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浩劫的來臨 1961-1966年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馬若德) 著　全譯本



三十年寫就宏篇巨著 系統闡述文革起源 全球首發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作者的文革前史三部曲，開創了西方研究文革的新領域。完整的中譯本終於問世，必將推動對文革更深入的研究。

——丁學良（香港科技大学社會科學部教授）

麥克法夸爾先生是美國知名的漢學家，五十年前就開始研究毛澤東和當代中國歷史。上世紀八十和九十年代他在哈佛大學主持費正清中心工作時，曾兩次邀請我到美國講學、座談毛澤東和當代中國的問題，可說是志同道合的老朋友了。他的有關文化大革命的巨著內容非常詳細。現在，他的中國為什麼會出現文化大革命的有關歷史巨著又要在香港出版了。我們真要向他致敬和致謝！

真實的歷史不僅可以鑒往知來，而且能弄清理論和主義的基礎。人類社會進步的普世規律，同弄清楚歷史事實是分不開的。對歷史要有忠誠的態度。任何理論都不能離開真實的歷史。

——李銳（中共黨史專家；前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據我的觀察，到目前為止，在國際學界（包括中國）關於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歷史及其起源的研究中，麥克法夸爾教授的這套書是最優秀的著作。無論是從史料的梳理，史實的把握，還是從邏輯的分析，它都顯示出一位熟知中國歷史的外國史學家的功力。相信這套書會給中國讀者帶來一個全新的視野，並有助於他們瞭解和研究自己的歷史。

——沈志華（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麥克法夸爾的這套書，稱得上是西方學者研究中國文化大革命史的開山之作，也是今人瞭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必讀書之一。

——楊奎松（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麥克法夸爾教授的文革史是研究中共高層政治的少有的傑出著作。它從毛澤東時代政治精英的意識形態與政策分歧和權力鬥爭來解釋文革的政治起源。由於麥克法夸爾教授對史料的嚴謹的研究和細膩與深刻的分析，這部文革三卷史已成為中國學的經典作品之一。

——裴敏欣（美國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政府學教授；凱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主任）

封面照片：
1966年12月28日，江青、周恩來和康生代表毛澤東和林彪接見全國集結北京的10萬紅衛兵。

新世紀出版社
New Century Press



HK $ 178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浩劫的來臨 1961-1966年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馬若德）著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BY RODERICK MACFARQUHAR

新世紀出版社
New Century Press

書名：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浩劫的來臨 1961-1966 年
作者：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馬若德）
初稿：　　何祚康、章宏遠、陸晉瑋、江元 譯；何祚康 統校
全譯稿：　　王笑歌 譯校
封面設計：　　Renee Chiang
出版社：　　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
www.newcenturymc.com
聯絡方式：　　editors@newcenturymc.com
國際統一書號：　　978-988-15570-0-1
定價：　　港幣 178 圓

香港印刷，2012 年 10 月。

版權聲明
沒有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 {New Century Media & Consulting Co. Ltd.} 的書面同意，本書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在任何媒介中複製或傳播。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English Title: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Author: Roderick MacFarquhar
Translation Draft: He Zuokang (also Editor), Zhang Hongyuan, Lu Jinwei, Jiang Yuan
Translation Editor: Wang Xiaoge
Design, Layout & Production: Renee Chiang
Publisher: New Century Media & Consulting Co. Ltd.
www.newcenturymc.com
editors@newcenturymc.com
ISBN: 978-988-15570-0-1
Price: HK $178

First printed in Hong Kong, October 2012.

©2012 New Century Media & Consulting Co. Ltd., Hong Kong.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hatsoever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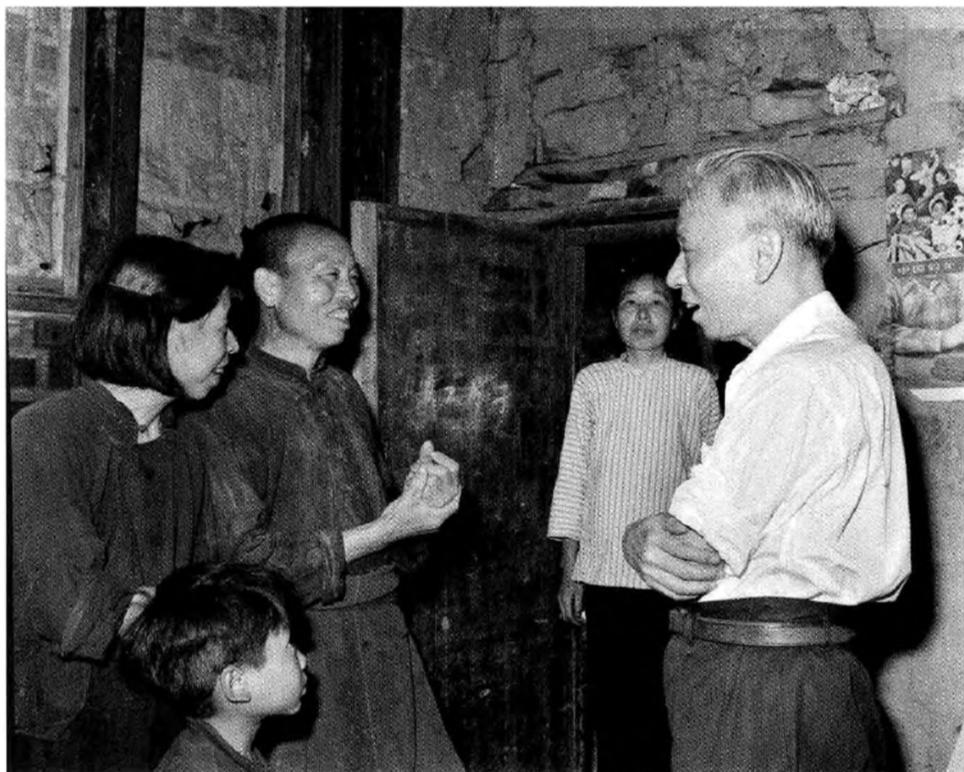
Original English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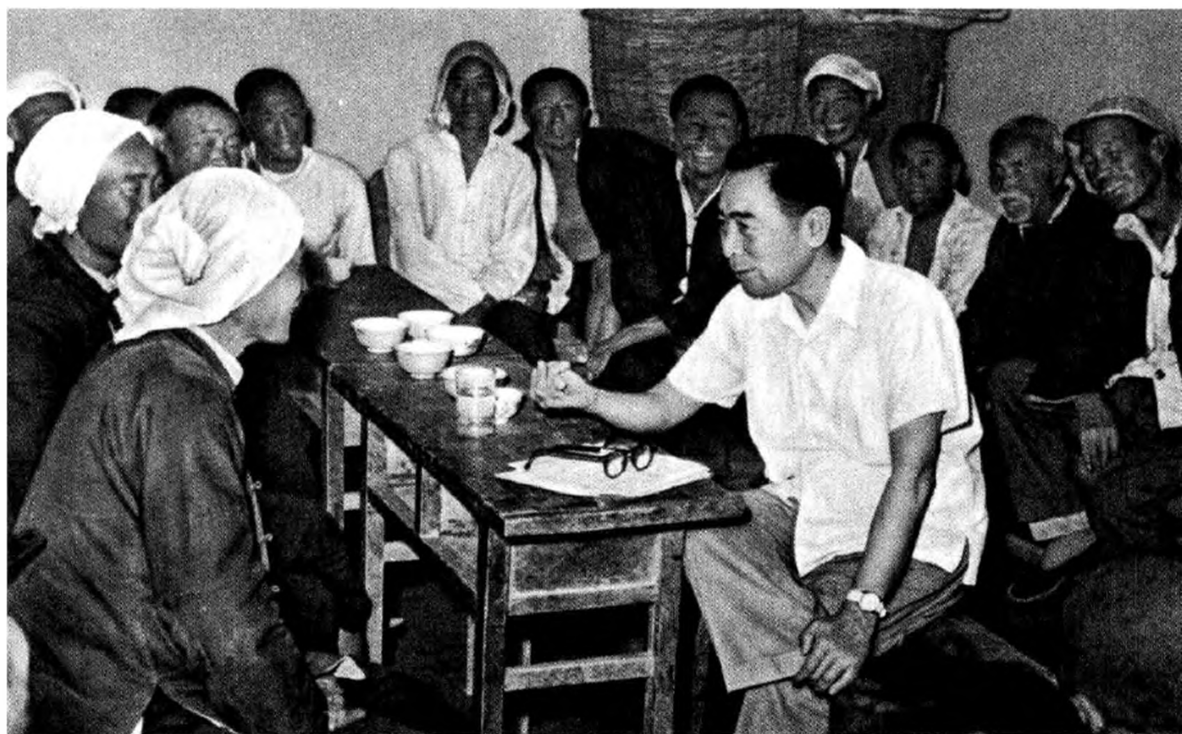
劉少奇指出自大躍進開始以來，除一年而外每年到年底都降低指標。他說，「『左』了這麼多年，讓我們『右』一下吧」。照片時間不詳。



劉於1961年1月1日到達湖南，直至5月15日才離開。一到那裏他就宣佈將以「遊擊方式」進行調查、生活，衣著從簡，目的地隨興，陪同人員只有他的夫人兼秘書王光美，以及一些職別較低的省裏的幹部。



劉少奇最初曾是熱情推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人之一。但是，隨著越來越多的不切實際的產量被宣佈出來，他評論說：「我們受騙了。」圖為劉少奇1961年4月在湖南。



周恩來剛開完廣州會議就馬上到河北武安縣視察一個公社。當一個特別直率的邯鄲農民對他說「如果情況一直像這樣繼續下去，甚至連你也可能沒飯吃」時，顯然周總理清楚地認識到了形勢的嚴重性。1961年5月。



沒有任何一次會議比 1962 年初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更使人感興趣了；它因空前的與會人數而被稱為七千人幹部大會。即使是八屆代表大會也只有 1026 名代表。它是大躍進後改革過程中的分水嶺。



大躍進的失敗改變了大多數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關於中國經濟發展的想法——甚至也包括像國家主席劉少奇這樣的人。1962 年 1 月，左起：周恩來、陳云、劉少奇、毛澤東及鄧小平。



中共十中全會毛的主要重點還是在後來貫穿於文化大革命意識形態的一些問題上：階級鬥爭，特別是在社會主義世界中的階級鬥爭。圖為 1962 年 9 月八屆十中全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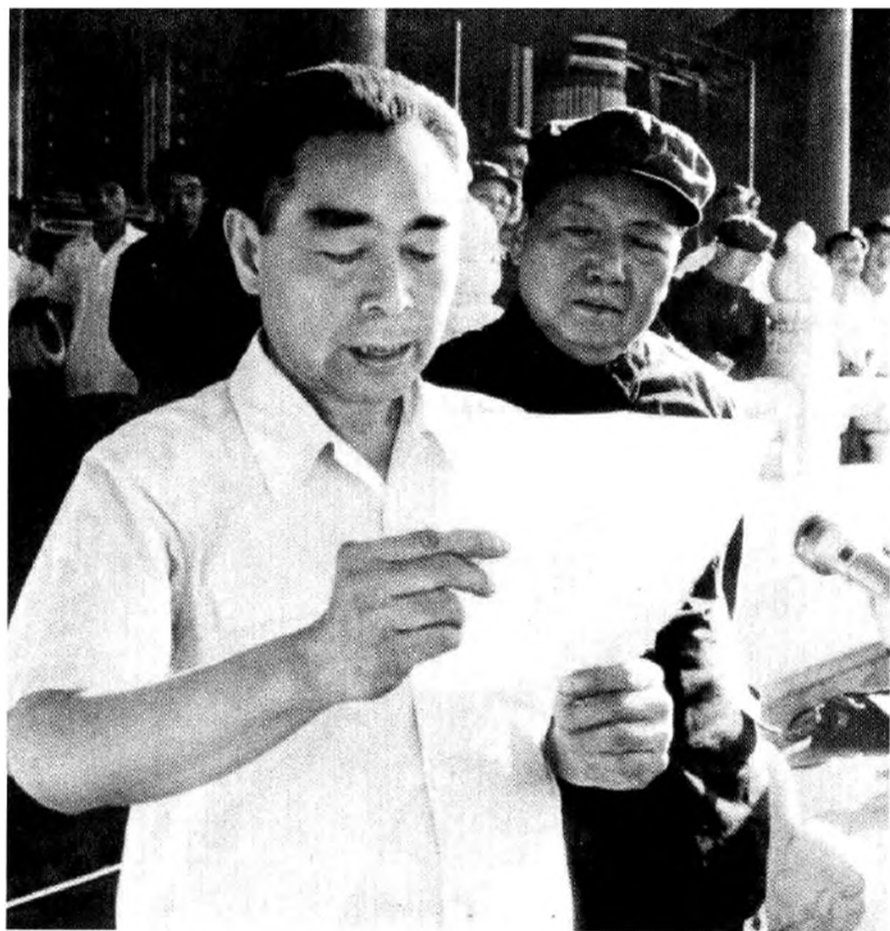
1962年，廣州軍委擴大會議，前左起陳毅、劉伯承、林彪、賀龍、羅榮桓。後左起羅瑞卿、聶榮臻、徐向前、陶鑄、葉劍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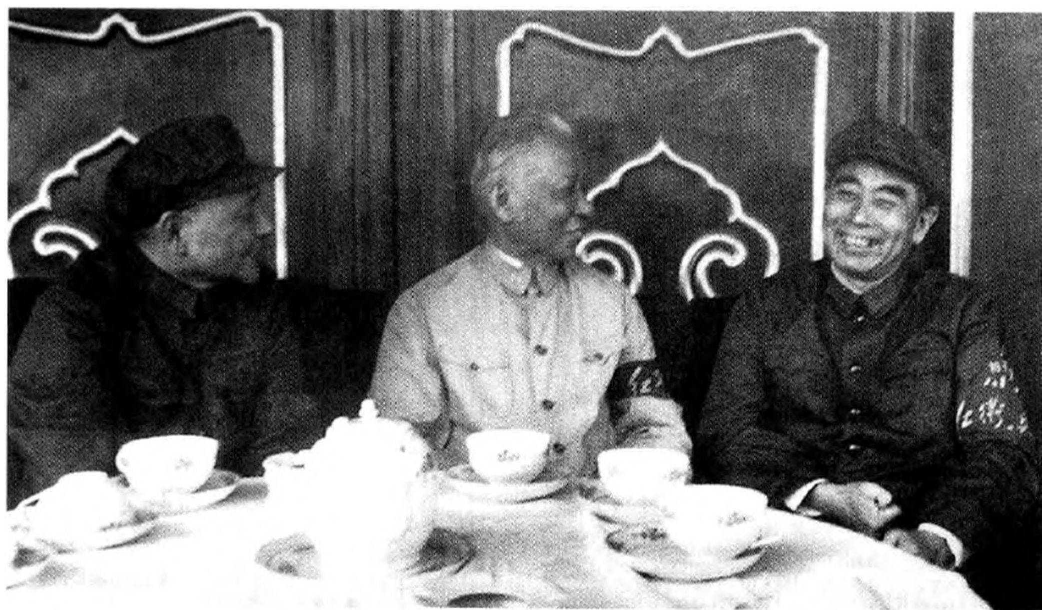
很多革命的勝利者滿足於權力和天下太平，毛不是這樣的人。舊革命已死亡；但革命萬歲！圖為1964年。



1963年9月中央工作會議討論了彭真的報告，在鄧小平與譚震林指導下，田家英起草了《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問題》，人稱《後十條》。圖為1963年10月10日。



1965年毛又贊成另一種觀點：中國「改變顏色」的關鍵在於中共內部是否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圖為1965年8月18日。



劉幾乎肯定從未想到過任何政變，但他卻未作任何抵抗，這確實是很奇特的。1966年，鄧小平、劉少奇、周恩來。



1966年7月16日，主席斬波劈浪，在長江順流暢遊兩小時。10天後，影片和報紙將這一壯舉傳遍中國。這是他隆重回歸公眾視線。



1966年8月18日天安門廣場上千百萬學生集會，狂呼毛主席萬歲。毛在隨後的3個月裏，親自出席另外7次這樣的集會，像是半個天神，激勵那些歇斯底里的紅衛兵去「炮轟司令部」。圖為1966年10月1日。



如果從上而下的革命，現在已不可能，那便應當進行從下而上的革命。如果黨不能改變社會，那毛便要發動社會來改變黨。



在中蘇集團解體後，中國成了世界革命的最後堡壘，主席必得尋到一種辦法，在他的人民心中植入一個意識形態的羅盤，永遠指向磁力中心的毛。圖為 1966 年 10 月 1 日。

獻給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研究的先鋒

史華慈 (*Benjamin Schwartz*)

多少事，從來急；
天地轉，光陰迫。
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
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毛澤東《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

新世紀出版社
New Century Press
www.newcenturymc.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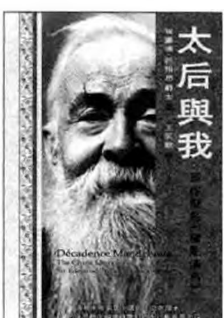












總經銷：田園書屋
香港九龍西洋菜街56號2樓
電話: 852-2385-8031
www.greenfieldbookstore.com.hk

目錄

全譯版前言......1

前言......3
導言......7
附錄一：出生率與死亡率......13

第一編 災荒第三年

第一章 中共中央第九次全體會議......17
第二章 緊急措施......29
第三章 農村工作的新路線......45
第四章 計劃迭出......76
第五章 紅與專......94
第六章 中國的孤立......124

第二編 虛假的黎明

第七章 七千人幹部大會......141
附錄二：暢觀樓事件......184
第八章 經濟困難......186
第九章 關於集體化的爭論......209
第十章 恢復統一戰線......230
第十一章「三家村」奇案......244

第三編 階級鬥爭

第十二章 毛改變了信號......255
第十三章 喜馬拉雅山戰爭，加勒比海危機......288
第十四章 毛負全責......314
附錄 3：獨裁角色和獨裁風格的比較......320
第十五章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323
第十六章 中蘇決裂和越南戰爭......336

第四編 延安圓桌會議的終結

第十七章 女戰士......367
第十八章 從灰色名人到紅色領導人......383
第十九章 毛以退為進......412
第二十章 浩劫來臨......441

結論......446

註釋......457
書目......585

内文列表

表 1 安徽省：1957-1962 年糧食與人口 8
表 2 少數省份 1957 年與 1960 年死亡人數 9
表 3 1959-1961 年人口負增長的省份（單位：千人）........11
表 4 1957-1962 年各省的出生率（單位：每千人）........13
表 5 1957-1962 年各省死亡率（單位：每千人）........14
表 1-1 1957 年和 1960 年每人主要食品消費量（單位：斤）........21
表 1-2 主要經濟數字，1960-1961 年（單位：百萬噸）........24
表 1-3 計劃與完成情況，1961：主要工業產品（% 變化）........24
表 2-1 中國的糧食出口，1958-1960 年份數量（百萬噸）增長（%）........31
表 2-2 糧食產量與貿易數字，1959-1966 年（單位：百萬噸）........34
表 2-3 中國進出口額，1958-1966 年（單位：百萬美元）........35
表 2-4 就業數字，1957-1966 年（單位：百萬）........40
表 2-5 對被遣返下鄉工人的經濟補償 41
表 2-6 零售物價指數 42
表 2-7 主要消費品零售價格，1957-1962 年（單位：元）........43
表 2-8 農業收購價，1957-1962 年（單位：元）........43
表 2-9 農業收購價（指數 1950 ＝ 100）........44
表 3-1 公社及其下屬單位的數量，1959-1961 71
表 4-1 手工業產值，1957-1966 年（單位：億元）........82
表 4-2 幾種工業產量數字，1960-1962 86
表 4-3 採礦設備（譯按，單位應為「千台」）........87
表 4-4 煤炭產量（百萬噸）........88
表 5-1 高教的擴張與收縮，1957-1963 年（院校的數目）........106
表 5-2 高等教育學生人數 107
表 7-1 國家收入中各經濟部門比例變化（%）........143
表 7-2 農業和工業工人數目的變化 (1957-1961 年）........143
表 7-3 糧食產量和收購量（噸）1957-1961 年 143
表 7-4 國家收購的其他主要農產品 1957-1961 年 143
表 7-5 消費品零售價格的變化（元）1957-1961 年 143
表 7-6 國家收入的主要來源（億元）1957-1961 年 144
表 7-7 主要農產品的國家收購價（元）1957-1961 年 144
表 7-8 國家開支的主要項目（億元）1957-1961 年 145
表 7-9 國家的收支（億元）1957-1961 年 145
表 7-10 1962 年的十年計劃目標（噸）........153
表 8-1 周恩來報告中的糧食數字 187
表 8-2 主要餘糧省向中央提供的糧食（單位：百萬噸）........187
表 8-3 周恩來對城市問題的表述 187
表 8-4 周恩來報告中的國際債務（10 億元）........188
表 8-5 由大躍進導致的中國的財政赤字（單位：10 億元）........189
表 8-6 餘糧省 1953-1961 年主要農產品產量（單位：噸）........202
表 12-1 1961-1964 年公社及下屬單位數量 279

全譯版前言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英文原版全書共三卷。第一卷《人民內部矛盾 1956-1957 年》、第二卷《大躍進 1958-1960 年》以及第三卷《浩劫的來臨 1961-1966 年》分別於 1974 年、1983 年和 1997 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與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聯合出版。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文版第三卷譯文 2005 年成稿以後在中國大陸未能發表。2011 年，作者麥克法夸爾（馬若德）教授本人將全部三冊中文譯文初稿及版權購回並授予本社發表。

初稿第一卷的譯者是：王紅續（第七章、附錄一、結語、第十六章註釋、索引的一部分）、趙麗江（第十二至十三章、第一至四章註釋）、宮力（前言、第二章第二節、第八章、第五至九章註釋、附錄一註釋）、馬陶（第二章第一節、第十九章、索引的一部分）、張沱生（第十六章第一至三節、第十四至十五章註釋）、李捷（第一章第一節、附錄二至附錄六、對書目和方法的說明、書目）、鄭謙（附錄七至附錄八、附錄七至附錄八註釋、第十七至十九章註釋、結語部分的註釋）、張霞（第十七至十八章）、招嘉熾（第四章第一節、第十至十三章註釋、附錄二至附錄六註釋）、呂虹（第十四章）、徐邦明（第十五章）、霍海丹（第十六章第四至五節）、譚一青（第一章第二節、第六章）、馬文倉（第五章）、黎青平（第九章）、謝偉民（第十章）、王雙梅（第十一章）、陳子光（導言）、傅鵬鵬（第三章、第四章第六節）、楊先文（第四章第二至五節）。校譯者是：何祚康、王澤槐。最後的中文統稿工作，由宮力、王紅續、馬陶、鄭謙四人合作完成。

初稿第二卷的譯者是：王紅續（第三章，導言、附錄 1 和第十章的註釋）、宮力（第七章和第八章，第七至第九章的註釋）、李捷（第

九章、關於書目的說明、書目，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的註釋）、趙麗江（第十章 13—15 節，第一至四章的註釋）、招嘉熾（第一章，第五、第六章的註釋）、呂虹（第六章第 1 節、索引）、馬文倉（第二章、第四章 1—3 節）、姚建平（第十章 1—4 節）、霍海丹（第十章 5—8 節）、譚一青（前言、導言、結語）、馬陶（第四章 4—7 節）、張平曄（第十章 9—12 節）、黎青平（第十一章 6—9 節）、傅鵬鵬（第五章）、邸文玉（第十二章 1—3 節、）苗彤（第十二章 4—7 節）、鄭謙（第十一章第 10 節、）孫建益（第六章 2—4 節）、張琦（第六章 5—6 節、附錄 1）、馬京波（第十一章 1—2 節）、李強（第十一章 3—5 節）、張霞（第十二章 8—10 節）。校譯者是：戴漢笠。最後的中文統稿工作，由鄭謙、霍海丹、李捷、姚建平四人合作完成。

初稿第三卷的譯者是：何祚康、章宏遠、陸晉瑋、江元譯；何祚康統校 。

本社的全譯稿補充了初稿中刪節的所有內容，並且對譯文進行了又一次校對。由殷钟睿以及王笑歌校譯；莫懷遠統校。

另外，全譯稿的最終出版得到了夏曉東先生不可或缺的幫助。

至此，完整的三卷中文全譯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終於和大家見面了。

新世紀出版社
2012 年 10 月 1 日

前言

1990年夏，我在上海的一家大書店書架瀏覽著新書。我愉快地看到本書前二卷的新譯本赫然陳列其上。當一位中國人在翻閱其中的一卷時，中國社會科學院派給我的陪同向他走去，告訴他，如果他購買該書，作者可以為他簽名。那位讀者回答說，「我在等第三卷呢。」從我羞愧地默默走出該書店之時起，我經常想著這位沉靜的讀者。這卷書終於出版了，我希望向我詢問這最後一卷何時出版的他和中國與西方親愛的同事與朋友們會對此感到滿意。

我一直堅持我25年前確定的原意：即研究文化大革命以前主要的重大事件對中國領導人的思想、行動與相互關係，以瞭解毛澤東為什麼決心將他努力創造的政權摧毀並重建一個政權。前幾卷的讀者可能還記得我特別感興趣的是毛對與他長期共事的長征和根據地同志的清洗，以及延安「圓桌會議」（譯按：指主要領導集體，原指英亞瑟王及其武士）的解體。這二者都是人間悲劇。

正如我寫前二卷時一樣，本書推遲出版使我能得到中國大量的資料，而這些資料又是我推遲出版的重要原因。十年前還是湍急的山間細流，現在已成了廣闊的長江。我完全意識到，想要描繪如此廣闊的場景，必然會遺漏重要的材料。這些材料可能會澄清現在仍使我迷惑不解的問題，然而，有些問題只有在共產黨的檔案最後對外開放時才能解決。

這些新材料對本研究產生什麼影響呢？我的論證仍然沿著原來的思路，但要感謝中國人的文件和著作，我的論證變得更容易了。喜歡自找麻煩的、一口氣讀完三卷書的讀者可能會發現我有兩個觀點起了變化。毛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不像個嚴厲但能團結人的圓桌會議的

主宰，而更像一個對別人抱有懷疑心的奧林匹斯山上的朱陛特神，隨時準備以萬鈞的雷霆打擊人。在某種程度上，這反映了毛在本書所述的十年中所處環境的變化多端，但我更傾向於認為他是有原罪的。第二，雖然在前幾卷所述中國政治進程中，農村顯然是一重要因素，在本卷中，農村則是理解文化大革命起源的根本。

有諷刺意味的是本卷之所以推遲完成是由於我在 1984 年鑽進了哈佛大學的象牙塔裏去了。二年前，作為一名訪問學者，除了授課而外，我沒有其他任務，我不能理解為什麼學者們不能寫出更多的著作來。現在我理解了。對管理學院略盡綿薄之力，特別是追隨菲利浦·庫恩（Philip Kuhn）指導費正清中心六年，雖然是件愉快的事，但這意味著我的研究與寫作（時間）主要只限於暑假。在這期間，是不會有多少學術成果的。

我更換工作得到的一個補償就是：由於我與中國問題學者和政治學家定期的交往，使我得以進入一個新的學習領域。與費正清共同編輯《劍橋中國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卷使我能掌握許多傑出專家的知識與智慧。費正清中心的課程——課程太多了，難以跟上——始終是個刺激。與中心的熟人和來訪者在餐廳共進午餐是特別有價值的，因為這時長期共事的同事們可以相互瞭解對方的觀點，而不受教室的拘束，也可以對世界的狀況哀歎惋惜。在過去，主要是我一個人工作，要感謝別人的幫助還是比較容易的；但現在，一想到要列舉曾啟發我、給我提供事實或參考材料的每一個人，就感到為難。

但是，在費正清中心，戈德曼 (Merle Goldman) 關於地球上一些不幸的人們——中國知識分子中「臭老九」一類的人——的開創性著作給我的著作增加了內容。施拉姆 (Stuart Schram) 對毛的革命著作所作的里程碑式的編輯，豐富了我對毛思想來龍去脈的瞭解。白魯恂 (Lucian Pye) 對毛所持的懷疑觀點比大多數人的觀點更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戴穆珍（Jean Oi）崔大偉（David Zweig）的著作幫助我以新的觀點看待中國的農村。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使我思考並使我打開了思路，他取得了盧斯（Luce）基金的優厚獎金與我們共同工作

了一年，參與了由魏昂德 (Andrew Walder) 領導的文化革命課題，邁克爾與我合作寫了一本關於文化革命的書（一卷本），泰偉斯（Frederick Teiwes）在與我自己相近的研究領域裏繼續出版了極好的著作。梅兆贊（Jonathan Mirsky）在《紐約書評》上的論文以及經常發表的談話迫使我重新審閱我的假設。

在中心的另一個好處就是它的圖書館，這對我接觸到大量新的中國文獻是絕對重要的。我衷心感謝該館全心全意的館長南希（Nancy Hearst）。從 80 年代該館將中國的資料擴大到收藏範圍內以來，她在中國和西方建立了聯絡網，使她能夠幾乎立即知道並得到最好的新書。全世界許多學者都知道，只要將你的研究領域告訴她，她就會到處搜索，使你完全滿意。她去年夏天到中國去採購，在聖誕節時獲得了豐收，當時從中國來的緩慢的輪船卸下了成包的書籍。

在我完成第一、二卷書以前，所有研究中國問題（譯者按：外國人將對中國的各種研究通稱為中國學，也有譯成漢學的，但漢學容易被誤解為漢文字學。對蘇聯高層的研究則被稱為克里姆林宮學）的專家們就已經可以自由地與中國公民接觸。在 1984 年和 1986 年夏，我在英國科學院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交流的贊助下，二次赴中國作學術訪問，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負責人的照顧下工作，並能利用中國科學院的圖書館。當時和以後，在各地我與許多作家、學者和學者兼官員談過話，並向他們學習。但我採訪在我以前學習期間頗為知名的退休的中央級幹部的要求卻始終未能如願。由於需要極端謹慎，我認為還是用英文字母來代表我採訪的人要好些，如知情人 A。除了這些花了時間向我提供情況的人而外，我將提到另一些增加了我對他們國家瞭解的人，即我們的研究生——丁學良、傅軍、龔小夏、顧為群、黃靖、黃亞生、景軍、裴敏欣、田東東、肖艷鳴、徐國琦、楊炳章、楊建利、尹曉煌、張煒以及鄭世平——其中一半人現在已是教授，有些人已出了第一本著作。我還十分感謝翻譯本書前幾卷和《劍橋中國史》的人們，他們的辛勤勞動使我能聽到來自中國人的聲音，他們提供情況，提出意見。

在準備書稿的最後階段，我還得感謝一些人。我再次感謝南茜·赫斯特極為細心地校對原稿，這是一項繁重的工作，需要核對書目與註釋，補充遺漏的參考材料，並將這些都以牛津大學出版社的體例列出。邁克爾·肖恩霍爾斯在收到稿件後，從斯德哥爾摩發出了許多電子郵件，糾正和補充我的結論，特別是第四部分。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審閱了有關經濟的章節，使我不犯大錯；蒂莫西·奇克（Timothy Cheek）將他書稿中有關鄧拓的最後一稿供我使用，並對第十一章提出了有洞察力的評論；傅軍核對了參考書目中中文書目的翻譯並校讀了原稿；黃靖關於黨派的論文給我教益良多，他仔細查閱了安徽報告與廖沫沙的著作。我將修訂的文稿送到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出版部主任瑪格麗特·梅（Margaret May）熱情地接受了這稿子，當然也驚奇地鬆了口氣。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安娜·伊林沃斯（Anna Illingworth)、邁克爾·貝爾森（Michael Belson）與杰夫·紐（Jeff New）仔細地編排了書稿，以備出版。安妮·霍爾姆斯以專業技巧和對中國的瞭解準備了複雜的索引。

埃米莉·麥克法夸爾（本書第一卷就是獻給她的，她耐心地等待第二、三卷的出版）以她那一貫敏銳的編輯之筆閱讀了整個文稿，並根據她任《經濟學家》和《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記者時所積累的有關中國的知識提出了探討性的問題。像往常一樣，她的參與增加了幾周的工作量，但由於我用計算機取代了打字機，我發現我能平靜地忍受來自妻子的嚴格要求，愉快而輕鬆地執行重寫的要求。但我仍應一個人對最後的成果負責。

我將本卷獻給我的老師、同事和朋友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他使我邁進哈佛大學，他過人的才智、廣博的知識、深邃的智慧與諷刺的機智都體現在他的著作和談話裏並繼續增加了我對中國的瞭解。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馬若德）
1995 於馬薩諸塞州，劍橋市

導言

鳳陽縣出名是因為它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出生地。鳳陽坐落在中國中部安徽省的西北部。該縣長期的貧困突出表現在一句老話上，即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1]但即使按照鳳陽低得可憐的標準看，大躍進（1958 至 1960 年）所帶來的饑荒也是災難性的。1959 與 1960 年，共有 60,245 人死亡，佔該縣人口 335,698 人的 17.7%。在受災最嚴重的幾個公社，死亡率高達 26.9%、26.6% 與 24.2%。這幾個公社中的一個大隊，死亡百分比為 39.7%，人口總數為 4,100，即死亡 1,627 人。在一個村子裏，70 人中死亡了 48 人。在全縣，有 8,404 戶（其中一戶有 12 人）成為絕戶，佔總數的 3.4%；在一個村子裏，20 戶死了 4 戶。由於死亡率高，活下來的人逃荒在外，鳳陽有 27 個村（其中的一個公社即有 21 個村）成為空城[2]。在最嚴重的 1959 年冬至 1960 年春期間，為了生存，甚至出現妻子離家出走，與另一男子結合的情況；1960 年至 1961 年間，重婚案增加了 27.5 倍，離婚數增加了 2.9 倍。[3]在安徽另一個縣，一名在文化大革命中「下放」向貧農學習的教師發現她所在的村子，在 1960 年有一半人口死去。直到 1969 年，開水還是奢侈品，因為燃料極為稀少！當地情況極為原始，一名中國古代史學者將這個村與在西安附近出土的新石器時代的遺址相比擬。[4]

鳳陽的情況可能是特殊的，但全省受到的損失是嚴重的。到 60 年代初，在安徽「上百萬人……大多數是農民，餓死了，這是個公開的秘密」[5]。甚至在省會合肥，糧食定量到 1959 年夏也減至每年 312 斤。「供應的主食是紅薯乾、紅薯麵、玉米麵和高粱麵。米和麵粉只在國家節日時有少量供應。」[6]據官方統計，該省糧食產量在 1958 年與 1959 年大幅下降（1958 年減少 13.9%，1959 年再減少 20.7%），並繼續下降

至 1961 年。全省人口從 1959 年末的 3,420 萬人降至 1961 年末的 2,980 萬人。在正常年份，安徽每年死亡 25 萬人；在 1954 年，該省洪水肆虐，51.5 萬人死亡。而在 1960 年，死亡人數為 220 萬人，為正常年份的 10 倍，是最壞的前一年的 4 倍；[7] 全省人口下降 11.2% [8]。據前高級官員說，由於大躍進，該省共死亡 800 萬人。[9]

表 1 安徽省：1957–1962 年糧食與人口

年份	糧食（百萬噸）	人口
1957	10.270	33,370,244
1958	8.845	33,941,565
1959	7.010	34,265,037
1960	6.746	30,425,058
1961	6.290	29,876,855
1962	6.707	31,335,852

資料來源：安徽省統計局編：《安徽四十年》，第 40、102、123 頁。

四川省的人口資料與安徽類似。[10] 該省糧食產量從最高的 1958 年的 2,245.5 萬噸降至 1960 年的 1,339.5 萬噸。四川這個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末的 1957 年達到革命後最高的 7,081 萬人。4 年後，在 1961 年，該省人口減少 600 多萬人，僅 64,591,800 人。直至 1965 年人口才超過 1957 年的高峰。[11] 在 1957 年，該省人口每月增加 100,217 人，到 1962 年全國開始從大躍進以後的災難中恢復時，每月人口的增長降至 72,219 人。1957 年，每月出生 170,774 人，在 1962 年則為 151,091 人。[12]

山東人口僅次於四川。1959 年 9 月再次發起大躍進，後一年，山東死亡人數比往年多 650,000 人，有 420 萬人患病，比如因營養不良導致水腫。該省人均主食（穀物）消費量降至每天 0.42 磅，據估計全省 5,400 多萬人口中有 1/4 至 1/3 人挨餓，110 萬人逃離家園去尋求食物。[13] 山東省委 1960 年 10 月 27 日發佈緊急指示，比 11 月 3 日的全國緊急指示 12 條早一個星期。該省情況極為嚴重，在該年的最後二個月，中央政府運去 50 萬噸穀物，2,000 輛拖拉機並捐贈 8,000 萬元幫助救濟。

其他華東各省則提供了 10 萬噸穀物，12.5 萬噸其他食物和 170 萬件棉衣。[14]

我們還可以看一眼災荒對河南省基層的影響。在河南，在第一書記吳芝圃的領導下，大躍進的左傾主義氾濫成災。[15] 在信陽，死亡人數達到 113.6 萬人，為該地區 800 萬人的 14.2%，群眾大量外逃。所謂信陽「事件」如此嚴重，不得不派了一支 4,633 名人員的隊伍，其中 359 人來自中央機關，1,223 人來自省級機關，來處理這次危機以及由危機引發的一些「反革命」活動。[16]

對河南以及其他受災嚴重的省份的影響見表 2。

表 2　少數省份 1957 年與 1960 年死亡人數

年份	甘肅	廣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江蘇
1957	142,041	261,785	572,000	290,600	370,059	424,500
1960	538,479	644,770	1,908,000	670,300	1,068,118	785,900

資料來源:《中國人口》各分冊：甘肅分冊，第 121 頁；廣西分冊，第 113 頁；河南分冊，第 106 頁；湖北分冊，第 106 頁；湖南分冊，第 138 頁；江蘇分冊，第 113 頁。

即令在受影響較小的省份，如河北，病人、老人與嬰兒死亡也很多。妻子被當作「表姊妹」出賣，以換取食物與現金。大隊發出證明允許農民乞討。盜匪襲擊糧站與火車，不得不派出部隊去保護。[17] 北京是享有特殊照顧的地方，人年均豬肉消耗量從 1958 年的 13.3 斤降至 1960 年的 5.3 斤。1961 年則降至 2.1 斤。[18] 而年死亡人數從 1957 年的 320,000 人升至 1961 年的 790,000 人。[19] 在上海，豬肉零售量從 1958 年的 65,800 噸降至 1960 年的 17,600 噸，大躍進後的 1961 年又降至新低，為 7,500 噸。[20] 這些數字並不令人吃驚，因為國家收購的豬從 1958 年的 46,337,000 頭降至 1960 年的 19,913,000 頭，在 1961 年再降至 8,071,000 頭。[21]

在中國的古拉格（譯按：指勞改營）裏，情況更糟。在勞改營裏，工作時間不得不減少，並拿犯人做試驗，以紙漿和沼澤的浮游生物喂給他們吃。前一種辦法導致便秘，而後一種辦法則使身體較弱的犯人死去。

自 1960 年夏末開始，12 個月內，一個大隊有 3/4 人死去或被送至等待死亡的營地。[22] 一名犯人描述了飢餓是怎樣致人於死地的：

> 我開始瞭解飢餓至死的過程了。當饑饉襲擊勞改營時，直接原因很少是營養不良。心臟並不因為缺乏營養就停止跳動。不吃不喝一個、甚至二個星期，人仍能活下去，這取決於人們的整體健康狀況。在如此匱缺的狀態下，使人死亡的是其他因素。有時，你著涼了，肺裏充水，最後你就停止呼吸了。有時，食物裏的細菌使人腹瀉不止，最終導致死亡。有時傷口感染成了致命的原因。在犯人的檔案裏，記載的死亡原因總是胸膜炎或食物中毒或因傷致死，從來不是飢餓。[23]

據另一犯人說，在青海：

> 我們不相信死亡會如此容易就降臨了。死屍多得像雨點，我們一連三年都處於嚴酷的地獄中。如果你那時看到我們，你會發現每個人的臉都餓成一個灰色的面具了，沒有血肉，也沒有生氣。這些臉與死人的臉毫無差別。無論是什麼臉型，都餓得只剩皮包骨頭。眼睛不像眼睛，而是眼窩裏的果核。這樣的眼睛毫無光澤，卻足以看出它們的主人已經瀕臨絕境，它們比任何語言都更說明問題。

據這名犯人的估計，在青海勞改單位裏死了約 20 萬人。[24] 整個中國基本都是如此，出生率下降，死亡率增高（見附錄一）。在有些省份乃至全國，至少有一年人口是負增長。[25]

上述數字冷酷地說明，60 年代初，中國陷入了歷史上最嚴重的人為饑饉之中。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本希望舉全國之力，通過大躍進的方法使國家與人民脫離貧困。但相反，他卻帶來了人間的災難。西方最近的人口分析表明 1958 年與 1961 年之間，中國人額外死亡了 3,000 萬人。[26]

表 3 1959-1961 年人口負增長的省份（單位：千人）

	1959	1960	1961
中國		-4.57	
安徽		-57.20	
甘肅		-25.79	
廣西		-10.06	-1.77
貴州		-19.41	-0.21
河南		-25.58	
湖北		-5.00	
湖南		-9.43	-4.97
遼寧			-0.30
青海		-27.66	-0.25
山東		-4.10	
四川	-30.26	-42.24	-17.61
雲南		-2.07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綜合司編：《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歷史統計資料彙編（1949-1989）》：安徽第 405 頁；甘肅第 829 頁；廣西第 642 頁；貴州第 721 頁；河南第 523 頁；湖北第 555 頁；湖南第 585 頁；遼寧第 213 頁；青海第 859 頁；山東第 492 頁；四川第 690 頁；雲南第 751 頁。

隨著死亡人數大量增加，據說中國領導人對自己的口糧也實行配給，不過相對說來，他們吃得還是好的。[27] 毛 1960 年有 7 個月不吃肉。[28] 周恩來總理經常用桌子上的算盤計劃全國人口的糧食需求。據說他自己每月只吃 15 磅糧食，將定量的剩餘部分用於必須的請客。據他的警衛說，在這一期間，他從不吃肉或蛋。他責備工作人員接受了各省送給領導人的蔬菜。[29]

但是，高層人士的內疚做法不能解決毛和他同事們因好高騖遠所引起的災難。1959 年上半年採取了初步補救措施，但在該年夏天的廬山會議後中止了。毛在會上憤怒地反擊了當時的國防部長彭德懷對大躍進的批評。1959-1960 年的水災和旱災又加劇了巨大的人為錯誤。一直等到第二年的秋季，中國經歷了一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自然災害，毛才下令後退，[30] 即令如此，1961 年也是第三個「困難年份」。實際上，它是最糟的一年。

但至少毛停止了——以後證明是永遠停止了——有些同事正確地所說的「冒進」。本書從1956年開始講起，部分原因是當時，在集體化以後，毛開始有經濟躍進的想法。此時，經過5年的積極推進以後，他不情願地放棄了中國可以一夜之間成為超級大國的幻想。

大躍進的失敗改變了大多數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關於中國經濟發展的想法——甚至也包括像國家主席劉少奇這樣的人。他們曾積極在「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下尋求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他們在60年代初所作的痛苦的重新評價使毛懷疑他們有的私下裏不公開的想法，即毛是否繼續適宜作為革命成功後的領袖。他的偏執妄想和對中國政治前途真正的擔憂結合在一起，而這種擔憂是當時國內情緒低落和他認為蘇聯丟棄了列寧主義而引起的。

本書從1956年開始講起的另一個原因就是中蘇爭論是在那一年開始的。蘇聯共產黨第一書記尼基塔·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使毛感到尷尬。毛像蘇聯過去的獨裁者一樣，醉心於極度的「個人崇拜」。該報告導致的匈牙利叛亂促使毛懷疑赫魯曉夫是否有資格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制定意識形態的準則。到1960年，北京與莫斯科就一系列民族和國際問題發生了激烈爭論，赫魯曉夫斷然撤走了幾千名蘇聯技術援助人員。在60年代初期，隨著兩國關係的進一步惡化，毛就已考慮如何在中國挫敗類似的、對革命的叛變。

國內集體主義烏托邦和共產主義國家間兄弟情誼的垮臺對毛主席的思想有著重大的影響。本卷逐年記錄了毛在在物質上改造中國失敗以後，怎樣集中精力去力求改變這個國家裏人的精神思想。它試圖解釋，為什麼在毛主席這樣做的過程中，決定摧毀他曾努力建立起來的政權並重建一個政權。

附錄一：出生率與死亡率

表 4　1957-1962 年各省的出生率（單位：每千人）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安徽	29.75	23.83	19.89	11.35	12.34	53.26
北京	42.10	37.02	30.70	33.03	25.70	35.92
福建	37.88	29.12	27.56	25.11	17.42	40.16
甘肅	30.00	31.50	19.30	15.50	14.80	41.10
廣東	34.99	30.10	24.67	18.96	21.27	43.31
廣西	34.52	32.87	24.52	19.40	17.73	39.08
貴州	41.12	30.08	26.76	25.97	17.32	41.54
河北	29.62	24.45	23.09	20.51	15.13	28.68
黑龍江	36.58	32.98	30.38*	32.50	27.27	35.46
河南	33.71	33.16	28.07	14.01	15.31	37.50
湖北	34.36	30.49	26.42	16.41	27.34	42.51
湖南	33.47	29.96	24.00	19.49	12.52	41.40
江蘇	34.48	24.83	20.91	18.56	18.83	33.30
江西	38.34	30.28	28.64	26.87	21.00	37.19
吉林	35.46	33.31	28.04	32.51	26.45	40.70
遼寧	41.90	38.70	28.00	31.80	17.20	34.10
內蒙古	37.20	28.40	30.80	29.40	22.10	38.20
寧夏	43.24	39.32	23.80	16.58	13.03	44.60
青海	32.18	27.97	23.02	13.07	11.43	35.72
陝西	32.20	26.70	26.60	27.70	21.10	34.60
山東	35.80	25.00	20.90	19.50	21.40	38.10
上海	45.60	36.00	27.80	27.60	22.40	26.30
山西	33.30	28.70	27.50	27.30	19.10	37.70
四川	29.22	24.03	16.71	11.73	11.81	28.01
天津	37.28	34.56	28.49	27.38	20.42	33.68
新疆	31.48	31.03	29.87	28.13	25.16	32.02
雲南	36.27	23.61	20.93	24.19	19.40	39.71
浙江	34.94	34.10	26.28	23.52	17.58	36.08*

註 *：資料來源中小數點後一位數字不清。

資料來源：安徽分冊，第 82 頁；北京分冊，第 85 頁；甘肅分冊，第 94 頁；廣東分冊，第 93 頁；廣西分冊，第 82 頁；河北分冊，第 102 頁；黑龍江分冊，第 84 頁；河南分冊，第 73 頁；湖北分冊，第 83 頁；湖南分冊，第 99 頁；江蘇分冊，第 89 頁；吉林分冊，第 77 頁；遼寧分冊，第 53 頁；內蒙古分冊，第 75 頁；寧夏分冊，第 90 頁；青海分冊，第 97 頁；陝西分冊，第 89 頁；上海分冊，第 72 頁；山西分冊，第 64 頁；四川分冊，第 87 頁；天津分冊，第 75 頁；新疆分冊，第 82 頁；浙江分冊，第 88 頁。有些數字摘自國家統計局綜合司編：《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歷史統計資料彙編（1949-1989）》，福建，第 433 頁；貴州，第 721 頁；江西，第 464 頁；山東，第 492 頁；雲南，第 751 頁。1965 年以前西藏未予收集數字。本資料的數字與分冊中的數字往往有差異，但只是小差異。

表 5 1957-1962 年各省死亡率（單位：每千人）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安徽	9.10	16.72	缺	68.59*	缺	8.23
北京	8.19	8.08	9.66	9.14	10.80	8.77
福建	7.85	7.46	7.88	15.34	11.87	8.28
甘肅	11.32	21.11	17.47	41.46	11.47	8.24
廣東	8.43	9.13	11.74	15.12	10.67	9.32
廣西	12.35	11.74	17.49	29.46	19.50	10.25
貴州	8.77	13.69	16.18	45.38	17.73	10.41
河北	11.30	10.92	12.29	15.84	13.63	9.06
黑龍江	10.40	9.10	12.80	10.50	11.10	8.70
河南	11.81	12.70	14.12	39.60	10.18	8.03
湖北	9.64	9.64	14.50	21.19	9.19	8.76
湖南	10.41	11.65	12.99	29.42	17.49	10.23
江蘇	10.26	9.40	14.55	18.41	13.35	10.36
江西	11.48	11.34	13.01	16.06	11.54	11.00
吉林	9.10	9.10	13.41	10.10	12.00	10.00
遼寧	9.40	8.80	11.80	11.50	17.50	8.50
內蒙古	10.50	7.90	11.00	9.40	8.80	9.00
寧夏	11.06	14.98	15.82	13.90	10.71	8.49
青海	10.40	12.99	16.58	40.73	11.68	5.35
陝西	10.30	11.00	12.70	12.30	8.70	9.40
山東	12.10	12.80	18.20	23.60	18.40	12.40
上海	6.00	5.90	6.90	6.80	7.70	7.30
山西	12.70	11.70	12.80	14.20	12.20	11.30
四川	12.07	25.17	46.97	53.97	29.42	14.62
天津	9.35	8.66	9.88	10.34	9.89	7.36
新疆	14.00	13.00	18.84	15.67	11.71	9.71
雲南	16.29	21.62	17.95	26.26	11.84	10.85

註 *：資料來源中二處是此數字，第三處為 65.58。

資料來源：安徽分冊，第 78 ～ 79，91，130 ～ 131 頁；北京分冊，第 112 ～ 113 頁；甘肅分冊，第 121 頁；廣東分冊，第 121 頁；廣西分冊，第 113 頁；河北分冊，第 135 頁；黑龍江分冊，第 118 頁；河南分冊，第 110 頁；湖北分冊，第 106 頁；湖南分冊，第 138 頁；江蘇分冊，第 113 頁；吉林分冊，第 104 頁；遼寧分冊，第 53 頁；內蒙古分冊，第 75 頁；寧夏分冊，第 111 頁；青海分冊，第 124 頁；陝西分冊，第 124 頁；上海分冊，第 72 頁；山西分冊，第 64 頁；四川分冊，第 118 ～ 120 頁；天津分冊，第 75 頁；新疆分冊，第 109 頁；浙江分冊，第 115 頁。與前表相同，有些數字來自《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歷史統計資料彙編（1949-1989）》，北京，第 62 頁；福建，第 433 頁；貴州，第 721 頁；江西，第 464 頁；山東，第 492 頁；四川，第 690 頁；雲南，第 751 頁。1965 年以前西藏未收集數字。與出生率的資料相同，本資料的數字與分冊的數字經常有差異，但只是小差異。

第一編

災荒第三年

第一章 中共中央第九次全體會議

1960 年夏季，當鬱鬱不樂的毛意識到他犯下的錯誤有多麼嚴重以後，理智開始佔了上風[1]。6 月在上海召開的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作了一系列講話，其中談到要調整目標，要重視質量和品種，而不是僅重視數量。他描述大躍進為一次真正的躍進，然而還有調整的餘地。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需要調查研究，[2] 在這方面仍然存在著「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客觀領域」。1960 年 7 月 15 日至 8 月 10 日在北方海濱避暑勝地北戴河召開了夏季例行的中央工作會議。在此會議上下達了一條指示，中國共產黨要把總的工作重點放在農業，特別是放在提高糧食產量上。然而，對於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提出的「調整、鞏固、提高」的建議並未採取任何行動。直到周恩來總理加上了「充實」，這個加長了的口號才在 9 月 30 日國家計委關於 1961 年調控指標[3]的計劃報告中得以廣泛傳播。但是，1962 年初劉少奇被迫承認，可惜這條「八字」方針在許多方面並未得到貫徹執行。[4]

同樣不幸的是，毛依然對提高鋼產量懷有極大的狂熱。[5] 他告訴李富春和國家經委主任薄一波，該年冬季 7,000 萬人民應當再次投身於大煉鋼鐵的運動中。顯然，他相信比 1959 年鋼產量提高 900 萬噸，即達到 2,200 萬噸的目標是可以實現的。他仍然渴望鋼產量達到他看作是魔力般的數字—— 一億噸，儘管他把這個目標推遲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 20 週年（1969 年）時實現。[6] 就在北戴河會議召開之際，蘇聯技術顧問突然全部撤走，[7] 這個消息刺激了毛澤東。1960 年上半年鋼產量不足，表明即便是原計劃 1,800 萬噸的指標也極難達到，可是毛顯然認為當時國家的榮譽受到了威脅，他在 12 月 3 日的緊急指示中也是

這樣表述的，發動全國進行一次最後的努力。在付出沉重的經濟代價後，煉出了 1,866 萬噸鋼。[8]

幸而毛澤東在農業戰線方面比較願意接受理智的建議。10 月份，周恩來總理提出採取比北戴河會議通過的決議更激烈的措施。11 月 3 日，中央發佈了「十二條緊急指示」，旨在通過鼓勵農民種自留地以恢復對他們的物質刺激，以及削弱公社在所轄生產大隊中推行平均主義的權力。生產隊有各式名稱：「隊、大隊、管理區」，但是與在此之前的先進的或「高級」(完全社會主義的) 農業生產合作社相比，它又處於三級所有制——公社、大隊、隊——的基礎階段，而且預計還將持續至少 7 年，公社在 1958 年平均主義高潮期間所佔有的所有財產都將歸還。實際上，這個指示重申和進一步發展了原本由毛澤東於 1958 年 11 月鄭州會議直至廬山會議之間規定的較為溫和的政策。[9]

11 月 15 日，中央又發出一個進一步的指示，呼籲摒棄「五種工作作風」(五風)，它源自 1958 年的「高潮」：共產風 (公社內部過度的集體主義／平均主義)；浮誇風；命令風 (不進行勸導和解釋而僅依靠行政命令)；幹部特殊風；對生產瞎指揮風。[10] 11 月 28 日，中央傳閱了甘肅省寫的一份報告，毛在上面附了引人注目的按語，承認在 1958 年所犯的個人錯誤。當時他過高估計了農村所有制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速度。[11] 毫無疑問，他是勉強承認這一點的，因為儘管有中央的命令，一些省級官員仍然認為左比右保險，而且他們很不情願揭露這場災難的嚴重程度，對這場災難他們是負有責任的。[12]

12 月 24 日，主要領導人參加了一次中央工作會議，這次會議一直開到 1 月 13 日，也就是第九次全體會議的前夕。[13] 第九次全體會議作出若干重要決定並正式通過。農產品收購價格分兩個階段提高：1961 年提高穀物、食用油、生豬、家禽、雞蛋的價格；1962 年提高棉花和其它農產品的價格。國家撥 10 億元人民幣專門用於提高穀物收購價格；隨後的中央全會決定，提高收購價格應從夏收開始，應平均提

高 20%，實際上最後提高了 25%，作為主要產糧區在 1960 年取得成就的獎勵補償。[14]

全會還決定賠償大躍進的平均主義對農民進行掠奪造成的損失。為此專門劃撥了 25 億人民幣的巨額資金，其中 15 億在 5 個月內以現金償付，在此期間對公社進行了調整；據說 20% 的公社已陷入困境；另外 10 億元以銀行借據的形式發放。為刺激農業發展而採取的措施還有：把分配給農民搞副業的自留地（11 月在「十二條緊急通知」中規定的）由 5% 提高到 7%，並且鼓勵開放農村集市。[15] 毛在講話中承認社會主義建設不能過急，而將持續 50 年。[16] 在 1 月 13 日的講話中，他強調了一個越來越重要的主題，那就是領導人要深入基層進行全面的調查研究，為制定政策提供事實依據。[17]

大躍進結束了；三面紅旗萬歲！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於 1961 年 1 月 14 日至 18 日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的任務是正式確認旨在減輕經濟危機已採取的種種措施，另外也反思自上一次廬山會議 17 個月來中國外交經受的災難。議事日程上最為緊迫的一項就是食品極度短缺，這已造成數百萬人餓死，並使人口出生人數從 1957 年的 2,100 萬陡降至 1960 年的 1,250 萬。[18]

1960 年的糧食產量僅有 14,350 萬噸，下降了 15.5%（1959 年下降幅度與此基本一樣），這個數字是自 1950 年中國國內和平以來的最低點。根據每人每年平均消費 250 公斤糧食計算，就缺 2,400 萬人的口糧。國家糧庫的儲備糧從 1957 年的 3,000 萬噸下降到 1960 年的 1,800 餘萬噸。對於官方來說，儲備糧的多寡似乎比糧食產量更為重要。1960 年政府試圖以強制性的手段多購買糧食 300 萬噸，上升到 5,100 萬噸以上。政府從農村的農民口糧、牲口飼料，甚至種子中榨取到這些糧食。因此，作為主要肉類來源的生豬頭數下降了 1/3，達到 1950 年

以來的最低點。儘管如此，國家統計局在 12 月份的報告中不得不承認到 11 月份，強制性購糧下降了 34%。

對於烹飪必不可少的食用油料作物產量暴跌 47.7%，比糧食產量下跌的幅度還要大，甚至比 1949 年仍處於內戰之中的舊中國時的產量還低，收購量降低了 42%。不僅如此，作為國家布料基本原料的棉花產量降至自 1951 年以來的最低點，降低了 37.8%，收購量降低 23%。[19]

與物質匱乏相對應的是貨幣發行量的大幅度攀升。人民幣的發行量從 1957 年的 52.8 億元上升到 1960 年的 95.92 億元，增長了 80% 多。這是大躍進擴張政策的後果，它導致了政府部門之外的公開市場的嚴重通貨膨脹。糧價為 1.1 磅／1 元～ 2 元，增長了 10 倍～ 12 倍；1 個雞蛋 5 角錢，1.1 磅豬肉 5 元，1 隻雞 10 餘元。[20]（譯按：1.1 磅等於 1 市斤）

農村危機迫使政府把 1961 年的農業徵收糧降至 1,110 萬公噸，比 1960 年降低了 42%。[21] 徵收糧的價格在 1959 年曾達到頂峰，1960 年降至 28.04 億元，1961 年降至 21.66 億元，這是自 1950 年以來的最低點。[22]

在主要生活必需品的產量災難性下降的同時，建立新政權的頭幾年中人口增加了 1 億。[23] 隨之而來的是消費水準的下降，農村的情況尤為嚴重，見表 1-1。

在第九次全會上，毛重申破除「五風」的必要性。他在最後一天作報告時的基調是強調實事求是的重要性。[24]「實事求是」必須作為 1961 年的口號。[25] 調查研究是達到這一目標的手段。[26] 實行兩個指標—— 一個是公開的、確定能夠取得的成就；另一個是不公開的、但力爭取得的成就——的作法應被放棄。[27] 大躍進時期的先鋒省河南採取的「四高」政策——高指標、高估產、高收購、高消費——也應被摒棄。[28] 一段時間後，即在當時進行的整風運動結束時仍不改變工作作風的死官僚將被撤職。[29]

表 1-1　1957 年和 1960 年每人主要食品消費量（單位：斤）*

	1957	1960
糧食	406.0	327.0
城市	392.0	385.0
農村	409.0	312.0
植物油	4.8	3.7
城市	10.3	7.1
農村	3.7	2.9
豬肉	10.2	3.1
城市	18.0	5.4
農村	8.7	2.4

註 *：1 斤大約等於 1.1 磅或 0.5 公斤。
資料來源：《黨史研究》，1980 年，第 6 期，第 24 頁。

毛對於自己在大躍進造成的災難中所起的作用並未公開顯露出有什麼後悔的表示。在幾周後會見法國社會黨領導人弗朗索瓦·密特朗時，他甚至明確否認中國發生了饑荒。相反，在九中全會上他提到 1959 年上半年他發出的一些反左的指示，實際上是指責省一級的官員沒有執行這些指示。[30] 他回憶起人們在廬山會議上說：「你也犯了錯誤。」對此他並不惱火，每個人都犯了錯誤，問題的實質在於這些錯誤的嚴重性。[31] 他承認在廬山會議上開展的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運動（如對彭德懷及其同情分子的反擊）搞亂了對左傾的糾正，但他又一次斷言這次運動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廬山會議之後再次發起的大躍進運動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在水土保持方面。[32] 大概就是在這次會議上毛重複了他慣常對當時國內形勢的樂觀的評價：「形勢大好，問題不少，前途光明。」[33]

像往常一樣，毛的王牌就是呼籲團結。「中央的團結是全黨團結的核心。」[34] 為了強調他個人對這一觀點的執著，他用和解的口氣提到了他在廬山會議上的對手：「彭德懷給我寫了信，彙報了一年來的學習體會，不論他是否取得了進步，都是應該歡迎的。」[35] 毛在這簡單的一句話裏試圖傳達這樣一個意思，即毛本人是寬宏大量的，而彭則頑

固不化。毛準備接受大躍進的終結，但並不打算給他的主要抨擊者復職。

但是對於那些計劃者來說，他們擔負著從大躍進造成的後果中恢復國民經濟重任，為彭德懷這樣一位敢於說出懷疑的人恢復名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讓毛重新支持經濟恢復計劃，即農業優先於工業，輕工業優先於重工業，[36]這實際上是暫停發展重工業。毛做好了鋼產量保持 1,800 萬噸，或再增加不超過 100 萬噸的思想準備，並接受「調整、鞏固、充實、提高」這個新口號。這被認為是「緊急時期的緊急措施」[37]。

此外，對各省執行政策的自由度要加以控制，並重申中央對經濟的統管。各省的自由是大躍進的一種災難性特點，它導致了各省之間競相提高目標和提出越來越響亮的口號。根據 1959 年作出的「全國一盤棋」的決定，對金融的控制權重新收歸中央[38]，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預算外費用——從大躍進前的 1957 年 47 億元到 1960 年增長到 130 億元。[39]全會同意中央建立6個地區局——華北局、東北局、西北局、華東局、中南局、西南局——旨在加強黨中央在各省、市、自治區的領導；顯然黨的領導者不再擔心這些機構會為野心勃勃的官員提供基地，使其倣傚 50 年代初東北地區高崗進行的活動以及建立「獨立王國」。[40]

然而毛仍不打算放棄大躍進的口號——「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的任何部分，而且警告說他不願被迫在預定於 3 月份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再次反右。[41]他私下裏表達了這樣一種想法，即大躍進的失敗應歸咎於人民沒有在思想上做好準備。[42]

毛重申大躍進的語言或許（也或許沒有）表達了他對新經濟政策的矛盾看法，但無疑他有意表明他決心不給重新發起對大躍進的——從而暗地針對他個人的——政治攻擊提供口實。不過，九中全會的公報雖然對「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起的作用大加讚揚，卻沒有提到大躍進的口號。九中全會標誌著大躍進的結束。[43]

制定經濟政策的官員顯然準備遵奉毛的政治路線。公報的經濟問題部分採用的是李富春在 1961 年經濟計劃中的「意見」[44]，這在全會的第一天就提出了。[45] 李富春於前一年提出的「以農業為基礎」的政策也再次得到了肯定。李對過去幾年形勢所作的估計高得驚人，那是有意讓毛安心：1960 年是國家經濟持續飛躍的勝利的一年；大躍進取得了偉大的、前所未有的成功。李用大量對比來支持這種說法，如與大躍進前的 1957 年相比，與第一個五年計劃前夕的 1952 年相比，與中國共產黨 1949 年接管政權時的經濟情況相比。從這個觀點看，人們可以坦然地面對「局部的、暫時的困難」以及工作中的失誤，這些困難和失誤可以用毛最愛說的一句話「一個指頭與十個指頭的關係」來概括，儘管李坦率地提到在一些地區和企業，失誤遠不止一個指頭。[46]

李對於這些挫折提出了六點原因：自然災害；比例失調，尤其是工農業之間的比例失調；缺乏經驗導致的過於雄心勃勃的目標（在這一點上，李並未做自我批評）；過度的分散領導；一些領導人的官僚作風；壞分子混入了領導崗位。[47] 當然，李根本沒有暗示，更不用說指責毛對大躍進造成的災難負有根本責任。李反而引用毛的兩句較為謹慎的話來暗示：假如大家重視了毛主席的話，許多問題就不會發生了！[48]

李對於 1960 年的工作給予好評是基於工業上的統計數字。當他講到農業時，他並未公佈產量，即便對這些高層領導人他也保守秘密。他只告訴他的同事們本世紀最嚴重的自然災害影響了 6,000 萬公頃農田的收成（相當於可耕地面積的一多半，這是大躍進想在小面積上取得高產的政策的結果），還有 2,680 萬公頃農田受到嚴重破壞。當然，有跡象表明他提出的數據在很大程度上是推測出來的。李試圖鼓舞同事們的士氣，他提出農業產量的波動並不僅僅發生在中國，蘇聯在 50 年代末期也發生過同樣的事情。[49]

展望未來，李認為用他的靈丹妙藥，採取他提出的、現在為官方採納的口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用 2 ～ 3 年的時間，就可以

把各種經濟成分重新平衡。最緊迫的問題是食品及工業原料的短缺，尤其是煤和木材。在工業方面，生產要優先於基本建設，開採優先於加工，維修優先於製造，成套設備優先於主機，質量和品種優先於數量。[50]

儘管他使用了謹慎的字眼，李對中國經濟的主要項目指標作出的預測樂觀得荒唐（見表 1-2）。[51]

表 1-2 主要經濟數字，1960-1961 年（單位：百萬噸）

	1960 年產量	1961 年目標	1961 年產量
糧食	143.5	225.5	162.3
油料作物	2.1	4.0	2.0
棉花	1.3	1.8	0.9
生豬（百萬頭）	82.3	150.0	75.5
鋼	18.7	19.0	8.7
煤	397.0	436.0	278.0

資料來源：《農業年鑒》，1980，第 34、36、38 頁；《統計年鑒》，1981，第 223 頁；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 23 卷，第 439、441 頁，表中數字保留一位小數。

儘管李顯然認為 1961 年計劃的增產是恰當適度的，他也完全意識到大規模削減工業產量的重要性。他只指望代替煤的能源和對工業生產至關重要的物資的產量能提高，但對這兩個方面，他提出的規劃也證明距實際情況相差甚遠（見表 1-3）。

表 1-3 計劃與完成情況，1961：主要工業產品（% 變化）

	計劃達到的指標	實際達到的指標
電力	+11	-19
石油	+25	+2
水泥	0	-60
硫酸	+20-8	-32
純鹼	+8	-40
發電設備	-44	-80
機床	-53	-63
汽車	-23	-84

資料來源：《統計年鑒》，1981，第 221 ～ 226 頁；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 23 卷，第 441 頁。

這些數字意味著經濟計劃者們雖然採取了新的面對現實的保守態度，的但還是受到兩方面的束縛：一是徘徊不去的政治恐懼；二是純粹的無知。少數經濟活動他們能夠重新加以控制，例如鋼鐵上產，但除此之外仍在黑暗中摸索。這也許主要是由於在大躍進中，統計機構被搞亂了。1960 年全年收到的都是錯誤的報告。實際上，直到 1962 年 4 月才堅決地再度強調精確的中央統計數字的重要性。[52]

李對於煤炭的統計數字說明瞭這個問題。大部分煤炭是由地方小型煤礦生產的。[53] 他指出 1961 年計劃達到 4.36 億噸的產量只比上一年增產 1,100 萬噸，這表明他認為 1960 年的產量是 4.25 億噸。然而我們現在得知實際產量為 3.97 億噸。[54] 鑒於李這樣的問題，他沒有把 1961 年經濟指標的預測公佈於眾是非常幸運的。中國從此進入了把經濟數據視為國家機密的時期；這些年的官方統計數字有 20 年沒有公開過。[55]

於是這次全會正式通過了早些時候工作會議上作出的決定，即結束大躍進和加強農業；但這次會議並未廣泛開展討論採取可能的、新的經濟措施。按毛以往典型的做法，他把這類事情留待 3 月份非正式的工作會議上解決。毛好像從來不喜歡在正式的、能作出決議的會議上進行實質性辯論，唯恐辯論或決議是反對他的。[56]

對莫斯科會議的判定

從人性的角度來看，經濟形勢是第九次全體會議要考慮的最緊迫的問題。大躍進造成的破壞使數百萬人仍在死亡線上掙紮。第三個死亡與匱乏的「困難年份」就在眼前。但是從冷酷的政治角度來看，中蘇聯盟的現狀相當嚴峻。中國的經濟將會緩慢地復甦；北京與莫斯科 1960 年的關係決裂將會迅速惡化，對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國內政治都將會有災難性的後果。

在九中全會上，中國共產黨總書記鄧小平彙報了上一年 11 月在莫斯科召開的有 81 個共產黨組織參加的會議情況，在此會議上鄧率先代

表中國攻擊了蘇聯總理和蘇聯共產黨第一書記尼基塔·赫魯曉夫政策。他還彙報了劉少奇率領的中共代表團所做的工作，全會決議對此表示滿意，並且「完全贊成」會議一致通過的聲明。然而決議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會議上作出的妥協是基於維護全世界共產主義團結一致的考慮，這並不意味著北京對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尤其是國際共運的主要力量——蘇共應採取的正確全球戰略的看法有所改變。

決議主要強調的是聲明中最好戰和反西方的段落，然而幾乎就在這同時，赫魯曉夫在莫斯科卻降低了調門。決議宣稱世界正處於「兩個對立的社會體系鬥爭的時代，是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時代，是帝國主義崩潰殖民主義體系消滅的時代……」，目前的形勢「迫切要求世界人民進一步聯合起來，同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美國是）現代帝國主義的主要國家，作為最大的國際剝削者，世界憲兵，世界反動勢力和現代殖民主義的主要堡壘，現代侵略和戰爭的主要力量……」這些強硬的字眼——值得注意的是赫魯曉夫並未使用它們——很難指望在即將由約翰·甘迺迪總統組閣的政府中贏得朋友。

聲明提到西方有「相當一部分資產階級」懼怕戰爭，這很可能僅僅指那些參加和平運動的人。赫魯曉夫重申了西方統治階層有一些「明智」的代表人物，與他們可以達成和平共處，這明顯是為他自己保留了一個與美國新總統談判的機會。但是中國共產黨的決議卻絲毫未提到愛好和平的人們，無論是西方的人民還是統治者。

中國人把「民族解放運動」列為防止戰爭的一種力量，而赫魯曉夫沒有這樣提；雖然他確實表明支持國內起義為解放鬥爭的一種形式，但他在莫斯科會議上小心翼翼地指出共產黨政權應當防止其國際化，因為這樣會帶來蘇美衝突的危險。

中國簽署了這份聲明，意味著同意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一大的講話中詳細闡述的觀點，即各種力量的平衡確實有可能防止世界大戰的爆發。但是在九中全會的決議中，同樣的觀點，中國人以截然不同的

消極語氣表達出來，斷言「帝國主義發動一場新的、前所未有的、毀滅性的世界大戰的危險並未消除」。[57]

不管中國領導人由於國內問題如何感覺受到了挫折，他們顯然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上和國際事務中決不妥協。據報道，毛把與俄國人的決裂視為中國的「第二次解放」，從此中國可以自由地制定自己的思想路線，毛組織了一個智囊團協助他。[58] 在全會之前召開的工作會議上，毛譴責了赫魯曉夫全民國家全民黨的理論。[59] 雖然中國為了團結以及迫於其它共產黨的壓力簽署了莫斯科聲明，但他們根本無意真正放棄在對外政策上的強硬態度。

甚至在中央委員會開會之前，毛計劃出一本書，用寓言來說明蘇聯外交政策的錯誤。這本書是中國古代傳說的簡編本，書名叫作《不怕鬼的故事》。按毛的指示這本書於 1959 年春天開始編纂，當時的主要目的似乎是想重新恢復國民的信任，因為大躍進造成的國內問題日趨尖銳。自然災害仍是要與之鬥爭的「鬼」，而序言中列出的主要的鬼卻是那些「國際帝國主義及其各國僕從」和「以鐵托集團為代表的現代修正主義」。[60]

這本書的編者是著名詩人何其芳，但他自己後來說，毛把他寫的前言從頭至尾細細審查，在 1 月 4 日他們首次會面時就花了 4 小時。這篇前言宣稱：在中國和全世界存在著「一個大問題」，就是如何評價世界上的革命勢力和反動勢力。人們還抱有迷信，不懂得這些反動勢力表面力量的強大只不過是「暫時現象，一個臨時性的角色」。[61] 前言概括了應該採取的恰當的態度：

> 從整體和戰略上來看，我們有充分理由藐視，而且我們必須藐視所有反動勢力。那些不敢藐視敵人，不敢藐視所有前進道路上絆腳石的人，那些被帝國主義反動派嚇破了膽的人，那些在困難和挫折面前屈服的人都是 20 世紀怕鬼的人。[62]

毛加進了一段話，顯然是嘲弄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政策的：「難道我們越怕鬼鬼就越喜歡我們？難道由於我們的緣故鬼就乖乖走掉嗎？然後一切都變得光明美好，像是春天裏盛開的花朵？」[63]

在故事的選擇上，有意識地將重點放在人們無所畏懼地奮起攻擊鬼——也就是在戰略上藐視敵人，——毛與何感到還須在前言和一些故事中提醒讀者注意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另一側面：戰術上要重視敵人。人們「在贏得最後勝利前要謹慎、機智」。[64]

1 月 23 日毛第二次接見何其芳時，中共已經制定了關於莫斯科會議的決議，毛在前言中加進了最後一段話，他這樣寫道：「『蔑視鬼』的（莫斯科）聲明極大地增長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力量和影響，總體上來講使妖魔鬼怪垂頭喪氣，並且打亂了反華大合唱。但是讀者應該認識到世界上還存在著大量妖魔鬼怪，還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把它們消滅乾淨。」[65]

儘管寫了這段話，——還寫了兩首反對修正主義的詩[66]（至今仍未發表）——大概使毛感到心滿意足了，他還是意識到中國領導人在 1960 年與蘇共的論戰時忽視國內問題是不明智的。不論是毛還是他的同事都不想在 1961 年重犯這種錯誤。在全會通過關於莫斯科會議的決議和出版了《不怕鬼的故事》以後，中國人似乎願意讓爭論平息下來。直到同年 10 月在蘇共二十二大上赫魯曉夫攻擊中國的同盟阿爾巴尼亞從而惹惱了中國人，中蘇論戰才又開始。

第二章 緊急措施

糧食危機

糧食產量災難性的下降以及給人民食品消費帶來的影響迫使北京採取前所未有的補救措施。由於大躍進的緣故糧食儲量急劇下降。在大躍進之前的 1957 年中期，糧食儲備保持在 1,820 萬噸；到 1960-1961 年之交的冬季，糧食儲量下降至約 505 萬噸，稍多於城市人口一個月的定量。[1] 每隔 5 天～ 10 天，有關糧食情況的報告就要送交周總理，他在 1959-1966 年期間主管糧食工作。從 1960 年 6 月至 1962 年 9 月，他密切關注著糧食問題的處理，在糧食結算平衡表上加了許多批語，每週與糧食部的官員進行幾次直至深夜的長時間討論（共 115 次），甚至自己設計了「中央糧食調撥計劃表」，以便能夠監控中央與各省之間的糧食流通。[2] 到了 1960 年 12 月，周肯定已意識到北京、天津、上海、瀋陽及其它主要城市的糧食供應僅能維持數天，有些時候甚至只有一天存糧，已經到了政府失控的邊緣。[3] 在大城市，每月人均食用油配給量下降到 3.5 盎司。[4]

城市境況惡化，從中國領導層的表現亦可說明，他們的決策毫無判斷，只憑感覺。12 月的某一天，周恩來和陳雲[5] ——政治局常委中唯一的著名經濟學家，勸說他們的同事同意向國外購買糧食，有人視此為恥辱。[6]12 月底，周準備乘飛機離開北京去緬甸進行友好訪問。[7] 在機場上，周、陳以及外貿部長葉季壯同意向國外購買 150 萬噸糧食。[8] 幾小時後，當周的飛機在雲南昆明降落時，他得到電話通知說購買數量增至 250 萬噸。周立即給陳雲打電話，陳雲告訴他糧食形勢異常嚴峻，因此必須增加購糧數量。[9]

對於糧食進口需求的評估在新年時更加混亂。1 月 18 日，國務院經貿辦公室[10]向中央領導呈遞了關於需進口 400 萬噸糧食的意見，以便緩和糧食危機，穩定市場，為農業提供支援；這個數字並不包括作為再出口的 100 萬噸。[11]然而在第二天的一次講話中，周總理用了一個新數字，但他的數字只有 300 萬噸。[12]不清楚這種混亂是否標誌著在這一政策上存在爭論；肯定的是 3 月 20 日經貿辦公室對於中國糧食需求的更為嚴峻的看法得到了認可，因為就在那天，辦公室主任、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李先念在廣州工作會議上講「已決定」1961 年進口 500 萬噸糧食，1962 年將進口 350 萬至 400 萬噸。[13]即使這些數字也證明對情況估計不足。[14]

同時還採取了組織措施來貫徹糧食進口的決定。12 月 29 日，糧食部召開了一次會議準備處理中央領導所謂「轉口糧」問題。[15]進口糧為何要冠以這樣的名稱並不清楚：大概糧食部按照早先的指示行事，早先僅提到買進國外的糧食，以滿足中國的出口任務；也許這個詞是用來裝飾門面的，以免老百姓瞭解到中國即將嚴重依賴國外的糧食。

同樣不清楚的是為什麼糧食部主動採取這一行動，因為一個月後，也就是 1961 年 1 月 30 日，中央發出緊急指示，成立一個中央特別進口糧食接運工作組，由商業和運輸方面的官員領導處理「轉口糧」，[16]對此的解釋可能是當時情況更為混亂了。因為當時對糧食形勢的估計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悲觀，中央對此作出了反應。

不管北京制定的進口糧食的政策在國內引起了多大混亂，1960 年底外部世界已經知道中國已決定向產糧大國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尋求幫助；出於政治原因的考慮，排除了與美國——世界第三大產糧國直接貿易的可能。1960 年 12 月，澳大利亞小麥委員會宣佈（向中國）出售 24 萬噸小麥，下一步出售 6 萬噸，總價值 600 萬英鎊。[17]同月，由兩個言行謹慎的人組成的中國貿易代表團到達蒙特利爾，他們預計逗留 3 ～ 4 個月。到 1961 年 2 月初，加拿大農業部長宣佈價值 2000 萬英鎊的 75 萬噸小麥和 26 萬噸大麥將在幾個月內運往中國。[18]

結果證明，最初購買糧食具有權宜措施的性質，用無線電把貨船召至澳大利亞和加拿大港口，[19] 在某種程度上是為了節約中國的糧食儲備而又不違背國際義務。儘管糧食危機不斷加深，從 1957 年以來糧食出口量還是大幅增長，直至 1960 年出現的緊急狀態才迫使糧食出口驟減（見表 2-1）。

表 2-1 中國的糧食出口，1958-1960 年份數量（百萬噸）增長（%）

年份	數量（百萬噸）	增長（%）
1958	3.25	73.1
1959	4.74	45.9
1960	1.00	− 78.9

資料來源：《當代中國的糧食工作》，122 ～ 123 頁。

應北京的要求，大約 6 萬噸小麥於 1961 年春從加拿大直接運往阿爾巴尼亞；同年晚些時候有 16 萬噸小麥直接運往東德。[20] 與此相似，中國 1961 年從緬甸購買了 30 萬噸大米，主要用於履行它用 16 萬噸大米換取錫蘭 1.7 萬噸橡膠的協議，另外用 10 萬噸大米換取古巴 35 萬噸食糖。[21]

當中國處於緊急情況時，甚至赫魯曉夫也主動提供幫助，儘管 1960 年中蘇發生了激烈爭論。在 2 月 27 日寫給毛的一封信裏，他提到蘇聯國內的糧食短缺問題以及對東歐和北朝鮮擔負的義務，但他還是主動要在 8 月前借給中國 30 萬噸小麥，70 萬噸黑麥，50 萬噸古巴食糖。周恩來在 3 月 8 日作了口頭回復，表達了中國避免增加蘇聯負擔的願望，並表示中國希望從國際市場上滿足自己的需求。他要求蘇聯把這些糧食先儲存起來，以防中國在國際市場上購糧失敗。如果出現這種情況，中國將要求借糧。然而，周還是接受了食糖。[22] 在適當的時候，他安排了從蘇聯遠東地區借 20 萬噸糧食供應中國的東北地區，然後又從西方進口償還借糧。[23]

但是中國領導人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國內的糧食危機日趨嚴重，短期緊急措施是遠遠不夠的。在 5 月 17 日寫給毛的一封長信中，李先念清楚地說明瞭這些嚴峻的事實，表示對 1962 年進口糧食數量的估計

必須從他在兩個月前在廣州工作會議上說的 350 萬噸，調整到 500 萬噸。廣州會議同意把 1961-1962（7-6 月）收穫年度國家徵收糧的數額定為 4,400 萬噸，但糧食部後來發現各省降低了各自的指標，現在總收購量僅有 4,200 萬噸；這些糧食的近一半，即 2,000 萬噸是中國大約 2,000 個縣中僅 250-300 個餘糧縣生產的。大家清楚地認識到，如果硬要從這些縣收購更多的糧食，生產將受到損害。

對國家收購糧總數的修改意味著各省不能為中央提供廣州會議上確定的 600-650 萬噸的糧食。廣州會議曾估計，全國缺糧總數為 350 萬噸，現在看來 750 萬噸更為合適，其中只有 500 萬噸能用進口糧彌補。進口更多的糧食是行不通的，因為國外的供應來源不可靠，中國缺乏必不可少的外匯，而且它的運輸及港口設備也沒有這種能力。這些數字意味著靠中央供應糧食的北京、天津、上海、瀋陽的 2,400 萬居民生計堪憂，更不用說還有 1.1 億城市居民要靠各省供應糧食。李關心的是年人均糧食消費量不能低於 1960-1961 年 140 公斤的水準，特別是他擔心政權的敵人可能會利用中國遇到的困難煽動騷亂。[24]

陳雲與李先念持相同的看法。陳雲曾因疾病和謹慎而退隱一段時間，[25] 1960 年秋毛放棄大躍進之後，他重返制定經濟政策的工作崗位。他被任命負責糧價問題小組的工作，這個小組曾建議提高糧食收購價格，[26] 並且陳雲也是糧食進口政策的主要制定者。[27]

對於陳來說（如同對於李），壓倒一切的迫切工作就是為國內市場增加食品和衣物的供應；食品優先於衣物，而糧食是最重要的食品。他在 1961 年 5 月 30 日講道，如果得不到糧食，那將是「很危險的」，而由於農業生產要花數年時間才能恢復，因此糧食的主要來源不得不靠進口。[28]

陳沒有採用李每年進行糧食進口預測的做法。在他極力主張下，中國政府決定與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制定一個長期計劃，以確保糧食供應，直至農業生產恢復。陳雲甚至勸說毛同意通過法國進口美國的糧食。[29] 結果，一旦開始長期依賴進口就不那麼容易停止了。在以後

的數年時間裏，進口糧食佔了城市消費中相當大的比例；雖然純進口糧只相當於 1961-1962 年國家糧食總產量的 2.7%，但實際上這相當於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從餘糧省調撥的年均糧食量的 55%。由於進口糧食，1961 年城市人均糧食供應從 235 公斤增加到 274 公斤，1962 年從 258 公斤增加到 296 公斤。[30]

第一份中加兩國的協議於 1961 年 5 月簽字，規定從 1961 年 6 月至 1963 年 12 月期間最大購買量為 508.1 萬噸小麥和 4670 萬蒲式耳（101.6 萬噸）大麥；其中 76.2 萬噸小麥和 1700 萬蒲式耳大麥要在 1961 年 11 月 30 日前啟運。[31] 在這份協議之後又簽了第二份三年協議，在 1963-1966 年期間購買 508 萬噸小麥，第三份協議規定在 1966-1969 年期間購買 610 萬噸，然後又簽署了一系列年度合同（也許是因為文革期間政府的正常活動陷入混亂），1973 年又簽了一個三年合同，購買 609.6 萬噸糧食。[32] 澳大利亞從 1961-1966 年向中國出售了總共 1,100 萬噸的糧食，1961-1962 年出口 196.5 萬噸。[33]

1961 年 2 月，第一批運糧船到達中國港口。同年第一季度 50 萬噸糧食到岸，第二季度 165 萬噸到岸。第一批運到的糧食馬上被分到即將斷糧的地方：北京、上海、天津、遼寧以及受災最嚴重的地區。[34] 1961 年全年的糧食進口量達到 580.97 萬噸，比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 11 年來進口糧食的總和多 6 倍多，比陳雲認為的中國外匯和運輸能力所能允許的數量多 80 萬噸。[35] 僅進口小麥一項——388.17 萬噸——相當於中國小麥產量的 27%，中國小麥產量從 1960 年的 2217 萬噸下降到 1961 年的 1425 萬噸；在以後的 5 年中，進口糧佔生產量的大約 25%。1959 年中國出口了 415.75 萬噸糧食；1961 年出口糧食降至 133.5 萬噸，很可能是為了履行不能逃避的責任。大躍進之後數年裏中國的負擔總數，見表 2-2。

表 2-2 糧食產量與貿易數字，1959-1966 年（單位：百萬噸）

年份	所有糧食			小麥	
	產量	進口	出口	出口	進口
1959	170.0	0.002	4.15	22.18	0.00
1960	143.5	0.06	2.72	22.17	0.04
1961	147.5	5.80	1.35	14.25	3.88
1962	160.0	4.92	1.03	16.67	3.53
1963	170.0	5.95	1.49	18.48	5.58
1964	187.5	6.57	1.82	20.84	5.36
1965	194.5	6.40	2.41	25.22	6.07
1966	214.0	6.43	2.88	25.28	6.21

資料來源：《統計年鑒》，1983，第 158、422、438 頁。[36]

糧食進口政策對中國貿易構成方面有相當大的影響。在建立政權的最初幾年，農產品占中國出口額的 50% 多，到 1957 年時——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最後一年——還佔 40% 多。1958-1960 年大躍進期間，農產品佔的份額進一步下降並且起伏不定，但仍然保持在 30% 多，可是在 1961 年，農產品的比例急劇下降至 20.7%，第二年降至 19.4%，這是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最低水準。自從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實施的第一年——1953 年以來，食品進口在所有進口量中所佔比例不到 10%，1960 年僅佔 4.6%，1961 年增至 38.1%，在其後的 3 年中占 44% 多。[37]

雖然賒購的方式為資金周轉提供了一些迴旋餘地，但是糧食進口政策耗費的外匯數額巨大。在 1962 年 1 月的講話中，劉少奇估計 1961 年和 1962 年花費的外匯總額為 6.6 億美元，他指出這些錢等於 40 個洛陽拖拉機廠，或 1,700 萬噸進口化肥。[38] 中國與加拿大的貿易在 1959 年之前基本保持平衡，1960 年出現巨額逆差，其後幾年有增無減。中國與澳大利亞之間的貿易一向是逆差，但到了 1961 年差額劇增。更重要的是，僅從這兩個國家的進口商品（主要是糧食）占總進口額的比例從 1960 年的 1.7% 猛增到 1961 年的 24.5%，1963 年增加到 28%，1965 年和 1966 年下降到不足 20%，這不過是由於 1965 年總進口額猛增了 1/3 的原因。表 23 詳細說明瞭新的糧食進口政策的影響。[39]

表 2-3　中國進出口額，1958-1966 年（單位：百萬美元）

年份	加拿大		澳大利亞		全球	
	進口	出口	進口	出口	進口	出口
1958	6.53	4.20	31.18	4.72	1,890	1,980
1959	2.37	4.23	31.27	5.28	2,120	2,260
1960	13.77	3.68	21.69	5.02	1,950	1,860
1961	167.88	2.29	187.75	3.88	1,450	1,490
1962	156.87	3.52	106.19	7.06	1,170	1,490
1963	111.10	4.83	245.60	10.81	1,270	1,650
1964	161.99	10.12	184.05	18.44	1,550	1,920
1965	125.77	15.63	214.97	20.88	2,020	2,230
1966	230.19	22.72	104.46	21.72	2,250	2,370

資料來源：《統計年鑒》1981，第 353、366、367 頁。

中國人決心承擔他們新的巨額債務，唯恐損害他們的國際信用，周總理告訴外貿部長葉季壯：「重合同，守信用。」[40] 為了確保做到這一點，周和他的同事們開始努力保持中國對外貿易的平衡，儘管進口中新增了重要的項目。他們採取了兩種重要手段。他們急劇減少從蘇聯的進口額，從 1960 年的 8.4516 億美元減少到 1961 年的 2.9156 億美元，再減到 1962 年的 2.1092 億美元。以後繼續下降，直到 1976 年才又超過 2 億美元，雖然 1965 年有一個 5219 萬美元的短暫回升，這是導致當年總進口額猛增的一個重要原因。1961 年從蘇聯進口額的銳減在某種程度上無疑是受 1960 年爆發的中蘇論戰和同年 8 月蘇聯撤走專家的影響，不過即便沒有發生莫斯科與北京的爭吵，中國也不得不減少工業產品的進口，而蘇聯是工業產品的主要供應國，部分原因是經濟緊縮政策的總體需要，部分原因是從澳大利亞和加拿大進口糧食需要外匯。[41]

另一個用於保持貿易平衡的手段是增加出口。實際上，進口政策的修訂就是有目的地購買為出口產品所需的原料。[42] 1961 年 5 月在解釋進口糧食的新任務時，陳雲告誡外貿幹部要遵守國際市場的基本準則，以及增加出口高質量、在國外受歡迎的傳統商品的重要性：

> 在國際市場上做生意，不只是我們一家，而是有許多家。在彼此競爭中，哪一種商品質量好，價格便宜，那一種商品就有銷路。做生意的要在競爭中取勝，……不能由生產單位主觀決定。……名牌貨，過去都有自己的基地，生產穩定，產量大，質量好，成本低……如一隻特別品種的雞換三塊美元，能買150斤糧食（75公斤）。這就叫經濟，許多人喜歡吃這種雞，有銷路，這就叫穩定。要保證出口，就一定要搞商品基地。我們要用一年半的時間把出口商品基地搞起來。[43]

主要的出口目標地是香港。香港是中國傳統產品的熱心購買者，也是外匯的主要來源。確實，大致在陳雲預想的一年半時間裏，對香港和澳門的出口幾乎翻了一番，儘管這比削減進口花費的時間長。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1958-1962年），中國對這兩個殖民地的出口平均為2億美元，1962年增加到2.2787億美元。1963年的出口額猛增到3.0064億美元，第二年又猛增到4.0431億美元。1966年達到5.8057億美元，在文化大革命的頭幾年中出口額又突然下降。中國從這些地區的進口一向很少。1963年降至816萬美元。在以後的三年裏徘徊在1,600萬美元左右。[44]

遣返農村

李先念在5月17日給毛的信裏曾謹慎地建議：也許另外能解決糧食問題的唯一辦法就是減少城市居民的數量。但他也不無擔心，大規模的人口遷出會損害大躍進所取得的工業進展，而那正是他大加讚揚的。[45] 然而到了5月底，可能是受了毛的鼓勵，陳雲更直率地提出了問題。

在5月31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講道：進口糧食只是解決糧食問題四個政策中的一個。根本的辦法是執行農業六十條（在下一章討論）以使農民發揮積極性。其次，工業對農業的支援必須增強。不過，他指出，像糧食進口問題有財政壓力一樣，工業產品生產也有時間壓力：化肥、拖拉機、灌溉機器設備的產量不可能迅速提高。

因此，他斷定第四種政策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必須立即採取行動：這就是動員城市居民移居農村，從而減少從農民那裏徵購糧食在城裏配售。如果糧食被徵走過多，農民的熱情就會消失，六十條也就不起作用了。[46]

陳提醒他的聽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發生的四次糧食危機中的三次——1953 年、1954 年、1957 年以及 1959 年以來——都是由於城市人口過度增長引起的。在大躍進期間，城市人口從 9,900 萬增加到 1.3 億，其中包括增加的 2400 萬工人，因此造成了儲備糧的急劇下降。陳估計經過春季和初夏兩個收穫季節，到 6 月底收割結束時，糧食儲備可能只增長 740 萬噸。[47]

陳承認讓人們放棄「好得多」的城市生活返回到農村將是非常困難的。但不這樣做情況就會更糟。除了進口糧食的費用外，這會給產糧多的地區帶來沉重壓力；農民可能只靠每年人均 150 公斤的口糧度日，可是那樣的話，他們就不會有任何積極性為城裏人提高產量。[48] 陳大概不用提醒他的聽眾，150 公斤口糧對於從事繁重農業勞動的農民來說是不足維持溫飽的定量。[49]

飢餓的農民不可避免地要吃掉本應留作飼料的糧食。這樣牲口就會餓死，結果是使靠畜力而不是靠機器的農業停滯不前。如果口糧供應不足，種經濟作物的農民會轉而種糧。總之，如果被迫養活那些膨脹的城市人口，作為國民經濟基礎的農業將會受損。[50]

顯然，如果有跡象表明農業能夠迅速復甦，就不會如此迫切地將人口遣返農村。但是根據陳的講話，周恩來總理進行的分析表明農業的迅速復甦是根本不可能的，要花費 3 到 4 年的時間，每年增產 1,000 到 1,500 萬噸糧食才能達到 1958 年的水準，而促進農業復甦所需的化肥和機器卻無法得到。[51]

如果工人們被遣返農村，工業生產會不會受到影響呢？不會，因為工業正處於非常困難的境地，大批工人根本無活可幹；工業戰線必須縮短。[52] 有些人說送到農村的城市居民不管到哪裏都要吃掉同樣多

的糧食。但是陳卻估計送返鄉下的人平均每人少吃國家 75 公斤糧食。如果 1,000 萬人回到農村，就能節約 75 萬噸糧食；如果 2,000 萬人返鄉，就節約 150 萬噸糧食，這只是第一年的數字。此後，隨著回鄉人在集體農田和自留地裏生產，他估計節約的糧食會加倍。[53] 實際上，在糧食收購問題上國家與農民的利益衝突會有所減輕，而在返鄉的人起作用之前，這些摩擦被轉嫁給各村了。

陳的講話暗示，在中央內部對這一政策還有一些阻力，這一政策對於那些負責動員城市人口返鄉及那些不得不監督他們在農村定居下來的幹部的組織能力是一個極大的考驗。但是由於劉少奇警告說，假如這些緊急措施不能得到貫徹，國家有可能陷入像蘇聯 1921 年國內戰爭時的困境，[54] 中共官員們意識到他們別無選擇，因而這個大規模的行動迅速得以實施。

6 月 16 日下發了一個九點計劃。決定在 3 年內減少 2,000 萬城市人口；1961 年 1,000 萬；1962 年 800 萬；1963 年最後 200 萬。[55] 第一批 1,000 萬人口的疏散實際上是在 1961 年 6 月至 9 月完成的。[56] 到 1963 年中期時，被遣返的人員總數大約為 2,600 萬。[57] 到 1964 年中期進行人口普查時，城市人口已降至 9,791 萬，低於 1957 年的水準。[58]

中共之所以能夠取得這樣的成績，部分原因是迅速動員起高級官員。由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組織部長安子文組成的三人小組負責這個計劃的實行。李召集了一系列各行業負責人的會議，一機部（6 月 20 日），輕工業部（6 月 21 日），鐵道部（6 月 25 日），文化與教育部（6 月 28 日）；從 6 月 20 日至 7 月 5 日，這個小組總共召開了十九次各行業領導的會議，就如何適當地削減經濟活動以實現減少城市人口數量的目標向他們下達指示。以輕工業為例，李下令，合併工廠和停工停產的決定不應根據人口的需要，而應根據農業能夠提供原料的數量。[59]

天津經驗

天津的數據表明，地方對中央的指示作出反應的速度是如何之快。[60] 天津市委常委早在 6 月 7 日已經在討論中央的「減少城市人口和城市糧食消費的九條辦法」，這甚至發生在中央指示下發之前。[61] 6 月 16 日舉行的第二次常委會上制定了 3 年之內減少城市人口 30 萬，1961 年底之前減少 10 萬的目標。6 月 19 日在區級及區級以下黨委書記會議上，作出了執行這個計劃的安排。7 月 21 日，又召開了一次工作會議，解決這項政策帶來的思想問題和組織問題，而在 8 月 21 日，市委書記召開會議，號召盡快完成 1961 年的目標，這可能是針對北京決定在 9 月完成第一年指標而作出的響應。[62]

天津市委第一書記萬曉塘親自監督，更加凸顯了這項政策的重要性。1962 年 3 月分派任務，4 月份成立了特別「領導小組」負責這項工作。這項活動可能是響應北京的要求，這個小組做了一個計劃，天津應減少人口 39 萬——不是原計劃的 30 萬——減少產業工人 26 萬。根據 1961 年下放人口的統計數字，領導小組決定天津在 1962 年應下放 26.2 萬人。但是到了 5 月下旬，這個數字又被大大提高到 40 萬，佔全市人口 7% 弱；在 4 月 14 日至 6 月 8 日之間，削減工人數量的目標被兩次提高，從 18 萬上升到 22 萬。[63]

很難對天津計劃的成功與否進行評價。最近得到的統計資料顯示：1961-1963 年從大天津（包括郊區）移出的人口總計為 26.4620 萬人，但如果把移入的人數計算在內的話，純減少人口只有 13.6448 萬人。在 3 年之中，天津市區的淨減人口為 10.0406 萬人（可能包括移入天津郊區農村的人口）。[64]

遣返工人

天津計劃顯示，6 月份下達的全國計劃中第二項基本內容就是下令削減工人和職員，全國的指標是 960 萬，幾乎等於 1960 年人數的 10%。[65] 山西省從 4 月 1 日至 10 日召開了特別工作會議，開始執行它

的措施。會議決定6月底之前削減20至35萬工人。6月1日，省委同意了這個數字。負責這次遣返行動的小組建議削減30萬非農業人口，兩天後這個數字就上升到50萬至60萬。[66]

削減非農業勞動力的工作之所以順利進行，其中一個因素似乎是產業工人的數目早在1959年就減少了，可能這是由於1958年底毛第一次從大躍進的狂熱行為中後退了；其中許多人無疑受雇於農村公社經營的企業，不過有些人可能是離開城市工業建設，返回附近的農村的農民。雖然1959年8月的廬山會議後大躍進又恢復了，人數有所增加，但也未達到1958年的高峰。見表2-4。

表2-4 就業數字，1957-1966年（單位：百萬）

年份	總數＊	產業工人	農業工人
1957	237.71	14.01	193.10
1958	266.00	44.16	154.92
1959	261.73	28.81	162.73
1960	258.80	29.79	170.19
1961	255.90	22.24	197.49
1962	259.10	17.05	212.78
1963	236.00	16.32	219.68
1964	277.36	16.95	228.03
1965	286.70	18.28	233.98
1966	298.05	19.74	242.99

註＊：這一欄包括從事管理的和其他非體力勞動的工人。
資料來源：《統計年鑒》1983，第120、122頁。

遣送返鄉工人這一「極其重要和複雜」的任務是6月28日中共中央下發通知的主題，即如何處理遣返過程中出現的問題。[67]遣返的主要對像是所有從1958年1月開始工作的臨時工、合同工、學徒以及正式工。除非他們在新單位已經成為必不可少的人——顯然這一條件很容易被濫用——他們必須回到老家的農田幹活。在此之前移居到城市裏的居民根據自願的原則回到農村去。真正屬於城市居民的工人一般不必搬到農村。[68]

在月中之前離開城市的人發給半個月工資，月中以後離開的人發全月工資。對遣返的工人還有額外經濟補償的細則，以使事情辦得更順利。（見表 2-5）

表 2-5 對被遣返下鄉工人的經濟補償

工作年限	臨時工 / 合同工	固定工 / 學徒工
少於半年	無	
少於 1 年		1 月工資
半年 -2 年	半月工資	
1-2 年	1 月半工資	
2-3 年	1 月工資	2 月工資
3 年以上	1 月半工資	2 月半工資

資料來源：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 23 卷，第 490 頁。

所有這些費用，如果需要還包括旅費，都由用人單位提供；國家不提供任何資金，不過虧損的單位可以得到銀行貸款。在遣返行動中有一項工作花費時間但很重要，即負責住房和糧食的機構必須確保每一個回鄉的工人都有當地的戶口。[69]

對於接受返鄉工人的地區，負責幹部被告知，要他們傳達一條有些自相矛盾的資訊：一方面他們必須頌揚重返農業第一線的榮耀；但同時又許諾一旦經濟復甦，他們可以優先返回城市。[70]

就天津來說，1962 年國有企業裁減的工人只有 59,061 人，但如果算上倒閉的社辦企業的話，這個數目可能會大得多。[71] 廣東省自稱遣返了 200 萬人。[72]

至於職員，被下放的人員包括中央的工作人員。1961 年 6 月，毛讚揚了國務院秘書長、副總理習仲勳的報告，報告說中央機關裁減了 24 萬餘人中的 1/3。毛對於中共處理下鄉行動的能力十分高興，也留下了深刻印象。[73] 他極力主張進一步裁員，再裁掉 4 萬，使總裁員數達到 1/2。他還推薦把這份報告廣泛傳閱，以鼓勵省政府照此辦理。[74]

6 月計劃的第三部分，實際上也是這次大規模行動的目的，是城市居民的減少會使得政府減少它不得不供應城市的糧食數量，所供糧食由 1960 年的 2,600 萬噸減少到 1962 年底的 2,400 萬到 2,450 萬噸。[75]

通貨膨脹

除食品之外，大眾關心的最迫切的問題大概就是物價了。由於大躍進把重點放在重工業上，從而引發了輕工業產品和農產品的短缺，其結果是商品遠遠不能滿足購滿力需求。國家的支出超過了收入，因此大量發行鈔票。大躍進期間，貨幣流通量增加了 81.7%；1957-1961 年期間，達到了 140%。[76] 新的共產黨政府最早也是最著名的成功之舉就是控制住了內戰帶來的災難性通貨膨脹。現在，僅僅過了 10 年，錯誤的管理又導致了新的通貨膨脹，嚴重程度不及 40 年代後期，但仍深深困擾著中國領導人（見表 2-6）。

表 2-6　零售物價指數

1959	100.0
1960	103.1
1961	119.8
1962	124.4

數據引自駱耕漢：〈社會主義與通貨膨脹〉，《北京週報》，1982 年第 44 期，第 20 頁。

政府決定保護城市消費者降低了 18 種主要日用品價格——主要是糧食、布、煤——同時急劇提高特殊或奢侈食品的價格以獲取閒散的現金，零售物價指數的上漲得到了緩解。但在中國的主要城市上海，自由市場的價格比國家的定價高一倍多。[77]

1 月份 40 個大、中城市開始出售昂貴的糕點和糖果，到 3 月份全國各地的大小城市都在出售這些食品了。到 1961 年底，銷售額達到 33 億元，佔所有消費品銷售額的 5.9%。[78] 1962 年 2 月，陳雲將這一政策進一步擴大，建議撥出 4,000 萬～ 5,000 萬元購買「山區和沿海」及其他地方的珍品，在飯店和賓館出售。1961 年該措施的主要對像是

城市地區，1962 年陳雲提倡向農村地區擴大銷售，因為那裏也有大量餘款。[79]

這項政策的成功使它又擴大了範圍：自行車、鐘錶、酒、茶、針織服裝都被當作奢侈商品出售。1961 年高價消費品的銷售總額是 74.5 億元，其中 38.5 億元是國家獲得的利潤。[80]

表 2-7 主要消費品零售價格，1957-1962 年（單位：元）

	糧食（噸）	植物油（噸）	糖（噸）	蛋（100 公斤）	蔬菜（噸）	豬肉（100 公斤）	棉布（米）	煤（噸）
1957	220.0	1,131.2	1,138	105.0	108.8	118.0	1.10	19.2
1958	220.0	1,154.0	1,143	140.0	98.8*	118.0	1.11	19.2
1959	220.0	1,180.0	1,143	151.4	107.4	125.0	1.11	19.2
1960	227.2	1,210.0	1,273	159.4	120.0	134.0	1.20	20.0
1961	231.0	1,393.0	1,264	196.0	133.4	171.4	1.31	25.3
1962	229.4	1,471.0	1,279	201.8	135.0	171.4	1.54	25.3

註 *：這次價格下降是由於 1958 年蔬菜產量過剩，由於缺少儲藏設備，許多菜都喂牲畜或浪費了。
資料來源：《統計年鑒》，1983，第 470 ～ 477 頁。

由於政府不能歧視農民，所以它被迫按照九中全會前召開的工作會議上的決議去做，即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這是以龐大的預算為代價的。從 1957-1962 年農業收購價指數上可看出這一點，見表 2-8 與表 2-9：

表 2-8 農業收購價，1957-1962 年（單位：元）

	糧食（噸）	食用油（噸）	生豬（頭）	蛋（100 公斤）	水產品（噸）	茶葉（100 公斤）
1957	162	940	47.7	94.2	341	137.4
1958	168	940	45.0	98.6	383	145.6
1959	164	1000	42.4	115.0	383	146.2
1960	170	1100	34.0	123.8	363	146.2
1961	213	1300	55.0	162.6	526	164.2
1962	214	1314	56.7	166.4	548	171.0

資料來源：《統計年鑒》，1983，第 478 ～ 479 頁，此價格為貿易糧價。

表 2-9 農業收購價（指數 1950 = 100）

1957	146.2
1958	149.4
1959	152.1
1960	157.4
1961	201.4
1962	200.1

資料來源：《統計年鑒》，1983，第 455 頁，表 27。

在 1960 年的工作會議上，曾估計提高糧食收購價會使國家多花費 10 億元，此外還要加上提高食用油料作物、生豬、家禽、雞蛋的收購價的費用。[81] 結果，農民從提高收購價中得到高達 30 億元的好處，儘管他們因財產充公而獲得的賠償（10.85 億）少於政府撥出的款額（25 億元）。[82]

第三章 農村工作的新路線

毛採取主動

九中全會為大躍進畫了一個句號。中國正在採取緊急措施以減輕饑荒。現在中國領導人必須制定詳細措施，以執行中央委員會已同意的總體意見，作出恢復農業生產的長期規劃。最重要的任務是把積極性引入公社體制。中國共產黨對於天氣無能為力，不過可以鼓勵農民生產更多的糧食。1961 年 3 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為實現這一目標採取了一些措施，這次會議通過了農業六十條草案。至今召開這次會議的背景還籠罩著一層神秘色彩。根據「文革」資料顯示，毛在會議上批評了中共總書記鄧小平和他在中央書記處很有權勢的副手、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

1 月 20 日剛剛開完九中全會，毛就給他的政治秘書田家英下達了非常詳細的指示，讓他立即組織並派遣三個高層次的七人小組，對廣東、湖南、浙江三省的公社作為期 15 天的調查。前一年 11 月發佈了旨在解決農村地區基本問題的「十二條緊急指示」，未能奏效，毛顯然感到震驚。於 1 月 21 日出發的各小組[1]，直接向毛彙報，然後在廣州聚齊，在那裏再進行一個月的工業形勢調查。[2] 此外，毛還派出 6 名包括警衛在內的身邊工作人員，指示他們在河南信陽地區進行調查，並向他彙報。[3] 1 月 26 日晚毛自己也坐火車出發，作一次在各地短暫停留的視察。1 月份他在天津、濟南、南京停留視察，然後繼續他的行程，經過上海、杭州、南昌、長沙，於 2 月 24 日到達廣州。[4]

毛對這次行動非常重視，不僅體現在他最初下達的指示嚴格明確，而且從他任命的領導層次之高也可看出：廣東組的組長是政治局候補委員、毛的前政治秘書陳伯達；湖南組的組長是毛的另一位秘

書、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胡喬木；[5] 浙江組的組長是田家英。三個小組的成員包括：鄧力群，劉少奇的政治秘書，後來成為陳伯達在《紅旗》雜誌寫作班子的助手之一；許立群，中央宣傳部理論處處長，不久成為該部副部長之一(1959-1966 年許立群任中宣部副部長。──譯注)；王力，也是一位宣傳專家，當時在中央對外聯絡部工作；梅行，經濟專家；王錄，中央農村工作部的一個科長；楊波，統計學家；胡績偉，《人民日報》副總編輯；逄先知，毛的圖書管理員；吳介民，《紅旗》雜誌記者。[6]

毛規定每個七人小組都要再分成兩個三人分組，每個分組都有自己的組長，而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負總責。每個組的一個分組要去調查一個富裕的生產隊，另一個分組去調查一個窮隊；一般的生產隊則不必調查。[7]

田家英嚴格遵守毛規定的時間限制，2 月 6 日在杭州向毛作了彙報，極力主張必須給公社制定規章制度。後來毛決定由田來制定。[8] 聽完田的彙報，毛分七個題目總結了他對農村形勢的初步想法：

a. 五種作風(共產風或極左風)必須改變，尤其是在留一些農田給小隊耕種的問題上；
b. 農民因財產充公而受到的損失一定要得到賠償；
c. 應該允許農民擁有「自留地」，種植蔬菜，飼養一些小的家禽家畜，如鴨子、豬等等；
d. 需要就人民公社三級之間的關係作出規定；
e. 以公社為單位可能規模過大，也許應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
f. 公共食堂應按照農民的意見經營；
g. 對幹部的貪汙腐敗問題應該處理，同樣也應按農民的意見。[9]

毛顯然已經願意考慮對公社進行大的改革了，不過他依然不願放棄某些 1958 年形成的烏托邦式的看法，特別是像公共食堂那樣的集體主義制度的萌芽。根據三個小組的調查和毛的親自視察，他派田家英及逄先知於 2 月 21 日南下廣州，兩天後，三個小組的成員在那裏會

齊，開始起草人民公社的規章制度。25 日，毛召集了一個會議，與會者有重新組建的中南局第一書記、當時的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陳伯達、胡喬木；農業部長廖魯言；趙紫陽，陶鑄在廣東黨組的主要副手；田家英。會議決定成立一個起草委員會，由陶鑄負責，陳伯達為副。[10] 多年後，陳伯達聲稱他是主要的起草者；[11] 很明顯，毛對陳負責的廣東調查小組的彙報印象深刻[12]。

26 日，召開了範圍更大的起草委員會會議。除陶和陳雲（陳伯達？）外，其成員還包括：胡喬木、廖魯言、趙紫陽、鄧力群、許立群、王力、王錄，還有田家英和逄先知。27 日，由廖魯言、田家英、王錄、趙紫陽組成的小組委員會進行具體的起草工作；[13] 胡喬木為修改者。[14] 這些會議顯然都在毛的直接監督下進行，不過他並未親自主持。[15] 3 月 6 日，包括六十七條的初稿完成(毛認為太長)，並呈送政治局常委；經過各方面的磋商，3 月 10 日第一稿定稿。[16]

3 月 10 日至 13 日，毛在廣州主持了「南方三地區」會議，參加者是中共中南區、西南區、華東區的幹部。胡喬木記錄了對草案提出的意見，3 月 15 日就完成了第二稿。[17] 這次會議重新發表了毛在 1930 年寫的「調查工作」。[18] 同時，國家主席劉少奇、總理周恩來、中共資深的經濟計劃專家陳雲、總書記鄧小平、中央書記處書記彭真等人在北京也召開了與之相當的北方三地區會議(東北、華北、西北)。[19]

雖然舉行兩個會議似乎是合理的分工，但卻非同尋常，因為除毛以外，政治局常委中四個重要人物——劉、周、陳、鄧——參加一個會，而毛卻單獨主持另一個會。[20] 北方的會議是中央書記處正式召集的，由那些毛認定當他退居「二線」後走上「一線領導崗位」的人主持，所以看上去更像是一次官方會議。[21]

北方省山西省黨委的做法證明瞭這一提法。3 月 17 日至 22 日，省委常委開會討論並執行北方會議的「精神」。省委的這次會議還在進行之中時又要召集另一個會議討論和執行廣州聯合會議的決議。假如省

委知道北方會議只是一個預備會的話，他們不見得會開這種重複的會議。[22]

另一方面，毛在南方召開的會議有一種即興的味道，九中全會後他個人決定組織自己的調查小組，看來就是這種心血來潮的產物。沒有跡象顯示毛給田家英的最初指示中有召開會議和起草公社規章制度的內容；相反，他談到對農村進行研究後，還要對廣州的工業進行調查，[23]然而毛的人一旦開始起草工作，這工作也就不能再被看作是臨時的了。

以下事實可證明，南方會議即興，而北方會議更趨於正式：3 月 13 日早晨南方會議結束時，毛寫信給他在首都的同事們，信中總結了廣州會議提出的一些看法，原想派陶鑄將這封信送往北京。毛在信中將他在以往兩個月裏的調查結果歸結為：根本問題是平均主義——將生產隊之間的貧富差別和個人之間的貧富差別拉平了。他呼籲各級黨委的第一書記在返回各自單位後要調查平均主義現象。不進行這樣的第一手調查，他們就不可能抓住問題，解決問題。

令人十分震驚的是，毛在這封信裏對他的高級同僚使用的輕蔑語氣：「我看你們對於上述兩個平均主義問題至今還不甚了了，不是嗎？我說錯了嗎？省、地、縣、社的第一書記大都也是如此；總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毛指責他們都忙於事務工作，而沒有時間親自搞調查研究，只滿足於聽取彙報。[24]

也許毛感覺到對他的同僚需要加以督促，因而改變了主意，或者更可能只是因為毛不願遵守退居二線的紀律，尤其是在對待農村集體化這個問題上。他認為這是他自己的事。不管怎樣，他並未派陶鑄去北京，而是把北方會議的人都召到廣州，於是 3 月 15 日至 23 日，一個中央聯合工作會議在廣州召開了。[25]

廣州會議

北方會議和南方會議都討論過公社的改革問題。北方會議可能沒有討論過南方會議的草案，因為該草案未能及時完成。[26] 相反，他們可能考慮過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起草的關於公社章程的一套具體建議。[27] 按劉少奇的要求，鄧子恢已於前一年夏天考察了山西、江蘇兩省的公社，並草擬了一個四十條建議。由於劉與鄧小平一起參加了北方會議，所以很可能劉把鄧子恢的建議帶到會議上討論過。四十條與其所附報告於 1960 年底呈送給毛。可以肯定的是，在廣州會議上，毛承認鄧子恢寫的四十條做出了積極貢獻。[28]

無論是在中央書記處的草案中還是在廣州會議的討論中都有提議，建議把整個國家分為兩大部分，把三個北方地區——大概是中共華北局、東北局和西北局管轄的地區——併入一個大區；把三個南方地區——華東、中南、西南——併入另一個大區。[29] 或許這能解釋為什麼為北方各局另開了一個會。也可能北方是小麥的主產區，而南方則是稻米的主產區，南北方公社的差異巨大，因此有必要這麼做。

毛為什麼會認為這個建議——六十條裏沒有提到它——本質上不令他滿意，原因並不清楚；但很明顯，他認為鄧小平對此應負責任。[30] 根據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報道，從毛的反應中可以看出，他不是對建議的內容反感，而是對它的做法反感。據說他這麼講：「是哪個皇帝決定的？」這聽起來好像是他對於鄧小平事先沒徵求他的意見就下令準備新建議的做法很反感——各種中國的消息來源也證實了這點。[31] 在「文革」期間鄧小平確實被指責自 1959 年毛退居「二線」後就不再向他彙報工作了。在這個特殊時刻，毛看到他的「一線」同僚已經走在前面，並起草了一個計劃時感到很生氣，特別是如果這個計劃比在他自己監督下起草的那份水準要高，或者他們曾試圖修改自己的那份檔時。

據說毛已經責備過鄧和彭真——不清楚是公開的還是私下的——未經事先充分的調查研究就提出建議。[32] 言外之意表明，毛在下結論之前視察了三個地區，而他的同僚們只是坐在北京的辦公桌前。六十

條草案由陳伯達主筆完成，由陶鑄領導的委員會定稿，而不是由適當的中央官員負責，這說明毛堅持把他主持的南方預備會議及他個人的工作班子放在首位。據一個與會者說，儘管得到了毛的讚許，鄧子恢的四十條並沒有被當作制定六十條的基礎。[33]

確實，從現有的最詳細的會議情況中可以斷定，廣州會議最顯著的特點之一是毛在他的高級同僚沒有到會的情況下與他的起草委員會委員們討論六十條的草案。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還有朱德和林彪（他們倆都參加了廣州會議，而未參加南方或北方預備會）[34]，在廣州會議期間可能與毛談過話，但奇怪的是，雖然他們都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當毛就即將出臺的檔作指示時，他們卻沒有出席。我們所知道的只是在 3 月 19 日中南組和華北組代表參加的聯合會議上，劉和周都講了話。[35]

當然，選陶鑄為起草委員會主任、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為副主任說明瞭對陶的能力和日益增長的聲望的讚許。[36]另外兩個大區級第一書記——李井泉（西南局）與柯慶施（華東局）——都是政治局委員，他們在黨內的地位超過了陶鑄；李還有特別的政治影響，因為他是中國主要餘糧省——四川省的領導人。[37]然而不論是李還是柯都未被指派作起草委員會主任。陶鑄過去與毛有過不愉快關係[38]，但毛顯然欣賞他的實際工作能力，並且最近還稱讚了廣州的晚報——《羊城晚報》的質量，這份報紙是在陶鑄的領導下創辦的，也是唯一一家由於質量好而在全國發行的省級晚報。[39]更重要的是，陶鑄曾在 1959 年的廬山會議上為毛在政治上出過大力，當時陶被選去向黃克誠將軍施加壓力，逼迫他承認自己的「罪行」，即屬於所謂的彭德懷反黨「軍事俱樂部」的成員。[40]

農業六十條

去年 11 月下達的十二條緊急指示曾是農業復甦計劃的綱領。廣州會議通過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便是以此為基礎，但後

者內容全面得多。此後，這個草案被公佈供討論，經進一步徵詢高層領導的意見後，於 6 月份下發了修訂稿。[41]

農業六十條（即「工作條例」）試圖推倒重來。條例的內容據官方稱來自毛早在 1959 年第二次鄭州會議上的講話以及他後來對省一級黨的官員傳達的指示。[42]

遺憾的是毛在廣州會議上的講話全文至今仍未披露，不過從他 3 月講話的片段中可以看出，毛似乎又強調了關鍵問題在於平均主義，他於前一年的 10 月已指示中央書記處處理這個問題。毛談到這一問題時將它與大躍進的口號「一平二調」聯繫起來，即：一，平均主義；二，（不加選擇地）調撥（物資）。[43] 他認為，目前十二條緊急指示已經解決了諸如從富隊向窮隊調撥農具、牲畜這些物質的問題，但還未解決公社內部家庭收入的平均化。這是一些富裕的生產大隊和小隊的社員強烈不滿的問題。如果這些問題得不到解決，那麼農民的積極性就得不到鼓勵。[44] 這些觀點都反映在廣州會議印發的文件中。

像早些時候的十二條指示一樣，六十條也試圖限制公社的權力和作用，而使大隊得到更大發展，[45] 公社是過去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高級階段（完全社會主義的）。六十條的第一條就肯定公社是「適應生產發展的需要，在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基礎上聯合組成的」[46]。（著重點是我加的）這種表述有雙重含義：生產單位比聯合組織更重要；生產比公社生活的社會主義化成分（如托兒所、公共食堂、老年人的「幸福之家」）更重要。

六十條強調了三個原則：「各盡其能，按勞分配」，這條原則從公社運動的初始階段就得到正式承認；「多勞多得」，這條原則是 1959 年第二次鄭州會議後採用，同年 8 月八中全會（廬山）重申的；「不勞動者不得食」，這條原則顯然是六十條中新採用的，以強調 1961 年更加嚴峻的氣氛。[47]

生產大隊要成為所有制與經濟核算的基本單位。這條規定的意圖是恢復到大躍進前的狀態，因為，公社幹部熱衷於平均主義，把富隊

各種形式的財產都調到窮隊去，毛注意到這激起了受到損失的那些人的強烈不滿。[48] 而且，大隊也應避免在它的組織內部即「直接組織社員生產和生活」的隊之間推行平均主義。為達到這個目的，各級公社的規模都不宜過大。公社本身應相當於鄉，而不是區或縣；生產大隊相當於過去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由於這些規定，各級單位的數量在 1961 年都有增加。[49]

為防止公社幹部干涉或強迫大隊和生產隊幹部專門出臺一條特別長的條文是。當大隊內部有必要進行合作時——如修建水利工程——公社管理委員會應促成各方意見的一致，簽訂合同，支付賠償費。公社有權利提取大隊的一部分公積金，但被告誡（一般）不要這樣做。[50]

鑒於以上這樣的強調，六十條中有關大隊和小隊內容的篇幅比有關公社的內容長三倍也就不奇怪了，六十條成敗與否的關鍵明顯在於大隊和小隊之間的關係。大隊是「獨立經營單位」，對自己的經濟核算、收益、虧損負責，這些都在一個關鍵句中表達出來：「在全大隊範圍內實行統一分配，又承認各生產隊的差別。」[51]

後面的一條條文闡明瞭這句話的意思，該條敘述了大隊和生產隊之間的關係。這在一條口號中得到明確解釋：「三包，一獎。」生產隊必須包一定的產量、勞力、費用；超過定額的產量就獎給生產隊。甚至在這一級上也要避免平均主義。為此，這一條指示大隊要給富裕的生產隊額外的獎勵和特殊的承包，以補償它們在統一分配中受到的損失。[52]

在基層的生產隊本身也要嚴格遵守「按勞取酬」原則，而且確保工資中的現金不少於 70%，以避免平均主義。至多為 30% 的工資是以物代款的形式支付的——供給部分——實物，包括分配給在公共食堂吃飯的社員的食物。不過生產隊有權為那些家庭人口多但缺乏掙錢勞力的社員以及老、弱、孤、寡、殘、病人發放補助金。5% 的土地可以分配給家庭從事副業生產，包括種菜和養豬。[53]

六十條的成功落實最終要靠幹部來實現。他們的人數應減少，而且在大隊和隊這二級的幹部還得盡力幹好自己的農活。他們必須實事求是，進行調查研究。「他們應該說老實話，如實反映情況；一是一，二是二。反對弄虛作假。」[54]

從一條規定了堅持民主工作作風的條文中可以看出大躍進高潮中幹部的所作所為。「嚴禁打人罵人或變相體罰。嚴禁用『不准打飯』或『不發口糧』和亂扣工分的辦法處罰社員。」[55]

然而，雖然三月份出臺六十條的目的在於減少平均主義，縮減公社的規模，降低上級單位對下級單位過多的控制，它還是未能解決兩個關鍵問題；仍然把「免費供應」部分定為收入的 30%，按勞所得的工資為 70%；肯定了食堂的生命力和好處，只有那些社員住處分散、缺乏燃料的生產隊食堂除外。[56]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毛在九中全會上，又在廣州工作會議上一再堅決強調調查研究的重要性。[57] 毛稍微批評了鄧小平和彭真，他的口號是：「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這個號召對於他的高級同僚起了刺激作用，他們同意中央向各省黨委常委發一封關於此事的信，命令縣級以上第一書記到基層搞調查研究。正是在這封信裏寫出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58] 的名句。

在廣州會議上，劉少奇和周恩來的講話中都涉及到同一主題。正如劉少奇講的那樣：「過去幾年來，調查研究工作很薄弱。」自 1958 年以來，儘管大躍進取得了一些成績，黨還是犯了幾個錯誤，有大有小，有些可以避免，有些不可避免。上面不得不相信基層的彙報，但是有些彙報不完全可信，有些則根本不可信。中央在未進行充分的初步實地調查之前就制定政策，而報紙毫無事實根據的報道也助長了狂熱氣氛，從而使這個問題日趨嚴重。像劉一樣，周讚揚了毛關於調查研究和實事求是原則的文章。黨當前的缺點在於「我們發號施令太

多，走群眾路線太少。」[59] 根據一位中國分析家說，這些講話和檔提出的要各級領導參加大量的調查研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60] 當時無人指出毛自己就違反規則，而專門喜歡聽官員們的彙報。[61]

現在毛又恢復了九中全會後形成的行為方式，親自去武漢、長沙、上海。7 月份，他在河北省邯鄲召開了河北、山東的幹部、社員參加的會議。他派三個工作組回到他們的老家，第二年又派田家英去山西、湖南和四川。[62] 毛花了 20 天時間監督胡喬木的小組到湖南調查研究。胡在毛的韶山老家村子裏開了一個會，討論了六十條，特別討論了公共食堂。[63]

周恩來剛開完廣州會議就馬上到河北武安縣視察一個公社，然後又派了一個工作組到邯鄲搞了三周調查。雖然他忙於準備參加討論老撾問題的日內瓦會議，還是從 4 月 28 日至 5 月 14 日親自去那裏，[64] 並去了雲南。[65] 當一個特別直率的邯鄲農民對他說「如果情況一直像這樣繼續下去，甚至連你也可能沒飯吃」[66] 時，顯然周總理清楚地認識到了形勢的嚴重性。周於 5 月 7 日淩晨 3 時打電話給在上海的毛，初步作了彙報，當時以及後來指出了三點：公共食堂普遍不受歡迎，在已經解散食堂的地方，農民們形容此舉為「第二次解放」；平均主義的免費供應制度既招致那些努力工作的人們的不滿，又不能滿足真正需要的人的要求；農民們要求恢復實行人民公社前評工分的辦法，即按照工作量及多勞多得的原則。毛很受觸動，命令把這個報告下發至地區黨委一級。[67] 周的調查結果可能是毛幾個月後視察邯鄲的原因。

彭真的北京市黨委組織了五個組到首都附近的公社進行調查研究。[68] 鄧小平與他合作，到順義縣搞調查；八人小組成員包括他的夫人卓琳和市統戰部部長廖沫沙。彭真率領 23 人的工作組在懷柔縣進行了 40 天的調查 (12 月份他回到闊別 30 年的山西農村老家)。[69] 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率領一個六人小組到豐台區的一個公社調查。5 月 10 日的北京報告是鄧拓寫的，他因在「百花齊放」時期惹惱了毛而丟掉

了《人民日報》總編輯的位子；當時他是北京市委書記處的一名高級官員。[70]儘管北京市去搞調查的人員在「文革」中受到攻擊，然而命令把他們的報告連同周的報告一併傳達的正是毛本人。[71]與周的報告一樣，他們的報告也建議緊急調整供給制、食堂、工分制，還包括對強制性收購糧食的建議。[72]

副總理李先念從國務院各部派出工作小組到河北、河南、山東、江蘇、湖北，他自己隨河北小組調查。[73]朱德去了四川、河南、陝西。[74]譚震林在大躍進期間曾負責農業部門的工作，這一次從4月至7月重訪了河南省的七里營公社，——它是1958年的開路先鋒之一。[75]在其它省份也開展了類似的活動[76]。遭貶謫的前國防部長彭德懷被准許回到湖南老家的村子裏工作並調查當地的情況。[77]即便是彭的繼任者，長年生病的林彪也下去搞了7天調查，因此毛給他寫了封信，強調保護他的健康多麼重要。

劉的農村之行

恐怕劉少奇進行的調查歷時最長。他重訪了他的家鄉湖南。他的調查——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斥責為「44天的反革命復辟活動」——是他學習過程的一部分，同時對於他與毛之間的關係產生了長期、深遠的影響。[78]

劉於4月1日到達湖南，直至5月15日才離開。[79]一到那裏他就宣佈將以「遊擊方式」進行調查、生活，衣著從簡，目的地隨興，出行用兩輛吉普，陪同人員只有他的夫人兼秘書王光美，[80]以及一些職別較低的省裏的幹部，其中級別最高的是省公安機關的首腦李強（音譯）。

這一切表明劉有意把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以及其他湖南省高級官員排除在外，並且不住他有特權住的大賓館，因為他認為這些都會阻礙農民無拘無束地跟他談話。就像他開頭所講的：「如果我們不像工人，那麼我們的調查就不會深入。」他堅持自帶輕便行李（包括碗筷在

內)，他一直不顧他的陪同人員提出的反對意見，一切從簡。他責備那些把沙發和浴缸送到他預定要去的村莊的幹部。[81]

劉的第一站是他出生的寧鄉縣，位於省會長沙西面。他在東湖塘公社所轄的王家灣生產隊呆了5天。他本想回故鄉村莊——花明樓公社炭子沖看看，這時他突然得知毛已到達長沙。我們不知道黨的主席在國內四處漫遊而不把自己的行動通知最密切的同僚是否正常。[82] 但劉對此消息的反應卻像是說明瞭這兩人之間的關係。

他立即重新安排了自己的計劃，匆忙南行去湘潭縣，途中經過他的老家，只在故居外停留了一下——這是40年來他第一次重歸故居——4月9日他到達毛的故鄉韶山視察。他在那裏唯一一次有報道的活動是把「毛主席故居」改為「毛主席舊居」，他說「故」字有死去的意思。他4月10日離開韶山，途經湘潭縣城，趕往長沙，親自向毛彙報。據說，毛對劉的彙報印象很深刻，他對陪同人員說：「我也要向少奇同志學習。」他發誓說自己也要回韶山，但這次好像沒有回去。[83]

4月12日，劉離開省城到長沙縣廣福公社的天華生產大隊作調查研究，官方稱為期18天。不過，他4月15日至17日曾回到長沙參加一個重要的省級領導幹部會議。在天華期間，顯然有三位大區級高級官員拜訪了劉：陶鑄(中南局第一書記)、王任重(中南局第二書記、湖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湖南省委第一書記)。離開天華後，劉又回到花明樓公社，在那裏停留了11天。在結束他44天的湖南調查時，他很快準備好一份關於這次調查結果的書面報告，通過特別信使呈交毛。毛當時在杭州，那裏似乎是毛最喜愛的中國風景勝地。[84]

劉在湖南的農村呆了大約1個月。在3個縣裏，他走訪了3個公社及其下屬的6個大隊。不論按什麼標準衡量，這次在基層進行的巡迴調查對於一個國家首腦來說都是非同一般地持久深入。劉在下面呆了這麼長時間，很明顯是因為他清醒地認識到讓農民開口抱怨、讓幹部坦白地講話是多麼困難。一到湖南他就說：過去幾年中我們做錯了一些事情，這是沒有進行調查研究的結果。只有在你們幫助我們揭露

出真實情況的條件下，我們才能幫助你們。你們只有說實話才能幫我們制定正確的政策。(譯按：原文未找到，所以取消了引號。)

但是前些年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使得每個人都小心翼翼，不敢大膽講話。比如，天華大隊的領導就掩蓋錯誤以保住其「紅旗」隊的地位。有些參加調查的幹部遇到的是保持沉默的農民，劉教他們仔細觀察農民的臉上掛著的是笑容還是愁容，他們的眼神是充滿生氣的還是無精打采的，他們是抬著頭還是垂著頭。4 月 30 日他相當誇張地對一群幹部說：要搞好調查研究並不容易；要使人的主觀世界反映客觀世界並不簡單……調查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懂得那個真實的世界，而這樣做的目的在於改造世界。在改造世界的同時我們提高了認識它的能力，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必須結合起來。[85]

劉對於公社生活的每個方面都很感興趣。他發現糧食供應、食堂、供給制、副業、自留地、住房、林業、商業、農村集市等方面存在問題。[86]為了掌握食品供應的真實情況，他搞「突然襲擊」，在吃飯時間事先不打招呼就走進農民的家。有一次，他看見一戶農民在吃「代食品」，大為震驚，以至幾個小時都沒說一句話。一次他甚至轉到一戶農家的後院，察看在那裏堆放著的曬乾的人糞，以證實他認為農民吃不飽的觀點。在視察一個豬場時，他被安置在一個飼料棚裏過夜。為了把他的床板墊軟一點，陪同人員尋遍了棚子想找些稻草。正常情況下，在湖南這樣的水稻產區稻草是很普通的東西，而他們竟然找不到，這使劉更加沮喪。[87]

去天華大隊之前，劉看過一份報告，上面說大躍進期間充公的所有私人財物都已歸還或賠償原主了。在 18 天的調查中他召集了 11 次會議，走訪了許多農戶，發現實際上根本沒有進行任何賠償。歸還財物與調查的兩個主要問題有關：公共食堂和住房。在這兩個問題上幹部和農民的意見是完全不一致的。[88]

在劉調查的小村子王家塘，有一個 72 人就餐的食堂。食堂雇了一個五人「專人」小組——每人分別負責做飯、砍柴、看管水稻、種菜、

挑水這五樣工作——他們得到的工分佔了當地工分總數的 1/3。然而這個食堂辦得很糟糕，這導致經常爭吵，社員喪失積極性。劉對此顯然大吃一驚，在那之前，劉還一直對食堂抱有希望：認為它的優點是節省勞動力，把婦女解放出來參加生產。

附近還有一個叫施家沖的小村莊，有 11 家農戶，前些年分別住在 9 所房子裏。可能因為這麼小的村子建一個食堂不能節省成本，所以強迫其它 3 個村子的村民擠進這 9 所房子，這才湊夠建食堂需要的人數。其結果是，土地荒蕪，廁所和豬圈沒有足夠用水，廄肥和糞肥減少，糧食產量下降，家庭副業生產幾乎完全消失。總體上看，成立公社之前天華大隊人均住房是一間多；生活集體化以後，人均住房只有半間了。這種情況十分嚴重，以致劉給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下達了關於住房問題的指示。

在一次大隊社員大會上，劉發現無法讓那些謹慎的農民在食堂問題上明確表態。當他問農民是不是應該建食堂，他們的回答是：辦食堂好，各家自己做飯也好！他試圖讓他們相信：公社有食堂也行，沒有食堂也行；不能說沒有食堂就不是公社或社會主義了。然而農民們還是猶豫不定：他們不擁護辦食堂，但也不迫切要求廢除食堂。無疑他們對 1959 年廬山會議後黨在公社政策上的突然轉變還記憶猶新，所以不願意在將來政策一旦出現突然變化時又處於遭受批評的境地。

劉注意到顯示他們情緒的一個具體跡象就是他們追憶 1957 年時的幸福生活，那是人民公社成立的前一年：豬和雞的飼料很充足，自留地的產品豐富多彩，每個人都吃得飽。

一天下午，劉邀請八位施家沖的老居民來喝茶、抽煙、聊天，討論食堂問題。農民感到無拘束時，告訴劉食堂供應的飯量不足，而且供給制使人們懶惰。他們的「小自由」已被廢除，因此家庭自產的甘薯、芝麻、蠶豆的產量急劇下降；還出現母豬不生小豬，母雞不下蛋的情況。

讓農民們高興的是，劉同意關閉食堂。他命令給農民提供交通工具，好讓他們返回家園，並供給他們炊事用具以補償過去被充公的那些。在他的監督下，一個 10 人小組在兩周之內解決了農民重新安居的問題。談到他瞭解到的情況時，他對當地幹部講，自從人民公社出現以來，所有的人，上自中央一級的幹部都在睡大覺，不看現實，現在他們已經醒悟過來。【89】不久之後，中央正式批准解散食堂。【90】

在劉調查大躍進「共產風」的消極影響的過程中，他也站出來反對在報酬分配上的過度平均主義。它的主要表現形式是供給制，即「免費」供應食物及其它物品，這一項佔了農民收入的 70%，而按勞取酬的比例只有 30%。甚至在劉到達以前，這個比例似乎已經顛倒過來了。他以超越了社會主義現階段為由否決了這個破壞生產積極性的制度，提倡把免費供給下降到 20%。在「文革」期間，這被說成是：由於退回到工分制，有許多人口多、勞力少的貧農家庭生活過得很艱難。【91】

但是對劉在天華活動的主要攻擊集中在他懲罰了一個天華大隊的支部書記彭梅秀。彭是貧農出身，長期被評為省「勞動模範」。據說劉把彭形容為階級敵人的傀儡，階級敵人是指彭的家族裏其他兩名成員，他們也是大隊幹部。文化大革命的材料承認這兩個彭氏出身於地主家庭，本不應該當幹部；但否認他們控制了大隊。【92】

更重要的是，劉指責彭和她的同夥為了保住「紅旗」隊的地位而篡改產量數字，還說她拒絕解散食堂也正是這個原因。最離奇的是，後來人們引用劉的話說，彭梅秀想把他從大隊趕走：「我在那兒呆了十多天後，她指責我妨礙生產……我知道她是想把我趕出去。我不會讓她得逞，我拒絕離開。她叫我劉鬍子，還撒謊說我擾亂了大隊的秩序。她想讓大隊陷入混亂……回想起來，我們的憤怒還沒有完全平息。」【93】

王光美後來回憶說，她丈夫找到那些因反對共產「五風」而被罷官的幹部，鼓勵他們回來工作。彭聽說了這件事，就站在一個主要的

十字路口上，高聲喊道：「劉鬍子，你竟敢用右傾分子。」當一個公安官員向劉報告這件事時，他只是笑了笑。劉下次碰到彭時，說的話讓她羞愧難當：「我們共產黨人是為了每個人的利益而工作；一個人不能只考慮自己的名和利，你說對不對？」[94]

文化大革命中的報道承認彭確實把國家主席稱作「劉鬍子」——他在農村不刮鬍子嗎？——但將之描述成為對劉稱她是「傀儡」和「婊子」的正當反擊。看來彭逢人就說劉呆在大隊裏極大地擾亂了正常的農業日常工作也是可能的。但她不大可能當著劉的面說。

他們的對抗結局是不幸的。文化大革命後的報道強調劉也承認彭的優點，而文化大革命中的報道卻強調劉離開時的粗暴場面。總之，在劉的提議下，彭被免職，調到另一個公社。一年後她死於喉癌——文化大革命把這個賬也算在劉的頭上！[95]

對於不幸的彭很難不懷有一些同情。她在黨的等級制度中只相當於一個小小的下士，一個將軍卻突然來檢查她的指揮情況。無疑，在劉這種不留情面的仔細審視下，全國有數千個大隊都會遭遇類似命運。也許是因為劉還記得讓農民開口多麼困難，還有他與彭的衝突，所以才派他的夫人於 1963 年下半年微服去農村搞調查。

劉重返故鄉

5 月 2 日劉在作一次為期 11 天的視察時又回到了他的出生地，此次似乎沒有上次那麼不愉快。很可能他在天華大隊活動的消息已先於他傳到這裏，因為劉與炭子沖的大隊書記僅會面一次，就勸服他重新考慮食堂的問題。劉鼓勵書記，對他說他（劉）和毛都曾戴過右傾的帽子，那天晚上召開了群眾大會，解散了食堂，縣裏所有食堂都倣傚此法迅速解散了。但問題並未完全得到解決。有幾戶沒有烹飪用具，無疑大部分是在 1958 年土法煉鋼競賽中被熔化掉了。劉下令製造炊具，並禁止幹部把第一批分給自己家。[96] 在中國的勞改營裏，犯人們奉命生產廉價的鋁質煮鍋和平底鍋。[97]

劉的出生地與天華大隊一樣，住房也是個問題，而且由於食堂解散而再度惡化。有些房子在大躍進時已被拆除，有一處是為了造集體豬圈。其它房屋由於住房設施的平均主義被充公，然後再次分配。劉遇到的一個寡婦前兩年搬了 8 次家。雖然下達命令允許原戶主搬回自己房子，但在許多情況下，那些需要遷移的人無處可去，因為他們自己的房屋要麼被拆除，要麼被接收了。據說劉制定了四條原則作為解決這個縣住房問題的依據。[98] 至於他自己家的房子，他拒不同意改成像毛在韶山的舊居那樣的展覽館，但文化大革命的報道聲稱劉家的房子花費巨資進行了整修。一戶貧農住進了這所房子，這就是在「文革」中它未被拆毀的原因。[99]

炭子沖的根本問題還是糧食。那裏的糧食產量低於 1957 年的水準。人們告訴劉，產量下降主要是天氣的原因造成的，而根據王光美的回憶，前兩年並沒有發生足以引起糧食不足的自然災難。各地農民都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在調查過程中，劉得出結論：農民說得對，他特別譴責了「五風」。[100]

劉很幸運，因為他有兄弟姐妹住在村子裏，他們向他作簡要彙報時不會保持沉默。據說劉聽說一個婦女被迫吃野草，也沒有食用油加工這些野草時，吃驚得說不出話。聽說當地醫院有那麼多營養不良的患者時，他驚訝不已。5 月 7 日，他就糧食短缺問題作了公開道歉：

> 我已近四十年沒回過老家。我讓你們失望了。我為自己的官僚主義作風感到內疚。我只是聽取下面的彙報。中央對「五種作風」(即五風)一無所知。下面一些人上報的畝產量有 1,000 斤、1,500 斤、2,000 斤或 5,000 斤。中央只知道怎樣收購更多的糧食。結果是人民挨餓，家庭破裂。[101]

劉還警告幹部不要走後門給自己撈取供應品，後來他給年已 70 的姐姐送去 5 斤大米和少量其它食品。當地輿論認為，他本來可以送更多的東西，但他不想把他姐姐擺在特權的位置上。我們可以假設劉也

記住了他警告那些幹部的話。據劉的一個女兒回憶，這時劉斷然放棄了肉食，還降低了自己的工資。

顯然是為了洗清「文革」中對劉偏愛私營企業的指控，撥亂反正以後的報道說：劉反對分田到戶，但提倡生產責任制——這可能是毛死後鄧小平搞改革時流行於全國的那一種制度。劉認為零散的小塊田地和山上的荒地可以分給各戶（包產到戶），他還批評幹部沒收自留地和禁止家庭副業生產的做法。據說他的意見使產量在數月之內有了明顯提高。[102]

在湖南期間，劉顯然針對中央在大躍進時期的政策作了一些十分尖銳的批評，特別是在與幹部談話時。「文革」期間的報道引用了劉言論的片斷，其動機明顯是要證明劉的叛黨行為，但「文革」後出版的劉的講話則經過過濾證明他的正確性。兩種版本之間肯定有相當多一致的地方，並且「文革」期間的材料並不是不可信的，後者通常不被重視。

比如，有人藉口缺乏經驗，犯錯誤在所難免，王光美引用劉的話反駁說：「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我們沒有經驗，而我們並沒有犯重大錯誤。我們進入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時有了一點經驗，但我們卻犯了嚴重錯誤。這是為什麼？這是因為我們相當一部分負責同志不夠謙虛謹慎，驕傲自滿，忽視了實事求是的精神。」[103]

這段話的關鍵點是含蓄地指毛。在「文革」後出版的言論集裏，劉在故鄉的村莊裏對農民的講話中明確指出，主席對這些錯誤也要承擔一部分責任：「這次回來，看到這裏工作搞成這個樣子，中央有責任，要向你們承認錯誤。人沒有不犯錯誤的；世界上沒有不犯錯誤的人。犯了錯誤並不要緊，要緊的是認識錯誤，改正錯誤。」[104]

一段「文革」中的引語很明顯地說明瞭劉作為一個大躍進的堅定擁護者由於認識到它帶來的災難而轉變了想法。這段話似乎是針對毛的，裏面提到了偉大的開國皇帝秦始皇，毛的同僚有時把他比作秦始皇：

大躍進已導致了一些地方情緒低落，很多人死了……恢復要花一段時間。在這些地方，應該說已經帶來了毀滅……我們要知道秦始皇和隋煬帝被推翻是因為他們建了長城和大運河。實際上，現在死的人比那時還多……現在不是繁榮時期。死亡的人數超過了出生人數。[105]

但是，劉的話並沒有過分，因為僅在兩年前毛自己還警告中國共產黨不要重蹈秦始皇和隋煬帝的覆轍。[106]

劉在家鄉講話時把士氣低落與大躍進時期過度的集體主義聯繫起來；「文革」版本與最近出的版本有相當多的類似點：

你們拿走了社員的東西。你們沒收了自留地。還剩下什麼所有制？為什麼農民不尊重所有制……拿屬於公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東西？有兩個原因：第一，他們吃的東西少了，他們的糧食不夠吃；第二，由於前兩年的重新調整，東西都從社員手裏拿走了。所以現在他們也從公社拿東西。但首先是公社和大隊拿走社員的東西，不尊重社員的所有制。[107]

劉還嚴厲批評了大躍進期間管理工作中的「命令主義」，即缺乏民主。公社食堂是 1958 年 10 月 1 日利用中央的威望建立起來的。如果以後中國共產黨頒布有害的政策，可以「批駁、補充，或修正這些政策」。如果個人覺得不易抵制這些政策，應當通過「公社代表大會」(這是公社的最高決策機構)實現，劉也承認幹部很有可能嚇唬民眾，迫使他們投票贊成自己的政策，從而輕而易舉地操縱這種機構。[108] 雖然有些觀點在「文革」中看起來是令人吃驚的，然而這與毛在 1959 年春代表農民和基層幹部說話時的觀點非常相似。[109]

新聞報道需要老實

從湖南調查的經驗中，尤其是在天華大隊逗留期間，劉吸取的主要教訓是實地調查的新聞報道極端重要。在劉抵達天華前，新聞記者

已對這個大隊作了3個月的調查，並且證實了它自稱取得的顯著進步。劉揭露出真相後，於4月28日就新聞宣傳工作作了重要講話。[110]

劉給調查研究規定了三項任務：檢查中央的政策是否正確；檢查這些政策是否仍然適用；尋找過去沒有預想到的問題。不過劉在天華也遇到過刻意掩蓋事實的事情，因此他對這項任務的艱巨性並不抱幻想。他斷定過去毛推崇的那種低調的調查方法——「誠心誠意，甘當小學生」——已不再有效。[111]

劉並沒有宣稱他有一定可以獲得成功的其它方法。事實上，讓人民開口說真話非常困難，這在湖南尤為嚴重。這是個老問題，而且它本身就值得調查研究。[112]與親戚談話可能是一種有效的辦法——劉的女兒愛琴對他講了這些年來內蒙古人民過的艱苦生活——看來中央在這種危急時刻可能已決定派高級官員返回家鄉搞調查。陶鑄回到湖南老家。鄧子恢與他的福建同鄉、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鼎丞回到他出生的地區。同劉一樣，他也斷言食堂應該立即關閉。但劉告誡說必須警惕有些親屬為了個人目的誇大事實。劉的另一項建議是與外地人交談，大概是因為這樣做能使他們感受不到地方幹部的壓力。最好的辦法是提出問題，或提出與當前路線相左的觀點，然後仔細觀察他們的反應。[113]

大約在這時，劉下令對有關大躍進的新聞報道進行一次大規模的調查——「習慣性的欺騙」——但這是否就是因為新聞界未能如實報導天華大隊事實情況而導致，尚不可知。[114]早些時候他和毛都指責新聞界在1958年助長和煽動了狂熱的異想天開，劉在廣州會議上再次提出抨擊。周恩來甚至更早就表示了對新聞報道的準確性的關注。[115]

當時，中宣部部長陸定一派工作組到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這裏顯然被看作是新聞界左派的溫床。30名教師被開除。這顯然是對記者的新要求的一次演示，因為陸定一就人民大學的事例向全國各家報紙發了兩個通知。這個以懲罰為目的的工作組由鄧拓監督，挑選他擔當此任無疑是由於他作為前《人民日報》的編輯所擁有的專業知識的緣

故。[116] 5 年後當「文革」開始時，鄧拓承受到他從事新聞活動帶給他的災難。

無法無天的問題

離開湖南後，劉北上河南，這是大躍進時期的先進省。[117] 當他前一年視察河南時，劉主要擔心的是省領導低估了問題的嚴重性。[118] 但在 1960 年 4 月，他卻不能或不願抑制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的狂熱。在 1961 年 5 月的緊急氣氛中，劉好像已給他降級處分。實際上，在廣州會議上劉把河南選為批評對象。[119] 河南是遭受饑荒最嚴重的省份之一，而且信陽地區嚴重的災荒被認為是當地幹部的錯誤所致，吳芝圃也應承擔責任。[120] 6 月份據透露吳已被降為第二書記，把省委的最高職務交給劉建勳，一個解決麻煩問題的能手，而且他之前也有過因一把手被罷黜而接任職務的經驗。[121]

劉視察河南的那個時期，河南正急需一個健全而強有力的領導班子。它正在饑荒中掙扎，在大躍進後期，省裏的一些地區的法律和秩序陷入癱瘓。在許多縣裏發生了強姦、行兇搶劫、公路武裝搶劫，甚至殺人越貨，這些事情主要是民兵幹的。1958 年輕率的擴充使民兵的數量達到約 2,000 萬人。農民把他們稱作「瘋狗」、「強盜」、「山大王」、「破爛幫」、「老虎幫」。1960 年底中央軍委被迫派出一個由一名上將指揮的 40 人工作組整頓民兵。經過六周調查後，6 月份以前的訓練暫停，以便讓民兵下地勞動。雖然河南是受害最重的省份，在其它省裏也出現了類似無法無天的情況，出名的還有山東。[122]

北京工作會議

5 月 21 日至 6 月 12 日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劉與其他領導人在基層調查中發現的飢餓、犯罪、不滿合在一起使新的中央工作這次會議帶有嚴肅的氣氛。[123] 前一個月毛交給鄧小平一長串他想在會議上討論的問題時，強調了形勢的嚴重性，這些問題包括：修改六十條；糾正五種「共產主義」的工作作風；食堂；糧食；供給制；農用牲畜和農

具應歸大隊還是生產隊；歸還或賠償被充公的財物。城市問題可延緩至 7 月工作會議上解決。鄧在接到毛的問題題目的當天 (4 月 25 日) 就下發到省一級組織。直到 5 月份中毛才與省委第一書記們通信，詢問他們對這些問題的調查結果。[124]

工作會議分為三個階段。在頭五天裏，針對毛提出的四個問題進行一般性討論：賠償被充公的財物；調查研究；群眾路線；為那些在 1959 年廬山會議後進行的反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中被錯誤地懲罰的人們恢復名譽——最後統計出的數字為令人驚愕的 600 萬人。在為期 10 天的第二階段中，與會者討論了中央六十條草案及相關的指示、對賠償費的規定、手工業、商業、山區問題和食物問題的一個指示。最後兩天半還是用於討論食物問題，周、陳雲、李先念都講了話。[125]

劉和鄧在會議上的講話令人沮喪。5 月 31 日，劉談到尖銳的矛盾，他說不論工人、農民還是幹部的心情都不舒暢。他宣稱糧食問題是主要問題：糧食、食用油、豬肉、魚和其它產品的短缺正在激化城鄉之間的緊張關係，正在威脅到政權的生存。[126] 劉小心地引用湖南農民的原話，還有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以及來自河南、山東、河北的未提姓名的同志的話，他重複了他們對農業問題的歸因：三分天災，七分人禍。[127] 對於物資短缺和中共在公社和大躍進政策上失誤，中央必須承擔大部分責任，這些錯誤導致餓死人的事件發生。有些錯誤是由於缺乏經驗或不可避免，但中共沒能早些發現和改正錯誤造成了極大損失。[128]

> 我看在座的同志應該是有經驗了吧！餓了兩年飯了還沒有經驗嗎？鐵路還要修幾萬公里嗎？「小洋群」還要搞那麼多嗎？工廠還要開那麼多嗎？還捨不得關廠嗎？還捨不得讓一部分工人回去嗎？招待所還要蓋那麼多嗎？恐怕應該得到經驗教訓了。農民餓了一兩年飯；害了一點浮腫病，死了一些人，城市裏面的人也餓飯，全黨、全國人民都有切身的經驗了。回過頭來考

> 慮考慮，總結經驗，我看是到時候了。再不能繼續這樣搞下去了。[129]

劉強調了恢復農業生產、扭轉局勢的極端重要性。為完成這個任務，必須把城市居民遷往農村從事生產，減少農民供養的城市人口。必須使輕工業向農民供應所需的商品，勸農民為了城市居民的利益而賣糧。劉回憶道，農、輕、重這個先後順序排列是毛本人在 1959 年廬山會議上宣佈的。[130]

鄧也同樣悲觀。恢復農業所需的時間不會是 3 至 5 年，而更可能是 7 或 8 年——劉說是 8 或 10 年：

> 照目前情況來看，在生產關係、黨群關係、幹部之間、所有制問題上都存在著緊張關係。在過去三年中，所有制陷入混亂，熱情被損害……人為的錯誤比自然災難更嚴重……河南農民 認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缺點和錯誤是主要原因，不要老說它們只是一個指頭(與十個指頭)的關係。[131]

劉也批駁了一個指頭的估計。他和鄧都不必再提醒聽眾，大家都知道毛本人最喜歡用這種方法掩蓋缺點和錯誤。

毛後來說他在北京會議的最後一天，即 6 月 12 日的講話中作了自我批評，但沒有下發。[132] 當然，現在可見到的講話版本是明顯縮短了的，其中沒有任何他本人認錯的表示。恰恰相反，毛描述了從 1958 年 11 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就開始的改正錯誤的過程，而且把這些措施的失敗歸咎於幹部未能理解它們的重要性。他號召用整風的辦法進行一次對幹部重新教育的運動，以強調幹部辦事不力。[133]

毛可能在提到 1959 年廬山會議問題時做了自我批評。據說他同意為那些在廬山會議「後」被錯誤懲罰的人恢復名譽，大概不包括「在」廬山會議「上」受懲罰的彭德懷和張聞天。[134] 當然，毛稱讚了劉在湖南的調查，還公開表示願意從中學習，這可能是默認他自己最近進行的調查的膚淺。毛的這些舉動中有一種不符合他特性的謙卑。[135] 值得注意的是，毛的發言中絲毫未有劉講話中急迫甚至驚慌的調子。

六十條「修訂稿」

然而，毛已充分認識到經濟形勢的嚴重性，支持對六十條作重大修正，根據已發現的問題對六十條進行了修訂，6 月 15 日重新發佈了修訂稿，其中只有八條未作變動。[136] 允許關閉食堂，除赤貧或困難的特殊情況外，終止供給制。[137] 對上下級之間各自的權力加以肯定，以改正集體化的極端措施。[138]

公社、大隊、隊仍須執行國家政策，但要注意當地情況與合理性。各級代表機構和管理機構現在必須經過正式的無記名投票產生。不能由少數人管理這些機構，貧農也不再有優先權。最重要的是，生產隊不再直接控制農民的生產和生活，只管理生產和集體副業。[139]

公社必須提供種子、農具、化肥和農藥，但現在大隊和生產小隊有權根據質量的好壞進行選擇。公社在進行水利建設前必須經過有關大隊和生產小隊的同意。即便是實施一項有益於大隊的工程時，公社也不能動用超出 12% 的大隊公積金。[140]

大隊和生產小隊擁有牲畜和農具的權利得到了支持。對於生產小隊的所有權闡述得更清楚。3 月份規定，對超額完成糧食生產任務的生產隊必須把超產的部分或大部分作為獎勵；6 月份規定，超產的全部糧食都可作為獎勵。[141] 另一方面，3 月份規定大隊企業不得使用超出 3% 的生產隊勞動力，現在這個限制放寬到 5%。其它兩個由大隊靈活處理的問題無疑反映出經濟的現實狀況：放棄形式主義的「90%」社員的收入應當增加的規定；刪去了工分的幣值不能降低的命令。

可是現在規定，進行基礎建設時農民出工的日期不得超過 3%，大隊受到限制；一個重要的新條款規定公積金中最多只可拿 5% 用於福利；在 3 月文本中，仍允許生產隊把自己的公積金中的 30% 用於供給制，包括食堂和供給貧困戶。[142] 在 6 月文本中，食堂並未被正式廢除；只是不再出現在有關的條文中了。[143]

在生產隊內部，可分給農民作自留地的土地比例從 5% 上升到 7%。[144] 另一個重要的新條款反映了中國領導人在調查中的所見所聞：

它准許農民永遠擁有自己的住房，他們有權買賣或出租自己的房子。組織不能強迫農民搬家，也不能徵用他的家，除非建設需要這樣做，並應給予適當的補償。[145]

最後的第十部分是關於中共在公社中所起的作用。3 月文本中幾處驚人的遺漏在 6 月文本中得到了補救：黨員不僅有責任宣傳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而且要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嚴令黨的機關遵守「民主集中制」，而不是「集中制」！[146]

在進行修改討論時，一個意想不到的人提出還存在著一個定時炸彈。朱德問道：「誰調查了全國範圍內還有多少人單幹？是否應該加進這一條？這樣就使它合法了。在八年或十年內還會有單幹戶。即便你們不寫進去，這種現象依然存在。」[147]朱德直率的質問可能暫時被當作一個沒有什麼政治影響力的政界元老的鼓噪，甚至是題外話，因此被人忽視，但在 1962 年，這個問題卻成為一個主要爭論點了。

毛的領導作風

雖然修改六十條是把中國農村工作納入新軌道的關鍵一步，北京工作會議在政治上最顯著的一個方面是毛有效地先發制人，左右會議的結局。事實上，毛用其特有的方式限制在會議上對食堂問題做任何實質性討論。他在 4 月 26 日批准傳閱胡喬木寫給他的有關四川情況的報告，這說明他信任的私人助手的報告在毛制定政策時起了重要作用。

3 月下旬，如前面已經提到的那樣，胡在湖南省毛出生的村子組織了關於食堂問題的討論，4 月 16 日（按照毛的命令），省黨委印發了關於韶山討論會的報告，並將胡的報告抄送劉少奇，後來據說這次討論解決了食堂問題。[148]也許胡在湖南得出的結論與他後來在四川得出的結論相似，在四川他寫道：食堂是「發展生產的一個障礙，是黨群關係之間的癌症……這個問題解決得越快越好」。[149]四川省委（兼西南局）第一書記、政治局委員李井泉也許是出於謹慎，更可能是不願放棄大躍進的左派觀點，沒有給毛寫出他自己發現的問題和建議的報

告，這肯定激怒了毛。直到毛催促他，他才於 5 月 8 日和 11 日寫了報告。在這個問題上，他再次堅持大部分食堂有生命力。[150] 然而，朱德元帥在看完胡的報告後，認為用他個人的調查結果可以進一步證實胡的報告的正確性，就寫信給毛，把自己從陝西、河南和四川一路聽到的對食堂的一長串抱怨附在上面。[151]

4 月 26 日毛下令把胡的報告下發，即便是為報告提供材料的四川省委，也顯然是直到此時才「深刻理解」食堂問題！這是個相當有含義的暗示，表明了毛在中央制定政策過程中起的決定性作用。確實，記錄顯示，即便中國的高層領導人也很少敢當場對各種問題發表意見，除非毛已經在授權傳達的檔透露了他的想法，而此時，有些當地幹部或農民已經病急亂投醫、擅自處理了。

周恩來 4 月 19 日寫信給毛，彙報了廣州會議討論後他在全國各地的早期調查結果，但是他沒有直接提出供給制的問題，也根本沒提及食堂問題；[152] 他寫的個人報告 5 月 7 日才送交毛——實際上周的調查在胡的報告傳閱兩天後才開始——朱德於 5 月 9 日，鄧小平和彭真於 5 月 10 日，鄧子恢於 5 月 13 日分別交了報告。[153]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劉少奇在他調查的湖南農村准許關閉食堂是在他和毛長沙會面、有機會揣測毛的想法之後，也是在胡喬木關於韶山 3 月會議的報告被省委下發之後。

毛最後的讓步

有了 5-6 月工作會議上通過的決定作依據，中共實際上已經把農村的組織形式恢復到 1958 年以前的狀態——雖不明講而實際如此。儘管公社一級還保留一些職權，相當於大躍進前農業生產合作社高級社的大隊成為主要的決策單位。毛的一些同僚已經意識到，即使是這些措施也並不徹底，解決不了農村的生產問題。但是照樣沒人能預計他會採取什麼態度。毛在 3 個月後才又採取行動。

不清楚為什麼毛改變了以大隊核算的觀點。8 月 23 日，中央例行的夏季工作會議的第一天，毛告誡他的同事們，不要因為在廣州和北京經仔細斟酌制訂出六十條而過高估計已取得的成就。更多的工作還有待於完成。然而他受到足夠的鼓勵，認為經濟危機已達到最低點，甚至極度擔憂工業形勢的田家英也傾向同意農村的情況正在好轉。沒人願意細想會議地點竟又選在廬山這個山區避暑勝地，1959 年就是在這裏毛與國防部長彭德懷在經濟危機問題上發生過具有歷史意義的對抗。最好是讓過去的事情過去吧。【154】

造成普遍樂觀的一個原因是中央農村工作部寫的一個歡欣鼓舞的報告，毛首先致開幕詞，提出警告，之後聽了這份報告。它著重強調了六十條帶來的巨大變化，毛對這份報告的評價是很好，下令在會議上散發。【155】

報告用十個進步與十個問題作了對比，最主要的進步是農村工作單位的規模以異常快的速度縮小，這樣就增加了它們的數量，這是早在廣州會議上規定的。當年年底的數字見表 3-1。【156】

表 3-1　公社及其下屬單位的數量，1959-1961

	1959	1960	1961
公社	25,450	24,317	57,855
大隊	518,000	464,000	734,000
隊	3,299,000	2,892,000	4,089,000

資料來源：《農業年鑒》，1980，第 5 頁。1960 年單位數量的下降大概反映出廬山會議後左派的復活。

其它大部分取得的進步也顯示了恢復的跡象：發放 250 億元（第一章為 25 億元，第二章最後一段也是 25 億元——譯注）作為財產損失的補償；把大隊排在首位；自留地；恢復各家自己做飯，僅有 20% 的農戶仍在食堂吃飯；集中精力抓生產，以及對工作進行適當獎勵的規定。【157】

這樣的評估體現了良好意願，但沒有反映出現實，特別是在報告的十個問題方面。毛要求幹部們在秋收與春播之間的 6 個月中解決這

> 勞動日生產的產品價值也增加了，因此工資也應隨著調整。不注意這一點是不恰當的。[40]

談到農民的生活標準，毛對集體資金積累過多提出警告。此外，國家來自農業的積累應當通過稅收政策而不是通過消費品價格來完成，——這就是說，他贊成直接稅，而不贊成間接稅。消費品應以薄利賣給農民。[41]

在李富春6月18日人大講話對這一點的回答中（這是他三個個人意見中的第三個），這位計劃工作的領導人似乎主要關心的是使他的計劃委員會不受節儉過度的指責。他指出提留的積累比例比蘇聯低，工資和福利設施一直在增加，工農業產品的價格比率一直在合理地調整。說過這些之後，他列舉了一些做得還不夠的例子。[42]

但是，顯然在毛還沒有作報告以前，提工資這件事已經決定了，雖然他的干預可能使增加工資的幅度有所擴大。[43] 在人大會議上，勞動部長馬文瑞宣佈平均增長14.5%。[44] 除了增加工資外，北京還鼓勵地方當局和工廠經理們要更加關心工人的福利，特別要集中精力解決住房短缺的問題。[45] 6月28日，在波蘭波茲南發生了騷動，工人們抗議他們貧窮的經濟狀況，同武裝警察發生了衝突。這件事一定使毛確信他在這方面所採取的政策是正確的。[46] 7月12日的《人民日報》社論，一方面附和波蘭官方的分析，譴責這場騷動，說它起源於帝國主義者的挑撥，另一方面也從中吸取了教訓，即官員們必須經常密切注意群眾的困難。

給地方以更多的權力

毛的第五個經濟題目是關於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毛大力支持擴大地方自主權：

> 現在幾十隻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辦。各部門向省市政府的各廳局發佈命令，雖然中央和國務院不知道，但都說是中央來的，給地方壓力很大。表報之多，鬧得氾濫成災。

> 這種情況必須糾正。我們必須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黨中央不同有關地方商量好，從來不冒下命令……省、市、地、縣、區、鄉應當有它們自己的積極性和適當的獨立性，中央不應當把它們束在一個狹窄的框子裏。[47]

他對中央的這種用公文進行指揮的官僚主義的抨擊，在他講話的後半部分即討論矛盾時加強了。在這一部分，他要求把黨和政府的現有機構砍掉2/3。[48] 這個分權給地方的要求後來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得到了響應。劉少奇強調了它的重要性。[49] 周恩來也透露，在毛講話後，5月至8月之間，國務院就這個問題召開了幾次全國會議。[50] 但是顯然，這種實行分權的嘗試直到1957年下半年才開始實行。

經濟發展和國防

毛的《論十大關係》講話只在一個問題上同計劃人員是一致的。他建議縮減防務開支以便增加經濟發展的資金份額。為了安撫軍隊，他說只有用這種方法，中國才能得到核武器：

> 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軍政費用的比重，多搞經濟建設。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還是按老章程辦事。[51]

毛的論點可能（因為他沒有詳細說明）是核武器計劃只能建立在更加發達的經濟——還有技術和科學——的基礎之上。

這一段話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它透露，在那時，毛已決定中國應當有核武器——和中國不得不自己製造這種武器。[52] 中國直到1958年5月，才由當時的外交部長陳毅第一次公開承認想要獲得核武器。這件事由當時的空軍司令在當月的一篇文章中證實。[53] 在隨後的幾年裏，由於中蘇論爭，中國人揭露說，他們曾同蘇聯人在1957年10月15日簽訂一個協議。他們暗示，這項協議中包括莫斯科承諾向中國提供一個原子彈樣品。[54]

很可能，製造核武器的決定是經過相當的討論才決定下來的。據別人引國防部長彭德懷的話說：「中國有眾多的人口。如果將來戰爭打起來了，我們提供部隊，蘇聯提供原子彈。」[55] 沒有註明這段話是什麼時候說的，但由於它談到「將來的戰爭」似乎作這樣的推斷是合理的，即它必定是在朝鮮的敵對行動——在那裏，彭德懷曾指揮中國軍隊——停止後，或許是彭於 1953 年末或 1954 年初回到中國以後某個時候說的。[56] 同樣，這一點似乎也是確定的，即彭發表這個意見只能在中國作出核武器決定之前，或許就在關於這一問題進行辯論的過程中。

可能朝鮮戰爭的結束和彭德懷回到中國，引起了一場中國應當怎樣為將來的任何衝突作最好的準備的廣泛的討論。參加朝鮮戰爭的人民解放軍基本上就是打敗了國民黨的那支軍隊。它在組織上非常機動、靈活，士氣高昂。但是它缺乏現代軍隊所具有的一些專門性武器和集中指揮機構。[57] 在最初一些給人深刻印象的勝利之後，中國人民志願軍開始遭到來自聯合國軍優勢火力所造成的重大損失。[58] 從 1951 年中期，蘇聯開始供應志願軍大炮和飛機。中國人民解放軍系統的現代化就始於那時。[59] 朝鮮戰爭後，彭繼續推行軍隊現代化，但是如果他的意見是中國應有一支現代化軍隊但依靠蘇聯的核盾牌的話，那麼很顯然到毛作十大關係報告時，這個意見已被毛拒絕了。

很有可能的是，毛選擇中國走核武器道路，不是因為不信任蘇聯，而是因為他感到，中國要想成為一個世界大國，核武器是必備的先決條件。更直接地，他可能認為，對於保衛中國來說，核武器比種類繁多的現代化常規武器更便宜。[60] 確定的是，在 1956 年春天，北京有一場關於軍事預算份額大小的討論。這反過來又跟戰爭可能性的估計有密切關係，而 1956 年初的幾個月這個估計有了急劇的變化。

1955 年夏天，中國領導人已經取得一致意見，認為外來的威脅足夠達到應當增加軍事支出。對他們的考慮有重大影響的應該包括：1954 年 11 月美國和台灣的國民黨政權締結的防務條約；艾森豪威爾總統 1955 年 3 月所透露的美國軍隊可以用戰術核武器對台灣海峽施加壓

力的談話，和對金門馬祖防務的加強。但是這種形勢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對中國以前的軍事活動和宣傳的反應（這種活動和宣傳使國民黨從大陳島撤退了）。但是，其真正的結果卻是，在 1955 年中期，中方感到他們的軍事地位已經惡化而需要加強。[61]

在 1955 年 7 月的人大會議上，財政部長李先念宣佈 1955 年財政預算中防務支出大幅度增長[62]，其理由是帝國主義者包圍中國，占領台灣，並以新的世界戰爭威脅中國。[63] 三位地位非常高的軍隊發言人在人大會議上強烈支持對國際形勢的這一認識，國防部長彭德懷 7 月 16 日聲稱：

> 我國人民和政府，對於緩和國際緊張局勢，消除戰爭威脅和保障世界和平，曾經作了而且在繼續作著不懈的努力。但是我們一時一刻也不能忘記美國侵略集團還在千方百計地阻撓著我國人民解放自己的領土台灣，用新的大規模侵略戰爭的計劃威脅著我們。戰爭叫囂者們正在以原子武器威脅著全人類，企圖借此來達到他們奴役全世界的目的。……我們決不能犧牲我國的領土和主權來換取和平。也正是因為這樣，我們就不能不堅決地迅速地實行義務兵役制，並且從各方面加強我國的國防。[64]

劉伯承元帥[65] 也對世界局勢作了類似的陰暗的描述。在 7 月 21 日的講話中他得出結論說：

> 我們尤應提高警惕，在集中力量建設社會主義的同時，必須增強保衛社會主義的國防力量，以保衛我國獨立和世界和平。[66]（著重點為作者所加）

無論彭德懷還是劉伯承都沒有提到國際緊張局勢的緩和。

然而，在人大會議進行期間，從 7 月 18-23 日，一次四強（美、蘇、英、法）最高級會議在日內瓦舉行，於是代表東西方關係緩和的新「日內瓦精神」的說法開始傳播開來。[67] 葉劍英元帥 7 月 27 日在人大會議的講話中沒有提到這次最高級會議，但是他承認國際局勢

「是向和平方面發展著」。[68] 然後他就著手抵消這種勉強的承認的效果。他歷數了美國的一長串侵略事實和目標之後，得出結論說：

> 為著保衛祖國和人民的安全，保衛祖國社會主義建設，解放我國領土台灣，一併准備應付侵略者突然襲擊，（中國人民）必須採取各種可能的措施，繼續加強中國人民解放軍。[69]

周恩來總理7月30日的講話對日內瓦會議的態度比葉元帥較少保留，說它已經「獲得積極的成功」和已經導致國際緊張局勢「一定程度的緩和」。[70] 但是，甚至他也表示了擔心，唯恐中國——因為它處於軍事基地和軍事同盟的包圍之中——會遭受意外攻擊。他的結論是：

> 在這種環境下，我們必須保持警惕，必須增強我國必要的國防力量。只有這樣，才能保衛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成果，保證我國的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並且對維護世界和平的事業有所幫助。[71]

像周恩來、李先念這樣的政府官員對中國正受到嚴重威脅有了一致的看法，對國防預算分配又有了增加，人們認為軍事領導人總會滿意的。但是，很明顯，這些人並不滿意。葉劍英元帥批評「有些人」時說：「他們認為現在只需要集中一切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而不需要注重國防建設。」[72] 按照葉元帥的意見，這些人不明白，對人民解放軍來說，獲得足夠數量的最現代化的裝備對於對付武裝精良的帝國主義者是多麼重要。[73] 劉伯承元帥顯然是同意葉的觀點的，他把工業化和防務放在同樣的地位。他說：「有了國家的工業化，才會有國防現代化的基礎。有了國防現代化，才能保衛國家的工業化。」[74] 彭德懷元帥援引國家憲法來支持他加強防務的要求：

> 我國的武裝力量目前不但擔負著巨大的保衛國家的任務，而且要求不斷[75] 提高自己的戰鬥力……為了擔負起全國人民賦予的為憲法所規定的這種神聖任務，我們必須迅速建立起強大的現代化的武裝力量；不但要有一支強大的陸軍，而且要有一支強大的空軍和一支強大的海軍。[76]（著重點為作者所加）

彭德懷用「不斷」一詞，給人們提供了一個線索去認識這樣一個問題，即在剛剛宣佈增加軍費支出以後，為什麼軍隊方面的發言人感到還有必要同時強調這項支出的重要性。李先念的預算分配只是一年的預算分配，如果人民解放軍要「不斷」地加強，適當的規定就必須放到五年計劃中。研究一下李富春 1955 年在人大會議上關於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講話就會發現，他對軍費開支遠不如軍隊希望的那樣關心。為了證明五年計劃的高速度是正確的，李說：

> 我們在國內面對著國民經濟的落後狀態，在國外還有凶惡的帝國主義的包圍，不實行社會主義工業化，就不僅不能使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並且有使我國不能抵禦帝國主義的侵略，不能保持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獨立的危險。[77]

這一段話的重要意義在於，雖然李富春接受有一個敵對的外部環境，但他不像其他發言者那樣，用這個事實去證明增加軍費是正確的，因為那樣的話，當然意味著從五年計劃的投資項目中轉移資金。的確，他沒有論及防務支出，雖然後來透露，防務支出（連同行政費用）共佔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總支出的 32%。[78]在他講話的結尾，李富春讚揚人民解放軍保衛了祖國，保衛了社會主義建設。[79]甚至稍往後，當他對破壞搗亂和戰爭威脅的危險發出警告的時候，他也僅僅要求提高警惕，並沒有用這種危險來證明把本來計劃用於經濟建設的錢再額外撥出來增加軍費是正確的。[80]很可能，李富春就是葉劍英元帥所批評的「有些人」中的一個主要目標。

必須假定，李富春在他的高級同事中獲得了相當程度的支持，否則他不可能以那樣的方式提出五年計劃。在 1956 年最初的幾個月內，有一點越來越明顯了，即不管毛和周恩來先前的觀點如何，他們肯定是支持李的。到周恩來在 1956 年 1 月 30 日向全國政協會議作政治報告的時候，中國和美國已經在日內瓦舉行了一系列大使級會談。直到當時，會談所取得的結果並沒有使他大幅度地改變他對美國的看法：侵略集團不能阻止國際局勢的緩和，但是他們仍然企圖這樣做。美國人

堅持他們的「實力地位」政策，正在走向擴軍備戰；美國的「戰爭冒險」是不能排除的。但是在私下，毛對美國的和平誠意要樂觀得多。除了其它事情以外，他列舉的例子是最近它縮減了武裝力量的規模。[81] 大約正是這種由中國領導人私下作出的比較樂觀的評價可以解釋為什麼雖然周的分析類似於 6 個月前的一次，這一次的提法會不大相同。

> 為此，我們必須繼續加強國防，壯大我們的力量，在這裏有決定性意義的就是加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提早超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同時，我們要進一步發展和鞏固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和合作。[82]（著重點為作者所加）

1955 年 7 月 30 日周純粹是從防務的意義上講的，而這時，他談到防務是從國家自我加強這樣一種更加廣泛的意義上來講的，強調的重點是經濟力量的極端重要性。這也是毛三個月後在他的論十大關係講話中採取的路線。

毛講話兩個月之後，周在 1956 年的人大會上對世界形勢作了一番較樂觀的描述，甚至當他談到美國「繼續用威脅在遠東製造緊張局勢」的時候，他也沒有用這一點來為增加防務支出辯護，而僅僅相當溫和地說：

> 同時，我們應該指出，如果美國有些人竟然認為它還可以在遠東發動一次突然事變，那末，可以斷言決不會替它帶來任何好處。中國人民有充分的信心和足夠的力量，保衛自己的勝利果實，戰勝從任何方面來的武裝干涉。」[83]（著重點為作者所加）

周關於中國已有足夠強大的國防力量的認識的重要性，由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作了解放強調。他在同一天向人代會議指出，上年預算分配給國防的經費只用了 90.36%。但意味深長的是，雖然這個事實使這位將軍支持在 1956 年的預算中縮減 5.2% 國防支出[84]，他是軍隊在會議上發言的高級人員中唯一公開支持這一削減的人。這同上

次人代會是一個明顯的對比。上次會議三位元帥發言支持大量的軍費支出。[85]

很明顯，到 1956 年年中，應該是到毛作論十大關係報告的時候，國防費用的削減已經定下來了。[86] 根據國際形勢，特別是認識到需要擠出更多的資金使經濟增長更快一些，毛和周決定防務可以放到稍微次要一些的地位。國防部長彭德懷不同意這樣做，我們將在關於中共八大的分析中談到這一點。

毛去游泳

對毛來說，1956 年頭五個月是一個緊張的政治活動時期。他尋求從緊張的體力活動中得到休憩。在 1956 年 5 月和 6 月，他不顧同事的勸阻，[87] 三次暢游揚子江。[88] 那時他已 62 歲，他用一首詩來贊美自己的技藝：

才飲長沙水
又食武昌魚
萬里長江橫渡
極目楚天舒
不管風吹浪打
勝似閒庭信步
今日得寬余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第二首詩透露，在 5 月，毛對經濟增長仍然信心十足，特別是在他想到將在第二年完成的橫跨揚子江的第一座大橋和揚子江流域的洪水被控制住的前景時，更是如此：

風檣動
龜蛇靜
起宏圖

一橋飛架南北
天塹變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斷巫山雲雨
高峽出平湖
神女應無恙
當驚世界殊[89]

第六章 解凍在擴展

解放報紙

與此同時，在北京，黨的領導人作報告、發指示支持毛發動的自由化運動。這些活動，大都像毛的兩次講話那樣，是秘密進行的。

加強百花齊放政策的一些最重要的措施的目的大概是解放新聞界。在某種程度上，這些措施可能反映了由於蘇共二十大的召開所帶來的不再迷信蘇聯的傾向。當年夏天胡喬木——宣傳部副部長，草擬1956年4月5日對斯大林評價文章的主要負責人——在他家裏召開了一次新聞界領導人會議。會上，他批評塔斯社說：「塔斯社的新聞是簡單化、沉悶和呆板的，這是斯大林時期蘇聯政治生活的反映。」[1]但是由劉少奇在5月28日和6月19日向新華社發出的指示表明了這一政策更加積極的出發點。[2]主要目的是幫助促成一種普遍的、更加輕松的政治氣氛。劉認為，通過使報紙少一些官方性，鼓勵不帶偏向的報道政策和學習西方新聞的專業技巧，這個目的是能夠達到的。[3]新華社做國家通訊社好，還是當老百姓好？我看不做國家通訊社，當老百姓好。[4]但劉明確指出他沒有把這件事本身看成一個重大問題，因而他的這個提議沒有什麼結果。真正的困難是如何從那樣一種情勢下解放出來，在這種情勢下，新聞工作者由於是國家的雇員而感到拘束。[5]不僅因為他們感到只報道官方路線是一種職責，而且，劉似乎已經感到，因為在等級系統中，他們的地位低下，因此，在向上級官員提問和報道他們的工作時感到拘謹。[6]劉似乎感到，如果新聞工作者脫離了官員的等級系統，他們就可以得到較高的薪水，甚至比毛的工資還

要高。如果讓他們署名和鼓勵他們建立自己的名聲，他們就可能有獨立性和責任感，就能說出真話。[7]

說真話是劉對新華社官員的指示中最關鍵之點：[8]

> 現在的新聞報道有偏向——只講好的，有片面性。應該好的要講，不好的也要講。……現在我們的國際新聞報道只有一面：一味罵美國壞，只說我們好等。這種片面性的報道，會造成假象，培養主觀主義……比如說，美國政府首腦人物罵了我們，這樣一項新聞，我看可以登……周恩來總理罵了美國，有的國家資產階級報紙就刊登出來。為什麼資產階級報紙敢於把我們罵他們的東西登在報紙上，而我們的報紙卻不敢發表人家罵我們的東西呢？這是我們的弱點，不是我們的優點。[9]

這種對客觀性的關心顯然是為什麼劉提倡研究非共產主義的新聞的一個理由：

> 外國記者強調他們的新聞報道是客觀的、真實的、公正的報道；客觀的、真實的、公正的報道，是他們的口號。我們如果不敢強調客觀的和真實的報道，只強調立場，那麼，我們的報道就有主觀主義、有片面性。[10]

劉責備新華社不能使它的報道像資本主義新聞通訊社那樣引起讀者的興趣，[11]他提倡研究他們的方法，反對「機械地照搬蘇聯塔斯社的經驗」。[12]早些時候，一個新華社代表團到蘇聯去向塔斯社學習。[13]由於劉少奇的指示，新華社社長吳冷西於 1957 年初往英國和法國向路透社和法新社探索堂奧去了。[14]

按吳冷西的說法，劉的指示給新華社的幹部「造成了空前的思想混亂」，而他自己感到這些指示走得太遠了。[15]雖然吳冷西這些批評是在旨在毀滅劉少奇政治聲譽的壓力下作出的，但這些話也許是真的，即便不是吳冷西所指的意思。吳說這番話時的意思是劉的修正主義使他吃驚。更大的可能似乎是他所說的混亂是由於要完全改變新聞實踐引起的。現有證據不能證明劉少奇提倡的新聞政策與毛當時所認

可的政策相悖。我們知道，在一個主要問題上——出版不利於中國共產黨人的材料——直到 1957 年 2 月，毛和劉還是一致的，因為他准備重印「美國之音」的廣播和蔣介石的講話。[16] 有充分證據證明新華社按照毛和劉在這個問題上的意見採取的第一個行動可能就是那張小心翼翼創辦起來的報紙——《參考消息》。這張報紙主要依賴非共產黨的消息來源，但是被嚴格限制在受信任的官員中閱讀。[17] 關於另一個主要問題——西方新聞技術研究——劉少奇不過是具體運用毛在他的《論十大關係》講話中提出向一切外國學習的總意見而已。當 1956 年 8 月 24 日，毛建議音樂工作者在發展當代民族音樂時，不但要學習中國傳統音樂，而且要學習西方音樂的時候，毛也是在具體運用這一總的意見。[18] 此外，甚至吳冷西，儘管是被迫給劉少奇抹黑時也承認，在他的指示中，劉首先說，新聞社的工作必須在人民利益和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的基礎上來進行。[19]

《人民日報》根據這些指示立即採取行動。從 7 月 1 日起，儘管紙張缺少，報紙還是從四版擴大到了八版，並且向讀者解釋說，這是為了發表生活中更多重要和新的事物：

> 無論是社會主義陣營的，或者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是通都大邑的，或者是窮鄉僻壤的，或者是直接有關建設的或者是並不直接有關建設的，是令人愉快的，或者是並不令人愉快的。[20]

報紙新面貌的另一個方面是用較大的版面供自由討論和一種更好的文風。[21] 其他報紙也都倣傚。[22] 這種版面的改變，或者劉的原指示，都不像文化大革命中硬說的那樣，是「慫恿妖魔鬼怪出洞」[23]——即鼓勵反共分子攻擊黨——然而，從這時起答應給報紙的額外權力的確引出一個意外的結果，即允許它們於 1957 年初夏更自由地登載「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對黨的批評——雖然這些批評是直接受到毛的論人民內部矛盾講話鼓勵的。

加強法制

在蘇聯和東歐，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出現了一個削弱警察權力，加強法制的行動。大赦、平反，並且撤掉一些犯錯誤的警察頭目[24]。在匈牙利叛亂期間，秘密警察甚至被私刑處死。[25]

在中國，1956 年 1 月期間，由於對整個政治形勢估計的全面改變，官方路線對反革命的態度有了急驟改變。首先的一個跡象就是《十二年農業規劃》的公佈。其中第五條規定，除了最壞的反革命分子外，其餘都允許加入合作社。幾天以後，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董必武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上說：「新」的規則適合「新」的農村形勢。但是，他繼續有些矛盾地說，這也符合於「我們長期實踐」的鎮壓和寬大相結合的方針。[26] 董強調了 1955 年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成績，並強調對社會主義高潮後的反革命分子應繼續保持警惕，而不能失之於放鬆和過分寬大。[27] 然而，他又說：即使犯了嚴重的罪行，只要真誠坦白和悔改就會得到寬大處理。他列舉了一系列不同類型的反革命分子的區別，這樣就可以使反革命分子明白如果他們自首，他們可以得到何種程度的寬大[28]。與解凍相符的是 1956 年 2 月由最高人民檢察院直接向它的下屬部門發布的、關於重新全面審查 1955 年對反革命分子逮捕、起訴案件的命令。[29] 可能就在決定重新審查案件時，劉少奇強調了避免錯捕人和按憲法辦事的重要性：

> 要保證不錯捕人，不錯判人，必須提出這樣的口號……動員每一個人努力實現這個要求……必須為基本不作錯誤決定而戰鬥。[30]
>
> 這是因為，在憲法公佈以後，我們必須根據憲法條款處理事務。當案件是依據合法程序處理的時候，即使我們錯捕了人和錯判，這樣的錯誤也是合法的。[31]

從這兩段話中還不能概括劉的講話的全部內容，但似乎他用來說服檢察院官員的論點之一，是堅持合法方式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是他們自己的最大利益所在。無論用什麼論點，中國領導人可能是在知

道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內容以前，至少是在他們能夠領會這個報告，並在此基礎上作出了政策性的決定之前，就明顯地傾向於注意合法性了。[32]

因此，中國人 1956 年開始的加強法制不太可能是共產主義世界對秘密報告的反應的一部分。自從 1953 年以來，中國人一直在建立一種類似於蘇聯溫和的新經濟政策時期所創立的那樣一種法制。[33] 這個體制在 1955 年「幾乎」被鎮壓反革命運動所沖垮。[34] 1955 年底政治形勢的根本變化足以恢復一個建立全面法制的運動。當然，秘密報告可能使中國人在執行中受到了鼓勵。

1956 年 3 月初的第三次全國司法工作會議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召集的[35]。意味深長的是，董必武沒有在會上發言。而他所處在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職位，又是與法律事務直接有關的老資格政治局成員，這些都表明他應該是一位發言者。或許，正像他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上的演講所暗示的那樣，他對於新的方針沒有足夠的熱情，或者他已過深地捲入了舊方針的實施以致不能夠很好地為新的政策做宣傳。總而言之，主要的指示是由彭真和陳毅作的。彭真當時在政治局的地位稍高於董必武。[36] 所以選他們出來發言，也可能因為他們是最大量城市資本家的集中地——北京和上海的市長，而這些城市資本家則是法律官員揭露反革命罪行和鏟除腐化的主要目標。在會上發言的唯一的高級法律官員不是召集單位即最高法院或司法部的官員，而是檢察長。[37] 這是值得注意的。因為檢察院的職責包括審查警察局對逮捕的申請和起訴，並監督政府部門包括警察的行動的合法性。[38]

彭真 3 月 6 日在司法會議上發了言，對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已經闡述過的當前政治形勢作了進一步分析。毛已宣稱政治形勢起了根本的變化。周解釋這句話的意思是，在中國，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是毫無疑義的。劉少奇則在早些時候也作了同樣的論斷。彭真用階級鬥爭的術語詳細說明瞭這一點：

> 今年和過去比較，階級鬥爭不是更加激烈、尖銳了，而是正在緩和。地主、富農奉公守法，資本家已經接受改造，甚至反革命分子也比去年老實了……[39]總的說來，情況已經變化了。富農已被剝奪了武裝，一半以上的資本家已進入公私合營企業。[40]企業公私合營和農業合作化表明，我們已經打敗了資產階級……。去年，資產階級要和我們較量，我們挫敗了他們，孤立了反革命分子。其結果是高潮和資產階級尋求改造，並（作為一個階級）被消滅……讓我重申，階級鬥爭更加尖銳不再是事實了。這意味著甚至是地主、富農和資本家的絕大多數都不是堅決地反對我們，而是放棄他們的反抗，或爭取主動。(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能說 (階級鬥爭) 正在尖銳起來嗎!?[41]

彭真一再強調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結果緩和了階級鬥爭，可能是對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一個呼應。赫魯曉夫曾駁斥關於在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階級鬥爭尖銳化的理論；斯大林曾創造這一理論來解釋進入社會主義後的大規模恐怖。[42]但是，彭真堅持這一點不能歸因於讀了這個秘密報告所產生的震動。很清楚，彭真，可能還有他的同事，感到司法界的全體成員深深地捲入了前一年鎮壓反革命的運動中去了，因此很難使他們確信幾乎是一夜之間政治形勢的變化。在他發言的另一部分，彭真諷刺了了對新路線的潛在的對抗：

> 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矛盾已經改變和消滅了……如果農民要求監管反革命，[43]資本家都在揭發他們的親屬，你能說這行不通？[44]如果今年你還要反對對嚴重罪犯從輕處理，如果你今年還要嚴上加嚴，那麼你的唯物主義到哪兒去了？[45]形勢已經改變了，群眾要求一個改變，如果你還要貫徹老一套，那麼你的唯物主義到那裏去了！……反革命分子不敢活動了，……他們正在投降，[46]這些證明他們正在崩潰並且不敢反對革命了。[47]

在某種程度上，彭真迫使這些法律官員接受新路線還有其他的一些考慮在裏面。如果他們不這樣做，那麼彭真在北京強迫資本家進入

公私合營企業的成績就會被人質疑：「資產階級已經把他們的財物交給了國家，並且大多數敲鑼打鼓、張燈結彩地接受改造，——你真能說這個是假的嗎？」[48] 但是，彭真試圖在這個講話裏表達的基本意圖是和毛澤東的序言（新的最主要的任務是生產）是一致的。這個序言說：「現在群眾的要求不再在這個方面（指階級鬥爭）[49]，而是一心集中於積肥、挖井、抓生產。」[50]

這一段特別證明瞭這樣的論點：即中國的解凍始於社會主義勝利的 1955 年底和 1956 年初，而東歐各事件則促進了自由化。法律領域的新路線是改變總體政治氣氛所必需的，而不是在讀了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後才突然感到法制的重要性。當彭真強調法制的重要性時，他是在中國政治形勢發展的框架內闡述的：

> 在恢復經濟的時期（1949-1952 年）結束以後，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良好的社會秩序建立起來了。公開反抗的敵人大多數被控制了起來，遺留下來的大多數是隱藏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們不加強法制，那是很容易犯錯誤的。[51]

4 月 25 日，毛澤東在他的《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中首次對二十大作出了個人的反應。一個英國知名律師在北京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他聽到一個新的刑法不久將要完成，對此他很感興趣。這有助於建立一個每個公民都瞭解的全面法律准則。[52] 有另外一些公開的跡象也表明，政府打算建立一套成熟的法律體制。[53] 但在幕後，中國領袖們似乎還感到保證順利實施這個法律制度的決定性步驟是說服與之有關的官員認識採取新的態度，特別是鼓勵尊重檢察院。檢察院能成功地執行其職責對新方針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為用兩位西方學者的話說，它是「法律的當然衛士」。[54]

5 月 30 日，劉少奇對一個在檢察院工作的重要性問題上向他匯報的高級檢察官說：

> 必須保護反革命分子的法律權利。人們對保護反革命分子的法律權利不敢說什麼，害怕被當作右傾。最高法院和高級的

> 檢察長必須承擔這個責任……現在必須強調質量，根據法律處理事情。必須強調正確處理案件。檢察官必須警惕地反對和糾正錯誤。必須做好工作……現在著重於監察是必要的。……發現『缺點』，並對一些問題更多地進行考慮是必要的。目的是更加準確地打擊敵人。檢察機關必須更多地致力於防止錯誤和作出錯誤決定。[55]

一個月以後，在一個類似的場合，劉鼓勵那個匯報的檢察官員敢於對政府的其他機關提出不同意見，並指示應該怎麼做：

> 一個檢察官必須保證在提出控訴中不犯錯誤。他的職責就是瞭解每一件事是否處理正確。〔……〕從現在起，檢察院的方針就是監督法律工作，提高質量，掌握重點和經得起檢查。在你們的工作中必須有一個重點。你們應當研究問題，特別是緊緊抓住那些可能和容易發生錯誤的方面……你們可以告訴各個省和市作好準備讓民主人士和外國人視察你們的工作。這樣的視察可以發現一些問題，黨委應極端重視這些問題。知道還有相當多的錯誤，他們會注意檢察工作。必須使每個幹部懂得不能犯任何錯誤。這是檢察院的職責和任務……保持一般的監督是有用的。如果省的人民委員會犯錯誤，省委當然能糾正它，而有時候，也可以依靠檢察院來糾正它。[56]

同時，在 6 月 5 日一個公安部負責人的會議上，[57] 彭真也試圖對官員們傳達了同樣的意見，這些官員是最不歡迎這種限制他們權力的前景的，特別因為過去他們一貫把檢察院作為在法律事務中的一個非常低級的夥伴：[58]「在這個時候，所謂健全的法制的關鍵因素就是一個健康的檢察機構。」[59] 但是，像劉少奇在 2 月所作的那樣，彭真似乎感到說服執法官員尊重檢察院的最好方法，是使他們確信這樣做是保護他們自己的一種方法：

> 這有兩種情況。一種就是公安機關沒有經過檢察部門的允許就逮捕了人，那麼，即使逮捕是應該的，也是不合法的。例

> 如，如果一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沒有經過人民代表大會的常委會的允許就被逮捕了，那麼，即使他實際上是一個特務，逮捕他仍然是非法的。另一種情況就是公安部門在取得檢察機構的允許以後逮捕人，（在這種情況下）即使逮捕錯了，也是合法的。[60]

像劉少奇、彭真這樣的高級幹部都堅持遵守法律方式的重要性，在6月底召開的人民代表大會上，一些做法律工作的高級幹部在講話中承認他們的部門有越權的行為就不足為怪了。[61]他們之所以敢這樣做，是因為知道毛澤東和他的同事們仍然堅持鎮壓反革命運動基本上是必要和正確的。[62]但具有標志性意義的是，在2月份由檢察院單獨對肅反運動所作的檢查工作，從7月份始由主要的法律部門——檢察院、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共同承擔了。[63]這意味著調查組所發現的問題將會受到更加慎重的對待。

對緩和的反應

儘管毛提出了關於新方針的建議和在幕後進行了改善民主政治氣氛的步驟，然而這些措施所針對的主要得益者城市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反應都很遲緩。1956年6月，[64]關於「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公佈後，中央統戰部召集民主黨派領導人開了三天會議，民主黨派也舉行了他們自己的會議，[65]討論在新的政治氣候下他們應起的作用。[66]在統戰部的會上，一致認為互相監督應當加強，並且為促進經濟發展，對於政府的工作應當有更多的監督。[67]農工民主黨主席章伯鈞——他同時也是中國民盟的副主席、交通部長——在會上說，長期共存的方針代表了政治民主，百花齊放代表了思想民主。[68]但是他和其他民主黨派的領袖們可能已經知道，他們必須小心謹慎，因為共產黨的官員們將會不願意給他們以更多的尊重。9個月以後，章伯鈞不得不告訴他民盟的同事說，他從一個高級幹部處得到消息說長期共存的方

針很難付諸實行。他建議集中於百花齊放，以便創造長期共存的適當條件。[69]

但是，在 1956 年夏天，似乎百花齊放的方針也不會取得更大的成功。的確，一名叫王蒙的青年作家發表的一篇短篇小說[70]引起了文學上的轟動，這篇小說批評黨的中層幹部的犬儒哲學、道德敗壞和官僚主義。但是，從總體上說，知識分子並沒有急於投入到開花和爭鳴中，而是小心翼翼地去適應這個新方針。少數幾個敢大膽說話的人通常是知名作家。氣氛比較輕松，文學活動和知識分子的活動漸漸增加了。新雜志出現了，在各種論壇上也出現了獨立的觀點。文學權威們試圖重現 30 年代繁榮的文學氣氛，使那些年代的著名作家再度寫作。[71]但是，當時畢竟只是作家胡風和他的朋友由於向黨要求更大的自由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後一年。[72]知識分子在他們確信有真正永久的解凍前，需要聽到更多的保證。[73]

起初，對新路線最明顯的反應來自省的黨組織，顯然它們是奉上面的命令作出這種反應的。到 9 月中旬第八次黨代會前夕，有了一些關於一個反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的運動的報道，據說領導幹部正在檢查自己的驕傲自滿的情緒。[74]重要的是，在這些早期的報道中，沒有談到宗派主義——歧視非黨群眾——的錯誤。顯然，這些民主人士對待他們的新作用採取小心翼翼的態度是有道理的。

由於這些在共產黨統治下生活了近 7 年之久的人表現出那樣多的顧慮，因此毫不奇怪，國民黨對大陸的解凍沒有產生多少好感。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新方針在對台廣播裏得到了解釋。[75]更重要的是，當時北京政府對它在大陸的控制充滿信心，於是正式向蔣介石伸出了橄欖枝。在 1 月的政治協商會上，周恩來重申了政府一年來要求和平解放台灣的號召，並且提出有第三次國共合作的可能性。[76]6 月 28 日，在人民代表大會上，他進一步說：

> 現在，我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們願意同台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放台灣的具體步驟和條件，並且希望台灣當局在他們認為

> 適當的時機，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適當的地點……我願意在這裏再一次宣佈，我們對於一切愛國的人們，不論他們參加愛國行列的先後，也不論他過去犯了多大罪過，都本著「愛國一家」的原則，採取既往不咎的態度……[77]

顯然，結束內戰完成統一國家的任務是這個新的自由路線的另一個重要的動機。但是，台灣的國民黨政府沒有對此作出反應。

第七章 第一次「躍進」的結束

對冒進的批評

1956 年 6 月初，當毛澤東回到北京的時候，他還來不及注意到人們對他的自由化傾向的小心翼翼的反應。使他擔心的一定是經濟形勢。當時形勢非常嚴峻，以致在北戴河的高級幹部會上決定把生產的速度減慢。[1] 1956 年 6 月 15 日，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的第一天，財政部長李先念概括了經濟問題。在農村，合作社企圖用二至三年的時間超速完成十二年農業綱要，因而投資過多；在工業上，不顧質量和經濟性地追求數量和速度，結果是忽視安全，造成工業事故的猛增。重工業部所屬八種主要產品，有五個在 1956 年初在質量上下降了。[2]

這些是熟悉的問題，但現在形勢非常嚴重，必須採取更有力的行動。把那些因為急於求成而忽視質量和節約的官員們說成是保守，時間已經證明，這並不能制止他們的行動。而現在很清楚，譴責他們歪曲反對保守主義的口號也無濟於事。這種批評的方法使人們繼續堅持反對右傾保守主義的口號。周恩來也在 1 月提出這是即將召開的黨的八大的一個中心議題。[3] 然而，口號有時具有其自身的生命力。反對右傾保守主義已成為全部生產的口號。把忽視質量和經濟性說成是歪曲那個口號，這種說法不可能說服那些正在數量和速度方面創記錄的官員們。因此，如果要將政府要求剎車的意圖貫徹下去，就必須提出一個新的口號。這個口號在李先念的講話中提了出來：「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的傾向，而這種傾向在過去幾個月中，在許多部門和許多地區，都已經發生了。」[4] 第二天，《人民日

報》用社論的形式加以評述，以保證它的讀者不忽略李先念講話的重要性：「今年的預算報告的另一個特點，也可以說是報告的最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在反對保守主義的同時，提出了反對急躁冒進的口號。」[5]（著重號為作者所加）。這個報紙繼續說，這個新口號是在前6個月貫徹計劃的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來的，並反覆強調由李先念提出的問題。在那段時期內在報紙各專欄裏一直反覆討論這些問題。

四天以後《人民日報》專門寫了一篇既反對保守主義又反對冒進的社論。[6] 社論解釋道：急躁冒進問題是特別嚴重的，因為它存在於高級幹部之中。這些幹部在十二年農業綱要公佈後，為了避免被譴責為右傾保守主義而驅使他們的下屬這樣做。批判保守主義、公佈規劃，加上使用了「多、快、好、省」口號，導致了許多幹部思想的片面性。「他們以為，既然要反對保守主義，既然方針是『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既然要執行四十條，於是一切工作，不分緩急輕重，也不問客觀條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廢俱興，齊頭並進，企圖在一個早晨即把一切事情辦好」（著重號為作者所加）[7]。社論的意圖很清楚，即在繼續批判保守主義的同時，反對急躁冒進將是更為重要的任務。

> 總的方針是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但在具體工作中，哪些能又多又快，哪些不能又多又快，哪些是現在就可以又多又快的，哪些是將來才能又多又快的，怎樣才算省得恰當，怎樣既多、既快、既省，而又能達到好的目的，這些都要根據具體情況仔細地、實事求是地去加以考慮。[8]

這個重要的社論是由《人民日報》的主編鄧拓起草，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和副部長胡喬木修改，最後由劉少奇審查並通過。劉少奇命令把這篇社論送給毛澤東批准[9]。毛在草稿上寫了「不看了」三字。18個月以後，在猛烈批評財政部官員的時候，毛說出了他的原因：「為什麼我要讀那些說我的東西呢？」社論似乎是平衡的，但事實上它的真正目標是反對盲目冒進。毛透露說，社論發表以後他非常憤怒，

以致抵制了任何來自財政部的文件。毛還批評財政部沒有給政治局以適當的機會去討論它的建議。[10] 但是他並沒有說他在 1956 年 6 月就對劉少奇不滿，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對這一小事件的敘述肯定含有這個意義。[11] 可能一般的慣例是，當一篇《人民日報》社論預示重要方針改變的時候，劉少奇的任務就是保證社論的起草者沒有曲解最高領導層內部已經一致的東西。在毛的眼中，真正的「元兇」一定是那些迫使最高領導進行剎車的人。看來很清楚，劉少奇不在他們中間。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沒有在這個問題上舉出證據來指責他。一位文化大革命時的宣傳負責人要劉少奇解釋的許多問題中，也沒有這一點；[12] 劉少奇本人被迫作的三份交待中也沒有這一點。[13] 或許在阻止 1956 年躍進的爭論的問題上能夠說明劉的態度的最重要表白，是他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他直言不諱地譴責那些負有責任的人，他的用語說明他不可能也是其中之一。[14]

計劃制定者的勝利

我們甚至有更好的理由來開脫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周恩來承認：「1956 年的反冒進我是有責任的，我做過一個自我批評。」[15] 周的承認是不奇怪的。作為總理，他總體負責全國的經濟部門。在 1956 年的許多時候，特別是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他的助手，即那些部門的官員都表示反對冒進。由於他們的職務，他們對冒進的影響是看得最清楚的。他們包括一些重要人物：第一副總理和政治局五個常委之一的陳雲；[16] 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李富春；[17] 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李先念；[18] 副總理兼國務院負責農業口的主任鄧子恢；[19] 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薄一波；[20] 國務院負責運輸和交通的主任王首道。[21] 如果這些人全部，或大多數反對盲目冒進（有證據證明他們都是反對冒進的），那麼毛澤東即使得到劉少奇的支持也很難拒絕他們的意見。而且，毛本身對於經濟事務需要現實主義並不是不敏感的，也很清楚地知道生產所遇到的嚴重困難。有意思的是，毛似乎對 1 月份

運動發動後出現的不現實的計劃和指標，採取了事後為自己開脫責任的態度。文化大革命期間，毛在 1956 年 1 月關於知識分子的會議上講話的一部分被流傳了出來：

> 各部門計劃指標也要放在可靠的基礎上。本來可以做的不做，是不好的，但無充分根據的行不通的就叫盲目性，就是「左」傾冒險，雖然目前這還不是主要傾向，但已經可以看出，有些同志的頭腦不那麼清醒，不敢於實事求是，怕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難聽。凡是經過調查研究，辦不到的，要敢於說辦不到，敢於停下來，把計劃放在可靠的基礎上。[22]

沒有理由懷疑毛在那時說過這樣的話，這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周恩來起初準備支持十二年綱要。在有效發動生產運動的著名《序言》中，毛還警告人們不要「無根據地胡思亂想，不可以超越客觀情況所許可的條件去計劃自己的行動，不要勉強地去做那些實在做不到的事情」。[23] 事實上，6 月 20 日的社論——據說使毛生氣的那篇——正是引了這段話，譴責冒進的同志不聽毛主席的話。[24] 在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一個講話中，毛一定花了許多時間講周恩來在同一會議上講的那些問題。但是，在「文革」期間那個講話唯一透露出來的部分，不是針對知識分子（他們大多數不是黨員），而是針對可能犯了急躁毛病的黨內同志。[25] 這段話頗有使毛從 1956 年上半年的經濟冒進中解脫出來的味道，而冒進都是他的政策的直接後果，雖然他也曾反對過冒進。

毛澤東像他的同事一樣，已經從過去幾年的經驗中認識到，生產競賽帶有很大的冒進性質。他也許可以接受在持續生產競賽的框架中限制冒進主義，這就是4月中央和國務院關於節約辦社的指示。但是，他反對的是對躍進本身的剎車。如果因為他自己對蘇聯工業化模式的複雜性的相對無知而感到無能為力時，他也許特別煩惱過。他的「十大關係」講話，是根據許多經濟部門的一系列匯報作出的。這些匯報必然揭露了許多工業上的問題。這個講話不應只被看作關於資源分配的綱領性文件，也應被視為一個要在蘇聯式計劃的背景內找到保持工

業躍進方法的努力。但是在六個星期內，他不得不接受了周恩來和制定計劃者們反對冒進的要求。

十二年農業綱要的放棄

使毛澤東最終不能堅決反對對生產運動剎車的，是農村中的發展情況。對這種發展的意義，他是能容易地意識到的。6 月 20 日，社論選擇登載了一個盲目發展的例子，這就是，儘管在南方雙輪雙鏵犁被積壓[26]（因為那兒的水田不宜使用它），但仍有生產雙輪雙鏵犁的高指標。在這種情況下，可能是鄧子恢的辦公室不得不發了一個命令「毀犁還鐵」，一下子大約有 70 萬張犁被毀掉。[27]

糟糕的事還沒完。按照一位西方專家所說，「農業的災難就在於計劃混亂和管理不善，這將導致危機。如果不採取果斷行動的話，這種危機將很快地影響整個經濟」。[28] 十二年綱要所倡導的各種技術改革，都被性急的幹部們不顧當地情況強制地推行。對穀物生產的過分強調，導致對那些輕工業原料作物生產的忽視。[29] 對自留地面積的限制和好鬥的幹部強制地將樹、生產工具和家畜集體化（有時無償或予以很低的價格），導致農民屠宰豬和家禽，並讓他們的役畜因無人照管而死去。[30] 結果農民的收入下降。[31] 而且壞天氣使政府更難以實現它讓 90% 的合作社農民在 1956 年增加收入的保證。在「八大」召開前，《人民日報》社論向與會代表報道了令人沮喪的消息：重要的小麥生產省份吉林和黑龍江遭受了中共執政以來最嚴重的水災，而河北、河南的水災比 1954 年的最大水災更嚴重。報紙唯一可以提供的安慰是，自從 5 月底以來全國各地遭受的洪水、風暴、旱災，就全國而言，沒有達到 1954 年的程度。[32] 即使這樣，據後來透露，全國 7.1% 的可耕地受到了影響。[33]

共產黨甚至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形勢綜述之前就採取了措施。9 月 12 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出了關於合作社生產和組織問題的指示。[34] 這個指示在開頭尊敬但簡明地提到了《十二年農業發展綱要》，

但指示的整個意圖明顯地是要糾正由綱要引起的農業經濟發展的不正常現象——忽視副業，給合作社規定不切實際的生產指標，硬性引進未經試驗的技術發明，建立規模過大的合作社等。實際上，《十二年農業發展綱要》已被放棄了。沒有什麼證據能夠表明中央七中全會(8月22日、9月8日和13日舉行)曾按原計劃討論過這一指示，更不要說批准它了。因為這個規劃曾是1956年「躍進」的核心部分，因此，它被放棄，以及對冒進的批判，就象徵著這次躍進本身被放棄了。[35]毛的以較快步伐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的第一次努力失敗了。

附錄一：陸定一對毛澤東百花齊放方針的解釋

在文化大革命中，陸定一對百花方針的解釋被攻擊為對黨的政策，也自然就是對毛的5月2日講話[1]的「擅自修正」。弄清這個指責是否公正很重要。如果指責是對的，那將表明那時政治局以外很高級的官員願意在何種程度上反抗毛。它也可以用來支持文化大革命中對1966年以前的大多數歷史研究的總體思想，即認為毛的思想總是前後一致的，而任何偏差則是他的反對者的修正主義行為的結果。

遺憾的是，由於手頭沒有毛5月2日講話，直接的對比是不可能的。但可以根據毛1957年2月27日發表了同一思想的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的有關部分進行對比。但是，這在原則上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因為有關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最後版本是在修改之後才發表的，並且政治環境完全不同於最初講話時的政治環境，也與毛和陸定一發表他們的百花講話時的政治環境相差很大。雖然如此，如果在這些情況下，陸的講話沒有與毛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根本不同的觀點，那麼，就應該可以假設：陸的講話也會同毛的百花講話一致。

對陸的論述的攻擊聲稱，陸定一認為雙百方針的四條根據，概括起來就是：矛盾消失了，階級消滅了，階級鬥爭結束了。讓我們考察一下他這四條根據。

陸首先說，在社會主義改造的各方面都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在以後幾年內，國家就會變為「一個沒有剝削階級的社會主義國家」。[2]毛在1956年1月25日最高國務會議上說過，社會主義在3年內將基本上建立起來。[3]在他的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中，毛進一步說，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在1956年「基本上已經建立了」(著重號為作者所加)。[4]陸的說法和毛的說法的一個不同點就是，陸在他們共同假設的基礎上對未來作出了正統意義上的結論。通過研究蘇聯人怎樣寫他們在1936年建立的社會主義，就可以看出陸定一沒講任何非正統的話。蘇聯人寫道：「社會主義已經勝利了……人口中的階級結構改變了。所有剝削階級已經消滅了」。(著重號為原文所有)[5]

陸的第二條根據是，「知識界的政治思想狀況已經有了根本的變化，並且正在發生更進一步的根本變化」。[6] 他指的是周恩來 1 月份關於這個問題的長篇講話。周的有關的話就是：「他們中間的絕大多數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我國的知識界的面貌在過去六年來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7]（著重號為作者所加）次年，毛說：

> 我們知識分子的大多數，在過去七年中已經有了顯著的進步。他們表示贊成社會主義制度。他們中間有許多人正在用功學習馬克思主義，有一部分人已經成為共產主義者……當然，知識分子中間有一些人現在仍然懷疑或者不同意社會主義，這部分人只佔少數。[8]

毛的話也許可以被認為不太明確，但這三個人基本上對知識分子政治狀況表示了十分樂觀的態度。同樣重要的是，陸的話並沒超出周在毛在場的情況下講的那些，然而，周的講話從來沒受到批判。

陸的第三個論點是：

> 我們還有敵人，國內也還有階級鬥爭，但是敵人特別是國內的敵人已經大大削弱了……仍然必須繼續堅持鬥爭，不能鬆懈。[9]

毛論述反革命問題時，用了相似的話語：

> 目前關於反革命分子的情況可以用這樣兩句話來說明：還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首先是還有反革命，有人說，已經沒有了，天下太平了，可以把枕頭塞得高高地睡覺了。這是不合事實的……如果我們放鬆警惕性，那就會上大當，吃大虧……如果說現在全國還有很多反革命分子，這個意見也是錯誤的。如果接受這種估計，結果也會搞亂。[10]

最後，陸說，「全國人民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性大大增強，而且還在繼續增強之中」。[11] 幾乎在毛的關於人民內部矛盾講話的第一句，肯定是實質性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們的國家現在是空前統一的。」[12]

毛接著繼續討論仍然存在於社會中的矛盾。但當時這是他講話的主題，並且這是針對百花講話後發生的匈牙利事件時講的。

總之，如果像「文革」所攻擊的那樣，陸暗示(因他的確沒有明確地講)階級鬥爭結束了，那麼陸也不比毛自己走得更遠。而且如果陸的話可以被解釋為，他認為這種方針的目的「只是使文學藝術繁榮，使科學趕上世界先進水平」[13]，那麼陸可以在毛的講話中引一段類似的論述來為他自己辯護：「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使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14]

在文化大革命中，把陸定一的講話視為對毛的觀點的完全歪曲的說法，根本沒有說服力。[15] 甚至，即使陸曾打算做一個同毛的政策的基本主張相悖的解釋，那麼毛也一定會有機會在他的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或別處糾正這種歪曲。[16] 可能的是，在最初講話時，陸也許有些激動，說得過頭了，以致講話的部分內容在發表前不得不被刪去或修改。例如，據說他講到：「必須有兩個傳下去——馬列主義世世代代傳下去，資產階級思想也要世世代代傳下去。馬列主義萬歲！資產階級思想也萬歲！」[17] 在他發表的文章中沒有這一段。也許，最接近這一段的是：

> 在人民內部，不但有宣傳唯物主義的自由，也有宣傳唯心主義的自由，只要不是反革命分子，不管是宣傳唯物主義，或者是宣傳唯心主義，都是有自由的。兩者之間的辯論，也是有自由的……對於思想問題，想用行政命令的辦法來解決，是不會有效的。只有經過公開辯論，唯物主義的思想才能一步步克服唯心主義的思想。[18]

早些時候，他說過「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鬥爭將是一個長期的鬥爭」，它甚至在階級消滅後還將繼續存在下去。所有這些都是正統的毛主義的思想。從這個觀點來講，我們可以看到那段未被發表的段落的第一句，僅僅是另一種表達唯心主義可能長時間存在的方式。他的

「唯心主義萬歲」甚至在1956年的寬鬆氣氛中也可能會被看作是過分的。但是，假設陸的講話中那一整段話是這樣的：

> 必須有兩個傳下去——馬列主義要世世代代傳下去，資產階級思想也要世世代代傳下去。馬列主義萬歲！資產階級思想也萬歲！(因為)馬克思主義只能通過鬥爭來發展——這不但在過去和現在是對的，在將來也必然是這樣的。正確的東西總是在同錯誤的東西的鬥爭中發展的……同錯誤思想鬥爭就像種牛痘——一個人在種了牛痘後就有了更強的抵抗疾病的力量。溫室裏的植物是不會強壯的。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不會削弱而只會加強馬克思主義在思想領域的領導地位。

在這樣的語境中來看，陸的「唯心主義萬歲」就是相當無害的。這樣來構建這段話也很可能和他的原話相近，因為它表達了之前所引用的那段話的同一思想。更重要的是，在「因為」後面的每一句話，都來自毛的人民內部矛盾講話。[19]甚至「資產階級思想萬歲！」也可能是直接引用毛的話。證據就是：1956年下半年，毛說過，「所有政黨萬歲」。這樣來看，如果他想要資產階級政黨萬歲，那麼他也會贊成他們的思想萬歲的。[20]

總之，根據現在所能看到的證據來看，陸定一並沒有歪曲毛1956年5月的思想。如果這個結論正確，那麼就要注意陸的講話中後來被修改的一個方面。劉少奇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的主要目的是同教條主義作鬥爭。這同毛在討論是與非關係(4月25日《論十大關係》講話的第九個關係)的論述是一致的。在這一段裏，毛只是攻擊了教條主義者。它也與《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對斯大林的評價是一致的。這篇文章的主要部分是論反對教條主義的必要性。陸定一的話是：「但是，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工作中，也有許多缺點和錯誤，主要的是教條主義傾向。」[21]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這個估計在後來幾年裏，隨著毛對修正主義的日益增長的擔憂而逐漸被修改了。

第二編

中共八大

第八章 毛澤東的地位

儘管前幾個月經濟遭受挫折，1956 年 9 月 15 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還是在一種勝利的喜悅氣氛中召開了。自從中共第七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來，在過去的 11 年中，共產黨人戰勝了國民黨，奪取了全中國，建立了強有力的政府，給中國帶來了過去一百年中明顯缺乏的和平和統一。他們恢復和發展了經濟，大體上實現了農業合作化——但沒有造成像蘇聯那樣嚴重的後果——並且把私人工商業改造成國營或公私合營的性質。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朝鮮戰爭中給人以深刻的印象，使國際社會對中國新政權刮目相看。近年來，特別是 1955 年萬隆會議以來，中國外交在亞洲贏得了新的朋友。毛澤東在 1949 年曾經說，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到了 1956 年，人們都明顯地認識到中國的確是站起來了。

不過，中共八大的代表們還不能沉湎於自我祝賀的情緒當中，他們面臨著一系列實質性的方針問題。其中包括，根據蘇共二十大精神，以及從那時起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開展反對個人崇拜斗爭所帶來的毛澤東的地位問題；[1] 由毛提出的政治自由化的方針問題；在剛剛放棄 1956 年的躍進之後，對於經濟發展的指導路線問題。有關這些問題的決定在年初就已作出來了，但對代表大會來說，認可這些決定，並且指出今後的發展道路仍然是重要的。後來的結果表明，儘管決定早已作出，但代表大會的情況說明甚至在中共的最高領導層，對這些問題仍然存在實質性的不同意見，自那以後，這些不同意見持續了很長時間並日趨嚴重，也正是在這些不同意見中埋下了文化大革命的許多種子。在八屆一中全會上選出了新的政治局，其中一些重要的提升和降職預示著今後的發展。

刪去「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在第八次代表大會的公開場合扮演了一個配角，他僅致了一個很短的開幕詞，而把主要的政治報告留給劉少奇去作。但這並不能說明毛澤東在黨內的實際地位。斯大林在 1952 年也曾讓馬林科夫在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主要的報告；那時或那時以後，沒有任何人認為這表明斯大林的地位下降。如果人們用蘇聯的這個先例作為指南，最多能得出這樣的結論：毛澤東正在把劉少奇作為他的繼承人推到前台。

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對毛澤東的威信的真正打擊是從新黨章中刪節了兩處涉及「毛澤東思想」的部分，而這曾寫在 1945 年的黨章中。[2]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這個刪節成為譴責劉少奇和鄧小平的主要理由之一，因為劉少奇在政治報告中也沒有提到毛澤東思想，而鄧小平則作了關於新黨章的報告。事實表明，劉少奇可能的確試圖減少毛澤東的作用——雖然不是像人們所指責的那樣——但是，鄧小平在他的報告中談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反對個人崇拜的鬥爭時，卻捍衛了毛澤東的地位。

> 把涉及毛澤東思想的部分從新黨章中刪去的提議，最初來自彭德懷。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審查時，彭德懷承認：1956 年，當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時，是我建議把毛澤東思想（從黨章中）刪去的；我一提出這個建議，劉少奇就贊成說，「刪去它可能更好一些」。我是反對個人崇拜的。[3]

彭德懷的交待澄清的第一點是，刪去毛澤東思想是由一個並沒有參與起草新黨章和劉少奇的報告中有關「國家的政治生活」那一重要部分的人提議的，這一部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到強烈反對。劉的報告中有關「國家的政治生活」部分是由彭真起草的；[4] 而新黨章則據說是由劉少奇指定的一個班子起草的，成員有鄧小平、安子文（那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代部長，後來作部長）和劉瀾濤（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代表大會之後，任書記處候補書記）。[5]

彭德懷的交待還證實，刪去「毛澤東思想」是在很晚的階段才決定下來的。[6] 而且有另外一個論據表明，主要的報告是在非常倉促、最後一分鐘的情況下定下來的。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後來宣稱：

> 「八大」的報告有缺點，但這不是他（劉少奇）個人的問題。「八大」的決議似乎也有錯誤……主席看過這個文件嗎？……每件事情都是在匆忙中做出的，劉少奇也好像是匆忙地看過它。不管怎樣，這個文件已經公佈很長時間了。毛主席和黨中央並沒有說什麼。[7]

劉少奇夫人認為文件是在倉促中制定的說法已經被周恩來總理所確認，他曾經說，代表大會關於劉少奇政治報告的決議在廣為傳播之前沒有給毛看過。[8] 劉少奇在一份交待中說，雖然毛澤東反對決議中的某些句子，但已「沒有時間去修改了」。[9]

為代表大會做準備的中共中央七屆七中全會斷斷續續地於 8 月 22 日、9 月 8 日和 13 日舉行，這進一步證明代表大會前夕缺乏一定的組織性，儘管從 1955 年 3 月就開始為大會做準備了。[10] 在代表大會的前幾個星期，幾位最高領導可能由於自然災害和農業問題分散了注意力，9 月 12 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曾聯合發出了一個關於加強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生產領導和組織建設的指示。

不過，即便決議是在最後一分鐘的倉促情況下制定出來，彭德懷和劉少奇如果沒有同事們的支持也是不可能刪去有關毛澤東思想的內容的。實際上，似乎毛澤東本人也對此給予了批准。陳毅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說：

> 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劉少奇在他的報告中沒有提毛澤東思想，這種刪節被認為是劉少奇所犯下的一百多條罪狀中的一條。但這個報告是經毛主席和政治局批准的，而且我出席了那次會議。[11]

毛澤東實際上證實了陳毅的說法，在一次討論對於劉少奇報告的其他指控的談話中，毛澤東說：「我們看了這個報告，這是代表大會通過的；不能僅僅由這兩個人（劉少奇和鄧小平）負責。」[12]

似乎有足夠理由認為，把毛澤東思想從黨章中刪除，這樣一個非常正式和重要的改動，大概是在陳毅提到的那次會議上，經過毛澤東和政治局同意的。如果這個假定成立，那麼毛澤東和陳毅的陳述就意味著，劉少奇和鄧小平都不能因為在「八大」上作了令人不愉快的報告而被指責為想要降低毛澤東的威信。[13] 如果有人試圖在《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發表以後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持續進行的反對個人崇拜的鬥爭的大背景下來估價劉、鄧等人對毛澤東地位的態度，則需要尋找其它的論據。

劉少奇對毛澤東的態度

首要的論據是彭德懷的交待，這個交待顯示劉少奇希望看到毛澤東思想的地位下降。顯然，當彭德懷在文化大革命的頭一年作這個交待時，他很可能是在壓力下不得不指控當時受批判的同事們。但是有意思的是彭僅僅點了劉少奇的名卻沒有提鄧小平，雖然這兩個人在這時在這個問題上都受到了攻擊。這就清楚地表明，在那次關鍵的會上，在促成同意刪去毛澤東思想的問題上，劉少奇扮演了一個積極和重要的角色，而鄧小平卻不是這樣。劉少奇這時的行為與他年初時想要削弱毛澤東地位的嘗試是一致的。這還與「八大」會議上，劉少奇所作的講話中的一些評論相吻合，這些評論即便是在讚美毛時也聽起來有雙關意義。

劉少奇在一段關鍵性的話中，向自黨的「七大」以來入黨的黨員們——占黨員總數的90%——闡明，在1935年，中國共產黨怎樣以正確路線取代了錯誤路線。每一個「八大」代表都知道，正是在1935年1月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在政治局取得了領導地位。[14] 劉的大部分聽

眾無疑都已經讀過胡喬木在其中共簡史小冊子中關於遵義會議重要意義的評價：

> 在多數同志的覺悟和擁護之下，遵義會議撤換了「左」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領導職務，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從此以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就一直在這位傑出的、偉大的、完全可以信賴的領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領導之下，而這就使革命的勝利得到最重要的保證。[15]

在蘇共「二十大」的影響下，劉少奇沒有像這本小冊子那樣熱情洋溢地重複他在「七大」時對毛澤東進行的讚頌。[16]這是可以理解的。對於劉少奇來說，他提到自從遵義會議以來，中國共產黨「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領導下」，沒有犯過路線錯誤，這就足夠了。[17]代表們會把這看作是慎重地重新肯定了中央的正式立場，即在中共中央決議中寫道的，遵義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新的中央領導——這在中國黨的歷史上是一個最重要的歷史性變化」。[18]但劉少奇卻未能善始善終。當回答應如何解釋黨從錯誤路線轉到正確路線時，他駁回了那種簡單地認為黨只是更有經驗了的說法，說：

> 也不能僅僅用某個時期黨的領導者個人情況如何去解釋，因為大多數犯過錯誤的領導者在後來也為黨做了很好的工作。從我們黨的歷史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黨的經驗多少和黨的領導人選對於黨是否犯錯誤有重要的關係，但是關係更重要的，是各個時期廣大黨員首先是黨的高級幹部是否善於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總結鬥爭中的經驗，堅持真理，修正錯誤。[19]

這段話顯然對毛澤東地位的上升的重要性打了折扣，[20]而且的確可以被認為是違反了上述中央決議。劉少奇在這個報告中也沒有提到他曾在「七大」提出的「毛澤東道路」[21]是中國共產黨的正確路線的說法；因而沒有把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歸因於毛澤東。

劉少奇對毛澤東的大部分讚揚之詞，是在他談到集體領導和黨內民主時提到的：

> 大家知道，我們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所以在我們的革命事業中起了偉大的舵手作用，所以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不但是因為他善於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而且是因為他堅決地信任群眾的力量和智慧，倡導黨的工作中的群眾路線，堅持黨的民主原則和集體領導原則。[22]

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時，劉少奇曾著重強調毛澤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的能力，而沒有提到他對集體領導的尊重。[23] 這種強調重點的變化，完全可以歸因於要把毛澤東同斯大林區別開來。但從劉少奇對遵義會議的評論來看，敏感的毛澤東很可能把這段話看作是暗示：他願意與同事們商量是與他的正確思想一樣重要的。[24] 由於毛澤東曾在 1955 年越過他的同事們直接去證明他關於農業合作化的觀點是正確的，所以毛肯定不會欣賞這樣的暗示。

鄧小平對毛澤東的捍衛

劉少奇對毛澤東的作用所持的矛盾態度，在把他的評論和鄧小平的評論進行對比時顯得愈加突出。鄧小平在他關於新黨章的報告中沒有試圖去說明為什麼要刪去毛澤東思想這一提法。這顯然是個太敏感的問題，不宜公開討論。但他正視了個人崇拜問題並盡力去為毛澤東開脫。他用了兩種方式。首先，他指出，如《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所述，中國共產黨早在許多年前就已經採取措施，以保證集體領導。他全文引證了中共中央 1948 年 9 月制定的《關於健全黨委制》的決定。參加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人民大會的代表們無疑全都知道這個決定（就像《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引證 1943 年 6 月中共中央作出的《關於領導方法的決定》那樣）是由毛澤東本人親自起

草的。[25]鄧小平實際上在告訴大會代表，在中國沒有個人崇拜問題，而且採取了一系列步驟來預防這一點的正是毛澤東。[26]

鄧小平把毛澤東同斯大林加以區別的第二個方式，是宣稱「對於領袖的愛護——本質上是表現對於黨的利益、階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愛護，而不是對於個人的神化」。[27]這段話顯然是為對毛澤東的頌揚（對領袖的愛護）作辯護，並且把它與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個人的神化）區分開來。[28]鄧小平繼續透露，在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前不久，正是根據毛澤東本人的提議，中共中央曾作出決定，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禁止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業的名字。[29]

鄧小平並不滿足於對可能出現的批評毛澤東搞個人崇拜的指責作這樣有力的捍衛。他還多次在講話中正面提到毛澤東。在報告的開頭部分，鄧小平簡要地回顧了中共「七大」以來的歷史，他談到「黨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委員會的領導之下」[30]打敗了國民黨。相比之下，劉少奇在他的簡要的回顧中，僅指出:「在 1949 年，我們黨領導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31]等等。鄧小平在他的報告行將結束的一段中，說得更明確:「我們黨的勝利，也要歸功於黨的各級組織的領導者，特別是我們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32]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鑒於從新黨章中刪去了毛澤東思想的提法，鄧小平要求各級黨組織「要認真地加強對於廣大的新黨員的教育，切實地組織和指導他們進行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對於毛澤東同志著作的學習，對於黨的歷史和黨的政策的學習……」[33]這種提法與大約同一時間由劉少奇和彭真給宣傳部門發出的一個黨內指示的精神是一致的，這個指示要求宣傳部門不要再提毛澤東思想，只提毛澤東著作。[34]但在劉少奇的政治報告裏卻沒有如此地繼續重申毛澤東著作的重要性，在毛澤東著作中當然包含著毛澤東思想。這樣的一個遺漏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人們注意到了。

毛澤東的引退計劃

我們可以設想，毛澤東本人對於任何一個認為他是或可能成為另一個斯大林的暗示都是很敏感的。但如果認為他本人只關心他個人的威信，那是錯誤的。赫魯曉夫對斯大林錯誤的揭露，引起了毛澤東對改進無產階級專政的深深思索。在蘇共二十大召開後的幾個月內，毛澤東已經開始為中國指出新的方向。這也促使毛澤東考慮最高領導人的作用以及接班人問題。他自己的陳述表明，他決定退出眾人注目的中心，以便讓他的資深同事們不依靠他，建立起他們自己的獨立政治形象。

毛澤東這一計劃的關鍵是把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分成「一線」和「二線」(參見附錄三)。毛澤東將退居第二線，讓出一些職責和職權，這樣就能使常務委員會的其他成員增加他們自己的經驗及威信——這是為了保證在毛澤東去世後，他的位置將由一些有自信心、經常作出決策並負得起責任的人所接替，而不是像斯大林的接班人那樣出現麻煩。另外，劉少奇將接替毛澤東的官方職責。這樣，在黨的高層領導之間，不公開的[35]、非正式的和實際上是不合憲法的分工之後，是正式的、公開的權力移交。

幾乎可以肯定，1959 年 4 月，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會中已退居第二線了，大約在那時，劉少奇接替他成為國家主席。但是，有跡象表明，早在 1956 年 9 月中共「八大」之前，毛澤東就作出決定，逐漸地將權力移交給劉少奇和其他同事。

我們知道，早在 1957 年 2 月，毛澤東就準備好向黨外廣大群眾暗示他這一決定。他在論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中「把自己比作一個著名的劇中的主角，但他說，他現在太老了，不能再很好地演主角了；他暗示他可能很快就要退到配角地位」。[36] 這意味著，在早些時候，他已在黨內同他的高級同事們談了這一想法。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的某些方面顯示這個決定是在大會之前就作出了。

一個重大的跡像是，在 1956 年的新黨章中，規定了一個黨中央名譽主席的職位，而這個職位看起來是為毛澤東量身定做的的，如果毛澤東有一天移交了實權和辭去黨中央主席職務的話。在 1956 年，毛澤東可能已經設想了一個五年的過渡時期，在此期間，他將放棄他的權力和職務。如果是這樣的話，他的確完成了這一計劃的第一步，即在 1959 年 4 月將國家主席職務移交給劉少奇，並在政治局常委會中退到第二線。合乎邏輯的第二步將是在預期的 1961 年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上由黨中央主席改任黨中央名譽主席。但結果，第九次代表大會直到 1969 年才舉行，而毛澤東在 1969 年之前很久，就對他當初退居第二線的決定極為後悔。

改革的另一個跡像是在 1956 年的黨章中，規定要設立一個其性質與原來不同的書記處。原來的書記處一直由毛澤東擔任主席，其成員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這樣的成員表明，迄今為止，書記處不僅負責行政和組織工作，而且同時負責制定方針政策，甚至更注重後者。這一結論，從明確公佈的說法中得到了證實，即以書記處制定方針的職責將由新產生的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承擔[37]，而政治局常委會則由原來的書記處成員再加上鄧小平組成，鄧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擔任了新設立的總書記職務。新的書記處雖然很有權力，但僅有一個人——鄧小平進入制定政策的政治局常務委員會。

據鄧小平說，改組書記處是必要的，因為「由於黨和國家的工作的繁重，原有的中央機構已經不夠適應需要了」。[38]這是容易理解的，中共的黨員總數已從第七次代表大會時的 120 萬人增長到第八次代表大會時的 1070 萬人。[39]但毛澤東本人後來把新的書記處的組成同黨的最高領導層分為一線、二線聯繫起來。這表明，毛澤東也認為他所建議的新的書記處[40]是逐步使他本人在中國的領導層中不那麼重要的計劃的一部分；書記處有助於加強黨的組織並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獨立於黨的主席之外的機構。與之形成對照的是，斯大林曾經迫使黨的機構變成他個人意志的附屬品。

毛澤東在第八次代表大會時的意向的第三個跡像是前面已經提到過的事實，即劉少奇作了中共中央的政治報告。這個跡象表明，毛澤東在把他的接班人推到前台。

但即使第八次代表大會的這三個方面都被證明是毛澤東開始有計劃地、逐漸地從最高領導地位上退下來的信號，我們也仍不能確定，毛澤東本人會熱心於把他的思想從政治報告和新黨章中刪去。顯然，正如我們所看的，他接受了這個建議，而且這個建議也適合他少拋頭露面的計劃，但他本人沒有提出這個建議。特別是由於他正準備交出實權，他可能對刪去對其指導中國共產黨取得革命勝利的思想體系的頌詞懷有個人的不滿。毛的如果持有這一態度，就不難解釋為什麼他的支持者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把注意力集中在這一問題上。

毛澤東的地位問題在代表中引起混亂

從文化大革命中的論戰來看，顯然毛主義者認為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的權威受到了打擊。在某種意義上說，他們的看法是對的。當然，在代表大會以後，毛的位置沒有變動，他的聲望也沒有失去光澤。但從黨章中刪去有關他的思想的提法，劉少奇對他的雙重態度，甚至毛澤東本人希望逐漸隱退的良好意圖，這些事情混合在一起，擾亂了大會代表們對毛澤東地位的理解。如果他們當時希望根據對個人崇拜的抨擊，由中央提供一個對毛澤東應採取的明確態度，那他們是失望了。劉少奇和鄧小平的不同態度肯定使他們不安。

代表大會期間，代表們在私下裏曾聽過關於刪去毛澤東思想的問題的解釋。據稱劉少奇說過：

> 毛主席對全黨的領導是在（黨的）「七大」上確立的；現在，即使我們不談它（大概指毛澤東思想），每個人也都清楚。此外，一個人如果總是重複某些事想要人們經常聽到它，這實際上不會有任何效果。[41]

中共中央組織部代部長安子文說了類似的話：在 1945 年，必須盡力建立毛澤東的威望，但是現在「毛主席威信很高，沒有必要再去樹立他的威信了」[42]。這樣的解釋——可能是反映了政治局同意的路線——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是，它們是否能使一些閱歷更為豐富的代表們信服，是大有疑問的。從會上發言者對毛澤東的開幕詞所採取的態度中，可以看到出現了混亂。

除了這三個報告人自己——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幾乎所有在大會上發言的黨員都在他們各自講話的開頭表示贊成中央的這三個主要報告。從形式上看，可能沒有必要去表示對毛澤東的開幕詞的贊同，因為它並不是一個正式的黨中央報告，不過，還是有 35 位代表在他們的發言中表示贊成毛澤東那簡短的開幕詞，與此同時，有 53 位代表在發言時沒有這樣做。[43] 在當時的情形下，即便在發言中提及毛澤東純粹是一種形式，但也能明顯地反映出對主席的態度。那 53 位代表中有一位高級幹部，由於在會上的發言中沒有提到毛澤東，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到了特別的攻擊。[44] 根據這一事件，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八屆中央委員中，在代表大會上發言時曾提到毛澤東並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在中央工作的人，有半數以上仍然倖存於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第九屆中央委員會之中。[45] 相反，那些沒有提到毛澤東的中共八屆中央委員，只有三分之一多一點的人在文化大革命時保住了他們的位置。[46]

當焦距進一步縮小時，這裏的相互關係甚至更為有趣。文化大革命前，由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選出的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中，[47] 除了三個主要的報告人之外，有 12 個人曾在代表大會上發過言。他們當中有二人在文化大革命前已經去世，剩下的 10 人中，有四人——陳雲、陳毅、李富春和李先念在發言中表示贊同毛澤東的講話；這四人全都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上重新當選為中央委員，雖然僅有一人——李先念仍保留在政治局內。六個在發言中沒有提到毛澤東的講話的人中，有一人（彭德懷）在文化大革命前已經遭到清洗，有三人

（李井泉、烏蘭夫和薄一波）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清洗，其餘兩個「老資格」的人物（朱德、董必武）則作為政治局成員倖存下來。

這些並不意味著在 1966 年，贊成文化大革命的人僅僅因為這些黨的領導人在十年前怠慢了毛澤東，就想除掉他們。[48] 如果一個高級幹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那是由他多年以來在許多問題上的行為和態度所決定的，當然在對斯大林的抨擊開始以後他的行為也是政治收支平衡表上的一項。對於毛澤東來說，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可能就像一張石蕊試紙，使他的同事們顯出真實的顏色。在成功地領導了革命 21 年之後，毛澤東可能非常失望，因為對他本人持肯定態度的人被證明並不是那麼多。

第九章 關於自由化的爭論

對毛講話的反映

毛澤東最近的一些政策建議明顯地不受歡迎，這可能增加了他地位不穩固的因素。這種不受歡迎的程度，在分析他向大會作的簡短的開幕詞所得到的反應上能感覺得到。講話的主題是為了發展團結起來：「這次大會的任務是：總結從七次大會以來的經驗，團結全黨，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的中國而奮鬥。」[1] 這裏沒有提階級鬥爭。

毛的講話是會上唯一一個官方報刊標明了鼓掌的分貝值的講話，蘇聯新聞機構喜歡刊登這種鼓掌的熱烈程度。中國人可能想表明：儘管反對個人崇拜，他們的領導人仍然得到了他們的尊敬。但這個鼓掌的熱烈程度也清楚地表明[2] 毛的講話的不同部分是受到了什麼樣的歡迎。

有四類鼓掌，我隨意給它們訂了一個計分法：

全體起立，長時間的熱烈鼓掌	4分
長時間的熱烈鼓掌	3分
熱烈鼓掌	2分
鼓掌	1分

用鼓掌計分法把毛的講話初步分類如下：

論題	字數所佔篇幅的百分比	分數	占總分的百分比
套話	11.1	22	34.3
國際問題	45.7	33	51.5
國內問題	42.9	9	14.06

換句話說，毛的講話中國際和國內論題所佔篇幅大略相等，然而根據鼓掌的情況來看，國際部分要受歡迎得多，——這實在是中共在全國勝利後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一個令人吃驚的事實。

對毛講話中國內部分所作的分類，也有意思地說明了問題。

論題	字數所佔篇幅的百分比（國內部分）	分數	占總分的百分比（國內部分）
八大的任務	6.7	2	22.2
1945 年以來的成就	19.2	6	66.6
要從錯誤中吸取教訓	11	0	0
與非黨人士一起工作	29.7	0	0
要反對「三害」（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	33	1	11.1

從這個分類中得出的第一個結論是中國共產黨和常人一樣，願聽成績而不願聽錯誤。

但是，當考慮毛提出的重大政策建議時，可以得出一個更加深刻的結論。這些政策建議包含在最後兩項中。這裏的反「三害」和與非黨人士一起工作有密切聯繫。宗派主義的表現就是歧視外面的人，尤其是非黨人士；但主觀主義（盲目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官僚主義（不考慮可行性就下命令）也都與非黨人士問題有關。很顯然，一個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的黨員往往是自以為是、不易接受非黨人士的意見的，因而也就犯了宗派主義的錯誤。換言之，毛對國內事務所作評論的後兩部分實際是一個政策，即毛自年初以來所推行的統一戰線政策的兩個方面。中共要首先爭取在全國生產運動中得到非黨知識分子的合作，然後參照蘇共二十大精神，爭取在「互相監督」中與他們聯繫。但是，儘管他把論述國內事務篇幅的 62.7% 是放在統一戰線上，統一戰線的內容所得到的鼓掌只佔他講話中國內部分的 11.1%，沒有什麼能比這更清楚地表明黨員對統一戰線政策缺乏熱情，而這又使得貫徹統一戰線政策越發緊迫了。[3]

對毛講話國際部分的研究提供不了很多看法。總的來說，鼓掌與這些字數所佔的篇幅相一致，雖然代表們對毛的反帝的評論（字數篇

幅 8.7%，分數 15%）比對他關於世界形勢有利於和平的論述（文字 12.5%，分數 3%。）更為熱情。很有意思的是，鑒於他後來對蘇共和其他外國黨的譴責，他在這部分中用了一多半的文字強調俄國和其他國家共產黨的友好、支持、和榜樣作用的重要性，特別是在稱讚蘇聯上。關於二十大，他是這樣說的：「蘇聯共產黨在不久以前召開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又制定了許多正確的方針，批判了黨內存在的缺點。可以斷定，他們的工作，在今後將有極其偉大的發展。」[4] 在這樣一個公開和講究儀式的場合，毛沒對二十大某些方面的不明智表示懷疑是不奇怪的，但它使得人們感到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劉少奇和其他人在相似的場合說了相似的話是沒有根據的。[5]

對中共的監督問題

必須記住，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不僅譴責了對斯大林的神化，而且也暴露了由斯大林下令的大量的逮捕、放逐和處決。這樣就提出了共產黨與其統治下的人民關係問題。這個問題在 1956 年 10-11 月匈牙利事件後對中國說來變得更加密切相關了，雖然甚至在中共八大以前，波蘭波茲南 6 月 28-29 日的暴亂已經表明了東歐群眾對斯大林主義的普遍敵視。[6]

雖然在中國似乎沒有發生這樣嚴重的事情，但毛後來承認（在他 1957 年 2 月 27 日《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有過鬧事：

> 1956 年，在個別地方發生了少數工人學生罷工罷課的事件。這些人鬧事的直接原因，是有一些物質上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而這些要求，有些是應當和可能解決的，有些是不適當的和要求過高、一時還不能解決的。但是發生鬧事的更重要的因素，還是領導上的官僚主義……鬧事的另一個原因是對於工人、學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1956 年，還有少數合作社社員鬧社的事件，主要原因也是領導上的官僚主義和對於群眾缺乏教育。[7]

毛提到的罷工至少有一部分很可能發生在八大以前，即使不是這樣，到這時中共也肯定意識到需要消除不穩定的因素，或者（用中共的話來說）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矛盾。[8] 1956年6月，中央委員會命令黨的縣委書記以上的幹部學習整風文件。7月，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命令高級軍官同樣學習這五個文件。[9] 9月初，山東省開始貫徹中央委員會的指示。[10]

這些措施以及劉少奇、彭真這年夏天的活動表明，在高級領導層中間對於改進政治氣氛沒有明顯的分歧.所有的人都承認中共幹部已犯過而且還會犯錯誤，對這些錯誤應當糾正。但是，對於錯誤的原因的看法明顯不同，這種不同的看法對應該採取的補救措施有重要影響。劉少奇和鄧小平的講話使與會代表看到了兩種對立的觀點。二人的分歧主要在於對「三害」（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中哪個最嚴重的判定上。

劉強調奪取政權後幹部面臨的新的條件和新的任務以及隨之而來的主觀主義的危險。在討論了1949年以前黨在克服錯誤方面取得的成績之後，他指出這個歷史經驗表明：

> 克服思想認識上的主觀主義，是保證黨的工作順利發展，避免重大錯誤的根本關鍵。主觀主義的錯誤在目前我們許多幹部的思想上和工作中仍然嚴重地存在著，使我們的工作受到許多不應有的損失。我們現在面對著新的條件和新的任務，我們必須解決許多比過去更為複雜的和不熟悉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不努力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覺悟水平，不努力學習新的知識，鑽研新的業務，而滿足於對勝利的一片讚揚，主觀主義的錯誤就必然會發展起來。（著重點為作者所加）

劉也指出大批新黨員還沒有受到足夠的馬列主義的鍛煉，容易受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影響。[11]

鄧小平則不是強調黨的新的任務，而是強調黨的新的地位和由此而來的官僚主義危險。

> 執政黨的地位，使我們黨面臨著新的考驗。過去7年，一般說來，我們黨經受了這種考驗……。但是，7年的經驗同樣告訴我們，執政黨的地位，很容易使我們的同志沾染上官僚主義的習氣。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的危險，對於黨的組織和黨員來說，不是比過去減少而是比過去增加了。而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的結果，必然發展主觀主義，即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錯誤，這種錯誤在我們黨內也不是比前幾年減少而是比前幾年增加了。[12]（著重點為作者所加）

在中共的分析中，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三害」如此密切相連，以致人們可能設想這只是強調的重點不同而已。但是事實上，重點不同導致了政策制定上的特別重要的不同。

劉強調主觀主義，認為反對它的辦法是進行「系統的努力來提高我們黨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13]這主要意味著更加緊張的理論學習。他也強調實地調查研究對於糾正黨的幹部的「驕傲自滿」的重要性。[14]這個錯誤很明顯是官僚主義的反映，但劉在敘述黨員的錯誤時從沒提到這個詞。

然而，鄧對改變局勢的辦法卻不同，這與他選擇官僚主義而不是主觀主義為「三害」中最危險的一害是一致的。

> 為此，黨除了應該加強對於黨員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還在於從各方面加強黨的領導作風，並且從國家制度和黨的制度上作出適當的規定，以便對於黨的組織和黨員實行嚴格的監督。我們需要實行黨的內部的監督，也需要來自人民群眾和黨外人士對於我們黨的組織和黨員的監督。[15]（著重點為作者所加）

劉和鄧的政策建議的關鍵性區別在於批評應當來自何處。劉強調黨組織和黨員自己學習和改正缺點的重要性。對於他來說，勝利的保證是重新強調集體領導和擴大黨內民主生活。[16]鄧則是從另一方面強調監督特別是黨外監督的必要性。

而且，這些差異不僅僅是一件事情的兩個不同方面。劉還把黨的幹部的驕傲自滿與某些政府官員的驕傲自滿進行比較。就後者來說，劉把官僚主義作為其主要錯誤並詳細論述了在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中應當怎樣加強對政府機關的監督。然而，劉沒提到黨的幹部的官僚主義和提出對他們的監督。而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鄧特別指出不論是政府還是黨的幹部都需要監督。

這種不同在劉討論毛在《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中首次闡明的中共和民主黨派之間需要「長期合作，互相監督」的政策時，更加著重地體現了。乍看起來，似乎只要在討論這個政策時持贊成態度，就意味著接受黨外人士監督共產黨的原則。但是對劉來說，似乎並不是這樣。他是在國家政治生活部分而不是在黨的領導部分中討論這個政策的。他在說了共產黨員是應當「善於從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監督和批評中得到幫助」之後，立即接著指出這些民主人士在國家機關中佔據著重要職位。然後他又進而討論了改進這些機關的各種辦法。很清楚，劉贊同監督的不是以黨員身份而是以國家官員身份出現的黨員。或者以另外的方式說，劉願意看到民主人士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批評周政府中恰好是中共黨員的官員的錯誤[17]。的確，在隨後幾個月的時間裏，劉和彭真制訂了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設立八個常設委員會（在地方上均有分會）的計劃。這些常設委員會將組成監督政府工作的全國最高監督系統[18]。但劉對民主人士批評黨的專職幹部一點也沒表示贊同[19]。而正是這樣的願望，促使毛在 9 個月後發動了整風運動。

劉少奇的觀點反映在大會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中。這個決議——很可能是彭真起草的，因為劉的報告中關於國家政治生活部分是他負責的——強調對國家機關監督的重要性，包括「更積極地鼓勵人民群眾和國家機關中的下級人員批評和監督國家機關」的方法（著重點為作者所加）。[20] 但是，在承認黨員也可能滑向官僚主義的同時（和劉不同），決議只說黨的領導機關必須「善於向人民群眾學習、善於傾聽

人民群眾的批評和建議」[21]（著重點為作者所加）。很清楚，在黨的體系中，不像在國家體系中，官員有權保持主動性。毛和鄧使中共幹部受非黨人士批評和監督的努力受到了挫折。

加強群眾路線

毛在政治決議中關於監督問題上所受的挫折由於在新黨章中規定加強「群眾路線」作用而部分地得到了補償。毫無疑問，對1945年黨章所作的這個特別顯著的擴展是出於對黨的官僚主義的憂慮。鄧小平在關於新黨章的報告中指出：

> 由於我們黨現在已經是在全國執政的黨，脫離群眾的危險，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脫離群眾對於人民可能產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因此，目前在全黨認真地宣傳和貫徹執行群眾路線，也就有特別重大的意義。[22]

鄧也明確加強「群眾路線」與對實行黨外監督問題有著密切聯繫。

> 在貫徹執行群眾路線、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中，密切同黨外人士的合作，廣泛地吸收黨外人士參加這一鬥爭……這些黨外的民主人士能夠對於我們黨提供一種單靠黨員所不容易提供的監督，能夠發現我們工作中的一些我們沒有發現的錯誤和缺點，能夠對於我們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幫助。[23]

什麼是群眾路線？按照鄧的說法，它有兩個方面，即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在他們自己解放自己時給他們指導的責任——人們可以稱之為「無私服務」方面；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人們可以稱之為「領導方法」方面[24]。鄧引用毛1943年起草的中央《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的決定[25]，把這種方法解釋為將群眾的各種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然後又回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自己的意見[26]。

鄧說明沒有正確的「領導方法」，「無私服務」是無效的：

實踐證明，許多人並非主觀上沒有為人民服務的願望，但是他們仍然把工作做壞了，使群眾受到重大的損失。這是因為他們自以為是先進分子，是領導者，比群眾懂得多，因而遇事不向群眾學習，因此他們出的主意，經常在群眾中行不通。[27]

鄧在他的講話中用了很大篇幅講群眾路線。他指出七大以後新黨員大量湧入，1945 年以來多年的鬥爭又使得群眾路線具有更加豐富、更加深刻的內容。他以這兩個理由來論證他的長篇解釋是必要的[28]。第一個理由無可爭辯，但第二個理由看來是在掩飾新黨章中群眾路線的「無私服務」和「領導方法」兩個方面強調重點的重大變化。這個變化反映出以毛、鄧為一方和以劉少奇為另一方的不同觀點。

劉少奇在「七大」關於新黨章的講話中，也以大量篇幅論述了群眾路線，但他更著重於「無私服務」方面。他指出，為了徹底貫徹群眾路線，某些「群眾觀點」必須被灌輸到每個黨員的腦子裏[29]。這些觀點有四個：一切為了人民群眾；向人民群眾完全負責；相信群眾能自己解放自己；向群眾學習。只有第四條與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方面有關。[30]

在劉少奇為之作過起草報告的 1945 年的黨章中，沒有用「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來描述領導方法。在論述與人民關係的總綱中，——這裏面沒有出現「群眾路線」這個詞[31]——絕大部分是講「無私服務」方面的。領導方法只是簡短地被提到，而且只是在說明教育群眾是和向他們學習一樣重要時提到的：「每一個黨員必須下決心向人民群眾學習，同時要不斷地用革命精神教育他們以喚起和提高他們的覺悟。」[32]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 1956 年黨章中詳細論述「群眾路線」的段落。像鄧小平強調的那樣[33]，這一段已經大大地被擴大了。它開始是討論「領導方法」，只是後來用與 1945 年黨章相似的措詞講到「無私服務」的重要性。而且「領導方法」被說成是中共勝利的關鍵。

黨的領導能否保持正確，決定於黨能否在分析和研究之後系統地總結群眾的經驗和意見，變成黨的意見，然後又回到群眾中去宣傳推廣，化為群眾的意見。[34]

是什麼促使1945年和1956年的黨章對群眾路線有不同的觀點呢？為什麼毛1943年提出的，劉1945年報告中又準確論述了的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方面沒有寫進1945年的黨章？回答似乎是二人對先進政黨作用的看法的根本不同。對劉來說，重點是黨員應當無私地致力於人民的事業，這種純潔的獻身是它能正確地代表人民行動的最好保證。對毛來說，光有獻身是不夠的，特別是當黨掌握了政權的時候。他要求不斷地向正確思想的源泉——人民群眾學習。認為這是正確行為的最可靠的保證。劉的態度有點精英統治論的味道，毛則有點民粹主義的味道。

這些對立的態度說明了兩人在對監督中共問題上的不同看法，劉顯然感到一個無私的黨的精英們應該置於外部監督之上；黨員可能犯錯誤，但是最好的糾正這些錯誤的方法是通過像學習馬列主義這樣的黨內措施；對於毛來說，監督卻是深入群眾的另一種方法。

還有一個問題，為什麼鄧小平在他主持制定的黨章中如此強調地重申毛的群眾路線的觀點？[35]他的地位本來應當使他像劉少奇一樣成為先進政黨的捍衛者。這個問題將在後面關於八大選舉新的領導的一章中談到。

毛對政治決議不滿意

文革期間，劉少奇在一份交待材料中透露毛對八大通過的政治決議中的某些句子不滿意，但「沒時間來修改，因而被這樣通過了……」。[36]劉談到的句子在下面這段中（不滿的句子打了著重號）：

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這就表明，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上結束，社會主

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

但是，我國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的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37]

劉沒具體說出毛反對的是哪些句子，但不可能是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看法。毛在八大自己的講話中就說，在上一次代表大會以來的11年中，中共「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又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決定性的勝利」。[38] 在1957年10月第三次全會的講話中，毛又重申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的論述。但他指出，「基本」不等於「完全」。政權問題已經解決，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但這些問題在政治上、經濟上都沒有完全解決。所以他否認現在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雖然這樣說是符合蘇聯正統理論的。[39]

斯大林在1936年關於蘇聯憲法草案的講話中提出，社會主義的勝利意味著剝削階級的消滅和階級結構的變化。[40]

這些變化說明什麼呢？第一，這些變化說明，工人階級和農民之間以及這兩個階級和知識分子之間的界線正在消除，而從前的階級特殊性也在消失。……第二，這些變化說明，這些社會集團間的經濟矛盾在縮小，在消失。最後，這些變化說明，這些社會集團間的政治矛盾在縮小，也在消失。[41]

問題是斯大林主義者的正統不是毛主義者的正統。不到六個月前，在《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中，中國人重申社會主義社會仍有矛盾，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這個基本矛盾始終存在。[42] 換句

話說，即使在社會主義社會裏，生產關係、上層建築中的缺點仍能阻礙經濟基礎的鞏固和生產力的發展。在毛所批評的政治決議的那段話中，卻作了相反的論述：落後的經濟基礎阻礙了先進的社會制度。

毛的不滿不是由於愛好教條地吹毛求疵引起的。兩個提法的不同有重要的政策含義，政治決議明確指出中共現在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經濟，政治結構不需要作進一步的改正。這反過來暗示中共不需要整風，毛完全不同意這種觀點。他在那篇關於矛盾問題的講話中指出：

> 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已經建立起來，它是和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但是，它又還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產力的發展又是相矛盾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存在，國家機構中某些官僚主義作風的存在，國家制度中某些環節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相矛盾的。[43]（著重點為作者所加）

正是這些矛盾的存在——特別是領導和被領導之間的矛盾[44]——為毛要求中共進行整風提供了理論依據。既然到八大時已有跡象表明毛已在考慮用開展全黨整風運動的形式來防止中共走斯大林的道路，那麼在一種相反的理論寫進像政治決議這樣重要的文件時他感到惱火是可以理解的。[45]

可以想像（雖然說這並不）政治決議中這段令人討厭的段落是理論幼稚的產物。毛畢竟在 10 個月前在他的序言中就把生產問題放到了最重要的地位。他在八大開幕詞中重申了它，甚至在他關於矛盾問題的講話中又指出：「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係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46]（著重點為作者所加）

但是他沒有在任何場合說過基本矛盾已改變了，只是說它的性質已從對抗性變為非對抗性。雖然在八大時，毛還沒有詳細闡述他的非對抗性矛盾的理論，但《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為毛主義的基本觀點提供了清楚的準則。

周恩來 1973 年 8 月在中共十大報告中把八大政治決議中的那段令毛討厭的段落歸咎於劉和陳伯達。假如王光美的話是可信的，即劉只是匆匆瀏覽了一下決議，那麼他所負的責任純粹是形式上的，雖然他無疑也會歡迎上層建築不要進一步改革的理論提法。假如陳伯達實際上對此負有責任，那它有助於說明毛在決議公佈之前不堅持審查決議。但是，一個在理論上和個人關係上這樣接近毛的人怎能犯這樣的錯誤呢？肯定不是出於惡意，因為顯然在其後多年陳還得到了毛的信任。我們只能設想，受過莫斯科培養的陳在這個重要場合感到有責任來描繪中國正在沿著蘇聯革命的道路走下去。

不管誰對此負有責任，很清楚，在這兩個重要方面——即不強調對黨的官員的監督和與毛關於國內基本矛盾觀點的否認，政治決議似乎打算阻止毛關於中共整風的任何要求。還是一個匈牙利的暴動促成了黨的主席能夠在這個問題貫徹其意圖。

第十章 第二個五年計劃

發展速度問題

毛澤東在八大遭受的第二個挫折是在經濟政策領域裏，「躍進」式的發展被堅決拒絕了。這是周恩來和他的內閣成員在夏季成功地反對冒進的必然結果。周恩來在會上作的關於二五計劃的報告，在速度問題上的唯一妥協是作了不冷不熱的承諾，即「速度」應是「積極的」。周的報告充滿了溫和的，甚至謹慎的精神，這是吸取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教訓的結果。按照周的說法，一共吸取了四個方面的主要教訓：

> 第一，應該根據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規定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把計劃放在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基礎上，以保證國民經濟比較均衡地發展。……應該把長期計劃的指標定得比較可能，而由年度計劃加以調整。[1]（著重點為作者所加）

周指出，1955 年的基本建設計劃由於前兩年農業歉收而縮減過多，因而導致鋼材、木材、水泥的過剩。由於沒有儲備規劃，鋼材、水泥的剩餘被出口，這就導致 1956 年這些材料的短缺。1956 年的建設規模由於 1955 年農業豐收「定得過大」，而且急於求成，搞得各個經濟部門很緊張。[2]今後必須一方面警惕急躁冒進，[3]另方面警惕裹足不前。[4]急躁冒進放在裹足不前之前當然不是偶然的。周概括他的觀點說：

> 我們應當對客觀情況作全面的分析，同時盡可能地把本年度和下年度的主要指標作統一的安排，以便使每個年度都能互相銜接和比較均衡地向前發展。[5]（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周在論述從經驗中得來的第二個教訓時，再次批評了冒進：重要的是使重點建設和全面安排相結合，以使國民經濟各部門能夠按比例

地發展，有些部門和地方想要「到處鋪開，百廢俱興，不顧條件，盲目冒進」，從而犯了錯誤[6]。這影響了國家的重點建設，造成了財政上的困難和人力、物力的浪費。他舊事重提地強調了被擱置在一邊的十二年農業發展綱要的有害後果：

> 1956 年到 1967 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公佈以後，又一次發生了這樣的偏向。有些部門和有些地方，急於求成，企圖把在七年或者 12 年內才能夠做完的事情，在三年、五年甚到一年、二年內做完。[7]

周以 1956 年上半年的一個例子來批評另一傾向——過分強調某些重要工作，以致於損害了其它工作。他引證這年初對雙輪雙鏵犁和鍋駝機的過高指標為例，雖然指標一再修改降低，但仍然太高。結果導致其它工程鋼鐵缺少。[8]

第三，周強調增加後備力量，健全儲備制度的重要性，在國民經濟發展中，不平衡的現象是經常會出現的，這樣保持必要的儲備對於補救平衡是必不可少的。[9]

最後，周認為雖然必須首先考慮經濟發展，但正確的財政計劃也是重要的。在這裏他似乎是給毛和陳雲年初的爭論作定論。雖然他企圖調和這兩種對立的觀點，但他明顯是倒向陳雲一邊的。

> 同志們常常喜歡爭論應該不應該有「財政框框」的問題。我們的意見是，不考慮經濟發展的需要，主觀地定出一個「財政框框」來限制經濟的發展，這當然是錯誤的，應該反對這樣的「財政框框」，但是，如果財政計劃符合於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體現著積累和消費之間、重點建設和全面安排之間的正確關係，那末這樣的財政計劃，無疑地應該嚴格執行，決不能夠當作「財政框框」盲目反對[10]。（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周恩來有計劃制定者們支持他。副總理李富春同樣穩重，他說計劃制定者的基本職責是：

多瞭解些情況，看法要客觀和全面，研究事物的內在聯繫，掌握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全面完成我們綜合平衡和全面安排的工作。[11]（著重點為作者所加）

新任國家經委主任薄一波在發表關於投資和消費兩者關係的個人意見時[12]，支持他的同事。他提出了一個他認為適當的二者的比例，這個比例將使經濟發展低於1956年的速度。[13]

很清楚，毛澤東這時必須承認這個形勢。在他唯一的涉及經濟發展速度的開幕詞中，他講要「一步步地把中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國家[14]。劉少奇政治報告中經濟部分也反映了取得勝利的計劃制定者們的觀點。但他對周恩來的觀點作了意義重大的修改，這表明劉少奇同毛澤東一樣，不滿意計劃制定者們提出的速度。

對十二年農業發展綱要，周恩來除了轉彎抹角地說了那一次以外，只談到一次。在透露第二個五年計劃中農業的主要指標後，他指出，它們的提出是建立在以下考慮的基礎上的：

一方面，除了個別的地區以外，農業將會完成高級形式的合作化，這樣我們就能夠進一步按照《1956-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的規定，廣泛地採取各種增產的措施和推廣各種增產的經驗。同時，灌溉面積和耕地面積將會有所擴大，化學肥料的供應將會有所增加，生產工具和耕作技術將會有所進步，這些，都將促進農業生產的進一步發展。[15]

總之，周把綱要看成了一個列人了各種可以提高產量的技術手段的文件。然而他接著警告，難以避免的自然災害，懇荒的艱難，以及低水平的農業機械化程度，「又使我們對農業生產的發展，不能要求有更高的速度」。[16]

但劉少奇仍然認為十二年綱要是一個直接明確產量目標的文件。[17]他指出：

為了適應整個國民經濟的需要，第二個五年計劃應當按照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所指出的方向，

把農業提到更高的水平。在 1962 年，要求生產糧食 5000 億斤左右……[18]

換句話說，劉少奇認為計劃指標應被視為完成十二年綱要規定產量的努力的一部分。言外之意是，雖然綱要可能已被擱置，但他，想必還有毛澤東，也應該還有別的領導人並不願意將它徹底埋葬。

此外，周恩來和劉少奇在提法上的分歧也發生在對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進程和第二個五年計劃的規劃的表述上。對第一個五年計劃，兩人都認為已取得「巨大的」成功。[19] 但劉少奇與周恩來不同，沒有立即強調挫折。

周說：「我們的成功是巨大的，但在我們的工作中，還有一些不足和缺點，我們必須堅決改正。」[20]

劉說：「我們已經取得了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巨大勝利，甚至我們的敵人都不能否認它……」。[21]

周的提法強調需要避免由於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而過於自滿，言外之意是：起草第二個五年計劃必須謹慎從事。劉少奇的提法不那麼小心翼翼，暗示同志們不要成為懷疑論者。

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周恩來提出的，並寫在草案中的是：計劃必須「是積極的和穩妥可靠的」[22]，它規劃的發展速度是「比較高」的[23]。另一方面，劉少奇不溫不火地把發展的速度說成是「積極和穩妥可靠的」，但他在前面的一個段落裏則把計劃規定的發展速度說成是「巨大的和迅速的」。[24] 在劉少奇的提法與計劃制定者不同的背後，看來還存在著他對規劃的發展速度太慢的批評，以及對他所喜歡看到那一種增長（巨大的和迅速的）的暗示。周的看法是，計劃既是合理的，又是有雄心的。

周和劉在對十二年發展綱要，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評價以及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描述上的每一個分歧，如果孤立地看，可能僅僅只有細微的差別，但綜合起來看，並聯繫已知的對 1956 年冒進和 1958 年大躍進的爭論，它很可能意味著劉正在表露他對計劃制定者們在 1956 年夏天

放慢發展速度的不滿[25]。換句話說，劉少奇似乎在經濟發展速度問題上是和毛澤東站在一起的，雖然他和毛澤東一樣，在這個階段不得不接受了周恩來和計劃制定者們的聯合建議[26]。

各省關於 1956 年冒進的報告

周恩來和計劃制定者們當時如果沒有大量的證據使毛澤東和劉少奇確信他們是對的，就不可能在結束 1956 年冒進的問題上獲勝。計劃制定者們的根據從各省黨委書記們在黨代表大會上的報告透露了出來。這些報告詳述了經濟冒進的影響。

受 1956 年整個生產高潮、特別是十二年農業發展綱要影響的最明顯的例子、可能是福建省委第一書記葉飛舉出來的。他指出，制定計劃時，有層層盲目地提高糧食增產指標的情況。當時在省裏糧食增產指標定為 16%，到了區鄉普遍提高到 40% 左右。[27]代替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出席會議的譚啟龍指出，由於他們省在 1953 年犯了右傾保守的錯誤，1956 年省裏領導要求農業增長幅度過高和過快，因而導致了非常大的浪費和損失。增長產量的運動使基層幹部依靠命令主義。[28]依據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的說法，他所在省的一些幹部感到，合作化以後「社員的小辮子抓在我們手裏，今後的事情好辦了」。他們不想去和群眾一起商量事情，生怕捲入各類矛盾觀點的漩渦中。「百姓百條心」是他們的習慣用語[29]。

江渭清舉了急躁冒進的例子。生產計劃訂得過高，耕作制度改革要求過急，推廣雙輪雙鏵犁，掃除文盲等項工作，不從群眾的實際需要與可能出發。領導機關把太多的責任壓到合作社身上，使得幹部們只能求助於命令主義。在一個村裏，這些做法已引起了一起自殺事件，這樣一來引起了全省對方法的討論，結果是拋棄了亂戴帽子和濫扣工分的做法[30]。

在湖南，幹部的合作化熱情也急劇地高漲起來。按周小舟第一書記的說法，一些幹部認為，既然合作社是一種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組

織，那麼，「一切都要公有化」才行，甚至如織草鞋和捕蝦等零星的家庭副業經營都統一歸集體經營，社員的時間被非常嚴格地控制和完全由集體支配，以至他們中有一些人抱怨，入了社一點自由也沒有了。[31]

在河北，第一書記林鐵在報告中說，領導被生產高潮所鼓舞，企圖很快地實現穀物自給自足，計劃把糧食產量比過去提高 36.39%，這導致了掘井太快，而後，很多井被證明是廢品；不恰當的密植在玉米生產中已產生不良後果；另外還在不適當的地區種植了種種高產作物。[32]

陝西是個非常典型的例子，高指標的制定，使幹部們忽視社員的健康和休息，一些幹部甚至要社員「把月亮當電燈，把黑夜當白天」。按第一書記張德生的說法，合作化戰役勝利以後，幹部中滋長了盲目樂觀和急躁情緒，過高估計農民的熱情，他們認為「只要想得到，便能做得到」。[33]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山東譚啟龍這樣的共產黨領導人，在指出過分熱情的危險性時，也感到必須在他同級面前作較高的產量估計。直到 9 月 29 日，他還在預告，1956 年穀物生產要增長 11%、棉花生產要增長 19%，而後來的情況證明，真正增長率只有 8.8% 和 3%。[34]

但其他省的書記們就已經吸取了教訓。陝西張德生說：「我們認為：越是勝利就越需要謙虛謹慎，就越需要發揚民主，群眾的勞動積極性越高，就越需要十分愛護和正確地發揚他們的勞動積極性。」張還批評了輕視農民經驗的幹部。[35] 河北的林鐵感到，應從省內那種過分熱情的生產高潮中總結四個教訓，人們不能在主觀願望的基礎上過高估計客觀情況，當然人們也不應犯保守主義的錯誤。冒進的計劃如同右傾保守主義一樣，同樣影響農民增產的熱情。上級的計劃必須同下級結合，並允許下級留有迴旋的餘地。技術改造應是逐步前進，不能一步求成，先進的經驗必須在推廣前與當時的經驗相結合[36]。

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對1956年「冒進」不良後果的討論可能是最全面的了。這些批評中有一些已被引證過。周的建議有：凡是不適合集體管理的全部回到個體經營；對社員自留土地要適當放寬一些；要改善勞動管理，使每個都有機動的餘地；合理使用勞動力，避免工作負擔增加太大；對婦女和體弱的社員尤其要注意照顧；指標要因地因時制宜，充分考慮農村自然條件和習慣的差異。[37]

第一書記們注意到的1956年生產熱潮中的一個主要缺點是過分注重了糧食或經濟作物的種植。周小舟把它稱之為「簡單化的傾向」，而它已經嚴重影響了一部分農民的收入。在湖南，糧食緊張兩年後，農民因食品而產生的憂慮使這種傾向增長了。周舉了一個合作社的例子，他們的收入主要依賴苧麻生產，但那裏勞力和肥料都被集中於糧食生產上，導致苧麻減產了20%。周說這種例子是很多的，並強調了其重要性。他指出，在湖南山區，農民收入的40%-50%是靠經濟作物和副業生產取得的，在省內別的地方，這種比例也高達30%。[38]

在福建，按第一書記葉飛的說法，勞動、土地、肥料和資金都集中到增加糧食生產上去了，為完成糧食增產指標，對經濟作物和副業生產進行了限制。一些地區甚至宣傳這樣的口號「種什麼吃什麼，種糧吃糧，燒磚吃磚」批評想搞副業是「資本主義思想」。結果果樹、茶樹砍掉去種地瓜，把磚窯平掉種糧食，福建的「建蓮」蓮田被改為稻田。因為忽視了山區情況，某些特產的產量還沒恢復到戰前的水平。農村副業減產的情況在1956年上半年特別突出。生豬產量比1955年同期下降了20%，磚瓦減產了27%，雞、鴨、蛋產量也下降了。

對農民收入的影響在一些地方達到這樣的程度（在福建，糧食收入佔全部農業收入的48%，經濟作物占28%，副業生產占24%）：合作社農民沒有零花錢，買黃煙都要向合作社借錢。副食品和燃料價格的自然上漲又影響了城市人民生活。葉飛引用了一些農民的牢騷：「去年是有錢買不到糧，今年是有糧沒有錢買。」[39]

在四川，合作化引起了生豬以及中藥原料等地方特產產量下降。但在討論副業生產倒退時，李井泉還責備了商業政策。不合理的價格，商業管理按照行政區劃進行，對小販活動的限制，打亂了商品過去的自然流通路線。[40]

但有一個領導人，山東的譚啟龍，則為他的省沒能集中力量抓糧食生產而憂慮。他指出，山東每年每人消費 180 公斤糧食是低於全國水平的。他強調，增產糧食是山東黨組織面臨的重大任務之一[41]。

各省對中央的經濟要求

由各省黨的書記們提供的有關經濟問題的證據支持了計劃制定者們反對冒進的做法，但它並不意味著這些書記們都從中央經濟當局的行動中得到了完全滿足。他們的講話中，很多都是要求關心他們省的建設問題的，看來書記們都已很清楚地知道，隨著周恩來提出第二個五年計劃，這是地方公開地向國家要資源來滿足地方要求的適宜時機和場合。

一個重要的理由是需要更多的錢興修水利。譚啟龍在論述了增加單位產量以解決山東糧食問題以後（1955 年山東糧食畝產量為 241 斤），接著就強調水庫和肥料的重要性。他說，省裏能夠發動群眾去改進灌溉，但在同時，我們「希望中央水利部門對治理以上幾條主要河流有關省與省間的統盤規劃以及在技術、投資等問題上給我們以支援」。[42] 楊尚奎，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提出相同的要求，請求中央撥款修建水庫。[43] 當林鐵在總結河北的海河問題時說：「我們迫切希望、也深信會得到中央的大力支持……」。[44] 黑龍江省有特別的理由強調治水問題，因為年初松花江氾濫的災害剛剛過去。由於第一書記歐陽欽集中談了黨的領導問題，另一個書記強曉初代表該省提出，他的省在災後，已擬定了一個建設 11 個大小水庫的計劃，其中四個應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內完成，他總結說：

為了作好根治松花江的工作，我們建議在國家計劃委員會領導下，組織有關部門和有關省、區共同研究，全面規劃，並設立專門機構從事此項工作。[45]

中央要求山東省大量生產棉花、油料作物和煙葉，這引起了山東糧食生產的不景氣。譚啟龍為自己省說話：

我們認為，目前不宜過多過猛地擴大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而應積極從提高單位面積產量著手……，因此，希望中央有關部門在規定種植計劃時，不要限制過死，使我們能夠根據國家需要與當地的具體情況，進行合理的安排。[46]

一些書記對幫助的要求則更為全面。海南區委第一書記張雲在代表大會上說，每個人都同意開發島上資源的必要性。他繼續說：

不過問題還在於開發的時間，也就是大規模開發，遲些好，還是早些好。根據我們的看法，是早些開發的好。因為，很多特種經濟作物，都是多年生的植物……因此，我們要求中央把大規模開發海南島農業資源列入第二個五年計劃。[47]

楊尚奎以感情和實際需要為理由，呼籲幫助江西。他指出，佔全省2/3面積的老根據地和佔全省1700萬人口一半以上的老根據地人口，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曾橫遭蹂躪，他們經常感到勞動力不足。他指出全省人口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下降了1/4，單被屠殺的就達100萬人。因而，江西鰥夫、寡婦、孤兒和孤老在人口中的比例很高。總的說來，他們的生活水平相當低，在老根據地的首府瑞金，一年的實際收入僅有42元。烈、軍屬和鰥寡孤獨以前「依靠國家的救濟維持生活，在實現了高級合作化以後，應該主要從發展生產方面來解決他們的困難。但是出現了一個新問題，就是五保戶太多，社員背不起來。因此這類地方在今後一個較長的時期內，仍然需要國家給予必要的救濟補助」。楊承認，國家對江西已給予了特殊的照顧，但他提出，江西某些負擔雖然減輕了，但另外一些負擔又加重了。自1951年以來，江西的公糧負擔每年都超過全國的平均負擔率，「總的說來，老根據地群眾的負擔

是重了一些，以致引起了某些群眾的不滿，並影響了他們生產積極性的發揮」。[48]

楊尚奎以及別的邊遠和交通不便省份的共產黨負責人，如四川的李井泉[49]，福建的葉飛一起，要求中央重新考慮價格政策，要求對交通不便地區的人民降低物價，以及提高對他們產品的收購價。

葉飛在考慮第二個五年計劃時，試圖將一些已列入規劃的工業發展項目爭取到福建去。他指出，1949 年以前，福建現代工業還不到全部工農業生產總值的 1%，全省甚至沒有一個像樣的工廠，福州造紙廠就算是唯一的現代工業了。1949 年以後，雖然發展了一些小型的榨油、制糖、鋸木和食品加工業，現代工業的比重已經發展到 11.32%，但福建相當多的木材、煤、鐵、水和漁業等資源相對來說還沒有開發出來。由於本地工業基礎薄弱，地方發展工業的能力受到了限制，需要國家大力的支援。一些年來，中央有關各部已關心這些問題，但仍嫌不夠，基本建設計劃和財政預算上控制得太嚴太死，強調消極限制而沒有給予積極的指導。他舉了南平造紙廠的例子，由於對設計文件反覆的審核，建廠規模經歷了八次重大的改變，廠址已經遷移了三次，前後為時六年，直到 1955 年第四季度才正式施工。現在如果古田水利發電站第一期工程（現在還不能滿足福州和南平地區用電的需要）不能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完工，那麼計劃中的福建工業計劃也將不能實現。

> 為此，我們要求中央有關工業部門，對福建應採取支持落後地區的辦法給予幫助，能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內在福建辦幾個大型輕工業，完成古田第一期水力發電站的建設工程，以便逐步地改變福建的經濟落後面貌。[50]

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與葉飛不同，他主要從自己的優勢而不是從弱勢出發要求發展工業。雖然他也指出：「我們覺得，作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首都，北京不僅應該是政治中心和文化科學的中心，同時，也應該建設成為一個有相當的近代工業的城市。」劉列舉了

北京的優勢，樣子就像美國南部城市的市長想要吸引北部的工業家那樣。他指出，在首都有中國科學院，有中央各部的許多研究和設計機構，一些新的科技研究部門的建立將使更多的專家進入北京。除此之外，在各類高等院校中還有約 10 萬名在校學生和教師，充分發揮首都科學技術力量，必定會大大地有利於提高國家工業技術的水平和加快工業發展速度。「我們認為，北京可以著重建設一部分精密機器和儀器工業」。劉仁指出，這些工廠可以在研究部門的幫助下，迅速掌握新技術和不斷地進行技術改革，而後者也能從理論聯繫實際中得到好處。劉還說，北京在附近的資源方面，在工業基礎、交通運輸方面，在氣候、地質等自然條件方面，也都有比較適宜的條件。如果劉在發言之初不曾詳細說明首都面臨的困難問題，劉的論據可能會更有力些。北京自 1949 年以來，人口比原來增長了 90%，另外政府部門無法下決心去決定工廠廠址和進行有關項目的互相協調。但他企圖反駁建立更多的工廠會增加首都服務業緊張的意見。他說，如果想控制北京的人口，那就必須靠有計劃的工業佈局，而不是靠限制工業人口的增長。[51]

讀了這些省委書記們在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人們對地方對中央當局無力很快地滿足他們的要求而感到的不耐煩，有一種深刻的印象。當然這不是中國特有的一種現象，甚至也不是一些嚴重缺乏自然資源，使得分配問題格外嚴重的發展中國家所特有的現象。但在像中國這樣大的一個國家中，這些問題會因行政系統的規模大和辦事低效率而更為複雜。

正是由於毛澤東認識到了這個問題，他才在當年早些時候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中提出了分權的要求。在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劉少奇迫切要求分權[52]。周恩來透露，已提出了一個關於改進國家行政體制的決議草案，現正在傳閱，徵求意見。[53]但直到大躍進大大地削弱了計劃制定者的權力，各省書記們放手大幹時，分權才真正地實行了。

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問題

可能是為挽救毛澤東的面子，當年早些時候計劃制定者們贏得的一個勝利在代表大會上被沖淡了。這就是沿海和內地工業發展的問題。李富春在他向代表的報告中談及國家計委的錯誤時，僅承認：「對沿海工業的充分、合理的利用注意得不夠」，[54] 這也是年初他在全國人大的一次會上所最多願意承認的。劉少奇輕描淡寫地提及這個問題，僅宣佈「現在必須把注意力放在沿海與內地工業的協調上」，[55] 周恩來也強調需要合理使用沿海工業，並在這個講話中給合理性作了限定：

> 改建那些有必要也有可能改建的企業；而不是改建一切的原有企業；在工業企業已經比較多的城市，一般地應該少建新的企業；新建和改建的企業，必須注意到原料來源、產品銷售、生產技術和運輸方便等條件，並且注意同其他地區的合理分工。[56]

周的提法很聰明，它沒有主張在沿海城市新建項目。實際上，從他提出必須考慮的諸因素來看，他是指沿海地區（例如已有許多工業企業的上海）不是新建企業最理想的地方。不過，他也沒有排除在這裏新建企業的可能性。

從在代表大會上通過的有關計劃的決議的提法看，周可能僅僅是挽回了毛澤東的面子而沒有改變政策。決議指出：「但是在內地進行大規模工業建設的同時，還必須積極地、充分地利用並且適當地發展沿海各地原有的工業……」[57]（著重號為作者所加）。很清楚，「發展」既指擴建又指新建。《人民日報》7 月 8 日的社論指出，應該進行一些擴建。由於使用了「原有工業」這個詞，決議的制定者表明他們僅考慮擴建，雖然這裏仍有一些模糊不清的地方，但這可能只是為了給毛留面子。如果毛澤東成功使得他的同事接受他關於在沿海地區搞新建項目的話，幾乎可以肯定，周和決議會更詳細說明那個觀點，李富春

的自我批評中，也肯定會批評自己沒有推進新建項目，而不僅僅是沒有充分利用沿海原有的企業。[58]

國防費用

如果說毛澤東在沿海工業問題上是失敗了的話，那麼他在論十大關係講話中提到的另一個問題上則取得了勝利。毛澤東關於減少軍費的意見，得到了計劃制定者們的擁護。在第八次黨代表大會上，周恩來總理提出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軍政費用從預算支出的 32% 減少到 20%。[59] 正如毛澤東所要求的那樣，國防的位置看來肯定比經濟建設要低。計劃內五項主要任務中的第五項是，「在增加工農業生產的基礎上加強國防和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60]（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削減軍費的背景是對國際形勢的持續樂觀態度。陳毅元帥在代表大會上作了關於外交政策的主要講話（陳在 1958 年成為外交部長）他指出：「世界上爭取和維護和平的力量不斷地發展壯大，執行侵略和戰爭政策的國際反動勢力處於日益削弱和孤立的地位。」[61] 他承認，美國「侵略集團」決不會自動放棄他們進行戰爭和侵略的陰謀，但他沒因此作出必須進一步加強中國國防的結論，僅僅說必須保持警惕，聯合愛好和平的人民和國家作出更大的努力。[62] 陳毅在另外的場合論及中美過去七年的關係時指出，中國人民非常清楚地知道，「只有堅決反抗侵略，才能保衛和平」。但同樣他並沒有繼續說這意味著必須加強國防。[63]

在會上發言的惟一另一名元帥（除去國防部長彭德懷）是國家副主席朱德。他支持陳毅的分析。美國正暴露自己是全世界人民的敵人，並正日益走向孤立。

> 這些情況就使得國際緊張局勢有了緩和，當然，我們不能喪失對於戰爭危險的警惕性，但是，只要我們社會主義各國和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繼續加強團結，並且為維護

> 世界和平和人類正義事業而繼續進行堅定的鬥爭，那麼，目前已經出現的國際形勢的緩和，就有可能轉變為持久的和平。[64]

那兩位曾在 1955 年全國人大的會議上支持過彭德懷的元帥（他們在黨的八大後被提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沒有在大會上發言。彭德懷在大會上幾乎是在荒野中獨自呼籲，他以人們熟悉的帝國主義可能背信棄義等為理由，要求大力加強國防：

> 為著保證實現我軍戰略防禦的方針，抵抗帝國主義可能的突然襲擊，幾年來我軍在國防前線和縱深戰略要點進行了現代的國防工程建設。如果帝國主義侵略集團一天不肯放棄侵略計劃，我們的國防工程就要不斷地加強和改進。我們堅信，這種國防工程與掌握現代武器的人民軍隊相結合，任何敵人對我國發動的侵略，都不可能達到他們幻想的目的。[65]

彭在黨減少國防開支的決議面前，不能提出要求更多的經費。但很清楚，如果中國人民解放軍要放棄游擊作戰而使用陣地和現代武器來保衛國家，那麼在有把握可以抵抗美國人侵以前，更多的投資是必要的。毫不奇怪，彭德懷對國防支出和國家建設的關係的看法與計劃制定者們的看法有些不同，後者認為國防是有賴於建設的。彭德懷則說：

> 我國人民需要一個持久和平的環境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也需要一支現代化的革命軍隊，應付可能突然發生的事變，保衛社會主義建設。我們的責任就在於把這兩方面的需要恰當地統一起來。因而我們既要抓緊軍隊的現代化建設，又要在軍隊的建設中適應國家經濟建設的要求，盡量節約，反對在軍事建設上的浪費。[66]

彭在講話裏認為，軍隊的現代化應放在經濟發展之前，而不是依賴於經濟建設。

彭的講話幾乎是孤掌難鳴，但也並不完全如此。劉少奇在政治報告中談到國際形勢時所作的分析類似於陳毅，可能陳的講話和劉報告

中的國際問題部分都是由周恩來的外交部起草的。[67] 關於台灣問題，劉和陳都譴責美國干涉中國的內部事務，但重申中國願意在外長級進行和平談判。[68] 陳和劉在這時都沒說美國在台灣駐軍是對大陸安全的威脅。但劉在由彭真起草的「國家政治生活」的段落中談到了台灣問題，在這一段話裏，劉的確把美國駐兵台灣說成是對中國最嚴重的威脅。就在這個論斷之前，劉還談到了人民解放軍，而他的語氣與彭德懷相似而與陳毅不同：

> 進一步說，為了保衛我們國家，我們必須繼續加強國防，我們必須繼續加強我們的國防軍——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國人民解放軍必須努力提高自己的戰鬥力，以達到一個更高的水平，警惕地保衛我們的邊疆和沿海，保衛我們的領土完整。[69]

劉少奇講話的用詞看來是經過謹慎選擇的，暗示他同情彭德懷對削減防務經費的不滿以及對和平共處的懷疑[70]，而又不偏離黨的正式路線。把劉加強防務的要求和美軍駐台是嚴重威脅的說法並列在一起，代表們很容易看出其因果聯繫。但劉少奇自己沒提到這種聯繫。重要的是，雖然劉少奇在談到要加強防務問題時的語氣與彭德懷類似，但他沒提「現代武器」，即尖端常規武器的問題。實際上，兩個月以後，他已在支持毛澤東關於核武器相對重要的觀點。同年 11 月 16 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增設第三機械工業部，這一被人們認為是負責核計劃的政府部門。[71]劉少奇懷疑常規武器的重要性：

> 我們現在已有了相當的國防工業，但它們是否有用是可以懷疑的，我們已經製造了許多飛機和大炮，花了許多經費，作了大量努力，但如將來它們絲毫無用，那我們今天是否在犯錯誤？[72]

劉被說成是表現了對核武器的盲目信任，但既然引不出任何劉的話來支持這種說法，我們可以假設，他可能只是重複毛澤東在他《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中支持核武器的論述。總而言之，劉少奇在防禦

政策上是同意正式的毛澤東路線的，但是看起來他想對彭德懷表示同情，也許是出於對彭要求從黨章中刪去毛澤東思想這一提法的感謝。

第十一章 新的中央領導人

八大會議的重要任務之一，是選舉新的中央領導人。自從七大以來，黨員從 120 萬增至八大的 1070 萬，因此，新的中央委員會最明顯的特點就是規模大就毫不奇怪了。它由 97 名正式中央委員（七大是 44 名）和 73 名候補中央委員（七大是 33 名）組成。新的中央委員會在代表大會之後立即舉行了第一次全會，選舉了新的中央政治局。

1945 年政治局的確切組成從未披露過，自從那時以來又有新的成員被選入。然而到八大召開時，當時的 13 名成員還是眾所周知。八大後政治局擴大到 17 名正式委員和 6 名候補委員。[1]

新的政治局反映了某些主要政治現實，即人民解放軍在中國革命中的重大作用和當時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在 1955 年任命的 10 名元帥中，有三名在七大時已經是政治局成員，[2] 四名在八大後召開的新的中央委員會的第一次全會上被增補進中央政治局，[3] 這意味著四個野戰軍的所有指揮員現在都成了黨的最高機構的正式成員。[4] 二名老資格的負責經濟計劃的官員在七大時已是政治局的成員，[5] 這次代表大會之後又有三名進入了政治局，二名是正式委員，一名是候補委員。[6]

這樣的黨的機構並沒有大量增加其政治局成員，僅僅增加了一名候補委員。[7] 這也許是由於七大政治局已經基本上包含了那些被主要認為是黨的官員中的大部分，雖然他們還兼有其它職務。不管怎樣，八大後的政治局看起來是想在黨、政府和人民解放軍之間保持一個大致的平衡。（參見附錄六）在這個平衡之下，人們從它的每個成員的位置高低上可以發現這是當時政治趨勢的一種反映。

鄧小平的上升

最引人注目的是，鄧小平從上屆政治局的最後一名上升到這屆政治局的第六名。他還在新設立的六人政治局常委會中被給予了一席之地。從這時開始這個常委會是黨的最高決策機構。但是鄧小平的提升，其具有最重要意義的也許是他的頭銜從秘書長變為總書記。

在毛澤東上升以前，總書記一職一直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的最高職位。當毛澤東在 1935 年 1 月遵義會議上戰勝了他的對手時，他似乎還沒有足夠的力量來獲得總書記的職位。這個位置由張聞天擔任，[8] 毛澤東不得不滿足於取代周恩來而成為黨的軍事委員會主席。[9] 據一份材料說，張聞天的位置是在 1937 年的晚些時候，共產國際因懷疑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期間與托洛茨基分子有聯繫之後受到削弱的。共產國際宣佈張聞天不應該再繼續擔任總書記。[10] 據說毛澤東也就利用此機會廢除了總書記這個職位。書記處從此開始向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而不是總書記——負責。[11]

不管這個過程是怎樣進行的，下面這兩件事情看來是確鑿無疑的：在遵義，那時被認為是黨內最重要職位的「總書記」被毛澤東的一個潛在的對手擔任了；而在隨後幾年的某個時候，這個位置消失了。即使毛澤東還不是黨的主席，但是那時，在組織上就再也沒有任何位置能夠控制他了。

到八大時，毛澤東從中央委員會主席的位置上對全黨的領導比 20 世紀 30 年代末期時強大了不知多少。但是，如果恢復了總書記職位，並把它交給一個像劉少奇那樣老資格的人來擔任，這裏顯然仍存在著潛在的危險，任職者可能成為和黨的主席一樣重要的人物。雖然，這時毛澤東意識到有必要建立起他的同僚的獨立地位，但在他這時或以後的行為中，沒有任何跡象表示他希望樹立對手。他的設計似乎是在他逐漸隱退時，劉少奇會繼他之後走上高位的。

這樣，由於毛對總書記職位的不愉快回憶，可以肯定處在這個重新設置的位置上的人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就必然要比繼承人低，一個不

可能向毛澤東挑戰的人。問題於是提出來了——為什麼在 1954 年選鄧小平為秘書長，[12] 並在兩年之後升上總書記的位置？更自然的候選人本來應是彭真。彭當時已是政治局成員之一，並且在黨的組織工作中更有經驗，[13] 關於彭真的問題下面將要更充分地討論，這裏我只集中論述毛為什麼可能更對鄧懷有好感。

鄧小平於 1904 年出生於四川，這個省產生的第七屆和第八屆中央委員人數在全國僅次於湖南（毛和劉少奇出生的省）。鄧是 20 世紀 20 年代一群為數不少的赴法勤工儉學的中國青年中的一員。從這群人中間——包括周恩來、李富春和陳毅——誕生了社會主義青年團，鄧參加了這個組織。他負責出版團的刊物的技術工作。他的工作效率很高，結果得了「油印博士」的綽號。在法國的六年期間（1920-1925 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之後又在莫斯科呆了幾個月。在返回中國後，他在全國各地為黨工作，最後於 1930 年最終進入毛的江西根據地。鄧參加了 1934-1935 年的長征，並在 30 年代末期擔任了劉伯承部隊的政治委員，在整個抗日戰爭和後來的國內戰爭期間，他一直和劉伯承在一起，參加了對於戰勝國民黨具有重要意義的淮海戰役。劉的第二野戰軍最終接管了中國的西南，鄧成為了以他的家鄉為基地的西南局黨委第一書記。在 1952 年年中，鄧調到北京出任副總理。從 1949 年中央人民政府原任命了四名副總理，直至 1954 年根據新憲法重新調整政府，鄧小平是這段期間內唯一被增補者[14]。1953 年 9 月鄧代替薄一波而擔任了財政部長，但九個月之後，即在被任命為秘書長不久後他離開了這一職位。以秘書長的身份，他在 1955 年 3 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會議上作關於清除高崗和饒漱石出黨的報告。在接著召開的中央全會上，他（和林彪）被選入政治局。[15]

鄧的能力看來是毫無疑問的。他性格果斷精幹。有一次，一個欽佩他的省級領導幹部說他「真聰明」，解決大的問題往往只用幾個字。[16] 這個特點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陳伯達攻擊為沒有恰當的調查就武斷決定。[17] 一個美國人伊萬斯·卡爾遜在延安時期曾會見過鄧，他把

鄧描繪為「矮胖結實，思維敏捷。一天下午，我們就整個國際政治領域的問題在一起交談，他的消息靈通使我感到吃驚」[18]。甚至陳伯達也不得不承認鄧給人的印象像是一部百科全書一樣。[19] 有趣的是，在鄧當了總書記之後，那些在西方觀察家中已經傳播的關於鄧小平的看法十年之後大部分被陳伯達所證實。英國劇場指揮邁克爾·克拉福特在1956年11月會見了鄧小平，他得出了和卡爾遜相似的看法。克拉福特說鄧是一個矮小、堅定、口才極好的人，他的個子即使按照中國人的標準來說也是矮的，人們估計他是60歲，但他看起來要年輕20歲。[20]

克拉福特報道說：「雖然據說他好爭論，並且他有些傲慢的性格使得他在同事中間不太受歡迎，但西方觀察家認為，他的影響現在已經甚至超過了周恩來。」[21]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陳伯達指責「鄧小平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他自己的主張，他想讓總理聽他的。和鄧小平討論問題真和登天一樣難」[22]。

顯然，鄧是一個強有力的人，但是在勝利了的中國共產黨中有許多強有力的人，值得考慮的是，鄧小平為什麼能夠在50年代中期如此突然和如此絕對地超過他的同時代人。

鄧在30年代中期曾和毛有過密切的聯繫。他那時是少數真正可以算是在毛的私人小圈子裏的人之一——他們是哪些人，研究那個時期的作者們的意見是一致的。他們中間包括毛的兄弟毛澤覃，古柏（這二人在共產黨勝利的時候已經去世了），林彪，譚震林，陳正人，鄧子恢和鄧小平。[23] 1933年，當毛的戰略思想被他的反對者在與「羅明路線」作鬥爭的幌子下批判時，鄧小平和毛澤覃一起，也遭到了批判。[24] 鄧小平和毛的兄弟關係是如此密切，以至於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想盡辦法來把他倆說成毫無關係。[25] 但是周恩來證實了他們的密切聯繫，並且證明了鄧小平在這個時期的卓越功績。[26]

我們已經看到，當毛的親信之一鄧子恢在合作化問題上與他意見相悖時，毛轉過來求助於另外二人——另一個江西同事陳正人和在延安時期跟隨了他的陳伯達。在下面我們將看到譚震林被提拔主管1958

年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彭德懷在1959年對毛的批評被擊退後，他的國防部長職位被毛的另一個密友林彪代替了。而當文化大革命發生時，它的主要受惠者是林彪、陳伯達和毛的妻子江青。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說毛永遠不會和他所最信任的合作者鬧翻。從1955年的鄧子恢到1971年的林彪，許多這樣的人，包括鄧小平，都被打倒在一邊。但是儘管毛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也在於他願意既往不咎，並能和各種各樣的人一道工作，包括從前的敵人，但上面的事實證明，他像其他許多國家的領導人一樣，還是喜歡讓經過長期考驗的同事來擔任特別重要的責任。

因此，下面這種假設看起來是合乎情理的，即那時任命鄧小平擔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這一具有很大潛在力量的職位與鄧小平和毛澤東過去的老交情很有關係。這個假設可以解釋其它許多事情——為什麼鄧小平在八大上對毛澤東的評價比劉少奇對毛的評價高得多？為什麼在1957年，是劉和彭真，而不是鄧小平，在毛的批評面前為黨的幹部辯護？為什麼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對鄧的批評主要是個人方面的，即對他個人的反叛，【27】而對劉少奇的批評卻是一個同僚犯錯誤；為什麼鄧小平被官方指責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第二號當權派（劉是第一號的），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的攻擊不僅比劉少奇少得多，而且甚至比級別更低的人也少得多？【28】這也有助於解釋為什麼鄧小平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受害者中第一個被平反的。

假設毛確實對鄧的提升有責任，還是沒有證據表明毛此舉是在接班人問題上保留了另一張牌。【29】但是至少鄧小平也許會把這個黨機器領導的位置看成是一個爭取更高職位的機會。肯定的是，新聞界出版的黨的重要會議的照片似乎是為了強調甚至誇大鄧的位置。【30】還有一點也值得注意：從1954年鄧任秘書長到八大召開時為止的兩年零三個月期間，全國有15個省委的高層領導作了明顯的變動。可以作為對照的是從1956年八大召開後到50年代末期的三年零三個月中只有五個省委有變動，而在60年代開始直到文化大革命發動時的隨後六年中有

13 個省委發生了變動。[31] 鄧肯定明白，他所得到的黨組織事實上是劉少奇和彭真，以及他們的親密同僚，已被打倒的饒漱石[32]和安子文[33]的；也許他希望建立新的忠於他自己的關係網。然而，在 1956 年九月他還沒有強大到安排中央委員會成員的地步。第八屆中央委員的名單看來是彭真和安子文準備的，據說他們是偏袒劉少奇的追隨者的。[34]

還值得注意的是，在八大上鄧小平批評了劉少奇和他的同事主持的吸收黨員的工作。劉沒有批評吸收政策，而強調了「絕大多數黨員在偉大的革命鬥爭中經受了鍛煉」，即使是在 1949 年後被吸收入黨的黨員也同樣如此。[35] 他僅僅承認大多數新黨員還沒有獲得足夠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36] 鄧承認大多數黨員是在完備的手續下被接收的，也承認在群眾革命鬥爭中吸收的黨員的質量是有保證的。然而他激烈批評了吸收方法，認為在「許多場合」造成了錯誤。[37] 他繼續指出：

> 在全國解放前後的兩年內，黨的組織發展過分迅速，而在有些地區，這種發展幾乎是沒有領導、沒有計劃的，甚至有些地區，在群眾還沒有發動的條件下，就忙於大量徵收黨員，建立支部，因而使黨的組織一度產生了嚴重不純的現象。[38]

這段時間中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彭真（在安子文的協助和劉少奇的指導下）在管理組織工作。

鄧還批評了黨的機構一度沒有看到從產業工人中吸收新黨員的重要性。[39]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曾披露出，毛在 1950 年 6 月即已指示吸收更多的產業工人入黨，而劉少奇和安子文卻有違毛的這個目標。[40] 鄧在他的八大報告裏對這件事的批評為此事（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提出）的真實性提供了依據，也支持了鄧是毛任命的這一假設。[41]

彭真遭受挫折

彭真是在八大後作為書記處中鄧小平之下的第二號人物出現的，顯然，這是擁有極大權力的職位。不過他本來可以有理由期望得到更

多的東西。大概鄧小平在 1954 年被任命為秘書長後，彭就失去了出任總書記職位的希望。但是他還可能被任命為副總書記，據劉少奇（這點是可以理解的）和鄧（這點不那麼可靠）認為他應被授予那個頭銜。[42]彭之後被指對毛主席懷有不滿情緒，因為他在八大時沒有進入政治局常委。[43]

但是彭不僅沒有實現這些目標，它的位置反而下降了。在 1955 年的秋天，他從政治局的第 11 號位上（緊靠於兩個新成員林彪和鄧小平之上）升到第七位（僅在五個大人物之下——毛、劉、周、朱德和陳雲，康生是第六）。在 1956 年初的一個短時間內，他被排在康生之上，居第六位。[44]在八大主席團名單上——這個名單與八大前政治局人選一樣，——他仍然是在第七位上，但是在八大的政治局中他下降到第十位，以前比他地位低的鄧小平和林彪上升到了他之上，黨的兩個老資格人物劉伯承、董必武恢復了在他之上的地位。為什麼顯然完全有希望進入政治局常委會的彭降了下來？（他又為什麼沒有在代表大會上講話？[45]他肯定不是在忙著運行這次代表大會，因為他既不是秘書處成員，也不是大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委員。）

有可能彭的下降是對他之前一年看起來過於積極地想爬上去的態度的懲罰。[46]可以想像他是由於與林彪的持續十年之久的爭執而遭受此挫折的。[47]據說，彭和安子文在八大上試圖以林彪不活躍為理由而把他排除出中央的領導。[48]更有可能的是，彭因為他起草的劉少奇報告中的政治決議不盡如人意而遭受了批評。另一個因素也許是毛和鄧想通過在書記處總書記和他的主要副手之間建立一個地位上的明顯的差距，來鞏固鄧新取得的位置。

再進一步的可能是毛生氣了，因為彭過於希望毛退居二線。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人們引證彭在 1956 年 8 月舉行的北京市第二次黨代表大會上的講話：總有一天老演員應該退出舞台。[49]這非常可能是影射毛的；但是鑒於幾個月以後，毛也使用了同樣的比喻，彭也許僅僅是要他的官員做好毛隱退的思想準備。

但即使彭真沒有在八大之前向毛放冷箭，還是又證據顯示他對於沒有進入政治局常委而感到不平。有人引用了彭真在八大閉幕後不到一個月的一次講話：「主席的話不是絕對的最後結論……。」[50] 然而在這裏，記住這一點是重要的，即 1956 年的氣氛不是 1966 年的氣氛，1966 年時，主席的每一個字都成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彭的評論可能是毛批准的一個運動的一部分，而這個運動的目的就是想使中共逐漸減少對他的創始人物的依賴。

毫無疑問的是劉少奇在彭受打擊的事件中也收到了牽連。劉和彭二人在一起工作，密切配合已有 20 年了，在文化大革命的爭論中也總是彭而不是鄧小平被人說成是劉的集團中的主要追隨者的頭目。一則評論說：「劉少奇和彭真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每次他出國前，總要通過電話和彭談話，或派人找彭來商議，或者他自己親自乘車去彭的家中。」如果讓劉來決定，他肯定會選擇彭真作為總書記的人選。[51] 而鄧小平卻是一個與毛有關係的人。他的任命，將導致重要的政治後果，尤其是在 1957 年，也一直持續到文化大革命。簡短地說，它的意義在於，從此以後劉少奇無法期望在之後與毛或者其他高級領導人發生爭執的時候獲得整個黨組織的支持了。

彭德懷、康生和張聞天的降級

另外三位八大前的政治局成員的地位遭受了比彭真更嚴重的打擊。在當時最具有最重大政治意義的是國防部長彭德懷蒙受的打擊。林彪元帥提升得比他高得多，這證實了 1954 年 9 月在政府任命副總理的名單中林彪的地位比彭德懷高的印象：也就是說，有人（可能是毛）認為公開建立這個印象是重要的，儘管林彪看起來並不活躍，但是他的地位比彭德懷高。

但是擔任政治局委員應該有 11 年，也許是 21 年[52] 的彭德懷遭受到了更大的羞辱。三名政治局新成員都高居於他之上。其中兩名是元帥——羅榮桓和陳毅，他們像林彪一樣，都曾經是他的部下。第三名

是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考慮到1955-1956年關於國防費用的爭論，這一任命的意義是更大的。這些變動的直接結果是破壞了彭德懷作為國家軍隊中第二號人物（僅在朱德之後）的地位，並且突出強調了經濟發展比國防更重要。

彭德懷遭受的挫折可能不僅是因為他與毛、周和李富春關於國防費用的意見不一致，而且由於是他建議從黨章上刪掉「毛澤東思想」——雖然毛不可能把這一點公開化。公開的、更正當的理由也許是彭在指揮朝鮮戰爭中所犯的錯誤。另一個個人方面的原因也許是毛把自己兒子的死亡歸咎於彭[53]。彭德懷似乎確信他和毛的關係在他從朝鮮返回後已經變壞了。據說，他在1953年之後的某個時候曾說：

> 我老了，失去了主席的喜愛，我對主席再不重要了。年輕的人已經上來，我不能擋住他們的路。我已經推翻了蔣介石和帝國主義，已經實現了我畢生的願望。我可以解甲歸田了。如果我不受喜歡，那就隨便吧。[54]

「年輕的」，彭大概指的是林彪，1954年底到1955年初，林彪在政府和黨組織內提升很快。同樣，林的提升部分地也許是由於毛不滿意彭的結果。特別是如果像後來所指控的那樣，彭在1953年與高崗有所接觸。[55]彭與毛另一個意見分歧之點可能是，彭強調在現代化武器方面中國需要依靠蘇聯的援助。[56]不管這種種原因怎樣，很清楚的是，彭德懷這顆星是從第八次代表大會開始殞落的。對自己地位下降的不滿也許是彭德懷在大躍進之後對毛的政策的攻擊的一個原因。[57]

儘管受到挫折，彭德懷仍能夠以黨在國防方面的首席發言人的身份在大會上發言。他畢竟不只是國防部長，而且負責中央軍委的工作。[58]但是受到更嚴厲的降職處分的康生和張聞天則沒有在大會上發言。這兩件事肯定是相關的[59]。康生降為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原因不詳。自共產黨執政以來，他顯然扮演的是沒有以前重要的角色。不過導致他降職的直接原因可能是由於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之後在共產黨陣營中普遍掀起的對秘密警察的反感。[60]文化大革命期間，康生以毛

主義的一個最重要的忠誠者的面目出現，這一事實說明，他和陳伯達一樣，同主席有長期的私人關係。如果的確如此，那麼很可能在八大上毛已經盡力使康生不致受到更大的屈辱了。毛與康生之間究竟有什麼緊密關係是難以弄清的。可能性之一是作為中央社會部（黨的保衛部門）首腦的康生，在 40 年代初整風運動期間向毛提供了藉以鑒別幹部忠實程度的材料。在同「留學生」（康生的同學）中像王明那樣的對手的鬥爭裏，康生作為一個從蘇聯回來的留學生，對毛也許極其有用。

至於張聞天降為〔政治局〕候補委員，沒有明顯的直接原因。不過儘管張聞天曾一度（1935 年在遵義會議上）[61]對毛有用，卻也一直是毛的對手，而且大概從未取得主席的充分信任。實際上，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地位誇大了張聞天的實際權力和影響。他雖然是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卻未獲准向代表大會作的外交政策報告。當 1958 年初周恩來放棄外長職務時，繼任的是陳毅，而不是張聞天。有可能張聞天在政治局被保留下來，只是由於承認他在遵義曾幫助過毛的歷史作用。也許張聞天會覺得他應當受到更好的待遇，尤其是在外交部被陳毅超過後。若確是如此，那麼在 1959 年批評大躍進的時候，他和彭德懷一樣，可能也部分地是出於個人的不滿。[62]

附錄二：擁護文化大革命的人對鄧小平報告的攻擊

如上所述，我確信，鄧小平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是真心捍衛毛，而且讚譽毛的。因此，考察一下文化大革命中對與此相反的說法，尤其是那些鄧本人似乎證明了這些說法的交待，可能是有意思的。

鄧在交待裏說，他從黨章裏刪掉了「毛澤東思想」一詞。[1]從他負責起草委員會這個意義上說這也許是實話，但就我們所知，沒有任何事實可以證明，鄧在這件事上不是在貫徹毛和政治局的指示。

鄧還從報告裏找出三條引文，說明他是怎樣讚許蘇共對個人崇拜的攻擊的。事實上，正如下面的對比表明的那樣，他的言論並沒有超出《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的評價，而大家知道，後者是經毛認可的。

鄧：「關於堅持集體領導原則和反對個人崇拜的重要意義，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作了有力的闡明，這些闡明不僅對於蘇聯共產黨，而且對於全世界其他各國共產黨，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2]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國共產黨慶祝蘇聯共產黨在反對個人崇拜這一個有歷史意義的鬥爭中所得到的重大成就……我們也還必須從蘇聯共產黨反對個人崇拜的鬥爭中吸取教訓，繼續展開反對教條主義的鬥爭。」[3]

鄧：「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一個重要的功績，就是告訴我們，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麼嚴重的惡果。」[4]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二十次代表大會非常尖銳地揭露了個人崇拜的流行，這種現象曾經在一個長時間內的蘇聯生活中，造成了許多工作上的錯誤和不良的後果。蘇聯共產黨對於自己有過的錯誤所進行的這一個勇敢的自我批評，表現了黨內生活的高度原則性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生命力。」[5]

鄧：「當然，個人崇拜是一種有長遠歷史的社會現象，這種現象，也不會不在我們黨的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6]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國共產黨過去在革命隊伍中曾經不斷地反對脫離群眾的個人突出和個人英雄主義。毫無疑義，脫離群眾的個人突出和個人英雄主義這一類現象還是會長期存在的。一次克服了，下次還會再出現。」[7]

這些引自鄧小平報告中被認為是指摘性的話，其原來的上下文和摘自《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相應引文的上下文一樣，顯然是想表明，在中國有個人崇拜，但是發生在下層領導人之中，正是毛本人一貫同它作鬥爭。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儘管鄧在交待中用了上述引文，但他既不想分析自己的「罪責」，也不坦白其動機。他只簡單地承認曾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說過這些話，就好像他知道別人指責他的是什麼，於是便羅列成大段引文來使交待能過關。[8] 有意思的是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談到鄧的報告所說的話。他只是說，報告反映了赫魯曉夫對個人崇拜的反對態度（這是實話，算不上是譴責），而沒有打算確定鄧的個人責任。[9]

擁護文化大革命的人們不僅列舉鄧關於個人崇拜的言論來攻擊他，還覺得有必要貶低他肯定毛的那些話。一份「批判」材料絕口不提鄧提倡學習毛的著作，卻只說他「基本不提『毛澤東思想』」[10]。同一材料表現出，為了給鄧的報告抹黑，歪曲是多麼地必不可缺少。它說，鄧「有四次極為勉強地提到毛主席，但卻三次宣揚和讚美劉少奇」。[11] 事實上，鄧七次提到毛（包括提到他的著作），而且是像上面所說那樣，以肯定的、有時是高度頌揚的字眼提到的。另一方面，鄧提到劉時所用的卻不是像人們所說的那種頌揚的語言。

鄧第一次提到劉是這樣講的：「關於這個時期黨的工作的各個方面和黨在目前的任務，劉少奇同志已經作了詳細的報告。」[12] 這次提

到劉少奇，是要說明鄧的報告的主題與劉涉及的範圍有何不同。在稍後，鄧說：「關於〔新黨章的〕總綱的政治部分，在大家聽了劉少奇同志的報告以後，我以為可以不再作什麼說明了。」[13]同樣，這又只是在避免重複。鄧提到劉少奇，只有一次可算作是對他的頌揚。話是這樣的：「毛澤東同志在第七次大會所作的政治報告中關於黨的作風的部分，劉少奇同志在第七次大會所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關於黨章的總綱部分，對於群眾路線都作了精闢的解釋。」[14]這段文字對毛和劉的讚美是相同的，要說這頭半句是「極為勉強」地講出來的，後半句才有「宣揚和讚美」的意圖，這要有怎樣精準的分辨力才看得出來啊！

擁護文化大革命的人們在企圖證明，鄧的報告是反毛的，所遇到的困難還可以由其公然改寫報告的行為來說明。據說鄧的報告的開頭是：

> 毛澤東同志領導全國人民從 1945 年起，只是在三年多一點的時間裏，打敗了蔣介石几百萬軍隊。……從 1953 年起，是劉少奇同志在黨的工作和任務方面提出了重要的指示。[15]（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這段話實際上是這樣的：

> 從我們黨在 1945 年 4 月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已經過去 11 年多的時間了。在這個期間，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黨都已經經歷了巨大的變化。在這個期間，黨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委員會的領導之下，團結了全國人民，在不過三年多一點的時間裏，打敗了蔣介石的 800 萬軍隊，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 1953 年起，黨和人民政府又開始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建設，並且在社會主義改造方面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所有這些一個接一個的光輝的勝利，無可爭辯地證明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所規定的組織路線和七大以後黨中央的組織領

導的正確性。關於這個時期黨的工作的各個方面和黨在目前的任務，劉少奇同志已經作了詳細的報告。[16]

附錄三：中國領導層的「一線」、「二線」

中國最高領導層分為「第一線」和「第二線」，這是文化大革命中由毛透露出來的。

> 依我看來，有件事17年來一直沒有妥善解決。起初，為了國家安全並且鑒於蘇聯在斯大林的繼承人問題上的教訓，我們提出了第一線和第二線。我處於第二線，其他同志在第一線。[1]

在另一次講話裏，毛詳述了設立一、二線的第二個原因：

> 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沒有當權，每次會議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沒有死之前樹立他們的威信，沒想到走向反面。（陶鑄同志說：大權旁落。）主席說：這是我故意大權旁落的。[2]

很顯然，毛的講話裏有一個矛盾。他一方面說一、二線從1949年（如他所說，在說此話之前的17年）一直存在；另方面又表示，1953年斯大林去世後蘇聯發生的事件在很大程度上使他深信，有分為一、二線的必要。此外，他談到馬林科夫表明，正是馬林科夫未能保住一把手地位（經過長時間黨內鬥爭，1955年2月，他丟掉了部長會議主席職位）的結局，可能還有赫魯曉夫對斯大林威嚇政治局的行徑的揭發[3]，使毛著手把接班人問題作為迫切的問題來考慮。

> 毛的另一段談話為一、二線並非始於1949年提供了進一步的證據：「進城後〔即1949年〕就分散了，各搞一攤。特別是搞一、二線就更分散了。1953年財經會議以後，就打過招呼，要大家互相通氣，向中央通氣，向地方通氣。」[4]（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這裏，毛把早期的「各搞一攤」同後來的一、二線時期區分開。所謂「各搞一攤」的時期，應該是1949年至1954年的那段時間，大批高級領導人遍佈全國，掌管著全國劃分成的各個大區。根據毛的敘述，1953年財經會議好像是屬於「各搞一攤」的時期；因為，一、二

線的問題不是這些領導人互不通氣的問題，而是他們不同毛通氣的問題。[5]

證明一、二線並非始於 1949 年的最有力的材料也是毛提供的：

> 為什麼說我〔對領導層分一、二線〕有責任呢？第一，〔政治局〕常委分一、二線，搞書記處，是我提議的……[6]

設立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和有更多職權的書記處，都是從第八次代表大會開始的；它們都是新黨章規定的調整組織工作的一部分。這樣，最高領導層分為一、二線的時間不可能早於 1956 年 9 月。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後來還有林彪[7]，在第一線，毛在第二線。毛把常委分成一、二線同設立書記處聯繫起來談，並不意味著這兩件事是同時發生的。儘管如此，這個舉動強烈暗示兩者是有聯繫的。的確，一個有更大權力的書記處的設立，會使黨更好地自立。

還有一個證據表明，第八次代表大會期間毛就著手準備退居二線，這就是這次大會通過的新黨章裏關於名譽主席的規定。不言而喻，唯一能擔任這一職務的，只能是毛。退到這個位置上，定會既使繼承人得以接過中國共產黨主席那令人敬畏的職務，又不致正式地和徹底地剝奪毛在領導層裏的最高位置。

翌年初，毛對一大批聽眾明白地暗示了他的打算。毛這次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報告是在 1957 年 2 月 27 日講的，據一位聽過原講話錄音的中國工商業者說[8]，毛「把自己比作一個相當著名的戲劇裏的主角，但是他說他現在年事已高，不能勝任這個主角了；他暗示，他也許會很快卸任，去做一個配角」。[9]

就在這個月，似乎在彭真主持下起草了國家憲法的一個修改草案，它包括這樣一個規定：任何人擔任國家主席職務不得超過一屆。[10] 這個修改草案從來沒通過，甚至也未公佈過。1958 年 2 月，毛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裏正式透露他要從國家主席職位上退下來的打算時，曾指出放棄這次修改草案的原因：黨希望為在緊急情況下使毛有可能重新出任該職留有餘地。「六十條」指出：

> 今年9月以前，要醞釀一下我不作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問題。先在各級幹部中間，然後在工廠和合作社中間，組織一次鳴放辯論，徵求幹部和群眾的意見，取得多數人的同意。這是因為去掉共和國主席這個職務，專做黨中央主席，可以節省許多時間做一些黨所要求我做的事情。這樣，對於我的身體狀況也較為適宜。如果在辯論中群眾發生牴觸情緒，不贊成這個建議，可以向他們說明，在將來國家有緊急需要的時候，只要黨有決定，我還是可以出任這種國家領導職務的。現在和平時期，以去掉一個主席職務較為有利。關於這個請求，已經得到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和地方許多同志的同意，認為這是一個好主意。[11]

似乎這樣的情況不大可能實際發生了：在狂熱的「大躍進」[12]的頭一年，全國就毛即將去職展開廣泛的討論。但顯然，毛堅持了自己的打算。1958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六中全會同意在1959年毛的任期屆滿時，不再提名由毛擔任國家主席。提出的理由是這使他得以集中精力通盤考慮政策和理論問題；對他的健康狀況隻字未提。[13]

在1959年4月召開的二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劉少奇繼任國家主席。他在略先於這次人大會議舉行的黨的七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國家主席候選人。我認為，正是在這時或在此前後，毛正式退居二線。

毛本人提供了一條證據。文化大革命中，他說：「鄧小平從不找我商量。從1959年起，他沒找我商量過一件事。」[14]這個抱怨不為鄧提出理由，但可能鄧這樣做是由於他認為毛從此不再要人和他商量，因為他已退居二線了。

文化大革命中一篇批判劉少奇的文章提供了更為明確的日期：

> 第二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劉少奇利用毛主席退居二線的機會，一躍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兼國防委員會主席。成為國家主席以後，劉少奇經常說，他非常忙，他的責任很重，他被責成掌管國家的全部事務。王光美甚至對她的孩子們

說：「爸爸很忙，沒時間休息。毛主席現在已經不管國家的具體事務了，把這些事全交給你們的父親了。你們不要打攪他。」[15]

這清楚地證明，毛是 1959 年 4 月退居二線的。為了強調劉的地位的上升，中宣部發出指示，從這年起，每年國慶節，報紙上應當並排刊登同樣大小的毛、劉畫像。[16]

可能毛這時也打算在第九次代表大會（按照 1956 年修改的黨章規定，應於 1961 年召開）上，從黨的主席退任名譽主席。結果，第九次代表大會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的 1969 年才舉行。但有一個重要的證據表明，毛的地位的確在 60 年代初曾發生過進一步變化。文化大革命中，陳伯達說：

> 1963 年，一線和二線的問題提了出來，主席退到二線。這是一項組織措施，可是，鄧以為現在他有了全部權力。在全黨占統治地位的還是毛主席的正確路線。然而，劉、鄧二人利用毛主席休養之機，在下層推行錯誤路線。[17]（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這是否就是計劃中的毛的最後隱退過程的開始，最終結果是他任名譽主席？如果確是如此，那麼上面提到鄧誤解了隱退的含義，這句話是否是說，原來的意圖是把毛之後的最高領導權一分為二，由劉擔任國家主席，而由鄧擔任更有權利的黨領導？這個問題將在本書的第三卷裏予以更為充分地討論。不過有可能在 1962 年初劉在七千人大會的表現之後，毛就對劉作為接班人不那麼熱情了。有一些來自蘇聯的證據表明，1962 年秋中共十中全會以後，更多權力從劉流向了鄧。[18]不過不管原來的計劃如何，結果卻大相逕庭。

附錄四：提到毛澤東講話的情況

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發言的該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在其講話開頭提到毛的講話者，列入「＋毛」一欄；未提及者，列入「－毛」一欄。字母「C」和「P」表示這些委員截至文化大革命開始，或截至其因政治或健康原因下台時，是在中央任職，還是在各省任職。

「1」表示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2」表示非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3」表示文化大革命前已被清洗的中央委員；「4」表示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選出前去世的中央委員，在八大一次會議和二次會議後不久召開的八次中央全會上選入政治局的委員，姓名用大寫標出（此處暫以△代替——譯者）。

瀏覽一下這兩列名單，就會看出第八章所作結論有一些問題。例如，擁護文化大革命的人提出的證據和說法表明，柯慶施自1957年整風運動的艱難之時直至逝世，一直是毛的積極支持者。他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沒有提到毛，這是否意味著毛在當時還沒有把他完全爭取過來？或者還有其他什麼解釋？董必武至少從30年代中期起就跟隨著毛，為什麼他在講話開頭也不提毛？對於蔡暢，也可以提出類似問題。她是李富春（他倒是提到了毛）的夫人，也是毛的密友之一、革命烈士蔡和森的妹妹。

儘管有這些疑問，數字肯定還是有意義的。在提到毛的12位中央官員中，7名（占58.3%）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裏復出；在沒有提到毛的18位中央官員裏，也有7名保留下來，但只佔38.8%。合計，22名中央和各省官員提到毛，9名留任（占40.9%）；32名中央和各省官員未提到毛，10名留任，只佔31.2%。結論必然是：未在八大上表態贊同毛的講話，這一失策很可能被主席，當然還有某些擁護文化大革命的人[1]看作是比較要緊的一次怠慢，因為它正好發生在毛的地位問題有些敏感的時期。

	+毛				一毛		
	張德生	P4			張仲良		
△	陳毅	C1			章蘊	C2	
△	陳雲	C1			陳漫遠	C2	
	江華	P2			賈拓夫	C3	
	蔣南翔	C2			周小舟	P3	
	江渭清	P2			周揚	C2	
	錢瑛	P2		△	朱德	C1	
△	李富春	C1			謝覺哉	C1	
△	李先念	C1			謝富治	C1	
	李立三	P2			黃敬	C4	
	李維漢	C3			黃火青	P2	
	林鐵	P2		△	柯慶施	P4	
	歐陽欽	P2			奎璧	P2	
	賽福鼎	P1			賴若愚	C4	
	譚政	C3		△	李井泉	P2	
	陶鑄	C2	(1)		李雪峰	C1	(1)
	陶魯笳	P2			林楓	C2	
	滕代遠	C1		△	林伯渠	C4	
	鄧穎超（周恩來夫人）	C1			劉仁	C2	
					劉瀾濤	P2	
	曾山	C1			羅瑞卿	C3	(2)
	王恩茂	P1		△	彭德懷	C3	
	王鶴壽	P2		△	薄一波	C2	
	王任重	C2	(1)		宋任窮	P2	
	吳玉章	C4			譚啟龍	P1	
					鄧子恢	C1	
					蔡暢（李富春夫人）	C1	
					曾希聖	P2	
				△	董必武	C1	
				△	烏蘭夫	P2	
					王首道	P1	
					吳芝圃	P1	
					吳德	C1	(1)
					姚依林	C2	
					葉季壯	C4	
					葉飛	P2	

〔1〕 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即調入中央工作。

〔2〕 對羅瑞卿的清洗，發生在文化大革命前夕還是在其開始，還值得商榷。在同一篇講話裏，毛既提到文化大革命始於 1966 年 1 月之前（大約是從 1965 年 11 月 10 日姚文元批判吳晗的文章發表算起），又說它開始於 5、6 月間（即在他的 1966 年 10 月 25 日講話前 5 個月，大約是從 1966 年 6 月 4 日《人民日報》透露彭真下台時算起）。（見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現狀背景》891 號，76 頁）

附錄五：擁護文化大革命的人對劉少奇報告的攻擊

文化大革命中加給劉少奇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報告的最嚴重的罪名，大概就是他宣揚階級鬥爭熄滅論，並為國內資本家「塗脂抹粉」。其實，這些指控是站不住腳的。下面的話是紅衛兵小報經常引用的：

> 外國帝國主義的工具——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已經在中國大陸上消滅了。封建地主階級，除個別地區以外，也已經消滅了。富農階級也正在消滅中。……民族資產階級分子正處在由剝削者變為勞動者的轉變過程中。[1]
>
> ……改變生產資料私有制為社會主義公有制這個極其複雜和困難的歷史任務，現在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完成了。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2]
>
> 現在，革命的暴風雨時期已經過去了，新的生產關係已經建立起來，鬥爭的任務已經變為保護社會生產力的順利發展，因此，鬥爭的方法也就必須跟著改變，完備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3]

上述引文被同毛在 1957 年 2 月 27 日關於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講話裏的若干段落對照。被引用的一個段落是：

> 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餘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4]

這兩段文字裏有一個主要的區別：劉說，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毛說還沒有解決。這也許代表了毛在 1956 年 9 月的看法，但也不能完全肯定這一點。在 1956 年毛的講話裏，沒有任何話表明他當時是這樣認為的。相反，1955 年 12 月，毛斷言社會主義的勝利「實際上已經得到了保證」。一個月之後，周恩來也

確認這仍然是他的觀點。若是在第八次代表大會召開時毛已改變了看法，他的開幕詞是向在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後感到極其喜悅的幹部們發出警告的一個適當時機：即使是現在，最後的勝利屬誰的問題仍未解決。

毛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直到 1957 年 6 月才發表，這時的政治形勢已有了急劇的變化。如上所述，一般說來，拿這篇講話同 1956 年在完全不同的政治氣候下所作的報告相比較，這個方法在原則上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在 1957 年初夏的資產階級右派進攻發生以後（見本書第三編），劉少奇也很可能會同意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最重要的是，應當始終記住，毛本人也承認他曾批准過劉的報告。如果說親自修改報告中涉及主席本人地位的部分對他來有些為難的話，他要是想提出不能過分樂觀地估計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的鬥爭形勢，則是輕而易舉的。

劉說，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除個別地區外）作為階級已被消滅；毛說，這些階級的「殘餘」還存在。要說兩種提法有重大的區別是站不住腳的。因為，毛也說這些階級本身是「已被推翻了的」。

從劉的報告裏，可以引出一些話證明他對國內政局並不滿意；而從毛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中，也能引出另一些話說明他對國內政局感到樂觀。

例如，劉少奇在講了誰勝誰負的問題已經解決的話之後，又以謹慎的措辭補充說：「這不是說，我們在社會主義改造方面的任務已經全部完成。」[5] 在這段話之前，他還強調過階級鬥爭會繼續下去：

>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他們〔指民族資產階級〕表示擁護人民民主專政，擁護共同綱領和憲法，表示願意繼續反對帝國主義，贊成土地改革；但是，他們又有發展資本主義的強烈願望。因此，我們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同過去一樣，仍然是又團結、又鬥爭、以鬥爭求團結的政策。[6]

劉也預見到在工商業國有化以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鬥爭會長期繼續下去：「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前，階級鬥爭仍然繼續存在。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之間的鬥爭，還會繼續一個很長的時間。」[7] 劉還告誡大會代表，不能以為同反革命的鬥爭結束了：

……成批的反革命分子向政府投案自首。這個事實說明，一方面，反革命分子確實是存在著，認為可以放鬆警惕性的想法是完全錯誤的；另一方面，只要我們的政策正確，反革命分子是可以肅清的，認為反革命活動會愈來愈嚴重的想法也是沒有根據的。[8]

相比之下，即使在資產階級右派進攻之後，毛還是顯然對國內形勢抱樂觀態度的。他在關於人民內部矛盾講話第一部分的開頭就強調已經取得的勝利：

我們的國家現在是空前統一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以及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迅速地改變了舊中國的面貌……我國的 6 億人民正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下，團結一致地進行著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9]（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就在毛發出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解決的警告之前的一段話裏，還肯定了階級鬥爭形勢的好轉：

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說來，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10]

文化大革命中，劉為其 1956 年報告辯護時，引用了一段話，想證明他的確提到了階級鬥爭：

限制和反限制的鬥爭是近幾年來我國內部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它反映著我國國內主要的階級矛盾……進行「三反」和

「五反」鬥爭，是因為有許多資產階級分子進行了有害於國計民生的非法活動，不能不堅決地加以制止。[11]

劉的辯護中奇怪的是，引文有一部分不準確，而最主要的是，他竟漏掉了能給他以強有力的證明的一段話。正確的原文如下：

> 限制和反限制的鬥爭是近幾年來我國內部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它反映著我國國內主要的階級矛盾——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從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國家同資本主義的經濟……經常地反覆地進行限制和反限制的鬥爭。其中主要的是 1950 年春天為了穩定物價而反對投機活動的鬥爭，和 1952 年反對行賄、偷稅漏稅、盜竊國家資財、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鬥爭。進行這些鬥爭，是因為有許多資產階級分子進行了有害於國計民生的非法活動，不能不堅決地加以制止。[12]（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除了詞句上一些不大重要的改變外，交待裏這段引文最主要的錯誤是把 1950 年反對資產階級投機倒把活動的運動同 1951 年 8 月開始的、在黨政幹部中進行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13]明顯等同起來。劉在原來的報告並未把「三反」運動列為反對資產階級的運動，這是正確的。

在交待中漏掉了用著重號標出的文字，這卻是很要緊的，因為就在那段辯護的引文之後，劉在交待中承認，他在報告中宣稱「我國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已經解決」。[14]顯然，這樣的說法是對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國內的主要矛盾的論述的否定。如果要譴責劉少奇的話，就必須略去去報告中對國內主要階級矛盾的分析，而且也確是這樣做了。但是，劉為什麼要在原先的報告裏說這樣相互矛盾的話呢？答案是，他沒有前後矛盾。我在劉的八大報告裏始終未找到斷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已經解決的話。[15]相反，他指出，這種矛盾至少將存在到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16]依照國家的贖買政策，這種改造至少在 12 年內不會完成。

劉在 1967 年的交待裏為什麼出現上述錯誤？一個可能的解釋是，他記錯了。雖然乍看起來，在 11 年之後，這也並不是不可能（如果他沒有得到報告的文本），但要說劉竟忘記了「三反」運動[17]的性質，似乎是難以置信的。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劉會忘記 1956 年國內的主要階級矛盾是什麼。

如果劉對這份交待確實能完全負責的話，他有可能是在故意地誤引自己的話，間接地來嘲弄那些強加於他的罪名[18]。另一種可能是，他被迫在一份由紅衛兵授意寫成的交待上簽名，這些人年紀太輕，不記得「三反」運動不是直接反對資產階級的。或者劉寫出的引文本來都是準確的，卻被散發交待的人篡改了。

有件事是顯而易見的：在能指控劉在 1956 年曾作出基本的階級矛盾已經解決的論斷之前，不對事實進行嚴重的曲解是不行的。

附錄六：政治局

八大以前		主要任職機關〔1〕	八大以後			主要任職機關〔1〕	文化大革命後〔2〕
1. 毛澤東	中共中央主席		1. 毛澤東	中共中央主席	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		psc
2. 劉少奇	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P	2. 劉少奇	中共中央副主席	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	P	o
3. 周恩來	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G	3. 周恩來	中共中央副主席	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	G	psc
4. 朱德	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A	4. 朱德	中共中央副主席	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	A	p
5. 陳雲	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G	5. 陳雲	中共中央副主席	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	G	cc
6. 康生		P	6. 鄧小平	總書記	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	P	o
7. 彭真		P	7. 林彪			A	psc
8. 董必武		G/P	8. 林伯渠			G	—
9. 林伯渠		G	9. 董必武			G/P	p
10. 張聞天		G	10. 彭真			P	o
11. 彭德懷		A	11. 羅榮桓			A	—
12. 林彪		A	12. 陳毅			A	cc
13. 鄧小平	秘書長	P	13. 李富春			G	cc
			14. 彭德懷			A	φ
			15. 劉伯承			A	p
			16. 賀龍			A	o
			17. 李先念			G	p
			1. 烏蘭夫		候補委員	P	o
			2. 張聞天		候補委員	G	φ
			3. 陸定一		候補委員	P	o
			4. 陳伯達		候補委員	P	psc
			5. 康生		候補委員	P	psc
			6. 薄一波		候補委員	G	o

〔1〕 A 代表解放軍；
G 代表政府；
P 代表黨。許多政治局委員有不少兼職；大多數元帥不再擔任實際軍事指揮工作。這張表僅作為權力結構組成部分的粗略指南，政治局委員們或在這些部門任職，或可估計他們同情這些部門。請注意：在這一時期，所有的副總理都是政治局成員，唯有鄧子恢是個例外，估計他是因為合作化問題上的保守主義受到了處分。

〔2〕 psc 代表政治局常委會；
p 代表政治局；
cc 代表九大和九屆一中全會產生的中央委員會；
—表示文化大革命前已逝世；
φ 表示文化大革命前被清洗；
o 表示文化大革命中被清洗。

第三編

整風運動

毛曾問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他能否作這樣講話。羅可能是誠實罷，但肯定是愚蠢地回答說他不可能。[150] 毛以後整羅是不足為怪的。一定有人告訴他，羅曾與林的妻子葉群激烈爭執，認為他們在擬定林彪講話書面稿的時候，過多加入了對毛的讚揚。毛還知道，林彪指責羅是修正主義。[151] 毛不會忘記。至於他的批評者，毛在私下評論說：「他們白天出氣，晚上看戲。一日三餐吃飽了──便去放屁。對他們來說，這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152]（按英文譯出。）

但在公開場合，在 1 月 30 日，並且即使現在主席仍是最具長者風度[153] 的一位善談中國歷史的文雅的巨人，能引述古典小說，是一位強有力的神，樂意於承認他可能也會犯錯誤的：

> 去年 6 月 12 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後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說，請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區。事後知道，很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當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154]

這個「自我批評」是他論述民主集中制長篇講話中的一部分；在講話中，他奉勸他的同事們不要害怕來自群眾和他們下級的批評。他用他慣常的粗俗的風格，告誡那些把自己認作老虎，推脫責任，壓制批評的人，說他們都會倒臺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嗎？偏要摸！」[155]

不過毛知道，有一個例外。有一隻老虎，沒人敢直接碰，這就是他自己。劉的報告沒敢碰，在他講話中也沒有。即令彭真也是當毛不在場時才講話的。在毛講話接近結尾時他漏了一點風聲，當時他說：「至於我嘛，我白天不會出去逛，夜晚不看戲。白天晚上都請你們批評（笑聲）。這個時候人坐下來，冷靜地想一想，兩三天晚上睡不著覺，想好了，想通了，然後誠誠懇懇地作一篇檢討。」[156] 那笑聲是不起作用的。沒有人能想像毛會受批評。毛一點也沒有表示他會改變方式。

他在會上說，在政治局常委會，如果「大家」和他不一致，他也總是讓步的！即使毛有在政策發佈前，舉行政治局常委會議，進行討論，而不用遊擊方式管理中國的習慣；這也沒多少讓步的意味。至少總有一位政治局常委，會跟著主席走的。

更為重要的是，毛的自我批評最多只能算是承認擺在杜魯門總統辦公桌上的那條有名格言的真實性：「責任再不能推諉了」；[157]且他可能確是準備承認那麼多責任，不過僅只是為了提醒大家：儘管他已經退居二線了，是他而非劉仍是中國的統治者。[158]

毛講話的大部分，是以經驗不足來為過去4年的錯誤辯解；是由於他的、也是其他每一個人的經驗不足。他仔細敘述了共產黨的革命史來說明：要制訂取勝的戰略，需花多麼長的時間，且需受多少挫折；並提醒他的聽眾，正是他帶領他們走向勝利的（這句話毫不讓步，與毛之後的歷史學家的說法不一樣，這些人說「毛澤東思想」是許多人智慧的集體產物）。他背出了一長串（對中國）心懷欽佩之情的外國人，他曾對他們說中國共產黨對經濟發展經驗不足；他也坦然承認他本人的無知，尤其對工業和商業。他說：「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的認識，必須有一個過程。」[159]對於主席來說，亦如前一天對林彪一樣，一個在世界人口最多、文明最悠久的國家，在和平時期，所犯下的最大的人為的災難，僅只是學習過程中所走的彎路的一部分而已。

正如1959年他最後不得不承認不可抗力時一樣，他指出恩格斯的一句話「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等於承認單只靠人，不管有什麼卓越領導和沖天幹勁，也不是任何事情都能成功。[160]但是他沒有對在制定要求躍進的總路線中，他本人所起作用作自我批評；他沒有承認他是公社的教父並提倡食堂和供給制；這兩者現在卻均已取消了。當然他也沒有對因他的普羅米修斯式的衝動，而造成的以百萬計的死者表示悔恨。意味深長的是，毛有幾次提到劉少奇的報告（報告曾再次肯定沒有路線錯誤），但卻從未提到劉的講話。在講話中劉曾指出主席對任

何危機慣常所作的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評估不再有效，因而暗示了路線錯誤。

在這種情況下，很難看出，為什麼毛的講話會對政治形勢產生這樣巨大的緩解作用。他明確地再度認可共產黨前一年費盡心機制定的那一大堆計劃，這一讚揚便抬高了那些較明智政策的身價：

> 有了總路線還不夠；還必須在總路線指導之下，在工、農、商、學、兵、政、黨各個方面，有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方針、政策和辦法，才有可能說服群眾和幹部。[161]

確實，他也認可甚至可以同非革命的知識分子一起工作，只要他們是愛國的。他也再次肯定 95% 的人口可以劃為「人民」，共產黨應當團結他們，不過對未來的騷亂卻有一點暗示：

> 現在反動階級已經沒有過去那麼厲害了……但對於這個殘餘，千萬不可輕視，必須繼續和他們作鬥爭……已被推翻的反動階級，還企圖復辟。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在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這種階級鬥爭是長期的、複雜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162]

考慮到毛的自我批評，和會議總的氣氛，這些話似乎僅只是一座死火山無害的低沉的隆隆聲而已。

真的，人們在閱讀以後的黨史，或與年長的中國學者和官員們交談後，必然會得出這個結論：主席的「自我批評」對政治空氣產生了深刻影響。即使一個微小道歉也是非同尋常，能使人震驚。[163]標題便說出了內容；通報便是資訊。毛本人對這個講話非常得意，決定立即審閱全文，可能準備出版吧。[164]然而，那些對毛知之甚深的人，也許必然會想到主席向黨的準則微微鞠了一躬時，內心是如何感覺的。而這些準則是指導其他每個共產黨員的行為規範。

儘管作了「自我批評」，毛卻未公開作過任何暗示他會正式向他的較清醒的同事移交權力。他會私下這樣做嗎？這時是再恰當不過的時機。從 1956 年 9 月八大的第一次會議算起，或 1958 年 5 月它的第二

次會議算起（按理應是前者），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代表大會按黨章規定的五年任期，不是已經過了，也是即將屆滿。毛可以在九屆大會上光榮引退，只要將他黨主席的身份，換成八屆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章中為他專門安排的榮譽主席的身份，便可完成他退居領導「第二線」的過程。[165]七千人幹部大會後，毛同事們的行為無疑表示，即使正式的移交儀式尚未舉行，他們認為一個新時代已經開始了。[166]但不論人們如何解讀毛的意圖，人們將會發現，在會議開完後，他只是暫時退卻一下而已。

批評大合唱

即使毛自己的行為是不可能有變化的，但他對民主集中制裏民主成分的強調，卻觸發了一輪對次要人物的（而不是對他本人的）批評。中央的、地區局的和各省的負責官員，均作了自我批評，他們過去數年的工作受到其下屬的嚴厲的審查。[167]在被迫作自我批評的人中，便有柯慶施。2月6日，他承認，在1958年夏季的大豐收後頭腦過熱，以致相信了誇大了的單位產量，結果深信中國的糧食問題已經最終解決了。譚震林這位大躍進期間的農業太上皇，一段時間以來經常作自我批評。[168]遼寧第一書記黃火青說，1959年廬山會議後，發生了最惡劣的左傾主義，他細訴了他主持下發生的錯誤：加速向共產主義過渡，禁止私人養豬，過高估算產量，過度的糧食收購水準，大辦食堂，取消農民自留地。在貴州，按貴州第一書記周林說不僅對農民收購過度，而且還因設想他們必定瞞產私分而予以迫害。[169]趙紫陽，在陶鑄[170]手下管廣東省。他可能是代表所有省級領導人說，在他的地區，他們忽視了兩條黨的根本傳統：當進行黨內鬥爭時，要治病救人；實事求是，作調查，走群眾路線。山西第一書記陶魯笳也作了自我批評。這類自我批評的結果是在那些鬥爭中曾受苦的各省高級官員的案件得到複查、推翻。這些人是：潘復生，原河南第一書記，後為造成災難的吳芝圃所代替；江一真和韋金水，兩人均為福建官員；李仲雲，

來自東北，他曾上書詳訴大躍進問題，在 1959 年廬山會議上曾遭到毛的怒斥。[171]

政治局常委的發言

最後到了其他政治局常委講話的時候了。1959 年陳雲曾短時間奉毛召請去制定較合理的經濟政策。[172] 這次主席也邀他在會上發言，但他謹慎地推辭了。[173] 剩下的 3 位政治局常委，周恩來、朱德和鄧小平的確發言了，不過均是加入了自我批評大合唱。朱德於 2 月 3 日在山東省代表團講話，作了有趣的啟示和嚇人的進言：

> 這幾年把家底搞掉了，要恢復起來，這不是開倒車，因為我們的基礎還是建築在生產隊上面。把生產隊搞好，又把農民的家底搞起來，事情就好辦了。[174]

朱德所說的家底，除餘糧外，指的什麼不清楚。但這短短一段話卻生動地說明，中國農民的生活已經接近到生存線的邊緣，而大躍進和三年苦難讓他們徹底崩潰。從理論上說，生產隊作為集體為農民們提供安全保障，但是生性直率的朱德體會到，他們也需要倚靠出賣自留地的產品積攢起來的薄產的保護。或許朱也是打算委婉地再次提出，1961 年年中他在北京工作會議上曾提起的家庭耕種問題。[175]

鄧小平於 2 月 6 日就黨的事務在會上講了話。[176] 像會議開始時劉少奇一樣，鄧在會議接近結束時感到有必要著重強調一下正面的東西，列舉了共產黨五個方面特點，即「五好」：它的指導思想；它的中央領導；一大批久經考驗的幹部隊伍；它的傳統和它的工作作風；中國人民。在思想、領導和傳統這些條目下，他自然是歸功於毛，但在表揚他本人和中央領導層內其他同事願意作自我批評時，他引用的是劉的報告，而非毛的講話。難道是因為主席的自我批評，是一個太敏感的問題，鄧不敢冒險去摸「老虎屁股」嗎？[177] 鄧也完全沒有提到劉的講話，雖然這講話是國家主席個人對會議的重要貢獻。一般說，也許他沒有必要去引用，但從政治上來說，會是一種表示團結的強有

力姿態。[178]劉大膽修改主席九與一的公式，鄧是否想試圖避免因自己公開地站在他一邊，會使自己和毛的關係緊張呢？

鄧進而闡明，這個「五好」黨如何因未能堅持實踐其傳統，而偏離正軌。自取得政權後，有些黨的官員忘記了他們是人民的僕人而非主人。[179]身為官員，他們忽視了調查，脫離實際，不講真話。鬥爭太激烈。恢復民主集中制將是改正這類問題的一個重要手段。對鄧說來，作為總書記要恢復對 1,700 萬黨員的控制，[180]分散主義導致的集中主義不足似是主要問題。他堅決認為，分散主義導致命令主義和民主的削弱，這意味著當中央的控制放鬆的時候，地方黨的領導人便變成了小暴君。黨的最終目標亦如國家的一樣，就是 1957 年夏毛在青島所說的：在於創造「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181]

為恢復共產黨的傳統，鄧強調了重要的兩點：不允許不執行黨的決議；不允許形成幫派（但毛插話說只有秘密幫派才是不可接受的）。[182]但轉而談到民主集中制裏的民主時，鄧再次強調了毛和劉兩人提出的反對給對手亂貼標籤的警告。正是這種作法，致使一些黨員寫匿名信，而不敢公開站出來進行批評。[183]在各級一起工作的幹部應當相互監督。[184]鄧代表中央建議，毛並插話加強這一建議，即在會議開完後，各級單位應召開一次出氣會，在各領導核心中，應進行坦率的交流和自我檢查。[185]

為避免將來的災難，鄧還提出了進一步的三條建議：恢復常被群眾運動打斷的日常工作的正規秩序；認真挑選和培養幹部；認真研讀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毛著作。但他對民主集中制的冗長討論僅揭示了這一問題的核心，而未提出解決的辦法。省、地區和縣的領導核心對他們以前做錯了的事進行談心，地方的老虎也讓人「摸一下屁股」當然是好的，但如果中央要對大躍進的災難負主要責任，則在中央也應當這樣做。七千人幹部大會所錯過的機會便是，毛的所有同事除一個人而外，似乎對他們鼓動其下級提批評的方式都思想準備不足。在

（我）所能得到的最高領導人在會議上的講話文本中，只有周恩來在會議最後一天所作的講話（這對他的同事們已起不了什麼激勵作用了）是真正的自我批評，而它的真誠性值得懷疑。

周恩來的自我批評

周對機構的和個人的錯誤均承擔責任。他把機構的錯誤歸納在國務院「五高」這個大標題下麵：生產數字過高，糧食收購過高，消費過高，中央從各省調撥糧食過高，出口過高。[186] 周所說的當前的經濟數字及其政策含義，將在後面一章討論。此處我們只關注總理自我批評的政治方面意義。

回顧大躍進，人們是怎樣把 1957 年 1.8 億噸到 1.85 億噸的糧食產量，在一夜之間變成 1958 年的中間產量目標 3.25 億噸，而到該年末竟然號稱產量達到 3.5 億噸。對此，周保持沉默。即使是 1959 年廬山會議修改後公佈的 2.5 億噸也是不可能的。鋼的目標在 1960 年被提高到 1,800 萬噸；影響了其他部門的生產，迫使很多企業停產。同一年煤的目標被提高到 4 億噸，結果造成裝備的損壞和 1961 年產量的陡降。[187]

大躍進時期的計劃完全是一團糟。周的報告說得清清楚楚。因為數字與實際不符，計劃不得不經常更改。其模式是：年初（定）高數字，接著年中向下調，而到年末不論實際達到什麼數字，很明顯政府均得接受。1960 年向中央提出第一個，接著是第二個計劃草案；後來，當某些部修改其數字時，又提出第三個。在地方各級更可能有第四個、第五個草案，所有事情便都搞錯了。[188] 計劃人員，在實事求是，或在經濟中作全面平衡方面，都做得不好。總理繼續說明計劃制定中的天方夜譚：

> 我們沒有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從實際出發，以農業為基礎，在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之間安排適當的比例，強調商品的品種及其質量以達到全面平衡，留有迴旋餘地。相反，我們違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和客觀規律，從主觀主義觀點進行工作，

> 強調數量和速度，沒有留下迴旋餘地，讓（計劃中的）缺口擴大，忽視品種和質量，唯獨片面地追求數字和高指標。在組織生產和工作中，我們把事情搞得一團糟，盲目發佈指示，召開電話會議，現場會議，文件和建議氾濫成災，最後大量任務加到縣、公社和工廠身上。上級要求各種數字和統計報表，並提出各種奇怪問題；下級簡直無法應對。公社所能做的只是打電話來回答，有些愛打電話的人只是像抱著好哭的娃娃一樣抱住機器。[189]（按英文譯出。）

周此前曾順帶引述了他本人的一些失誤，如提議大學也須進行寒假入學考試，工廠和礦山應當辦高級學習機構，結果招收學生太多。此時他較詳細交待他自己錯誤的兩件具體事例。第一件發生在 1959 年 8 月 26 日，他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報告 1959 年的主要數據時。他承認，他曾「錯誤地、片面地規定工農業應當每年以躍進的步伐增加生產」。他曾提出農業產量增加 10% 以上應當認為是躍進，增加 15% 以上是大躍進，20% 以上是特大躍進。周說，根據以前 1958 年要求產量翻一番，和 1959 年要求再增加 40% 看，這些百分比似乎比較現實，但是事實上它們是既不可能也不科學的，只須調查一下全世界的農業發展（情況）便可看出。不按現實來確定躍進的速度，便是「違背毛主席一再重複的要求，計劃應在實事求是、全面平衡、留有餘地的基礎上制定，結果是欲速則不達」。[190]（按英文譯出。）

周的第二個例子是關於下放經濟權力，以創造有相對完整工業體系的地區。為達到這一目標，把 98.5% 以上的輕工業和 76% 的重工業的控制權，都下放給了下級政府，相應的財政、商業、文化和技術權力也下放了。[191]

作為一名政治局常委，周的自我批評是不同尋常的，因此引起後來一位中國歷史學家的注意[192]。依次提出兩點值得關注。第一，周明確做了兩個暗示，責任不應完全歸於國務院。他問責手下負責的不同部門，因為「我們是在中央書記處的領導下做具體工作」，顯然矛頭指

向鄧小平。他準備關於過度下放權力的檔時，那是「由中央通過的」。這可能指的是毛，不過毛不可能去仔細研讀一份詳細的計劃文件，因此更有可能指的是劉和鄧。[193] 從這評論可以看出，大躍進初期中共八大第二次會議以來，對於經濟政策的控制權在多大程度上從政府國務院轉移到黨的書記處。提請幹部們注意這一點事實，對於推卸責任也很相宜。還可以想到的是，鄧小平在前一天的報告裏，對於這些事沒有承擔任何責任，周對此感到氣憤。也許他決定，不能再讓鄧推諉了。[194]

更重要的是，周的自我批評是毫無意義的。雖然國務院的幾位副總理及其下屬各部高級官員——周恩來特別點出農業、財政和貿易部——無疑在前幾年犯了許多判斷錯誤，但他們想出了「五高」政策，是為了響應毛壓倒一切的跳躍前進的要求；這一要求也得到了劉少奇的支持。周對跳躍前進重下定義，乃出於一種忠心的企圖，以便降低期望值，又可為實際取得的結果辯解；在他的權力下放文件中，他只是簡單地遵循毛的命令。周恩來和其國務院同事，在大躍進開始時曾因反對「盲目冒進」遭到毛和劉的批評，以後，就只得隨波逐流了。[195] 周此時宣佈，謹慎的毛主席曾不斷提出神聖建議，要警惕盲目衝動，他們沒有遵循；周還熱烈擁護三面紅旗，這體現他在七千幹部大會上對毛叩首服從。而這是迄今中國歷史學家僅僅安在林彪一人身上的標籤。[196] 無足為怪，《周恩來選集》的編者，無疑爲了維護總理迄今為止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享有的一無瑕疵的聲譽，決定不把這一重要講話選入集內。

這種類型的荒唐可笑的自我批評，是難以鼓勵一般幹部的。也許出席七千人幹部大會的下級官員，對首都政策爭論的內部詳情很不熟悉；不過周的聽眾人人都明白，毛是發動這極度不切實際的大躍進政策的人，雖然雖然他沒有管理具體的工作。周所樹立的是這樣的榜樣：即在大躍進問題上被證明是正確的每個人，都應該作坦白交待，好讓那些被證明是錯誤的人得以安然無恙！

但是周的行為確實顯現出他同僚們的膽怯。毛、劉和中央其他應負責的人所作的自我批評全都很好——中央政治局常委們的講話曾向黨內傳達【197】——不過，空泛的自我批評講到各個方面，可在具體上卻一無所指。劉少奇與周不同，他沒有像要求下級領導人在交心會上那樣具體談他在 1958 年什麼時候，怎樣投入那運動去的。【198】如果他這樣做了，可以想像，毛也將不得不作更令人信服的自我批評。

在 1959 年廬山會議上，政治局常委和委員們還有些藉口不和毛對抗。儘管有困難，大躍進似乎還取得了一些可觀的成功。各種問題，在彭德懷橫加干擾前，正在處理，毛也正在領導這一過程。對大量統計上的誇大，即將作公開承認。劉、周恩來和其同事們，可能未曾預計到，儘管作了這種承認，對彭的反擊竟會導致再次發動大躍進；他們也可能不知道，他們正處於三年苦難的第一年中，這三年會付出幾百萬生命的代價。最首要的是，毛使他們面對在彭和他本人之間進行選擇的局面，在那些情勢下，他們只得支持他們的主席。【199】

但 1962 年 1 月的形勢卻完全不同。大躍進的人為災難已明擺著，儘管（我）所能得到的講話文本表明，沒有一位領導人會提到大量死亡人數，來描繪這種災難。經濟處於崩潰中。除了公社不動而外（毛在其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劉、周和鄧帶頭要求恢復經濟。主席正處於守勢。唯一需作出的是在管理國家中的現實主義和誇大狂之間進行選擇。現在是空前未有的時刻，政治局常委們應設法確保毛再也不可能造成相似的災難。相反地，他們讓他得以保全面子，可能部分因為他們自信他們自己已經牢牢掌握了權力；部分因為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曾警告過所有共產主義精英們，幹預領袖崇拜是危險的。如果說一個已死獨裁者的事件，尚且能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那麼，涉及一個活的領袖，其影響將會是更巨大的災難；尤其是這一個，他會像在廬山會議上那樣運用他全部的手段，來抵制對他的廢黜。

彭德懷問題

在這些籌算的背後，在這件事的中心，便是被冤屈的彭德懷案件。毛和劉似可能達成某種默契，但肯定是不合原則的：在緊隨元帥受到屈辱之後的反右傾機會主義浪潮中，有許多幹部和其他人被無辜清洗，現正開展對他們「平反」的群眾運動，但彭德懷不能作為平反運動中的一部分而予以平反。在鄧小平監督下的這次赦免計劃的廣度表明了 1959-1960 年清洗範圍之廣泛，也凸顯了為何在 1961 年，要勸說官員們去推行在將來某一天會被說成是右傾機會主義的政策是多麼困難。365 萬幹部和黨員中的 70%，和超過 370 萬普通公民的案件，全部經過調查，被判為冤案。【200】

劉在對七千人幹部大會的講話中，談到了不把彭包括在這次赦免中的理由。雖然彭沒有參加這次會議，但前一年 11 月曾批准他回故鄉訪問 50 天。正是他 1958 年 12 月在故鄉的調查情況，使他對大躍進所造成的損失有了更多的瞭解。【201】在 1961 年他的這次訪問（這是最後一次允許他離開以後 4 年他在北京郊區的拘禁地）中，地方官員對他詢問的反應使他不禁驚呼：「唉！在舊社會我正是因為害怕飢餓才參加革命。我決沒想到在革命勝利 12 年之後，我們的人民還填不飽肚子。多麼深刻的教訓！」【202】（譯按：按英文譯出。）因這次訪問在他心中還很鮮明，無怪乎這位前國防部長在讀到劉對他的攻擊時，會義憤填膺。他坐下寫了一份 8 萬字的自傳性辯白書，駁斥對他參加反黨集團的指控。他於 1962 年 6 月 16 日把這份文件送交毛和其同事，要求進行全面調查；並在 8 月 22 日的另一封信中重申了這一要求。

在他的辯白書中，他駁斥了說他曾參與高——饒陰謀的指控。他承認確曾被高蒙騙了一陣子，但在鄧小平和他談話後，他看清了端倪，並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告知了鄧。彭似乎對與外國勾結的叛國指控更為憤懣。他僅承認廬山會議前在蘇聯和東歐訪問時，他對三面紅旗談得不夠（即不曾稱頌它們），但他說這是因為，他集中在討論 1959 年的西藏叛亂和 1958 年的炮轟金門。因為他不通外語，每一次會議均

有一名中國譯員在場，因之他建議中央委員會應當檢查譯員的記錄，看他是否曾說錯話。[203]

彭的反駁是一個爆炸性檔，迄今未曾全文公佈。[204]當時，甚至一名政治局常委如陳雲，也沒讓看到這份文件；即使 1962 年 8 月至 9 月的十中全會上透露有這份信函存在時，也僅散發了節本。在全會上成立了由賀龍元帥（彭德懷的老對手之一）領導的特別調查委員會，該委員會最終未能給彭加上任何罪名。[205]

但彭的憤怒證明他的復出將威脅中國領導高層中的許多人。也許 1958 年亞洲爆發的許多未遂的和成功的軍事政變——緬甸、印尼、伊拉克、巴基斯坦和泰國——是為什麼在 1959 年毛談到彭的「軍事俱樂部」和政治局常委團結一致反對這位元帥的原因之一，即使在 1962 年（前一年，在老撾和南朝鮮又發生了二次政變），可能也有人害怕這位被平反的軍隊英雄復出以後指權力結構可能發生變化。

而劉和他的同事們無法（或不願）理解或面對的是——甚至連周恩來也不能，他在 1959 年彭德懷被整的時候也沒有保持清醒——[206]只有為彭德懷平反，毛澤東才會在表面上從而實際上馴服，也只有馴服了毛，他的左傾主義惡魔們才能被驅除。這是一個代價慘重的錯誤，無論是對於他們本人，還是對於整個中國。

附錄二：暢觀樓事件

文化大革命期間，曾把無限惡毒的嘲罵傾倒在所謂的暢觀樓事件的參與者頭上；它是1961年12月，在《人民日報》前編輯鄧拓領導下，北京市高級官員的一次會議；會上對大躍進以來中央政策檔作了批評性回顧。

這次會議，因是在北京動物園附近的這棟大樓召開而得名，原是響應毛提出的作基層調查的要求而進行的調查過程的最高峰。後來指控鄧拓和其同事曾準備一份振振有辭的對「三面紅旗」的控訴狀，供彭真用來反對毛。西方學者不得不對毛後史學界在這問題上異常的緘默作探索。他們傾向於認為，這個會確實開過，且確曾產生一份對大躍進作高度批評性的文件，但彭真，或是因為謹慎，或認為沒有必要，決定不向七千人幹部大會報告北京黨的調查結果。[1]

最近中國透露的情況表明，暢觀樓事件的意義似不像文化大革命報道所指控的那樣富於戲劇性。劉少奇在1962年1月給七千人幹部大會的書面報告中，即曾說，中央書記處曾於最近向毛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提出一份有關政策制定的報告。[2] 它是根據對過去數年所發中央文件的研究而提出的。由張天榮所作七千人幹部大會的權威性（研究）報告指出，鄧小平領導了一次對中央文件的調查，以評估書記處的工作。[3] 另一份中國報道稱，這個報告已於1961年12月16日由鄧，也可能和彭真一道呈交毛。它並指明該報告言辭謹慎，沒有批評毛。[4]

12月初，彭真曾將有關中央書記處的調查事告知其一名下級，並命令在鄧拓主持下，組建北京專門小組，進行同樣工作。此時，北京黨委會正完成一份報告，總結它年初在市屬懷柔縣所作調查；彭曾在該縣蹲過相當時間。北京的幹部在考察了基層之後，被告知應分析他們所發現的問題是如何產生的。某種意義上，他們可用自己微觀的觀點，去補充中央書記處的宏觀觀點。依據一份敵意的但很詳細的文化大革命的報道，北京的調查是在12月9日到20日進行的。183 這工作下分九個題目，以便相關幹部調查其所負責範圍；其最後結果是一份

兩萬字的「中央文件摘要」，前面僅有一個簡短說明，按中央指示所造成的問題來劃分時期，這種時期劃分與大躍進兩次高潮時期是完全一致的。[5]

到此時，中央書記處的報告已經呈交毛。彭真作為鄧在書記處的二把手，肯定會知曉該報告的內容。這兩份報告必然會包括很多相同的材料。即使彭原來曾考慮向即將召開的七千人幹部大會提交北京的材料，他現在也會知道，它們僅只是重複而已。

確實，因鄧本人須監督撰寫劉報告的第一階段——這是一個比書記處報告更重要的報告，因為它將會在很多黨官員中傳閱——和監督會議的安排，[6]因此，彭真可能在負責呈報政治局常委會的書記處報告中，起了關鍵作用。

若果如此，劉(的文件)與暢觀樓文件相重迭的可能性將會更大。這便可以說明，為什麼彭在七千人幹部大會上，沒有提起北京檔。它也能說明，為什麼文化大革命分子們(他們可能是被對毛大躍進政策的委婉而並非公開的批評所激怒)只攻擊了暢觀樓文件，而沒有(據我所知)攻擊鄧的報告。[7]暢觀樓材料極可能是絕對符合事實的，沒有絲毫虛飾之詞，正是這種虛飾之詞使得書記處的最後報告能為毛所接受。[8]也許它僅是北京專門小組口頭所作高度批評性意見，因為他們曾仔細研讀了構成「暢觀樓事件」的那些文件。[9]

第八章 經濟困難

經濟負擔

不清楚為什麼周恩來直到七千人大會的最後一天才作中國當時的經濟負擔的報告。可能在此以前，數字還沒有計算好[1]，但是在會議開始時大家就明確知道中國當時困難的程度會使大家更集中考慮這問題。周想要說明三個主要問題：中國岌岌可危的糧食供應情況；糧食供應情況與城市居民的關係以及中國的外債。他透露的數字均列於下面的 4 張表內。

周竭力強調，農民遭受到重大的壓力。國家從農村收購了過量的糧食，這部分是由於國家對收成的估計大大高於後來所知道的數量，部分是由於需要供應大為增加的城市居民數。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國家在收購後，每年給農村留下了 1.25 億噸原糧；在 1962 年，則降至 1 億噸。因而，種子和飼料的數量均下降，農村每年人均口糧從 200 公斤降至 150 公斤（見表 8-1）。

中央的政策是要有餘糧省份多提供糧食，這主要是指四川、黑龍江和吉林省（見表 8-2）。它們，尤其是四川，以前積極響應號召，將糧食送到中央，供急需時用，但這時餘糧省的糧庫幾乎空了。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這 3 個省每年向中央提供 400 萬噸，這時已不再可能，而其他省份則不能補上這個缺額。事實上，幾個星期以後一份中央的報告透露，四川與黑龍江這時已成為缺糧地區。但中央仍需大量增加運送到城市去的糧食（見表 8-3）。政府已從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進口大量糧食來彌補城市的缺額，但是為償還債務（主要是向蘇聯償還），中國的外匯很緊張（見表 8-4）[2]

表 8-1 周恩來報告中的糧食數字 *

	產量（年）	收購量 **（6 月～ 6 月）	收購比例（%）	返回農村的糧食	農村定量（公斤／年）
第一個五年計劃	180	43.5	28.4	18.5	200
1958	250?				
1958-1959		55.0	[26.4][33]***	25.0	
1959-1960		60.0		25.0	
1960					
1960-1961		41.8		20.0	
1961	140				
1961-1962		34.0	29.1	13.4	
1962 計劃	150				
1962-1963 計劃		39.0	32.1	13.4	150

註：* 周提出的數字為億斤，我已以 2000 斤轉換成 1 噸。
** 產量為原糧，收購量為淨糧。以周提出的百分比計算，原糧與淨糧之比為 1 ∶ 1.2。但以此比例計算，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收購比例應平均為產量的 29%，不是周所說的 28.4%。
*** 以上是從周所給的數字推算的，顯然，周對 1958 年收穫量的懷疑說明他是知道 1959 年初缺糧情況的（《起源》，第 2 卷，第 144 頁），這樣就不能得出所說的收購比例。如果人們接受官方修正的 1958 年產量，即 2 億噸，那麼，收購比例為 33%，遠高於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平均數。
資料來源：周恩來：《七千人大會資料》，第 88 ～ 89 頁。

表 8-2 主要餘糧省向中央提供的糧食（單位：百萬噸）

	第一個五年計劃（平均數）	1958	1959	1960	1961
四川	1.7	2.10	2.1	1.25	0?
吉林與黑龍江	2.1	2.15	2.7	1.50	0.75*

註：* 僅為黑龍江提供的數字；吉林省會長春的居民 1991 年告訴我在 1960 年初他們沒有受到中國其他地方感受到的困難。
資料來源：周恩來：《七千人大會資料》，第 80 頁。

表 8-3 周恩來對城市問題的表述

	人口（百萬）	糧食供應（百萬噸）	工人（百萬）	工資（10 億元）
1957	99.49	21.10	24.50	15.6
1960	130.00	26.25	50.44	26.3
1961	120.00	24.00	41.70	24.8

資料來源：周恩來：《七千人大會資料》，第 89 頁。

表 8-4 周恩來報告中的國際債務（10 億元）

借貸	償還	債務	承諾援助	已付援助	應援助	義務 債務＋援助
7.75	4.7	3＋	6.9	3.7	3.1*	6.2

註 *：不清楚為什麼周不將這數字定為 3.2（即 6.9 － 3.7）。
資料來源：周恩來：《七千人大會資料》，第 100 頁。

西樓會議

周恩來所作的大綱式的報告是令人沮喪的，但它卻使高級經濟官員們採取了一系列行動，這是七千人大會的最重要的、直接的成果。186 特別是陳雲，他明確地認為主席的「自我批評」和他大會後的引退意味著他願意贊成採取激進措施來扭轉經濟形勢。陳雲曾謹慎地拒絕毛要他在七千人大會的全體會議上講話的邀請，但幾個月後，這時他變得很積極，帶頭提出恢復經濟的措施。

然而，在中國共產黨官僚體制的下層，大會的影響卻不明顯。人們仍然害怕報復懲罰。他的同事沒有公開批評毛，而且主席也沒有作真正的自我批評意味著情況還不明朗。同樣地，劉少奇寧願咬文嚼字地與主席爭論成績與缺點應各佔幾個手指，而不願詳細提出大躍進造成的可怕的死亡人數。這可能觸怒了毛。但這說明中國共產黨大部分幹部並不知道全國性的災難有多大。人們有一種在激進的恢復經濟措施前裹足不前的趨勢，希望形勢會好轉。由於這種情緒很普遍，七千人大會的主要任務並未完成，即，對危機程度有一個統一的認識和提出恰當的措施來緩和危機。

然而，對七千人大會後所採取的第一個重大決策，高層領導並無分歧，這就是進一步減少城市人口和工業工人數。到 1961 年底，城市人口已減少 1,300 萬人，這意味著減少了 950 萬名工人。這些人中，大多數是在中央 1961 年 6 月作出決定後離開城市的。[3] 在 1962 年 2 月 14 日，中央決定進一步執行這一政策，命令在上半年再從城市撤走 700 萬人，其中 500 萬是工人。這些工人中，大部分是 1958 年初進城的。而在 1957 年底截止日期前進城，因而不是隨大躍進進城的人則轉

到其他城市單位去或在得到經濟報酬後回家。那些已全家落戶在城市的工人可自行決定，是否回到農村去。[4] 最後證明這只是初步決定。

然而，在七千人大會以後，第一線領導人對經濟形勢作了更悲觀的估價，在提出激進措施以應付這形勢時，爭論出現了。爭論始於劉少奇於 2 月 21 日至 23 日在西樓召開的政治局常委工作（譯按：應為擴大）會議上。[5] 西樓是中南海內一座樓，黨和國家的主要辦公室即在該樓內。

西樓會議的日程包括財政、銀行、市場及全面經濟形勢。討論的主要政策報告是國務院財貿辦公室提出的，該報告提出 1961 年預算與信貸計劃執行情況以及 1962 年的預算建議。預計 1962 年的稅收與支出各為 300 億元，得以平衡。

在仔細審查後，劉少奇及其同事吃驚地發現這些數字完全脫離了現實情況。報告中一些收入是虛假的，而一些支出則未計算在內。真正的情況是 1962 年預算赤字在 50 至 60 億元之間。這意味著財政情況遠比七千人大會所知道的要危險。這在政治上是極危險的。[6]

在這重大挫折的背後是過去 4 年來對財政情況的計算錯誤——或者說是隱瞞。原來的估計是有 39 億元的結餘。實際上，從 1958 年以來，每年都有巨額赤字（見表 8-5）。

表 8-5 由大躍進導致的中國的財政赤字（單位：10 億元）

1958	2.18
1959	6.58
1960	8.18
1961	1.09
1958—61	18.03

資料來源：《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414 頁；《中國漲價風暴》，第 17 頁。

負責財貿辦公室的副總理李先念估計，如不採取措施，1962 年赤字將達 60 億元，但他似乎對這正式透露的巨大差額並沒有承擔責任。[7]

危機是由大躍進期間信貸過大與極不可靠的公眾核算造成的。大躍進期間，銀行向工業的貸款增加了 12 倍，向商業的貸款增加了 2.3 倍。李先念當時私下承認、中國經濟學家 20 年後也公開解釋，當時的財政支出與銀行貸款「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虛假的」。投資資金大部分來自維修保養的基金、日常運作以及銀行貸款。國家名義上得以收支平衡是由於將企業的一些流動資金列作稅收和利息，而它們實際上是銀行的貸款。在大躍進的 1958-1960 年，貨幣流通量增加了 81.7%，是自中共取得政權後不久的 1950 年以來增長最快的一年。到 1961 年底，貨幣流通量共達 125.3 億元，自該年 2 月份以來又增長了約 7%。到 1962 年 2 月初，即西樓會議前夕，該數字增加到 137 億元，在一個多月期間又增加了 11%。[8] 中國的財政已失控了。

劉少奇及其他領導人嚴厲責備了倒楣的官員，要他們回去，再提出一份報告，解釋問題所在，而這又用了一個月。[9] 就是在這種不利的情況下，陳雲再度振作起來，作了講話，分析了財政與經濟危機並提出瞭解決危機的辦法。[10]

陳雲的方案

陳雲首先討論了經濟的五大危機：農業產量；投資資金；通貨膨脹；農村的貨幣太多；以及城市生活標準下降。前兩點是基本的，其它三點是從前兩點派生出來的。陳直截了當地提出了關鍵問題：「糧食不夠吃，去年進口糧食 100 多億斤（500 萬噸），今年還要進口 80 億斤（400 萬噸）。肚子裏缺少油水，身上缺少衣著，這都是農業減產直接帶來的後果。」[11] 陳承認在中國領導人中對問題的嚴重程度有爭論；有的同志說，有的鄉村，農民吃得好，雞鴨成群。陳將這類農村說成是「極少數」；在大多數地區，農民「糧食不夠吃」。[12] 他承認在國務院農林辦公室進行的調查清楚以前，自己不能預計恢復會是快還是慢。但是他指出，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1953-1957），糧食產量平均每年只增長 600 萬噸多一點，而從那時起，則減少了 4000 萬噸。[13] 中國農

民現在有了更多的機械，更好的水利系統可用，但在土地、耕畜、肥料、農具和種子方面則條件差得多。例如，在過去 4 年裏，在 2.66 億畝耕地（包括一些最好的耕地）中，工業與其他方面用去了 6.25%。[14]

然而，陳駁斥了農業扯了工業的腿的說法；當前在工業部門的投資規模，即使在正常年景也是太高了。從開國以來，缺糧有過四次；三次的原因是由於對工業投資過大，導致城市人口增加過快。此外，工人人數要比工業產量增加得快。這樣，在數量、質量或品種方面都不能滿足需要，而半成品則大量積壓。整個大躍進的工業是建立在 1958 年生產 3.5 億噸糧和 350 萬噸棉花，和不久國家就能生產 5,000 到 6,000 萬噸鋼的錯誤估計上的。因此，投資規模與工業基礎很不適應。[15] 事實上，1961 年投資規模已比 1960 年減少了三分之二，而 1962 年則下降到 1960 年數字的 17.6%。[16]

工、農業商品大量減產，再加以貨幣供應增加了 60 億元～ 70 億元以彌補財政赤字，是當前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大多數多餘的現金流向農村。由於市場緊缺，農民得以將 10 億元的產品在去年以三倍價錢出售。國家沒有儲備足夠的商品來扭轉這種趨勢和阻止投機；也沒有生產出足夠的商品來回籠農村的多餘現金。農民每賣給國家 100 元的農產品，政府只能提供 60 元的商品和 10 元～ 20 元左右的服務，留下了 20 元～ 30 元的差距。除非這種情況穩定下來，否則就有農民停止出售他們產品的危險。[17] 陳透露說，對大多數問題的事實情況和補救辦法，都有不同意見，但對一個問題，意見是一致的，即在城市地區，價格上漲而實際工資則大幅下降。[18]

陳列舉了有利於克服這些問題的條件，但陳必然瞭解他不得不講的（一部分）話是軟弱無力的，這話就是總路線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這是由於毛堅持對整個形勢持樂觀的態度而不得不講的。大多數人認為這是指三面紅旗，而陳卻是指產量；糧食產量上去了，家禽和豬的產量在回升，工業能力和基礎設施比以前擴大了。如果把問題講

清楚，人民會理解的，領導幹部取得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但他警告說，如果官員們不說老實話，革命是會失敗的。[19]

最後，陳雲列舉了恢復計劃中的六條基本辦法。10 年計劃應分為兩個階段，即恢復階段和發展階段。這樣，對在第一階段裏需要繼續放慢速度，就不會引起思想混亂。他認為第一階段還需要 3 年。為防止各省扯後腿，他號召加強中央控制。

第二，陳再度強調繼續使居民遷出城市的重要性。雖然勸說居民返回農村是困難的，但不這樣做就更糟。如果 1961 年沒有居民返回農村，國家就需要從農民手中多收購 200 萬噸糧食供應城市，而這是不可能做到的。

第三，為制止通貨膨脹，必須嚴格控制現金流動，增加生產日常必需品，如果需要，就進口原料或從重工業轉移原料給輕工業，生產少數高價奢侈品以吸收購買力並以較好的市場管理來嚴格控制投機活動。[20]

他的第四個方案是保證城市地區的最低生活標準。他認為這是極端重要的。對此，他提出三條辦法。這表現出他善於仔細分析難以解決的問題的能力。在 1959 年毛任命他使鋼鐵工業回到正確道路來時，他的這種能力為中共力挽狂瀾。[21] 陳認為每個人每天至少需要 70 克蛋白質，而大豆則是向城市居民提供這一劑量的理想物品。他告訴他的聽眾，每斤糧食含 45 克蛋白質，每斤蔬菜含 5 克，而每兩大豆含 20 克。陳提出的數字說明大豆作為蛋白質的來源，其營養比糧食高 4.5 倍，比蔬菜高 40 倍。他作出結論：目標是向每個城市居民每月供應 3 斤大豆，也就是每天 1 兩或 20 克蛋白質，尚缺 50 克，可能要來自糧食和蔬食，因為肉和蛋供應不足。

陳的根據是城市人口為 1 億。他號召每年向城市供應 30 億斤大豆，以達到上述目標（比 12 月份計劃委員會剛號召的 8 個月供應 12 億斤有了相當大的增加）[22]。他說在今後 2 年內，是可能做到這一點的；大躍進前產量為 190 億斤，在過去的 2 年內，產量為 120 億斤。粗

略的計算說明，即使以陳估計的城市居民為1億計算，這計劃仍留有6億斤的缺口。[23]事實上，後來估計1961年底，城市居民為1.27億人。這意味著實際需要45億斤才能完成陳的計劃，缺口為15億斤。[24]我們後來會看到，兩個星期後，陳開始改口為，不是向全體城市居民供應大豆，而只是向大、中城市的6,000萬人供應。按這個政策，如果只需要供給這個人群的話還是可以達到的。[25]

陳雲為改善城市居民生活的第二個辦法竟是每年供應幾千萬雙尼龍襪子！

> 孩子多的人家，都感到補襪子是一件傷腦筋的事。如果用400萬美元進口1,000噸尼龍，就可以織4,000萬雙襪子，如果織尼龍底的襪子，產量就可加倍。一雙尼龍襪子可以賣幾塊錢，買的人喜歡，國家一年也可以回籠幾億元的貨幣。[26]

陳的第三個辦法可以稱之為「讓他們吃熊掌」，因為這個辦法雖然合乎邏輯，卻令人奇怪地想起瑪麗·安托瓦內特（譯按：法國路易十六之皇后）。在缺乏基本必需品的時候，陳再度強調出售昂貴的食物。他建議擴大高價飯店，將全國各地4,000萬元～5,000萬元的山珍海味用於這些飯店，從而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並回籠多餘的貨幣。

陳的恢復計劃中的第五個方案是強調增加農業產量的基礎重要性。他指出這問題有三個方面。必須增加經濟作物的產量以保證對城市的商品供應。國家用於收購棉花的每1元錢，可以從棉布賺回4元，如果加工成編織物，甚至可以賺得更多。但是經濟作物的生產者也要吃飯。按當前的辦法，農民每100斤皮棉可獲35斤糧食。這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因而他們將棉田改為糧田。陳建議將糧棉比例提高將近6倍至每百斤皮棉可得200斤糧食；他還建議，對其他經濟作物的生產者也做類似的提高。[27]

陳提出提高農業生產的第二個辦法是革命性的，這是指此辦法與大躍進時簡單地選擇一些全國性的典型並號召所有人都向他們學習的辦法相反。由於生產可以上市的餘糧省份情況各有不同，政府應該

找出各不相同的方法來增加產量。一個共同的因素就是化肥，因為進口化肥比進口糧食更划算。陳的第三個辦法就是有必要分配鋼鐵、木材，製造中、小型農具，這些農具遠比拖拉機要重要。[28]

陳雲最後的一條主要建議就是國家計劃人員的注意力應從工業轉到農業上來。這條建議，提出來容易，執行起來難，因為計劃人員是按蘇聯的作法培養的，是偏向工業的。[29]

當陳雲在 2 月 26 日向國務院官員的會議重複他在西樓會議上的講話時，聽眾自發地給予熱情和長時間的鼓掌。[30] 過了 30 多年，現在仍難以理解這是為什麼。陳只是老調重彈——有計劃、按比例發展——並重複聽眾們已接受過的教訓而已。可能這是由於他的謹慎的、無水分的分析和實事求是的方案與大躍進的豪言壯語和毛主席的輕率的樂觀主義形成了對比，因而打動了人們。也可能是由於聽眾們相信，陳雲所說明智、理性的政策可以使中國走出目前的危機。他們歡呼也可能是因為他們聽說陳雲將負責恢復工作。2 月 24 日，即西樓會議剛結束，劉少奇、周恩來與鄧小平即赴武漢會見毛。劉簡要地講了對形勢的評價和所做的決定，並說，如果主席不同意這些評價和決議，他們就得回去重新研究，再開一個會。然而，毛同意了，也同意恢復財經小組，由陳雲領導。

陳不願意接受這職位，聲稱身體不好，可能他是不願意就任這一定會成為有高度風險的政治角色。最初，會議同意由李富春任主任，他和周恩來只任小組成員。但在西樓會議上，在陳缺席時，劉少奇宣佈有幾個人向他提議陳應任主任，李任副主任。李表示願在陳領導下工作，這樣，事情就定下來了。當陳得知這情況後，想要辭去這職務——後來，他堅決反對重印並下發他的所有講話——但劉少奇對他說，他必須就任，並允諾全力支持他。[31]

如果聽眾知道毛實際上對西樓會議所作的對形勢的評價很不高興，他同意陳再次出來以及向全國幹部下發陳的講話，只是因為當時他沒有其他的選擇，2 月 26 日的聽眾就不會那麼熱心地鼓掌，陳雲

也不會那麼容易地被說動了。劉少奇本人並沒有意識到毛反對會議通過的辦法，當時大多數官員只知道有陳雲負責，他們就可以鬆口氣了。[32]

7月1日，中國共產黨成立41週年，面向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員的《光明日報》在頭版登了一幅照片，傳達了令人欣慰的資訊，毛與陳再度合作，延安「圓桌會議」的友誼又重新建立起來了。該照片是在七千人大會上拍攝的，照片上毛微笑著與陳雲談話，兩人周圍是全體常委，全都微笑著：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林彪和鄧小平。[33]對於讀者來說，這份富有進取精神的報紙，這一資訊當時幾乎已經過時了。可能這就是為什麼《人民日報》沒有登這樣的照片。

陳雲戰略的意義

計委主任李富春在2月26日國務院會議上也講了話，但陳雲策略的嚴峻意義是由財政部長李先念說出來的。[34]他著重談了達到中央平衡收支，減少流動貨幣的目標所需採取的措施。[35]

1. **增加生產**：最近中央常委會議決定，寫進計劃中的完不成的9億元輕工產品必須完成。並且必須再生產幾十億元的產品。這些產品包括糧食、棉花、煙草、酒和豬。李響應陳的講話，說工業應生產更多的運動鞋、化肥、化工產品、五金、尼龍襪和中、小型農具。其目標是再生產20億元的這類物資。

2. **節約**：工資總數必須限在計委和勞動部規定的224億元範圍內。商業部必須將已公佈的233億元貨物目標減少9億元，以完成這目標。行政、文化和教育支出必須削減幾億元。為起帶頭作用，中央委員會已同意將國家機關和群眾組織的人數減少三分之二，即從268萬人減至94萬人。[36]前年為賠償農民財產損失、於今年到期的7億元的白條將推遲3年兌現。國家收購糧食的獎勵價將取消，各地方自行提高的收購價應降下來，以節約幾億元。各群眾組織的購買力必須減少幾億元。應進行調查，是否能進一步減少基本建設投資。

3. **高價商品**：生產高價糖果與食品在前一年頗有成效，有助於回籠淨 20 億元。這一政策將推廣到多種商品以幫助應付赤字：酒類（除去供地下或高空作業人飲用的 10 噸）；不用布票的針織品；迄今專供國家賓館用的珍稀海鮮山貨將在高價食品店出售；高價手錶與自行車。

出售高價消費品是一種臨時性與輔助性措施，但在農村投機者手中有一大批現金，如果不予回籠，農民可能不出售他們的商品，從而對城市造成更大壓力。有三條原則指導這一政策：必須集中在少數能迅速見效的商品，應集中在農村地區，而不是像 1961 年那樣集中在城市；應只向有餘款的鄉村出售。

李自稱對第四條政策（即鼓勵多儲蓄）持懷疑態度。他勉強地支援存款自願、取款自由、為存戶保密的三項政策，但他懷疑這會促使存款增加。當市場緊張時，取款會增加；而當市場穩定時，存款則會增加。

李認為重要的問題是農村增加重要消費商品的生產。1957 年七類主要商品——糧食、棉布、針織品、食油、豬肉、煙草與酒類——共出售 203 億元，佔消費品銷售量的 46%。1961 年這些商品的銷售額下降 29%，僅為 146 億元。

李先念講話的第二部分集中談到嚴格財政紀律的極端重要性，這意味著更多的中央控制，特別是對銀行系統。李對某些銀行活動的警告說明，省與下級政府在大躍進期間濫用了他們新得到的財政權：銀行基金不得用於生利息、支付工資、為基本建設項目出資或支付各項費用。[37]

李的講話給人以奇怪的印象。一方面他似乎不喜歡陳雲提出從農村搜集資金的方法，而另一方面，他顯然對有機會鞏固他自己的權力頗為高興。雖然他的下屬在估計赤字多少時犯了錯誤，但國家財政緊縮，一致同意加強中央控制又加強了他的官僚地位。國務院會議後兩天，中央發佈緊急通知召回在大躍進期間暫時調往地方的銀行、財政與商業幹部。中央銀行與商業部在各地方的分支機構必須是第一流

的，他們與地方行政與財政機構脫鉤，估計在大躍進期間這些地方機構給了他們以好處。在 1962 年，財政部將增加工作人員 4 萬，銀行系統 6 萬，商業部則增加 50 萬人。[38] 在大躍進前夕的南寧會議上，被毛澤東痛斥的財政部，[39] 在 4 年後又重新獲得了在制定經濟政策中的中心地位。到 1963 年 7 月，已可以說財政情況又得到了控制。[40]

一連串的中央指示制定了規定使李的政策得以實施。3 月 10 日，中央委員會和國務院發佈了加緊控制銀行的六條規定，次月，他們發佈了關於銀行的六條規定，類似關於工業、商業與其他經濟活動的規定。3 月 20 日，中央禁止地方政府做計劃外的建設（這些政府在大躍進期間已習慣於無視中央的指導方針）並命令立即停止在建項目。3 月 25 日，財貿辦公室提出修改後的報告，提出三條建議：多生產 20 億元的日常用品以增加 4 億元的稅收；國家支出減少 31 億元，其中包括國防與發展開支；上市七類新的高價商品，以再回籠 20 億元的貨幣並增加國家稅收 10 億元。此外，嚴格的信貸條件可減少國家風險 5 億元。以上對預算的影響為減少預算 50 億元。

3 月 26 日，財政部採取措施防止稅源減少。由於前兩年自然災害，財政部不得不做出調整，農業稅由 1958 年的 388 億元降至 1962 年預計的 215 億元，大致僅為 1949 年的水準。財政部命令各省增加儲備 7%，供中央政府補償遭災地區農業稅收減少之用。[41]

所有這些措施均突出了 2 月 26 日向國務院幹部傳達的消息有多麼糟糕。然而李先念仍想起毛澤東，因而在該講話的最後部分振奮人心地說，與中國共產黨的勝利和汲取的寶貴經驗相比，當前的危機是次要的！[42]

陳雲的最後意見

陳雲最後一次發言是在 1962 年 3 月 7 日對財經小組的發言。[43]除了兩處重要的例外，他對細節談得不多，而更多地談根據他自己的經驗管理經濟的方法。他不贊成匆忙地制定第三個五年計劃，原定該計

劃將於 1963 年開始執行並定於 7 月份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討論。他指出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花了 3 年，而且在開始執行二年半以後才公佈。他強調指出擬議中的十年計劃期應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集中力量於恢復。他堅持，「只有恢復好了，才談得上發展。」需要立即研究的是 1962 年的年度計劃，而一旦定下來後，就不要像過去那樣經常調整。這是計劃官員們的老毛病。對大幅降低目標，也不能再猶豫了。[44]

陳雲似首先想要他的同事們對他愛談的議題即綜合平衡有深刻印象。他長期以來就認為三個平衡至關重要：政府開支與稅收平衡；銀行貸款與存款平衡；商品的供求平衡。[45] 這次他與大躍進時的老對手冶金工業部部長王鶴壽爭論並且又贏了他。[46] 王顯然贊成制定長期目標，如 7 年內生產 2,500 至 3,000 萬噸鋼，在一段時間內由這一目標決定其他目標，簡言之，就是無計劃地混下去。但陳雲的經驗是如果短期平衡沒有事先算好，就談不上長期平衡，其結果是大量材料和半成品賣不出去成為廢品。

在他與王爭論時，他問這七年計劃是否會生產出品種齊全的鋼鐵產品，王答以不能。王就平衡問題提出，如果 2,500 萬噸鋼所需有色金屬，國內不夠可以進口。陳以精確的計算回答他的問題，這種精准一定會令他那些管理靠直覺、數字靠推測的感到惱怒。他估計增加 300 萬噸鋼，就需要 15 萬噸有色金屬。自 1949 年以來，一年裏進口有色金屬最大量為 13 萬噸。如果進口 15 萬噸並生產 300 萬噸鋼，那麼，第二年必須進口更多的有色金屬才能進一步提高鋼產量。即使中國有外匯，要做如此大量的購買也是困難的。因此，需要在短期基礎上做出計算上的平衡。[47]

陳還設法勸說他的同事們只關注鋼是錯誤的。像美、英、德、日、蘇這樣先進的工業大國在大量擴大鋼鐵工業以前就做到了平衡工業結構。陳暗示他不相信王鶴壽會忠實執行他對平衡的要求。他堅持由計委負責中央對物資的管理，否則，「鋼材交冶金部管，他們就『監

守自盜』……」。計委也不是無可指責。它一向主要注意工業的發展，現在它必須轉移重點，將農業放在首位。[48]

陳談及的另一個重要細節問題反映了他特別關心城市的膳食，這也可以理解。陳補充了他對豆腐食譜的建議，可能是為答覆周恩來嘲弄的插話所反映的批評：

> 陳雲同志以前提出的每人每天供應一兩豆子的辦法很好。但人的營養光有植物蛋白不行，還要有動物蛋白。和尚尼姑，每天打坐，有植物蛋白也許就行了。我們這些人不行，勞動量比我們大的人更不行，有了植物蛋白，還需要有點動物蛋白。[49]

陳的解決辦法是魚和豬肉。他創造性地提出分配更多的鋼去製造機動化帆船和更多的捕魚設備，要求有關的部每年增加供應 15 萬噸魚。這就可使住在大、中城市的 6,000 萬人每人每月有半斤（略多於半磅）魚。此外，捕獲的魚，有些可分配給飯店。陳的意見很奇特，但具有啓發性。他說，如果有更多的人有錢去吃館子，群眾就會減少對幹部特殊待遇的意見了。陳還提出分配相當於 1962 年國家計劃收購豬肉的一半給城市居民，使他們每月除魚外還有半斤豬肉。按照陳的計算，五口之家每月可以分到 5 斤動物蛋白，其中魚和豬肉各一半。陳嚴肅地強調解決這問題的政治重要性：

> 如果 6,000 多萬人身體搞得不好，我們不切實想辦法解決，群眾是會有意見的。人民群眾要看共產黨對他們到底關心不關心，有沒有辦法解決生活的問題。這是政治問題……同志們，我們花了幾十年的時間把革命搞成功了，千萬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們手裏失掉。[50]

陳以懷舊的心情結束他的談話，回憶起他在政權建立初期的光榮時日管理經濟的辦法。[51]這是個恰當的結束語，提醒他的同志們：在他跌下臺時他們失去了什麼。不久，他又下臺了。幾乎整整 15 年他沒有再做重要的講話。[52]

五月中央工作會議

陳雲在講完話後以身體不好為由馬上回到上海。會議主席由周恩來擔任，雖然他只是委員，而不是財經小組二主任之一。總理作了一個很長的講話，闡發了陳雲的觀點。[53] 4 月初，小組按陳雲以前的要求召開了國務院工作人員財政會議，討論當前而不是今後的形勢。約在同時，周將國務院財經小組有關赤字的修訂報告呈交給毛。毛於 4 月 12 日退回報告，說報告很好，同意分發；報告正常發出，開頭附有解釋，說這是對七千人大會提出的赤字數字的「更大一些」的修訂。[54] 周恩來和李先念在小組討論和毛的同意基礎上，向中央提交了 1962 年計劃的報告草案。這報告成為 5 月 7 日至 11 日在北京由劉少奇召集、周恩來組織的另一個重要工作會議的基礎。[55]

出席會議的人員可以證明這次新會議的重要性。他們是：中央 7 名常委中的 4 名（他們全在全體會議上講了話）[56]，政治局其他 10 名委員中的 6 名，5 名候補委員中的 4 名，以及書記處全體書記。引人注目的缺席者是政治局委員中在大躍進時堅決支持毛的兩名省級委員，上海的柯慶施和四川的李井泉。會議的頭兩天，參加會議的 105 名官員仔細研究了小組報告和其他文件，然後分成五個討論組。4 名常委在最後一天講了話。[57]

財經小組的報告

小組的報告顯然是想要對經濟危機提供盡可能全面和真實的評價並提出克服危機的措施。[58] 不清楚該報告是否講出了災荒涉及到的人數，但它的確詳細講出了國家經濟的困難情況。經濟嚴重失調：工農業之間、工業各部門之間、城鄉之間的關係都不恰當；文化、教育和行政費用與當前的經濟形勢的關係也不恰當；積累與消費的關係嚴重失調。

為說明這些問題，報告指出，1961 年工業產值比 1957 年高出 45%，但農業不僅沒比落後的 1957 年有所增長，產值反而下降

了 26%。自 1957 年起，重工業產出增加了 79%，但輕工業只增加了 16%。雖然 1961 年有 1,000 萬人回到農村，但城市人口仍比 1957 年增加 2,000 萬人。1961 年城市工人減少了 870 萬人，但現在工人數仍比 1957 年多 1,724 萬人。雖然在 1961 年採取了措施，大多數農產品 1962 年的目標仍低於 1952 年的水準，而農業的全部產值估計比 1957 年低 22%。輕工業產值增加了 9.6%，但六類食品低 37%，14 類衣服低 39%。然而，同時，重工業卻仍謀求增加 42%。

八個重要領域

報告分析了經濟中的八個重要領域。

1. **農業**：產量自 1957 年後嚴重下降。1961 年包括大豆在內的糧食總產量為 1.425 億噸，自 1957 年以來降低了 4,250 萬噸。[59]其結果是，1961 年農村地區人均分配到的糧食量自 215 公斤降至 150 公斤，超過 1/3。該報告預測糧食產量要恢復到 1957 年水準需要 3 到 5 年，而整個農業的恢復則需要更長時間。[60]

該問題的嚴重性在於：在這 3 至 5 年期間，不能期望國家能從傳統的來源獲得更大量的糧食來供應城市。正如周恩來以前所說，四川和黑龍江這兩個餘糧省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平均每年向國家提供 310 萬噸，而現在則已成為缺糧省。[61]各省的統計後來表明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四川向國家出售糧食最多的一年，即 1954 年，共出售 648 萬噸，超過總產量的 1/3；而在 1962 年，共出售 270.5 萬噸，不到總產量的 19%。[62]在黑龍江，產量上下波動極大，由於大躍進，產量直線下降（見表 8-6）。

該報告根據當時對城市及其他方面需求的計算，估計國家在 1962 年中至 1963 年中必須提供 700 萬噸糧食，這意味著必須由進口填補的缺額為 400 萬噸。但如果城市人口與工人數能進一步減少，糧食產量能逐步回升，每年能增加 100 萬噸的餘糧，則進口可以削減。但報告

建議，即令糧食供求達到平衡，國家仍應每年進口 100 至 150 萬噸糧食補充糧庫，以備急需。[63]

表 8-6　餘糧省 1953-1961 年主要農產品產量（單位：噸）

年份	糧食	大豆
1953	7,140,000	1,735,000
1954	7,035,000	1,370,000
1955	8,205,000	1,415,000
1956	7,925,000	1,660,000
1957	6,650,000	1,500,000
1958	8,780,000	1,650,000
1959	8,510,000	1,795,000
1960	5,340,000	1,180,000
1961	4,250,000	1,020,000

資料來源：張向淩編：《黑龍江四十年》，第 466 頁。

2. **工業**：該報告直率地聲稱，農業不恢復，沒有大規模的工業重建，工業產量就不可能上升。[64]

3. **基本建設**：削減以後，需要 2 年或 3 年，投資才能再度回升。在 1958 年至 1961 年期間，這類投資總共 1,112 億元，其中 245 億元是計劃外的。這不僅遠遠超出國家的能力，其結果也不能說明這些支出是合理的。為了用各種非正當手段提供資金，人民的生活標準壓低了。這確實是「拆東牆補西牆」。任何無法達到投資目標的項目均必須停下來。

4. **交通**：鐵路危機已暫時緩和了，但短程運輸能力嚴重不足。[65]

5. **工人人數過多**：1961 年底，仍有 4,170 萬城市工人，比 1957 年增加了 1,720 萬人。中國的農業不能養活這麼多的工人。在過去 4 年裏，糧食生產下降了 23%，而工人人數增加了 17%。即使今年工人人數再減少 900 萬，農業仍不能提供足夠的糧食。除非工人人數大量減少，工人生活水準無法改善。

6. **市場情況**：在 3 至 5 年內，在供應問題上，特別是食品與衣著上，情況不會有改善。

7. **外匯**：外匯數不可能增加，中國外匯約半數均用於進口糧食。

8. **財政**：國家有大量赤字，貨幣發行量太大。國家倉庫無任何商品庫存，生產資料卻大量壓庫。這兩個因素，再加以外匯的消耗、借貸過度，許多國營企業虧損，過去4年內造成250億元以上的赤字。僅1961年一年，國家收入下降至790億元，比1957年的932億元少142億元。如果情況不改善，投資將枯竭，消費水準不可能得到改善。[66]

三項政策建議

報告的第三部分提出三項籠統的政策，使國家得以應付上述的危機：

- 在經濟各部門之間恢復綜合平衡，這是陳雲、李富春和其他計劃人員多年來最關心的事。[67]
- 財政工作爭取快，但準備慢，因為會有意外發生。
- 削減工業以幫助農業。

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陳雲的作風是將準確、具體的分析作為提出政策的根據。這報告也不例外。他完全知道一般警告對省的領導人和工業經理們不起作用。因此，他對當前工業形勢進行了特殊調查以證明應該做什麼。

1961年底61,800家工業公司與849家建築公司共有4,170萬工人。這樣龐大的工業設施不僅不適應當前的農業水準，也不適應修正過的1962年計劃。雖然可供加工的農產品已大量減少，但仍有21,000多家輕工業公司。其結果是糖、煙與罐頭廠的利用率只在20～25%。這一年棉紗產量預定只有260萬件，即使將明年及以後增加的產量計算在內，也只需要500萬～600萬錠子與不到100個的棉紗廠；但棉紡工業卻現有1,000萬錠和236家工廠在運作。

這份報告對重工業也毫不留情。修訂的1962年計劃號召生產12,000件機床；50家～60家機床廠即可完成，但當時有110多家工廠。機械工業其他部門的生產能力也大大超出需要；在有些部門，情況比

機床部門要糟。鋼鐵工業的能力為 1200 萬噸（直至 1965 年中國才生產出這麼多），而 1962 年中國只生產了 667 萬噸。[68]

小組的結論自然是許多國家工廠沒有足夠或沒有任何工作可做，但它們仍在消耗燃料、電力、原材料及其他投入並且仍在支付工資。因此，需要縮小規模、合併甚至關閉工廠，或至少改變它們的職能。這會是困難的，但是不走這條路就會更困難。為保證停產或減產的命令得以執行，材料不會被非法處理，該報告認為在已發佈的指示中對財政與物資的控制辦法應該嚴格得到貫徹。[69]

修訂 1962 年計劃

小組報告為修訂的 1962 年計劃制定了四條原則：

1. 農業優先。鋼鐵製品的分配量增加 13%，至 75 萬噸，木材分配量增加 16%。
2. 增加生產 19 億元的日用品。
3. 降低重工業各部門的計劃 5 ～ 20%。
4. 減少基本建設 1/4，至 46 億元。

該報告要求計委保證貫徹以上原則。劉少奇指出自大躍進開始以來，除一年而外每年到年底都降低指標。他說，「『左』了這麼多年，讓我們『右』一下吧」。[70]

下鄉

如果要關閉工廠而又不引起城市嚴重騷亂，必須繼續有大量工人和其他城市居民下鄉。周恩來總理帶頭談論這問題，引用一位參會者的話：「昨天有一同志說：去年下 1,000 多萬，今年，再下 2,000 多萬，合起來下 3,000 多萬，這是一個中等的國家搬家。這是史無前例的，世界上也沒有的，也可能是空前絕後」[71]。周解釋說遷移人口的決定是逐漸成熟的，以前沒有這個可能。目的是重新調整經濟秩序，為發展奠定新的基礎。其他中國政府不可能做到，只有「我們無產階級專政」

才能做到。[72]周向會議提交的計劃的主要內容是在二年內共減少 1,000 萬工人，2,000 萬城市居民，據說他詳細地談到如何貫徹這一活動。[73]

劉少奇支持周，他解釋為什麼他們兩個人都談到在執行下鄉政策時需要下定決心，劉說這比大躍進還要難以貫徹執行。在將要下鄉的城市居民中也有學生，劉用了一些時間談到學生鬧事的可能。他特別關心要在像北京、上海、天津、武漢、瀋陽、哈爾濱和廣州這樣的城市中避免騷亂。如果避免不了，就要努力使之數量少，規模小。如果一切措施均無效，爆發了騷亂，那麼就應發佈軍事管制，切斷與其他城市的交通聯繫，直至秩序恢復為止。但，他補充說，「開槍打死人是不行的。」[74]

廣東人大批出走

廣東發生的事正是劉所害怕的那種騷亂。早在 1961 年 7 月，廣東省當局就已決定，允許人們更容易地赴香港，以此來緩和自身的經濟問題。公安官員的會議同意在與香港毗鄰的邊界增加 7 個出口以繞開邊境控制。甚至生產隊也可以發放出境證明。為放鬆中國的遷移限製作辯護，可能在向北京彙報時，省委第二書記趙紫陽辯稱，廣東南方農村實際上是香港的郊區，中國公民赴港是完全自然的。廣東希望中國公民會帶回食物、肥料和其他物品。[75]

在 1962 年接到命令負責進一步安排人口流動時，第一書記陶鑄與他的同事們最終決定採取更激進的措施：允許大規模出境。3 月邊防會議將 7 個新出口增至 90 個。同月另一個會議制定了計劃從即將到來的出境中獲利：收取費用即可安排非法進入香港。到這一事件結束時，賺取的錢數目不明，但在 100 萬以上港幣。在 4 月份，形勢開始混亂，各出口處壓力增大，邊防人員向一心出境者開槍甚至相互開槍，造成「流血事件」。公安部長謝富治致電陶鑄，顯然是要求省政府採取政治措施停止人口出境，以減輕對他的部隊的壓力。但，據說陶鑄視察了邊界，命令減少邊防人員。[76]4 月底，廣東邊防人員不再阻止出境。[77]

省政府默許人民逃出中國一事一旦廣為人知，大規模出境就成為「浪潮」。[78] 3 月 19 日，半個世紀來最大的地震在廣州發生，可能許多人視之為惡兆，加速了人們出逃。[79]

在幾天內 3 至 4 萬農民進入香港。緊隨其後的是城市居民，許多人無疑想以移民 到不必下鄉的這個城市來逃避下鄉。[80] 5 月有 3 個星期對出境不加任何控制。這期間，約有 10 萬人越過了邊界。香港熱傳到福建、湖南、浙江和江蘇。香港當局不願意人口大量增加，盡量捕人，遣返回邊界。有人多次企圖返回香港，[81] 但到 5 月 12 日越境者已沒有可能逃避香港當局逮捕。人們用腳投票表示對政策的不滿，廣東這時可以將人們的不滿轉移到拒絕他們避難的英國殖民政府身上了。[82]

5 月中旬以後，可能在 20 日左右，周恩來總理致電陶鑄，命令他於 5 月 25 日制止大規模外逃。[83] 5 月 22 日，廣東當局關閉了邊界，但群眾壓力仍在繼續。6 月 5-6 日，在廣州九龍火車站及其他地方有幾千人遊行要求允許他們乘上赴香港的火車。據曾生市長後來關於「東車站事件」的回憶稱，在他們散發的「反動」傳單中竟有要求允許他們到殖民地去慶祝女皇的生日！這次抗議被成功地扼制並壓下去了，但受驚的市長向周總理要求將當地公安部隊從 5,000 增至 7,000 人。[84]

幹部的平反

面臨經濟危機造成困境的不僅是公安幹部。如果計劃與財政幹部要無顧慮地採取「右傾」態度的話，他們顯然必須得到保證，這樣做是安全的。前一個月，中央發佈通知稱，為在 1959 至 1960 年「反右傾」和以前運動中的幹部、黨員和普通公民平反的工作從 1961 年 6 月開始以來，進展太慢，因為官員們對此不重視，或者採取方法不恰當。[85] 中國共產黨總書記鄧小平負責此事，在五月工作會議上，他再次強調這一活動的重要性，要求簡化手續，以加快平反。

這問題的根子在農村，受到影響的人大部分在縣級以下的生產隊與大隊裏工作。由於中國共產黨寄恢復農業的希望於改善生產隊的體制——鄧認為這對恢復農業來說是與減少城市人口同等重要的[86]——重要的是農民不應感到不高興或有怨言（譯按：鄧小平的原話是「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平反牽涉到的人數是很大的。鄧估計在全國需要甄別的可能有 1,000 萬人；假定每個家庭有三名成年人加上一些認識的人，受影響的總人數就可能幾千萬人。河南省在大躍進時是「左傾」的而且是鄧認為工作做得比較好的，但在河南有 40 萬人要平反。為加快進程，鄧建議用四川的一攬子甄別平反的辦法，在檔案上不留尾巴。[87]

五月工作會議的氣氛

五月中央工作會議的報告和講話給人以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就像 1961 年的廣州、北京和廬山工作會議，特別是七千人大會一樣，他們給人以新的開始的感覺。採取了新措施，甚至宣佈了更大的決心來實現這些措施。官員們離開時都有了新的激情。

這一次，會議參加者樂意聽取實事求是的報告，討論小組的評論指出七千人大會未能將國家困難的真實情況講出來。比較普遍的情況是盲目樂觀、僥倖心理，似乎只要今年有個好收成明年就萬事大吉了。官員們和工廠的經理們在觀望等待，不肯減人，這樣就喪失了半年時間。一位會議參加者說七千人大會影響不大的原因就在於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沒有將事實攤在桌面上：「講明為什麼要退，為什麼要減（城市人口），不要隱瞞。」[88]

高級領導人對此做出了恰當的回應。劉少奇稱形勢「很困難」；人們不再能像以前（當然特別是毛）那樣用「很好」這個詞了：「我們這裏不開口，人家是不好講的。」劉補充說主要的危險是低估國家所處的危險；估計得困難些要比估計不足要好。他實際上承認他對七千人大會說「最困難的時期過去了」是愚蠢的。人人都用這個詞，但對不對

呢？「恐怕應該說，有些地區最困難時期已過去了，但在城市裏面，在工業中間，最困難時期還沒有過去。」[89]周恩來也說了同樣的意思。[90]鄧小平插話說那些怕承認有問題後被指責為右傾的人事實上是右傾分子。[91]

但是即令在這時，這種意見一致究竟有多深多廣？這些新措施能否貫徹執行？中國共產黨證明它能將相當於一個中等國家的人從城鎮搬到農村去，但是如果頭腦清醒些的領導人不將大躍進災荒造成的人員死亡情況直言相告毛和中共黨員，中國共產黨的、基本上是革命的或「左的」精神會改變麼？如果為了毛自身或為了中國共產黨的威信而讓毛保留面子，即令他形式上同意更合理的政策，這些政策能長期堅持麼？[92]這問題不久就要與中國共產黨的決定性戰場，即農村相聯繫起來，而且取決於此了。

第九章 關於集體化的爭論

在五月工作會議上爭論的許多問題中，沒有比是否應採取更激烈的措施，改革農村合作化的結構以刺激農業的問題更有分歧了。在這問題上，沒有得出結論，也沒有作出決議。[1] 自劉少奇以下的每個人都知道對毛來說，這可能是中國政治中唯一的中心問題。在少數省份中，這問題已是暗流湧動，而在華東的安徽省則已明顯波濤洶湧了。[2]

安徽的責任制

安徽的第一書記曾希聖是一名老黨員，參加過長征，到 1949 年已升到人民解放軍的高級政委。[3] 他在 50 年代初是安徽黨的高級官員，在 1956 年的八大上被選入中央委員會。1961 年，他兼任中國共產黨華東地區第二書記。[4] 他可能是省級領導人中最知名的一個，因為他經常為官方出版物寫文章。[5] 他受到毛的信任，[6] 可能是由於他享有當之無愧的左的盛名，[7] 因而在大躍進期間，該省受的災難可能比其他任何省都重。1960 年，安徽死了 220 萬人。有一個材料估計由於大躍進，不正當死亡總人數達 800 萬人。1962 年，糧食生產比 1957 年的水準低 35%，油料低 20%，棉花低 15%。[8] 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左傾分子也會嘗試「右傾」的辦法來恢復省的農業。曾對整個集體化過程進行了一次重大的調查研究。[9]

事實上，早先，安徽曾用不同的集體生產方法開展兩個實驗。1957 年，由於 1955-1956 年匆忙建立了高級社，導致嚴重的問題。有些地區實行了承包到戶，但名義上仍是集體管理的。在 1959 年，再次由於前一年將高級社合併成公社所導致的問題，加以由此引發的平均主義，有些地區實行土地下放和定田到戶，實際上所有農活都包工到戶。[10] 人們不清楚毛是否知道這些實驗，但他肯定知道早在 1958 年

安徽部分地區饑荒嚴重，因為，那年底，他收到來自有 500 人餓死的一個縣的一封信，他命令曾與他的同事們對此進行調查。[11]

1960 年，曾在北京的高聲望使他被任命為山東第一書記，山東的問題被認為比安徽還嚴重。他還兼著安徽省的領導職務。1960 年 12 月，一群安徽的高級幹部在山東向他彙報，他指示他們在山區試驗包產到戶，這一方式似乎得到了毛的同意。在下一個月，當安徽的其他官員向他彙報該省的情況正在惡化時，他又作了同樣的指示。他責備自己對安徽人民犯下了罪行，馬上請求毛和華東局解除他在山東的職務並獲得了批准，於 1961 年 2 月 6 日返回安徽。第二天，他在蚌埠召開會議，聽取地方彙報並討論危機。這時，他正式提出承包制的問題，這一制度，儘管名稱各異，實際上就是包產到戶。他將此比之為工廠裏的「責任制」。在工廠，責任分到車間，車間又分到各機床，工人按件取酬，超產有獎。曾將生產隊比為車間，土地比為機床，他說農民像工人一樣，應對車床負責，這不就是將工業生產的責任制移植到農業生產嗎？在工業裏，這樣做不是單幹，或復辟或倒退，那麼我們用之於農業，單幹、復辟和倒退的帽子是扣不到我們頭上的。[12]

就是在這個會上，承包制富有神奇色彩的成功事例使得曾和他的同事們相信他們走的路是正確的。1960 年，宿縣地區有一名 73 歲老農民，鄰居都認為他應當住到養老院去，但他獲准帶他的生病兒子到山區去休養，不要別人幫助，自行供養他們兩個人，結果十分成功。曾評論說這是社會主義，不是單幹，因為這位老人將一半多的收穫交給集體了。1961 年春，滁縣地區的全椒縣要求向這位老人學習。[13]

曾於 2 月 14 日回到省會合肥，召集省委書記處（成員），命令立即對承包制進行研究。他將承包制定性為保衛社會主義的一種方法。原則是移植工業的責任制，方法則必須與農民討論，可包括土地定產、責任到人、超產有獎、缺產有罰。在幾天之內，他派出四名高級幹部在合肥附近的獨山公社監督試驗承包制。他們要他注意 1959 年廬山會議後發表的攻擊包產到戶的文章與社論，曾不予理睬，說這只應

該使他們更仔細地研究這些問題。他一人對這試驗負責。這一新方法的保護傘的名稱是「田間管理責任制加獎勵」，簡稱「責任田」。這一制度在鼓勵恢復產量方面極為有效，群眾廣泛稱之為「救命田」。[14]

1961 年 3 月 7 日，曾兩次視察獨山以後，採取了對他說來是致命的步驟，即命令推廣這一試驗，並將之稱為「包產到戶，定產到田，責任到人」。這被認為是「包工包產責任制」的一種形式。同一天，他赴廣州參加中央工作會議。[15]

在廣州，曾向華東區的同事們詳細彙報了他的試驗。他似乎受到了該地區第一書記、左傾分子柯慶施的攻擊，曾打電話給他省裏的同事們，要他們暫時停止推廣這項改革。[16] 3 月 15、16 日，曾向毛彙報他準備如何做，主席說，「你們試驗嘛！搞壞了檢討就是了。」曾立即打電話給他的同事繼續試驗。[17] 但曾在廣州得到的信號是矛盾的，柯慶施轉給曾毛的信息是承包制只應作小規模試驗。[18] 由於這與曾親自從主席那裏聽來的話有矛盾——可能這是柯勸說毛加上的警告——這位安徽第一書記於 3 月 20 日書面向毛和廣州的其他高級領導人解釋他那個省正在做的事。[19]

要理解曾的論據，就需要瞭解安徽黨幹部在改革過程中所實行的制度。在建立高級社和公社以後，農民的基本收入是根據「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的社會主義原則來自勞動的。這一原則往往是通過工分制執行的，在河北省南部的楊儀（音譯）公社，兩名常住中國的西方學者看到，每個男子平均每日的工作定為 10 個工分。特別強壯的農民或很有經驗的老人工分高些，如 12 分，剛開始工作的青少年可能計七分，而婦女的標準分為 8 分。[20] 工分值事先是不知道的，要由收穫的多少來決定，但事先做出了估計，以可以預付的現金為基礎。當收穫量知道後，以大隊（毛規定應為生產隊）的總收入除以大隊成員所作工分總數，來確定工分值。每個農民按他所掙工分數獲得報酬。[21]

即便是根據以生產為重心的六十條，這一制度也極為複雜。1961 年 9 月，邯鄲會議上毛獲知，這一制度要求認字不多的農民保存準確

的記錄和賬目。關鍵問題是怎樣評定：一個農民在某一天是否幹足了10 個工分，還是他只是遊手好閒，這一問題往往要爭吵後才能解決。但是，如果為了鄰裏間的團結，不作評定，那麼就有危險，一個懶惰的農民會鼓勵其他人也變懶，因為這樣並不受罰。[22] 以前曾做過農民的人是這樣描述做「零活」的情形：

> 對這類工作，不管你幹得好壞，工分都是一樣的。但你必須幹滿固定的一段時間，人們幹活時一面笑，一面玩。例如，一天早晨，隊長可能說：「看到那一堆柴禾了嗎？把它搬到這兒來。這是個零活。」許多人慢慢吞吞地幹，搬的柴都不重。而一些老實人則搬的是重柴，但工分卻與別人一樣——每天10 分。[23]

只有當工分數是由搬的柴禾的數量來決定，農民才有多幹活的積極性。[24]

當然，鬆鬆垮垮對集體是有懲罰的，因為大隊的收入減少，工分值也就低了。但關鍵問題是勤奮工作、收穫多少與農民的報酬之間的關係並不十分直接，也不由個人決定，因而積極性不高。1961 年 9 月將核算由大隊下放到生產隊使村的收穫與村民的工作情況以及村的平均收入有了較密切的聯繫，但各戶努力情況與收入之間的關係仍然不太密切，不足以促使人們有真正的積極性，而且公社社員之間還有許多理由引起爭論。

據河北省西北部的一位中層官員說，農民有四「埋怨」：其他小組來得遲而他們那個組來得早；其他小組休息的時間長，他們的小組休息的時間短；其他小組歇工早，他們的小組歇工遲；其他小組的工分多，他們的小組工分少。因而，農民勞動時沒有積極性，仍然要小隊隊長挨家挨戶去叫他們出工。[25]

安徽與其他地方對這一制度的改革就是想要糾正這些缺點。政治上的難題就是怎樣做到這點而又不被指責為恢復家庭耕種，甚至是資本主義農業。安徽在廣州會議上就遭到這種指責。

曾希聖的辯護

曾希聖在 1961 年 3 月 20 日的信中提出了兩點辯護：省委抵制了群眾「包產到戶」的要求，「包產到戶」就是完全回到家庭耕種了；集體農業仍佔主導地位。據曾說，農民曾要求逐丘定產，逐丘定工。每戶根據各自的勞動力多少承包一定數量的田地。產量除以勞動量，得出每一勞動日的產量，從而可以確定工分。事實上，曾暗示，這最後一步是不必要的，因為產量是分給承包各戶的。曾說群眾贊成的這個制度的優點就是不必計算工分，只要計算勞動總量，這樣就使無能的官員不必去做他們做不到的事了。更重要的是，在這種制度下，不必去衡量工作的質量（全力以赴，還是沒有全力以赴）；以前只有幹部才關心產量，而現在每戶對此都有積極性。

曾承認這樣也有危險：即自私，競相要求對自己的田地有照顧，勞力弱和有其他困難的戶有困難。該省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是「五個統一」。其中最重要的二條是統一按小隊分配糧食和集體進行大型農田工作。個人與戶的活動限於管理農田與幹零活。積極性來自於如果農田產量高於定額，負責該田高產（如保證適當施肥）的家庭與在該田上勞動的集體成員可分紅。這一制度的核心是將農活分成大活與小活；這不是一般的包產到戶，更不是「單幹」。

最後，曾列舉的優點是：各戶保證的產量是現實的；目標產量是逐年增加的；出勤率大幅提高；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數增加，人們更關心農田；人人積肥，農民關心修理農具，人們不再僅僅關心自留地而是也關心集體的項目。[26]

曾這封信像他打給安徽的電話一樣是一場阻擊戰，用以緊急應付困難的政治局面。他並未能說服毛的秘書田家英。田將安徽的材料送給毛，附有一封動情的信，詳細講述了包產到戶對寡婦和農村其他處於不利地位的人的有害影響。這信給毛以相當的印象，他將這信在常委與大區第一書記間傳閱，[27]但沒有提出他自己的意見。[28]這時，曾有責任提出更正式的意見，意見在 4 月 27 日安徽的黨幹部給毛和其

他人的一份報告中。這報告與曾的信在用詞上的差異反映出在安徽還在實行的制度有實驗性和當時政治上的迫切需要，也反映出曾迫於當時情況，未能制定出深思熟慮的辦法。[29]

安徽的辦法不再被稱為「定產到田，責任到人」(因為這名稱的家庭耕種的味道可能太濃了)，而改為「包工包產責任制」，並稱這一試驗只是在3月6日才開始實行[30]，從而為這一改變找到了藉口。包工是計算某一塊地上農活的難易，將之分為大活與小活，大活由作業組幹，小活則交給各戶，而各戶則視之為責任田，由雙方簽訂勞動合同。然後計算出該塊土地的可能產量，稱為包產，也由作業組和各戶簽訂合同。再計算出主要農活與次要農活的報酬。這份簡短的報告結束時列舉了曾在信中所說的優缺點，但增加了一條缺點以預先防止政治上的批評：有些農民錯誤地將這新的制度稱之為包產到戶，或者說這是分田由各戶耕種。安徽省的這份報告聲稱這項新制度實際上並不是上述二種說法，而是完全符合六十條所主張的「田間管理責任制」。[31]

曾希聖的倒臺

無論曾希聖可能認為這些解釋是多麼有說服力的，但他卻不可能無視由柯慶施向他轉達的毛後來的想法，即安徽的試驗應是小範圍的。從3月15日決定推廣這一試驗，到曾於3月28日從廣州返回合肥期間，安徽省生產隊已有39.2%開始以某種形式實行這一新的激勵制度了。曾似乎凍結了這試驗直至4月底，因這兩個時期實行這制度的數字都是39.2%。[32]但是在7月12日，毛自南方返回北京途中在蚌埠停留時，曾根據他長達一個月的現場調查，再度向毛詳細地解釋了安徽的試驗達一個多小時。最後，毛勉強地說，「你們認為(那制度)沒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廣。」這位安徽領導人打電話給他的同事們，高興地指示加緊推廣。到省黨委在7月24日的書面報告對正在進行

的事做認真地、實質性討論時，自動採用新方法的小隊的比例已升到 66.5%；到 8 月中，達 70.8%，10 月中 84.4%，而到年底則達 90.1%。[33]

該報告顯然想盡量與中央的政策保持一致，又將該政策改名為「田間管理責任制加獎勵」。它強調集體的作用，降低家庭的作用；生產是由小隊包的，生產是按田定產的，大的農活是由作業組包的（包工到組），只有小的農活，如田間管理是包給各戶的，在前兩份報告中明顯地未提及大隊的作用，在這份報告中則寫入了。[34] 最後，曾又將這制度與國營工廠的制度相提並論，使之更具有合法性。[35] 然而，一眼就可看出，這報告中所述的制度與安徽省前兩份報告中所說的是同一種制度。曾希聖這位老黨員顯然是竭力在追求最後證明是相互矛盾的目標：拯救他的省和保持他的事業。

一位中國的歷史學家說毛同意這個試驗，只是因為他看到在 1961 年夏，甚至修改過的六十條也未能解決大隊核算制中的平均主義問題。他願意授權實行可能是條出路的任何試驗，但這不說明他同意這些方法。[36]

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毛在 9 月 29 日致同事們的信中做出了以小組為核算單位的重要決定。後來證明，這是他最後的讓步，一旦作出這個讓步以後，任何比這走得更遠的試驗都被認為是不可取的。[37] 在 11 月 13 日，中央委員會發佈了有關農村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其目的顯然是要使在安徽和其他地方實行的制度停下來。該指示號召鞏固和發展集體經濟，它雖然承認大躍進的五種共產主義的形式（譯按：即五風）對農民和集體經濟是有害的，但它警告不要將上述五種形式與集體經濟或公社的基本制度混為一談：

> 目前在個別地方出現的包產到戶和一些變相單幹的做法都是不符合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原則的，因而也是不正確的。在這類地方，應當通過改進工作，辦好集體經濟，並且進行細緻的說服教育，逐步引導農民把這些做法改變過來。[38]

我們不清楚從發出以小隊為核算單位的決定以後到公佈社教指示以前這期間的考慮過程。我們也不知道這一指示是在誰的提議下發出的。然而，鑒於後來發生的事，我們只得假設毛在討論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他的立場是常委同意的。到 12 月，毛在無錫試探性地問曾希聖，生產既已恢復，責任制是否應該取消。[39] 可能毛是給曾以明確的暗示，但曾要求允許繼續這一試驗，因為它還剛開始。毛沒有正式禁止，而安徽仍堅持試驗。[40] 但在 1962 年 2 月七千人大會上，曾希聖受到了全面批判，被撤銷安徽第一書記之職。[41] 劉少奇是被指定的擊球手。(譯按：借用棒球術語，指批判者)

在大會期間，劉有幾整天都與安徽代表團在一起。[42] 最後，在聽取了曾的自我批評後，劉宣佈了他的結論性意見。安徽的問題歸根到底來自它的第一書記，他是一個取得過不少成績的忠誠老黨員，但似乎是脾氣暴躁工作作風專橫的人。劉說，他和其他高級領導人長期以來就知道曾的個人缺點，但是，直到現在他才瞭解到這些缺點對安徽黨組織和安徽社會的影響，因為曾將安徽作為獨立王國來管理，不承認缺點，拒絕中央視察。[43]

劉強調曾不是因為安徽處於這樣困境而被撤職的；中央要對大躍進的政策負責。雖然其他省份的情況可能更糟，但他們是公開的透明的。[44] 雖然劉做了這樣的否認，但曾仍是個合用的替罪羊。他的撤職可能安撫安徽的幹部和人民，他們在大躍進期間和以後的饑荒中都受過他對省進行左傾領導的苦。安徽省委「負責人」也在劉少奇向七千人大會提交的書面報告中受到由於不民主作風導致相當程度破壞和浪費的指責。[45] 同時，解除曾的職務使毛清除了他認為不贊成他的農村政策的高級官員。劉譴責曾所犯的一個具體的政策錯誤是將中央允許在一個地區試驗的責任田制度在全省範圍內實行。[46] 像曾這樣的老幹部會對毛的指示採取這樣隨意的態度是很不可能的，但是曾也更不會敢於公開否認毛曾發出過這樣具體的指示。

安徽的黨回歸中央了。它召開了主要幹部會，在 3 月 20 日發表了一份屈辱的自我批評，承認責任田制事實上就是走向單幹的包產到戶制，並將錯誤歸之於曾希聖的領導。安徽省的這份文件稱，隨著在十二條和六十條上增加了以小隊為核算單位的指示，現在有可能解決勞動與報酬不相符以及小隊內平均主義的問題了。該檔規定了在 1962 年到 1963 年間糾正責任田制的方法。[47] 曾由李葆華取代（中國共產黨兩位創始人之一李大釗之子），劉對李做了高度的評價。[48]

來自基層的呼聲

曾被撤職並未使安徽的事結束。1962 年春末，安徽西南部貧困的太湖縣一名宣傳官員錢讓能向毛本人發出了特別呼籲。[49] 錢說責任田制是農民的創舉，是六十條和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重要補充。對農業生產來說，它就如魚得水，錦上添花。[50] 他描述了大躍進期間生產的悲慘情景，有些地區被毀滅了。中央委員會 1960 年冬對五種共產風的批評沒有多大作用，因為群眾已奄奄一息了；而幾個月後，在 1961 年 3 月開始實行責任田制，群眾勁頭鼓起來了，勁頭比土改以來任何時候都大。遭難地區有了生產，人員外逃變為移入，饑饉變為富足，健康取代了疾病，生命取代了死亡，婦女們又懷孕了。

錢列舉了該縣最貧困地區從 1960 年至 1961 年生產增加情況如下：糧食 81%（自留地不包括在內，一般地，自留地的產量更高些）；油料作物 750%；棉花 1100%；豬與家禽，百分之幾百。[51] 1962 年的情況甚至更好些。這不能全歸功於責任田制，也是中央委員會政策的自然結果。他提醒毛：「主席曾經說過，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實際事物相聯繫，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52] 錢明顯地感到自從 1955 年和迅速推廣高級社（這是在毛指示下推廣的，不過他沒有提）以來，生產一直走下坡路。1955 年是太湖縣最好的一年。

由於大躍進，要超過 1955 年的生產水準，還要許多年。錢也不得不表示對六十條的補救效果和以小隊為核算單位和責任田制的信心。[53]

錢為這一制度辯護的根據是他相信這制度解決了農民在集體所有制下的嚴重問題：即如何保證他們的個人利益。要提高效率，必須使人們有積極性，關心生產，明確責職。錢引用斯大林關於工業中個人職責的重要性的話，並評論這對農業更為適用，因為農業要複雜得多。在既耗時又複雜的工分制度下，人們是不會有這種責任感的。[54]

錢堅持說責任田制只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一種管理方法，它沒有改變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土地仍是集體所有，個人收入是按勞動所得，實行的仍然是集體勞動，只有複雜的、次要的的任務除外，更適合個人勞動。他強調說在任何社會主義的生產單位裏，集體生產與個人勞動總是並存的。[55] 最後，錢不同意安徽省關於修改責任田制的決議所說 70% 的農民對這一制度採取了無所謂的態度。他說 80 ～ 90% 的農民贊成這一制度，他請主席派人到安徽來瞭解真相。[56] 他的呼籲似乎未起任何作用，[57] 但是兩個月後，來自省的北部的另一基層資訊證明錢的分析是正確的。[58]

宿縣的富麗（音譯）區委的全體委員和所有黨員都同意責任田制從 1961 年 3 月宣佈以來使生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因此，在區委委員聽到 1962 年初省改變這制度的決議以後，他們都很焦急，似乎「在我們背上壓了一塊思想磨盤」。雖然幾次學習、討論了這決議，他們仍然不能理解它，[59] 他們進而以類似錢讓能的話解釋他們為什麼喜歡這一制度，不認為它是反社會主義的。不清楚的是這些官員是否受到當時在宿縣進行調查的中央委員會農村工作部的工作組的直接或間接的鼓勵寫信。工作組的報告，當月作為富麗區第一號文件，表面上是不偏不倚的提供事實的報告，卻明顯地傾向於當地的方法。[60]

想要維護這新的農業生產制度的人不僅是安徽的幹部。河北西北部一個專區的第一書記胡開明也寫信給主席。[61] 胡提出農民缺乏生產積極性的三個原因是：國家的收購政策、國家的價格政策及缺乏生

產責任制。由於經濟形勢不可能對前兩個原因有所作為，因此解決第三個原因是至關重要的。胡重複指出當前工分制的二個人所共知的缺點：太複雜（有 200 條至 300 條規定），爭議太多，如果按規定評分會引起埋怨。胡報告說在他召集的兩個會議上，幹部們意見一致認為從初級社到現在，評工記分從來沒有執行好過。他們發現不評分，而代之以平均主義的工分制要容易得多，而這樣卻意味著工作勤奮的小組受罰，而懶惰的小組卻得獎。[62]

胡說將工作與產量分開是不行的，他斥責各種包工制為空的。[63]他贊成的解決辦法是「三包」生產責任制，其要點是在自願基礎上組成很小的作業組，長期分配土地、牲口與農具給作業組，按可能產量、勞動量和需要的投資來評定土地。這種評定就是作業組向小隊做的三包。收穫以後，多餘的產量歸作業組按勞分配。

由於生產單位小，集體與個人利益的聯繫比目前的制度更直接，也便於互相監督。另一個好處是不用評工了。[64]胡小心謹慎地表明他反對包產到戶（不同於到組）——雖然如果農民堅持，他也願意接受包產到戶——說這樣，互助的優點就不能發揮。[65]他更謹慎地沒有提，當一個組分配其超產時，它可能是在個人或家庭承包某些農活（如土地管理或照看牲口）的基礎上進行的。

廣西經驗

對曾希聖的懲罰和安徽省政策的改變應該是一個教訓，可使責任制的進一步試驗停止下來。但這制度能很快地滿足恢復農村生產的需要，所以在許多省份都已興起。甚至在安徽改變農村政策的決議作出以前，中央已收到廣西省關於單幹的令人震驚的報告：參加農村會議的幹部中有四分之一的人讚成單幹；在富裕地區，單幹只佔 15%，但在受災嚴重的地區，或在大躍進期間五種共產風氾濫的地區，贊成的人數高達 60%，在柳城縣，65% 的幹部贊成單幹，其中有 4 人是公社黨委書記，另 14 人是公社黨委委員；在龍勝（各族自治）縣，42% 的

小隊已實行了包產到戶制。這些幹部認為單幹是他們的「總路線」，勸說別人倣傚他們。他們提出的理由是這制度解決了平均主義的問題，改善了生產，並且防止了壓迫。他們將集體化時期與集體化以前時期和自留地制度進行了對比，認為集體化時期不如後二者。[66]

廣西問題的解決與安徽的情況相比十分特殊。1962 年 6 月初，中央委員會中南區的兩位領導人陶鑄和王任重對龍勝（各族自治）縣的情況作了兩天視察，宣佈他們原則上強烈批判的單幹問題，由於當地對該名詞的不正確理解，被誇大了。陶與王將所看到的小隊活動分成五種形式，其中只有一種是明顯的單幹，不過另一種在沒有堅強領導下可能蛻變成單幹。他們的結論是集體經濟可以採取多種形式，只要堅持某些原則就行了。[67]

陶與王制定出區別集體農業與單幹的四條標準：主要生產資料集體所有；統一安排生產；集體勞動；統一分配勞動收入。這四條中，有三條是容易理解的，只有集體勞動這一條令人難解。因此陶與王解釋道，集體勞動的主要內容是小隊應該統一分配勞動，這並不意味著所有農活都必須集體幹。人力與任務必須相符。集體勞動與個體勞動都應是如此。合理的分工是社會主義發展的先進特徵，單幹是不能與之相比擬的。因此，人們不能僅僅從集體幹的工作的多少來推斷是否集體生產。為保證這四條原則得到執行，小隊應抓住六點：主要生產資料集體所有；統一生產計劃，農活和副業的生產職責統一分配；統一分配勞動；統一規定家庭向小隊上交的肥料數量（這或許意味著家庭可以保留部分肥料）與小隊統一掌握肥料來源；統一收割與分配收入；對困難戶適當照顧。[68]

在 1961 年廣州會議上反對包產到戶的陶鑄，[69] 他和王的分析及意見與安徽多次向中央提出的意見極為相似。曾早就抓住了強調下列幾點的重要性：該省各小隊實行統一分配收入，統一管理和分配勞動，集體所有制以及集體勞動仍是安徽農村的主要特徵。雖然曾沒有想到要有技巧地談到集體的優越性就在於它能將勞動分配給恰當的集

體勞動力或個體勞動力，但(曾說)安徽的路線與國有工廠內的制度沒有差別這一點就等於這樣說了。

借地

陶鑄與王任重想找出一條可以繞過意識形態的辦法。這種想法在中南區的其他省份表現得更為明顯。在湖南和河南，他們準備容忍借地給農民私人耕種。1961 年 8 月，湖南黨的領導向它的官員們指出有高達 600 萬畝（約合 100 英畝）的土地在冬天是閒置的。另有 100 萬畝受災的土地。這些土地可用來種植冬季蔬菜與作物，在春季收穫。如果集體不能全部利用這些土地，可以將部分土地借給農民，在一般地區，每人至多三壠，在饑荒地區，每人至多五壠。除非出現極度困難情況，這些土地的產品均歸耕種者所有，不得充作國家收購定額或減少(農民)糧食定量之用。湖南的通報強調這是允許人民生產自救的政策，應告訴幹部與農民這「絕不是分田到戶」。這些土地應交還集體供 1962 年春播用。【70】

從受災更嚴重的河南的經驗看，這嚴厲的警告是不現實的。在 1962 年 7 月，河南第一書記劉建勳（他被派至河南來解決由他的前任的極左造成的混亂情況）向大區領導人陶鑄和王任重寫了一封關於借地的報告，並要求轉給毛。劉報告說，由於連續幾年收成不好和嚴重的鹽鹼化，豫北和豫東的農民棄家出走，將衣服、傢俱拿到鄰省去換糧食。省的黨組織考慮緊急運輸國家掌握的糧食去，但最後認為這樣並不能促進集體經濟。也可能中央通知河南，根本沒有餘糧可用。這肯定可以解釋為什麼中央決定容忍河南的借地政策。得到陶鑄的同意後，劉建勳及其同事們決定向鹽鹼化嚴重、外逃人多、農用牲口大量死亡地區的農民借地並送種子。計委主任李富春同意免費供應 100 萬把鐵鍬以代替死亡的牲口。受災區集中在 4 個專區，共 22 個縣，約 400 萬人。每戶約可借地 6 至 8 畝，加上自留地，每人可達一畝（1/6 英畝）。河南也像湖南一樣，將這政策說成是讓農民生產自救。這一詞

彙在中南區已成為一個巧妙的詞，作為緊急措施的藉口。這些措施，按思想意識來講，是不可想像的。

這些政策，一旦採取了，似乎就生了根。5 月河南嚴重缺糧，早麥生長情況很糟。人人都很緊張，下級幹部建議借出少量秋糧的地，種上供 8 月收穫的一季紅薯。土地應及時交回集體供種麥用。省委又獲得中南局的同意，這次發現這政策十分得人心。這時所有的地區都要求實行。黨的官員們知道借地只種一季糧食會影響土地肥力，因為農民知道土地很快就要交回，就會設法從中取得盡量多的產量。因此，省委做出正式規定，所借土地，加上自留地，不得超過可耕地的 15% 至 20%，借地時間為 3 至 5 年。幾乎各地區立即實行較高的年限，政策乾脆就改為借地 5 年。所借土地的產品不屬國家收購範圍，但省委規定除集體勞動有報酬外，不再有定量口糧。困難家庭除外。然而，第一書記劉建勳估計每戶從所借土地只能收穫 150 斤糧食，比以前的定量要低。這樣，對農民來說如果他們能將（借地的）產量加在口糧上，投入額外的勞動才有經濟意義。

從劉建勳為撰寫七月報告所收集的統計數字看，顯然，下級幹部和農民將這新政策用到了極致。該省只有極少數小隊沒有借地。在鹽鹼最嚴重地區，借出的地和作為自留地的地總數達可耕地的 28.6%；在不那麼嚴重的、有 4,000 萬人的地區，比例為 16.5%，略高於限額；甚至在靠近像開封和洛陽這樣大城市的 5 個較富裕的地區，11% 的小隊報告借地比例為 20% 或 20% 以上；83% 的小隊則報告最高為 15%。

劉承認對政策已失去控制，但又為之辯護說這樣有成效。外逃已停止，許多農民已返回家園。農民積極性已提高，生產正向好的方向轉變。總之，集體已垮了，挨餓的集體成員們流亡去尋找食物，只有私人耕種的前景才將他們吸引回來，雖然劉不可能這麼說。[71] 結果，1962 年確實是河南的較好年份，農產品價值增至 1961 年的 115.4%。這是自 1957 年以來第一次產量沒有下降。[72] 然而，在 1962 年中，劉顯然感到他的地位在政治上不穩，只得承認問題；集體與私人耕種爭勞

力和肥料，人人都知道在這競爭中哪一方會得勝。他也宣佈措施，收回超過 15% 或不需要的借地。[73] 即令這樣，對省的大部分地區來說，3 至 5 年內，集體仍損失 15% 的可耕地，而要收回這些土地則需要巨大的政治努力。

地區差別

安徽的改革似乎不那麼激進。因此，很難理解為什麼允許河南和湖南實行的政策就不能應用於安徽，而安徽的經濟形勢至少與這二個省是一樣的困難。陶鑄與王任重對廣西危機情況的分析被毛認為是馬克思主義的，並且一度曾要它作為中央委員會決議的基礎。[74] 如果這種分析早先應用於安徽，曾希聖就會沒有錯。對南方諸省的不同處理可能反映了標準混亂或對可接受的辦法的看法有了變化。更可能的是，它們表明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內部就正確解決大躍進後農村危機的方法有對立的看法，也反映大躍進後中國共產黨權力結構在推進對立的解決方法中的重要作用。

雖然陶鑄和王任重在大躍進中也難逃其咎，但他們在廣西問題上的報告以及他們對河南和湖南所採取的行動說明他們現在將恢復作為首要任務。他們顯然在理論上有技巧，在毛眼中有地位，能將中南區的農業集體主義說成是包括某種類型的責任制。[75] 在華北地區，似乎也有類似的現實主義與寬容。胡開明的分析先是在地區的農業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來的，並且一定是被人們接受了，否則是不敢魯莽地呈交給主席的。這與對安徽改革的嚴厲判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對曾希聖說來不幸的是，他的上司，華東區的領導人是一個頑固的左傾分子，也是另一個受寵於毛的人，即柯慶施。他的名聲是與大躍進的集體主義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他從一開始就帶頭對他下級進行批判。[76] 他只批准過對責任制的試驗，而不是推廣。[77] 1961 年重建中央委員會（在地區）的局的意圖就是在大躍進分權以後加強中央對各省的控制。但是，農村責任制的問題意味著會出現一個意想不到的

結果，即賦予新區的首領，而不是中央，以對他們轄下各省事務的獨斷獨行的權力。

鄧子恢最後的爭辯

陶鑄和王任重的現實主義（如果不是能言善辯）在黨的高層機構中也有知音。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認為農村形勢很危機，僅僅譴責在全國各地方正在試驗的制度是錯誤的。雖然他在 50 年代受到了毛的粗暴對待，但他準備提出不同的觀點，這證明他的勇氣和責任感（也證明他不夠謹慎）。他可能認為毛最終已將權力交給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了。[78] 在 1962 年 5 月和 7 月的兩份主要報告中，他直率地提出了在 1960 年的十二條和 1961 年的六十條連續對農民做出讓步和採取以小隊為核算單位以後，農村繼續存在的問題。[79] 他贊成包產到戶，這是再次提出了他從 1954 年 4 月開始加快集體化進程以來所持的觀點。[80]

農村問題的表現形式是出勤率低、效率低，三個人幹以前一個人就能幹的活，漫不經心和裝病溜號。鄧子恢將這種普遍現象歸咎於繼續實行平均主義，以及隨之而來的積極性不高，再加上幹部有特權和管理不善。在農村，經濟持續衰退又加劇了這些問題。因而，全國有 20% 的農戶在實行不同形式的單幹，在一些縣則高達 60%。鄧子恢預計，如果不採取適當措施來解決這些問題，單幹還會進一步擴展。[81]

平均主義在土地所有制上表現得最為明顯。各村抱怨說，從 1958 年以來，農田中很大部分被建築、其他企業、官方機構、學校，甚至軍事單位所佔，而且迄今尚未歸還。鄧說但基本問題還要更深一些，可以追溯到毛在 1955 年 7 月 31 日發出動人的號召以後匆忙實行的集體化。

鄧的理由是，在 50 年代初土改中分配的土地是以合乎法律的方式分配給農戶的，因此，也是分配給他們所居住的村子的。初級社以後的組織形式往往涉及一個村子，對基本形勢並無影響，因為農民仍保

留了土地的所有權和如農具和牲口這樣的主要資產。雖然這時一個村子的農民所有土地往往是被另一個村子擁有的土地所包圍。

毛在 1955 年中拒不接受鄧提出的警告，這意味著對中國大部地區來說，初級社只不過是暫時的中途站而已。而且往往不僅如此，幹部匆匆地將農民趕進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社，以此來證明他們的「紅」。剛在土改中獲得的土地成了合作社的財產。這些高級社下屬有幾個初級社。新的農村領導在下屬各村中重新分配土地，以達到簡單、有秩序和平均的目的。土改時，對財產的分配是按村子的人口進行的，而這時是按幾個村子的勞動力來分配的。其結果是好地換成了壞地。三年後以更甚的匆忙建立公社時，這一過程又繼續推行了，土地的重新分配是根據平均原則進行的。人們對改變農村土地所有權是有怨言的，但影響不大，因為在一個公社之內，對所有的農民在名義上是一視同仁的。

管理權力和最近核算權力下放到小隊使這問題重新突出了。小隊大多數就是老的初級社——如果該地區認真經歷了建立初級社時期，就應該是初級社。全國小隊的成員們突然發現 50 年代初的以村為單位的情況已不存在，而在大多數情況下，新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使有些村子比十年前的情況糟得多，而有些村子則好得多。既然現在小隊（村子）要自負盈虧，這個意義就大了。

鄧子恢指出，大躍進後的政策中含有將公有和私有財產都歸還原主的規定。但劃線的時間是 1957 年，而 1957 年已造成了損失。他指出應以土改為解決土地問題的基線，並要求制定法律，中央莊嚴承諾農村的新措施 30 年不變。這樣，幹部就不得不承認（農民也會相信）新的解決土地的辦法不僅僅是臨時性的、令人懷疑的便宜措施，可以開始根據這個承諾行事。[82]

平均主義的第二個方面是與糧食有關的。這方面的平均主義使農民不高興，挫傷了他們生產的積極性。鄧在一年的調查中發現，在許多省實行的五種分配糧食制度中，有三種他認為是有缺點的，因為它

們使農民失去或很少有積極性。最壞的一種是僅按年齡分糧的，不論一個農民幹得多努力甚或者是否幹活，他仍能分到與他同一年齡的任何人一樣多的糧食。鄧贊成將三種分糧方式結合起來的辦法，即基本口糧、勞動糧和照顧糧。小隊糧食中約有 1/3 是以每月 20 至 30 磅的基本糧的形式分配給基本上無勞動力的人；另 2/3 則按工分分給幹活的農民（他們不分基本糧）；另提出 5%（照顧糧）分給有需要的人、長期有病的人、孕婦和革命烈士家屬。【83】

在評工上也盛行平均主義，因為這樣簡單些，也較少爭論。評工是不考慮難度和強度，也不考察工作的質量的，如果考察，也只是粗略的。這樣做一部分原因是為了避免爭論，另一部分是因為年輕的隊長也沒有能力去評判。沒有恰當的制度，沒有固定的或普遍使用的驗收制和獎懲制。這樣，那些幹得慢但幹得細、質量好的人所得工分要比那些幹得快但不細的人少。到產量能表明誰幹得好時，工分早已分下去了。【84】

鄧和 60 年代初許多其他關心中國農村的官員認為效率問題的關鍵是怎樣向農民灌輸在日常勞動中的責任感。答案是要有激勵機制。激勵當然是 1961 年和 1962 年爭論的各種責任制中的基礎。鄧引用了 1957 年的一份決議，在新的高級社內，實行包產到隊、包工到組、田間管理包到戶。田間管理包括除草、施肥，並保證澆足夠的水。這個制度可能是鄧提出的，在大躍進的熱潮中，這制度被取消了，但在全國各地都有恢復的跡象。【85】

鄧稱，要使集體經濟獲得成功，必須使農民有積極性，而做到這一點的唯一辦法就是責任制，在責任制下分工合作。【86】他像其他人一樣，以工業作類比：沒有責任制，工業不能運行；農業也如此，必須按勞分配；報酬應明確合理；必須評工記分；必須嚴格履行職責；必須有政治工作。【87】

鄧子恢從他視察的各地中舉出具體例子。一個突出的例子來自廣東山區的一個大隊。當時的大隊長在 1955 年任小隊長時，日出時敲

鐘。但農民在上午8或9時才起床到地頭去，11時左右就返回。他很快就認識到這種方法不行。因此，他規定每人必須工作8小時，否則就扣工分：人們就整個時間全呆在地裏，但工作拖拉，8小時的工作量只相當於3小時的緊張工作量。這隊長的第三個辦法是確定職責。但時間靈活，人們可以自由來去，不用敲鐘打鑼。這樣效果好些，但工作的質量有影響，農民只注意多掙工分。目前，他的第四個辦法很成功：完成定量可得8分，按質量可再得2分。[88]

從鄧子恢舉出的這個和其他例子看出，顯然，包產到戶（特別是當所有土地全包出去的話）是他的理想，只要超產有報酬就行；最少，超產的80%應歸各戶。在這種情況下，家庭所有成員早早就起床，摸黑到地頭，對集體的土地也精心照料，多施肥料，像對自留地一樣。鄧說這不等於單幹，因為土地和生產資料是集體所有的；但他承認必須有堅強的政策領導，因為這樣有墮人個體經濟的危險。[89]

另一個重要的激勵方法是保證農民有小自由。由於十二條和六十條重新肯定了自留地，農民對飼養家禽和其他牲口積極性很高，副業也恢復了。當主要的生產資料仍是人力和獸力，不是機器時，小自由促進了責任感，只要社會制度的主體是集體和國有經濟，政權在中國共產黨手裏，就沒有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鄧認為將分給各戶作自留地的土地從六十條的5～7%增加到10%（一些地區已經這樣做了），不會有問題，並提出再分配一些土地供種植草料用。他甚至贊成借地給各戶，時間長達5年，特別是在災區。以各種名目分給各戶的土地總量不應超過可耕地總量的20%，這樣就不可能會有資本主義的危險。對那些認為有了自留地就不關心集體土地的人，鄧指出，大躍進期間，一切個體活動都取消了，但農民幹集體活的出工率卻很不令人滿意。[90]

鄧子恢除了注意增加積極性，還注意減少打擊積極性的措施，這就是過量的收購負擔。他說，由於幣值不穩定，當前的收購糧類似蘇聯內戰時期的強迫收集餘糧。此外，農民的產品沒有公平地得到相當

數量的消費品作為報酬。鄧提出了兩條建議。5月，他提出將國家收購糧數定在3,500萬噸，3至5年維持這一水準不變，在貧困地區甚至可維持10至12年不變；到7月，他將收購數減少至3250萬噸，分為稅糧1,250萬噸，收購糧2,000萬噸。至少對那些為市場生產了大量糧、棉但感到壓力的400個縣，應該固定定額。鄧的第二個建議是發工業券，可用以交換消費品和其他成品，因為國家只能生產價值相當於農民收購糧的30%的貨物。另一個辦法，是以糧換物比如棉花。要從農民取得更多，最好將負擔定得低些，一段時間內維持在該水準上（「定輕定死」）。[91]

此外，國家與農民的交換還可以輔以農村集市。據鄧說，農村市場僅在廣東和廣西很活躍，因為，在這些省裏，除去米與麥，糧食和熟食是自由交易的，而在其他地方則是嚴格控制的。在全國其他各地控制的結果是黑市猖獗。[92]

最後，鄧談到與農村幹部有關的問題：特殊照顧和管理不善。鄧發現大隊和小隊幹部往往比一整天在地頭幹活的農民多掙14%；有些幹部一年公職就掙600個勞動日。如果他們晚上開會或去檢查，則再加10分。農民說共產黨養了一批懶漢，他們的勞動積極性受到了影響。鄧提出限制有補貼的幹部數量，並限制補貼，大隊幹部最高150個勞動日，小隊幹部最高30個勞動日。如果不進行這些改革，這些幹部就會成為修正主義的基礎，中國在20年內就會變修。[93]結果證明，鄧子恢說的時間是正確的，但他的假定卻是錯誤的，他假定在20年內，存在一個扶持農民資本主義的有特權的幹部階級仍應被視為社會主義的失敗。到80年代初，鄧小平政權在追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宣稱「致富光榮」時，農村幹部一邊監督著集體農業的摒棄，一邊仍把持他們的特權，以新的方式高踞於農民之上。[94]

然而，回到1962年，幹部並不需要顯示出經營才能來證明自己應該處於這種地位，而只要遵照上級的指示辦事就行。鄧子恢認為這些似乎在政治上忠誠的小隊和大隊幹部的經驗遠不如過去地主和富農的

管事。舊制度是值得倣傚的，但現在處於領導地位的是有經驗的老農而不是僱用的工頭[95]。

鄧子恢的估計顯然與下層官員的估計大部相同。這並不奇怪，因為他和他那個部的官員們一直在徵求小隊長和其他人的意見。他的幹預比陶鑄和王任重的活動影響更大。作為中共農村工作部部長，雖然他在近年來的作用大為削弱了，但鄧的權威和經驗在全國（而不是地區）範圍內是起作用的，有利於在饑荒面前進行影響深遠的農村改革。

更為重要的是在高層有支持鄧子恢的人，這種支持可算是一種勇氣，而在其他人看來則是一種魯莽。6月底，在中央書記處聽取華東地區的農業官員解釋他們壓制安徽試驗的理由的會議上，[96]鄧聽到陳雲和鄧小平表明贊成包產到戶。雖然在這問題上還是有不同意見的。也就是在這個會議上，鄧小平同意安徽農民的一個說法「不管白貓黑貓，能抓老鼠的就是好貓」。後來人們將這句話與鄧小平的名字牢牢聯在了一起。7月初，陳雲向毛和其他高級同事提出包產到戶。[97]甚至在政治上小心謹慎的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在到過安徽以後也贊成包產到戶。[98]

這是對鄧子恢提出的改革的巨大支持。實行其中的一些改革也就意味著承認1955年至1960年紅紅火火的集體化和公社化的過程（這是1949年以後毛的最大的成績）變成一場災難，而說明公社性質的主要口號（一大二公）的根據是有嚴重缺點的。[99]毛似乎感到別無選擇，只得批准在當地、一事一議的基礎上，對公社制度進行大幅但暫時的改革。這樣可以盡量減少政治影響。但贊成鄧子恢的計劃就證明在全國範圍內有了重大的失敗，因而是不可容忍的。幸而，當時情況給毛提供了一個反對鄧的意見的根據。

第十章 恢復統一戰線

鄧子恢在集體化問題上的直言無忌反映的不僅是他個人的勇氣，還反映了自從大躍進結束，特別是七千人大會以後政治氣氛的改善。政治上的變化和經濟上的必需使中國領導人重新重視專業知識併力圖帶來新的百花開放。由於中國知識分子、專業人員和經營者大部分都是非黨人士，也就是非共產黨員，[1]而且往往有「複雜的」政治經歷，這就意味著要恢復「統一戰線」的政策。這些人在 1957 年反右運動中曾受到過嚴重傷害。中國的 8 個非共產黨，或「民主」黨派，也是中共統一戰線的夥伴的許多領導人與其他總數達 50 多萬的人受到過批判。[2]此後，大多數非黨人員害怕說話，雖然在大躍進中期氣氛比較和緩，在 1958 年主要右派分子能夠、也願意對中共的所作所為提出過批評意見。[3]

1959 年反「右傾」鬥爭又引起了人們的憂慮。這鬥爭原來只是黨內的運動，但許多左傾人士卻將它當作也是攻擊非黨人士的一個機會。[4]小心謹慎的資產階級分子的口號是「三看三不說」：看風向，如果對上層的風向看不清楚，就不要說話；看眼色，如果領導人的眼色不對，就不要說話；看意圖，如果領導人的意圖不清楚，就不要說話。[5]

這種畏懼情緒使中共統戰工作部部長李維漢的工作複雜化了。李早在 1959 年 12 月，在劉少奇的支持下，就與資產階級工業家和商人交朋友，要他們在中國越來越困難的經濟形勢下提供幫助。[6]據李的調查，這些人士的主要構成如下：71 萬商人，其中 55 萬，即近 78%，在公私合營的商業與工業部門中的投資不足 2,000 元；1 萬多工程技術人士；約 15 萬中、大資本家，其中 7 萬人在舊社會僱用工人數在 10

人以上。許多富裕的民族資本家與知識分子是民主黨派成員。民主黨派領導人在中共的領導下，與中共精英有來往，其下有 5,700 多個支部，李估計其中有 80% 在政治上是「好的」或「比較好的」。[7]

1961 年李對這些支部進行了一系列調查研究，結果傳達了一整套指導方針以消除當地機構中樂於「拔白旗」的左傾主義。[8]（這形象說明中共高層在制定政策過程中，有時有意見分歧和混亂。常在統戰問題上作發言人的周恩來和陳毅竟不知道拔白旗不是像他們以為那樣是基層組織想出來的，而是出現在一份中共檔上的。[9]）

該年夏天，在毛表示反右傾運動面太寬了，建議有錯就給予平反。[10] 鄧小平告訴李維漢，中央已決定，在反右傾運動中，縣及縣以下受批判的人一風吹，縣以上的人則逐一重新審查。[11] 李據此在統戰工作部建立了一個小的工作隊，規定了為改善中共與黨外人士的關係必需做的事。他自己幫助上海黨統戰工作部起草了類似文件，但遭到該市左傾的第一書記兼政治局委員柯慶施的反對。最後，在 1962 年末左傾主義再次抬頭時統戰工作部的草案無聲無息了。[12]

信息中斷

恢復統一戰線有一個主要問題，這就是隨著大躍進危機惡化，非黨人士就被置之局外了。在 50 年代，他們還能聽到或讀到領導人的講話；尤其是周恩來每年向人民代表大會作的政府工作報告總是出版的，它至少也是經過過濾的國情報告。但在 60 年代初，中共領導人顯然決定不將壞消息向非黨人士透露，[13] 更不要說普通的老百姓了。可能是出於難堪，也可能是害怕傳到海外去。即令在 1962 年領導人開始又對信任的「民主人士」講話，這些講話也是不出版的。[14]

中共主要宣傳機構《人民日報》的編輯方針說明在緊接著大躍進以後他們氣餒了，並且失去了方向。當中國的宣傳工作者創造了「經濟，蠢貨！」這一口號時，[15]《人民日報》將社論的數量減少了，而將各欄的中心轉移到外事上去了。[16]

由於《人民日報》的社論是中央告訴廣大人民，包括大部分非黨人士它對所有政策問題的想法的主要工具，這種自我審查意味著在官僚權力圈子以外的人們都不知道毛和他的同事準備怎樣來減輕國家的痛苦。如果有頭腦的中國公民懷疑中共的沉默反映了高層對之沒有明確的辦法，那麼這種想法由中共的報紙予以肯定了。

1958 年，當毛非常注意中東危機並在台灣海峽發動了對美國的重大對抗時，《人民日報》社論只有 31% 多一點是關於國際事務的。1960 年，毛自己說領導層花了大量時間在中蘇爭論上，[17] 這時報紙的社論有 28% 以上是關於國際事務的。這一比例說明領導人認為中國人應該關心的是中國的事務。但在 1961 年中國人迫切需要在國內事務上的指導時，有關國際事務的社論所佔的比例卻增至 46.9%，而 1962 年又增至 59%。在中國領導人正確地決定恢復農業生產應優先於其他事務時，談及與農村有關的社論數量卻從 1960 年的每月 13.66 篇降至 1961 年的每月 5.5 篇，1962 年又降至每月 3 篇，1963 年只少量增至 3.3 篇。

1961 年人們原期望《人民日報》應對播種、積肥、水土保持、養豬和收割有許多及時的指示，但人們知道的卻是英國在科威特的「武裝入侵」，推遲簽訂與德國的和平條約以及在東京勝利召開的反核武器的會議，還要人們記住蒙古與古巴革命的週年和老撾愛國的政變，並歡迎來自巴西、古巴、加納、尼泊爾和北朝鮮的貴賓。即令我們同意領導人意識到中國作為世界革命的最後主要堡壘應該在國際事務中起更突出的作用，在國內有危機時刻，這樣著重使用「第一講壇」也是不正常的。[18]

周恩來的努力

但是如果領導人認為對「廣大群眾」的指導工作可以由通過內部管道瞭解情況的黨的幹部去做，那麼不將國家的總形勢告訴高級黨外專業人員，就不可能得到他們的合作。因而，重新召開了有黨外人士參加的國家機構（的會議）。劉少奇於 1962 年 3 月 21 日召開了最高國

務會議——這是由國家元首在他認為合適的時候召開的、由他指定的人參加的[19]特別機構。這是二年半以來第一次。毛在任國家元首的四年半期間共召開了15次最高國務會議，他往往利用它作為主要講台，向非黨的高層人士傳達政策。[20]劉任國家元首已3年了，但以前只在1959年夏末召開過一次。

這次，劉作了坦率的講話，再次談到七千人大會和西樓會議的結論，詳細講到國家的經濟問題和共產黨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據說聽眾都為劉講話的主要內容所感動，而無疑也感到放心，因為他認為所有黨外人士對這次危機不應負主要責任。[21]

但恢復統一戰線的主要責任落在了周恩來身上，他在1962年春季作了四次講話來處理這事，第一次在北京，第二次在廣州，以後在人代會和政協。[22]這兩個組織已有2年沒有開過會了。毛對劉和周處理這些會議的方法很滿意，認為他們已補救了中共近年來對黨外人士的疏忽。[23]

3月2日，周對廣州召開的全國科學與作家會議的聯合開幕式上作了主題講話[24]。他開始時以討好和友好的口氣說：

> 今天能有機會和全國高級的優秀的有成就的科學工作者、戲劇寫作者聚在一起談一談，對我個人來說是很高興的事。因為時間關係，我只談一個問題：知識分子問題。這個問題也包括我在內，我也是知識分子出身，談起來會更親切些。[25]

在簡短的論述知識分子是腦力勞動者的一個社會階層後，周對他的社會出身和思想成長作了簡要的介紹，以此證明他和他的聽眾一樣都來自中國過去的封建社會。他出身於官僚家庭，在兒時拜過佛，後來則信仰過無政府主義，喜歡過費邊社會主義。[26]總之，我們必須承認的事實是：我們都來自舊社會，不論我們現在是什麼人，在過去，我們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27]周借這個機會感謝張申府，張介紹他加入中國共產黨，從而使他脫離了資產階級環境。張幫助李大釗在北京建立了馬克思主義小組，但很快就脫離了共產黨，幾十年都是黨外

人士，1957 年被打成右派。聽眾中熟悉黨的早期歷史細節的老黨員認為他提到張就是個突破，說明這是一種新的實事求是。[28]

但周接下來的話便不那麼實事求是。他說，中共一貫強調與知識分子結盟，因為——在這裏，他引用百花齊放時期（1956-1957）毛和劉的話——知識分子中大多數是愛國的並逐漸相信社會主義的。雖然進行了反右運動，但總的評價並沒有變，然而，有些中共黨員並不瞭解這些。但知識分子必須改造自己，才能逐漸消除由於出身帶來的資產階級思想。[29]

周然後轉到中共應怎樣領導知識分子的棘手問題。這曾在 1957 年有過大量討論。[30] 中共應對總的方針、政策負責，中共能夠在政治、思想和組織上進行指導，但不應干涉具體業務工作。中共應該相信和幫助知識分子，改善與他們的關係，解決他們的問題，承認並糾正錯誤。知識分子則應繼續自我改造。[31] 這是周恩來專為知識分子聽眾而作的一篇出色講話，說理而不是粗暴、強調一貫的共性，不談過去的分歧，訴諸愛國主義，盡量減少階級鬥爭。

在以後的四個星期內，似乎大家都認為周表現得更友好。3 月 28 日，總理在向人民代表大會講話中說絕大部分知識分子都為社會主義服務，聽黨的話，他們屬於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這是令人安心的話，但很難說是保證，因為周並沒有進而稱他們為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毛在 1957 年時還比較溫和，周引用毛那時嚴厲批評中共黨員不能正確對待知識分子的黨員的話，並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中共的主要目標。[32]

在這次會上，總理談到了統一戰線內的各組成部分。在轉而談到少數民族時，周對西藏的「民主改革」表示滿意。在西藏，社會主義改造在 1961 年 4 月就停止了，[33] 但他承認在有些少數民族地區，幹部們違背了黨平等對待所有民族的政策，導致了不必要的傷害。確實，不久在新疆少數民族就出現了重大事件，這些事件可能證實了周的分析，雖然人們輕易地將這些事件的責任歸之於自治區裏的蘇聯領事館

的挑撥。4 月 16 日，中蘇邊境三個縣——塔城、裕民和霍城——的 6 萬名哈薩克人開始遷到蘇聯，無疑他們希望生活在同民族之間，條件會更好。在下個月，即 5 月 25 日，在伊犁發生了叛亂，人們又將這歸之於蘇聯，也可能反映了漢人沒有正確對待新疆少數民族。[34]

周還在講話中簡短地談到華僑和宗教徒，強調了中共決心嚴格執行政策。[35] 該年底，中共批准了如何改善與華僑、少數民族和總的統一戰線工作的詳細報告。[36]

但是，在人民代表大會上，唯一從周恩來那裏獲得承諾可以得到物質利益的是「民族資產階級」或商人。1956 年初，他們的公司就已成為公私合營企業了，當時向他們允諾付息 7 年，即他們資產的 35%。在 1957 年百花齊放時，有些資本家要求有更長的贖買期，即 12 年，甚至 20 年，這樣政府就能給他們以 100% 的補償。在反右運動中，這一要求遭到了批判。[37] 當劉少奇在 1960 年初向資本家示好時，他在這個問題上非常小心謹慎，什麼也沒有承諾。[38] 而現在，周能夠告訴他們政府「已決定」再延長贖買期 3 年，以後再研究這問題。[39]

周在 4 月 18 日的政協會上，對 897 名代表作了最長的關於統一戰線的報告[40]。政協是體現「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機構或「組織形式」，可追溯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41] 因此，在這個傳達政策的講壇，周告訴委員們統一戰線又取得「新進展」，也是適宜的。[42] 他所說的改變就是從強調社會主義改造改為強調社會主義建設；換句話說，中共願意放鬆思想改造，以換取非黨人士在與當前經濟危機的鬥爭中的積極合作。按照毛對七千人大會講話的口徑，周也提出了「擴大民主生活」的前景，條件是人們不違反毛 1957 年有關矛盾的講話正文本中提出的六條標準。[43]

周具體地要求政協委員們更多地進行調查、研究和學術討論。這表明中共已重新認識到需要有對政策執行情況的獨立的反饋。周恢復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政策，這恰是毛在 1956 年為此目的而提出的，雖然他的追隨者們嘖有煩言。[44] 雖然對這問題，周說的比在人

民代表大會上說的要長，但他並沒有做更多的讓步。他所能做的就是要求他的聽眾信任他；老的路線在新的政治氣氛下有新的意義。但資產階級在經過長時期的粗暴思想改造後能相信周的第二手的政策麼？李維漢於5月召開了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希望得到一個正面的回答。[45]

百花齊放與爭鳴

在1962年，像在1961年一樣，統戰工作的主要內容是對資產階級友好的中共領導人，如周和陳毅，繼續努力恢復百花齊放政策。[46]周在這問題上的三篇主要講話（中華人民共和國作家和編者出版或引用的）中二篇是在這二年中講的，另一篇是在1959年講的。[47] 1962年2月17日，周在北京對有100多名劇作家參加的會議作了講話。[48]

週一開始就承認有些省和市的領導人不肯傳達他1959年的講話。[49] 這一承認並不能使他的聽眾們放心。然而，他下面所說的話與他8個月前對該講話的評價形成了對比。1961年6月，周表示了不安，雖然他沒有透露省的官員對他的講話進行了抵制：

> 我在1959年關於文藝工作兩條腿走路方針的談話，從今天水準來看，也不一定都是對的，裏面也會有過頭或不足的地方。使我難過的是，講了以後得不到反應，打入「冷宮」，這就叫人不免有點情緒了。這次你們要求談一次，我就談一談。心有所感，言之為快。但不可能什麼都講對了……。[50]

現在，在1962年2月，他的信心大為增強，他只簡單地說，他那天重看了1959年的講話，認為內容「基本正確」。[51]

這位總理的這番話說明大躍進引發的左傾氣氛甚至對非常高級的領導人也造成高壓。周在1959年講話時，正是他的權威由於受到毛的批評和將對經濟的控制權轉交給中央書記處或省而受到削弱時。[52] 雖然他講話時，大躍進曾有短時期的理性表現，但左傾主義並沒有被遏止，可能像上海第一書記柯慶施那樣的大躍進積極分子感到拒絕向他

權力範圍內的許多知識分子傳達在他看來是顛覆性的檔是完全符合時代和主席精神的。[53] 1959 年講話遭抵制時周的反應，和 1961 年他的檢討都說明，雖然大躍進已正式結束了，他還不能完全肯定政治氣氛已有了根本轉變。而他在 1962 年有信心地重新肯定他 1959 年的講話，以及他願意以一笑置之態度對待那次講話不被傳達的命運，一定是反映了他的新的信心，這種信心從他引用毛的講話不多也可以看出。[54] 這只可能是十天以前結束的七千人大會的結果。

但是對他 1962 年 2 月講話的聽眾來說，(他們有些人可能前面兩篇講話都聽過）還需要小心對待這次講話。中共第三號人物，在國內、國際享有威望的人的有關知識分子政策的重要講話竟然曾像一個縣委書記的講話一樣被冷落。如果甚至周都能被一系列的事件弄得手中無權，那麼知識分子勇敢地響應他的建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又有什麼用呢？

周說文學藝術領域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這話是用來強調他所傳達的信息的。他按年份大致勾畫出一份大事記，有的年份有重疊處。[55] 周說從 1949 年到大躍進是第一階段，其特點是對問題不熟悉，對來自舊社會的東西應該保留什麼不清楚。由於百花齊放政策，創造性激發了，認識提高了，人們敢想、敢說、敢幹、敢於丟棄舊的，引進新的，直至 1957 年反右運動。

周的第二階段似乎始於 1959 年秋的反右傾運動，他稱之為「在執行總路線中，在具體工作上的偏差」，這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一切領域。然而，周將主要責任歸之於藝術本身的發展。新的迷信取代了舊的迷信。反對所有舊的都比新的好，所有洋的都比中國的好的迷信是正確的，但現在又說是所有新的都好，舊的都不好，所有中國的都好，所有洋的都不好。這不符合毛澤東思想，這種思想是本世紀初義和團思想的翻版；但義和團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的，而目前恢復排外主義則有「大國沙文主義」的味道。[56]

周也反對新的局限性，體現在僵硬的人物塑造上，這就是說黨的書記或反動派只能用程式化的、政治上正確的話來描繪，這使批評家和負責文化的黨的官員的工作大大輕鬆了。爲了表達他的意思，周批評了他的「老朋友」，傑出的作家曹禺。他在抗日戰爭的重慶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是勇敢的。曹在 1959 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應該更為勇敢，但以他最新的作品與以前的作品比較，他好像受到了更多的限制。[57]

周聲稱文學和藝術現正進入第三階段，這就是「否定之否定」。這是恩格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個貢獻。周這個說法極不符合他一貫的風格，甚至有些冒險。周是利用這個理論上的裝飾以達到實際的目的，他要作家們回到被他描繪為玫瑰色的早期去並重新激發出勇氣來。[58]

黨的領導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周引用在 1958 年 1 月發表的毛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說黨委應將專業事務讓專家去負責。總的說來，黨的領導是成功的，但在基層，成績與錯誤的比例並不總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周婉轉地問，在文學與藝術領域裏，不也有這種現象嗎？錯誤應以自我批評來糾正，黨委應聽取別人的意見；在這裏，周重複了毛在兩周前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漢朝開國皇帝劉邦取勝的秘訣就是他願意聽取意見。人民是高度信任黨的，但這不是說他們信任每一個黨員，也不是說每個黨委的工作都是正確的，非黨人士應該說話來幫助改正錯誤。[59]

周也譴責了黨委領導人的「新政治緊身衣」，他們不會寫作，但簡單地貼「保守」或「右傾機會主義」的標籤。這導致文藝工作的公式化和庸俗化。中央對此負主要責任，各省負次要責任，但各單位的黨委也難辭其咎，有些要改組。隨著民主的實行，正確意見就會提出來，就有可能實現毛在 1957 年提出的目標，即創造「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的政治局面」。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否定的否定。[60]

周然後轉而談到作家的具體問題。他們應該表現出「時代精神」，但這並不是說中共的政策和決議應該出現在舞臺上。正如毛所說，如果戲劇像會議一樣，那演戲有什麼意義呢？也不是所有的人物都必須是英雄；每個人都有局限和缺點。周還說，「沒有絕對正確的人」。[61]在文化大革命中，如毛同意的話，這句話就可能成為紅衛兵批判的對象。

周承認寫人民內部矛盾要比寫敵我矛盾難，因為後者可以用公式化的方法來處理。但是日常生活主要是內部矛盾，必須描寫它們。周當然知道（雖然他沒有說出來）作家必然擔心官員們會對這些內部矛盾的「不正確」分析而不高興，因為許多這些矛盾是來自幹部的缺點和局限性的。周在談到文藝與歷史的真實時，向作家們提出應如何對待無產階級的缺點。但作家們並未從他的講話中得到保證。他說他反對人們像被清洗的胡風那樣去描寫人民，[62]胡風到天津去搜尋無產階級的缺點。而應該倣法高爾基那樣描寫了工人們的缺點、錯誤，但將它們歸之於舊的制度。

事實上，雖然周熱情鼓舞地談論民主，雖然他聲稱已經開始否定新時代的錯誤做法，他對作家的安慰實際上是冷冰冰的：「即令所有窗戶都打開了，二個階段的迷信都驅除了，作家自己還需要自我教育——思想上的和藝術上的自我教育。」（譯按：按英文譯出）[63]總之，雖然像周和陳毅這樣的領導人對作家們是持同情和幫助態度的，但歸根到底，作家還要負起責任，在藝術上的真實與政治上的生存之間做必要的妥協。

陳毅鼓起了勇氣

人們推斷周恩來在北京對劇作家所作的比較大膽和樂觀的講話的根據是七千人大會的精神。而陳毅在廣州對全國劇作家會議所作的馬拉松式的講話[64]中同樣承認：「我參加了七千人大會，我才敢講……今天中央已決定要主動改善同作家和科學家的關係。」[65]陳毅的半官

方傳記證實這段講話不僅是口頭上說說而已。該傳記說有人認為陳膽敢作這篇講話是由於毛在七千人大會上作了自我批評，並評論說這樣想是有根據的。[66] 似乎陳在準備講話時並沒有徵求高級同事的意見，只是在講話前兩天，周恩來離廣州赴北京時，將講話要點告訴了周。在周批准這講話大綱時，[67] 他也不可能預見到會有如此壯觀的場面：有 60 次被笑聲或鼓掌聲所打斷。在知識分子的記憶中這次講話是陳在處理文化事業方面最輝煌的時刻。[68]

陳一開始就以長篇幅談到黨與知識分子關係的總的情況。他的判斷是：「很不正常。」在大躍進期間，科學家對荒誕的提法和運動一言不發，怕被扣上保守的帽子；在有人發誓要在一晚上寫 60 個劇本時，作家們只得默不作聲。如果黨當時願意傾聽意見，可能國家就會少走些彎路：

> 昨天我在科學家會議上說，今天重要的是我們應該培養科學家。他們是人民的知識分子，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人民的工作人員，用腦為人民服務的工作人員。（譯按：這一段按英文譯出）——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是我們國家勞動人民中間三個組成部分，他們（也）是（我們社會的）主人翁。不能夠經過了 12 年的改造和考驗，還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頂帽子戴在所有知識分子的頭上，因為那樣不合乎實際情況。[69]

陳說思想改造是個長期過程，應該自願，而不是通過運動來進行。他建議所有做黨和行政工作的人進行反省和自我批評。在過去，不與知識分子團結，不聽取他們的意見，結果，事情就搞糟了。陳像週一樣，提醒幹部們，毛將劉邦能建立漢朝的原因歸之於他願意傾聽意見。他嘲笑對知識分子做整體的攻擊，他借助毛在七千人大會上承認中共的無知，大聲喊道：「你們（指：左傾分子）幹的是蠢事。」[70]

談到人們要他講的具體問題，陳透露說毛和周，以及其他中央的同志——有趣的是陳幾次談到毛和周，但一次也沒有談到劉少奇[71]——從來沒有對現代話劇做過專門討論。陳推論毛不反對話劇，因為

毛在各領域裏都認為應該利用古今中外的東西，他引用毛的話來解釋毛對話劇的不關心：「我不去看戲是因為我每天都『在演戲』，再去看戲就煩了。但我不反對戲。我聽說廣大的青年和人民很愛看戲，因此我們應該發展戲劇。」[72]（譯按：按英文譯出）而周卻對各種劇都很關心，並多次與陳討論有關的問題。總理對當時普遍不尊重劇作家和演員，以政治口號和任務去妨礙文藝自由非常不滿。他說，至於他自己，除了他經常講的意見外，沒有什麼新意見。他反對說農民不喜歡在資本社會裏寫的話劇，在抗日戰爭中，這已證明是不對的。他也不承認電影可以完全代替戲劇。人們喜歡所有的藝術形式，不能根據個人的喜好來制定法律。[73]

陳毅表示他個人讚成「作家的民主權利」，黨的書記，甚至副總理，也不應該強迫作家修改作品。只有一件事是不允許的，這就是進行反動宣傳，但陳不相信會有一個作家想那樣寫。[74]

更重要的是陳堅持在藝術創作中作家個體作為主要因素的重要性和不可侵犯性。在像寫作這樣的專業工作中，必須要有才華的個人。作家個人對他精神產品負責。集體創作——在大躍進期間受到大肆宣傳的[75]——只是一種形式：「我發表的詩就是我一個人寫的，你要和我合作，我就不幹了」（笑聲）。[76]（譯按：按英文譯出）

作家個人也要對主題負責，他完全有權選擇寫內部矛盾。陳正在設法解決這問題，但他大膽地修改了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中的觀點，即這些作品可能被帝國主義利用來反對中國。他認為這類作品應該被視為自我批評的例子，雖然後來他比較現實地補充說當前農村情況太嚴重了，尚不宜公開地描寫；因為，它們的確能使帝國主義高興。顯然是在周恩來的提議下，陳將《洞蕭橫吹》這部電影當作他的文本，在講話中幾次提到它。這部電影的作者海默在反右運動中因為他對兩名地方貪汙的黨的官員作了批判性的描述被清洗，現已平反。陳指出，這電影事件說明向北京和毛申訴可以產生效果，因此，他鼓勵人們反對錯誤。[77]

陳對戲劇中的人物的內部矛盾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悲劇，作為藝術形式也是可以允許的，他還修正了毛根據恩格斯的觀點提出來的作家只應強調人物的英雄一面。陳說，他們的缺點也是可以寫的，因為這會突出了他們的優點。[78]

人們應該怎樣對待受到冤屈的海默們呢？聽眾完全是擁護革命的人，主要是黨員，他們應該瞭解革命的過程是紛擾的。總的情況是光明的，但不時會有黑暗時期。陳說雖然現在廣州的天氣有陽光，不能說總是這樣，政治氣候也是這樣不穩定的，這句話很快就在實際上證實了。人們不能說「太陽沒有黑子」。[79]在黨的領導下也會有壓迫，但最後黨會糾正這些問題。陳以他自己的經歷和毛的遭遇為例，告訴聽眾，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應該立場堅定，嚴守紀律和耐心等待。[80]

雖然他說了這些勇敢和鼓勵的話，陳也老實地承認不論像他這樣的領導說了些什麼，不論在像這樣的會議作出了什麼保證，這些都不能保證人們回到單位去不受報復。他知道，他是在向已改變立場的人說在中共黨內那些迫害知識分子的人沒有到會，因此，他希望根據這次會議的記錄展開爭論。[81]

但情況發展並不是這樣。陳的預見是正確的。雖然廣州會議的餘波曾有利於全國各地的知識分子，包括以前的右派[82]——有人還記得「1962 年氣候怎樣一下子熱了起來」[83]——這餘波只在左傾的堡壘上輕輕拍了一下。上海（陳的第三野戰軍 1949 年佔領了上海，陳在任市長 5 年後調到北京）兩名參加會議的人回到上海後熱情地要求傳達他的講話，但第一書記柯慶施斷然禁止了。當地與柯同樣左的黨員經過允許看到這講話後說，如果講話沒有清楚地寫上陳毅的名字，他會以為這是「右派分子」說的呢。[84]可能柯知道當周恩來請示對知識分子的政策作指示時，毛不予評論。[85]

雖然全國文學的官員們不能控制上海，但他們還是利用陳毅的講話做了些事。8 月，中國作家協會在東北的大連舉行了一個小型座談會。16 名知名作家，包括茅盾、趙樹理和周立波討論了農村題材的短

篇小說。會議由作家協會黨組書記邵荃麟主持，負責文藝的宣傳官員周揚講了話。這二人以前曾無情批判過偏離正統路線的作家。這時，在某個會議上探討描繪有「內部矛盾」的真實世界的複雜性，而不是斯達哈諾夫式農民的理想化世界，這兩個人一反常態，贊成忠實描寫人口中絕大多數的「中間狀態的人物」，包括他們的錯誤與偏見。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們的講話都被用來批判他們。[86]

第十一章「三家村」奇案

像陳毅和周揚這樣黨的高級負責領導人在廣州和大連的講話和行動說明瞭大躍進以後恢復時期的一個重要特點：官員們願意思考以前不敢想的事。在各領域都提出了激進的措施。正統的官員容忍了他們以前譴責的事。對有些人來說，毫無疑問，這只是奉命行事，而對另一些人來說則是天賜的機會來表達長期不敢說的思想。

這至少是文化大革命分子對三名黨的高級宣傳人員（鄧拓、吳晗和廖沫沙）提出的未明說的指責，說他們在當時的專欄裏向毛和他的政策含沙射影惡毒攻擊。[1] 一些海外的觀察家深信這些指責，但對這些受批判的作家表示同情並佩服他們的勇氣。[2] 然而，直至今日，這些指責是否可靠仍不清楚；雖然對這三個人的文章的批駁在歷史上是重要的，因為這些批駁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批排炮，但不清楚的是這三個人在60年代初刊出的這些文章是否有政治意義。

儘管所謂「三家村」一案一直未定性，但必須對其作出判斷。如果這些文章完全是無辜的，那麼，以後對它們的作者的攻擊反映了偏執狂或者文革之初故意歪曲證據作為攻擊黨的領導官員的藉口。而另一方面，如果這些文章的意圖像後來所指責的那樣是要批評毛，那麼，在60年代初共產黨士氣與紀律的崩潰程度就是相當厲害了，而毛重新發動一場革命的意願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對歷史學家來說，幸而「三家村」中的一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倖存下來，可以說出他對事件的看法了。前記者和歷史小說家廖沫沙在1961年時54歲，是北京市黨組織的高級官員，有作宣傳和教育工作的經歷。該年9月，他任北京市統戰部部長。該部對非黨知識分子實施控制。[3] 該月中，鄧拓和北京市黨的理論刊物《前線》的編輯們邀請

他到四川飯店吃午飯，在飯店裏他發現陪他的人裏有首都知識分子中的領導人物吳晗。[4]

鄧拓與「燕山夜話」

鄧拓是黨的傑出記者，在革命期間，他任晉察冀根據地主要報紙編輯時獲得聲譽，當時他的文職上級是彭真。[5] 在晉察冀，根據軍事指揮員聶榮臻的指示，鄧拓還編輯了第一部官方出版的毛的選集。[6] 在共產黨於 1949 年 1 月佔領北京後，鄧拓成了北京市委的宣傳部長，但該年秋，共產黨部隊在全國取得勝利後，他被任命為《人民日報》的主編。《人民日報》是前一年作為共產黨的主要全國性報紙創辦的。[7]

但不清楚，為什麼這樣一個重要崗位不至少由 1956 年解放後第一次的共產黨代表大會上當選的候補中央委員擔任。[8] 人們所知道的是，在 1956-1957 年百花齊放期間，毛對鄧拓越來越生氣，最後於 1958 年秋，在主席的堅持下，鄧拓失去了主編的職務。[9] 由於鄧實際上並沒有犯路線上或紀律上的錯誤，他被調到北京市委書記處任負責文化與教育的書記，《前線》於 1958 年 11 月創辦後，兼《前線》總編輯。[10] 鄧又在彭真領導下工作。在大躍進初期，他也鼓吹大躍進的優點。[11] 1960 年，鄧拓又成了新成立的共產黨華北局的候補書記。[12] 1961 年，鄧開始在《北京晚報》的專欄上寫文章。該報雖是地方報紙，但在首都以外地方銷售了總印數 30 萬份的一半。[13]

《北京晚報》的編輯，鑒於鄧廣博的歷史與藝術知識，幾年來一直在勸他為報紙寫文章，偶爾也從他那裏得到幾篇文章，最後終於使勸服為專欄長期寫作。在三年困苦的黑暗日子裏，他們感到他們的讀者需要一些能「開闊視野，豐富知識和振奮精神」的文章。1961 年 3 月，鄧拓同意了。

當興高采烈的編輯們造訪他的家來定下細節的安排時，鄧交給他們二張紙。一張上寫著他為專欄選的名字：《燕山夜話》。燕山是北京地區的一條重要的山脈，而夜話是指只有在天黑以後才能說的知心

話。另一張紙上寫著他選的筆名：馬南村。這是他抗日戰爭時期編輯的《晉察冀日報》所在的小村子馬蘭村的諧音。他表明，他的日程很緊張，只能一周寫兩次，他希望該欄排在版面的右上角，便於願意保存它的人剪下來。[14] 他的稿費是每篇15元，高於一般稿費。[15]

這開始對於鄧拓來說不過是可有可無的一件額外差事，這時卻成為一件新的令人興奮的事了，能讓他按自己的意願對任何事發表意見。在毛堅持之下屈辱地離開《人民日報》主編位置後三年，這無疑是一件他所歡迎的增強自尊心的事。他第一篇在1961年3月9日刊出，到1962年9月寫了一系列共152篇「夜話」。[16]

「夜話」這個詞事後證明並不僅指親密。在第一篇文章「生命的三分之一」中，鄧拓引述了中國古老的作法，將晚上時間算做半天，因為一個有心的人可以在這期間做許多的學習與工作，可能也包括閱讀鄧的專欄在內。[17] 他自己就做出了榜樣，在晚上用不到一小時的時間完成他的專欄。[18]

「燕山夜話」所談主題多種多樣，大多數是文化問題：哲學、科學、歷史、地理、文學、藝術，還有政策、時事、學習、工作和工作作風。鄧在文章中談到儒家經典著作、歷代歷史、小說和許多其他方面。廖沫沙將這專欄說成是「琳琅滿目，很像一部小百科全書」。[19] 鄧拓似乎執著於「知識」。[20] 可能這專欄吸引人之處主要就在於大多數文章，即便有些略帶下意識的政治意義，但其主旨能為普羅大眾所欣然接受。在經歷了多年的毫無幽默感的政治運動以後，遊弋在馬南村最新的文章中，略作小憩，也是很大的安慰。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專欄比姚文元後來「揭露」的任何政治影射文章更具有潛在的顛覆意義，因為在這樣一處私人空間內，政治不掛帥合法化了。

這專欄極受歡迎。在第一年裏，鄧拓收到了大約400封讀者來信，有些遠至雲南、貴州、新疆和西藏，有工人、教員、學生、科學家和領導人。[21] 文化大革命中，賀龍元帥受到指摘說他一期都不缺地閱讀這專欄。[22] 甚至連指責鄧拓誹謗毛主席和他全部著作的姚文元當

時也對之評價甚高。[23] 有諷刺意義的是後來被說成是對此事負責的人們似乎並未讀過它。他們是鄧的直接上級彭真和北京第二書記劉仁。彭真不讀它們是因為他的文化興趣面很有限，而劉則像他後來說的那樣，太忙於解決首都的白菜問題了。[24] 由於鄧拓是他們的同事，而且是他們委派他去監督管理《北京晚報》的，他不需要去徵求他們的意見，更不用說在付印以前要呈送批准了。[25]

吳晗與「海瑞罷官」

在中國領導層中，瞭解鄧拓與毛的緊張關係的人會認為姚後來對他的指摘是可信的。然而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姚的第一個目標卻是毛欣賞的吳晗。[26] 吳是參加四川飯館午餐的第三位主要人物。[27] 鄧拓和廖沫沙都是在 1930 年加入共產黨的。[28] 而吳晗長期是同路人，是民主同盟的活動分子。他作為非黨的同情者，對共產黨很有價值，因此雖然他在 1948 年就申請入黨，卻在 1957 年 47 歲時才被批准入黨。[29] 吳晗在政治上很活躍，因此在他出任北京市副市長的時候，在公共生活中很快贏得支持[30]，但從職業上講，他卻是位學者，明史專家，是明太祖輝煌一生的傳記作者。[31]

1959 年，毛私下抱怨說甚至像劉少奇這樣長期的戰友也不敢當他的面說真話，[32] 他號召黨員們學習明朝勇敢直言的官員海瑞。[33] 毛最早的秘書之一、共產黨宣傳部副部長胡喬木竭力勸說吳晗用他的專業知識為知識不多的黨的官員們講述海瑞怎樣對抗當地的權勢，甚至敢直諫皇帝。吳寫了一系列關於海瑞的文章，最後在 1962 年出版了海瑞的文集。[34]

一個京劇公司的領導勸吳寫一個有關海瑞的歷史劇由他們演出，這對吳來說，是走入一個新的領域。在反覆接受批評和重寫後，該劇於 1960 年 11 月 13 日完成。吳晗只為它取名「海瑞」，但他的合作者認為不恰當，因為這不是講海瑞一生的劇，在前 5 稿上均題為「海瑞還田」，但在一位朋友的建議下，最後二稿均題為「海瑞罷官」。[35] 該劇

於 1961 年上演[36]，立即在《北京晚報》上引起廖沫沙與吳晗的探討，廖問吳歷史真實與戲劇真實之間是否有差別。[37]

在戲上演、劇本出版後，毛有一個機會對它評價。主席邀請演海瑞的演員馬連良到他家吃飯，要他背誦他那個角色的台詞，並發表意見說：「戲好，海瑞是好人！《海瑞罷官》寫得好。」[38]該年末，毛送給吳晗一本自己簽名的《毛選》第四卷。[39]顯然在這時，毛對《海瑞罷官》一點也不生氣，對作者也無不滿。遲至 1963 年，毛在招待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的招待會上找到吳晗，問他明太祖傳的修訂工作進行得怎樣了。[40]他對吳晗的態度是否有了改變，我在下一章將作討論。但姚文元卻指責吳晗夥同廖沫沙和鄧拓組織了「在三家村中經過精心策劃的、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一場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進攻。」[41]

「三家村」

在 1961 年 9 月中的一次決定命運的午餐上，鄧拓告訴吳晗和廖沫沙，他的雜誌《前線》想倣傚其他報紙的做法，由幾名作家共同主持一個專欄。[42]他建議他們三個人合作辦一個「三家村劄記」的專欄。一面吃，他們一面談到許多話題。他們既已對此事毫無異議，他們直到結束時，才決定了細節。

他們共用一個筆名寫作，筆名叫吳南星，從吳晗的吳，馬南村(鄧拓的另一筆名)的南和方星(廖的筆名)的星組成，但北京的聰明人很快就識破了這個筆名。[43]他們在每期的《前線》發表一個專欄，只在極少的情況下(5 次)在他們都很忙時另邀人來補缺。據廖沫沙後來說，編輯不提題目，更不用說指定題目了，他們關心的是保證這專欄的文章不超過一千字。[44]廖說，從背景和才能來說，這三個人的結合是自然的。他們都是同一代人，相互瞭解。[45]每人都有長期為共產主義事業寫作的歷史，都深深地介入了首都的文化生活。他們之間共同關心

的是文學、戲劇、學術、新聞學和宣傳。[46]可以想像他們會聯合起來攻擊黨和毛主席麼？

廖沫沙後來堅持說在午餐桌上，除了技術細節外沒有達成任何協議。他回憶他寫的題目都是自己選的，從來沒有需要換題目的事。鄧拓沒有行使編輯權力使專欄適合某一事先定好的計劃。他「指天誓日」說「三家村雜記」是無組織、無計劃的，三個作者都是沒有領導，沒有接受指示的獨立作家。[47]姚文元卻不這樣看。

反「三家村」事件[48]

姚文元說他的批判對像使用了伊索寓言的語言來表達政治意見。這從本質上說並無荒唐之處。鄧拓三四十年代在「紅色」根據地工作，因此用這種手法的機會較少，但吳晗和廖沫沙在中共取得政權以前都使用過這種技巧反對國民黨。[49]但姚文元在批判這三個人時，主要的火力卻是對著鄧拓的，將「三家村雜記」與「燕山夜話」聯繫起來，指出他是這所謂陰謀中的主要人物，是「黑手」。[50]姚是通過分析一些論文來批判的。

在《歡迎「雜家」》裏，鄧列舉出這樣一群人：「有廣博的知識」對「雜七雜八包羅萬象的東西」都知道一些，像舊時代的知名學者那樣，並說「現在我們如果不承認所謂『雜家』的廣博知識對於工作的重要意義，那將是我們的很大損失。」[51]姚從這些引證的簡短的話推論說「『雜家』就是那些沒改造好的資產階級分子、地主階級分子及這些階級的知識分子，就是一撮政治面目不清的人物……他們以自己的知識為資本，正在拚命地混進來或爬上去，篡奪各級領導崗位，改變無產階級專政的性質。」鄧拓實際上「就是要黨向他們開門，讓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雜家……為資本主義復辟準備輿論」[52]。

在一篇談農業政策的文章《堵塞不如開導》中，據說鄧拓「要求」一切事物都要「積極開導使之順利發展」。根據這幾句簡單的話，姚文元竟作了特別大膽的想像，這種想像的飛躍只有那些不怕出錯的批判

家才會做出。他寫道：「請注意，『一切事物』即包括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黑暗的事物，如『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向正在興起的壞風氣妥協，如『單幹』〔即恢復個體經濟〕風，擴大自留地和自由市場風，發展自負盈虧的小企業風，按戶定產量指標風」。[53]（按英文譯出）

在另一處，姚又展開想像，指責鄧拓寫了一篇叫《今年的春節》的文章說「北風的嚴寒即將過去，溫暖的春風將吹拂，大地即將解凍」。姚矯飾地問道，鄧用「解凍」這個詞，不是有重要意義的麼？「這不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反斯大林時用的徹頭徹尾的反革命語言麼？」據姚說，鄧拓是在預言「社會主義新中國」到年底就要垮臺。姚的某些讀者可能會作出相反的看法，他們懷疑北風這個詞，鄧指的是在中國北方的蘇聯，因此，他實際上是指毛將戰勝赫魯曉夫，因為人們習慣於將毛與東方的一切聯繫起來。[54]

但姚文元的指責聽來荒誕，但也不能由此得出結論，鄧拓從來沒有利用典故和歷史類比的方法對當前事務作尖銳的評論。姚大加伐撻的一篇文章是「愛護勞動力」，在這篇文章裏鄧引用了中國歷史上的例子。告誡人們不要過分使用強迫勞動力。姚說這是對大躍進所採取的方法的歪曲攻擊。這說法是有道理的。但即令如此，這攻擊也是溫和的，非控訴性的，而且與當時官方的看法是一致的。[55] 西方為鄧拓寫傳記的人認為在七千人大會後發表的《王道與霸道》和《三種諸葛亮》顯然是攻擊毛的。[56]

姚文元的火力主要指向鄧拓，可能不僅是因為他認為鄧是「三家村」的主要人物，而恰恰是因為他的文章比較易於批判。吳晗的文章「基本上不是明顯諷刺性，而是直率的，……他公開地提出問題，所提的解決辦法往往將傳統智慧與社會主義意識結合在一起」。他想以歷史的類比來議論這是可以理解的。[57] 廖沫沙所投稿件是有所暗指的，「既不像鄧拓的稿件那樣尖銳、諷議，也不像吳晗的稿件那樣專心致志於保存某些中國文化傳統。」然而，他早些時的稿件提到中國的傳統，要比提到馬克思、列寧和毛多。顯然他重視傳統的師生關係，認為黨是

老師而「廣大群眾」是學生。[58]吳晗與廖沫沙會與一個想要傷害毛的人聯盟，以報復那個人在主席手中所受的屈辱麼？雖然姚的邏輯變化無常，但他說（他們）正在進行某種事情，還是有道理的麼？還是這些文章裏並沒有姚所看到的那些意思？

隨風轉向

弄清這問題的一個方法就是將這兩個專欄的文章按日期來研究，看看它們與政治氣候的起伏有什麼關係。以鄧拓為例，顯然，他在這兩個專欄的文章中，只有少數幾篇（可能只比四分之一略多一些），有可能有政治雙關語，其他的則純粹是有關文化的，或與當時路線相符的。[59]它們是怎樣反映高層政治的呢？

有一種分析認為鄧「在政治上是狡猾的，對時機的選擇很謹慎」。按這個觀點，鄧對毛主義的左傾和毛本人的批判性評論有 5 個高潮：1961 年 3-4 月份，可能起因於廣州會議；1961 年 6 月，即毛在 5-6 月份工作會議上作了「自我批評」時；8 月份，即在第二次廬山會議前後；11 月份，鄧在暢觀樓會議搜集北京黨幹部有關大躍進檔中起了主要作用；[60]以及 1962 年 2 月，即剛在毛在七千人大會上作第一次自我批評以後。[61]更為重要的是，在 1962 年 9 月中共十中全會以後，毛宣佈階級鬥爭為綱時，「三家村」專欄的文章變得更正統，更溫和和有更多的文化內容了。[62]鄧在 9 月初，停辦了「燕山夜話」，此時毛在夏季工作會議上反復提到階級鬥爭問題，在北京的高級官僚中必然已是人所共知的了。可能鄧拓感到由一個人寫專欄更容易暴露。

然而，隨風轉向不至於有罪。[63]我們已看到，周揚，在九中全會以後就按新的政策指示轉向了。在共產主義國家裏，作一百八十度的轉向，不論是奉命，還是根據新的現實情況而做的調整，總是生存下去的關鍵所在。姚在 4 年後，在完全不同的氣候下說，這二個專欄的一些文章是批判大躍進的作法。這說法當然是正確的。但在這問題上，毛本人也是有錯的，因為他指責了五種「共產風」。唯一的區別是

「三家村」和「燕山夜話」的批判無疑要比官方長篇大論的講話和指示精煉得多（不說簡短得多）。

有證據證明，吳晗有關海瑞的戲，在 1961 年 1 月上演時，毛是欣賞的，而不是惱怒的。關於三家村成員，唯一需要研究解決的、令人感興趣的問題是鄧拓在他的文章中對毛的批評是否犯了謀害君王罪。他的遺孀、他的同夥廖沫沙以及他的朋友們都說不是，但鄧拓在文化大革命初就自殺了，從而將這秘密帶進了墳墓。自殺可以是認罪，而更可能是一種抗議，一種決定，不再在一場六親不認的革命中受折磨。

極不可能的是像鄧拓這樣一個有經驗的幹部會成心報復他在毛手裏所受的屈辱。這樣是太危險了。正如在七千人大會上，比鄧拓職務要高得多的那些人所表現的那樣，即令在毛感到必須作自我批評時，過分強調毛的錯誤也是魯莽的。無疑，鄧拓會接受他的上級彭真的教訓。彭真曾溫和地建議將一些錯誤歸之於主席，但結果是很不好的。

顯然，鄧拓利用了對共產風作一般性的批評來發洩他對左傾主義的不滿，而左的根源卻是毛。有幾篇文章中，他用了類比和舉例的手法，可能意識到容易被人引申，像姚文元和其他人後來所做的一樣。但他這樣做的原因可能不是有意貶低毛——其他學者都說他的矛頭基本上是指向各級幹部的——而是 自動對號入座。如果鄧拓像姚後來所說的那樣是明顯地批判毛的話，當時在北京的官僚中肯定會有傳說的，但事實上專欄的讀者們似乎完全沒有看出這種影射。[64]

毛的支持者所不喜歡的是鄧拓文章中反大躍進部分。因為這會產生一種氣氛，與十中全會上再度掀起的左傾主義格格不入，而這種左傾主義後來發展成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最後爆發成文化大革命。但在文化大革命初，卻回過頭去將三家村劄記——只是當時許多專欄之一——說成是主要事件，根據是不充分的。在 1965-1966 年間，在一個更大的政治陰謀中，鄧拓、吳晗和廖沫沙成為犧牲品。在 1962 年夏，毛有許多更緊迫的事要考慮，還無暇顧及用筆名寫作的專欄作家所寫的想像的、晦澀的、有針對性的諷刺。

第三編

階級鬥爭

第十二章 毛改變了信號[1]

1962年7月11日，中央書記處傳閱了一份文件，要求對41個特殊問題提出意見。有關農業的問題起了政治炸藥的作用：

> 你們認為在實行六十條和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以後，農村生產關係和農業生產中還有些什麼問題，你們認為，應當採取什麼辦法來鞏固集體經濟，使農業生產恢復和發展快一些？你們認為，採取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的辦法是不是可以更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如果我們採取這種辦法，它將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引起何種結果？在那些現在實行包產到戶，實行單幹的地方，你們認為應當採取什麼政策？你們那裏有沒有因為破壞嚴重、幹部作風不好，集體經濟搞得不好，農民要求包產到戶的生產隊，你們認為對這類生產隊應當採取什麼政策？[2]

這個文件可能是去年6月書記處一次贊成包產到戶的會議的成果。鑒於曾希聖已被罷黜，安徽省的黨後來作了卑微的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這些問題應是不必要提出的。每一個精明的黨的官員都會反對包產到戶，以免遭受到（與曾希聖）類似的命運。但是，僅憑提出這些問題，就意味著書記處在重新討論這問題，暗示正在考慮對安徽的實驗做出相反的判決。雖然這些問題貌似無偏向，但實際上是想得到使包產到戶成為可能的答覆。鄧小平似乎是襲用了劉少奇前一年的戰術：即在提出相反的政策時，要緊緊跟著廣大群眾（不論廣大群眾的含義是什麼）。

由於這份書記處的檔只要求提出意見，而並沒有發佈任何指示，嚴格說來，事先並不需要毛的批准。但是，即令毛沒有在事先看到這檔，毛主義的信徒，比如華東區第一書記柯慶施也很快會向他報告

的。不管毛是怎樣得到這文件的，讀了這些問題以後，他立即就會認識到他不再能夠依靠他放在總書記位置上的這個人，來保證黨忠於他自己。[3]

劉少奇掌舵

在七千人大會以後，主席到上海去了幾乎兩周，然後又到杭州，[4]並且引人注目地，而且史無前例地沒有出席像西樓會議和 5 月工作會議這樣重大的黨的會議。[5]這個時期裏，中央領導顯然必須根據七千人大會的明顯一致意見做出艱難的政策抉擇。前一年，在九中全會以後，毛在探尋新政策，尤其是農村新政策上起了主要作用。在 1962 年上半年，他命令秘書田家英將他的農村調查情況向劉報告並請求指示，這說明他讓位於劉少奇[6]，[7]考慮到他對領導權的危機感，這樣的行為特別令人驚訝。

最明白表示劉的地位提高的是在共產黨建立 41 年之際出版了劉 1939 年著名的《論共產黨員修養》一書的增訂版。該文佔據了該日《人民日報》的大部分版面。在以後的 4 年裏，以小冊子形式印了 1,800 萬多份。[8]劉借此出版機會從中共歷史中汲取了一個教訓。他對 30 年代的歷史增加了一長段，說明黨怎樣根據客觀形勢的變化修改了戰略、戰術和聯盟。一名劉的親信 25 年以後解釋說，這樣寫是為了說明較緩和的階級政策（可能還包括強調統一戰線）是正確的。[9]

此書的出版是一個重要象徵。這與 1959 年他取代毛成為國家元首後，在《人民日報》上的照片與毛的照片並列在一起，並且大小相同是同樣的。[10]雖然，修訂版引用了原書沒有的大量毛的話（刪除了一些引自蘇聯的話），這仍然說明官方承認劉作為理論家的地位。而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這地位只有主席才能佔有。在幕後，在毛的提議下[11]，一個小組在康生的領導下[12]正準備出版劉少奇選集的第一卷，但在他去世後 20 年才出版。[13]

其他能說明劉在 1962 年上半年的新地位的是其他領導人的講話。上面所述周新獲得的信心與自由說明對左傾主義考慮得較少。在某種意義上，這說明左傾分子的主要鼓動者和負責人毛本人已不再掌權。

另一個風向標是李先念的講話，不過 表現方式不同。李先念是位精明的政治家，在文化大革命中未被殃及，可以說毫髮無傷。對於權力關係他有敏銳的觸覺。文化大革命之前他的講話都是商業性質的，只談數字、問題、政策。沒有言必稱毛主席，但通常也會恭敬地引用或暗指幾句。與之形成對比的是，七千人幹部大會之後他所作的兩篇重要講話轉而引用了劉。6 月 6 日的講話尤其暗示，誰是負責人：「劉少奇同志非常重視商品和材料的統一管理。」3 個月後，9 月 25 日的十中全會上，他的話明確無誤地指出，毛又重新拿回領導權。李說道：「毛主席親自主抓商業……」事實上早在 7 月 12 日，當高級官員看出端倪，毛在即將召開的北戴河會議上會重新掌控局勢，此時李已經開始又提到毛和毛澤東思想了。[14]

毛在 1962 年初的行為說明，他不願意對當時國家所面臨的、不合他口味的權宜辦法明確表示贊成，但在他的高級同事要他批准時也不得不同意了。雖然陳雲為工業部門提出的苛刻政策顯示出大躍進的災難性後果，但這些政策並沒有尋求摧毀經濟中的國有或集體部分。然而，為包產到戶平反會威脅到毛對中國的集體（化的）農村的整個看法，因此必須予以抵制。在這個問題上，主席發現，甚至他的秘書田家英也背叛了他。

田家英 1962 年的農村調查

在七千人大會後，毛決定再度進行他在 1961 年提出的農村調查。他召來田，給予詳細指示。田奉命率四個小組下到湖南省去，一個小組去調查毛的老家韶山，另一個到毛外祖父母的村子，第三個到劉少奇家的村子，第四個到劉在 1961 年調查過的天華大隊。結果，田的 17 人小組只調查了前三個村子。

3 月 22 日，小組成員在赴湖南前，在湖北武昌東湖的賓館受到毛的接見。毛詳細詢問了每個人的姓名，並說了幾則政治笑話，從而使每個人都輕鬆下來。然後，他解釋他希望他們做些什麼：與各級當地幹部緊密合作；不要越級發號施令；除馬克思主義之外，不要帶有先入為主的成見；注意歷史情況；只注意好人好事，不要注意壞人壞事；做一些輕微的體力勞動。[15]

田自己希望通過調查能提出一個十點計劃來振興農村經濟。然而，他確實是有先入為主的成見的。他仍然反對包產到戶。在他遭遇韶山一個免於大躍進最嚴重影響的村子的村民包圍他和他的同事們，要求實行包產到戶，甚至分田到戶時，他是完全沒有思想準備的。自從 1955 年高潮以來，生產持續下降。有諷刺意義的是：小組發現在這些一度是毛的鄰居們背叛了他的事業的同時，劉老家村子的農民卻更傾向於接受 1961 年批准的修改後的集體制度，主要是因為國家主席在訪問該村時做了工作。[16]

然而，田被韶山的農民說服了。在聽取了農民們提出的理由後，他確信要達到他增產的目標，只有包產到戶，甚至分田到戶才是最好辦法；在目前的危機中，集體經濟「難以為繼」。雖然田只對一名他信任的同事談了他得出的結論，他組織小組對這問題作了熱烈爭論。結果田的觀點處於少數；但他鼓勵與他持有相同觀點的成員繼續在這問題上進行研究。後來，他派兩名小組成員去研究安徽的經驗。

田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當地人全知道他是毛的秘書並且是主席親自派來的。他要在毛的老家村子提倡包產到戶就會成為重大的政治新方針，立即會在整個湖南引起反響，以後又會傳到全國各地。該省的黨組織在借地，但並未同意包產到戶，雖然在實際上，早在 1961 年 3 月有些地方就在偷偷地實行這一制度了。因此，田在湖南緊緘其口。[17]

但這時他卻有一個不值得人羨慕的任務，這就是將他調查結果向主席彙報。他先到北京向劉少奇談了劉老家村子的情況，劉平靜地聽

取了彙報。然後，田到上海去向主席彙報。在彙報前，他將報告給當時也在那裏的陳雲看。陳在廣州會議上不同意田以前的觀點，這時卻很支援田。

與陳不同，主席似乎並沒有閱讀田的報告，而是不甚熱情地聽取了他的口頭彙報。最後，在評論時，他透露出，他完全不同意農民的意見，而且不經意地表示反對劉和鄧在基層幹部意見的掩護下所採取的策略:「我們是要走群眾路線的，但有的時候也不能完全聽群眾的，比如，要搞包產到戶就不能聽。」【18】

田以後的活動可能最清楚不過地表明，在某種意義上，毛那時已讓權了。田在上海時，被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叫去，說總理想知道在農村略微擴大私有土地，是否合適。田毫不猶豫，也沒有徵求毛的意見，就同意了。【19】

另一個徵候是，當田回韶山時，他的小組正結束調查，但他並沒有傳達毛的意見。在形式上，這樣做可能是正確的，因為毛是談意見，而不是作指示。但是，正如鄧拓在《人民日報》任編輯時所發現的，遵循正常程式，不傳達主席的意見是危險的，他為此付出了代價。此外，正是在這時，田派了兩名小組成員去研究安徽的經驗。田應該瞭解這樣做是有風險的，只有在他認為毛不再實際掌權的情況下才會採取這種措施。【20】

當田在6月底返回北京時，北京發生的事似乎證實了這種看法。他發現在首都對包產到戶的談論與在湖南農村一樣多，主要的差別在於，在北京的談論是在理論外衣的幌子下進行的。人大代表中一名模範工作者提出維持安徽的制度6年不變。李富春向劉少奇和鄧小平彙報，安徽群眾仍要求這一制度。【21】當田向劉彙報時，劉打斷他的話說他完全瞭解情況並表示他支持包產到戶，認為它是合法的。可能就是在這場合，他說，「在工業，我們必須退夠，在農業，我們也必須退夠，包括包產到戶和單幹」。【22】他要田向政策專家徵求對這問題的意

見[23]而不要透露黨的第二號人物有這樣的觀點。田問他是否能將他的意見向毛轉達，劉馬上同意了。

接著田將他準備擬定十點政策，恢復農業經濟的想法告訴鄧小平。田準備提倡多種所有制：集體、半集體、包產到戶，甚至分田單幹。鄧只是以典型的公事公辦的口氣說：贊成。這時田家英也參加了在中南海舉行的有關這問題的會議。[24]他對其他領導人說了他的看法，也獲得同樣支持的反應。幾乎除毛而外，所有的政治局常委都贊成包產到戶，或至少某種形式的責任制。[25]

然而，此時，田家英有一個困難的任務：使毛瞭解他得出的最終分析。不論當時實行的是什麼樣的領導機制，他完全知道，包產到戶需要得到毛的同意。他打電話到河北。毛當時還在邯鄲的基地上。9個月前，他就是在這裏同意以小隊為核算單位的。田接到通知毛傳話說不要忙，田知道這表明毛已不耐煩了。兩天後毛回到北京，召見了他的秘書。

田闡述了他的觀點。中國農民中約有30%正在包產到戶或分田單幹，其數字還在增長。[26]田估計比例可達到40%（譯按：薄一波說60%），其餘的則是集體或半集體耕種。這些辦法是恢復生產的最好辦法，一旦完成後，可再將農民領回集體主義。

人們不知道田是否真的相信他說的最後這部分好聽的話。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毛更加瞭解，但他沉默地聽田講完。毛與劉不同，他既不打斷他的話，也不表示意見。田說完後，毛向他提出一個完全意想不到的、他沒有準備好回答的問題：「你提倡農業的主要形式應是什麼，集體還是私人？」毛緊接著問田的意見是他自己的，還是別人的。田顯然自己承擔全責，沒有提到劉的立場，雖然劉同意他這樣做。主席沒有表示意見，但是他的助手完全知道，這意味著否定的反應。[27]

從7月9日至11日，毛與河南、山東和江西的省級領導人商談。[28]不久後，毛召集了工作人員會議，陳伯達也與會。毛批評田家英宣傳包產到戶而沒有修訂公社六十條。他沒有與常委們商議，就委

任陳伯達起草中央決定，鞏固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29]像在 1955 年一樣，他對主要助手在農業事務上的意見失去了信心，轉向左傾的意識，他根據這種意識提出了他贊成的解決辦法。[30]但是，當田提出要求到農村去，毛未予批准，可能他還需要田在他預見的劇烈的政治活動中施展才能。[31]

常委會裏的尷尬

田不是唯一在此問題上觸怒毛的官員。在夏日出巡後，陳雲 7 月初寫信給毛要求佔用 1 小時解釋他有關恢復農業的意見。在毛返回首都的當晚，陳會見了毛並表示在一個長時期內，集體與個體經濟必須在農村共存，為對付目前的危機，應強調個體經濟。[32]毛未作評論，但第二天，陳雲瞭解到，主席生氣地說分田單幹是修正主義，瓦解集體制度。因此陳寫信給總書記鄧小平並抄送主席，以健康不佳為名要求請假，並表示支持陳伯達為毛起草的加強集體經濟的中央決議。[33] 3 年後，他在隱退處寫信給毛對他 1962 年的立場作了自我批評。[34]

由於毛回到北京，總書記也不得不應付他自己的尷尬處境。7 月 7 日早晨，鄧在對共青團中央的講話中，提倡通過百家爭鳴來發現農村組織的最好形式，讓每個人表達自己的意見。他又用白貓黑貓的比喻來說明自己的觀點，提出應允許農民決定他們所需要的制度，如果這制度不合法，就應該使之合法。[35]同一天下午，鄧打電話給共青團第一書記胡耀邦。告訴他毛剛回來，表示不贊成包產到戶。據胡說（他將這消息傳達給共青團中央了），鄧命令將他講話中白貓黑貓的那一段刪去。[36]第二天早晨，他又打電話，命令胡加強有關集體經濟的段落。

7 月 18 日，劉少奇在對赴農村加強領導的中央官員講話時，試圖做難以做到的事。劉告訴他的聽眾，中央不久即將對包產到戶和單幹作出決定[37]，並表示他贊成河南的責任制。按這個制度，主要農活由集體幹，而零活則分散由個體幹。每個生產小隊負責一片土地，每戶負責一塊，超額有獎。[38]但鑒於人所共知的毛所持的態度，他也捍衛

集體制度，將當前的問題歸之於執行中的錯誤，號召聽眾與不正確的觀點和態度作鬥爭，以鞏固集體經濟。他也承認（他完全知道）全國從最高層到最低層都對集體制度有所懷疑。劉後來知道他保留某種形式的責任制的希望是不可能的，因為主席將他召到游泳池去，責備他未制止包產到戶。[39]

毛準備重新掌權。可能在另一個領域裏他的思想受到了挑戰促使他這樣做，這就是他認為是他特別關注的領域——外交事務，尤其是與蘇聯的關係。挑戰來自一名傑出的共產黨領袖，此人像其他幾個一樣，在毛的運籌下，已經風光不再。

「三和一少」

王稼祥，像 1959 年在廬山反對大躍進的張聞天一樣，曾是「28 個布爾什維克」中之一，這是地位不那麼高的、在中國土生土長的同事們給 20 年代在莫斯科受訓、準備成為中共未來領導人的一群年輕人起的諷刺性外號。他在江西支持過毛[40]，更重要的是 1935 年 1 月遵義會議上支持過毛，毛在遵義會議上成為中共事實上的領袖。儘管如此，10 年後在 1945 年七大上王失去了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裏的席位。[41]毛對七大代表講情說，王雖然犯有「路線錯誤」，仍應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中的第二名。[42]王繼續為毛服務，他的妻子則為江青服務。[43]從 1949 年 10 月到 1951 年 4 月，他是駐蘇聯大使，回國後任負責與各國共產黨聯絡的中共聯絡部部長。[44]就是在這個職務上，在 1959 年廬山會議上他受到毛的諮詢，徵求他對中蘇爭論最後階段的意見。[45]但在 1962 年初毛不掌舵時，王提出了毛後來認為是不入耳的有關這問題和其他外交政策的意見。

王的這些想法已醞釀了一年。由於他反覆的病痛又一次發作，[46] 1961 年 3 月他正在廣州休養，當時正在廣州開會討論農業六十條。文件起草人之一、聯絡部的工作人員王力去拜訪他，[47]，並向他報告了他最近視察時所瞭解到湖南省因饑荒而餓死人的事。王稼祥激動起

來，哭了。他說中國共產黨應集中精力於這樣嚴重的內部問題，因此應採取更和解的對外政策，以避免與美、蘇和印度的危機。他還希望看到少花些錢在各種外援上；如果中國由於在外國的事務中投入人力和財力而不穩定，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危害會很大。王的一個意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應該發表外交政策的總原則聲明，強調它基本上的和平姿態。

後來，他在與劉少奇的一次長時間談話中解釋了他的想法，劉同意他的看法。後來批判他的人將這些想法諷刺地稱為「三和一少」。[48]王受到這次和其他談話的鼓舞，於 1962 年 2 月 27 日寫信給三位負責外交事務的人：周恩來、鄧小平和陳毅。[49]他沒有去見或寫信給毛進一步證明七千人大會後，毛不管事了。聯絡部副部長劉寧一和伍修權也在信上簽了名。[50]

借用文化大革命的語言說，王稼祥的建議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王原文引用了毛較早時期的文章和聲明來支持毛已不再贊成的立場。這些建議是從戰略考慮或在與赫魯曉夫作鬥爭時出於戰術需要而提出的。王的方法是攻擊蘇共的路線，但接下來反對更極端的中共路線。由於王認為保持和平國際環境對中國致力於恢復國內經濟至為重要，他又重提 1960 年關於戰爭的爭論，例如，他說「我們不贊成片面地強調世界大戰已經註定地可以避免，說現在已不存在世界戰爭的危險……我們也不認為世界戰爭註定地不可避免。」[51]為減少由於外交事務花費而對財政的壓力，王稼祥提出對支持革命和民族運動的費用做「實事求是」的研究。有許多可用的政策：從發表宣言和聲明做道義上的支持，通過物質援助，到派遣自願人員。[52]但不能期望社會主義國家在一切條件下和一切時候都提供援助。在像目前經濟危機時，中國對它在海外的費用必須仔細考慮，不能太多[53]，不論這些錢是用於阻止帝國主義，還是用於使人們從忠於蘇共轉向忠於中共。王的觀點與周恩來在七千人大會上表示的觀點大相逕庭。七千人大會時，可能由於毛在場，總理強調了中國的國際義務。[54]

在談到志願人員時，王以 30 年代的西班牙內戰為例，當時有許多「進步」的真誠的志願人員參加，而沒有引用就在家門口的朝鮮戰爭的例子。朝鮮戰爭時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只不過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遠征軍，是北京國家安全政策的工具。王認為中國在 60 年代初完全不需要盡另一場朝鮮戰爭規模的義務。

王稼祥最後一次提出在外交事務中應採取更為克制姿態是在 1962 年 6 月 29 日，在這以前他的意見似乎沒有受到大的批判。鄧小平像劉少奇一樣是完全支持他的。[55] 此外王闡述他的意見時，正好中蘇爭論處於相對平靜階段。1961 年大多數時間國內危機太嚴重，甚至毛也無暇顧及蘇共。毛似乎滿足於九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莫斯科會議的決議。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二大公開攻擊阿爾巴尼亞共產黨領導偏離了蘇聯對集團外交政策和非斯大林化的觀點，毛因而大發雷霆以後，[56] 中蘇爭論又沿著人們熟悉的、攻擊替罪羊的方式進行。中國人的目標是南斯拉夫，而蘇聯人則繼續攻擊阿爾巴尼亞人。莫斯科與北京的傳媒更多地轉載第三黨對對方的攻擊，禮貌的外表逐漸撕去了。[57]

1962 年初，5 個「中立」共產黨，在胡志明和越南黨的率領下，提出舉行一次新的國際會議來解決黨際分歧，在此以前，應暫停宣傳上的對立。[58] 這一建議為中共所接受，4 月 7 日，中共致函蘇共，表示願意作雙邊會談。[59] 雙方都引人注意地調低了公開評論的調子，雖然當時中國在新疆正經歷著民族問題，後來中國將這歸罪於蘇聯。[60] 結果是阿爾巴尼亞的領袖恩維爾·霍查開始對中國盟友可能採取的機會主義態度感到惱火。在他 1962 年 4 月至 6 月的日記中，他多次將中國的政策說成是動搖、中間路線和調和的，有走向軟化、畏懼和消極的傾向。由於中國對阿爾巴尼亞閉口不談它與蘇聯的交道，他就更加關切了。[61]

中國的新路線第一次公開亮相是 7 月 9 日至 14 日在莫斯科舉行的世界和平大會上，當時雙方的活動都有所克制。北京代表團正式團長是知名作家茅盾，但鄧小平和王稼祥派出王力作為一名成員。他與尤

里·安德羅波夫進行了會談。雖然雙方的立場依舊，但還是達成了一些協議。王力返回北京後，他接觸蘇方的方法，以及王稼祥的總的方針，顯然都是得到鄧與彭真贊同的。[62]

美國這時對在台灣的國民黨有所制約也有助於發展不那麼緊張的關係。國民黨的特工人員滲入大陸進行破壞活動，美駐太平洋司令與中央情報局駐臺北站的負責人呼籲美國支持。[63]5月1日，國民黨徵收「返回大陸」消費稅；還報道了島上軍事準備情況。台灣報紙鼓吹在大陸虛弱時採取行動；5月份大批人從廣東逃往香港被認為是共產黨政權接近崩潰的證據。在幕後，「臺北長期反攻計劃在修訂，奉命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使之可行」，並在洽談購買更多的海軍艦隻與兩棲艇。[64]據說國民黨的這些騷動在中國領導人之間引起一定程度的緊張，[65]其結果是在金門對面的福建省大事增強人民解放軍的力量（可能有50萬部隊之多），以備遭到全面攻擊。[66]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將軍認為這不是是否有一場戰爭的問題，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應如何打這場戰爭的問題。在敵人到岸以前就擊退，還是誘敵深入內地的問題。[67]中國參加華沙會談的大使王炳南奉周恩來之命中止假期返任以探明美國的立場，美國的立場被認為是國民黨是否進攻的決定因素。1962年6月23日，應中國24小時之前的要求舉行了一次中美大使級談判，在王的住所喫茶時，王炳南大使警告他的美國對話者約翰·摩爾斯·卡伯特不要支持國民黨的反攻。[68]卡伯特向王炳南保證，華盛頓不支持台灣政權任何攻擊大陸的企圖，這立場在幾天以後由甘迺迪總統公開證實了，[69]但同時又重申美國有保衛台灣的義務，如果在福建的集結兵力不是防禦性的，而是攻擊附近島嶼的前奏的話。[70]9月9日在華東，人民解放軍空軍第一次擊落國民黨U2型偵察機，在10月1日至12月6日期間，據說9批共217人海運或空投的國民黨武裝人員在廣東被消滅。[71]但6月底以後，台灣海峽的戰爭熱在相當大程度上減弱了。在王大使的回憶錄裏，他證實美國政策的聲明「對國內政策的決定有很大影響」。[72]

在印度問題上，王稼祥似乎至少謀求部分恢復50年代中葉的「萬隆路線」，按這條路線，第三世界的非共產主義獨立國家都被視為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全面鬥爭中的盟國。在1959年中印邊境衝突與中蘇爭論以後，這條路線實際已被丟棄了。毛在與赫魯曉夫爭論中，認為像印度尼赫魯那樣的資產階級政權不可能「和平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並堅持它們必須由革命予以推翻。[73] 王改進中印關係的努力可能導致6月3日《人民日報》一篇關於中印關係的相當樂觀，甚至有懷舊感的社論，[74] 不過在毛恢復掌權後的那一年裏，這只受到了很短時期的注意。在北京，親印度的情緒可能並不普遍，毛也沒有放棄他在和平轉變問題上的觀點。

有關老撾問題的日內瓦會議於7月23日結束，中國外交部長與美國國務卿都在協議上簽了字。這是經過14個月協商達成的。在協商期間，美國與中國的代表都在活動中表示出克制態度。陳毅將和平解決老撾問題的協議說成是「對世界和平事業的重大貢獻。中國代表團歡迎它」。[75] 的確，北京派出龐大代表團參加的日內瓦會議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是一個走出冷遇的機會，減少了由於1958年沿海島嶼危機、1959年中印邊境衝突和1960年中蘇爭論引起的孤立和敵對情緒。

這樣，在1962年中，毛的同事們採取了許多毛不贊成的政策：他們接受了在農村實行家庭責任制的意見；他們賦予知識分子新的自由和地位；他們緩和了中國對待主要對手美、蘇和印度的態度，並發現與他們有可能進行成功的協商以解決分歧。毛有被被邊緣化的危險；他贊成的政策在私下被認為，說得好聽點，是不恰當的，而說得不好聽點，則是有害的。

毛在北戴河的講話

5月份決定舉行夏季工作會議討論農業問題。所舉行的那次工作會議被認為是成功的，但主要討論了工業和建設問題，對農業應怎樣辦仍未達成一致意見。5月26日在傳閱財經小組的報告時，中央命令

各區系統地調查研究農村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以便做適當準備，在下一次工作會議上採取措施解決農業生產問題。[76]會議於北戴河舉行。

像以前那樣，毛掌握了主動。他將日程放在一邊，代之以他自己的議程：階級，矛盾和當前形勢。[77]他集中攻擊了三風：黑暗風，農村單幹風和翻案風。[78]

毛在 8 月 6 日[79]工作會議開幕時立即同意劉少奇的提議，設立由 22 名高級領導人組成的核心小組，討論六個未指明的、不宜所有參加會議的人討論的敏感問題。[80]這提議顯然代表了劉的意圖，組成一個指導集體，以便就任何應變當前的經濟形勢，艱難地達成一致意見。這小組人數少而秘密，使毛的同事可以在迫使主席面對事實的同時，不像在七千人大會的全體會議上那樣感到拘謹，也能給主席在政策問題上有後退的餘地，而不再有作公開自我批評時的那種屈辱和尷尬。這種有組織的官僚作法與毛所喜歡的那種個人作風大相逕庭，此外，他幾乎肯定將這種作法視為圈套。事實上，這小組中不全是文化大革命類型的極左人士，有些人會支持他，因為他們對當前政策的某些方面感到不滿意：如柯慶施、李井泉、譚震林[81]、陳伯達、陸定一、陶鑄和劉瀾濤[82]。其他人他認為會隨風倒。

但是這個小組的作用卻由於毛說的下面一番話而難以確定了：

> 社會主義國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階級，在外國有人講，沒有階級了，因此黨是全民的，不是階級的工具、無產階級的黨了，無產階級專政不存在了，全民專政對像沒有了，……像我們的國家是否也適應？讓我們討論這個問題。我和大區來的幾個同志曾談到過這問題，瞭解到有些人聽到中國還存在階級大吃一驚。[83]

在毛信口講來時，將階級、階級之間的矛盾與當前的政策問題聯繫起來，顯然是警告他的同事們，他認為農村問題是一個原則問題。毛還沒有談到階級鬥爭，但他堅持矛盾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他主要談到人民之間的矛盾，但在 1957 年解決這類問題的辦法卻是反右

運動，這對統一戰線和中共使用非黨專業人員的能力起了災難性的影響。

如果承認國內階級還存在，就應該承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是存在的。階級的殘餘是長期的，矛盾也是長期存在的……如果沒有階級，也就沒有馬克思主義了，它就變成無矛盾、無衝突的理論。現在有一部分農民鬧單幹，究竟有百分之幾十？有的說 20% 或 30%，安徽更多……究竟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農業合作化要不要？「包產到戶」，還是集體化？[84]

毛很堅定，在安徽或其他地方採取的責任制，沒有一個可以合法地歸為僅僅是集體制度下的一種分工形式。想要單幹的是富裕階層、中農，甚至地富殘餘。如果中國共產黨不去勸說貧農反對這一方式，他們也會搞資本主義。

毛就這樣在當前的集體制度周圍建起了防禦外圍陣地，並謀求以發動進攻來保衛它，在這過程中批判了鄧子恢自 1950 年以來的所作所為。[85] 毛的第一個戰術就是譴責悲觀主義。那些感到沒有前途、失去信心的人是思想混亂或錯誤。他反覆說他在 1959 年廬山會議上的論斷——「成績很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86] ——並補充說「我對目前形勢的問題就不特別悲觀。不是一切都不好」。[87] 在 8 月 9、15 和 20 日所作一系列說明他思想的講話中，毛明確表示對 1960 年以來他與悲觀主義作鬥爭中所受到的壓制感到不滿。他批評那些不像他一樣注意光明面的同事：「有那麼一些人，沒有幹勁了，怎麼辦？他們鼓單幹之勁，鼓黑暗之勁，鼓講缺點錯誤之勁。講光明，講成績，講集體經濟，他們就沒勁了，怎麼辦？」在後來一次，他生氣地說，「講困難，講黑暗已經講了兩年多了，講光明不合法了。」[88] 他在這裏批評的對像是劉少奇、周恩來和陳雲，他們對經濟問題的處理是建立在春季對經濟形勢作最壞預計的基礎上的。[89] 毛對農民中願意試行責任制的

比例的估計顯然故意比田家英的數字要低，這是為了強調他有理由樂觀，他說農村問題不像鄧子恢所說的那樣嚴重。

毛的第二個戰術是批評他的同事們無能。「我們」（意指他自己）一直說農業是基礎，但在 1959 年至 1962 年這四年裏並沒有（由負責執行主席所訂目標的同事們）真正貫徹執行。主席將他在 1962 年讓位於劉的 6 個月也包括在內，明顯地指出他批評的是誰。他還怕人們不明白，繼續說，自從七千人大會以來，「我認為」在集中與分散的矛盾上「沒有解決好」[90]。換句話說，劉、周、陳雲、鄧等人在他不在時沒有掌握住農村的形勢。

毛的基本戰略是改變爭論的基礎。[91]一旦人們接受階級，也就是政治是農村的真正問題所在，而不是經濟，那麼，毛重新掌權就具有合法性了。此外，他使他的同事們心神不定。他說的話使他們想起上一次有關經濟政策的爭論在 1959 年廬山全會上變成了政治鬥爭，結果是 4 名高級官員被清洗。

3 天以後，他在對新的中心小組作了 6 次講話，在第一次講話中提高了價碼，從而佔了上風。[92]「今天，我只談中國共產黨會不會垮臺……國民黨維持了 23 年，我們還有幾年」。[93]（按：據英文譯出）在一切制度下，政治領導人偶爾會在高級隨從面前提出喪失政權的可能前景，以便使他們統一意志，再度效忠。毛當然也不會不用這謀略。[94]在這次，他也將政權的存亡與他政策的喜好聯繫在一起。但更重要的是，人們可以從他 1962 年 8 月 9 日那篇相對說來不長的講話所採取的戰術背後，看出他思想的要點，這些思想最後導致他做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蘇聯革命的墮落、中國受到影響的危險、需要階級鬥爭來防止這種墮落，中國高級幹部的缺點和他們未能做好工作。

在兩個共產主義巨人之間的關係相對和緩之際，毛對蘇聯的定性是特別嚴厲的，表明這種解凍與他不參與決策的時間相吻合，也不是意外。但蘇聯的墮落和中國未能消滅資本家這兩件事聯在一起說明他在未來的歲月裏思想的走向：

> 蘇聯存在了幾十年，但它仍是修正主義的，為國際資本主義服務。事實上，它是反革命。在《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中，有一句話說資產階級已被消滅了，剩下來的是資產階級思想的殘餘。這不對，應該修改……資產階級可以再生，蘇聯就是這樣。[95]（按：據英文譯出。）

毛看到（中國）滑向南斯拉夫模式的危險，而聽眾中有人將當前的現象與台灣的土地改革相比。[96] 主席多次將未能消滅農村資本主義歸罪於在後來解放地區中相對溫和的土改運動，而在較早解放的華北和西北區，則要徹底得多。中國共產黨早就控制了華北和西北地區，有些地區，在掌權以前 10 多年就控制了，他們在這些地區試驗了許多農村政策，後來用於中國的其他地區。[97]

但對目前農村思想滑坡，毛並不滿足於只批評過去的錯，即農民要求實行包產到戶制。這時他承認有 40% 的農戶實行了包產到戶制。他說，問題的部分原因是對派到農村地區的幹部沒有給予明確的指示，結果他們下去時有各式各樣的想法。可能他在責備自己，想當然認為他的意向會為田家英所瞭解和接受；更有可能的是，他在批評劉少奇於 7 月 18 日的講話中未能給予正確的引導。西南局和四川省第一書記、左傾的李井泉插話批評鄧子恢的講話，毛乘此詢問為什麼沒有要鄧子恢參加中心小組。他命令鄧子恢、王稼祥、康生、吳冷西（新華社社長、《人民日報》主編）和歷史學家胡繩（陳伯達在《紅旗》的副手）都參加中心小組。[98] 增加鄧和王可以被看成是主席的公平姿態，使他們能在最高級會議上發表他們的觀點。毛還增加了同情者康生和胡繩，他可以依靠他們對「修正主義」觀點進行尖銳的批判。而且，組員的擴大使得以毛打亂了會議最初的目的；現在更像一個普通的工作會議而不是核心成員會，這樣就可以壓制潛在的對手，操縱一組人去對付另一組人。

他將當前農村情況描述為有勞動力的家庭與沒有勞動力的家庭之間的對抗，這是有些公平的說法。他說，蘇聯以前試行個體耕種幾乎

有十年，但農業並無突破，之後斯大林進行集體化；他透露，康生正在準備這方面的材料。不那麼清楚的是他根據什麼說美國的農場平均有 16 戶家庭，這與中國小隊有 20 戶相差無幾。更咄咄逼人的是他說像曾希聖這樣的省級高幹受到了富農思想的影響。倒楣的河北幹部胡開明並不因為他人微言輕而逃避毛的批評。他曾寫信給毛宣傳包產到戶。[99]

毛宣稱在農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錯誤要嚴重得多。這與過左是不同性質的。修正主義在資產階級中是有根基的，如果中國共產黨不進行一萬年的階級鬥爭，中國共產黨就會變成像國民黨和修正主義分子一樣了。他還批評了過分的悲觀主義，嘲笑一些幹部像小資產階級農民一有困難，就無所適從，像疾風中發抖的小草。[100]

毛進而像一貫那樣將一些較理智的政策歸功於自己，即令這些在商業領域裏的政策可以被說成是「右傾」，[101] 他建議將商業部改稱瓦解部，因為它沒有執行在 1958 年 11 月鄭州會議後他作的指示。[102]（譯按：註釋中的原文未找到，按英文譯出。）

更重要的是，他像 1961 年 3 月在廣州那樣，嚴厲批評了由他最高級的助手們負責的部門，這就為他回到第一線打下了基礎。在說了軍事與外交部門不錯（這兩個部門大事的最後決策都是由他定的）後，他進而批評計委、經委以及國務院金融、貿易和農業辦公室，因為它們似乎根本未能解決各自的問題。像在 1958 年南寧會議上一樣，毛特別對金融和經濟領域的機構進行了批評：

> 他們從來不報告；在行動前，他們不請示，行動後，又不報告。他們是獨立王國。不管什麼時候，他們逼著人同意，上層不與中央聯繫，下層不與群眾聯繫……人人都知道外國的事，甚至甘迺迪想幹什麼都知道，但是誰知北京的各部在幹什麼？我不知道各經濟部門裏有什麼事，如果我不知道，我怎麼提出原則。[103] 我瞭解各省也有這問題。[104]（譯按：據英文譯出。）

當然，毛說這話是完全不真實的。近幾個月對他的回報是減少了，但無疑只能歸咎於他主動退居二線。劉少奇、周恩來、陳雲和鄧小平依然非常謹慎，不擅自做主。他們很注意地徵求毛對陳雲開出的猛烈的經濟藥方的意見。主席將當前的經濟危機怪罪於正想挽救危機的官員，而不怪導致危機出現的政策的制定者，也就是他自己，這是完全不公正的。他也暗示，如果徵求他的意見的話，他會提更好的怎樣做的意見的。

毛這時採取的是典型的的戰術，即分裂可能反對他的聯盟：他不點名，顯然是將一些人除外，至少是不指責他們在某些領域中的工作，如在軍事方面的林彪和羅瑞卿以及外交方面的周恩來和陳毅，而批評了其他大多數人，如計劃方面的李富春，經委的薄一波、財貿方面的李先念和農業方面的鄧子恢。周恩來當然與劉少奇和陳雲一起分擔監督經濟不力的責難，而陳雲則與鄧子恢一起分擔提倡包產到戶的責難。[105]

在毛懷疑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已真正改造好了的說法時，周和陳毅受到了批評。這說明他不贊成他的同事們討好這些人，並警告陳毅不要到處發表他的看法。[106]以後，周和陳毅就沒有在這個問題上再作過重要講話了。該年晚些時候，那些早先不同意周和陳關於知識分子的階級地位的觀點的人，在宣傳會議上受到鼓勵發表看法。陸定一以贊同的口吻向書記處會議報告了毛的觀點，他在十中全會上成為書記處的成員。陸自己在宣傳部公開表示不贊成周當時所作的幾次講話，他評論說他聽說過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但從未聽說過屬於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107]當時周也在場，這位總理為自己辯護說他是在闡述黨的政策。鄧小平支持他，並告訴陸查一下。鄧早些時候當陳被攻擊時也支持過陳，這時鄧告訴陸，他徵得毛的同意宣傳會議的記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討論）不下傳。[108]

在這新的左的氣氛下，統一戰線政策也受到了攻擊。百花齊放運動是統一戰線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周是支援的。毛特別反對為在

1957 年被斥為資產階級右派的知識分子平反，他顯然認為平反過於倉促了。[109] 在十中全會以後，中共統戰部部長李維漢不得不作自我批評，因為他被說成想要將民主黨派改造成社會主義政黨並成為社會主義領導核心的一部份。[110]

毛設法使省級領導人站在他一邊。他不是第一次這樣做。[111] 他讓他們講出他們的怨氣。他們奉命去執行嚴格的措施，他們因中央重新集權化而失去權力，他們還不滿意批評他們錯誤地執行了正確的政策——這是毛的同事們用以使毛免於責任的辦法。

在毛製造的緊張氣氛中，大多數高級政治家一定都感到岌岌可危，因此，毫不奇怪，沒有人準備站起來為不幸的彭德懷講話。彭因為在七千人大會上受到攻擊而惱火，因此他寫了一份很長的辯護書，於 6 月 16 日送達中央。毛置之不理，認為這是試圖為 1959 年廬山會議對彭的判決翻案，是沒有道理的。沒有人企圖去反駁他。[112]

人們並不難理解毛為什麼突然發動了反擊。他面臨的是他認為在關鍵政策上的根本性、而且是不能接受的改變：在農村，集體化的倒退，這會破壞他以社會主義改造中國的整個設想；與蘇聯的緩和，這會破壞他探求有中國特色的道路。[113] 在他眼裏，這就是向資本主義的「和平演變」。[114] 此外，這些改變推翻了他自己過去的政策：快速集體化，然後是快速的公社化和正面攻擊蘇聯修正主義。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在他那著名的論戰文章「炮打司令部」裏，他將 1962 年裏發生的事稱之為「右傾」。[115] 為彭德懷平反就會成為最後的一根稻草，意味著要承認大躍進的錯誤，遠遠超出毛在七千人大會上所承擔的責任，而這樣承認是災難性的，決不能容忍。

毛反擊的時機

毛有充分理由與他的同事們對抗並重申他的主導地位，但還有一個時機的問題。為什麼在 1 月底，他被迫做了他的同事明顯感到不同尋常的自我批評，從而解放他們，去探索激進的政策改變，而到 8 月

初卻又發動了無情的反擊，使他們匆忙尋找躲藏之處？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使毛突然有了信心？

決定性因素可能是夏收的規模，這是一個可靠的指標，說明秋收規模會更大，因而全年產量也會更大。[116] 毛在七千人大會以後巡視各地時，顯然各方面都告訴他 1961 年比 1960 年好。而 1962 年又比 1961 年好。[117] 5 月 11 日，周恩來告訴他的同事們「農業生產下降的趨勢，除部分地區還在繼續外，大多數地區已經停止並開始回升」。[118] 6 月份在濟南，山東的官員們根據最近麥收情況向毛也作了這樣的估計。[119] 到他赴北戴河時，他應該能有統計資料來支持這一估計。雖然 1962 年夏收情況尚未公告，我們知道至少在 7 月第三個星期末就應該能有資料可以統計出夏收的規模了，因為在 1958 年農業部在 7 月 22 日發表了夏收的數字，這些數字中國領導人應該在 6 月中旬就能看到。[120] 毛在 1962 年 8 月 6 日在北戴河作第一次講話時就透露他看到了對這年上半年工業成就的估計，很可能這是全面統計簡報的一部分。[121] 因為對秋收的第一次估計一般是在 8 月份做出的，毛也可能看到了。[122]

雖然我們不知道 1962 年夏收的規模，但我們確實知道該年的總產量。糧食生產從 1961 年的 1.475 億噸增長到 1962 年的 1.6 億噸，增長了約 8%，除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的一年外，這是一年中增長最快的，雖然它增長的基數不高。毛假定夏收的數字是鼓舞人心的趨勢的先兆，他一定確信中國農業已好轉了，而集體制度不會全面垮臺。的確，在秋收以前，人們普遍這樣看。[123] 8 月 11 日，劉少奇在辯解中承認在 5 月工作會議上他的兩個錯誤之一就是過早地說 1962 年夏收會比前一年要少。[124]

毛以前兩次在農村採取的重大行動——1955 年的集體化和 1958 年的公社化——都是在 7 月底或 8 月發動的，可能是他掌握了即將有大豐收的徵候。1955 年，像 1962 年一樣，在經歷了兩個困難年份後，第一個好轉的跡象早在 5 月份就可以看出來了。[125] 在 1962 年，他只計

劃要阻止後退，所以並不需要大豐收，只要能保證產量足以使人們不怪罪他禁止包產到戶就行了。他得到了這樣的產量。[126]

還有一個原因，但可能沒有那麼重要，即北戴河會議期間，毛得知美國會阻止國民黨發動對大陸的進攻。他因此就沒有必要爲了迫在眉睫的國際危機而去維護領導層的團結了。

十中全會

北戴河會議一直到 8 月下半月才結束，大部分與會者回到北京，中共十中全會的預備會議於 26 日在北京開始。會議討論了毛提出的幾件事，也討論了農業、商業、貿易和計劃[127]問題，一直繼續到 9 月 23 日。第二天上午 10 點，毛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十中全會開幕，並作了第一次發言。[128]

毛的主要重點還是在後來貫穿於文化大革命意識形態的一些問題上：階級鬥爭，特別是在社會主義世界中的階級鬥爭，以及沒有階級鬥爭，共產主義政權就有被推翻的危險。他的目的是反對國外的修正主義和防止國內的修正主義（反修防修）。[129]

> 社會主義國家有沒有階級存在？有沒有階級鬥爭。現在可以肯定，有階級存在，階級鬥爭肯定是存在的……要承認階級長期存在，承認階級與階級鬥爭，反動階級可能復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幹部、教育群眾、教育中層和基層幹部，老幹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們這樣的國家，還會走向反面……所以我們從現在起，就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開大會講，開黨代會講，開全會講，開一次會就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一條比較清醒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著重點是我加的）[130]

我們不知道自從毛在七個星期以前在北戴河會議的開幕式講話以來，他是否遵循自己的指示，天天講階級和階級鬥爭，但他一旦帶了頭，他的戰友們就得跟著做。毛的高級同事們，在他不在時制定了實際的新路線，但他們中沒有一個人想制止他這種在思想意識上的復古

論。陳雲似乎沒有出席這次會議。[131] 鄧小平和彭真明顯地決定不向後代說明，他們在北戴河或十中全會上的討論中講過什麼。同樣地，劉少奇和周恩來身後出版的文集的編輯也寧願不談他們在這些會議的言論。毛的同事們似乎在他堅定的決心和不可抗拒的性格面前完全瓦解了。

毛在恢復掌握權力後，馬上就開始軟化劉。主席問劉為什麼沒有制止陳雲宣傳包產到戶。這一招很高明。[131] 雖然毛很可能懷疑劉也贊成包產到戶，但這次毛沒有批評劉本人，而是給他一個機會戴罪立功：指責陳雲、鄧子恢，從今往後否定包產到戶，而且暗示還要和毛反對的任何領導人和政策劃清界限。劉投降了。

在北戴河，劉作了自我批評，因為在 5 月工作會議上犯了兩個錯誤：對夏收估計不足和認為單幹已佔總數的 20%。[133] 9 月 26 日十中全會最後一天，他在講話中的主要關注點就是和主席保持一致。他的講話常被毛打斷。[134] 在毛的領導下，發展一直比較順利，到了 1959 年，因為天災和工作中的一些錯誤導致一些比較大的困難。但是，真正的問題是人們對這些問題採取什麼態度。大多數同志克服困難，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毛主席、黨中央的革命道路，這就是西樓會議和 5 月工作會議的路線。但有些人在困難面前被嚇倒，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採取在農村單幹。這是鄧子恢的態度。此時，毛插話說這些人名義上沒有放棄社會主義道路，聲稱他們只是謀求經營方式上的改變，但實際上是單幹。劉接著說，許多人寫信給中央，主張單幹，而鄧是他們的代表。劉將鄧的主張說成是「毒草」。鄧雖然受到批判卻毫不畏縮地贊成責任制，這樣在全會以後，他被解除了農業事務中的職務是毫不令人奇怪的。[135]

最後，還有人，如彭德懷，想利用中國的困難來攻擊中國共產黨，陰謀推翻中央和毛主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領導。這三種態度中，第一種是正確的，第二種是動搖，第三種是敵對的態度。毛又插話說，第二種人不懂馬克思主義，沒有認識到共產黨勝利後，仍有實

行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的問題。劉繼續說，如果領導人讚成單幹，中國共產黨就會改變性質。他採取了毛在北戴河的路線，盡量縮小單幹的問題，認為單幹主要局限於安徽和甘肅。[136]

劉關心的第二個問題是洗刷自己誇大了中國形勢的黑暗面的罪名。他堅定地說，最大的困難現在已過去了，但宣傳工作仍將強調困難。在5月工作會議上，對困難的估計多了一些，這種態度還不是個問題。但是，如果對困難的估計太多，這就表明對社會主義的信心動搖了。或許劉已經得到了毛的同意和讓步，允許在公眾樂觀的前提下持有個人悲觀態度。至少，劉得到了毛的默認，即在上述前提下，把劉早先的估計，解釋為是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作為回報，劉擁護毛的看法，即令在共產黨取得政權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兩條路線鬥爭必然要繼續幾十年，可能幾百年，或者，像毛插話那樣，五到十代。劉最終是這一理論的主要受害人。但這時，他抓住機會對主席大加奉承：斯大林說錯了，毛說得對——毛謙虛說，他只是追隨列寧而已。[137]

突出經濟問題

可能由於劉這樣對毛全面支持，使毛同意不讓意識形態問題幹擾經濟問題。[138]主席總是小心謹慎的，這是可以理解的。他完全知道如果他在全國範圍內發起反修正主義——這是他對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新名詞——鬥爭，那麼痛苦的經濟恢復過程就可能像1959-1960年那樣災難性地夭折，那麼，他的同事們可能最後聯合起來反對他。[139]如果他當時腦子裏已有四年後他終於發動的那種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概念的話，他知道，現在時機還不成熟。相反他告誡全會：

> 注意階級鬥爭不要妨礙了工作。1959年第一次廬山會議原來是談工作的。彭德懷跳了出來說，「你罵我娘罵了40天，為什麼我不能罵你娘20天？」這罵娘將會議搞亂了，工作受到影響……工作和階級鬥爭應該同時進行。階級鬥爭不應放在突出

位子上……我們必須進行階級鬥爭，但有專人負責這類工作。公安部就是專門負責進行階級鬥爭的。[140]

劉在這問題上也跟著說，黨內修正主義分子不戴假面具的不多，全黨沒有必要全捲進去，幹擾工作。幹部應照常工作，由特殊的隊伍對付國內和國際的修正主義。需要的只是一點教育工作。毛插話說，只有科級以上的 10 萬幹部應討論一下。[141]

這一規定使十中全會與二個大躍進會議——1958 年北戴河和 1959 年廬山會議——形成了奇怪的對比，那時既強調生產，又強調思想意識的正確性。在大躍進時，這二者被認為是有聯繫的，相互促進的。在 1962 年，則默認這二者可能是有矛盾的。結果是雖然十中全會被人們正確地認為是決定性地回到了左，最終導致文化大革命，但它也做出了一系列經濟決定，與正在進行的調整相適應。[142] 然而，有證據證明不論毛怎樣做出了認真的限制，十中全會向左轉的確影響了經濟工作。[143]

定稿的《農業六十條》

由於恢復農業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任務，可能出自十中全會的最重要文件就是定稿的農業六十條了。1962 年 9 月的文本與 1961 年 6 月傳閱的文本有很大差別，反映出早些時候的文本起草後發現的問題、爭論和決定。

主要的修改反映出大隊的作用減弱了，限於領導、督促和幫助小隊，而小隊的作用擴大了，成為核算的基本單位，這點毛在一年前就接受了，而現在則也是所有制的基本單位。[144] 毛在以小隊為核算單位問題上做出讓步以後，對爭論過的所有制與經濟責任分離不可行的問題也被承認了。難以實行的大隊 控制小隊的三包一獎制自然也在大肆削減大隊職責後消失了，大隊（和公社）一般不應從小隊積累資金；大隊幹部的職務工分限制在小隊總工分的 1%。確實，這時公社被視為相當於以前的農村行政單位「鄉」，中國共產黨曾準備，在適當時取消

大隊一級單位，尤其在「鄉」很小的地方。[145] 由於大躍進以後不久，單位縮小，公社的三層組織的數量均有相當數量的增長；[146] 這時公社與小隊的數量有進一步的增長，但大隊的數量有所減少，因為有些大隊撤銷了（見表 12-1）。

表 12-1 1961-1964 年公社及下屬單位數量

	1961	1962	1963	1964
公社	57,855	74,771	80,956	79,559
大隊	734,000	703,000	652,000	644,000
小隊	4,089,000	5,530,000	5,643,000	5,590,000

資料來源：《農業年鑒》，1980 年，第 5 頁。

雖然 1962 年夏，鄧子恢受到了攻擊，但定稿的六十條卻帶有他的印記。六十條賦予農民以非常接近於法律上的保證——嚴肅地寫入官方的中央計劃中——新的核算制度「至少」35 年不變，這恰是鄧提出的。[147] 小隊所有制並未保證 30 年，而是「長期」，但這也意味著承認鄧的分析是正確的。他曾指出，在許多小隊對他們擁有的土地相當不滿，因為由於集體化，土地所有情況有了很大的改變，使許多村莊現在比以前更糟，以致他們不得不恢復自負盈虧。[148] 保證當前土地所有制 30 年不變會使這些不公平的作法以及由此引起的不滿永遠存在下去。但另一方面，這時中國共產黨在農村最不願做的事是對農村的土地進行大規模重新分配，從而引發人們的憤怒與爭論。由於對當前的土地所有制保證相當長但又不確定的時期，中國共產黨贏得了時間，同時又保留了在更為繁榮的情況下糾正人們抱怨的可能。

其他的改變反映了生產需要和意識形態需要的奇怪的結合。在老辦法下，大隊可以至多積累的資本數為可分配收入的 5%，但小隊積累數則減為 3 ～ 5%；大隊福利基金數最高為可分配收入的 3 ～ 5%，而小隊則僅為 2 ～ 3%，這兩項改變顯然是為了留下更多的錢作為分配給家庭的收入。[149] 農民有權購買中型農具，而不僅是「小」型的。[150] 在強調建立規範的重要性同時，將以前重產量，輕質量的作法顛倒過來了，這反映了單一強調總數的負效應，這已為大多數人所看到。[151]

位於房屋附近的自留地仍限於土地的 5 ～ 7%，但鑒於農民對自留地極為重視，由私人管理的土地增至 15%，包括森林、荒坡和荒地；農民也可以在他們後院外面指定地區內種樹。[152] 該年晚些時候，當局又擴大了這些措施，發出指示，鼓勵農民進行傳統的副業活動，並禁止幹部們將之稱為資本主義。[153]

正式寫入六十條草案的雙重目標明顯地體現在公社代表大會與管理委員會成員資格的條文上。以前規定代表大會代表最好由下列人員組成，即有經驗的老農、青年、婦女、少數民族和歸僑，這時增加了有特殊技藝的工人（手工業者），以增加這些機構的技術知識，還有復員人員與革命烈屬，以防思想意識上的滑坡。[154] 當代表選擇管理委員會成員時，以前要求他們保證貧下中農佔絕大多數；這一要求在 1962 年草案中也保留了，但為尋求寶貴的經驗，在這些資格的前面加上了「老」這個形容詞。[155]

幹部的新三八作風中也可以見到這同樣的雙重目標。新三八作風是在前一年制定並在劉少奇對七千人大會所作的書面報告報告再度確認的。[156] 三條主要紀律做了次序上的變動和文字修改：以前列為第二的執行黨的政策，現改為第一。增加了服從政府指示並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更多地強調了生產。同時，任務繁重的幹部在執行指示時獲得更大的餘地，他們只要「真誠」而不是「正確」即可。實行民主集中制則從第三條升為第二條，可能反映了毛在 1 月底對這問題所作的講話，而將第一條的說老實話放在第三條可能意味著中央認為現在能更有保證地獲得真實情況。

八項注意中的第一項是全新的，即「注意群眾的生活」，對其他各點的變更也表明對幹部與農民之間的差距有了更多的認識。幹部不僅要參加勞動（這可能意味著在自留地裏勞動）而要參加「集體」勞動，與農民肩並肩地勞動；他們不僅不得有特權，還要與群眾打成一片。

然而，這些修改並沒有忘記對思想的要求：幹部不僅要提高政治水準，還要提高無產階級覺悟[157]；農民不僅要盡責和遵守國家政策，

還要提高他們的社會主義覺悟；[158]黨支部在宣傳中不僅要宣傳總路線，還要宣傳另兩面紅旗，即大躍進和人民公社。[159]

東海聖人

毛的負責管經濟的同事們無疑對六十條中所作的折衷平衡感到鬆了一口氣。此檔似是具體地證明瞭毛同意不應停止調整計劃，也同意階級鬥爭應由專家處理，不應太突出。但不論怎樣予以限制，階級鬥爭對那些與毛有衝突的人都預示著惡兆。在十中全會上，毛表示彭德懷和在廬山會議上與他一起被斥的三個人將再受「專案審查委員會」的審查。鄧小平宣佈（在康生提議下[160]），他們不再有資格參加他們所在黨組織的會議，雖然他們仍是成員，但這一措施只是對當前形勢的一種正式確認而已。[161]毛對所有人表示彭可以隨便寫多少信，信隨便多長，但只有死了後才能平反——這恰恰是後來發生的事。所有的人都按毛的口徑發言，彭因他最近的信在全會遭到批判。這封信被說成是響應中國的敵人的。為易於記憶，中國的敵人被名為「三尼一鐵」（甘迺迪、尼基塔·赫魯曉夫、尼赫魯和鐵托）。[162]

不知道毛的同事們對與毛合作再次對已受屈辱的元帥進行報復是否後悔。但他們在主席宣佈成立第二個專案審查小組來審查一名全新的受害者應該有所警覺，因為這表明毛確信有反對他的陰謀。這名新的「反黨」人物是周恩來的國務院裏一名關鍵的副總理習仲勳。當周和鄧小平不在北京時，他有時代理總理的職務。[163]主要迫害者康生的身份，和侮辱他的根據和方式都預示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幾個月的情景。

即使對康生的同事們來說，康生也是一個陰險的影子人物。陰險是因為他在1949年以前在蘇聯和延安的所作所為，影子人物是因為在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後的頭6年期間，人們幾乎沒有見過他（顯然是由於有病）。[164]然而，他顯然是個有相當能力的人；田家英對他很尊敬，稱他為「東海聖人」。[165]他1898年（與劉少奇和周恩來同歲）生於山東的一家富有的地主家庭，先在家設學館與兄弟學習中國古典文

化[166]，後來被送到青島的德國教會學校去讀書。在那裏，他除了儒家的書籍而外，又學了現代西方知識。[167]雖然 1919 年的反對帝國主義的五四運動激起了他的愛國主義[168]，但他還是呆在家裏 5 年，在當地小學教書，1924 年才赴上海，將妻子和二個孩子留在山東。康進入由中國共產黨支持者管理的上海大學社會科學部。第二年，他與一名學生曹軼歐相識，後來他們結婚並且都參加了中國共產黨。[169]

1927 年 3 月，當時已是當地的高級官員的康參加了上海工人那次成功的起義，並在後來逃脫了蔣介石下令對共產黨員的大屠殺。他已顯示出組織才能，到 1930 年，他任中共組織部的秘書長。[170]在 1937 年，周恩來任命他負責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安全與偵察活動，從而開始了他後來終生的職業。[171]

這一期間，由於與國民黨決裂後共產主義活動中的激烈變動，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從一些笨拙的手中傳到另一些笨拙的手中。康的傳記人說由於康靈活明辨，見機行事，隨著政治風向機敏地改變效忠對象，在黨內一路遷升。[172]西方評論者對周恩來也是同樣的評價。到 30 年代初，康已與 28 個布爾什維克的首領王明勾結在一起了。28 個布爾什維克是在蘇聯受訓又由他們的保護人巴維爾·米夫派回中國領導中國共產黨的中共黨員。在王的庇護下，年康生成了中央委員，1931 成為組織部長，1934 年任政治局委員。從 1933 至 1937 年，康在莫斯科作為王明的代表領導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團，得以親眼目睹斯大林的大清洗，據說他在中國駐蘇僑民團體內也試用了一些清洗的手段。[173]

1937 年 11 月底，康生返回中國，到延安加入王明一夥，一個月後被任命為中央書記處的書記。但康很快就發現在中國土地上權力關係與他在莫斯科可能看到的大不相同，這時他就轉向效忠毛了。[174]

當毛想要鞏固他在 1935 年 1 月在遵義會議上贏得的權力時，康是個有價值的助手。康可以出賣王明及其一夥的秘密。他熟悉莫斯科的政治和員警的方法，俄文又很流利，所以成為與蘇聯客人的主要接觸

人。他學習了相當多的馬列主義，又瞭解斯大林主義的論戰方法，所以有理論家的氣質，還寫得一手流利文章。[175]可能當時更重要的是，他得以將一位他在山東結識的上海女演員介紹與毛認識，並且，當毛的同事反對毛與江青結婚時，康證明瞭她無可挑剔的政治資歷。[176]他的天賦以及新被發現的忠誠為他贏得了兩個重要職務：中央黨校校長，在傳播毛的思想方面起到關鍵作用；和中央社會部部長，社會部就是中共的安全部門，換了個溫和的名字而已。[177]

40 年代初，在毛的主要對手張國燾叛逃，王明受辱以後，這位取得勝利的黨的領導人發動了整風運動，在他的支持者中灌輸他的原則。[178]這開始時是一個思想教育運動，但是，戰時的危急情況，以及國民黨特務滲入的危險，使康生發動一個廣泛搜尋特務和第五縱隊的運動，對忠誠的黨員進行誣陷。一方面，據說康生曾稱，奔向延安的青年和幹部中有 70 ～ 80% 是政治上不可靠的。無情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會議相當可怕。此外，根據捏造的指控進行了大規模的逮捕。黨的高級幹部警覺了，重新審查了這些案件，糾正了結論。最臭名昭著的事件就是 1947 年將作家王實味及另 100 名嫌疑人在案件審定以前就處決。[179]但在此前，康生已被解除了社會部的職務，因為 1945 年中共七大上對他在整風運動中的所作所為頗多非議。然而毛為他保住了在政治局裏的位置。[180]

到 1962 年，康生何以在政治局裏保留了位置，對中共 1,700 多萬黨員，加上 1949 年以後入黨的 80% 來說，可能都是個謎。[181]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的歲月中，人們幾乎見不到康生。他顯然對沒有任命他為新政權的整個華東地區的領導人，而只是山東地區的領導人感到憤怒，他託病臥床，在醫院裏呆了幾年，使醫生們困惑不解，無法作出診斷。他直到負責華東局的饒漱石與高崗一起被黜時才在公眾面前露面。[182]在許多國家的政治文化中，這樣的裝病是會受到罷黜處罰的，但是，雖然康的地位在 1956 年八大會議上有了波動，卻仍保住了政治局裏的位置，只是從委員降為候補委員。[183]他受益於毛，毛一向

保留和保護那些他信任和依靠、並且他預見到會在將來有用的人。[184]康生馬上應用了他在意識形態上的專長，吹捧主席的思想，煽動個人崇拜，毫無區別地支持毛在 1957 年的「右」的政策和大躍進中的「左」的政策，從而向毛證明瞭他的價值。[185]他有了多項頭銜，他也盡量利用了這些權力：1957 年 3 月任中央文化教育小組副組長，1959 年 3 月任毛的選集的編委會副主任，1959 年晚些時候，又負責中共黨校。[186]大躍進的垮臺使他暫時不受寵；他花了些時間在各地巡視，並恢復了他年青時對傳統戲劇的興趣，有時與江青在一起。江青倒是真有病，這時已恢復了。[187]但是，當毛在北戴河敲響左傾的警鐘時，康生做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迅速予以響應。[188]他的戰略就是攻擊關於一位革命烈士劉志丹的小說稿子。

劉志丹事件

劉志丹於1903年生於西北的陝西省。1926年他即已成為中共黨員，進入黃埔軍校第四期（與林彪同期，該校是由蔣介石指導的，並有蘇聯軍事顧問）。[189]在 1927 年國共分裂後，他回到陝西並建立了一支遊擊隊。一度，他受到中共領導層「左」傾人士的攻擊，但在毛和長征部隊 1935 年抵達陝西後，獲平反。他死於 1936 年與國民黨的戰鬥中，當時只 30 多歲。[190]

寫作這本有關他一生的小說的起因類似海瑞的那個劇本。吳晗原來無意寫有關該明朝官員的劇本，只是在戲劇公司不斷要求下才寫的。他不願寫是因為他不是個劇作家。《劉志丹》的作者李健彤在 50 年代中有人找她時也對接受這一任務非常猶豫。她認為她沒有足夠的藝術或思想水準。由於她與劉志丹的弟弟劉景范（地質部副部長）結婚，又與劉志丹有複雜的「鬥爭關係」，事情就更複雜了。李的丈夫是不同意她接受這任務的。但是工人出版社認為劉是一套為提高和陶冶革命情操的叢書的好題材。出版社認為以小說方式來敘述，如有錯誤或遺漏，就可以藝術虛構來解釋。可能這說法打動了李健彤。劉志丹

倖存的戰友們級別最高的習仲勳副總理在知道這一寫作計劃後警告過她，由於劉曾捲入過黨內爭論，這可能給她帶來麻煩。她最終決定不顧他的忠告，像吳晗那樣接受了她毫無經驗的任務。她以二年時間搜集資料、訪問曾是劉的戰友，之後於 1958 年開始寫作，並於 1959 年將第三稿送往出版社。編輯們認為稿子可用，但李要求送給習仲勳去批准。【191】

像劉志丹一樣，習仲勳也來自陝西。他生於 1913 年，1926 年加入共青團，1928 年加入共產黨。到 1932 年，還只有十幾歲時就在陝西與甘肅邊境處建立了一支遊擊隊。【192】就是在這裏他參加了劉和高崗的部隊。劉與高是毛與長征部隊抵達西北以前西北的兩名共產黨領導人。在內戰時期，人民解放軍南下，習留在西北，任該地區的黨的領導官員，一直保留此職直至 50 年代初才赴首都。習在擔任了短時期的中共宣傳部部長後，於 1954 年任國務院秘書長這一重要官職。到 1962 年他仍在此位上。【193】

習對稿子不滿意，在又作了三次修改後，他似乎對執著的作者不耐煩了，沒有通讀完後來的幾稿就同意了。【194】但李健彤仍不放心，又於 1962 年將第五稿送給她的原來的老師周揚，請他審閱。周當時任負責文藝事務的中宣部副部長，有權力給予出版許可。他提出幾個問題，但沒有禁止出版。至少有一名來自陝西的幹部對該書有不同看法。1962 年夏，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三星上將、雲南省第一書記、一度是劉志丹的戰友閻紅彥寫信給作者，提出沒有一個作家能負得起對歷史作結論的責任，這種責任是要由中央負的。由於閻的反對，決定在《工人日報》和《中國青年》上印第六稿中的幾個章節，聽聽反映。在北戴河，閻馬上勸說全國總工會和共青團領導——劉寧一和胡耀邦——下令停止出版。閻還書面向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提出此問題，在 9 月 8 日，又向十中全會預備會議提出。【195】對李健彤、習仲勳和許多中共高級官員來說，不幸的是，閻紅彥採取了進一步措施，向康生提出此事，聲稱小說的目的是為高崗翻案【196】。

高崗與劉志丹不同，在西北戰爭中倖存下來了，由於得寵於毛，遷升高位。但 1953 年他做得過頭了。他想要取代劉少奇作為毛的接班人，並據說與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饒漱石一起陰謀使中共高級領導大換班。[197] 這兩人都被清洗，高被軟禁，之後開槍自殺。[198]

走狗當道

高崗事件在 1962 年仍未結束。我們看到，在七千人大會時，據說彭德懷與這事也有牽連，這成為毛拒絕為這位元帥平反的主要根據，雖然他對大躍進的嚴厲批評被證明是正確的。這就無怪乎康生在聽到有一個新的高崗陰謀時豎起了耳朵。在毛在北戴河又掀起黨內鬥爭的緊張氣氛中，對康生說來，這是個天賜良機，再次向主席證明在挖出叛徒方面，他是不可缺少的人物。

康生當時的職務中有一個是中央文化教育小組副組長和該小組下屬理論組組長。據此，他命令宣傳部停止再刊登《劉志丹》的章節，雖然此時他甚至還沒有看到過稿子。他命令第三稿印 300 份，第五稿印 600 份，發給北戴河會議參加者審查。8 月 24 日，他寫信給中央辦公廳說，這不僅是個文藝問題，而是有政治含義的。他創造了「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是一大發明」的詞句，毛非常欣賞這話，後來這話被說成是主席說的。[199] 但作者劉健彤是個小人物，因此康生編造出一個以習仲勳為首的高層陰謀集團。

為什麼毛抓住《劉志丹》事件，不調查就任康生為所欲為，或為什麼他要相信這些指控呢？[200] 他不是有許多事要做，要阻止他的同事們在農村和國際上追隨修正主義政策嗎？一個原因可能是他很樂意有一個新的案件，仿佛專為他打造，以證明他發出的需要階級鬥爭和長期警惕的警告是正確的。第二，自從匈牙利叛亂和中國的百花齊放運動以來，他對知識分子利用專業技巧為非法的政治目的（即裴多菲綜合症）服務已極為警覺了。[201] 康的新想法引起他的共鳴，在 60 年代毛要加強對知識分子的壓力。最後，正如康生無疑靠直覺感到的那

樣，攻擊《劉志丹》是一個極好的方法，證明高崗事件還未結束，因此更有理由拒絕為彭德懷平反。

由於他自己的原因，劉少奇在彭德懷問題上必須贊成這一戰略，但在十中全會上，他也以同樣的口徑批判了習仲勳和《劉志丹》[202]。沒有記錄證明周恩來曾設法拯救這位他顯然認為是國務院裏關鍵的成員；在得到毛的允許，當著陳毅的面，這位總理只安慰習仲勳，保證如果對《劉志丹》的指責是錯誤的，那就會得到糾正。[203]這樣，在十中全會上，康生就得以帶頭對習進行攻擊，以後又領導了第二個專案審查小組來審查據說由習、賈拓夫和劉景範領導的「反黨集團」。賈拓夫曾是劉志丹的戰友，當時任中央委員、國家計劃委員會的副主任，[204]劉景範則是劉志丹的弟弟，作者李健彤的丈夫。康生聲稱小說中一個叫羅閣的人物代表高崗，就像他 3 年後稱海瑞就代表彭德懷一樣。出版社和整個西北的官員都受到審查，在文化大革命爆發時，案件仍未結束，成為人所共知的事。[205]康生得到的獎勵就是在十中全會上升為中央書記處書記。2 個月後，他遷入首都的釣魚台賓館，負責反對蘇聯修正主義運動的一個意識形態小組。[206]毛的文化大革命別動隊中最激進的一名打手，現在已就位成為執行者，幫助制定國內外政策，最終成為那場災難的序曲。

第十三章 喜馬拉雅山戰爭，加勒比海危機

康生在毛反對國內外的修正主義運動中所起的雙重作用標誌著中國國內與對外政策之間的密切關係。毛的許多重要講話開始時都是從大視野出發的，這明顯地說明他認為中國革命是全世界許多大事中的一部分，而二者又是相互影響的。在共產主義集團內更是如此。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攻擊，對毛說來，有個人意義。匈牙利叛亂有助於在中國引起新的整風運動。[1] 毛承認蘇聯對公社的憤怒導致他修改了為公社提出的意識形態主張。[2] 到 60 年代初，毛開始考慮蘇聯修正主義對中國國內的政治有什麼含義。[3]

中國的軍事行動與國內的政治之間的關係更模糊一點。中國捲入朝鮮戰爭使得中共的領導人能發動一個愛國運動將人民團結在身後，但這是一種意外的收穫。派出中國遠征軍去保衛搖搖欲墜的金日成政權明顯地是對威脅的一種反應，不允許中國邊境上出現一個與美國同盟的、團結一致的反共產黨的朝鮮。[4]

1958 年台灣海峽的危機也是中國對外部事件的反應：中東危機以及蘇聯拒絕對之採取強硬行動。[5]（中東危機）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無直接威脅，而朝鮮戰爭還可以說是有威脅。如果中國僅僅像在 1956 年蘇伊士運河危機那樣，再次發動大規模抗議集會，發出威脅要派志願人員，也可以滿足它的榮譽感。但 1958 年 8 月 23 日炮擊金門就能使毛更好地鼓起人們對公社運動的熱情，這也可以給赫魯曉夫一個教訓，應如何與帝國主義對抗。[6]

中國在 1962 年秋在外交事務上的新的姿態，同樣有助於創造適合的氣氛，開展毛在北戴河和十中全會上所要求的國內階級鬥爭。但是中國是不得已才對新德里和莫斯科這兩個外國首都的決定作出反應

的。毛不喜歡王稼祥的三和一少政策，出現的事件使他得以否定這一政策。

印度的「前進」政策

例如，很明顯，1962 年 10 月中印邊境戰，至少部分是中國對在新德里的所謂「前進」政策的反應。[7] 這政策於 1960 年提出，前一年出現邊界爭端，導致衝突與傷亡。當年 4 月舉行首腦的會議中，印度總理尼赫魯與中國總理周恩來未能解決。[8] 前進政策計劃，印度部隊盡量深入到西藏與喀什米爾邊境的有爭議的阿克塞欽地區，直到印度認為是前沿的地方去巡邏。然而，這一設想並未實行，因為部隊不願在軍事資源處於劣勢而供應設施又很差的條件下向前推進。

然而，1961 年 9 月，新德里情報局作出新的評價，得出結論說只要印度建立了哨所，中國人對它們就不會進行挑戰。11 月 2 日，尼赫魯與他的國防部長和親信梅農，以及高級軍事官員開會，會上作出強硬的決定向前推進，並在拉達克建立新的哨所。命令下達了，沒有給西部地區的小心謹慎的指揮員以繼續拖延的餘地。即令在西藏與印度的東北邊境局邊境沿線的東部區，不得在邊境 3 公里內有行動的禁令也取消了，而當時這一地區是寧靜的。當地指揮官受命，向印度所說的麥克馬洪線作「系統推進」，以「堵住空隙」。

尼赫魯顯然不知道邊境印度部隊的狀況很糟，也肯定不願意從國外緊急採購武器，但他之所以制定這樣的政策是因為他相信印中之間不可能爆發戰爭，而這一信任又是建立在中國人不會發動一場大的進攻的假設上的。[9] 而這一錯誤的假設又由於直至 1962 年 9 月蘇聯也這麼說而得到了加強。[10] 印度情報單位從沒有想對中國國內和外交局勢作出分析，這就加劇了這錯誤的認識。相反，印度人依賴的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簡報、報紙上的報道，可能還有印度駐北京大使館有關中國的經濟危機、與蘇聯的決裂和台灣入侵的威脅等方面的報告。印度得出結論說中國各方面的壓力太大，不可能考慮進行重大的對抗。[11]

此外，印度部隊在1961年12月很快地就收回了葡萄牙在果阿的殖民地，這一勝利產生了虛假的安樂感，很容易掩蓋起在這相對簡單的活動所暴露出來的「軍事上的不適應」。[12]

1962年上半年，在拉達克的印度部隊逐漸得到了加強，兵力達到4個營，分在60個哨所和巡邏隊中，但人數與中國相比仍為1與5之比，而且火力也弱。在東北邊境局，在山坡高處，靠近西藏邊境處建立了新的哨所。雖然始終缺乏足夠的後勤支援，但在總參謀長B．M．考爾的堅持下，在東、西兩區，都採取了這些行動。

從1961年12月至1962年2月，中國沒有採取行動，但在3月1日中國外交部又對印度的這些行動提出了抗議。4月30日，北京的第7次照會發出了威脅。在列舉了據說在4月15日至27日期間印度部隊作出的十五次新的入侵後，中國照會聲稱人民解放軍將恢復在有爭議地區的巡邏，即從卡拉柯拉（Karakoram）山口至孔卡（Kongka）山口一帶。自1959年衝突以來曾停止巡邏。，並聲稱如果印度繼續其前進活動，人民解放軍將在邊境全線巡邏。尼赫魯並未受到這威脅的制止，仍然相信中方不會進行大的戰爭。他的判斷似乎在5月份得到了證實。一支佔優勢的人民解放軍進入到印度新的哨所前，顯然想要消滅它，但以後卻什麼也沒有做。[13]

中國軍事委員會2月1日制定的作戰規定是很嚴格的。在他們控制線以內30公里地帶裏，中國部隊不得發射武器、巡邏、打獵，甚至不得追捕反叛的西藏人；在控制線內20公里地帶裏，限制更多：不能打靶、演習或爆破。如果印度部隊侵入，中國部隊首先要發出警告，設法迫使他們後退，如果無效，應按國際慣例沒收其武器，在予以解釋後，發還武器，讓其離去。[14]解放軍排長們一般會評論，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但中國人的謹慎是有道理的。

1962年5月至6月，北京主要關心的是台灣反攻的威脅。雖然印度的行動可能被視為在美國和蘇聯的支持下包圍中國的戰略的一部分，中國領導人並不願意在喜馬拉雅山區挑起對抗，因為這可能要

將兵力從福建沿海那些主要危險地點轉移過去。兩面作戰肯定是不利的，中國的報紙對印度邊境的事件低調處理。[15]《人民日報》6 月 3 日的社論可能反映了當時中國領導人對三和一少政策的偏愛。[16]該社論對印度拒絕續簽 1954 年的貿易協定表示遺憾，並重申中國政府和人民永遠不會改變他們保衛中印友好的立場。[17]只是在 7 月以後，在美國的保證使國民黨入侵的威脅不再存在以後，[18]中國人得以集中精力將印度邊境看成是個需要謹慎對待的對外政策問題。

第一次衝突

開始，人民解放軍的行動似乎並無變化。一個印度排冒險進入中國哨所後面的一個陣地，從而在 7 月上半月引發了衝突，雖然中國部隊自 5 月底已增到營的兵力，他們並未予以攻擊，因而這對印方是進一步的鼓勵。[19]7 月 21 日，中國部隊自 1959 年以來第一次對印度巡邏隊開火，導致印軍 2 名傷亡。[20]

雖然印度國會口頭上氣勢洶洶，而且印度又購買了蘇聯飛機，[21]沒有一個瞭解情況的印度官員會懷疑，一旦小衝突升級為全面對抗，中國軍力是佔有優勢的。印度參謀長 1961 年 1 月份提出的有關國防政策的主要報告稱：「如果戰爭性質超過有限戰爭……進而發展成全面戰爭，導致對我國領土的入侵，除短期外，我國部隊將無力進行戰爭。」[22]以上報告的評價是由受人尊敬的前陸軍參謀長K・S・蒂馬雅將軍領導做出的。他在 1962 年 7 月寫道：「即使作為一名士兵，我也不能想像印度主動與中國發生公開衝突。中國目前在人力、裝備和飛機上的力量超過我們一百倍，而且還得到蘇聯的全力支持，我們在可預見的將來不可能有望與中國相抗衡。必須由政治家和外交人員來保證我國的安全。」[23]異乎尋常的是參謀長們的報告甚至沒有向印度政府提出要有一個足以抵禦中國全面入侵的兵力，而只提出軍隊需要更好地對付不斷的邊境衝突。即將到新德里司令部任軍事作戰處處長的帕利特准將在 1961 年初看到這報告後，得出結論說該報告提出抗擊中國威

脅的建議「是不負責任地簡單……對這樣一個嚴重問題竟會如此漫不經心地處理，真是難以置信……」[24]

可能印度政府瞭解到這種根本性的弱點，它才在有關衝突的照會中採取了相對和緩的語氣。7月21日，中國照會有下列說法，「中國政府曾多次聲明中國不願與印度作戰，中印邊界問題只能通過正常協商來解決。」[25]印度在7月26日答覆稱，「印度政府充分回復中方的意願，和平協商的辦法來解決。」[26]

甚至在衝突以前，尼赫魯總理在招待離任中國大使潘自力的宴會上似乎作出了重大讓步，他說印度準備進行討論，不以從有爭議地區撤出部隊作為先決條件。[27]7月26日的照會重申這一立場，表示願意在「一當目前緊張局勢有所緩和，並有適當氣候時」進行談判。[28]幾乎就在同時，在日內瓦的老撾會議上，中國外交部長陳毅找到印度代表團團長、國防部長梅農要求就邊界問題進行非正式討論，[29]但「只是由於（印度代表團）與新德里聯絡不上才未能發表建議進一步談判的聯合公報」。[30]另一個促使印度在此時採取同意談判態度的因素可能是蘇聯第一副總理米高揚對新德里的訪問。印度人急於想得到蘇聯的支持，而蘇聯人也肯定急於避免打破他們與中國人之間的暫時和平，因為如中印邊境爭端像1959年那樣升級，他們就不得不表明立場。[31]

但對尼赫魯先生來說，不幸的是國會和輿論的壓力使他在危機日益增加的時候沒有迴旋餘地。印度7月26日照會的公佈召來了普遍的出賣的指責聲。中國人在答覆中同意，談判不應有先決條件，但又提出印度撤兵會使一切困難迎刃而解，這又使尼赫魯先生陷入尷尬。他不得不向國會解釋印度照會中所說消除緊張是指以前以武力改變的邊境必須首先得到認可。這就使以前所作的讓步成為無效。[32]

中國改變了立場

雖然這時尼赫魯（不論願意還是不願意）所採取的立場不那麼靈活，但8月5日至26日，中國的外交活動和公開宣傳卻大量減少了，可能其意圖是在還有協商的機會時要減少緊張氣氛。[33]據現在所知道的毛在1962年的政治活動而提出的另一種解釋是，中國減少活動與8月6日北戴河會議的召開有關。在北京負責中國外交部的官員們不願意在周恩來和陳毅不在時採取重大步驟。[34]更為重要的是周和他的同事們馬上理解毛的新的左的路線會對外交事務的活動有影響，在完全理解這些影響以前，不可能採取進一步的主動行動。至少，這意味著三和一少的終結。

據一份材料分析，「8月底，在協商的前景破裂以後，中國人的行為有了劇烈的變化……這表現在中斷幾個星期以後，中國對新德里提出了新的外交抗議，對印度活動的後果提出了尖銳的警告，而且在邊境上確實發生了軍事衝突」。7月份和8月份大部分時間胡蘿蔔與大棒交替使用，而這時，中國人只使用大棒了。[35]這種新的形勢是在8月27日開始出現的，在北戴河會議結束，也就是在北京開始十中全會的預備會議後一天。[36]北戴河會議的結束是區分中國對邊境危機態度的分水嶺，這可由印度所列導致中印戰爭的大事記來證明，該大事記將戰爭物資的大量增加與中國哨所數量的增加定在8月29日。[37]

中國對待印度態度的變化

2月27日	王稼祥正式寫信給周、鄧、陳毅談三和一少，事先得到劉少奇的同意。
6月3日	《人民日報》社論回顧中印關係。
6月16日	彭德懷的信送抵中央委員會。
6月29日	王有關三和一少的最後綱領性的聲明。
6月底	美國告訴中華人民共和國它不支持國民黨進攻大陸。
7月上半月	印度推進，有對抗但無衝突。

7 月 7 日　毛重申對集體化的態度。
7 月 9-14 日　在莫斯科召開和平大會。
7 月 21 日　自 1959 年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部隊第一次向印度人開火。
7 月 23 日　老撾會議協定。
7 月 26 日　印度發出溫和的照會（陳毅找梅農在日內瓦進行非正式會談）。
8 月 5-26 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印度之間的外交活動減少。
8 月 6 日　毛澤東主持北戴河會議開幕。
彭德懷的信被斥責為與三「尼」一「鐵」站在一條線上。
8 月 29 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在邊境集結部隊。

毛負全責

軍事活動的緊急計劃似乎不像曾在北戴河會議上討論過（除非泛泛地討論）。[38] 這個議題太敏感了，不宜廣為傳播。[39] 據一份官方報告，周親自負責一切事宜，包括照會、信件、新聞發佈和談判，一切活動均需經毛批准。據另一份材料，劉少奇也扮演了一個角色，可能主持了 7 月 14 日的中央委員會的書記處會議，在此會議上，他和周都對邊境事件作了報告，以後總參謀部發佈了適當的命令。據說毛已批准，並提出二條有聯繫的理由，說明爲什麼儘管中國有充分理由，但暫不反擊：要讓尼赫魯暴露，要使國際社會相信印度是侵略者。7 月 16 日，總參謀長羅瑞卿傳達主席對形勢的八字評論：武裝共處、犬牙交錯；可能毛在考慮現在已發展的形勢會長期繼續下去，而中印的哨所則相互牽制。[40] 中國人的材料強調，由於邊境衝突有外交意義，一切決定都是由最高層決定的：「邊防無小事，事事聯北京。」[41]

中國的防禦措施是將中國的部隊分為三個部分。在有爭議的阿克塞欽地區，南疆軍區司令何家產領導西區司令部。沿著相當於麥克馬洪線的邊界（西藏和印度 NEFA 地區的分界線）建了東區司令部，由

西藏軍區司令張國華中將率領，他在內戰的最後階段曾統率過由劉伯承和鄧小平領導的第二野戰軍下的一個軍，下屬三個師。[42]張有二名副手，鄧少東和趙文晉，和副政治委員呂義山。據印度人在邊境戰爭以後的估計，這幾個人指揮三個師，比印度人在最後對抗前集結的兵力略多一些。[43]左翼在拉薩是西藏軍區的政委譚冠三，副司令陳明義，副政委詹化雨與參謀長王亢。[44]

這些高級軍官的分佈說明中國人預計東部的戰鬥會比西部激烈，而且他們還相當關注要掌握住西藏。達賴喇嘛僅在 3 年前才出逃，所以留了很強的後備部隊來控制這一地區。中國人的部署也反映了中國人對任何印度想要從拉達克進入有爭議的阿克塞欽地區的兵力都有絕對優勢。雖然印度當地司令員竭力要求增兵並發出警告，印度的外交態度需要有相應的兵力來支持。[45]雖然中國人有優勢，但他們不心存僥倖。早在 1962 年 5 月，張國華的老上級劉伯承（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名最優秀的指揮員，軍事委員會戰略小組主席）就預言印度要攻擊，並負責制定中國的反擊計劃。[46]

毛的評論和中國在印度邊界的軍事指揮結構都不能說明中國人在北戴河會議幾周以後採取的行動的理由。[47]一方面，中國人的言行無疑是越來越激烈了，而另一方面印度人的言行也越來越激烈了，他們在東北邊境局前線建了 45 個新前進哨所，其中 35 個在麥克馬洪線上。

這可以被北京認為中國對此作出反應是有合法的根據的。確實中國人的判斷是：印度在阿克塞欽地區受阻，9 月份印度政府決定將向麥克馬洪線以北推進；總參謀部決定以足夠兵力對抗印度人。[48]

行動與文書

9 月 8 日，一支中國部隊越過朵拉嶺。印度人認為這一地形特徵是東線的一部分，雖然該嶺位於麥克馬洪線以北。該線是印度人確定在本地區其他地方邊界的標準。中國部隊進入陣地，對在朵拉哨所的一支印度小部隊形成威脅，雖然他們並未進攻。但朵拉哨所是直到 1962

年6月才建立的，這是（印方）第一次違反1959年以來雙方達成的默契，即在全面解決以前，在該地區內不得有新的推進活動。朵拉哨所位於印度所說的領土以內，但處於麥克馬洪線的西藏一方。在新德里，該地區被認為是無可爭議的印度領土，在北京，中國人認為是中國的領土，但承認這是有爭議的領土，因此，是正式劃定邊界時可以協商的部分。[49]

9月13日，中國發出了兩份強硬的照會。一份抗議在西線的最近的事件，警告說「玩火者必自焚」[50]。另一份是談總的邊境形勢的，該照會指責印度「堅持進入中國領土，以武力改變現狀並加劇邊境緊張局勢」，利用談判作為「蠶食中國領土」的掩護，但建議自10月15日開始進行談判。[51] 9月16日，一份中國照會抗議印度在朵拉建立哨所，再度將這說成是印度「一貫的蠶食活動」的一部分，這「充分暴露了印方侵略計劃是何等地野心勃勃」。[52]印度的9月19日照會指出，北京的「非外交語言」和「以武力相威脅」，反譏是中國人企圖以「單方面的行動和侵略活動」改變現狀，但同意在10月15日開始談判，「以確定措施，恢復西區在過去幾年內以武力改變了的現狀，並消除該地區目前的緊張局勢」。[53]

雖然雙方都表示願意談判，但在願意談判的議題上卻大相逕庭。更為關鍵的是，雖然印度政府似乎準備接受西線毛所謂的犬牙交錯局勢，但它不願接受在他看來是對已確定的東線邊界的侵犯。印度官員的想法是基於這樣的信念：不論他們在西線的部隊是怎樣力量不足，但在東線，印度有力量將中國人趕出去，雖然地方指揮官的報告完全相反，他們完全瞭解人民解放軍在當地的人力、武器、後勤供應和陣地方面都佔有優勢。國防部長梅農，不顧下級指揮員的警告，於9月9日，即中國人越過朵拉嶺以後，命令部隊將他們驅逐出去。[54]

雙方增加部隊，堅決不妥協必然導致流血。9月20日，在朵拉發生了衝突。中國人死傷各1人，5名印度人受傷。[55]此時，印度總理與國防部長均在國外。尼赫魯出席倫敦的聯邦總理會議，梅農在紐約

出席聯合國大會，陸軍參謀長鑒於人民解放軍兵力明顯增加，要求部長以書面形式發佈命令將中國人趕出東線。命令電報很快就從紐約發回。[56] 9月24日，有進一步的衝突，又有3名中國士兵死亡。[57] 雙方又交換了照會，再次提出談判，但雙方均不準備接受對方的條件。北京與新德里都很瞭解在亞洲影響輿論的重要性，因此，他們的照會既相互指責對方殘暴，又向外界宣傳己方的合理性。[58]

10月4日，由於在東北邊境局前線的高級官員意見不一致，印度政府指定總參謀長考爾將軍負責進攻中國人。雖然考爾的戰鬥經驗很少，印度報界立即報道他的任命預示著將全面出擊。在這一階段，雙方定期無目的地交火。但是考爾不知道，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已傳達了中央和主席的重要指示。

在此以前，毛抱怨說印度從1959-1961年一直在邊境上壓中國壓了3年；如果他們在第四年想再這樣，中國就要回擊。朵拉衝突顯然使中國領導決定，軍事交鋒是不可避免的了。10月6日，命令下達給邊防部隊：「如印軍進攻，即無情予以回擊……如果他們進攻，不僅要擊退他們，而要無情回擊，使他們感到痛。」在中國領導人在於10月進行決定命運的討論時，毛和周主持會議，劉少奇、鄧小平也參加了，還有劉伯承、賀龍與徐向前元帥，以及總參謀長羅瑞卿將軍。鑒於最近發生的事件，會議顯然採納了劉元帥的建議。他不贊成隻以邊境部隊驅趕、擊退和包圍他們，而是選擇印軍的精華，迅速打垮，只有這樣才能算是決定性的勝利。[59]

考爾將軍定在10月10日開始攻擊，但中國人先反攻了，一場大衝突開始了。然而，對中國人的行動與命令的分析說明他們進攻的目的是制止而不是全面進攻的開始。考爾將軍向新德里陸軍總部所作的報告既實事求是地談到印度陣地的弱點，又不現實地對他的任務表示樂觀，但他還是相當驚恐地飛回新德里，與尼赫魯總理商議是否應取消這一任務。[60]

10 月 11 日晚會議的結果是一致同意既不增加兵力向中國人發動進攻——這是由於軍事理由而作出的決定——也不後退到相對隱蔽的陣地上去，而是要守住陣地——這是由於政治原因而作出的決定。但第二天，尼赫魯在赴斯里蘭卡途中的飛機場上與印度記者臨時談話中談到給東線部隊什麼樣的指令時，並沒有說出事實真相，只是說「我的指示是解放我們的國土」，對什麼時候能完成這任務，則閃爍其詞。此外，在中國人留在沙拉嶺南坡時他完全排除進行談判的可能。[61]

毛的印度戰爭

中國抓住了尼赫魯這不經意的說法，而且直到今日，在中國人對邊界戰爭的敘述中，這仍是一個重要證據，證明印度是侵略者。[62]《人民日報》兩天後的社論宣稱「東線印軍大舉侵入中國領土似乎迫在眉睫」，繼而發出含蓄的警告：

> 難道中國人就是這樣軟弱可欺嗎？應當向尼赫魯先生大喝一聲：有著反對外國侵略的光榮傳統的英勇的中國軍隊是永遠沒有任何人能夠把他們從自己的國土上清除掉的……在中印邊界上守衛著的人民解放軍全體指揮員、戰鬥員同志們，要百倍提高警惕！印度軍隊隨時可能執行尼赫魯的命令，來「清除掉」你們。你們要準備好。你們現在的神聖任務是：守衛國土，時刻準備著給予一切侵犯者以堅決還擊！[63]

印度不顧當地指揮員的意見，為達到國內的宣傳目的，決定對固守戰線的部隊增加兵力[64]，這給中國的指控以口實。北京可以將這決定視為準備進攻，而不是為了防禦。國防部長梅農的聲明也給人以這個印象。[65]

10 月 16 日，即尼赫魯說出這致命的話以後 4 天，中國軍委決定消滅麥克馬洪線以北的印軍；第二天，作戰命令指示「消滅入侵的印軍」。以後的幾天，印軍眼看著人民解放軍有條不紊地在準備戰爭，卻毫無辦法。在東線，中國人集結了 10,300 人的部隊去攻擊印度第七

旅，他們估計該旅兵力為 6,000 人。[66] 在西線，他們的前線部隊為 2 個營，中國人增加了 4,000 人，包括另一個步兵營。[67] 東線被選為主攻方向，一來因為在軍事上，該地比較有利，另一方面中國人希望明確表明他們不接受麥克馬洪線。[68] 最後，10 月 20 日黎明後不久，人民解放軍以壓倒兵力在西線進攻；在東線則越過了麥克馬洪線，4 天以內，基本佔領了印軍過去幾個月在西線辛勤建立的所有哨所。[69] 一個星期後，中國在東北前線地區停止了前進，敵對行動就停在那裏，而西線的印度哨所仍繼續被拔除。[70] 中國人取勝後，尼赫魯立即親自接管防務事宜，但仍將梅農留在內閣裏；然而，11 月 8 日，總理迫於他在國會中的黨的壓力將他長期的政治盟友解職。考爾將軍飛回新德里，因為在他視察駐在高山上的東北前線區的部隊時肺部受損。[71]

如果尼赫魯在此階段同意在雙方按中方要求退回印度前進政策開始前的陣地以後進行談判，毛和周就會認為他們懲罰性的遠征已達到目的，不再需要使用武力了。考慮到雙方的軍事力量懸殊，在軍事上和外交上是可行的事，新德里也認為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中國的攻擊根本沒有嚇倒印度人，反而導致印度全國團結一致、積極備戰和下定決心。如果尼赫魯認為謹慎第一，不可一味蠻勇，並在中國退出他們剛用武力取得的地方、印度退回到有爭議地區的哨所以前就同意與中國坐下來談判，那麼連他自己的位置也難保了。[72] 他第一封回絕周恩來提出談判的信中語氣溫和，因此已經受到批評，所以以後的通信中，他的語氣明顯要敵對得多。然而他拒絕與北京斷絕外交關係或將事件提交聯合國。[73]

雖然東西兩線地面上的陣地均仍不利於印度部隊，而且在東線由於不當的戰術部署，情況更為不利，新德里卻堅信北京不會再下令進行另一次重大的攻擊，並信心十足地準備將中國人趕出東北前線區。中國官方媒體這時並不強調這次爭論中的軍事活動，而相比之下，印度報紙卻報道了印軍準備進攻的一切活動。據說尼赫魯說雖然在「技術上」印度並沒有處於戰爭狀態，「事實是我們正處於戰爭狀態，雖

然我們並沒有做這樣的聲明——在目前並不必要這樣做，但以後會不會，我就不知道了」。[74]

中國人在停止了最初的攻擊後，採取了雙管齊下的外交政策。一方面周恩來以謹慎的語言壓尼赫魯坐到談判桌上來——在他的第一封信中並未用中國的宣傳口徑：是印度首先進攻的。同時，他又向亞非不結盟運動的領導人作解釋。[75]

但是在尼赫魯拒絕周主動提出談判的建議後，10 月 27 日《人民日報》寫了一篇 15,000 字的社論全面斥責印度總理。該文標題是〈從中印邊界問題再論尼赫魯的哲學〉。這是 3 年前達賴喇嘛逃到印度後該報對尼赫魯的「哲學」和西藏叛亂的文章的續篇，但是對印度總理的攻擊更為尖刻、直接，而文章大部份都是由毛執筆。這篇文章的主要論據是尼赫魯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並且是「國際反華運動」的走卒，這種說法可以從尼赫魯呼籲美國在中國進行攻擊後給予軍事援助得到證據，但並不可信。[76]

這篇文章的語調和內容與北京 1960 年反蘇的爭論相一致，也是 1963-1964 年反蘇爭論的先聲，因此成為與蘇聯思想鬥爭的武器，而不是與印度軍事鬥爭的武器。毛又譴責赫魯曉夫的理論，即在發展中國家有可能和平進入共產主義，從而導致蘇聯與一些國家，特別是像印度這樣的國家交朋友的政策。這種「我早就告訴你」的態度是對赫魯曉夫的反擊。他在 1959 年中印邊境衝突中採取中立態度，因而觸怒了中國領導層。[77]

中國的第二次反擊

尼赫魯可以不理睬中國人的辱罵，也可以接受中國領導人對他個人的敵視。[78]對他說來，更為嚴重的是有證據證明中國人在東線繼續在作軍事準備。即令在中國人第一次反擊以前，曾在朝鮮戰爭中戰鬥過的、駐在四川的 54 軍的人員，包括軍長丁盛、副軍長韋統泰已組成

另一個指揮所負責東線的東部「防禦」，並帶來了 130 師和從青海調來的 1 個團。[79]

但缺乏經驗的考爾將軍仍與以前一樣熱情奔放，他業已康復，回到東北邊境局[80]，決定在 11 月 14 日對中國人進攻，但這次進攻只在一個地區進行而不是全面進攻的一部分，其理由只不過是因為那天是尼赫魯的生日。他選的恰巧是東線的東部，對手是丁盛經過朝鮮戰爭的老兵。他不理睬印度司令部對中國兵力有優勢的評估，結果是印軍雖勇敢但寡不敵眾，一敗塗地，這促使考爾終於承認他屬下兵力不足，要求新德里請求外國部隊來拯救印度！[81] 一位印度歷史學家說，「顯然，印度軍隊的指揮是混亂的。完全掌握不住部隊，沒有洞察力，也不能臨陣不亂。」[82]

當中國人繼續於 11 月 18 日在東、西線進行顯然是事先計劃好的攻擊，以 8 個步兵團，3 個炮兵團攻擊東北邊境局前線時，情況就更是如此了。[83] 對軍事考慮得不夠，對政治問題又過分關心使東線的印軍主力處於極易受攻擊的陣地，[84] 在中國人向前推進時，就完全被包抄了。有謠言說中國人不久就將抵達阿薩姆平原，可能有傘兵會降落在新德里，首都的士氣就垮了。尼赫魯私下向甘迺迪總統要求美國戰機支援。[85] 一支航空母艦駛入孟加拉灣，一中隊運輸機抵達了。但 11 月 21 日，北京單方面宣佈停火，並宣佈它的部隊不久將開始從東北邊境局撤出。[86]

這時，談不上由印度準備反擊了。中國人令人信服地教訓了印度。中國無意放棄阿克塞欽，也有手段保衛該有爭議的領土。此外，印度再次實行前進政策就可能再次在全線遭到大規模威脅。[87]

這次成功的懲罰性的遠征不僅保衛了中國的安全，同時又羞辱了中國在亞洲的「對手」[88]。不僅如此，尼赫魯在需要時向西方請求幫助，就算沒有摧毀至少也損害了印度作為不結盟國家的形象，從而降低了它在共產主義集團和第三世界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中國消除了最近人們認為它是一個因經濟災難而癱瘓、可能即將爆發叛亂和便於

入侵的國家的形象。北京也向不聞不問的莫斯科表明選擇印度而不是中國作為盟友是多麼的不明智。最重要的是它向它以前共產主義的夥伴發出信號，戰鬥的馬列主義的旗幟又飄揚在北京上空了。唯一無法回答的問題是：如果毛依然退居二線，劉少奇和周恩來還會不會選擇以如此野蠻的方式教訓尼赫魯？鑒於他們支持三和一少原則，答案很有可能是否定的。

赫魯曉夫對邊境戰爭的立場

事實上，在邊境爭論問題上，莫斯科這次比 1959 年那次要偏向北京，雖然中國人對蘇聯出售武器給印度仍不滿意。

> 〔10 月 8 日，〕一位中國領導人[89]告訴蘇聯大使，中國得到情報印度將沿中印邊境發動大規模進攻，並說如果印度進攻，我們就堅決保衛我們自己。他還指出蘇制直升機和運輸機正被印度用來空投和運輸軍事裝備至中印邊境，這給我們前線守軍造成了很壞的印象……[90]

這次談話後，一個星期，赫魯曉夫表現出他是多麼急切在這個時刻與中國人修好。他對任職 8 年準備返國的劉曉大使表現出不同尋常的熱情。[91]當劉向他作正常的離任訪問時，赫魯曉夫用了 2 小時向他介紹了他對世界事務的整體看法。10 月 14 日，赫魯曉夫召集蘇共政治局全體委員參加告別宴會，讓大使夫人坐在他自己和他的高級同事科茲洛夫之間。赫魯曉夫站起來以懷念情緒回憶 1958 年以前中蘇友誼的力量，並表示希望兩個國家停止過去的爭吵，在他們關係上翻開新的一頁。社會主義國家應相互尊重對方的國內政策，如果莫斯科和北京在進入社會主義問題上有分歧，時間會教導人們誰是正確的。

赫魯曉夫說在中印邊境爭議問題上，蘇聯是站在中國一邊的。這是蘇共政治局一致的立場。尼赫魯在赴斯里蘭卡時在新德里機場的評論說明他在安撫國內的反應。如果不幸對中國發生了攻擊，「我們就與中國站在一起」。如果中國人希望，蘇聯第二天就可以宣佈這一點；

以前沒有這樣做是為了避免將印度人驅趕到美國人的懷抱中，美國人正想賣武器給他們。談到飛機問題，赫魯曉夫顯然沒有提到過去蘇聯向印度的出售，不過，在後來的備忘錄中蘇聯政府聲稱中國人所抱怨的飛機沒有軍事意義，不影響邊境的力量平衡。但在宴會上，赫魯曉夫沒有作出這樣一個不禮貌的聲明。相反，他表示了他個人的看法，這看法科茲洛夫和其他人都表示同意。他認為蘇聯在邊界爭議解決以前，應推遲出售米格 21 型機給印度，這不是因為幾架飛機就會使印度比中國強大，而是不讓「我們的敵人」散佈不和的種子。當然，在經歷了 1959 年在北京的遭遇後，赫魯曉夫完全知道責備他的人不會是敵人，而是他在中國的「朋友」[92]，而的確印度在 8 月中旬宣傳米格飛機的交易後，北京的媒體大肆予以報道。[93]

劉曉告訴赫魯曉夫印度軍隊正在前線的東部集結，如果他們進攻，中國會抵抗他們的。赫魯曉夫說這情報與蘇聯的相吻合。他又想起 1959 年的事，因此說「如果蘇聯處於中國的位置上，它也會用同樣辦法的」。（蘇聯）不可能在邊境問題上採取中立態度，如果中國受到攻擊，宣佈中立就是背叛的行為。[94]

不清楚劉曉認為赫魯曉夫有多真誠。但他的妻子張毅提醒她的丈夫，蘇聯領導層爲了追求戰略目標，自 50 年代以來給印度人以特殊的禮遇。由於她四處作告別拜訪，她能夠做出判斷，告訴她丈夫，這一政策仍有效。印駐莫斯科大使的妻子告訴張毅，她和她的丈夫也即將離任，他們受邀在返國以前到克里米亞度假一個月。這是與外交常例不符的，劉曉和張毅所受到的待遇不過是米高揚請他們以後再來的慣例的邀請。[95]

周恩來對這樣外交上的細微之處是很敏感的；他永遠也忘不了杜勒斯在 1954 年日內瓦會議上拒絕與他握手的事。[96] 對毛來說，這些都是資產階級的無關緊要的小事；他任國家元首時就討厭必須去接受大使呈遞的國書。這兩個人都不信任赫魯曉夫，然而，當劉曉返國並

向中央就赫魯曉夫的宴會作詳細彙報後，他們決定蘇聯領導人作出的支持中國的表示不值得予以答覆。[97]

然而，在中國人於 10 月 20 日開始反攻後不久，尼赫魯從赫魯曉夫那裏收到一封信，在信中蘇聯領導人隱約提到前些時得到印度有意發動攻擊的報告，並勸他同意周提出的談判的建議。蘇聯官員執行了赫魯曉夫在米格 21 型機上對劉曉的承諾，告訴印駐莫斯科大使館，蘇聯不能兌現向新德里出售飛機的承諾。赫魯曉夫對中國的最接近承諾的事就是 10 月 25 日《真理報》上的一篇社論，社論說麥克馬洪線是強加在印度和中國人身上的線，中國人從來沒有承認過，北京前一天的聲明是談判的合理基礎。[98] 從中國人的觀點看，這都是不值錢的小花樣。北越南外交部長發表的支持中國的講話受到登在《人民日報》頭版的待遇，而《真理報》的社論則刊登在末版，在北朝鮮和北越報紙支援中國的消息之後。[99]

古巴導彈危機

赫魯曉夫在 1962 年夏與初秋中蘇爭論問題上的克制態度、他略微傾向北京和疏遠新德里以及對劉曉大使的熱情接待，可能不是因為在中印邊境問題上轉變了態度，而與他預計會與美國對抗有關。赫魯曉夫在面對甘迺迪時需要有一個團結一致的共產主義陣營的支持。中國在 1962 年不希望兩面作戰，赫魯曉夫也不希望在秋季同時與美國和中國對抗。

赫魯曉夫預計在美國期中國會選舉以後，在 11 月初會挑起對抗。屆時，他將向甘迺迪透露蘇聯人已將核導彈佈置在古巴了。如果中國在與印度的關係中採取「好戰」的態度可以部分地歸之於尼赫魯在喜馬拉雅山的前進政策，那麼它在 1962 年秋重新發動中蘇論戰同樣可以部分地歸之於赫魯曉夫在加勒比地區的「前進」政策，這一政策導致古巴導彈危機。[100]

據這位蘇聯領導人自己說，他長期以來就擔心美對在家門口有一個共產主義國家持不妥協態度，會再度企圖推翻他的盟友卡斯特羅，而繼 1961 年 4 月豬灣失敗後，下一次他們會成功。如果蘇聯「失去」古巴，這對「馬列主義會是個可怕的打擊。它會在全世界，特別是在拉丁美洲大大降低我們的地位」。[101] 最終，在 1962 年 4、5 月間，[102] 赫魯曉夫想到秘密在古巴部署蘇聯導彈以遏制美國的進攻。這政策還有一個好處，就是使美國所受到的威脅相當於蘇聯受到美國在土耳其的導彈威脅。確實，雖然他在回憶錄裏沒有承認這一點，他計劃運到古巴去的導彈「核彈頭四倍於蘇聯可能扔到美國的導彈」。[103] 可以想像，赫魯曉夫這場賭博的真正原因就是這一點，而不是古巴的安全。

這位蘇聯領導人設法說服他的同事們同意這一政策，但在說服卡斯特羅時則困難得多。[104] 他的設想是如果甘迺迪面對既成事實，他就會接受它。他未能瞭解，這樣大的活動不可能躲過美國對古巴的大量監測儀器。他還完全錯誤地估計了甘迺迪的反應。赫魯曉夫計劃在 11 月份選舉後透露他做的事，以免使甘迺迪感到尷尬，進而採取過熱的反應。但 10 月 14 日，也就是蘇聯領導人請劉曉赴宴的那一天，中央情報局得出結論，U2 型飛機該晨在古巴上空拍攝的照片表明正在島上修建導彈地下發射室。[105]

此後，危機迅速升級。10 月 22 日，甘迺迪透露了美國的發現，要求撤出這些導彈，並宣佈海軍將封鎖古巴，以防蘇聯的武器再度運往古巴。沒有攜帶武器的船隻去嘗試這次封鎖是否是認真的。過了一個緊張的一周，甘迺迪與赫魯曉夫交換了照會後，赫魯曉夫 10 月 28 日同意拆除導彈，摧毀導彈設施。儘管赫魯曉夫當時和在回憶錄裏都聲稱這個政策是值得的，因為它迫使美國保證不入侵古巴，這一結局卻是一場屈辱，而且蘇聯為此花費了 10 億美元。[106]

這個時期的日程顯示出加勒比危機和喜馬拉雅山上的危機的情況：

危機日程表

10 月	喜馬拉雅山加勒比
14 日	赫魯曉夫保證支持中國美國發現古巴有導彈地下發射室
20 日	中國首次出擊赫魯曉夫致信尼赫魯
22 日	甘迺迪透露古巴有蘇聯導彈，要求拆除，並佈置海軍封鎖
24 日	中國建議商談蘇聯船隻停止赴古巴
25 日	《真理報》社論偏向中國
26 日	美海軍阻攔第一艘船
27 日	中國第一次反攻結束
28 日	赫魯曉夫同意拆除導彈
11 月	初莫斯科再度採取中立態度
5-14 日	〔中國在保加利亞黨代表大會上受到批評〕
14 日	印度進攻蘇聯大使向尼赫魯表達善意（在 21 日前，證實出售了米格 21 型飛機）
16 日	中國第二次反攻
20-24 日	〔中蘇在匈牙利黨代表會議上衝突〕
21 日	中國人停火
12 月 1 日	中國開始撤退
4-8 日	〔中蘇在捷克黨代表大會上衝突〕

據說劉曉事先就向北京報告了赫魯曉夫的導彈計劃[107]，不過中國可能已知道此事，因為他們在古巴有很好的情報來源。但是，當赫魯曉夫在處理喜馬拉雅山危機時肯定也想著加勒比的時候，中國人卻極不可能也是如此。在中國人第一次反擊以前很久，喜馬拉雅山危機就一直籠罩著。中國與莫斯科的通訊和中國人的宣傳都事先警告過赫魯曉夫可能會發生什麼事。但中國人第一次反擊以後，加勒比危機才爆發，中國人無法預見到美國人的反應，如果赫魯曉夫的估計正確的話，古巴危機不會導致世界大戰。[108] 此外，如果中國對蘇聯計劃有所察覺的話，他們就會知道美蘇之間的對抗不可能在 11 月的第二個星期

以前由赫魯曉夫使之緩和下來。[109]到那時，如果尼赫魯同意在他們的第一次反擊後談判，喜馬拉雅山危機就會過去了。[110]

這兩次危機同時發生對毛來說是極為重要的，這使他可以有力地提醒他的同事們，他顯然將其視為赫魯曉夫的不忠誠與膽怯：在喜馬拉雅山危機中不忠誠，就像他在 1959 年類似情況下表現得那樣，在加勒比危機中膽怯，就像他在 1958 年中東事件時那樣。[111]一年以後，當中蘇公開論戰時，中國人透露出他們對蘇聯在喜馬拉雅山危機中的表現的看法：「在加勒比危機中，他們出於權宜之計說了一些似乎公正的話。但當危機一過，他們就食言了。他們一直站在印度反動派一邊反對中國……完全背叛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112]在導彈危機結束後但在中國停火前，蘇聯駐新德里大使向尼赫魯轉達了他的國家對尼赫魯的問候，表明蘇聯又退回中立了，不過米格 21 型飛機的出售只是在中國停火以後才進行的。[113]在這方面說來，赫魯曉夫是信守諾言的。

與俄國人在邊境戰爭問題上的態度不同，中國人在導彈危機問題上是熱情的。進行了大規模集會（在邊境戰爭時並無大規模集會），中國領導人發表談話支持俄國人與古巴人。這強有力地證明中國人認為在東西對抗的危機中，集團的團結是重要的，因為北京領導人確實不同意赫魯曉夫將導彈部署到古巴的政策，他們後來說，這是不必要的、「冒險主義的」。然而，更糟糕的是赫魯曉夫同意撤出導彈，他們認為這是「投降主義的」。[114]鑒於這些事，毛的同事們很少有人會站出來贊成三和一少政策了，毛最終號召終止自 1962 年開始以來一直勉強執行的中蘇休戰，這也是不可避免的。

論戰再起

然而，似乎又是蘇聯人先挑起爭端。論戰的舞臺是 4 個東歐共產黨代表大會，這些會議自 1962 年 11 月初相繼開到 1963 年 1 月中。幾

乎在 30 年後，出席這 4 個會議的中國兄弟代表團團長伍修權將中國共產黨對中蘇的分裂怎樣在一個又一個會議上漸漸擴大的看法寫了出來。

在第一個會議，即索菲亞的保加利亞黨的會議上，對阿爾巴尼亞共產黨做了許多公開攻擊，對中國共產黨的攻擊則比較隱晦，但也有幾個代表指名道姓。[115]顯然，批評者都是聽從蘇共指揮的，保加利亞的領導人日夫科夫在代表大會開會前幾天還在莫斯科。伍並不想與這些指控爭辯。相反，為表示他不同意某一段批評時（他從同聲翻譯的俄文裏立即就瞭解了），他既不站起來也不與別人一起鼓掌，由於他坐在主席臺上，他的舉止是大家都看到的。伍自己的講話只包括慣常的祝賀，簡略介紹國內的發展情況，另加一個評論說，中國共產黨認為對阿爾巴尼亞人的批評只是為帝國主義分子服務。可能聽眾在這講話開始和結束時起立鼓掌，伍覺得這是因為他一直是講禮貌的。在保加利亞黨為客人們舉行的宴會上，他就不那麼禮貌了。按照禮儀單，他應該坐在蘇共代表團團長蘇斯洛夫旁邊的，但整個宴會期間，由於這位蘇聯的理論家在講話中提出的批評，他故意冷落蘇斯洛夫。

在會議結束後對日夫科夫進行例行的拜會時，伍後來寫道，他主要關心的是解釋中國人在邊界戰爭上的立場，其目的是要消除保加利亞領導從西方媒體得到的錯誤印象——這是一個有趣的承認，共產黨領導人願意相信西方有關一個兄弟國家的報道而不相信兄弟國家自己的資訊，可能他們太瞭解他們自己的宣傳是失實的。[116]日夫科夫，像在後來匈牙利代表大會的卡達爾一樣，事實上是按照蘇聯恢復執行的路線行事的，即呼籲在喜馬拉雅山實行和平，而在這些問題上則保持中立。[117]

東歐官方對中共的廣泛反感在中國代表團從索菲亞赴布加勒斯特休息幾天時再度表現出來了。當他們在羅馬尼亞首都去買赴布達佩斯的機票參加匈牙利黨的代表大會時，他們被告知機票沒有了，他們只有向匈牙利大使館請求時，才拿到了機票。後來證明飛機當然遠沒有滿員。[118]

匈牙利人採取了預先措施以防伍重複在索菲亞的戰術，從而陷入尷尬境地。他們做出規定，在他們黨的代表大會上，不用起立，以示贊成報告。但是，當然，像伍評論的那樣，他們不能禁止鼓掌，如果他有理由反對某一個講話，他可以坐在那裏不鼓掌。事實上，中共在匈牙利的遭遇還不如在保加利亞。中國代表團統計出在索菲亞會上，參加會議的 64 個黨中有 20 個攻擊了他們，而在布達佩斯則增至 60 個中的 30 個。只有北越代表團公開表示對中共的友誼。伍將此情況向北京彙報並要求指示。

在匈牙利代表大會最後一天，即 11 月 24 日的早上，一名官員問中國代表團，是否準備在該晚閉幕招待會上講話。由於當時尚未從北京收到指示，代表團不得不推託，答應在下午答覆。幸而，午飯時收到了電報，指示利用招待會回擊批評，集中講三點：蘇聯與中共和阿爾巴尼亞人關係惡化應歸罪於莫斯科；當前反華合唱隊是由蘇聯指揮的；黨的代表大會應是促進團結的機會，而不是製造分裂。電報中有一份中國官方聲明，要在會上宣讀。

伍的心下沉了，可能因為他知道這會導致人們的憤怒。然而，他很快叫人將這聲明譯成俄文和匈牙利文，想出了一個辦法使抗議不致在中途被阻。如果他按照正常辦法讀一段譯一段，他預計在聽眾知道大意時會打斷發言，所以在節約時間的藉口下，他說服主人同意讓他的譯員以匈牙利文讀這篇發言。這個辦法成功了，但在讀完中國的強烈抗議以後，一名拉丁美洲的共產黨員在蘇聯人的煽動下進行了反擊。卡達爾親自走到伍修權的面前說：「真沒有想到你們代表團會有這麼一個講話，對於你們這種做法，我們只能表示遺憾。」伍回答說他瞭解卡達爾的意思，他的代表團不能再留在招待會了。[119]

伍和代表團然後到波蘭與他的同事王炳南大使在一起等待 12 月 4 日召開的捷克代表大會。他發現波蘭人比羅馬尼亞人好客，他被邀請去打野豬，這是他在任駐南斯拉夫大使時學會的消遣。在過了愉快的一周後，他必須面對在布拉格的爭吵。[120]

顯然，蘇聯代表團因為伍在匈牙利黨代表大會上掌握了主動而受到了刺激，來參加捷克代表大會時做了充分準備，代表團裏有一個很強的來自國際部的專家組。幾天前，在義大利黨代表大會上對中國人的攻擊增加了，代表中共出席該代表大會的伍的代表團的成員的發言受到了冷遇。[121] 作為回應，《人民日報》批評了義大利黨的領導人陶里亞蒂。[122]

在匈牙利代表大會的前夕，《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不點名地間接批評了赫魯曉夫在導彈危機中的表現，蘇聯這時有機會對這些批評進行估量並與衛星國協同反措施。[123] 捷克的第一書記諾沃提尼指控阿爾巴尼亞人——實際上是中國人——迫使古巴人進入核戰爭，[124] 並攻擊支持他們的不指名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民族主義者」。[125] 蘇聯代表團團長勃列日涅夫表示關切：那些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人會懊悔古巴革命竟然不打一仗就得到了挽救。[126] 自此以後，捷克和其他外國講話者不斷地對阿爾巴尼亞人和他們的中國同盟者提出批評。中國代表團又作了個統計，在 60 個兄弟代表團中，50 個點名攻擊了阿爾巴尼亞，其中又有 20 個指名攻擊了中共。甚至北朝鮮也受到攻擊，因為它不同意這一作法並堅定地支持中國。形勢對中國更不利了。

伍奉北京命不得後退，又抗議利用一個黨的代表大會攻擊一個兄弟黨，並又一次用了個聰明的辦法勝過了他的主人諾沃提尼，獲得權利向每個外國代表團提交一份中國官方聲明，內容與上述相同。[127] 中國這些利用會議程式的小的戰術勝利幾乎可以肯定觸怒了東歐衛星國的舉步維艱的領導人們，其憤怒程度超過了中國聲明本身的重要性，他們的敵意增加，模仿他們主人的語調大肆咒罵中國。[128] 無疑在莫斯科的指導下，東歐人也在禮儀上進行報復取得了一些勝利，雖然伍修權並未在回憶錄裏記載此事：諾沃提尼在講話中沒有像慣例那樣將中國列在第二位而是列在第八位，在東歐各黨之後；在東德的代表大會上，烏布利希則將中國列在第九位，在蒙古之後。[129]

這些大大小小的事，北京都密切注意著。12 月 14 日，也就是伍和他的同事們回去作短暫休假，然後赴東德代表大會的那一天，《人民日報》選登了諾沃提尼反華言論，第二天又發表社論，號召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反對他們共同的帝國主義敵人。更為重要的是毛將伍召到杭州，要他極為詳細地講了他的經驗。主席說他很滿意，對伍的表現予以表揚。[130]

伍在 1963 年 1 月中旬回到東柏林準備進行最後一個回合，卻發現赫魯曉夫在領導蘇聯代表團，而東德提出了更嚴格的措施，防止外國發表不同意的聲音。只有由第一書記率領的代表團有權口頭發表兄弟式的賀詞，其他黨只能以書面形式發表，登在當地報紙上。但東德知道如果嚴格執行這些措施會引起巨大的爭吵，又將中國和捷克斯洛伐克除外——諾沃提尼沒有出席。其他黨則由地區發言人代表：古巴代表拉美、日本代表亞洲。這意味著親中國的黨如北朝鮮和印尼黨不能發言，他們的發言在東德報紙上也沒登。[131] 更為糟糕的是東德黨領導人烏布利希的開幕詞中譴責中國在中印邊境上丟棄了和平共處政策。

在烏布利希的譴責性發言後，赫魯曉夫沒有按照慣例的敵我分明的態度，而是發表了部分和解的講話，可能這又是一次企圖困住中國代表團的伎倆，避免布拉格式的慘敗。他花了很長的時間以他後來在回憶錄裏提出的理由為蘇聯在導彈危機中的行為辯護，進而不指名地譴責中國人在這問題上提出的爭論：

> 有些自認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人認為與帝國主義鬥爭的方式不是首先建立起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力量——這是我們的敵人要考慮的有利因素；不，他們發明瞭一種新方式，可能是從未有過的廉價方式。你們知道，這種方法不是靠一個國家的經濟水準，不是靠武器的數量和質量，它什麼都不用，就靠謾罵。這些人幻想只要無休止地咒罵帝國主義就最能幫助社會主義國家。這是相信咒罵與咒語的巫毒的。[132]

赫魯曉夫建議，從這時起，公開的各黨之間爭論應停止，不再在自己黨內批評兄弟黨；阿爾巴尼亞黨應放棄他們的錯誤觀點，回到社會主義兄弟大家庭來。東德馬上支持這個「正確建議」，並要求知道中國代表團的反應。

伍和他的同事們認為雖然氣勢洶洶，赫魯曉夫還沒有決心徹底破裂，並無論如何不願承擔分裂的責任——這可能也反映了毛的立場，但伍對此未作評論——因此放出了煙幕，以迷惑走中間道路的外國共產黨人。這使中國人處於兩難之地：如果不同意赫魯曉夫的建議，他們就會被視為分裂者，但如果他們同意，又會失去機會說明他們的主張。這時從北京來了新指示和中共官方祝詞的文本。祝詞翻譯好並印好後，所有中國官員都出動散發檔，以避免東德拒絕發表它。1 月 18 日，赫魯曉夫故意未出席，伍修權走上講台宣讀賀詞。中國的說法是，每個人都要聽其言觀其行，以區分假團結和真分裂。伍還對東道黨利用自己的代表大會作為攻擊一個兄弟黨的機會表示「極大遺憾」。

東德主席因為伍批評南斯拉夫（其代表也在座）而惱怒，一再搖鈴，企圖打斷伍的講話，伍繼續在宣讀。東德的代表在他們的高級幹部率領下企圖以大聲呼叫、口哨、跺地板和拍桌子來淹沒他的講話。當他們最終停息下來時，伍又開始讀，並且離開講稿說：「你們這樣做很好，這就使我看到了你們德國同志的文明。」德國譯員沒有譯這句不在稿子裏的評論，一名會說德語的中國人插進來譯出這句話，引起另一陣叫喊。中國代表團為抗議這種無禮，除最後一次會議外，沒有參加會議。當赫魯曉夫與烏布利希進入會場時，伍和他的同事們不肯站立和鼓掌，在會議結束時，甚至沒有等唱《國際歌》就離開了。對伍在受到攻擊時的冷靜態度，外國報紙作了長篇報道，也贏得了他的主席的讚許。[133]

儘管有了這次無先例的公開衝突，伍表示中共願意經過適當的準備時間以後在關鍵問題上與蘇聯談判。雖然後來 1963 年在幾次代表大

會上也爭吵過，中共和蘇聯坐下來進行了最後一次談判來解決他們的分歧，但未果。

第十四章 毛負全責

毛在 1962 年下半年重新控制外交和國內政策的主要問題以後，他就集結起一個非正式的內閣來協助他，這是一個由得到毛信任的支持者（如康生）組成的特別小組。當發動文化大革命時，這個小組成了真正的「反黨集團」。為何採取這種極端官僚的做法處理鬥爭，毛主義分子給出的一個理由是黨的機構不忠於主席，而這種解釋大部分也為外國觀察家所接受。黨的機構不聽他的話，與他的看法也不同。

但劉少奇在十中全會上很快就投降了，這與他在七千人大會上謙遜而直率的作法形成了對比。這說明這種解釋根本不正確。在全會上看到過劉的作法的人，沒有人會懷疑，雖然他的頭銜是兩個主席之一，雖然在國慶日，他的照片與毛的照片受到了同等地位的待遇，但他仍然是個忠心耿耿的助手，當毛一指揮，劉就緊跟。周恩來則甚至更為順從，據說更為俯首貼耳。[1]

中央全會的作用

此外，毛不僅能控制他的最高級的同事，他也不顧黨的規章程式。十中全會是毛在 18 個多月來召開的中共黨章裏最高權力機構的第一次正式會議。在以後的 4 年裏，這也是最後一次會議。這與八屆中央初期的做法不大一樣。[2] 從 1956 年 9 月到 1959 年 8 月的 3 年裏，中央委員會共開了 8 次會，幾乎平均每年 3 次。如果算上 1961 年 1 月的九中全會，平均每年仍有 2 次，這與中共黨章是相符的。[3] 在以後的五年半裏，直到 1966 年 8 月的十一中全會，只開了一次。

八中全會與九中全會之間的長期間隔可以解釋為要集中精力解決緊急經濟問題和中蘇爭論，那麼，十中全會以後是經濟恢復時期，在這期間，中國系統而成功地著手於恢復行政秩序，取得經濟進展，中

央也沒有停止召開一般在全會以前召開的那種工作會議。是什麼導致這種精英統治方式上的改變呢？

答案必須從毛談起。作為中央主席，他有特權召開全會。在他領導中華人民共和國期間沒有別人曾主持過中央全會。從 1956 年到 1961 年大部分時間所用的方式來看，毛認為中央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就是正式達成共識，而這共識是在之前召開的氣氛更自由、更輕鬆的工作會議上所取得。接下來，每個人在思想上就理解了中央的目的與政策，並行動一致地去完成它。

1956 年 11 月的二中全會是在八屆一中全會後僅 6 個星期召開的，可能目的是使中央委員會對東歐進展迅速的事件作出反應，最重要的是讓中央委員同意中共對匈牙利叛亂以及之後的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混亂所採取的態度。[4] 在二中全會與三中全會之間間隔了 10 個月，這是八屆中央委員會前 3 年中，全會之間間隔時間最長的，幾乎可以肯定這是由於難以解決最高層領導在整風運動及以後的取消整風問題上的意見分歧。[5] 但有一個不重要的例外，即三中全會到八中全會之間，平均間隔時間只有 5 個月，很接近於黨章的理想時間。[6] 第八次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在四中全會與五中全會之間）宣佈一致同意發動大躍進，而大躍進是在 1958 年前 4 個月內的幾次工作會議上取得一致意見的。[7] 六中全會同意修改大躍進，也是在早些時候的工作會議上商定的；[8] 七中全會正式決定任命劉少奇為國家元首；[9] 八中全會是在一次特別激烈工作會議以後召開的，會上批准清洗彭德懷，雖然這不是全會原來的目的。[10]

雖然前九次全會都是按黨章規定，定期召開的，而十與十一中全會的召開則是不合理地拖延了。這形成了尖銳的對比。但如果用另一個方法來區分這些會議，就可以更好地看到毛的所作所為。如前所述，一至七中全會是意見一致的全會。但從八中全會到十一中全會則是鬥爭的全會，在這些全會中，中共分裂了，高級領導人遭清洗。[11] 在這幾次全會中，九中全會是例外地按以前的方式召開的。從這個角

度看，從八中全會到十一中全會正式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開始，毛只有在感到有把握強制通過某個決定的時候才會召開全會，而他也預見到這決定會招致極大的不愉快。這又是由於毛的看法與他同事們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同事們認為於國家利益至關重要的決定，他卻深表懷疑。

毛的工作方式

對毛 60 年代初管理中共高級機構的方法還有另一種看法。在 50 年代中，在鞏固政權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完全贊成蘇式的制度與作法，畢竟，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在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時，對蘇聯憲法進行了研究並予以模仿。[12] 按蘇聯模式建立了龐大的中央經濟與計劃機構。[13] 教育體系是仿傚蘇聯的。[14] 原本簡單的人民解放軍制服，在經過重新設計後，使中國的元帥與將軍們有蘇聯的元帥與將軍那種金光閃閃的色彩。[15] 甚至嚴格執行了蘇聯飲食禁忌。主席在大躍進期間透露了他對這種制度很生氣，他喜歡的是被稱為遊擊式的管理國家方式。[16]

事實上，看一下毛的個人辦公室就能證明即令在中國的「蘇聯時期」的高潮時，毛個人保持的管理體系也似乎是更適合延安而不是北京。毛「不到辦公室」去，而是在家工作，常常是在臥室，不論是在中南海、在杭州或是在他喜歡的省的城市，或是在專列上。50 年代中，在北京，他住在中南海的豐澤園，其主要建築是頤年堂，有一個會議廳及幾間小會議室和菊香書室，他就住在這裏。[17] 除了他牙疼，許多官員就到這裏來謁見他們的默罕莫德。[18]

毛有 4 個政治秘書，但只有田家英是專職的、正式任命並領工資的。陳伯達和胡喬木都有自己的職責，但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常被毛叫去進行調查或起草檔。江青是第四名秘書，也不是專職的，毛只叫她讀材料。[19] 毛不時還可能用臨時兼職「秘書」，如在大躍進前半期時的李銳。[20]

毛掌握情況的方法也是不正規的。他醒後第一件事就是要他的秘書將送到他那裏的最新文件和材料拿給他。這些文件和材料都是事先挑選過的，有時秘書口頭或書面向他報告。[21]毛在視察時一般讀《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材料——儘管他對中國共產黨的官方機構往往表示不滿意[22]——和當地的報紙。江青每天在報紙上選材料給他。田家英或別人並不每天固定將過去 24 小時內國內、國際發生的事向他報告，這與美國制度大不一樣，在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每天呈送給總統一份各情報單位所獲情報的書面材料。[23]（毛所獲）最接近（於美總統所獲）的材料是各種「內部」參考資料，這是新華社準備的新聞體的材料[24]，然而，大部分只是重印外國報紙而已。[25]毛在 1960 年告訴蘇聯大使每天他二次收到兩大本有關國際事務的「固定材料」。（按：應指參考資料）[26]

給毛和其他最高級領導人的文件多少是由中央辦公廳所掌握的。辦公廳由書記處候補書記楊尚昆領導。楊和他的下屬決定哪份文件給誰看，這取決於各領導人的職責與興趣。田家英和其他政治秘書決定哪些文件應送給哪些上級看。毛看的文件並不多。[27]

毛的遊擊作風

毛是怎樣統治的呢？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將他認為他能信任的人放到掌握實權的主要機構上，這些機構是中國共產黨、人民解放軍和政府：鄧小平負責中央書記處，林彪負責人民解放軍，周恩來負責國務院。雖然林彪由於健康原因，可能還有天性，不能每天具體地管理人民解放軍，但周和鄧卻有能力和精力有效地進行管理，毛似乎認為他們和他們的下級在有問題時會忠實地向他彙報。[28]然而，主席長期的困難在於：他身旁沒有由專家組成的班子來監督各部，在下面提出技術性，特別是財政性措施要他批准時，他往往感到為難。他 1958 年在南寧，1962 年在北戴河就此曾道出苦衷。他的這種煩惱，至少有些中國皇帝也有。[29]

但毛不是一個高高在上的、被動地等待下級官僚向他報告的皇帝式的人物。主席很熱情地關注著治理中國的各種問題。他親自到首都以外的地方視察，瞭解情況，雖然這種調查來的情況的價值有時是可疑的。[30] 更為有效的辦法是他派出身邊工作人員去調查。當制定主要政策時，如農業十二年規劃、1956 年十大關係、大躍進和 1958 年的人民公社等，他的調查和找人談話就很頻繁。[31] 他的調查所得與他身邊工作人員的報告就為他的講話和（或）計劃提供了基礎，如 1961 年在廣州。按中國皇家的做法，這是利用「內廷」官員來繞過「外廷」官僚機構，以免他們拖延與反抗。[32] 以中國革命方式來說，這反映了毛喜歡遊擊式的管理，而不喜歡標準的管理方式。

毛傳達意見的方式[33]

在他不主持工作會議時，主席將他的意見告訴他同事的主要方法是對送給他的文件作「批語」。這種皇家式的傳達意見的方式，他用得比發表談話或寫文章的方式要多得多。從 1949 年到 1957 年，一個月幾乎 11 次。[34] 他對群眾運動、軍事和各省事務的批語較多，但令人奇怪的是對農業的批語卻很少，甚至在土改和集體化時也是如此。他批得最多的時候是在年底年初，而最少的時候是在夏天，這時他一般參加每年的工作會議。毛的批語往往表示同意或不同意，但收到文件的官員們有時碰到的問題是怎樣處理資訊很少的批語。這種批語可能不完全表示主席自己對這件事的意見。

中央書記處

如果毛不重視利用組織，他這種工作作風至少對其他人來說可能導致官僚系統的混亂。[35] 劉少奇得到他的授權，在他不在時有權召開常委會、政治局會議和這些機構下的各種會議。也可自行建立各種小組來處理需要超越官僚機構的權力的特殊問題。權力核心很明顯。自大躍進開始以來，中央書記處在毛和劉的領導下，並且執行他們的指示，在中國的政治活動中起主要作用。[36] 十中全會又肯定了這樣的地

位。[37] 周可能並不喜歡，但他從未提出不同意見。據目前所掌握中國的資料，鄧小平似乎不像周或劉那樣引人注目，卻有效地管理著中國的日常事務。[38]

在十中全會上，除康生外，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被任命為書記處書記，這清楚地說明將更重視意識形態問題，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則正式取代黃克誠在書記處中的位置。[39] 這樣，書記處由常委成員鄧小平領導，另有 4 名政治局委員——彭真、李富春、李先念和譚震林，現在又增加了 2 名政治局候補委員，陸定一和康生。軍事問題顯然也由書記處管，因為鄧小平是除毛本人而外軍事委員會中唯一的非軍人，而羅瑞卿作為軍委秘書長則在行政上負責該委員會。[40] 陳雲又自動地不管事了，李富春，尤其是李先念成為這個國家的主要負責經濟的官員。在大躍進以後，對經濟的控制又集中在中央，這意味著他們兼任的國務院副總理的職責又變得重要，至少在執行政策上如此，而國務院似乎沒有恢復 50 年代中所享有的集中權力；政策最後是在書記處制定的。[41] 甚至周恩來也不得不出席書記處的會議。[42]

這樣，在 60 年代初，毛的問題就是要劉和書記處聽命於他。如果他們不執行他的批語，他作批語就沒有意義了。他成功地在 1958 年和 1959 年使國務院和人民解放軍聽命於他。他對書記處也必須採用同樣的戰術麼？他在 1962 年夏已改寫了國家的日程，他的同事們也服從了，但他們還會忠心耿耿地繼續執行麼？正如本卷卷首的那首詩所示，1963 年初毛感到有信心，有必要打敗他的敵人，而且也很有可能打敗他的敵人。他知道這些敵人在莫斯科。但問題是：在北京也有這些敵人麼？第一個考驗的就是他最近發動的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附錄3：獨裁角色和獨裁風格的比較

以蘇聯的角度看，毛的工作風格與列寧和斯大林截然不同。兩位蘇聯領導人都是通過行政機構運作的，列寧通過蘇聯人民委員會（Sovnarkom）而斯大林通過蘇聯共產黨書記處。列寧和毛形成強烈反差，前者不信任「隨機應變」，堅信「每走一步，都必須有預設的計劃和周密的圖表」。[1] 自斯大林1922被任命為總書記之後，他在三年內將蘇共書記處打造成擁有767名全職雇員的組織，成為黨的真正權力核心，並延續下去。[2] 中共書記處則小得多，毛賦予其中國行政機構的核心角色，事實上，書記處只是他行使個人權力的工具，而非國家權力的核心。

毛不想僅僅屈尊做一位總書記，該職務代表著大量的繁文縟節。他喜歡鑽研中國歷史、文學或其他他愛好的領域，並與知識份子探討。[3] 毛的同事們還知道，他還要花大量時間在女性身上，[4] 他們就好像阿道夫·希特勒的同事一樣困惑，不知道他們的領導到底什麼時候工作。希特勒更願意和教育程度不那麼高的人交往，經常在桌上就一些泛泛話題數小時長談。但這兩人的同事們都知道，希特勒和毛這樣的活動只是休憩醞釀，而絕非懈怠偷懶。[5]

斯大林則不一樣，他「生活只有一種方式，就是工作。他是工作的奴隸」，[6] 他在他書記處的辦公室管理整個蘇聯。[7] 然而斯大林也會和毛、希特勒一樣，長時間離開首都，每年到南部度假，三十年代中有兩三個月，後面幾年長達四個半月。[8] 儘管他和莫斯科保持聯繫，但這也說明斯大林和另外兩位領導人一樣，不得不依賴他們所信任的下屬，比如莫洛托夫。[9]

毛和斯大林不同，不喜歡受日常工作程式的束縛，對行政規定不屑一顧。鑒於中央在斯大林的蘇共或毛的中共內部未能發揮應有的最高作用，毛召開全會的頻率遠遠低於斯大林——他統治中國二十七年間，召開二十一次；斯大林從1934年「勝利者的代表大會」到1953年

去世十九年間，召開二十二次——這就顯得意味深長。[10]與蘇聯的這位獨裁者相比，毛更為不關注憲法的精確性。

對於計劃制定者和專家，毛比斯大林更顯得嗤之以鼻，不願意將複雜問題簡化為單個的矛盾。他的工作風格因此顯著區別於他的蘇聯先驅，而更讓人聯想到阿道夫·希特勒的行動和態度。這位納粹領導人也同樣不信任專家，拒絕接受事物的複雜性，厭惡常規工作程式，堅信只要有意志，則會無往而不利。實際上，假如毛也相信，只要沒人製造麻煩，所有困難都會迎刃而解，那麼這種工作風格就好像獨裁元首之於納粹德國一樣，[11]可能會為政府工作帶來同樣的混亂,。[12]

但和希特勒不同的是，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毛還是在一個按部就班的國家機構中進行統治，儘管他對此提出抱怨。在中國，所有的領導都在中央和政治局之下，而在納粹德國，在黨的主要機構和政府之間存在爭權奪利的部門鬥爭，內耗很大。這無疑給了希特勒大權獨攬的機會。他不但是黨和政府的領導人，實際還成為這兩個國家機器之間唯一的清晰的聯繫紐帶，以及二者的仲裁者。[13]

就某些核心信仰而言，希特勒和毛是相似的，而不像斯大林。後者似乎將鬥爭主要當做征服對手的手段。而希特勒則和毛一樣，認為鬥爭是存在的本質：「鬥爭使人強大……」，鬥爭是「萬物之父」。「要生存，就必須戰鬥。在這個世界上，永恆的鬥爭是生存之法則，那些不願戰鬥的人是沒有資格生存的」[14]毛對此的看法眾所周知：「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15]儘管毛並不擁護希特勒的種族理論，而且通常只在階級的範疇內談論鬥爭，然而他永不間斷的革命理論和希特勒相似，[16]而他為階級鬥爭所做的哲學辯護也說明，他就像希特勒一樣，認為鬥爭是生存的基礎：「一分為二，這是個普遍現象，這就是兩分法。」[17]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對他的醫生的說法更個性化一些：「我喜歡大動亂。」[18]

同樣讓人驚訝的雷同是，毛和希特勒都相信意志力佔主導地位。希特勒的觀點自然來源於叔本華和尼采。[19]我們也知道毛在二十多歲時，也從包爾生《倫理學體系》的譯文中吸收了這些西方哲學家以及其他人的思想，[20]正如他在該書的一條註釋中所說：

> 豪傑之士發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張其本性中至偉至大之力，因以成其為豪傑焉。本性以外之一切外鑠之事，如制裁束縛之類，彼者以其本性中至大之動力以排除之……大凡英雄豪傑之行其自己也，發其動力，奮發踔厲，摧陷（廓）清，一往無前，其強如大風之發於長穀，如好色者之性欲發動而導其情人，決無有能阻回之者，亦決不可有阻回者。[21]

甚至在他這些豪言壯語之前，他 1917 年論體育的文章已經顯示出他對儒家的格言銘記於心：「有志者，事竟成」。[22]正如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所證明的，他對「愚公移山」的力量從未喪失信心。[23]

有一點毛更像斯大林而不是希特勒，就是他這些年來逐漸膨脹的偏執心。[24]相比之下，希特勒從納粹運動伊始便成為當仁不讓的領袖，沒有任何人質疑他的地位，他從未擔心過宮廷政變，因此也從未感到清洗納粹黨的必要。他在任何階段都未曾遭遇意識形態的挑戰；對於普通黨員而言，「阿道夫·希特勒就是我們的思想」。[25]希特勒就是納粹革命；從他而始，因他而終，沒有他，革命則無從談起。儘管毛大權獨攬，儘管他的思想佔了主導，但也是直到文化大革命，他才取得了能與希特勒相提並論的地位。

第十五章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毛在十中全會上恢復的積極使用武力的政策被簡潔地歸結為「反修防修」[1]。十中全會後中共在《人民日報》上進行爭論，並通過伍修權在東歐之行中的各種活動加強了在國外反對修正主義的鬥爭。赫魯曉夫煽動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大部分國家反對中國，無疑使毛生氣，並惡化了這兩個人之間的關係。

更重要的是，在思考赫魯曉夫的蘇聯時，毛看到了未來，認為這個前景完全不合他的口味。他再也不認為「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了。他要為中國尋找不同的命運。因此，當中共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與蘇共鬥爭的同時，毛在考慮更為嚴重的任務：在國內防止修正主義。其第一個措施就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3 年後，在繼這個運動而來的更遠為雄心勃勃的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有些地方，社教運動還正在進行中。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他與劉少奇作決定性的決裂的場合。

四清與五反

十中全會公報並未提及進行社教運動的計劃，只是強調由於有人要丟棄社會主義道路，因此今後會有長期而艱苦的階級鬥爭。但公報的確承認下層領導幹部已脫離了群眾。並說中共「應努力改變這種狀態並立即改進這些單位的作風。[2]

> 1 月份，《人民日報》抱怨說：有少數辦得不好的生產隊。……這些生產隊的幹部作風不純……幹部自己缺乏社會主義覺悟，甚至有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這樣的幹部缺乏甚至沒有為人民服務的覺悟，他們不切切實實地參加勞動，卻總想多吃多佔，他們不但不傾聽群眾的意見，而且還強迫命令……[3]

來自福建沿海靠近福州的農業縣連江的文件反映了這一現象的具體例子。[4] 幹部們利用職權叫農民們為他們造房子，盜竊集體所有的磚木。他們隨意吃喝、結婚和過生日接受現金賀禮。集體資金浪費在宴會、演戲和無意義的建設上。少數幹部腐化，提倡或至少「容忍」「迷信」──宗教。[5]

連江的文件表明，在福建，在 1962 年底正採取措施糾正這些錯誤，並以社會主義理想重新教育農民，使之符合十中全會的決定。在黑龍江、山東和四川也採取了同樣的行動。[6] 全會後毛視察了 11 個省，但只有二名官員「流利而不停地」談到社會主義教育，即湖南的王延春和河北的劉子厚，他們都是省的黨機關的高級書記。[7]

10 月 21 日，湖南省委報告 1961 年春季與秋季，1962 年春季的三股單幹風意味著 25,200 多小隊，即小隊總數的 5.5% 已分田單幹；更多的小隊正準備走這條道路，雖然有些小隊已回頭糾正錯誤了。顯然，在這新的政治氣氛下，「單幹」包括各種責任制（包括包產到戶在內），不僅是指分田到戶。貼分田到戶這個標籤的標準是戶在生產計劃和農活，以及勞動與收入分配上都起關鍵作用，不是指放棄集體所有。在大多數小隊裏仍實行集體所有。也不只有「地主和富農」關心單幹；貧農和幹部也支持單幹，他們對社會主義的信念已被饑荒動搖了。他們的動機顯然是迫切需要恢復生產，有食物吃，並且認為單幹是達到這目標的最好辦法。[8]

湖南的解決辦法是對幹部和從前的貧農進行社會主義信念的教育，並將他們作為先鋒隊來阻止和擊退單幹風的蔓延。要農民們回憶實行共產主義以前的困苦日子，並隱晦地威脅他們，除非他們集體耕種，否則在機械化方面，不會得到政府的幫助。[9] 可以預見，湖南的報告聲稱取得了成功。[10]

在河北省，1962 年冬季，保定地區試行了農村「四清」運動，後來被稱為「小四清」，以減少農民對幹部行為的憤怒。[11] 調查組命令「清」小隊賬目、糧庫、財產和工分、幹部瀆職與無能導致農民不滿的

各方面，以及改善收入分配。[12] 其他地方有試行「三清」、「五清」和「六清」的。[13]

在 1963 年 2 月 11 至 28 日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迫使其他省份接受湖南和河北的模式，他說:「一抓階級鬥爭，什麼都解決了。」[14] 他對劉少奇的講話插話說，防止修正主義的關鍵在農村，[15] 既然 3 斤豬肉幾包香煙就能賄賂幹部，只有階級鬥爭能防止修正主義。[16] 會議批准在農村進行四清運動，在城市展開五反運動。五反運動的對像是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鋪張浪費、分散主義和官僚主義。[17] 毛同意經濟調整期從 1963 年延至 1965 年，以作為對加緊階級鬥爭的補償。[18]

此次會議促使一些落後的省委行動起來。[19] 到 4 月份，四清運動在河南已進行到縣一級。[20] 省委提出分三階段進行：在縣級召開三級幹部會議，在公社級召開三級幹部會議，這兩個階段是對第三階段（即群眾受教育階段）的教育者進行動員。第一階段約 20 天，參加會議者為大隊級以上幹部 15 萬人，在 4 月中基本結束。

河南省委送給中央的統計數字是符合這樣一個在大躍進時左傾主義氾濫的省份作法的。該數字證實毛所希望的那種嚴厲的階級鬥爭是必要的。該省有 10 萬多起投機倒把案，有 1,300 多起反革命集團活動；26,000 多起地主、富農反政府案件、8,000 多個秘密社會和宗教團體；有 50,000 多個巫師、法師和風水師；有 10,000 多起保留宗族儀式的案件和 5,0000 起買賣婚姻。

最嚴重的是許多幹部參與，甚至帶頭進行這些活動。基層幹部中有 50 ～ 60% 是沒有經過土改鍛煉的年輕人，因此不會去鎮壓這些非法活動。有一個例子，一個小隊在 1960 年沒有一個人從事商業；到 1962 年就有 8 人，而到 1963 年 4 月就有 80 多人做生意了。而農活的出勤率則降至 10%，集體企業幾乎全垮了。[21]

在江蘇，省委的步伐卻不那麼緊。江蘇甚至在 2 月會議結束前就開始討論其意義了，但五反運動的發動卻遲至 3 月下半月的另一次會議以後。它的四清運動於 4 月 30 日才開始。[22] 在黑龍江，省委似

乎更為落後，五反運動到 4 月 23 日才發動。[23] 第一個階段包括清理哈爾濱和另 7 個大城市的黨、政和其他單位，到 8 月底才結束。可能腐化幹部受到了罷黜或紀律處分，在八九十年代反貪汙運動中，嚴重的違法者難以受到懲處，這使人回想到社教運動的統計數字時，不禁有些懷疑。第二個階段直到年底才結束，這個階段將運動延伸到了縣級。運動的每個階段都有三個步驟：增加生產、厲行節約；結合反對鋪張浪費和改造；最後形成反腐敗、反投機的群眾鬥爭。在運動過程中揭露包括哈爾濱在內的 4 個城市的 55 家企業共浪費 1.03 億元。[24]

社教運動轟轟烈烈開展後出現了未預料到的現象。這在政治局候補委員烏蘭夫領導的內蒙古黨的做法中體現出來了。為響應中央各種號召，當地的黨召開了一系列會議，從 10 月 8 日到 11 月 3 日開了一個長會，另一個會議於 12 月 27 日召開；第三個會議在 3 月開了 10 天，而第四個會則在 4 月 1 日召開。每個會議都作出了新的決議。[25]

「向雷鋒同志學習」

毛在 2 月會議上驅使各省採取行動後，又取出與國內修正主義作鬥爭的新武器。同月，《中國青年》的編輯寫信向毛報告他們將發表一篇文章表揚一名叫雷鋒的無私的人民解放軍年輕軍官（譯按：原文如此，可改為軍人），請毛為之書寫口號，號召人民學習雷的榜樣。[26] 這要求是由他的一名秘書林克在成堆的文件中轉給毛的。在後來的幾天中，編輯們兩次打電話詢問主席作出了什麼決定。第二次，林告訴他們毛會寫的；毛對雜誌有關這年青人的報道留下深刻印象並告訴總參謀長羅瑞卿這年青人的確值得學習。編輯們問毛的口號能否在 2 月 25 日寫好，供 3 月 1 日的那一期雜誌使用。毛要林克擬幾條口號，2 月 22 日他叫林去並說他不用林的口號，而用他自己的：「向雷鋒同志學習」。

這口號在《中國青年》3 月 2 日那一期上刊出，3 月 5 日又登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光明日報》。第二天，《解放軍報》發表

了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和鄧小平寫的類似的口號。後來，陳雲也寫了。3月13日，《解放軍報》發表了重要社論，如何通過學習雷鋒做一個毛主席的好戰士。[27]就在這種不經意的方式中，全國掀起了「學習雷鋒」的運動。[28]

雷鋒證明是一系列英雄人物中的第一個，這些英雄中，大部分都在他們為群眾服務中獻身了。他們的日記，大多數文字平庸幼稚，表達了一種新的共產主義的道德情操。他們很欣賞雷鋒的下列兩則日記：

> 今天早上起來，我感到格外的高興，原因不是別的，昨晚我夢見了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正好今天又是黨建立40週年的誕生日。今天，我有向黨說不盡的話，感不盡的恩，表不完為黨終身奮鬥的決心……我像一個學走路的孩子，黨像母親一樣扶著我，領著我，教會我走路……親愛的黨，我慈祥的母親，我要永遠做您忠實兒子……
>
> 今天是星期日，我沒有外出，給班裏的同志洗了五床褥單，幫戰友補了一床被子，協助炊事班洗了六百多斤白菜，打掃了室內外衛生，還做了些零碎事……總的來說，今天我盡到了應盡的義務，雖然累了一點，也感到很快活……當一名無名英雄是最光榮的。[29]

雷鋒運動的實質，就是鼓勵徹頭徹尾的忠誠、奉獻，在危難關頭聽命與毛和黨。劉少奇和他的其他高級同僚們在寫下歌頌雷鋒的口號的時候未曾想到，有一天毛會利用這一切好處，轉而打垮他們。[30]

《前十條》

雖然在社教運動中雷鋒被樹為典型[31]，但階級鬥爭對幹部的要求更嚴厲，不僅要「洗手洗腳」，甚至還要「洗澡」，總之，使自己從腐化中解脫出來。[32]毛在2月工作會議後又於5月2至12日在杭州召開了另一次會議。就像1961年廣州會議一樣，這次會議開始時是毛與有些大區的領導人之間的自由討論，但很快就升級為更重要的會議，許多最高層領導都參加了。[33]然而，開會時，劉少奇正在海外對印尼、

緬甸、柬埔寨和越南作國事訪問。[34] 對於劉來說，這次訪問能為他在媒體上樹立更高的聲譽，這樣的聲譽截至目前只為周恩來和毛自己所專有。對毛來說，劉的缺席讓他有機會定義社會教育運動，而不受這個被他放在政治局常委第一線的人幹預。不是說劉會反對毛，但他不在，毛就可以隨心所欲推動社教運動而不受干擾。劉對該會產生的文件完全贊同，沒想到他與毛最終會在什麼是大躍進以後的問題上有分歧，劉認為問題出在基層，而毛則認為在最高層。[35]

杭州會議的文件《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後來被稱為《前十條》，是由彭真起草和修改，並由陳伯達定稿的，毛則在各階段都密切注意並予以修改。[36] 這檔是根據湖南、河北、河南、湖北、山西、浙江與東北的 20 份報告草擬的。第 1 條充分肯定了當前農村形勢，以此證明過去的悲觀是錯誤的，三面紅旗是正確的。第 2 條回顧了十中全會的結論，再次確認毛號召進行階級鬥爭之正確性。鬥爭之所以尖銳是由於剝削者企圖捲土重來，其證據就是怠工、投機、牟取暴利、雇工、土地買賣之出現以及宗教、宗族和秘密社會之再度出現（第 3 條）。由於一些幹部對這情況未能理解，因此形勢更為嚴峻（第 4 條）。在農村地區進行階級鬥爭，中共必須依靠貧下中農（第 5 條）——這就解決了在毛看來是千年的問題[37]——這些農民應在公社、大隊和小隊中組成協會（第 7 條）。社會主義教育就是講授各公社、大隊的革命歷史、農村改革和合作化的歷史，以此使人回憶起過去的壓迫。運動應有三個階段：訓練幹部、訓練更多的幹部與農村積極分子，最後是群眾教育（第 6 條）。《前十條》是根據保定模式制定的，它號召在農村開展「四清運動」。動員群眾查賬、查庫、查財產和查工分。目的是教育而不是懲罰。嚴格禁止「任何種類」的體罰，這樣幹部們就得「手腳乾淨」，與 95% 的幹部和群眾團結一致以對付敵人。[38] 毛在杭州會議上的講話中，說這一年不能取消死刑，在 1964 年再議。[39] 嚴重腐敗的案子可以法律手段予以解決（第 8 條），雖然毛也承認在退賠後可以寬大處理。[40] 第 9 條再度肯定中央一直進行的

所有幹部參加體力勞動的號召；與前十條一起頒發的與此有關的 7 個浙江文件，毛稱之為很好。主席說沒有這一醫治過程，就會出現修正主義。[41] 第 10 條再次肯定了「蹲」點調查。[42] 以上各條，大多都是毛在杭州會議的 4 次講話和批示中所強調的。[43]

隱含在前十條之內的是自始至終圍繞社教運動的根本問題：教員（幹部們）和教室（中國農村）是否適宜於完成對農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這一任務？顯然，如果幹部要說話有道理，有人聽，他們就必須乾淨。這就是為什麼這運動的綽號叫「四清」，即令「清」的內容改變了，而這綽號仍然保留著。在合作化以前，幹部們令農民們回憶地主和他們的庇護人國民黨的殘暴和經濟上的壓榨；而自合作化以來，許多幹部腐化了，利用地位來統治，有時毆打農民，像以前地主一樣。毛在杭州公開地思考過有些幹部與國民黨的幹部是否有本質差別。[44] 的確，幹部洗澡最後成為廣泛和難以駕馭的事，以致將對農民進行教育的終結目標都淹沒了。

但是，即令「教員」是乾淨的，教育的環境也很差。在大躍進以前，在農村，不論是心甘情願，還是勉勉強強，人們還是接受合作化的，因為它是未來的潮流。這時，顯然有許多農民，甚至幹部對這一前景都抱有嚴重的懷疑，而責任制卻提供了另一個誘人曙光。在饑荒以前，幹部們可以使農民回想起在共產黨取得政權以前的艱難生活條件，那時實行的是個體耕種；但即令是在 1963 年還活著的老農，也沒有幾個人經歷過大躍進以後嚴酷的饑荒帶來的匱乏。更為重要的是，不論河南的數據是多麼地誇大，它還是說明瞭傳統的社會與經濟的作法是深入人心的，在社會主義的華而不實的外表失敗以後，這些作法又重新出現了。

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毛在政治危機時常用的拯救措施——1957 年夏、1959 年廬山會議以後，1960 年第二個困苦歲月之初以及 1961 年第三個困苦歲月之末。[45] 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向毛和中央保證貧農回憶歷史是引導農民重新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很有效的

方法。[46]*** 的確，進行了大量的「憶苦」[47]，雖然即令宋也承認難以使年青的農民相信過去比現在要糟。[48]事實上，「教育」可能與在全國放棄責任制無關。重要的是中央重新鼓起了勇氣，發佈了明確的指示，上自大區，下至小隊的中共幹部們知道除非他們遵照指示行事，否則就會對他們不利。只要幹部們又團結一致和堅定起來，農民的反抗就無濟於事。但是在中國廣大的農村，無疑仍有相當餘地可以實行某種形式的「責任制」。

《前十條》在一段裏引用了毛最近「極為重要的」講話：

> 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不然的話，讓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跑了出來，而我們的幹部則不聞不問，有許多人甚至敵我不分、互相勾結、被敵人腐蝕侵襲、分化瓦解，拉出去，打進來……照此辦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請同志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麼危險的情景啊！
>
> ……這一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一次偉大的革命運動……這一場鬥爭是重新教育人的鬥爭，是重新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向著正在對我們倡狂進攻的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作尖銳的針鋒相對的鬥爭，把他們的反革命氣焰壓下去。[49]

這段講話預示著以後文化大革命的內容：光明（社會主義）和黑暗（修正主義）力量之間的殊死對立；需要永遠提高警惕和如果中共和群眾放鬆警惕，中國就有走向資本主義的前景，以及「重新教育人」的要求。

然而，這時毛所指示的與他在社教運動末期與文化大革命所企求達到的有一個重要的差別。在 1963 年春，毛的行動仍然建立在中國的未來將由農村決定的假設基礎上，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部分時間

裏都持這一假設。在 1956-1957 年，他錯誤地得出結論，農村問題已由合作化解決了。他將重點轉向了知識分子，他認為知識分子是他所擁護的蘇式現代化計劃的工程師。在 1958 年，知識分子令他失望，他將大躍進的快速發展寄希望於體力而不是腦力勞動，又回到他慣常的對農民的重視。[50]這種重視充分體現在《前十條》裏。但到 1965 年 1 月，毛又贊成另一種觀點：中國「改變顏色」的關鍵在於中共內部是否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後十條》

杭州會議以後，在城市進行了五反運動，到 9 月中央黨政單位已結束[51]。在農村，各省建立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試點。雖然毛對各省領導人指示要穩妥，《前十條》又規定要教育，不要懲罰並且禁止開鬥爭會，但社教運動仍像以前農村運動一樣激烈粗暴。（我們）所得資料有限，但到 2 月底，甚至運動還沒有正式開始，湖南已死了 76 至 97 人，大多顯然是自殺，在湖南和湖北發生多起拷打和其他暴力鬥爭事件。5 月中至 6 月中，彭真視察了河北、江西、湖南、廣西、雲南、貴州、四川和陝西，發現各地均有類似問題。在他 7 月 4 日向毛的報告中說，除去少數案件是地主和腐敗分子奪權，需要由外面派工作組外，可以信任當地幹部來負責這運動。他警告不要重複在土改時華北老解放區所犯的「左」的錯誤。中央決定必須採取步驟防止情況失控。[52]

毛也承認問題是由於他的號召引起的，[53]但他似乎又退到二線去了，而由他的同事們討論如何調整社教運動。9 月中央工作會議討論了彭真的報告，在鄧小平與譚震林指導下，田家英起草了《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問題》，人稱《後十條》。10 月 5 日，在反覆修改後，鄧說草案「可以了」，並送給毛。主席似乎在一些大區與他滿意的領導人——華東的柯慶施、中南的陶鑄和王任重——討論過這草案，加批語後退回政治局。

劉少奇在這過程中的作用似乎很少，只是正常的作用。在文化大革命初的交待中，他否認知道這文件的起源：

> 第二個十條怎麼來的? 我不知道。只是到最近，我才知道在制定了《前十條》以後，彭真視察了 7 個省。他回來後，向毛主席呈遞了一份報告，這就是「第二個十條」的基本思想。[54]（著重點是我加的）（按英文譯出）

在 1966 年 10 月劉所處的那種嚴峻政治情況中，如果沒有根據，他是不會說出透露常委決策過程中偶然事件的話的。他的交待說明黨是多麼以毛為中心的。毛在 1962 年夏又重新顯示了他的作用，社教運動是他個人發動的。在這種情況下，似乎在鄧與彭真領導下的書記處不認為有必要將所有有關社教運動的文件都通過劉（送給毛）。劉赴北朝鮮進行國事訪問，因而不在國內，但這不能成為他們這樣做的理由，因為國事訪問只佔用了 9 月下半月的二個星期。[55]

10 月 31 日，劉少奇召開了政治局會議，通過了第六稿，鄧第二天將之送給在上海的毛。11 月 4 日，田家英將下一稿送給主席。最後，11 月 14 日，政治局會議在劉主持下正式通過了這檔，然後，由毛簽發。雖然他後來抱怨在（前十條）公佈不久，他的同事就認為應該修訂他提出的原稿，但他在起草新檔時還是參加了的。[56]

《後十條》裏充滿了對毛、對社教運動和《前十條》的讚揚，說它是：

> 一個偉大的具有綱領性的文件……關於我們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和經濟上各方面的基本建設……各地試點的經驗，充分證明，毛澤東同志對於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階級矛盾、階級鬥爭問題的分析和指示，具有偉大的革命意義和歷史意義；充分證明，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指示開展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對於打退曾經囂張一時的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的倡狂進攻，對於鞏固農村社會主義陣地和無產階級專政，

對於剷除發生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對於鞏固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都有著極其重大的作用。[57]

起草《後十條》的人知道它將決定社教運動的未來道路。他們顯然竭力向主席表明他們的意圖是嚴格遵照他的指導方針的。[58] 他們是這樣做的麼？是的，但也不是，因為他們想遵照的指導方針是有矛盾的。[59]

一方面，毛認為社教運動是自土改以來在農村進行的第一次徹底的階級鬥爭。[60] 確實，他曾責備在許多地區的土改進行得相對平穩，歪風吹遍農村，[61] 社教運動是第一次真正在全國展開的這類鬥爭。前、後十條都承認社教運動的史無前例的性質。[62] 如果徹底的土改是最低標準的話，那麼社教運動就會導致相當大的騷動。[63]

另一方面，在《前十條》裏，毛遵循他在十中全會上所作的承諾不發動一場有損生產的運動。在列舉社教運動的目標時，前一份文件稱他們「完全是為了發展農業生產」；後來，它規定社教運動過程「在不誤生產，密切結合生產的條件下」分期分批地進行[64]。《後十條》再度強調這一立場：「運動進行的每一個步驟都不能耽誤生產。」[65] 這兩個基本上矛盾的目的怎樣調和起來則不是毛的事，他將像這樣難辦的問題留給他的同事們，而他自己是保留了最後批准的權力。這樣，他的同事們極為小心地、而且篇幅很長地在《後十條》裏——比《前十條》長一倍半[66] ——列舉了幹部在社教運動中應採取的辦法和方法。它規定了十二項工作，七種領導方法（內又有 6 小條）四種區分階級敵人、小投機者、進行合法副業的農民的方法，五條組織貧下中農協會的原則，五種（內又分 4 小條）處理犯錯誤幹部的方法以及社教運動後黨支部應遵守的八條標準。[67]

在如此眾多的規定中，起草人必須找出一條辦法將社教運動行將釋放出的反資本主義熱情與十中全會正式批准的《農業六十條》所鼓勵的自留地和自由市場協調起來。起草人以苦心孤詣的語言命令當地幹部區分「投機倒把分子與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比較嚴重的農民」、「投

機倒把活動與正當的集市貿易活動，臨時的肩挑運銷和小量的販運活動」、「資本主義自發勢力與正當的社員家庭副業」。[68] 但他們都是有經驗的黨的官員，他們一定知道，說到底，在當地，這些判斷是由當地的權力結構、家庭或其他個人關係和當前的階級地位來決定的。[69]

為減少當地內部鬥爭的規模（已有此類徵候），《後十條》強調需要團結 95% 以上的農民和幹部，並表示這兩類人中只有很小的百分比是反革命分子或嚴重罪犯。10 條裏有一條是談處理前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的，另一條則是談處理他們的子女的。[70] 關鍵的人群是富農，毛和劉都出身於富農家庭。富農可能是農村最富有活力的分子，對恢復農業生產至關重要。單獨一條是談中農的，他們也富有企業精神，但給他們定成份卻是個棘手問題，這種問題可追溯到 1933 年。[71]

但《後十條》卻掀起了階級鬥爭，而不是抑制當地的偏見。在第一批湖北的試點中，有二千多人死去，在省的第二批試點開始 25 天內，僅襄陽地區就死去 74 人。在廣東有 602 人企圖自殺，其中 503 人死去。[72]

如果《後十條》沒有要求幹部們謹慎從事，並防止社教運動失控，這類數字無疑會還要高些。這裏不再是 40 年代末、50 年代初國民黨的農村了。當時這裏是一片處女地，可以由中共前來開墾，因為土改的階級鬥爭在摧毀當時權力結構中是個關鍵階段。這裏是共產黨的農村了，已被饑饉荒蕪了，但在社教運動過去以後將仍由共產黨管理。這就是為什麼社教要比土改「更為複雜」，為什麼《後十條》說，除非在特殊情況下，這裏不會重定階級成份。[73]

兩個十條的最根本差別在於社教運動中的領導權問題。《前十條》按毛以前所做的那樣強調各級幹部必須認真對待階級鬥爭問題，參加進行階級鬥爭的社教運動。但在這份較早的文件中，幹部卻更像是調查者、教員和助手，而不是領導者。如第 8 條在談應如何進行四清時說「首先應做的是發動群眾」。[74] 計劃中的貧下中農協會是與社教運

動本身同等重要地位的。[75]而《後十條》則認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能否順利進行，黨的政策能否在運動中貫徹的關鍵在於領導」[76]（按：重點是我加的）。而成立農民協會則放在次要位置上。[77]

如果群眾要像《前十條》規定的那樣在四清中起領導作用，那麼就意味著要有一個「開門」整風的過程，群眾參加批判「四不清」幹部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會。而《後十條》規定的領導權是由高一級幹部組成的工作組掌握的，對犯錯誤的幹部進行「關門」整風，少數貧農代表參加。[78]

這兩份文件的矛盾反映出毛和劉的分歧，這分歧在 1957 年整風運動中有關允許黨外人士批評黨員的爭論上就表現出來了。[79]大多數黨員害怕被黨外人士批評，不論他們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是貧農。他們完全知道這樣會發生什麼事。這種矛盾也是植根於如何進行革命的不同方法裏，以毛為一方，以劉和大多數同事為另一方，各持一詞。即令在大躍進開始、毛和劉立場一致的時候，毛也是贊成釋放出群眾的積極性，而他的主要助手則寧願贊成有組織的動員方法。[80]毛相信在革命中學會革命，這樣，資訊就是仲介。而他的第一線的同事們，關心的是農村恢復健康發展，這樣，由共產黨謹慎地控制社教運動就是防止運動失控的關鍵。這種在方法上的不同後來成為毛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攻擊劉和鄧的根據。[81]

然而，後來批判《後十條》[82]並沒有說毛曾同意該文件，也沒有說他當時可以否決這文件。他發動了社教運動，又很快地否定有關社教運動中他不贊成的後一份文件，證明他有權藐視他的同事們。可能他在等待機會，看看社教運動發展得怎樣，評估他的同事們是否適合領導他認為必須有的革命高潮。更為重要的是，與蘇共的分裂可能分散了他的精力，當時與蘇共的分裂已公開化，似乎是不可逆轉了。

第十六章 中蘇決裂和越南戰爭

1963 年德國統一社會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原文是東德代表大會）結束後，以莫斯科、北京和地拉那為中心開始了一系列的論戰。從 1962 年年末到 1963 年春的 3 個月時間裏，北京便發表了 8 篇辯論文章。[1] 中蘇在交鋒中唯一一致的觀點就是形勢十分嚴峻，蘇聯人指的是「主要政策問題」上的分歧，而中國宣稱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正面臨「越來越危險的分裂」。雙方表面保持謹慎克制的態度避免相互直接攻擊，但無疑行動都是有針對性的，尤其是《人民日報》轉載的阿爾巴尼亞指名攻擊赫魯曉夫的文章。北京特別指出，蘇共領導人提出停止爭論的建議，是一個要封住中共的口而任其為所欲為的詭計，因而他們予以拒絕。[2]

論戰的一個焦點是南斯拉夫問題。鐵托訪問莫斯科時，蘇聯邀請南斯拉夫派代表團參加東德和義大利黨代會，這樣做顯然破壞了 1960 年在莫斯科召開的（註：原文無）共產主義高級會議作出的決議：共產黨一致譴責國際機會主義的南斯拉夫變種，這個變種是現代修正主義「理論」的「集中表現形式」。決議斥責「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正不斷破壞社會主義陣營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指出進一步暴露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的頭子（鐵托）「仍然是馬克思—列寧黨的一個重要任務」。[3]

中國人認為，一個黨對南斯拉夫問題的態度代表著一種選擇：「或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或是陷入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泥潭……要麼真正加強聯合要麼僅是表面聯合真正分裂。」[4] 蘇聯回答的中心意思是要求像對待一個失足者那樣對待鐵托，堅持認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應當把幫助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改正錯誤作為自己的目標。另外《真理報》發表了中國早期親南斯拉夫的言論。[5]

北京在辯論中除了再次強調長期以來的立場外，猛烈攻擊蘇共對兄弟黨行使霸權。[6]通過強調第三世界革命的重要性，中共含蓄地提出了自己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意圖。前年12月份赫魯曉夫曾指責中國未能收回香港和澳門，為了反擊這種挑釁性言論，《人民日報》發表了在19世紀帝國主義國家利用不平等條約所掠奪的全部中國領土，其中包括由沙俄掠走的現在蘇聯的中亞和遠東地區。文章暗示赫魯曉夫任何刺激性的言論都會導致中國提出重新談判中蘇邊界的要求。[7]

中蘇談判

中蘇重新辯論使許多兄弟黨憂心忡忡，莫斯科與北京可能的分裂，將嚴重威脅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和他們自身。他們呼籲召開會議使蘇共和中共能消除分歧。兩黨最終接受了這個請求，儘管目的只是顯示善意，獲得支持。[8]

蘇共作出的第一個姿態就是邀請中共舉行雙邊會談，準備另一次的國際共運大會。1月23日蘇聯駐華大使在遞交蘇共給毛澤東的信時，毛建議赫魯曉夫來北京交換意見。[9]3月9日鄧小平將中共的覆信交給了蘇聯大使，表示中共歡迎蘇共提出會談的建議並重複了毛對赫魯曉夫的邀請。[10]3月30日，蘇共利用外交技巧，認為赫魯曉夫已三次訪華，而毛只訪問過蘇聯兩次，提出反建議：毛應當再次訪問蘇聯以實現他一直希望訪問蘇聯的心願。但是，不管是誰率團，莫斯科會談的日期都定在5月15日。[11]

中蘇通信的目的不只是要爭論誰是對方代表團的領導人。蘇共只有第一封信是試圖緩和緊張氣氛；其後的信件則是進一步爭論，重申了蘇聯的強硬立場，中國對此反應十分強烈。[12]中共對3月30日蘇共的覆信，即由陳伯達等人起草的《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13]這個《建議》代表了中國的談判立場，北京在定稿前預先徵求了友好的兄弟黨領導人如金日成、胡志明等人的意見。[14]蘇聯聲

稱它具有很強的煽動性而拒絕公佈。一個蘇方官員事後認為赫魯曉夫真正擔心的是被扣上偏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罪名。[15]中國駐蘇的一些外交人員和留學生試圖散發這份《建議》但遭到驅逐出境，其後發生了蘇聯年輕人搗毀中國使館展覽櫥窗的事件。[16]但是在進一步交換了有關會談日期的意見後，中國派鄧小平、彭真、康生、楊尚昆、劉寧一和必不可缺的伍修權前往莫斯科，與蘇斯洛夫領導的包括安德羅波夫等人的蘇聯代表團進行會談。[17]

莫斯科會談

1963年7月5日上午7點30分中國代表團離開北京前往莫斯科，在機場受到除毛以外中共主要領導人的歡送。[18]一個心情不好的盟友，恩維爾·霍查在他的日記中透露：「代表團……在北京受到婚禮般的熱情歡送，在莫斯科卻受到葬禮般的冷遇。我們將預見到這個不值得進行的正式會談將會產生什麼後果……和叛徒赫魯曉夫會談能取得什麼樣的成果呢……」[19]幾天後，霍查寫道中國外交部長陳毅告訴阿爾巴尼亞大使，莫斯科會談可能破裂，但是以後會繼續談的。雖然陳顯然對赫魯曉夫提出激烈批評，但說重要的還是要阻止他「投向帝國主義」，霍查十分反感地說，這種說法等於重複了蘇共為討好鐵托而提出的理由。霍查批評中國左右搖擺，沒有明確的戰術，經常因蘇聯施壓而嚇倒。他指出，儘管阿爾巴尼亞是中國「唇齒相依」的盟友，但在會議前要求友好兄弟黨提意見的時候，還是被排除在外。[20]雖然中國歡迎地拉那大肆攻擊莫斯科，但同時他們也認為霍查就像一個一觸即發的火炮，在他為孤立的巴爾幹尋求更大安全的過程中，將會破壞中國的利益。

然而，不應無視霍查的直覺。儘管中共的公開聲明是強硬的，但是邁出與蘇共分裂這重大一步是要謹慎考慮的，這可能會導致有高度破壞性的影響：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分裂，而這個運動是毛和他的同志們期待了40年的理想。另外，面對美國，還將失去蘇聯的核保護

傘。在中蘇敵對最嚴重的1960年之後，仍有一些像王稼祥這樣的中共領導認為，中國的目標應當是改善與蘇聯的關係，避免關係破裂。在毛判斷雙方關係已達到無可挽回的地步以前，毛想要自由進行自己的選擇時，有這種提法也是不足為怪的。中國的談判代表奉命對蘇聯的攻擊給予適當的回應，但還是應在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國際主義的基礎上同蘇共保持團結一致，「盡最大的耐心和努力」[21]。

在最好的情況下，和解也是難以達成的，更何況會場外是雙方相互不斷攻擊，[22]會場內又是「聾子對話」[23]。從7月6日第一次會談開始，雙方只是重申自己的立場和批駁對方，進行攻擊和反攻擊。沒有解決問題的共同基礎。會談很快陷入了一種模式：一方由代表團中的高級官員宣讀準備好的發言，然後翻譯，一兩個小時便過去了。[24]

> 從一開始，會談就以他們特有的節奏和方式進行。由無休止的單方面聲明組成，一方面猛烈攻擊對方，其次為自己的觀點和正宗的馬克思主義辯論。蘇方代表宣讀他們的發言，然後就按事先的演練，其他人起來輪流補充。[25]

會議結束後，雙方馬上進行各自的緊張研究，分析對方所講的內容，準備下一次會上宣讀的批駁發言。會議就是這樣循環往復進行。[26]會議的發言程式是：7月6日，蘇斯洛夫；7月8日，鄧小平；7月10日，蘇斯洛夫；7月12日，鄧小平；在同一天的第五次會議上發言的是波諾馬廖夫；7月15日，彭真；7月17日，安德羅波夫；7月19日，康生[27]。在伍修權看來，這樣的進程唯一的好處是雙方都有充分機會解釋自己的立場。[28]

徹底決裂

在會議毫無結果的爭論中，蘇聯代表團突然奉命迅速起草了回答中共二十五條《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的公開信。「這篇長文是在創紀錄的短時間內寫出的，我們在蘇共中央的一幢辦公樓裏工作長達30個小時，一頁一頁地傳遞給中央書記們審看」。[29]7月

14 日，蘇共中央發表了對此的回應，對比這兩份文件使那些甚至處於會議室以外的人也能看出北京和莫斯科的分歧之大。雙方文章仍舊像以往一樣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語言寫成的，並以大段引用經典著作的話來支持自己的理論，至少中方如此。但實質是有關外交政策和共產主義陣營內部矛盾的問題。

中國的二十五條「建議」是把 7 年來雙方爭論問題作為標題，以一系列命題的形式羅列：

-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必須要有一個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基礎之上的總路線，用它去分析世界的基本矛盾，就像 1957 年和 1960 年的莫斯科聯合宣言那樣。[30] 這意味著社會主義陣營要有一個共同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說中國能否決蘇聯試圖改善同美國關係的行動。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力量對比朝著有利於前者的方向發展，然而美帝國主義繼續在世界範圍內推行戰爭和侵略政策。[31] 也就是說，社會主義陣營的不斷壯大並不能證明就一定能取得勝利，還需要為之繼續鬥爭。
- 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廣大地區，是當代世界各種矛盾集中的地區，例如以解放鬥爭的形式呈現。「因此，在一定意義上說來，整個國際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終究要以佔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這些地區的人民革命鬥爭為轉移」。[32] 這顯然是中國持續努力，要把蘇聯的注意力從美蘇雙邊鬥爭吸引到他們特別擅長的地區來。
- 如果共產黨領導人執行非革命路線，那麼他就要被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者取代。[33] 18 個月後赫魯曉夫被逐，中國共產黨派周恩來前往莫斯科就是去看看是否發生了這種情況。
- 世界和平與安全是通過鬥爭取得的，而不是放棄鬥爭或天真地呼籲普遍裁軍能實現的。[34]
- 核武器的出現不能改變社會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必要性，也不能改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有關原理。[35] 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之間實

行和平共處並不意味著結束民族解放鬥爭或是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共產黨國家有責任支持和幫助被壓迫民族和國家鬥爭。[36] 換句話說，蘇聯不應以核毀滅戰爭為威脅來削弱第三世界的革命鬥爭。

- 共產主義政權建立以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始終有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全民國家」和「全民黨」（這是蘇共的最新綱領所提到的）是資產階級思想。[37]
- 對個人崇拜（非斯大林化）的攻擊已蛻變為迫使兄弟黨更換領導人的陰謀了。[38]
- 對待與兄弟黨之間的分歧，如蘇聯與阿爾巴尼亞之間的矛盾，可以通過黨內協商解決，而不應在黨的代表大會上公開進行攻擊；[39] 修正主義或右傾機會主義（南斯拉夫的綱領路線），而不是教條主義（像蘇聯認為中國是教條主義）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主要危險。[40]
- 最後，在社會主義陣營內的爭論中，蘇共也應像中共發表蘇聯文章那樣，將中共的辯論文章公開發表。[41]

7 月 14 日蘇共中央以致全體蘇聯共產黨員的公開信的形式，作出了對中共覆信的回應。它指責中共「歪曲」解釋 1957 年和 1960 年《莫斯科宣言》的內容，拒絕中共對蘇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決議「毫無根據的和無理的誹謗」。[42] 公開信列舉了蘇聯對中國革命和中國經濟發展所給予的幫助，進而列舉了中國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反蘇和分裂的活動。[43] 中共的《建議》就是這樣一個例子，蘇共拒絕將其發表，因為發表了就必須對之答覆而這反過來又會惡化兩國關係。[44]

這封信轉而談到兩黨分歧的實質。可能為瞭解釋蘇共在爭論中很少提出理論根據，公開信嘲笑中共用口頭「偽裝」的辦法，「使外界認為爭論是學術研究性的，涉及個別公式，而不是重要問題。而事實上，爭論的中心是涉及到各國人民切身利益的問題。」[45] 這些問題是：

- 戰爭與和平問題；
- 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作用和發展問題；
- 反對個人崇拜的鬥爭；
- 世界工人運動戰略以及策略問題和民族解放鬥爭的問題。[46]

對此，公開信重申了蘇共的立場，探究了中共理論主張的隱秘動機。例如關於個人崇拜，公開信不能判斷中共為什麼保衛個人崇拜：「實際上，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我們還是第一次遇到公開頌揚個人迷信的事。必須說，甚至在我國個人迷信盛行時期，斯大林本人也不得不至少在口頭上反對這一小資產階級的理論……」[47]讀者顯然對此可以得出這樣的判斷：中共維護個人崇拜是因為要在中國維護對毛的崇拜的需要。另外，中共強調武裝鬥爭是取得革命勝利的唯一途徑，把重心放在了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區，按照蘇聯的說法，這是用最輕易的辦法在第三世界人民當中贏得聲望，使民族解放運動孤立於國際工人階級及社會主義世界體系（即蘇聯）之外。[48]

但是，實際上辯論的核心仍然是戰爭與和平的問題。蘇聯公開信重申了 1956 年 2 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確定的路線，對此，中國當時是贊同的。[49]核武器的出現使「進行戰爭的手段有了根本的、質的改變，這種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壞力。只說一點就夠了，即一個強大的熱核炸彈的爆炸力就超過包括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內的以前所有戰爭中使用的全部戰鬥武器的爆炸力。而這樣的炸彈已經積貯了成千上萬個了！」[50] 1957 年毛在莫斯科的講話令蘇聯和他的東歐盟友不寒而慄[51]（這話引用在公開信中但沒有指名），赫魯曉夫十分擔心 1958 年中國炮擊沿海島嶼所引起的台灣海峽危機將會升級為蘇美直接對抗。中國在中印邊境所採取的行動和北京對加勒比海灣危機的宣傳報道，使赫魯曉夫更加確信毛是危險的、無知的戰爭販子，[52]認為他沒有時間搞和平，最好是將蘇聯拖進蘇美核戰中，在這場戰爭中只有人口眾多的中國能夠得益。[53]這就是為什麼 1959 年赫魯曉夫取消與

中國的防衛協定和撤銷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的計劃。[54] 這種擔心再一次表現在公開信中：

> 中國同志……直截了當地說：「在帝國主義死亡的廢墟上」，換言之，由於戰爭的發動，「將創造起美好的將來」。……顯然，那些把熱核武器稱為「紙老虎」的人沒有充分意識到這種武器的破壞力……原子彈是不會辨別帝國主義者在什麼地方，而勞動人民又在什麼地方的，它轟擊成片的地方，所以消滅一個壟斷資本家，就會消滅數以百萬計的工人。
>
> 中國同志對問題的這種提法會使人產生理所當然的懷疑：這已經不是用階級的態度來看待消滅資本主義的鬥爭，而是有完全另外的目的。如果在舊世界的廢墟下，既埋葬剝削者，又埋葬被剝削者，那麼將由誰來建設「美好的將來」呢？在這方面不能不注意到，中國同志不是採取表現在「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一口號中的階級的、國際主義的態度，而是頑固地宣傳沒有階級內容的「東風壓倒西風」的口號。[55]

毛在用東風和西風的提法時，所謂東風是指整個社會主義陣營。但蘇聯故意錯誤地理解了這個提法，認為毛把蘇聯歸之於西風，只有中國才是東風。

儘管蘇共堅決否定中共的提法，但是蘇共本身的立場是處於一種矛盾狀態，源於蘇聯在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存在著搖擺和分歧。根據一個曾經參加起草回信的蘇聯官員的說法，「毛主義者的宣傳恐嚇和逼迫，不難令我們採取防禦，採取矛盾的和錯誤的立場」[56]。另外，蘇共第一次明確地指出「原子彈不會辨別階級」，但是後邊的一些段落卻用了幾近中共的語言「不言而喻，如果帝國主義狂人竟然發動戰爭，各國人民一定把資本主義消滅光和埋葬」[57]。

禁止核試驗條約

蘇共強烈重申核戰爭的危險和與美國保持和平共處的必要性，是由於蘇共領導層內部出現了戲劇性變化的結果。4 月 11 日，科茲洛夫

在赫魯曉夫缺席並謠傳準備遞交辭職報告的情況下主持召開了蘇共政治局會議，24 小時後由於嚴重中風或是心臟病而離開了政治舞臺。[58] 科茲洛夫以前對赫魯曉夫反對中國政策的支持是決定性的，從而表明蘇共領導人是一致反對中國人的。但他在蘇美問題上所堅持的立場比赫魯曉夫更強硬，如果他在 1963 年春佔了上風，中共也許會從莫斯科與華盛頓日趨緊張的雙邊關係中得益。[59] 無疑，科茲洛夫的退出，使赫魯曉夫對甘迺迪的態度有了變化。蘇聯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開始軟化下來。[60]

巧合的是，科茲洛夫病倒 4 天後，甘迺迪和英國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聯合致信赫魯曉夫，試圖恢復擱淺的禁止核試驗條約的談判。[61] 西方盟國最關心的是阻止中國得到核武器。1963 年 1 月，甘迺迪對戴高樂總統的文化部長安德列·馬爾羅說，一個擁有核武器的中國將會「對未來人類，自由世界和自由的地球造成很大威脅」；中國人「甘願冒犧牲千百萬條生命，來實現他們的『侵略和軍事政策』」，因為他們「輕視」人的生命價值。[62] 美國政府希望簽訂的禁止核試驗條約將會進一步鼓勵蘇聯制止中國的核計劃。[63] 儘管赫魯曉夫說了一些刺耳的話，但那是為了贏得國內對他的支持，5 月 8 日赫魯曉夫主動對西方的建議回復的態度是積極的。[64] 兩國對禁止核試驗問題的信件不斷往來極大地鼓舞了甘迺迪。6 月 10 日他在美利堅大學發表了一篇重要的「和平演說」，說新的一輪禁止核試驗高層對話不久將在莫斯科舉行。赫魯曉夫形容它是「自羅斯福以來歷屆總統所發表講話中最精彩的一次」；一位美國歷史學家認為這是甘迺迪總統一生最輝煌的一頁。[65] 7 月 15 日，與蘇聯人長期打交道的外交家哈里曼和英國內閣大臣黑爾什姆抵達莫斯科進行禁止核試驗條約談判，在這種突然到來的美好氣氛中，蘇共發表攻擊中國的公開信這一狂熱舉動決非巧合。[66] 在 7 月 20 日，蘇共代表團和中共代表團達成了一項協議：會談無限期休會。當天中共代表團離開莫斯科回國，於 21 日到達北京。這次毛和其他的主要領導到機場迎接代表團的歸來，表現了中共領導層團結一致反對蘇聯修

正主義者。代表團從機場立刻前往中南海向毛澤東和周恩來作了詳細彙報（但顯然沒有劉少奇）。[67]

7 月 25 日，葛羅米柯、哈里曼和黑爾什姆就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在莫斯科進行磋商。[68] 不久後，哈里曼私下向赫魯曉夫提出中國核武器問題，然而蘇聯領導人不願提供幫助，尤其是在法國不同意參加這個條約的情況下。[69] 然而，中國顯然知道這個條約是要將他們排除在核俱樂部之外。[70] 這是最後一根稻草。從此後，他們將竭盡全力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及其前線組織中公開反對蘇聯，開動所有宣傳工具公開譴責赫魯曉夫和他的盟友。中蘇同盟破裂了。[71]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鬥爭

中蘇論戰的主角們現在尋求把支持者和中立者聚集到自己這一邊。長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習慣處於領導地位的蘇共，有著天然的優勢。在歐洲，除了 1964 年 1 月周恩來曾為鼓舞士氣而訪問過的阿爾巴尼亞以外，[72] 只有比利時共產黨領導層分裂出一個親中國的派系。但是，這種論戰的存在就意味著，各國共產黨，特別是東歐集團以外的黨以及那些雖正式表示支持蘇共，但又不像蘇共那樣堅決肯定地宣佈中國出局的黨。甚至在東歐集團內部，也有了更多的選擇權，至少羅馬尼亞就在開始利用這個機會。[73]

在亞洲，蘇共可以信賴蒙古和印度共產黨，但北朝鮮、北越、印度尼西亞以及日本共產黨，由於他們自己的情況，在對美國的集團政策上，更願意站在中共的立場上。在第三世界，特別是集中在亞洲和非洲的國際統一戰線組織中，中共比蘇共有明顯的優勢。但二者之間為擴大影響而多次進行的激烈論戰已經使那些非共產黨組織感到越來越厭煩，不願成為中蘇爭論中的小卒子。卡斯特羅試圖保持中立，但古巴在經濟上依靠蘇聯，使他越來越難以保持他的立場。

國際共運的關鍵變成了是否應該舉行一次新的國際共產主義會議。照蘇聯的看法，這次會議的最終目的應該是正式譴責中共的異端

學說，並將它逐出共產主義運動之外。中國領導人也曾經把這次會議看成是在論戰公開以前，在共產主義運動中散佈他們觀點的一個時機。現在則反對這種意見，他們認識到蘇聯必定能夠承購地使他們處於困境，因為所有人都明白，中國將會得到極其微弱的支持。但在論戰公開以後，他們甚至得到一些親蘇黨派的幫助，這些黨派運用新發現的影響力拖延達成協議，因為這協議將會結束一個單一世界運動的時代。[74]

中蘇論戰並不限於共產主義運動及其統一陣線，因為雙方都試圖在同情他們的第三世界國家中得到更廣泛的支持。中國最主要的努力是派周總理和陳毅外長以及隨行的幾十名助手去訪問非洲 10 國。[75] 這次訪問從 1963 年 12 月中旬到 1964 年 2 月上旬一直延續了 7 個星期。一方面，周恩來以他的個人魅力給東道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些東道主還從來沒有款待過如此卓越的訪問者。而另一方面，他顯然沒能說服他們在禁止核武器試驗條約以及中印邊境爭端上站在中國的立場上。中國總理尋求在既反對西方又反對蘇聯問題上獲得盟友。但是，雖然攻擊帝國主義在一些人士中得到廣泛的接受，但那些嚴重依賴西方和蘇聯幫助的國家又幾乎不可能接受增進自力更生的說教。而他在訪問結束時所明確提出的非洲是革命風暴的中心，「革命的時機已經成熟」的觀點，可能被那些自認為已經很革命了的心神不安的統治者們視為是一種威脅了。[76]

中蘇宣傳戰

就在周恩來多少還在謹慎措辭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的喉舌們已經耐不住性子了。早在 1960 年，中共中央已經在釣魚台國賓館組織了一個五人小組用來專門為當年發表反蘇論戰工作。他們是：組長康生、新華社和《人民日報》主編吳冷西（應為總編輯——譯注）、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的王力、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姚溱、黨的主要理論雜誌——《紅旗》雜誌副總編輯範若愚。[77] 有了這個先期基礎，中國共

產黨在 1963 年中國新年後就已經準備好新一輪的反蘇宣傳戰。[78]總共大約 120 位來自全國各地的最好的思想理論家雲集北京，他們被安排在北京西郊另一處建於 50 年代的高級賓館十八棟樓。[79]他們被給予特殊的待遇。特別重要的是，在那物資匱缺的日子裏，他們可以得到很好的伙食，有些人還被允許攜帶家眷。一個冬日的晚上，和這項任務有關的大約 400 到 500 人聚集到他們的負責人康生在釣魚台的住處舉行了一次招待會。甚至他們的日常體力勞動也是一種特權，因為他們的雜務勞動僅僅是清掃一下「六所」的地面衛生，六所是附近為政治局常委準備的六棟建築。[80]

他們組成了 8 個組，每個組受不同單位的領導。《人民日報》負責一個組，《紅旗》雜誌負責另一個組，等等。負責單位負責挑選組員。他們並不一定僅從本單位的幹部中選，《人民日報》組從解放軍中、某個省黨校中以及另一個省的宣傳部中選調人員，當然也從本報社中選。這 8 個組的領導人又組成一個領導委員會，直接向康生負責，後者已經代替王稼祥成為現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81]

每個小組被指定準備論戰中的一個專題：「蘇共和我們黨領導分歧的起源和發展」;「論斯大林問題」;「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新殖民主義的維護者」;「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這個專題是指派給《人民日報》小組的);「和平共處——兩種截然相反的政策」;「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和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不久，第九個，也是最重要的一個論題也加上了，「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以及它給世界的歷史教訓」。(以上均為譯名)就在同時，第十個專題也已經擬好了。[82]

為了準備論題，每個小組又分為若干小隊，四個小隊負責為小組的論題編輯有關參考資料——從毛澤東、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著作，帝國主義者以及新老修正主義者那裏收集，總共超過 36 本書準備出來供引用。從這四個小隊中抽調出人來然後組合成第五個小隊，專門負責審查這些引證。最後，所有的加在一起，大約搞出 40 本。那些來自新

老修正主義者，如考茨基、伯恩斯坦、葛蘭西、托洛茨基、布哈林以及當代的蘇聯、東歐和南斯拉夫的理論家們的引言則在內部發行。這就是所謂的「灰皮書」。

這些原始材料由小組中級別較高的幹部組成的寫作小隊編入被指定的論題中去。每一個論題都被送交組長康生、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鄧小平，最後是毛本人進行嚴格審查。九個論題從 1963 年 9 月 6 日到 1964 年 7 月 14 日陸續發表。這些組在 1964 年的秋天最終解散。[83]

整個行動是一種帶有正統虔誠意味的大量繁瑣的勞動。而蘇聯人永遠也不會有這種人力、天才或者意願來做這工作。這九個論題加上 1963 年 3 月 30 日蘇共的信，中共中央 6 月 14 日的回信（建議書），蘇共 7 月 14 日的公開信，以及中共對 1964 年 10 月赫魯曉夫倒臺的評論，都收集在《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這一英文著作的全部 585 頁之中。

甚至在當時，這場爭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個毫無結果的事情。這一場共產主義運動內部意識形態「大躍進」的爭論從一開始就註定要失敗。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家們很少有人，（更不要說毛澤東本人）會相信這種巧手安排、從經典中精心挑選的引證能說服論戰對手改變他們的政策。在核時代，國家的生存問題遠比這個重要得多。但是，毛澤東卻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大旗，想以北京代替莫斯科成為地球上不幸人們的新的羅馬（革命聖地），並且使他本人成為從馬克思到斯大林之後最新的教廷繼承人。他希望能夠在他身邊集合起共產主義者和某些第三世界民族主義者，然後是拋棄其修正主義領導者之後的蘇聯人和東歐人。他沒有意識到的是，在這條道路上經歷了四分之一世紀以後，已經十分厭煩的蘇聯集團的人民寧願徹底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他也沒有意識到，他於 1960 年終止的修正主義政策，到那時中國卻以更為激進的姿態重新撿了起來。

儘管這九評中的許多材料多少有些陳腐，但是，在這些文章中表現的中蘇分裂依然對最近的發展有很重要的影響。[84] 莫斯科和北京的分裂粉碎了殘酷的歷史潮流的神話，即全球統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運動必然走向勝利。自中國共產黨 1949 年奪取政權後，這是一次最重要的提示，即民族主義是一種比國際無產階級團結更為有力的力量。[85]

九評對於瞭解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也具有重要意義，自 1956 年蘇共二十大的召開使中國對蘇聯老大哥的幻想破滅之後，到此時達到徹底。[86] 中國共產黨現在實際上與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所有主要政黨隔絕了，並且只能從共產黨集團外的毛派小集團的形成得到無關痛癢的安慰。[87] 這個結果使中國轉向自己。毛澤東在思考蘇聯為何會走入歧途時，決定將中國變成一個實驗室，保持革命活力，清除修正主義。他的這種觀念的要點萌芽於 1962 的夏天，最終在兩年後的九評中提出。[88]

第九篇評論

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和它給世界的歷史教訓」開頭很長，以傳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為社會主義社會和無產階級專政下了定義。該文確定了標準以後，接著說當代的蘇聯並不符合這些標準，文章提出了一連串在「蘇聯的全民企業裏的各種資產階級分子的活動」，是為了表明頭頭們和他們的「一幫人」如何濫用職權並聚斂財富。[89] 從蘇聯出版物上摘出的材料被用來證明蘇聯已是資產階級廣泛進攻無產階級的場所。如果國家的領導權仍掌握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手裏，也許這種情況還不會那麼令人震驚和擔憂。[90] 但是該文在下一段的論述中證明瞭事實遠非如此。「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被描繪為讚揚物質刺激，犧牲「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推進高薪以擴大收入差距，藉口攻擊個人崇拜來誹謗無產階級專政，以資本主義管理代替社會主義計劃。[91] 結論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是蘇聯資產階級，特別是其特權階層的政治代表」。它以一系列的清洗驅逐了真正的

共產黨人，控制了黨和政府。[92]雖然術語不盡相同，中國人的說法與南斯拉夫異端理論家米洛萬·德熱拉斯所闡述的非常相似，即譴責蘇聯的精英是一個「新階級」。[93]中國人的結論是，由於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由偉大的蘇聯人民用血汗創立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正面臨著空前嚴重的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94]（原按：著重點是我加的）赫魯曉夫的「共產主義」以美國為榜樣，並且迎合美國「和平演變」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政策。[95]

接著，文章提出應向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和共產黨敲響資本主義復辟危險性的警鐘，包括中國和中國共產黨在內，他們必須為阻止「和平演變」而鬥爭，演變意味著在他們自己社會中復辟資本主義。文章提出了十五條原則來指導如何開展這場鬥爭。[96]但是這些人們已十分熟悉而且十分傳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萬能藥方似乎並不夠用。現在有一項很重要的新的任務：培養革命接班人。[97]

> 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問題，從根本上說，就是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所開創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事業是不是後繼有人的問題，就是將來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能不能繼續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家手中的問題，就是我們的子孫後代能不能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道路繼續前進的問題，也就是我們能不能勝利地防止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的問題。總之，這是關係我們黨和國家命運的生死存亡的極其重大的問題。這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98]（原按：著重點是我加的）

這裏揭示出的是未來的黑暗前景，它最終使毛認為有發動一場文化大革命的必要。粗略地看一下這個階段就是對下一代進行毛澤東思想教育的方法。但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在群眾鬥爭中產生的。是在革命大風大浪的鍛煉中成長的。應當在長期的群眾鬥爭中，考察和識別幹部，挑選和培養接班人」。[99]（原按：著重點是我加的）毛澤東的同事中讀完這篇論文的人，也許只把它當作是康生為了

取悅毛澤東，說服同盟者和與修正主義者鬥爭的一種革命的高調。肯定不會有人把它看作是一場即將吞沒中國和他們自己的政治颱風的風暴警報。

赫魯曉夫的倒臺

中國共產黨的雄辯家們對赫魯曉夫進行了太多的譏諷，[100]因此毫不奇怪，當他於 1964 年 10 月中倒臺後，中國人就迅速作出努力以便與其繼承者達成和解，儘管他們也曾被指責為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的成員。[101]北京和莫斯科迅速互致相當熱情的電報。中國停止了論戰，並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和解的社論。這被霍查斥之為可恥的、不莊重的、虛假的和偽善的。[102]周恩來向所有共產黨國家的大使尋求意見，發現他們（除去阿爾巴尼亞）[103]都積極贊成一個暫定計劃，即於 11 月布爾什維克革命紀念日向莫斯科派出高級代表團以與蘇聯新領導人接觸。蘇聯人發出了正式邀請。中國決定不派任何在論戰中起重大作用的人物去，而派周恩來和賀龍元帥，由伍修權陪同，率領一個 50 ～ 60 人的龐大代表團以表示北京對這次使命的重視。中國代表團在莫斯科機場受到了新任蘇聯總理阿列克謝·柯西金的歡迎，他是赫魯曉夫後領導集團中僅次於新任蘇共第一書記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人物。[104]

除了推測莫斯科新領導人的意願，可能還爲了奠定較好關係的基礎，周恩來和他的同事們還有一個直接目標是取消國際共產主義會議。赫魯曉夫原來意圖在會中譴責中共並把它逐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會期原定在 1964 年底召開。蘇共新領導人把它延期到 1965 年 3 月。在 11 月 13 日兩黨正式會議中，周恩來提出應該取消或至少延期到雙方達成協議之後。他發現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事們毫不讓步。他們重申蘇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的政治路線，而對這一路線，中國的雄辯家們曾花費了那麼長時間對其進行公開抨擊。照情形看來，即使沒有赫魯曉夫，他的中國政策仍然會被堅持。[105]

對於中國代表團來說，真相甚至來得更早。11月7日在克里姆林宮的一次招待會上，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元帥對賀龍說「我們已經消除了赫魯曉夫，你們也應該以我們為榜樣，清除毛澤東。這樣，我們才能相處得更好些」。賀龍憤怒地給予反駁，然後去向周恩來彙報。周恩來立刻向勃列日涅夫提出抗議。這位蘇共第一書記試圖藉口馬林諾夫斯基喝醉了酒，說錯了話來息事寧人，但是周恩來以酒後吐真言為由拒絕接受。

中共代表團於11月14日回到北京。毛澤東和他所有的同事們又一次來到機場以向蘇聯人顯示中國領導人是團結在一起反對他們的。[106]霍查尖酸地說：「中國總理以拿破侖的方式到莫斯科，又以拿破侖的方式返回。他遭受了可恥的失敗。」[107]但這位阿爾巴尼亞的領導人因為11月21日《紅旗》雜誌發表了一篇社論，題目是《赫魯曉夫為什麼跨台》而有些高興了。社論斷言，毫無疑問，後者的修正主義路線已是名聲掃地，他的支持者不會甘於失敗，而是想要「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義」。但是，這是一條死胡同。[108]儘管赫魯曉夫的繼任者很明顯是他的路線的支持者，該雜誌顯然沒有對勃列日涅夫或任何其他蘇聯領導人進行他們曾經對赫魯曉夫進行的針對個人的辱罵。也許毛澤東不想排除莫斯科的領導人最終改變態度的可能。如果他是這樣想的，那他會感到失望的。

中國我行我素

儘管中國在莫斯科遭到挫折，但它手中仍有一些牌。在赫魯曉夫倒臺同日進行的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象徵著他們在世界舞臺上願意也有能力單獨幹。[109]早在3年以前，在蘇聯專家撤回以及國家正處於大躍進後的饑荒之中時，曾有過一番有關中國繼續搞原子彈是否是明智的熱烈爭論。但是，毛澤東很早就將核武器視為中國自立於國際事務當中的關鍵。[110]在1961年的爭論當中，這個觀點得到了副總理、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主席聶榮臻元帥的支持。在一份被中共領導

人接受的報告裏，他宣稱，即使是單獨幹，中國也照樣可以順利完成核子和導彈計劃。[111]

中國在核武器方面的成就，是60年代早期在林彪主持下制定的武裝部隊現代化和戰略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解放軍在西藏邊界擊敗印度軍隊之後二年，中國在核武器方面的突破，增強了一個日益強大的軍事強國形象。即令他現在同時與兩個超級大國相抗衡，也決心不再受人威脅。

中國的外交資源並沒有完全被剝奪，儘管它被逐出蘇聯集團。由莫斯科召集的譴責中國的國際會議遭到慘敗。[112]在集團以外，隨著戴高樂總統不顧美國盟友，在1964年1月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又取得了一個重大勝利。法國和中國都在他們各自集團內反對絕對領導權，他們都不準備在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上簽字。他們雙方都相信，擁有核能力是在國際事務中作為一個獨立角色的必要支撐力量。中蘇的分裂證實了戴高樂所相信的關於國家利益高於意識形態的信念，這使他感到高興。[113]

在亞洲，蘇加諾總統是一個堅定的朋友。他的代表在亞非人民團結組織和類似的「進步」國際團體中都值得信賴，支援北京的政策，包括反對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1963年4月劉少奇對雅加達成功訪問以後，中國參與贊助和組織新興力量運動會。該運動會於1963年11月在雅加達舉辦，用以對抗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作為對中國支持他粉碎馬來西亞願望的回報，蘇加諾逐漸追隨北京路線，與中國領導人定期交往。而當1965年1月印尼從聯合國及它的各種機構中退出以抗議馬來西亞被選入安全理事會時，中國人支持蘇加諾組織一個新興力量會議的建議與聯合國抗衡。5月，彭真在雅加達發表了一篇措辭強硬的反帝國主義的講演。即使蘇加諾也對中蘇分裂感到沮喪，並且給毛澤東一封信中表示了他的擔憂，但他仍然在印度尼西亞強大的共產黨人艾地的支持下堅定了親中國立場。[114]

中國與亞洲執政的共產黨領導人的關係卻要曖昧一些，北朝鮮從 1962 年以來一直在國際以及集團內部與中國站在一起。可赫魯曉夫倒臺後卻馬上停止了反莫斯科的言論，爲了回報赫魯曉夫繼任者在經濟和軍事上的支持，金日成現在又重新強調共產主義世界團結的必要性。這樣，他在意識形態上向北京傾斜，而在「組織上中立」，就意味著蘇聯贏得支持，而招致中國的怨恨。[115] 對於越南，由於河內征服南越的鬥爭日益嚴重和這一鬥爭的國際意義，中越關係變得更加複雜。

越南戰爭

在與法國、印度尼西亞、北朝鮮的交往中，中國主要是以聲望來衡量其得失的。中國與北越的關係則涉及國家安全這一更為嚴肅的主題。而這些也將影響毛對國內經濟，也許還有政治政策作出的決定。甘迺迪政府第一次公開作出重大決定，幫助南越逃過直接來自河內的遊擊隊叛亂。[116] 這使北京惱火。甘迺迪在他上任的第一年，派遣了一系列使節到西貢並向他的高級顧問們徵求意見以便決定他的政策。在 11 月 13 日制定、12 月中旬公佈的決定當中，總統著手派遣幾千人的地面部隊和戰鬥機、直升機從而大大超出了美國對吳庭艷政府的承諾，儘管吳的穩固性值得擔憂。1961 年 1 月甘迺迪就任美國總統時，美國在越南有 700 名軍事顧問，這個數字一年後增加到 3200 人。[117] 1962 年 2 月軍事援助顧問團變成「全面的野戰軍事司令部」，叫作駐越軍事援助司令部，並派遣一名四星將軍代替三星將軍負責。[118]

這個新的軍事機構的創建引起了北京的特別關注，因此中國和北越政府於 1962 年夏天在中國首都召開了會議，討論美國加強力量，準備打擊北越的可能性。結果北京馬上決定向河內提供免費的足夠裝備 230 個步兵營的武器。[119]

美國在甘迺迪執政年代對越南承擔的責任，日益增加。1963 年 11 月 22 日總統被刺前幾個星期，美國在南越的軍事人員已達 16,732 人。[120] 中國人繼續與北越協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率領一個

軍事代表團於 1963 年 3 月到達河內，又一次討論美國進攻北越的可能性。隨後，劉少奇在 5 月對北越進行了國事訪問 。[121] 毫無疑問，中國人的幫助和關心，加上河內對赫魯曉夫的行為的憤怒（後者力圖在一個美國總統那裏尋求和平共處，而這個總統正忙於裝備他們在西貢的敵人），使北越人從 1963 年開始，改變了他們在中蘇論戰中希望保持的中立地位，轉而與北京站在一起，儘管他們從未與莫斯科斷絕過聯繫。[122]

在甘迺迪的領導下，美國愈來愈捲入了後來被稱為越南泥淖之中無法自拔。但他從來沒有無條件承諾把南越從共產主義手中解救出來。[123] 他也避免派一個裝備精良的美國遠征軍到亞洲大陸去作戰。[124] 在他的繼任者，林登· 約翰遜的領導下，這些猶豫不決最後被掃除。[125] 他堅決認為越南戰爭與朝鮮戰爭和慕尼克事件有相似之處，新總統和他從前任繼承來的高級顧問們把越南戰爭看成是一場西方必須取勝的戰爭，[126] 否則東南亞「多米諾」將倒向共產主義，從而帶來災難性的地緣政治的後果。[127]

兩項主要發展標誌著美國加大了承諾。1964 年 8 月初，北越魚雷艇在東京灣國際水域蓄意攻擊美國海軍船隻，約翰遜總統下令迅速空襲北越以示報復。東京灣發生的事情後來成為爭論的主題，但該事件卻促使總統勸說國會通過了一項決議，授予他實際的全權，以他認為適當的方式包括訴諸戰爭，來保衛南越。[128] 確實，報復的實施「未引起任何國內的批評，實際上公眾對行政當局的支持還日益增加」。一種心理門檻已經越過，轟炸北越已合法化了。[129] 在共產黨攻擊博來古（Pleiku）兵營後，1965 年 2 月，一項對北越實施有限的空襲，在南越實施無限制的空中行動的計劃獲得批准。[130] 同月，約翰遜總統採取了第二個美國加大捲入的行動，批准在峴港部署兩個海軍陸戰隊營。到 5 月，他已批准增加美國部隊達 82,000 人，包括 13 個戰鬥營。7 月，他下令增兵到 125,000 人。[131] 美國的擴大捲入對中國和北越之間的關係有相當大影響。

中國和越南

甚至在約翰遜越過這個「界限」以前，中國人已經注視美國在南越的集結，這是早先甘迺迪的決定，令中國人的關注與日俱增。在1964年5-6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提議應立足於戰爭，把全國劃分為三線，[132]並於8月決定著手實施。[133]一線包括易受攻擊的沿海各省份，二線是那些在全面戰爭中也易受攻擊的內陸的一些省份。[134]三線是該國的深遠內部，包括四川、貴州、雲南等西南省份和甘肅、寧夏、青海等西北省份，以及陝西、河南、湖北、湖南等省的部分地區，粗略地講，就是長城以南和北京廣州連線以西這一地區，當然其精確定義是有所變化的。[135]

從1965年到1971年，第三線或叫中國的無油開發計劃(non-oil development)[136]耗費了基本建設資金的百分之五十，超過800億元。[137]為監督這一行動，毛澤東建立了「國家經濟高級指揮部」由辦事得力的石油部長余秋里主持，直接對毛和劉少奇負責，而把國家計劃委員會擱到一邊，毛對該委員會很不滿意。[138]正如中國有關方面承認的，這個新經濟計劃把毛在1956年4月發表的《論十大關係》講話中明確表明的重視沿海政策顛倒了，恢復了先前部分依據於國防考慮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戰略。[139]它還導致對大躍進以後所採取的發展優先次序作了重新的安排，把「農、輕、重」的次序改為「重、輕、農」。[140]三線應建成一個戰爭的工業基地，這是蔣介石抗日戰略的翻版。但與蔣不同的是，蔣當時面對的是日本已佔領了沿海和中國中部的大部地區，因而只能採取這種政策而別無選擇。而毛僅僅是估計有可能入侵，便明顯慌亂，從而把經濟投入此後7年的代價高昂的混亂之中。

由於日本入侵來自東北和東部，蔣介石被迫躲在西南。[141]毛澤東則明知如果美國從其南越基地發動攻擊，該地區絕對是危險地帶，仍把資金的最大部分投向西南。[142]這顯示毛懼怕的是如果戰爭擴大，對中國的危險仍然來自東部沿海：美國的戰略是「放出」南越，越過17度線進入北越——1963年11月吳庭艷被刺殺後接掌南越政權的阮文

紹將軍，於 1964 年初敦促美國盟國允許他做的正是這件事[143]——而蔣介石則會從東南入侵中國大陸。[144]這就毫不奇怪毛澤東於 1964 年 6 月對北越總參謀長范田頓 (Tien Dung) 將軍說的「我們兩黨必須合作共同對付敵人。你們的事就是我們的事，我們的事也就是你們的事，這就是說我們兩國應無條件地聯合反對敵人」。[145]

三線計劃對技術治國論者無異是一個惡夢。毛的大躍進將全國帶入黑暗地道中，到 1964 年中期，他們已開始見到地道盡頭的亮光，現在這位主席又提出經濟必須進入新的轉向。[146]但是東京灣事件似乎顯示，主席正確預計到美國將加大捲入越南，這對中國的影響深遠。中國人公開動員了 2,000 萬人在全國舉行抗議集會；私底下，來訪的越南共產黨第一書記黎筍告訴毛「我們的人民和我們的軍隊的士氣是如此的高漲，他們勇敢戰鬥，因為他們始終認識到他們背後有中國的支持」。[147] 1964 年秋，外交部長陳毅向外國專家們保證，中國已做好準備，迎戰美國從南部，蘇聯從北部和日本從東部發動的進攻，他以典型的修辭學上的誇張語氣說：「讓他們都來吧，如果必要，我們將放棄一些城市，退到山裏去，戰鬥一百年。」[148]

1965 年 2 月，美國開始空襲北越，3 月美海軍陸戰隊進入南越。毛的先見已被證實，北京的關注也日益增強，[149]周恩來和陳毅在會見外國記者時，對美國的行動表示憤怒，[150]雖然毛此前曾表示過他相信國務卿臘斯克所說的美國無意入侵北越的話，毛甚至暗示美國將可能在幾年內撤出南越。[151]政府在一項聲明中警告華盛頓，中國正做好準備並無所畏懼。這是說給公眾聽的。毛及其高級同僚出席了 2 月 10 日在北京組織的 150 萬人的反美集會。而私底下，4 月 12 日中共發佈了一個備戰的指令，推斷美國將可能攻擊中國的軍事設施、工業中心、交通線路以及大城市，甚至可能入侵。可能是為了防止恐慌，中國只動員前沿地區的人民進入備戰。[152]

還在早春，北越領袖胡志明就曾秘密赴長沙與毛會談，顯然不過是為了尋求對在河內以北建造道路的援助。[153]在美國擴大捲入後，北

越於1965年4月派出第二個秘密代表團，由黎筍和國防部長武元甲率領趕赴北京。8日，在與劉少奇會晤中，黎筍要求中國擴大援助。包括志願的飛行員和戰士，以及人民解放軍支援部隊。[154] 他告訴劉，他和他的同事們認為只有中國而不是蘇聯，才能在此危機時刻提供所需的緊急援助。[155]

雖然有了這種甜言蜜語，對北越來說，美國的升級已經改變了軍事平衡的性質。過去，中國提供的援助對於河內在南方進行的戰爭方式非常合適。但是，面對著用最新式武器裝備起來的美國軍隊，北越所需的同樣先進裝備卻只有莫斯科才能提供。赫魯曉夫（他曾有效地擺脫開聯合越南的共產黨鬥爭）下臺後，蘇聯人再次表示願意援助河內。1965年2月，柯西金總理訪問河內，結果北越取得蘇聯給予的軍事援助，這推動越南人在中蘇爭論中採取中立的傾向。[156]

中國人處於兩難的境地。不答應北越人的要求就會喪失對越南的影響。另一方面，越南戰爭性質的改變不可避免地造成蘇聯影響的加強。此外，北越人決心以美國人的方式與美國人戰鬥，而不是僅僅繼續追求拖延的遊擊戰術，將會增大戰爭升級甚至波及到中國的危險。面對著十分有限的選擇，並也許出於希望在可能的越南重新統一後保持對河內的影響，中國人在一項並不美妙的事業中竭盡了全力。[157]

在與黎筍會談中，劉少奇接到了毛「無條件地滿足越方要求」的指示。因此，他告訴北越黨的領導人，他們要求的只要中國有都將得到滿足。如果河內不發出邀請，中國人不會去。如果他們被邀請，中國人將按北越人的需要去任何地方。在這些交談後，劉和黎筍分別命令他們的軍事助手草擬出具體協議以供簽署。[158] 4月10日，應北越人的要求，一批中國軍官和鐵路官員起程赴越南，以考察在鐵路建造和防空方面中國如何進行援助。[159] 在4月12至21日間，中國共產黨和人大常委會正式支持援助北越的政策。[160] 在此情況下，武元甲將軍就能夠與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21日）和副總參謀長楊成武（22日）討論實質性的問題。[161] 5月25日，周恩來、羅瑞卿和楊成

武在與越南代表團會談有關公路、鐵路和其他交通方式方面問題時，實現了毛對胡的承諾。[162] 一個維修公路的協議於 5 月 30 日簽署。[163]

在羅瑞卿的建議下，周還建立了兩個組織去監督援助。楊成武和另一位副總參謀長李天祐擔任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援越小組的組長。[164] 他們兩人還被指定參與一個更高級的小組，該組的任務是代表中共監督援助小組的各項活動。該小組另外五名成員有李先念、薄一波、羅瑞卿、劉曉（前駐蘇大使）以及李強（專門負責共產黨集團內貿易的對外貿易部副部長）。[165]

根據中國—北越協議，人民解放軍地空導彈部隊和防空部隊以及工程和鐵路建築營、後勤部隊、掃雷部隊，自 1965 年 6 月 9 日開始在北越部署。[166] 美國人當然知道人民解放軍部隊已到北越和他們的活動性質，但顯然並不清楚中國承擔責任的規模。在最高峰期，有 17 萬中國軍隊為河內擔任不同職責。從 1965 年 6 月到 1968 年 3 月將近 3 年期間，總共有 32 萬中國人在各種不同時間被派往參與越南戰爭。此外還有 6,000 名政治和技術人員在越南部隊中協助從事訓練工作。此後，根據原協議，中國部隊逐步減少，截止 1971 年全部地面部隊完全撤出。掃雷部隊一直呆到 1973 年 8 月。[167]

根據可能低估的官方數字，人民解放軍傷亡 5,270 人，其中陣亡 1,070 人。高炮連，這些直接與美國部隊作戰的部隊，自 1965 年 8 月到 1969 年 3 月 14 日最後一個連撤出，據說參加了 558 次戰鬥，用過時的裝備，擊落飛機 597 架，擊傷 479 架，自己犧牲 280 人，傷 1,166 人。中國供應北越 170 餘架飛機，140 艘艦船，500 輛坦克，16,000 輛汽車，37,000 門大炮，2,160,000 枝步槍和機槍，以及 12.8 億發彈藥。中國援越的總值達 200 億美元。[168]

北京給華盛頓的資訊

雖然中國明顯看重與北越的「唇齒」關係，[169] 中國同時也向華盛頓傳遞資訊，表達它避免在南部邊界以外成為完全參戰者的願望。

在1965年3月9日至4月2日間某一時刻，可能是3月9日到23日之間，中國同意建立一套原則，作為她對越政策的依據。[170] 4月2日，即劉少奇與黎筍開始討論中國能向北越提供什麼軍事援助前一個星期，周恩來趁在卡拉奇停留期間，私下請求巴基斯坦總統阿尤布·汗（周恩來一直鼓勵他扮演北京與華盛頓之間的橋樑角色）[171] 在他本月晚些時候訪問華盛頓時，向約翰遜總統轉交四點意見：[172]

1. 中國不會主動挑起中美戰爭；
2. 但是中國表明她說過的話是算數的；它將援助任何遭受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攻擊的國家，如果由此引起美國攻擊中國，中國將戰鬥到底；
3. 中國已準備好：如果美國進攻中國，它將難以脫身；
4. 一旦戰端開始，那將沒有邊界（可能的一種威脅是中國軍隊將大舉擁進南越，如同它進入南朝鮮那樣）。[173]

巴基斯坦總統是傳遞此類資訊的明顯的候選人，巴基斯坦此前很久就是美國的盟國，現在又是中國的朋友。對中國人來說，不幸的是，約翰遜總統以一則空前簡短的聲明突然推遲阿尤布的訪問。訪問原定於4月25日，但美總統新聞發言人於4月16日宣佈訪問延期。[174] 有諷刺意味的是美國的行動明顯的是由於日益緊密的巴基斯坦和中國關係導致的，特別是阿尤布總統在3月2日到9日訪問北京期間發表有關越南的演講。[175] 儘管如此，周恩來的資訊似乎還是轉遞過去了，雖然明顯地不是經過巴基斯坦人之手。[176]

為使這資訊傳到美國，人民解放軍加強了華南的空中力量，修建了專供北越飛機使用的機場，並與北越飛機舉行聯合演習，他們知道美國人會立即知道這些作法。中國人肯定希望他們將以此制止美國飛機「窮追」入他們的領空。——人民解放軍於1965年9月擊落美機9架或9架以上飛機中的第一架。[177] ——中國希望能保持一個安全的領空，如同朝鮮戰爭時的那樣。[178] 一個中國權威評論員公開為中國援助北越辯護，認為這是對美國援助南越的正當的回應。但是《人民日報》

卻強調了經巴基斯坦總統傳遞的私下資訊的精神「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179]總之，中國將向盟國派遣支援部隊，但不會像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那樣與北越軍並肩進行大規模戰鬥。可能這就是為什麼雖然毛完全同意了北越的所有要求，但是中國從未派出志願飛行員或步兵部隊。北京信守了她的四點意見的文字，雖然沒有實踐它的精神。[180]

國際環境和文化大革命

中蘇分裂使毛澤東越來越確信他的信念，紅軍可以贏得革命，但共產黨可以喪失革命。如果沒有莫斯科和北京之間逐漸出現的緊張、然後是危機、撕毀協議和最後公開破裂，很有可能（不說難以想像），毛不會提出作為文化革命基礎的理論。確實，中國在共產集團中的日益孤立在心理上造成他想把他的國家作為一個大規模的革命實驗室。人們可以假設，毛認為把其國內事務放大到更大範圍的國際共產主義中來考慮，就能增強他作為全面政策制定者的地位（而通常他只控制對外政策）。這不是偶然的。中國忍氣吞聲地退到「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的孤立政策中去，專心更新經濟，就會使得毛澤東的駕馭計劃者和務實主義者的能量受到削弱。

與莫斯科合作援助北越的願望沒有恢復親密關係（雖然 1965 年 2 月在柯西金訪問北京期間做了某些事）。[181]另一方面，雖然美國在越南的行動證明毛關於帝國主義的認識是正確的，而蘇聯是錯誤的，但中國南部前沿爆發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使得他猶豫。難道他能夠將其國家拋入政治和社會騷亂中，其結果是更易於受到美國的進攻和國民黨的反攻？難道華盛頓政策制定者不認為這正是把中國核發展扼殺在萌芽狀態的好機會？[182]或者，反觀這個問題，保證中美之間不會再有朝鮮式衝突發生，從而使毛能在國內有活動餘地，為發動文化大革命作必要的部署，這對毛來說不是至關重要的嗎？看來似乎毛至少早在 1965 年 1 月就決定除掉劉少奇或者發動文化大革命了。[183]4 月周致

電約翰遜四點的意圖可能就是想使毛擺脫重大對外戰爭的風險，不致迫使他中斷（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計劃。雖然中國人似乎沒有從約翰遜本人那裏收到任何私下的再次保證，[184]但美國出席華沙談判的使節在 1965 年 2 月和 4 月舉行的會議上十分清楚地表明：美國無意入侵或轟炸中國，也不想摧毀北越政權。[185]北京理解美國的這一政策[186]。實際上，華盛頓無意中給毛髮動文化大革命開了綠燈。

再一個問題是越南戰爭是否對中國領導集團起了分裂作用。中國遠離了她從前的蘇聯盟友，於是失去了象徵性的核保護屏障。同時，中國又遇到另一個超級大國不斷威脅其南部邊境。在所有政治體系中，危機都會使意見分裂。如果說 1963-1965 年的國際危機沒有使北京產生意見分歧，那中國的政治體系就是非同一般了。特別是 1962 年上半年，幾乎所有上層領導人都聽取了王稼祥的勸說，即在外交事務中執行比較溫和的政策在當時困難情況下對國家更為有利。

但是，自從王提出他的建議以來，到 60 年代中期，形勢有了相當的演變。那些明智的人，即使沒有毛對他們怒目而視，也已逐步改變他們的想法。除去主席恢復控制外交事務外，其他方面也不一樣了。尤為重要的是，中國不再為其經濟衰退而痛苦。國家領導人們也沒有那麼多理由感到危機重重。無疑，赫魯曉夫還在挑釁，他聯合其東歐的隨從反對中國，他力圖以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把中國凍結在核俱樂部之外。因此，王稼祥要與蘇聯改善關係的倡議，在赫魯曉夫垮臺以前，可能在中國領導層內不再站得住了；此後，勃列日涅夫及其同事們明確指出，北京不可能指望莫斯科的新領導會改變路線。雖然劉少奇當時在中蘇爭論中的個人態度是不明確的，但兩個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即遭迫害的高級人物鄧小平和彭真，作為毛反蘇的利斧，在這個問題上缺乏熱情，也無可厚非。

就美國來說，1962 年中期，美國人願意遏制蔣介石，隨後卻在中印邊界戰爭中完全支持印度。中國人對蘇聯人在 1959 年早期的中印危機中保持中立態度表現出憤怒，這就表明，協力廠商對此事件的態

度，某種程度上對北京來說就是一塊試金石。同莫斯科一樣美國沒有通過考驗。

但是，關鍵的問題當然是，美國在越戰中日益加深的介入。越戰有可能把中國也捲進去，那麼將奉行什麼樣的路線才算正確，中國領導人是否有分歧？是否某些領導人會以為為了北越的勝利和中國國家的安全，擱置中蘇爭論更為安全些呢？或者希望更多地支持北越，甚至可能派出朝鮮戰爭式的「志願軍」？或者少出些力以避免美國的進攻？這些都有可能，但沒有跡象表明毛對對外政策的控制遭到挑戰。而且即使這類分歧確實存在，也沒有跡象表明參與過這場辯論的任何人，其對越政策的觀點在其以後被清洗中起了重要的或者是任何確實的作用。【187】

在有進一步證據之前，人們一定會得出結論，60 年代中期的國際環境對中國來說是使得毛堅定了其對世界的觀點，這似乎促使他要求在國內進行一場徹底的大手術。他與他的同僚們的分歧不在於世界的性質，而是關於這個手術的方式問題。這個分歧集中表現在 1964 年末，在毛和劉少奇之間關於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正確方法的爭論上。

第四編

延安圓桌會議的終結

第十七章 女戰士

1963 年年中以後，中蘇爭論從猛烈攻擊代理人或由代理人進行攻擊轉為北京與莫斯科之間無節制的、公開的爭吵，這不可避免地加劇了中國制定國內政策時的左傾氣候。1963 年 9 月 6 日發表了中共對蘇共的九評中的第一篇評論，這恰是中共討論制定後十條的工作會議開幕時。雖然這文件的最後一稿企圖對社教運動的行為制定某些標準，但該運動仍是階級鬥爭的運動。此外，在後十條經過多次修改後在 11 月後終於通過時，毛與劉都在向左轉，認為中共所面臨的任務艱巨。對劉來說不幸的是，他一年後發現主席的左與他的左有差異。

毛對上層建築的看法

毛像往常一樣，每當決定進行階級鬥爭時，就以惡意的眼光看待知識分子。毛就好像斯大林和希特勒一樣，「看不起知識份子，但同時又急於建立他的知識份子權威」[1] 另外，自從他看到裴多菲俱樂部在 1956 年匈牙利叛亂中所起的潛在作用後，毛對知識分子在政治危機情況下動員群眾時可能起的關鍵作用始終縈懷在心。[2] 這樣，當吹起向修正主義作鬥爭的號角時，主席要求保證使知識分子站在他這一邊。[3] 他開始對知識分子當前的走向表示不滿。在十中全會上，他急切地採用了康生的標籤，「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1962 年 12 月 21 日，毛對他在華東區領導層的左傾追隨者說好戲少，壞戲也少，許多是中間的，包括許多帝王將相的戲。有的戲裏有點西風壓倒東風。演舊劇的劇團太多，包括北京的京劇團在內。[4]

華東地區和上海第一書記柯慶施對毛主席的話是聽到風就是雨。1963 年 1 月，在上海文藝工作者座談會上，他提出「寫 13 年」，[5] 也就是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來。上海的高級宣傳工作者，如張春橋和

姚文元就開始宣傳這口號了。他們說，文學和藝術的對象決定其性質，因此中國要有社會主義文化就必須寫當代的題材。[6] 這不僅意味著否定古典文學，也意味著否定 20 年代到 40 年代共產黨員和左傾知識分子寫的作品，他們中許多人都是當時文化機構的領袖。上海的左傾人物受到中央文藝官員們的反對，如周揚、林默涵和邵荃麟等，他們認為姚「過於簡單」和「粗暴」，[7] 並求助於周恩來的指示，既應「寫 13 年，也要寫 108 年」。[8] 但在中宣部 4 月召開的會議上，張不為這類反對意見所動，宣稱寫 13 年有十大好處。[9] 甚至周揚（在文化大革命以後承認）也只得順風倒了——當主席作出指示時，沒有人能無視這些指示——作了講話，強調需要在文化領域裏反對蘇聯式的修正主義。[10]

這場在北京與上海之間，在省級的左傾分子與中央黨的機關之間的爭論預示著二年半以後即文化大革命前夕會發生什麼事。在 1963 年，毛的妻子江青在幕後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在 1965 年就更是如此了。

等待時機

1938 年江青與毛在延安結婚，在這位未來主席的同事們中間引起了相當大的驚訝。他們喜歡他的前妻賀子珍，賀在長征路上伴隨過他，但由於他早期與前上海演員的關係疏遠了她。他們對這位新到的演員藍蘋（江青的另一名字）[11] 的「色彩豐富的過去」和混亂的性關係持批判態度，並懷疑她在上海時與國民黨有關係。中共中央機關注意到（毛與江的）這種關係，顯然是反對的，雖然在反對的程度和應怪誰的問題上意見不一。組織部調查了她過去的政治歷史，沒有發現任何問題。有些報道說，討論的結果是中共對江青作出三點口頭警告——不參與黨的政治工作；不在公共場合上露面，照顧好毛的生活——對這幾點，她最後都違反了。當然，始終有類似的謠言。[12] 不論對她下了什麼樣的禁令，在她結婚後的初期，江青表現得很活躍，

意志堅強和自信心強，但似乎對中共領袖妻子這一地位是相對滿意的。[13]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50年代，江青很少露面。她有多種病痛，有大病，有小病，有些則是想像出來的病。從1949年開始，她斷斷續續在蘇聯由蘇聯醫生照顧了幾段時間，有一次長達幾乎一年。回國後，她就開始住在與毛分開的院子裏，說因為他們的生活方式不一樣——口味、睡眠習慣和活動時間都不同。她幾次下農村，但她這期間最重要的政治活動是她最感興趣的領域，表演藝術。[14]

雖然在延安可能達成了對她活動的限制，在50年代初，江青短期任過一些職務。她厭惡壓力大的辦公室工作，因為這會加劇她的健康問題，她在中央辦公廳秘書這最主要的工作崗位上呆得時間不長。[15]更適合的職務是中宣部電影科科長和文藝處副處長，這些職務是周恩來為她取得的。雖然她從來不到辦公室去，[16]這一職務卻使她能合法地攻擊她認為是資本主義的電影。她發起反對從香港進口的影片《清宮秘史》，雖然該片未受批判，但她在幕後施加了影響，使該片不再上映。她對一部叫《武訓傳》的電影的攻擊則取得了較大的勝利。這部電影是周揚批准的。她設法勸毛在《人民日報》上寫了一篇社論批判該影片。[17]江青找到了用武之地，但這只是曇花一現，因為十年間，她健康不佳、缺乏機會和文化官員的不合作態度都使她基本上處於不活躍狀態。然而到60年代初，毛開始給江青文件，要她研究。[18]

在這期間，她恢復了與康生的友誼，其共同基礎是他們都喜歡傳統戲劇。[19]康從年青時就是戲迷，對戲劇有相當多的知識。在「三個困苦年月」裏，他放縱感情，積極幫助演出老戲，甚至色情的戲。他鼓勵老朋友戲劇家孟超改寫明朝的《李慧娘》，該劇的主角李慧娘是一鬼魂，在排演時，康極為關心。周恩來稱讚了該劇，在北京和全國向觀眾公演，大獲好評，[20]導致對鬼戲的一股熱潮。[21]毛自己命令特別在中南海演出《李慧娘》。[22]在1962年春，七千人大會後，康與江在杭州呆了2個月，要求當地劇團演出該劇。[23]

他們的這種隨心所欲隨著北戴河工作會議和十中全會結束了。康和江都抓住了毛重提階級鬥爭這個政治機會，而要抓住這機會就意味著放棄他們對戲劇的資產階級的、甚至「封建的」口味。康警告孟超，應寫其他劇本，要他的戲劇界同事們停演鬼戲。這是他對孟超的最後一次照顧。【24】十中全會後，康生忙於反習仲勳和九評，江青則回到她在 50 年代初短期擔任的協助管理舞臺的工作上去。

左傾分子在文藝方面的進攻

1963 年 3 月，文化部黨組提出報告，哀歎鬼戲盛行。鬼戲受到了批評界的支持，當代劇作家也都在寫鬼戲。該報告舉《李慧娘》為例。【25】1963 年 4 月，江青抓住了鬼戲，特別是《李慧娘》作為她的第一個目標，【26】《李慧娘》特別受到譴責，因為可以將之解釋為反對大躍進。【27】在柯慶施的合作下，她安排在 5 月 6 日《文彙報》上發表一篇批判文章，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她稱這是對鬼戲第一篇真正的攻擊。【28】

但是，像在「武訓傳」事件一樣，江青在她丈夫參加批判以前並沒有真正的影響。1963 年 5 月，毛說主要由廖沫沙提倡的「死人無害」論是城鄉階級鬥爭的反映。【29】1963 年 9 月，毛警告那些寫歷史劇的劇作家要推陳出新——人們熟悉的指示——不要再寫帝王將相和古代美女的劇了。【30】他 11 月份又回到這個問題上，批評《戲劇報》和文化部：報紙只宣傳鬼，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東西氾濫，都不管。文化部如不改正，就應改名為「帝王將相部」，或「才子佳人部」，或甚至叫「外國死人部」。【31】

在這隆隆的雷聲以後，就是一權威記錄所說的毛對文化領域裏正方興未艾的鬥爭作了第一次重要的幹預。這是由有關上海的一份報告引起的。該報告刊登在 1963 年 12 月 9 日中宣部的刊物《文藝情況彙報》裏。該報告名為《柯慶施同志抓緊民間藝術工作》。這極大勾起了毛的熱情，將該文選了一份給北京市黨的領導彭真與劉仁，可能意味著要

他們整頓一下自己的所屬。他附加的批示與原文一起作為毛主席 12 月 12 日對文藝的指示傳閱：[32]

> （本文可讀）多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至於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社會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築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這需要從調查研究著手，認真抓起來。
>
> 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33]

毛提出的這些不盡人意的情況，平地一聲驚雷，讓負有責任的宣傳人員忙了起來。1964 年 1 月 3 日，劉少奇主持了一個由中宣部 30 個人和文化領域領導人參加的座談會，會上周揚提出了毛的指示，再次肯定了過去的成功，但承認了現在的問題。彭真在講話中認為毛將指示送給北京黨委是因為北京的文化工作相當落後，他接受這個批評。[34] 像毛一樣，彭認為知識分子可以發揮重大的政治影響。他指出許多知識分子參加革命就是受到小說和其他文化作品的鼓舞，他舉毛所厭惡的裴多菲俱樂部在匈牙利叛亂中的作用為例子說明，如果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在文化領域中的傾向不予以制止的話可能會發生什麼事。[35]

顯然，這只不過是一個安撫的姿勢，用以化解主席的不滿而已。在文化領域裏，彭真是真正的左傾分子，他不認為應該給知識分子乙太多的自由。恰恰是這個觀點使他與毛在 1957 年有了衝突。那時，彭認為中共應從匈牙利叛亂中汲取的教訓是需要加緊對可能的持異見者的控制，而不是敞開讓人們進行批評，因此他對開門整風是不贊同的。[36] 彭真的例子，像陸定一的例子一樣，說明雖然文化革命者（對

他們）作了簡單化的批判，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並不一定意味著這些黨的領導人以前或一貫是右傾分子或反毛的。

由於 1964 年 2 月 3 日戲劇家協會為歡迎春節舉行的晚會有些「庸俗低級」的東西，[37] 黨的官員[38] 調查了過去幾年的工作，決定直到 3 月底在全國文聯和一些單位，如作家協會的幹部中發動一場整風運動。5 月 8 日，中宣部提出了一份這次整風運動進展情況的報告草稿。[39] 它認為在文藝界中有一些嚴重問題：

a. 沒有貫徹中共的文藝政策，在十中全會以前，各文化組織方向模糊，對階級鬥爭沒有認識；
b. 文藝批評軟弱無力；
c. 忽視了思想改造。[40]

在這份報告尚未定稿時，江青將副本送給毛，6 月 27 日，毛附了一段很嚴厲的批示：[41]

> 這些協會和它們所掌握的刊物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15 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42]

宣傳官員又忙碌起來，在 7 月 2 日又召集了另一次文化幹部的會議，進行第二次整風，在特別小組領導下，整風進行了 10 個月，直至 1965 年 4 月。[43]

京劇節（觀摩演出大會）

由於毛的批判表明對戲劇特別關心，這是最可能影響群眾的藝術形式，因此決定召開全國性會議討論這問題。柯慶施又起了帶頭作用。在 1963 年 12 月到 1964 年 1 月華東戲劇節期間，他表揚新型的革命戲劇是團結人民的思想武器。[44]

繼之，1964年6月5日到7月31日在首都舉行了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這是在周恩來和彭真（但沒有陳毅，看來他在傳統戲劇上的所做的努力是結束了）主持下的一件大事。當文化部長，1949年以前的一名大作家茅盾致開幕詞時，陸定一、康生、郭沫若及京劇界名人都在臺上就座；在他們前面是來自全國的5,000名藝術家和官員。演出期間，來自19個省28個劇團的2,000名演員演出了37個現代劇，毛觀看了其中一些。[45]

周和彭真都講了話，彭的講話，毛本人也難以超過；確實，毛事後說這講話「很好」：

> 我們的京劇藝術已經進入了新的階段。在我國，當前根本的矛盾是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也表現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修正主義的矛盾。因此，我們的京劇是為社會主義服務，還是為資本主義服務；是為工農兵服務，還是反對工農兵；是為總路線服務，還是反對總路線；是擁護黨的領導，還是不擁護；是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道路，還是走修正主義的道路，這是必須解決的根本問題。也是判別京劇藝術好壞的第一個標準，是決定京劇生死存亡的關鍵問題。我們的社會是社會主義社會，各種上層建築一定要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服務。[46]

在7月初，當毛提出組織一個小組負責革命化的文化時，彭真顯然是領導五人小組的人選，陸定一是他的副手，成員有康生、周揚和吳冷西（新華社社長和《人民日報》社總編輯）。這些人負責所有文化單位的艱巨的整風運動，然而，有諷刺意味的是，除康生而外，這些人全是文化大革命早期的受迫害者。

江青出場，左傾

在這種有利氣候下，江青從政治幽閉處走了出來。甚至在京劇節以前，她就自己擔負起使中國舞臺革命化的任務了。1964年5月，在看了表現共產黨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京劇《紅燈記》的綵排後，她

發表了第一次講話，指導戲應如何演，這樣的講話共做了 5 次。[47] 6 月 23 日，在周恩來安排的演員座談會上，江青作了第一次公開講話。並在下一月的另一次座談會上作了稍長一些的講話，後者被選出來作為更好的版本。[48] 這兩次講話的重要差別在於，在第一次講話中，她明確地表明瞭其政治上的同盟，以尊敬的口吻提到林彪和康生，康正在同時推行同樣咄咄逼人的左傾路線。[49] 兩次講話裏都提到了柯慶施，第一次是將柯在上海對戲劇的干預態度與未點名的彭真作比較，以褒獎前者。在私下裏，江青喜歡指責彭「大北京主義」，因為他對上海戲劇的實驗不屑一顧。[50] 北京黨的知識分子私下裏會承認彭真和他的副手劉仁對有關文化事宜既不感興趣，也不懂。[51]

江青在講話一開始就提出兩套「令人震驚」的數字，對比了上演傳統、歷史或外國戲的劇團佔劇團總數的高比例，和歡迎這種演出的人在全國人口中的低比例——5% 或三千萬地富反壞右和資產階級分子。[52] 江青響應以前上海左傾分子的號召，強調「我們最主要的任務」是上演革命現代題材的戲，這些戲反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 15 年的真實生活。「描寫我們黨成立以前人民生活和鬥爭」的歷史劇也是需要的。好的傳統劇，「除了鬼戲和宣傳投降、叛變的」，也可以上演，但是如果它們有觀眾就需要仔細審查。她還記得她丈夫的警告：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她給她與康生在 1962 年在戲院裏度過的歡快生活加上政治色彩說，我二年多經常到戲院去，對演員和觀眾的觀察使我得出了這個結論。[53]

應該從哪裏開始改造京劇呢？從好的新劇本，但近年來寫得太少了。江青表揚了柯慶施，柯親自抓了創造性的寫作問題，提出了領導、作家和群眾三結合的方法。另一個方法就是改編現有劇本中政治上還可以接受的那部分。有趣的是，江青承認京劇以藝術誇張的手法在描述反面人物時有問題，但真正的困難在使英雄可信。[54]

毛很快就表示同意江青 6 月的講話。[55] 確實他一直向各式各樣的人——外國訪問者、經濟官員和親戚——抱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狀

況和管理文化的官員。[56]江青受到了鼓舞，繼續她的遊擊活動。7月，江青把說明當前中國文化情況糟糕的官方材料，選送給毛，使他保持對文藝的興趣和不滿。[57]根據她對《紅燈記》所作的工作，在12個月期間，她對其他戲劇「發號施令」，甚至涉及音樂領域。[58]1964年底，她會見中宣部5名副部長，勸說他們批判10部電影。遭拒絕後，她就要求上海的黨來批判，中宣部發現別的地方批判起來了，不得不在《人民日報》上批判其中的兩部以裝樣子。[59]

這些活動觸怒了整個文藝官員，尤其是彭真，因為他們感到她管到他們的地盤上去了，還因為他們認為她抽掉了作品的藝術成分了。[60]一名西方學者認為：

> 在江青（提倡）的戲劇與芭蕾中，男女主人公沒有動搖、軟弱、憂傷或混亂，心中充滿了思想意識目標，為革命作出超人的行為。她改造傳統劇時丟棄了它的內容，但保留了它的程式、技術和風格。她排斥西方文化，但融入了最簡單、傳統的蘇聯舞蹈、音樂和歌曲。這些手法，加上階級鬥爭、軍事衝突和英雄模式的內容預告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那種官方文化。[61]

然而，也有另一種西方觀點：雖然這些樣板戲處理善惡鬥爭簡單化，反對柴可夫斯基的作曲法，用了複雜的道具與燈光，但它們有著輝煌的時刻，是真正受到歡迎的，但後來由於演出太多而削弱了影響。[62]

共產黨員知識分子整風

不論彭真對江青的活動的看法有什麼不滿，他的五人小組公開宣佈的目標與江青的目標卻是完全一致的：中國文化的革命化。雖然文化革命者將功勞——文化大革命後的歷史學家則將罪名[63]——歸之於江青和康生，但在逼迫知識份子就範的過程中，也沒有記錄證明彭真、陸定一和周揚曾推脫過。在他們領導下，在每個部門，都有絕對

忠誠的幹部，不論這些人是趨炎附勢者，還是有信念的政治家，他們也隨時會揮起鞭子，就像他們二年前放下棍子一樣。[64]其結果是一長串的戲劇、小說、短篇小說和電影以及它的作者受到了攻擊。在文化大革命中，公佈了63部應受譴責的小說及對小說負責的55名作家的名單；其中許多第一次受攻擊時是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前。[65]

由於在50年代反右運動中對描繪當代現實的小說受到攻擊，在60年代初，許多作家把小說的背景放在過去而不放在現在，以求庇護。現在作家們被迫描繪現實，又因作家協會黨組書記邵荃麟被攻擊而憂心忡忡，邵在1962年大連會議上鼓勵描繪「中間人物」——既非英雄，又非惡棍，而是搖擺於新、舊社會之間的，像那些不願意合作化的農民。作家們感到他們的主題受到很大限制，人物的色彩只剩下黑白兩種了。人物所應根據的是雷鋒這樣的模範。[66]

在文化部和文聯領導下進行的整風於1965年4月正式結束。在高級位置上發現了如此多的修正主義，領導官員必須撤換。文化部長是知名作家茅盾（沈雁冰），不是黨員，因此只是名義上負責該部。[67]他原可能被當作替罪羊的，但可能認為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的國際知名的人士不應受辱。[68]但另一方面，在新的左傾時期，非黨的頭面人物顯然不合適作為部的領導人，因而，在1965年1月甚至在運動結束前，就被陸定一撤換了。陸在4月7日撤換了二名負責日常工作的高級黨員，齊燕銘和夏衍。夏衍一度是上海電影界的主要人物，顯然是江青不滿意的另一個重點人物。[69]人們不清楚陸在選擇接替他們的人時有多少餘地。因為考慮到今後事情的發展，他從外單位調人來任文化部負責日常工作的黨的領導。他們是二名將軍和一名上海的官員：南京軍區副政委肖望東中將，上海市黨委書記石西民和參加過朝鮮戰爭的老戰士、當時任武漢軍區政治部副主任的顏金山少將。[70]

一分為二

在 1964-1965 年的整風中，並沒有將文化狹義地解釋為戲劇、電影、小說和美術。一旦「左」的思潮啟動了，它就橫掃腦力活動的一切領域。在許多場合上，毛對簡化教育過程、教育與工作相結合表示關切，一如他在大躍進期間那樣；他顯然認為長時間的學習書本知識不是最好的成為新一代的革命接班人的方法。[71] 許多知名人士都受到了攻擊。經濟研究所所長孫冶方被陳伯達誘勸，在 1962 年寫了一篇文章，兩年後卻因該文的觀點受到攻擊，更主要是因為他提出了比大躍進時所採取的政策更為理性的經濟政策。[72]、北京大學校長翦伯贊，可能是中國一流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也收到批判，因為他提出既要重視事實，又同樣要重視理論，並反對使歷史成為政治的婢女。他還質疑是否只有通過革命，中國農民的命運才變得好些。[73] 另一名馬克思主義學術帶頭人、北京大學哲學家馮定受到攻擊，因為他以前認為幸福可以是個人的，與階級鬥爭無關。隨著毛關注于教育年青一代學習雷鋒，自我奉獻，馮定就成為明顯的靶子，特別因為他曾表示反對個人崇拜。[74]

但這時最重要的受攻擊人物是另一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楊獻珍。[75] 他於 1956 年被選為候補中央委員，1958 年成為正式委員。從延安時代起，他就被委派從事對中共幹部的教育工作。1949 年，他是馬列學院的副院長、哲學教研室主任。1955 年該學院改為中央黨校後任校長。[76] 在這個職位上，他處於一個戰略地位得以影響成千名將提升的中央與省幹部的學員的思想。

對楊來說，不幸的是他的職位的重要性使其成為政治野心與鬥爭的焦點。他的一名下級是另一名傑出的哲學家艾思奇，在延安時就一直是他的對頭，當時受到毛的倚重。[77] 1955 年，艾和楊便在合作化問題上相互對立，艾宣傳要更快地改變，這一立場不久被毛採納了。艾長期受到康生的影響，在康於 1956 年被任命為政治局對該校的負責人

和他的妻子曹軼歐被任命為行政人員以後，他與劉少奇（總體上支持楊）之間就學校的方針與方向問題開始了鬥爭。[78]

在三個困苦年月，楊獻珍在巡視帶頭躍進的河南省農村後，對發現的情況大為震驚，對大躍進作了不謹慎的批評性評論。由於楊與彭德懷在延安時期有密切關係，而彭在廬山受辱後被派去隨他學習理論以糾正錯誤，這樣楊的敵人就有了更多的材料反對他了。[79]

在這些敵人中，有陳伯達，他像對待孫冶方那樣對待楊，要他寫文章然後又用來整他。1958 年陳要楊起草反駁蘇聯百科全書中的一個條目，該條目「誹謗」毛的一個概念。楊按正統的馬列觀點寫了，但這篇文章沒有發表。在他 4 年後向陳提到這事時，才知道陳贊成艾思奇的、與此不同的觀點。爭論的問題是似乎神秘的黑格爾的說法「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這一說法唯物主義者是反對的。艾，更重要的是毛，卻認為唯物主義者也可以接受這觀點。對毛說來，這是大躍進的哲學根據，有可能將思想變成現實，正確動員起來的人可以創造奇跡。康生利用楊的更為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來反對他。[80]

七千人大會以後，楊像許多在反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運動中受牽連的人一樣平反了，得以重新開始。對他來說，不幸的是正當他設法使學校從康生的影響中擺脫出來時，政治風向又變了。[81]楊再次因為他的正統思想觀點與毛有了不一致，這次則是因兩名他的追隨者的文章，討論另一個看起來很深奧的問題：「合二為一」。

早在1957年，毛在莫斯科講話時就說「一分為二」是個普遍現象。當時，他似乎關心的是低調處理蘇聯集團內的爭論，主要是蘇聯人與波蘭人的爭論。他說矛盾導致不一致是事物的自然結果，不必大驚小怪。到 60 年代初，中蘇爭論的尖銳化和 1963 年 7 月的公開化提供了另一種不同的語境，來解釋這一觀點。該年 10 月，周揚用這一觀點來解釋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為什麼會分裂，暗示毛在導致這關係破裂中所起的作用是有完全正當的。這篇講話於兩個月後 12 月 26 日毛生日時

才發表，顯然說明周是在轉述主席的思想，從此以後，「一分為二」就成為毛以社教運動發動的階級鬥爭的根據。[82]

1963 年 11 月 11 日，此時已降為中央黨校副校長的楊獻珍作了自平反以來的第一次講課，利用講課攻擊大躍進錯誤背後的哲學唯心主義。由於康生沒有聽這次講話，它毫無反響地過去了。楊 1964 年 4 月 3 日對新疆班的講課就不那麼幸運了，在講課中，他闡述了他對矛盾的統一規律在工作或「合二而一」中的觀點。這次講課使聽課的年青講師艾恆武感到興奮，他勸說朋友和同事林青山一起寫一篇文章闡述楊的觀點。在艾向林解釋這課程時，楊舉例證明一切事物都代表二種相反事物的統一，這就是為什麼「一分為二」是進行分析的很好工具，也就是具有第二位的和方法論的重要性。[83]

事實上，楊後來否認這兩個觀點的先後次序代表他的立場。[84] 據他簡要的講課提綱：

> 學習辯證法就是要瞭解怎樣將兩個對立的思想結合起來，這就是說，應該學會在實際工作中運用對立面的統一律，學會兩條腿走路。所謂對立面的統一就是兩條腿走路。一定要把對立面的統一的意思弄明白：一分為二；合二而一。一分為二是對立面的統一規律，一切事物都有二方面，二分法……。[85]

楊進而反駁了「修正主義」觀點，認為對立面的統一就是它們的「調和」。相反，它的意思是「矛盾鬥爭因為矛盾的性質不同……此外，對兩個對立面來講，統一是相對的，而鬥爭是絕對的。這也是對立面的統一律」。[86] 總之，楊似乎是說這兩個概念是處於同等地位的；他肯定沒有說「合二為一」否定了「一分為二」；也不贊成階級調和而贊成階級鬥爭。[87]

但楊的真正哲學立場與 1964 年政治環境是無關聯的。當艾和林以「『一分為二』和『合二為一』」為名的文章於 1964 年 5 月 29 日在知識分子閱讀的《光明日報》上出版時，康生抓住它作為最終打倒楊的機會。他錯誤地認為這文章是楊授意，至少是他同意寫的。他動員一名

年輕哲學家關鋒出來。關鋒是《紅旗》的哲學組組長，很快組織寫出反擊文章，於6月5日在《光明日報》上刊出。此後，康組織了爭論，鼓勵發表支持艾和林的其他文章，從而證明有一個嚴重而廣泛的異端存在，不應等閒視之。[88]

康能致楊於死命的關鍵是毛發怒了。康讓江青將6月5日的反駁在出版當天送給主席。毛的反應是「『合二為一』是矛盾調和論」。三天後，他又評論說「『一分為二』是辯證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義，階級調和吧！」[89] 8月18日在一個冗長囉嗦的哲學討論會上，毛向康生、陳伯達等人點名批判了楊。這時《人民日報》早已將楊定為「合二而一」的主要鼓吹者。毛說

> 什麼是綜合？你們都看到了國民黨和共產黨這兩個對立物是怎樣在大陸上綜合的。是這樣綜合的：他們的軍隊來了，我們就消滅它，一點一點地吃掉。這不是像楊獻珍所說的那樣合二而一，這不是兩個和平共處的對立物的綜合（譯按：按英文譯出，原文是1964年8月18日講話）。[90]

不論是故意的，還是受了康生的挑撥，毛似乎誤解了楊的立場。不管怎樣，楊是完了。在中央黨校，他已在群眾大會受到批判。1965年3月1日，學校給中央委員會一份報告，將他說成是「黨內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彭德懷的工具和小赫魯曉夫」；這最後一個詞是特別致命的詞，因為在文化大革命中，劉少奇一般被認為是「中國的赫魯曉夫」。[91] 6月9日，學校建議撤去楊的副校長和校委委員職務。9月24日，中央批准該報告並同意上述建議。[92]

受迫害的不僅是楊獻珍，林青山和艾恆武被送到東北農村。另一名副校長受到攻擊並被捕。另一名同事寧願自殺，不願出賣楊。總共有154名幹部受到各種懲罰，監禁、強迫勞動、開除出黨和不同程度的群眾批判。[93]

爭當左派

自從延安整風運動以來，楊獻珍一案第一次使整個共產黨的高級知識分子嘗到了受迫害的滋味，而在此以前，這是他們對付「資產階級」同事們的手段。在毛看來，這些黨員知識分子不論是由於疏忽，還是由於存心不良，沒有作出革命榜樣。彭真小組的成員就是要使他們自食其果。否則，下一次受批判的就會是他們自己了。因此，周揚親自負責反邵荃麟的運動，而二年前的大連會議上，他還是支持邵的。[94] 從周揚 1963 年 10 月的講話中可以看出，如果康生不是佔先一步，周可能也會攻擊楊獻珍的。

在這一階段，內部五人小組與江青的遊擊隊分歧的主要問題，與其說是政治，還不如說是地盤。彭真和他的同事們是中央委員會正式任命的，因此，被認為是（對文化問題）負責的，彭尤其不能容忍單打獨幹，但往往他們都無能為力，在江的非正規部隊點起火後，彭的部隊不得不將之扇成熊熊大火。

一個例子是康生對《早春二月》和《北國江南》這二部電影的批判。這是在 1964 年 7 月北京京劇節時發生的。到 7 月底中宣部不得不向上打報告，請示是否可以公開放映，公開批判。[95] 而中宣部的二名關鍵成員陸定一與周揚是彭的五人小組的成員。毛正想以反面例子來進行教育，命令這些電影不僅在大城市放映，也要在 100 座中等城鎮放映，以使群眾接觸到這些修正主義的材料。他說除這二部外，還有許多電影應予批判，從而開始了大規模的批判運動。[96]

此外，將這二個爭奪運動控制權的集團區分開來的還有他們個人的考慮。彭真和周揚想要保護至少一些較著名的、與他們有密切聯繫的黨員知識分子和文化官員。而江青，作為局外人，在康生和柯慶施的煽動下，卻沒有這種關係。不僅如此，她似乎對許多知名人士有著怨恨，這都是由她以前在上海左翼文化界任次要角色時一些真實的或她想像的小事結下的怨恨，也有她在 50 和 60 年代謀求文化政委職務未遂而只獲得較低職位而產生的。

一個突出的例子就是戲劇家協會主席兼黨組書記田漢，他是江青過去當演員時最討厭的一個人。早在 1963 年 12 月，田在華東戲劇節時就受到了冷遇和屈辱。[97] 在北京京劇節上康生攻擊他的朋友孟超並公開批判他的《李慧娘》是反動時，也一併提到田漢的《謝瑤環》。[98] 這是一出歷史劇，陳毅很喜歡[99]，劇本像吳晗的《海瑞罷官》（下一章將談到）一樣，寫的是一個想要保護人民不受她其他昏官壓迫的清官——這次是個女的。該劇有多層次的含義，寫於 1961 年，顯然是暗指大躍進所造成的痛苦。但是皇帝——這次也是女的，即武則天，暗指毛——在劇末以正面角色出場，在瞭解了人民的疾苦後糾正了這些錯誤。不論後來對田漢的批評是否恰當，對他的這些攻擊當時就足以使他立即下臺，但是他的威信、地位，還有可能來自周恩來的保護使他免於受辱，直到 1966 年初。[100]

田漢在 30 年代就觸犯了江青，在 60 年代又犯了思想錯誤，而周揚的問題則是在這兩個時期都觸怒了江青，這可能是獨一無二的。雖然他的官位很高並且他始終想與毛的立場保持一致，但他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消失了。[101] 由於毛支援江青，結果 5 人小組只能對所喜愛的同事（的事）拖著不辦。但這個小組成員甚至也救不了他們自己。

第十八章 從灰色名人到紅色領導人

王光美的桃園經驗

當毛鼓勵江青調查文化領域的修正主義時，劉少奇則鼓勵他的妻子王光美在農村做同樣的調查。這兩位妻子所起的輔助作用應該是為了協調一致。但江青對王光美作為國家元首的妻子越來越多地在公共場合出面心懷不滿。在 1962 年 9 月印尼總統蘇加諾夫人訪華時，這種心情就隱約表現出來了。在《人民日報》登出幾張王光美陪伴蘇加諾夫人的照片後，這份黨報頭版登出了一張毛和江青與印尼來訪者在一起的照片，而在第二版則登出了一張劉、王和蘇加諾夫人在一起的小得多的照片。這是江青的照片第一次登在報紙上，也是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次刊登的她和毛在一起的照片。[1] 自此以後，偶爾有毛和江青（在一起）的照片登在官方報紙上，但未註明江的身份。[2]

人們記得，王曾陪同劉在 1961 年去視察湖南，因此有在農村進行調查的經驗。在那段時期裏，劉不相信由中共官員和記者提供的材料，但同時又面臨任何知名領導人要收集情況的（困難）問題：農民不願意對大人物批評中共的政策，特別是有當地官員在場時。這樣，劉決定派他的妻子隱姓埋名地到農村去證實大躍進和三個困苦年份以後幹部腐化的事實。[3]

利用妻子去解決問題，對這兩個人來說都是有高風險的戰略。在大多數政治文化中，由高級人士的妻子在沒有自己獨立的合法性時自發進行活動會引起人們的敵視和不滿，[4] 當她們的丈夫都不在身邊時，王和江都受到了打擊。至少劉想要減少這種危險因而請毛批准王的任務，後來證明這也無濟於事；據王說，每次她從農村回去，毛都要詢問基層的情況。[5]

毛和劉都願意利用他們的妻子這種有爭議的辦法，反映出他們對其努力創造的制度的許多地方普遍不滿意。毛越來越執著地關心文化領域的事。而中共中央有關機關卻未能控制這些事，這使得他鼓勵他的妻子來彌補他的下級未能做到的事。毛似乎不信任中央的官員，因為他們往往不忠實執行他要他們做的事；他信任省的官員，可能是因為他們會告訴他想要聽的事。

劉則不同，他信任中央官員，因為他與他們在一起工作，並認為他們的目標與方法都與他的相似，確實，許多重要的中央官員都曾是他所領導的 1949 年以前的華北局的成員。他更關心中共在農村的地位，因為大躍進和饑饉在農村造成了很大的損失。1960 年他與吳芝圃在河南工作的經驗意味著他不能肯定省的官員會將實情告訴他，1961 年他在湖南的經驗給他以深刻的印象，要從農民那裏得到真實情況是困難的。[6] 因此，在 1963 年，他派他的妻子去為他瞭解情況。他給其妻子的指示是：「不要有任何先入為主的概念，始終從實際情況出發；有什麼問題就解決什麼問題。你應有馬列主義的觀點和方法，你必須瞭解黨的基本政策，但除此而外，不要有任何先入為主的概念，始終從實際情況出發。」[7]

1963 年 11 月底，王光美參加了河北的一個社會主義教育工作組，該組的任務是調查唐山地區的桃園大隊。[8] 她和劉 1958 年曾視察過該地區。但這次她用董樸的化名，帶著紗布口罩，頭上圍一條大圍巾來化裝。[9] 據王自己說，工作組原來打算在桃園駐 3 個月，但是它的任務很複雜，他們不得不留在那裏達 5 個月。收成很好，但是階級鬥爭卻很激烈。[10] 問題出在大隊支書吳臣身上。就像 1961 年在湖南劉少奇與彭梅秀之間的衝突一樣，[11] 這個主要罪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一個幾乎完全無辜的受迫害者。

吳臣手上有幾張王牌。公社領導將他推薦給工作組。工作組組長是縣幹部，他對大隊幹部很熟悉。[12] 王發現，吳準備充分利用他任職

五年的一切方便。她的王牌，像江青的王牌一樣，是她的丈夫，她在鄉下時也與他保持著聯繫。[13]

工作組發起了三個「高潮」，勸說幹部們承認錯誤來「洗個澡」，並鼓勵群眾揭發他們。第一個高潮是召集當地三級幹部——公社、大隊和小隊——開會，公社黨（委）書記應帶頭公開放下包袱認錯。但他沒有這樣做，同時，桃園幹部也沒有這樣做。幾經推諉後，吳臣只承認打過幾名社員。

在工作組參加的華北地區四清會議以後，發動了第二次高潮。這次高潮的特點是更廣泛的調查和更仔細的思想工作。王的敘述給人以印象，這次會議意味著一個突破，因為鐵板一塊的大隊權力結構開始變得四分五裂，而當地土生土長的幹部與外來工作組成員之間力量平衡也開始有了變化。第三次高潮是在另一次三級幹部會議上掀起的，河北省第一書記林鐵在會上講話，號召幹部進行自我革命，號召群眾幫助他們，並承諾寬大處理已經改造好的分子。[14]

群眾逐漸說話了，但只是在工作組接受群眾的建議設立了舉報箱以後，而且他們還建議舉報箱不設在工作組辦公室門前而設在公共廁所，這樣農民可以投入「訴苦」條，不用怕被他舉報的幹部發現。[15]慢慢地，工作組建起了吳臣的檔案，指控他侵吞公款、進行資本主義活動以及毆打 31 名社員。他還被指責偽造階級出身；事實上，他原是小商販，不是貧農，經常吃喝嫖賭。工作組的結論是：這不是一個變了色的黨支部，而一直是一個國民黨式的組織。[16]吳的後台老闆是個地主，在土改時事先將大部分家產賣了，以此狡猾地逃過了劃成地主。[17]吳被開除出中國共產黨，而由當地民兵隊長關景東取代他任黨（支部）書記。[18]

1967 年 9 月，《人民日報》發表對王在河北農村的活動進行抨擊的重要文章。將王光美的記述和文化大革命的說法進行比較可以看出異同之處。王承認工作組的領導選出的新支書有侵吞公款和糧食的記錄。任命他為支書，她的理由是他有能力提高生產。[19]《人民日報》

承認吳臣曾毆打農民，曾是小販。[20]它為他辯護說，他長期致力於社會主義農業。[21]

在饑饉以後，王和她的工作組特別關心她們的調查和改組能導致農業生產的發展，這一點不令人奇怪，[22]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時，黨報集中注意力於思想，這也不令人奇怪；這兩種立場都可以引用毛的話來證明其正確。但這兩種情況都能證明的事實卻是在農村權力部門中的腐敗是何等地普遍。這意味著新來的工作組面臨著的選擇卻是不能令人愉快的：或者使在位的幹部留任，但警告他們從今往後應幹得比現在好；或者以其他幹部取代他們，這些幹部是否可靠同樣值得懷疑，不過是運氣好當時沒有工作在第一線而已。王光美強調發現「根子」很重要，[23]但又很困難。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已經對所有領導人的材料都查過了，幾乎每一個幹部或可能當幹部的人都可能受到沾染。[24]

以如此大的聲勢發動的階級鬥爭，如果結束時竟保持原樣，這在政治上是不可想像的。因此，工作組別無選擇，只得以一批有缺點的幹部來取代另一批有缺點的幹部。對農民來說，換和不換，都一個樣——除非新領導班子裏有他們的親戚或朋友。但這對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卻要嚴重得多。工作組將近二十年前土改以來就一直在位的農村幹部基礎結構予以改變，這就導致破壞農村的整個官僚系統。正如王光美的報告所說，既然當前領導層與直接上級的掌權者有著密切的關係，這就意味著社教運動只能由政治權力比縣和地區一級還大的外來工作組來進行。這就是劉少奇在他妻子回到北京以後想要進行的革命。他完全有理由相信毛會支持他。

修訂的《後十條》

1964 年 3 月底到 4 月底，正當王光美結束她的桃園大隊之行時，毛像往常那樣進行旅行並在杭州作短暫停留，並聽取了 8 個省官員的彙報。他對所有的人說兩個十條必須一起宣傳，並譴責他最喜歡的一名第一書記——湖北的王任重不到基層去調查研究。[25]

當毛和劉在5月15日到6月17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見面時，似乎意見是一致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中央所面臨的問題的嚴重程度。劉對農村幹部的評價不高，這是他從他妻子那裏所瞭解到的看法，並傳到他同事們那裏。這個看法與毛從1960年底以來所說的話是一致的。1960年11月，毛就曾將整個農村1/3地區的不良經濟狀況歸罪於壞分子。該年12月和1961年1月，毛又將（國家的）災難歸罪於「封建勢力」和恢復以前的權力結構，但這災難大部是由他自己的烏托邦的觀點引起的。[26] 1963年6月14日，毛回到了這個議題，當時社教運動正在進行。一年以後，1964年6月4日，他對北朝鮮的來訪者說，農村幾乎有1/3的小隊被中共的敵人或這些人的同盟者所掌握；在8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全國權力結構中約有1/3不在中國共產黨的手中。[27] 甚至在8月18日在對哲學作長篇發言時，他也將農村腐敗幹部的問題拉進來講，充分說明他對這問題是多麼在意。[28] 這也是劉後來響應的問題。在工作會議上，劉也譴責基層幹部想要對社教運動進行翻案，竟說「四清」是「反黨」。他提議，任何這種破壞都應定為反革命，將這些人開除出黨。[29] 關於目前問題真正的責任在哪裏，劉也預計到毛的看法：不在有「四不清」幹部的基層，而在上面，他發現在上面已有了向資本主義「和平演變」的人了。他提出揭露腐敗的根子，即令根子在中央委員會，也要揭露。[30]

許多人作了咄咄逼人的發言，號召在農村搬石頭，在城市中重劃階級，之後，[31] 在會議結束時，中央書記處正式決定修改《後十條》。書記處成員之一、負責農業的譚震林負責此項工作，並負責起草貧下中農協會的章程。書記處高級成員、負責城市工作的彭真則負責起草城市五反運動的指示。農民協會章程很快就制定好並於6月25日傳閱，同時發出指示提出對非法獲得貧下中農身份的人重新劃定其階級成份。[32]

劉少奇將7、8月的大部分時間都用於在各地巡視、講話：天津、濟南、合肥、南京、上海、鄭州、武漢、長沙、廣州和南寧。他後來

解釋說，他擔心《後十條》有些條文「會幹擾對群眾的動員」。[33] 他強調毛的看法，即中國共產黨已失去對 1/3 國家的控制，需要找出基層壞幹部在上層的根子。同樣有威脅性的話是，不能依靠基層幹部，可以團結的 95% 這個數字要向下修改。他號召擴大四清的概念，認為目前的四清可以歸為一類——清經濟——還應加上清政治、思想和組織。最後，他提出集中精力，打殲滅戰。他的意思是派大量工作組下去，超過當地權力結構，以便改造它們。[34]

他的日程表明不僅表明中南和華東地區以及這些地區的領導人陶鑄和柯慶施的重要性，還體現出他們對社教運動的無條件擁護。更主要的是他的革新建議完全證明他很有自信心，也說明他是負責社教運動的。另一個證明是陳伯達的行為，陳是毛政治上信任的人。陳總是趨炎附勢的。[35] 本身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已於 7 月 5 日在彭真建議下，發到河北省委，陳又向劉建議擴大報告的發放範圍。據說，毛對這種作法以農村罵人的話表示不滿，[36] 但劉可能不管這些，同意陳伯達的建議並寫了一個前言。8 月 5 日，鄧和書記處將譚震林主持的《後十條》修改稿交給劉（薄一波從彭真手中接管五反工作），[37] 並在陳伯達的建議下，讓劉在一個新的指揮部全面負責社教運動和五反。[38]

可能就是根據這個職務，劉在 8 月 16 日寫信給毛和黨中央，告訴他們，他已告訴中南區各省改變進行社教運動的戰術。他改變了組成縣工作隊搞下屬區的辦法，提出湖北和湖南組織省或地區的工作隊搞下屬的縣。這樣就為打殲滅仗增加幾千或上萬人的力量。他還建議中央機關派 1/3 幹部，約一萬至幾萬人下農村。

毛於 8 月 18 日覆信表示完全贊成，說他認為這些辦法「很好」。主席對劉的聲勢浩大的辦法很欣賞，這是用大躍進的辦法來清理思想。他可能認為這是響應中共最近發佈的九評中提出培養革命接班人號召的一個恰當的辦法。毛告訴劉，他已與其他中央同志討論過他的建議。這些人中可能包括鄧，他作為書記處的頭頭，必須組織實施這建議並命令黨要迅速按這些路線行事；在 10 月工作會議上，全黨思想

應團結在這個辦法周圍。同時，中央、省和下級應在今後二個月內訓練工作隊，準備在秋季迅速開始。根據毛的指示，中央工業、交通戰線的不同個部組織了 25% 的幹部共 3,901 人，包括 1/3 的副部長的工作隊。在全國，為社教運動和城市的五反，共動員了 156 萬名幹部。[39]

8 月 19 日，劉繼續跟進，又寫了封信給毛和中央，並附有他對《後十條》的修改意見。田家英將這文件從廣州帶到北戴河。一周後，毛將修改稿交鄧小平，並批示應盡快傳給大區書記處成員和參加工作會議的其他人，徵求意見，以便進一步修改該草案。

毛對此的支持是令人驚奇的。當他的秘書田家英應劉的請求離開毛，陪劉視察時，請主席指示，毛要他記住兩點，（a）不要將下級幹部說得漆黑一團；（b）不要將大量工作隊集中在一個點上。田原原本本將這些看法傳達給劉，但這些看法似乎對劉不起作用。在這一點上，毛顯然接受了劉的立場。[40]

可能毛是受到王光美給他的桃園經驗報告的影響。他要她召開萬人大會，大規模動員群眾。[41] 當然，毛對劉的活動的最重要的支持在 8 月 27 日，他贊成陳伯達的建議，王的報告應傳達（譯按：與作者以上所說有矛盾）。該報告的建議中，中共黨內認為重要的部分是：先紮根串連，然後進行四清和與敵人鬥爭；依靠基層幹部，但不是完全依靠基層幹部；四清不僅是清工、清賬、清財、清庫，而是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和清組織。9 月 1 日，中央傳達了王的報告，劉寫了批示，指出該報告有普遍意義。[42] 在 8 月底由劉主持的工作會議考慮並經毛、周、鄧小平和彭真審查和同意以後，中央於 9 月 18 日發佈了修正的《後十條》。[43] 在劉同事的眼裏，這是他在七千人大會以後最引人注目的業績；它標誌著從「小四清」到「大四清」的過渡。[44]

薄一波當時政治局候補委員並在 8 月接管對監督五反工作，據他所說，新文件在七個方面有重要修改和補充：

- 毛關於衡量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搞得好不好的六條標準。（這六條是：貧下中農動員的程度；在幹部中將四不清幹部清洗出去；幹

部參加體力勞動；建立一個好的領導核心；在基層對各種不好的成份的人進行鬥爭；增加生產。)；[45]

- 領導人必須在一個大隊從頭到尾做完全部工作，並且要去二次；
- 判斷社教運動是否徹底的標準是群眾，尤其是貧下中農是否發動起來了；
- 要解決群眾問題必須先解決幹部問題；
- 運動必須由工作隊領導；
- 民主革命（指土改）不徹底的地區，必須補課（包括對混入貧農隊伍中的前地主或富農重劃階級）；
- 運動分為二個階段，首先進行四清和對敵鬥爭，第二個階段是組織建設。

這七個方面中，最重要的是工作隊的領導。[46]

新的檔體現出劉少奇的認識，即社教運動成功的關鍵在於無情地徹底進行。據估計，運動約需 5 到 6 年，而以前則認為 2 到 3 年。工作隊工作的最少時間從 3 個月延至 6 個月。過分照顧基層幹部「面子」的作法受到了批評。與原來的《後十條》相比，修改後的文件警告說這方面的右傾主義比左傾主義更嚴重。不僅是犯大錯誤的人，就是只犯了小錯的幹部也必須面對群眾；農民們害怕在工作隊離開後受到當地官員的打擊報復，文件保證工作隊要定期回來檢查以保證他們的成績不會被取消。一切貪汙案件均應由工作組處理，不得交給上一級的當地幹部，因為按以前的辦法，這些幹部會對與他們有長期工作關係的人採取寬大的態度。原先對投機倒把的人採取說服教育的辦法，現在改為鬥爭。劉得以按其意願行事了。[47]

社教運動的操作：親歷者的看法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有可能從華南逃到香港的基層幹部和農民中搜集到社教運動操作的情況。文化大革命後，也可以從工作組成員處得到材料。在這些身歷其境的人看來，社教運動是個可怕的經歷。被選中進行社教運動的每個縣，要接受的工作組人員均超過 1 萬人。工

作隊繞過當地幹部，而且「奪」了他們的權。在青海省的一個公社，工作組決定 47% 的幹部應予撤職或受紀律處分。這個例子可說明當時左傾主義氾濫，這是全國最壞的一個例子。[48] 在許多地方，幹部多次受到毆打或捆打，有許多人逃亡或自殺。對北京郊區的通縣，派去了一隊記者，其中 40 人來自《人民日報》，為時一年。[49] 在通縣，毆打事件超過一百起，70 人自殺，其中 50 人死亡。在山西洪洞縣，45 人死去。在四川，1964 年 11 月與 12 月間逮捕的人數超過同年的前 10 個月的總和。[50]

在廣東的一個縣，所有農村幹部集中在縣政府所在地的院子裏，進行幾個星期的政治學習；按中共的一貫作法，給每個公社的幹部分配了貪污罰金定額。據一名經受過這場鬥爭的幹部說：

> 一個月的大部分時間，我們學習黨的文件，寫交待。我甚至得交待看了幾次不花錢的電影，在集體的地裏勞動時，吃了幾根甘蔗。我被處罰金 46 元，但我拒絕付款。許多幹部都被嚇壞了……有些幹部感到太丟面子了，後來拒絕再任幹部。

據另一名幹部說，幹部們從大院裏回到公社後，考驗還沒有結束：「我們回家後，工作組動員群眾批判我們。這是很可惡的。以前的整風運動基本上限於黨內。這次，一切都亂了。」[51]

似乎有一個政策是專門打擊知名的單位，可能爲了表明社教運動從此會毫無畏懼地、也不講情面地進行下去。還爲了說明任何幹部，不論他是多麼可尊敬，也免不了受審查。事實上，當時能看到的賬目顯然說明到處都有嚴重的問題。在山東，曲阜的東郭大隊領導人（省級著名的勞動模範，曾很大地提高了當地的生活水準）全家被批判，其長子被撤去民兵隊長職務。[52] 廣東的珠江三角洲的典型盛始大隊以前曾由第一書記趙紫陽宣佈為清廉的大隊。但來了一個新的工作組，這次在王光美的領導下，由省和北京市公安局的人員協助。當地黨的領導人也是一名勞動模範，但犯有強姦和貪汙罪，企圖乘小船逃往香港，但未成功。即令是山西省的大寨大隊也由工作隊從「先進單位」

改定為「有嚴重問題」的單位。[53] 用一名西方學者的話來說，這「可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對農村黨員和幹部的最激烈的清洗」。[54]

城市的激進主義

北京近郊的自殺說明激進的衝擊不限於遠郊區，天津的小站區（也坐落在河北省內）是比王光美的桃園更為令人害怕的典型。那裏的社教運動始於 1964 年 1 月，但在 3 月，天津市的黨組織決定大力加強工作組的力量，可能因為它聽到了在桃園發生的事的風聲。新去的人有周揚和《紅旗》雜誌社的 10 名工作人員，包括主編陳伯達，陳伯達去可能是他自己提出的。[55] 8 月 4 日，在天津的黨寫出報告以前，陳寫信給中央稱在小站發現了三個反革命集團。領導人一個是水稻專家，一個是女勞動模範，第三個是鎮黨委書記。陳的信與材料一起被傳閱，6 個星期以後，天津黨的報告肯定了陳的報告中發現的問題，中央轉發這報告時作了批示，說不論在什麼地方，當領導權被反革命分子篡奪時，就必須有一場奪權鬥爭。[56] 據一份報告稱，由於陳的活動，250 名幹部被清洗。[57]

在許多地方，如各工業和運輸部，城市的五反運動在 1963 年就結束了，但在 1964 年，為響應新的左傾主義，又重新開始了。在那年，工業和運輸多個部組織了 13 萬名幹部，包括 45 名副部長，組成工作組，派到 1,800 家國營企業和 730 家集體企業去。[58] 雖然，這次運動不像以前有些運動那樣厲害，[59] 但也產生了另一個著名的城市典型，即甘肅白銀有色金屬公司，簡稱白銀廠。這一大型企業於 1962 年全力生產，僱用了 11,000 名工人，除白銀外還生產銅和硫磺。由省和冶金工業部派出的五反工作隊早在 1963 年 3 月即已抵達該廠，在愈來愈高漲的左傾思潮下，它將該公司的問題說成是國營企業演變為地主、資產階級的企業。開展了奪權鬥爭，該廠幾名高級黨的官員受到紀律處分，有的被判了刑。[60]

劉的遷升

在收到這些警報式的報告後，劉點起了階級鬥爭之火。他發出了一系列指示。[61]工作隊中的中央或省的幹部中，沒有人願意被指責為未能從地主分子或腐敗的前貧農（這些人可能證明是地主，只是定成分時逃過了）手中奪回政權。由於當時和後來的報告都說明腐敗是普遍的，不滿意的農民和工人的任何指控都被當作戰火之前點燃的烽煙。

對劉的最熱情的支持似乎來自中南地區。在劉於該年年底與毛的爭論中（見下），與劉持同樣意見的是陶鑄。陶的主要助手湖北第一書記王任重注意到毛對他的批評，下到基層去了，不久作了講話，劉 12 月初下令傳閱。[62]王經常提到「少奇同志」的講話，這是對劉當前地位的肯定，但這肯定來自毛的一位親信，令人覺得驚奇。王也同意劉的分析，即前一年的社教運動只是觸及表面，有些工人已成為剝削者，共產黨員蛻變為國民黨了，真正的問題不在基層，而在上面，甚至在省一級。這當然也是毛的立場，但王只提劉。[63]毛會因為（王的）這種改變忠誠對像而生氣麼？

王任重認為「和平演變」和反革命奪權有三個層面的原因：社會的、歷史的和黨的工作方面。他指出在紅安縣安全大隊的書記就是 1947 年劉鄧大軍解放該地區時由「敵人」安插的，這樣就偽裝了 17 年。由於反革命分子從大隊一直到上面都掌了權，因此國營和集體企業都被侵佔了。土改是徹底的，但還不夠徹底，因而，壞分子沒有被揭露。在土改中湧現出來的積極幹部，並不是每一個都是壞的，但「這些人都是農民，農民有兩重性，有革命的積極性，同時又有自私自利、個人發家致富的自發傾向。」王說，共產黨的錯誤就是只對這些幹部講生產、徵購和分配，不注意思想、政治和階級鬥爭。如果不教育農民走共產主義道路，他們就必然向資本主義倒退。[64]在 1961 年和 1962 年經濟衰退時，出現了兩種市場、兩種價格，這鼓勵了投機倒把，甚至在共產黨內，幹部們竭力多吃多佔，變得腐化了。幹部和他們的家庭成了特權階層，有權就有錢；在 1961-1962 年，有些人甚至不

願當幹部，要去經商。[65]不清的經濟必然敗壞政治和組織。因此，反對四不清意味著尖銳的、複雜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既包括人民內部矛盾，也包括與敵人的矛盾，兩種矛盾交織在一起。[66]

王任重同意當前鬥爭的重點應是解決主要矛盾，也就是群眾與四不清幹部之間的矛盾——這是劉的提法，也是毛後來反對的提法。王也不弱化了毛原來的、寫進發動社教運動的《前十條》裏面的提法，[67]以新舊對比來進行「教育」可能使農民相信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因為有些農民的生活與以前一樣困苦，大多數人都受到四不清幹部的壓迫。王與《前十條》的另一不同之處在於他不認為發動群眾反對四不清幹部應是「和風細雨」、「洗溫水澡」，而應該是一場「急風暴雨式的大革命」。[68]這樣，農村幹部所受到的整風比高級幹部在 1957 年短時間受到的整風要激烈得多。[69]也不會寬厚地對待弱者，而是正相反。此外，受壓迫的農民的批判要比小心謹慎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批判直率得多。

王任重完全知道他所說的這種運動會在該省的黨內造成組織上的混亂。王考慮，在社教運動期間，大隊的黨支部一般會垮掉，工作組必須承擔起管理的職責，在貧農協會組成後交權給它。在運動結束後，可以組建乾淨、更健康的黨支部，再次成為大隊領導的核心。為鼓勵前途未蔔、膽戰心驚的湖北黨員們，王又提出了樂觀的前景：如果正確地開展社教運動，那麼就可以保證馬列主義將戰勝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這也就意味著社教運動是最後一次重大的革命運動。[70]這種革命運動終結的想法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毛的反對，他贊成定期大亂，以保持每個人的革命熱情始終高漲。

王對黨支部全部垮掉的預見並不是激情想像的無稽之談。他一定聽到在鄰省湖南和中南區已經發生了這樣的事。11 月 1 日，省長程潛和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張平化是省貧農協會籌備委員會的負責人)簽署了正式命令，在黨支部已垮掉或在敵人手中的地方，允許工作組

將權力交給貧農協會。劉 11 月 12 日批准了這一命令，這是在王任重作報告的前三天。王的報告到 12 月 3 日才發下去。[71]

對劉的反抗

但是，如果說中南局忠實地執行了劉少奇對社教運動的想法，這想法在其他地方卻遇到了反抗。如果是夏洛克 福爾摩斯，則會留意到有些狗是不叫的，至少不那麼大聲。[72] 西南區第一書記、政治局委員李井泉，沒有上交任何材料，1964 年夏季劉少奇也沒有巡視該地，儘管該地區包括了全國人口最大的省份——四川。不過劉少奇可能認為，李的左傾以前已經有先例佐證，因此應該信任他會遵照自己的命令執行。[73] 東北區毫無反應，以致劉頗有怨言，不得不在 12 月 6 日寫信給第一書記宋任窮要求他至少寫一份簡短的材料使他瞭解該地的社教運動情況。[74]

桃園大隊所在地的華北區是肯定不滿意。第一書記李雪峰在 8 月 20 日向毛抱怨，表示反對劉不讓縣委管社教運動；他還特別提出有人對桃園典型持保留態度。然而，毛剛批准了劉的計劃，因此並未給予李以鼓勵。[75] 這可以說明為什麼李於 10 月 11 日寫信給劉，支持劉的方法，但為他自己以前的態度辯解說，在推行中央指示時遭縣一級的堅決反對。開始時，只有 60 ～ 70% 的縣同意，在社教運動中，他們應退居二線。許多縣的官員，還有省和大區的官員基本上不瞭解階級鬥爭問題的嚴重性。李雪峰同意劉的看法，他估計山西的 96 個縣中，44% 或 45% 有嚴重問題：2 個縣委全爛了，17 個嚴重右傾，5 個鬧宗派嚴重，另 20 個相當右傾。96 名縣委書記中 19 名反對或不支持社教運動，19 名是妥協派，共佔 40%。[76]

華北區勉強跟著走，但華東區則不然，華東區是由毛的主要夥伴、政治局委員柯慶施掌握的。劉夏季巡查中間視察該區 7 個省中的 4 個時，沒有證據證明柯給予他以公開的支持。此外，除毛而外，劉在社教問題上與之發生的唯一的公開衝突的是華東區書記江渭清。他在

1955 年接替柯成為省第一書記以前是作為柯的副手在江蘇工作的。劉就是利用了這一段特殊的經歷向省的領導人表示他不能容忍反對。

江渭清是江蘇人，自 1949 年就在那裏工作。1956 年中共八大第一次全會上，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77] 江的講話和報告經常受到中央表揚，並發給他的同事參考，對他這樣級別和職位的幹部來說，這也不是不平常的。[78] 他與劉在這時的爭吵緣於江關於社教運動的講話在江蘇省內分發下去供人學習。劉在夏天曾視察過江蘇省，但二人的衝突是在 9 月 8 日以前在北京發生的。在那次會議上，劉提出了講話的分發問題，對此江激動地說這是省辦公廳做的，他不知情，並堅持說劉無權不相信一個黨員的話。劉就將這事放了下來，但江顯然很激動，以致會議的後半截就沒有什麼結果。[79] 劉的話的意思是他在視察江蘇時就已讀過江的講話了，認為這講話不合適，並這樣說了，但被告知講話已發下去了。江的辯解是他可能對下屬管得不嚴，但他並沒有公開不服從劉，從而犯下更大得多的錯誤即違反黨紀。

9 月 8 日，江給劉寫了一封劉認為不能令人滿意的信，信中說江沒有理解劉的關心。9 月 30 日，劉作了覆信，並指出了這點，這覆信使江蘇省委於 10 月 15 日給他發了一封電報，其中有江的自我批評。劉既已顯示了他的權威，又得到毛的同意，就將他的信和電報下發到縣一級，作為對全國幾千名黨的官員的教訓，據說，這些官員中，有的比江的錯誤更嚴重。[80]

為什麼江的報告不值得下發呢？劉寫道，因為它是「空話連篇」，是沒有創造性的教條主義，在這裏，這是指僅僅重複了文件裏的話。第一部分是大段摘引《前十條》和毛關於這問題的講話。第二部分引了劉在江蘇省會南京的講話，他沒有摘引，這是因為劉不是按照書面稿念的。第三、四段完全是關於社教運動的行政指示。[81]

江渭清不是第一個，肯定也不是最後一個以重複上級所說的話的方法來避免自己犯錯誤的人。如果兩位上級的話不一樣，就照樣重複這兩位上級的話。因此，劉批評江騎牆，是不公正的。此外，如果江

說的話更討劉的歡心，劉就不會生氣。但劉覺得江的講話表示對劉在南京的講話有保留。劉堅信是他在負全責，因此講出了他的反對意見。

劉宣稱他自己贊成當前學習毛的著作的運動，以及「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口號。他不反對號召學習《前十條》和毛的講話，但他認為這只要幾句話概括就夠了；將這作為江講話的中心只不過使毛的著作教條化罷了。[82] 的確，劉對江蘇召開的社教運動會議所作的分析是：江蘇各級黨，包括省一級的黨的幹部脫離了實際，脫離了群眾。江蘇黨組織的幹部已處於毛主席所說「養尊處優，驕傲自滿和固步自封」的地步。在他們在北京見面時，劉迫使江承認，雖然他在省內已有十年多，但他今日瞭解的情況不如以前多，特別是有關階級鬥爭的情況，劉這時寫道，江未能執行中央的指示，因為地方的黨委為所欲為，是這些人領導江，而不是江領導他們。[83]

劉指責江和他的許多同事沒有到群眾中去，因此，只傳達了基層幹部的意見。這些錯誤意見是幹部們散佈的，導致《後十條》中的錯誤，其結果是束縛了群眾，因此需要修改這檔。

劉在信末表示他相信江是個好幹部，對他最終下到基層去感到高興。但這種拍拍腦袋的安撫更突出了劉對江指責的曲辱性，這是其他省的書記們無疑會記在心裏的。[84] 對江早些時候的違抗，他的怒氣一點也沒有減少，這在紙上躍然可見，但劉的真正目標可能是江的直接上級柯慶施，柯無言的侮慢可能給了江渭清以鼓勵，使他堅持己見。[85] 顯然，通過在公眾場合指責江，劉實際上是警告柯和其他大區領導人，如果他們不執行他的指示，他就會直接干涉他們的領地了。毛的這位副手從未對黨組織這樣強調過他個人權威。毛可能對他的話和《前十條》受到如此粗率的對待感到不高興，但後來，毛似乎也準備將正式的權力讓給劉。

「你當秦始皇」

關於毛內心中對他這位重要副手的隱密感覺，只有一份資料提供了證明：李志綏醫生的回憶錄。李在 1954-1976 年任毛的私人醫生，根據他的記述，毛早就對劉抱有疑慮。1964 年初，當毛得知劉罹患肺結核時，明顯表示出滿意，而不是關切，這已經確切說明瞭他對劉的敵意。更重要的是，毛後來採取措施，撤銷中央健康局（Central Bureau of Health），限制本來對中國領導人的特殊照顧，李認為正是針對劉的。[86] 無論他這種猜測是否正確，毛與劉的關係在 1964 年最後的幾個月內進入了變化的階段。像過去那樣，蘇聯發生的事件可能對毛的思想有重要影響。[87]

決定性的時期是 10 月中赫魯曉夫下臺，到 11 月中周恩來的代表團兩手空空地從莫斯科回到北京。如果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事們略微讓點步，毛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宣稱獲得了勝利。但他們表明了意圖，用《人民日報》的話說，要實行「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義」。如果照李醫生所判斷的那樣，毛患有輕微的妄想症，那麼這樣的事態發展更讓他惱火。[88] 為什麼不是「沒有毛的毛主義？」對主席來說，馬林諾夫斯基說他應該被搞掉的醉話太傷人了，不能以舉止失當一笑了之。

蘇聯人將赫魯曉夫清洗掉不是因為他們對他所有的政策都不同意，而是因為他們認為他想要改造黨，還有其他「輕率的計劃」對國家和他們社會的利益傷害太大了。[89] 用勃列日涅夫的話，赫魯曉夫「咒罵我們，說我們什麼破事都不幹。……根本無法和他合作……我們簡直不知道該拿他怎麼辦」。[90] 毛也喜歡對他的同事進行諷刺和威嚇，至少與赫魯曉夫相當。這是有案可查的。在過去的十年裏，他發動了半途而廢的百花齊放運動、大躍進，後來導致饑饉，他清洗了一位國內的軍事英雄、否定了理智的農業政策，發動了造成分裂的社教運動，採取了耗資巨大的「三線」政策，而不願在國際上採取溫和的姿態，現在，他要改造黨，甚至執行了更為「輕率的計劃」，其結果是

更為災難性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義分子譴責劉少奇是「中國的赫魯曉夫」，但是在蘇共第一書記倒臺後，人們可以寬恕毛，因為他害怕他最後也會得到這個外號。[91]

張聞天在1959年作為反毛集團的成員被批判時，說「誰要推翻毛主席？就是有人真的想要推翻他，他們也做不到。」[92] 可能在1964年所有毛的高級同事們都會有這種感覺，但主席卻沒有這樣的把握。他可能會注意到赫魯曉夫之所以會被推翻，正是因為他不在首都，因為這是唯一他不掌握日常事務的時候。由於毛不在首都的時間要比赫魯曉夫多得多，而且從來不負責日常事務，原則上講，他的處境要危險得多。1961年當他發現他的專列和所有住地都被竊聽時，馬上懷疑他的同事們會利用錄音帶編一個反對他的「黑報告」，就像赫魯曉夫反斯大林一樣。[93] 在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批判已故的獨裁者斯大林以後，毛擔心，也可能在他逝世後被他的同事們批判；[94] 在赫魯曉夫被清洗後，他必須考慮他還在活著的時候就被推翻這種遠為令人震驚的可能性。從這時起，對毛來說，忠於他個人要比忠於他的政策更為重要——這就是為什麼像周恩來這樣的「右傾人物」能在文化大革命中生存下來，而劉這樣的「左傾人物」卻不能。忠誠包括促進對毛的個人崇拜，因為主席曾得出結論「赫魯曉夫先生垮臺可能是因為根本沒有對他的個人崇拜……」。[95]

有意思的是毛對可能的危險的反應類似赫魯曉夫在1963年受到威脅時的反應，他暗示願意下臺。[96]1964年11月26日，毛在討論「三線」的會議上說：

> 還是少奇掛帥，四清，五反，經濟工作統統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測風雲，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現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點，我罵娘沒有用，不靈了，你厲害，你就掛個罵娘的帥，你抓小平、總理。[97]

從毛的聽眾的觀點看，毛開始的話看起來像是要強調，雖然毛在1964年對整個經濟事務，特別是三線的興趣越來越大，但劉仍負責日常事務。[98] 然而這一段話還是隱晦地告訴別人劉是處於第二位的，是由毛決定誰負責的。劉被說成是在毛之下的第一副主席，似乎他的另一個頭銜，即國家主席的頭銜，是無關緊要的。他的暗示是沒有毛的支持，劉不可能接替他任黨的主席。即令他稱劉是新的「始皇」（人們經常將他比作秦始皇），這也不過說明，相比之下，劉還不適宜擔當如此重任。[99] 偉大的中國歷史學家司馬遷寫道：「秦王……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100] 這話聽起來不像是說劉，而可能是指毛。

然而，對劉來說，這是一個有吸引力的時刻。毛在明顯地表示他最終願意將黨主席的位子讓給劉，並退到在八大就為他設立的名譽主席位子上去[101]。劉再也不必成為一個灰色的領導人了，他已經證明在領導黨方面，他可能是與毛一樣紅的。但劉的反應顯示出他還是很謹慎，這是長期經驗得來的。他必須問自己，這是一杯毒酒嗎？他自謙地說他搞不來那麼多，他可以管四清，但彭真[102] 和公安部長謝富治管五反，經濟由鄧小平和總理管。毛堅持說鄧和別人都很忙，如果劉不負責，就統不起來。[103]

雖然主席這樣說了，但他仍然很活躍。12月5日與12日，他對謝富治和他以前的秘書陳正人有關五反的報告作了批示。同樣地，在13日，他對周恩來即將提交給人大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作了長篇批示。14日，他寫信給副總理薄一波，同意他有關三線需要的鐵路的建設。[104] 顯然，沒有人想按他說的字面意思，不讓他瞭解情況，而他繼續不斷地作批示也證明他的下級的謹慎是有道理的。

12月的工作會議

在12月某時，毛身體不適，鄧小平建議他不必參加鄧本人認為是一次例行的有關社教運動的政治局工作會議，該會議由劉少奇主持。

這次會議將與新的全國人代會同時召開，日程是討論劉對社教運動問題的評價並起草適當檔來解決這些問題。[105]可以想像，鄧小平也是在考驗毛將事務交給劉少奇的意圖是否真誠。如果是這樣，那麼，毛的反常的行為很快就打破了他的同事們幻想，認為他會真地履行諾言。

12月15日會議開幕，劉作了報告，然後會議像往常一樣分成小組討論。毛在20日前似乎未出席會議，[106]可能是因為開政治局常委會。[107]該日，劉比毛遲到會兒，毛對他說，「你先講，你掛帥，你要不講，我們就休會了。」[108]毛又一次顯示是他讓劉先講話的，從而重申了他的領導作用。他對劉的不滿是在該日討論社教問題時因意見不一致而出現的。[109]。

據一位參加會議的高級人士說，這兩個人分歧的實質在於（a）主要問題，或社教運動矛盾的性質，（b）怎樣進行社教運動。[110]20日至28日一直在爭論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直至1月才嚴重地表現出來。[111]

劉少奇得到陶鑄的支持，堅持根據王光美的報告得出的看法，並在3個月前將這個看法寫進修改的《後十條》，我們還記得毛曾同意該報告，並贊成該政策。在該文件中，將原在毛的主持下制定的四清予以修改，原先只將四清與經濟犯罪聯繫在一起，現在將四清擴大為包括政治、經濟、思想和組織。對劉來說，鬥爭是四清與四不清的鬥爭，應予根除的不清的人包括三種人：以前的地主和富農；在土改時逃避劃定成份的地主與富農，和已變質為相當於地主、富農的前貧農和中農，他們在土改和合作化後成為幹部並進行了壓迫和剝削。劉認為如要平息農民的意見，這最後一種人必須吐出他們的非法所得。[112]

毛贊成縮小打擊的人數的一個理由是工作量太大。他認為這可能需要達到人口的20%，約1.4億人。因此，他說他自己在這個問題上是「右傾分子」，並規定，鬥爭後貼上壞分子標籤的家庭數不得超過10%，這本身就是一個讓步，因為正常的運動規定的份額只是5%。毛在1964年12月的立場十分類似他在1959年初因同樣原因而採取的立

場，當時在收繳瞞糧問題，他稱自己為「右傾分子」。[113] 主席對觸怒人口中大部分人總是很敏感的，特別是在農村中。

毛在反對劉的羅伯斯比爾式的正直時，甚至提出對侵吞公款的人也不要太嚴厲，反對在退賠時要嚴厲、徹底，並提出要他們盡快回到革命隊伍中來。他受到華北區第一書記李雪峰的支持，李在該年早些時候向毛訴說了對劉的政策的不滿，但未獲支持。這時，李爭辯說劉的強硬路線會大量減少貧農的數量，這當然也等於承認劉對農村情況的分析是正確的。

劉反對這意見，指出在許多案例中，涉及的數量不是像毛所說的幾十元，而是幾百，甚至幾千元，對此主席反駁說人們不能一次就將牙膏全擠出來，對毛這樣對口腔衛生的理解只是像農民一樣用茶漱口的人來說，這個比喻選得真怪。[114] 劉想要使毛明確，侵吞了多少百分比的公款的人應退賠，但沒有成功；毛甚至提議用國家的款項來賠償被剝削的人，以便犯錯誤的人得以解脫。[115]

面對正在興起的大規模鬥爭，毛可能退縮了，但他也有更深層次的思考。到這時，他已作出決定，如果要防止修正主義影響中國，必須淨化的應該是中國共產黨，而不是有盜竊行為的農民。這個月的早些時候，他心情沉重地談到形成了一個官僚主義者階級，這個階級正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116] 在 12 月 12 日的同一份批示中，他第一次明確地談到「走資本主義的領導人」。[117] 此刻，他在三處強調要集中注意四不清幹部中的黨員。[118] 以這個觀點看，農村社教運動的問題在於運動的對象即幹部中黨員相對較少。1964 年末，共有 18,011,000 名黨員，佔人口的 2.55%，但農村只有 10,563,000 名黨員，佔農村人口的 1.74%。在大躍進時期大量吸收新黨員（6,420,000 名）後，從 1961 年起當局幾乎凍結從這些往往是低質量的人中吸收黨員。毛憤怒地指出，這意味著在大隊和小隊二級中，黨員相對較少；25% 的小隊沒有黨員，2/3 的小隊長不是黨員。[119] 這又意味著，毛髮動的

社教運動作為一個工具，用以反對他現在認為的主要目標，在農村中不是一個好辦法。

討論到這時，監督城市五反運動的經委主任薄一波支持毛。薄很願意以黨員為目標，認為這就會將矛頭從「資產階級」工程師們身上挪開，這恰與3年前與薄有很大關係的《工業七十條》所宣揚的專家路線相符。[120]因此有了以下的對話：

薄一波：因此，目標應明確，我們必須集中力量整頓部、工廠和黨。如，在一個部裏，應先整頓黨組成員；在工廠裏，應先整頓黨委書記和廠長。必須將這一點規定清楚，否則，有權的幹部就滑掉了。

主席：先搞豺狼，後搞狐狸，這就抓到了問題。你不從當權派著手不行。

（財政部長）李先念：如果不先整頓掌權的人，最後就會整貧下中農。

主席：根本問題就在這裏。

薄一波：先打豺狼，後抓狐狸。[121]

薄和李似乎毫不猶豫地將豺狼打了；確實冶金工業部長王鶴壽就被免職了，他要對甘肅白銀廠的問題負責。[122]薄和李負責領域裏的黨員所佔比例遠比農林高：在工交系統中佔15.3%，在財貿系統佔17.3%。[123]可能他們認為可以清除一些多餘無用的人。

劉少奇也似乎感到必須平息主席的怒氣。他提出不追究有錯的農民，在幹部和農民共同侵吞國家錢財時，只要幹部退賠。在培養新幹部時，可以使用「勇敢分子」，劉的意思似乎指品質有問題，但有幹勁的人，因為毛歡迎這個想法，他回憶說遊民是他早期遊擊隊的主力。主席在一份說明他意圖的批語中，警告劉，如果他執著地尋找老實人，就會一事無成（「你專搞老實人，不會辦事」）。腐敗分子也可以當總理。[124]

但是，雖然劉在戰術上作了些讓步，但在實質上卻沒有後退。可能他因為毛在最近幾個月裏對他有所支持而變得膽大了。在一次認

真的討論中，劉堅持自己的意見，不讓主席主持這次討論。主席表示他希望社教運動的重點在黨身上，這對劉說來不是問題，這不會嚴重影響農村的社教運動，因為黨員肯定也是運動的目標。關於社教運動的基本矛盾，毛並沒有設法提出前後一致的理論，以便他的同事們遵循。會議結束時，這兩個人都同意在社教運動中不應有大量的處決。毛再次肯定劉當秦始皇，他自己是劉的副手。【125】

12 月 23 日，與會者再度開會對十六條文件草案作最後一次修改。這檔在表述上做了妥協，從而對毛作了部分讓步：關於運動性質的幾種提法，即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這是劉對運動性質的不同提法），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毛的提法），「後一種提法較適當，概括了問題的性質」。「重點是整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包括貪汙盜竊、投機倒把分子）。毛接受了該文件並同意發表。【126】但實際上，他所獲甚微。關於社教運動性質的不同提法顯然被認為是可以接受的，雖然毛的提法是各提法中最主要的；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攻擊也包括對貪污盜竊，這是劉一貫關心的事。如果毛的目的是通過攻擊黨內當權派來說明與修正主義鬥爭的極端重要性，那麼，他應該集中火力，瞄準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矛盾。這樣，毛後來的行為是可以解釋的：即他認為，或有人告訴他，他的勝利是花了重大代價的，而劉仍然能按他自己的意志來進行社教運動。這似乎使他發怒了，這一怒氣是在他 71 歲生日，即 12 月 26 日爆發的。

毛和他的同事們一直避免類似蘇聯為慶祝斯大林誕辰而舉行的奢侈的公共祝壽活動。1949 年斯大林誕辰日是一個重大的國際活動，毛和其他外國共產黨領導人都參加了，【127】而毛前一年是和 4 名當時已在北京的湖南籍老朋友和他們的子女一起慶祝自己生日的。【128】親密的戰友以贈詩來慶祝。【129】因此，毛 1964 年為相對說來並不重要的 71 歲生日，而在人民大會堂召集一些中央和大區黨的領導人、幾名部長，一些科學家和勞動模範參加宴會，很明顯是有政治意義的。【130】

毛請科學家和包括大寨大隊領導人陳永貴在內的勞動模範和他坐在一起，而將常委們和其他親密的同事們打發到另一桌去。在午餐桌上，他稱關於社教運動的幾種不正確提法（劉的提法）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攻擊在中央的「獨立王國」。這顯然是指鄧領導的書記處和李富春領導的計劃委員會；並說黨有產生修正主義的危險。這時，屋內鴉雀無聲。[131]

毛對陳永貴的禮遇明顯地不僅是故意冷落他的同事們。無疑，主席是知道大寨大隊要向社教工作隊證實所說的業績，絕非易事。[132] 在毛還沒有發出「農業學大寨」的號召時，他就以自己的威望來宣傳這個大隊的自力更生精神了。如果大寨所說的成績全屬子虛，那麼他和他的同事們就會招人恥笑。更為重要的是，樹立典型是毛和中國共產黨管理國家的一貫重要方法，而大寨就是一個光輝的例子。這種方法允許制定高指標，並證明它是可以達到的；對於那些想方設法將黨的意圖與當地情況相結合的下級官員來說，它提出藍圖（譯按：指樣板）以簡化他們的任務。總之，典型促進了一種發展模式，即由中央掀起運動，以及由此產生速度。如果全國的典型制度被毫無同情心的工作隊所摧毀，其結果就是一個個地方將有一個痛苦的、沒有英雄出現的而且是不革命的發展，這從60年代初責任制的發展就可以看出。這種前途是毛所不喜歡的，他以在生日宴會上特別禮遇陳永貴的方式來表示他反對那種前途。這方式使社教運動在大寨夭折。[133]

工作會議的第二天，他又進行了攻擊，讓陳伯達出面批判劉對社教運動的提法，但對提出這些提法的人未指名道姓。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這種概念是不恰當的，畢竟腐敗問題從皇朝時就已存在了。黨內外矛盾的交叉的提法也可以用於國民黨。陳問道，什麼是主要矛盾，「主席總結了每個人的觀點。主要矛盾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毛將這話的含義挑明瞭，「我們這個黨至少有兩派，一個社會主義派，一個資本主義派」。（著重號是我加的）[134] 據一份材料說，劉接受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說法，但認為將他們作為一派來提意

味著他們的人數比實際情況要多。他辯解說實踐會決定哪些是基本矛盾，不應該將它們全說成敵人與人民之間的矛盾，也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同一天，毛又收到了會議文件，這文件可能是爭論的結果，這次增加了第十七段不太重要的話，以使文字更準確。毛也批准了這文件。[135]

但劉始終不肯倒向毛的一邊，使毛採取了迄今最不同尋常的行動。12 月 28 日，他再次獨自長篇發言闡述對社教運動性質的看法，並重申他自 1962 年以來就堅持的路線，為自己的立場辯護。在結束時，他揮動著黨章和憲法冊子，說作為一個公民和黨員，他有權在黨的會議上講話。他指責一名未點名的同事（顯然指鄧）想要剝奪他參加會議的權利，另一個（顯然指劉）想要剝奪他發表意見的權利。[136] 他這一嚴厲的話使人想起他 1959 年在廬山會議上發出的威脅，如果人民解放軍在他反彭德懷元帥的鬥爭中不支持他，他就組織一支新的軍隊。[137] 在這兩次，他都強調問題對他說來是重要的，在 1964 年這一次，他含蓄地表示如果不服從他，他就要採取斷然措施。後來證明，這時他在為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指責他的同事們（特別是鄧小平）不重視他打下基礎。[138]

但與 1959 年不同的是，毛這次發火似乎毫無道理或毫無效果，因為就在當天，即 28 日，彭真正式下令印刷毛在 27 日同意的十七條，作為 1964 年第 811 號中央文件分發下去。工作會議準備休會，也可能正式休會了。[139] 要麼毛已得到了他想要的文件，要麼他的嚴詞譴責未被人重視。[140]

後來，在 30 日的「小型會議」上，[141] 毛突然提出對十七條的修正，這些修正是陳伯達建議的，目的是加強有關當權派的段落。新的提法詳細闡述有些當權派在幕前，有的在幕後，在幕後的人中，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毛表示，如果「少奇同志」和書記處同意這新的提法，就應分發。

初看上去，這一作法似乎證明毛在28日的憤怒並未起作用，會議通過的文件沒有考慮他的反對意見。但劉的反應說明不考慮主席的意見是不可能的，即令他違反了中央的標準操作程式。第二天，即12月31日，在劉的同意下，辦公廳下發了第814號中央文件，取消了第811號文件並予以銷毀，根據是中央仍在修改文件過程中。[142]毛很容易就得以按自己的意圖行事，說明他對28日頒發的文件曾經是滿意的，但後來在接受了陳伯達的意見，認為該文件應該寫得更明確些。我們從以後在1965年姚文元批吳晗的論戰中也可以看出，毛在準備文件的過程中，即令是那些推行他的主張的文件，也遠不是毫無過錯的。[143]另一個動機可能只是為了顯示他的權威，以恫嚇他的同事們，如果是這樣，那麼，他是如願以償了。

此後，毛似乎從劉那裏取得了對事務的控制權，[144]劉可能作了自我批評。[145]以後可能舉行了一系列由主席召集的游擊式的特別會議，而不是正式的工作會議。[146]毛很滿意他對主要矛盾的提法得以佔主導地位，他下一步關心的事就是改變社教運動的做法，停止他在幾個月前還同意的人海戰術。在1月3日的會議上，也就是人民代表大會正式批准劉再度當選為國家主席那一天，毛嘲笑對一個28萬人的縣竟派出了共有1.8萬人的工作隊，而且在出發前還花了6個星期學習有關文件的作法。他甚至批評了陳伯達在天津也採用了類似的作法；陳及時地又向毛表達了他的忠誠。毛這時所宣傳的、經過改進的社教運動完全針對著黨，而「小偷小摸」，就赦免了。確實，四清可以推延到下一個階段，即只有當群眾要求四清時才進行。[147]14日，正當他準備頒布社教運動的最後一份文件（即二十三條）時，他對前些時候的一份文件表現了不滿。在《前十條》頒布了才3個月後，有什麼必要在1963年9月頒布《後十條》呢？在這麼短的時間內，黨能夠積累多少經驗，值得這樣快就去修改呢？這使他批評了北京的「獨立王國」，即在鄧小平領導下的黨的書記處（應對《後十條》負責）和李富春領導的計委（應對起草將於1966年開始的第三個五年計劃負責）。[148]這時，

毛決定原負責三線的「全國經濟最高司令部」(譯按：未查到原名，現根據英文譯出)的官員們應起計委的作用——在官場裏被稱為「小計委」——直接向周總理負責，而不向負責經濟政策的副總理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負責。[149] 由於李富春和李先念都是書記處的成員，這意味著鄧失去了對經濟政策的有效控制。

《二十三條》

為符合毛偏好簡短的要求，由彭真起草的《二十三條》，雖然條文多，但比社教運動前幾個綱領性文件要短得多。[150] 然而中央在文件開始時的指示說明這文件比其他文件重要：如果《二十三條》與任何以前有關社教運動檔有牴觸的，「一律以這個文件為準。」[151]

然而，對不熟悉「立法的歷史」[152](也就是工作會議討論時的細節)的下級幹部來說，這文件似乎有許多重複。階級鬥爭仍然尖銳。階級敵人正企圖用「和平演變」的方式復辟資本主義。有些社、隊和企業的領導受到「腐蝕，或者被篡奪」(第一條)。毛在 1964 年 6 月制定的評價社教運動的六條標準全部收在修正的《後十條》內，在《二十三條》中又予以重複(第四條，一個新的條文)，要團結的幹部與人民仍為 95%(第一條)。仍規定了要批評犯錯誤的少數人，以便在他們「洗手洗澡」以後再次團結他們；但在當地領導權已被階級異己分子把持的地方，錯誤性質嚴重，仍應像以前一樣予以奪權(第九條，一個新的條文)。仍應大膽動員廣大群眾(第三條)。現場調查或「蹲點」仍是幹部瞭解新地區問題的方法(第七條)。

即令那些不瞭解黨的內部會議情況的人也可以看出這幾份檔的根本不同之處，因為根據上一份文件頒發後所取得的經驗作了調整。對運動的性質是按毛在工作會議上堅持的提法定性的，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而不是四清與四不清之間的矛盾(第二條)。然而，運動正式被定名為四清，而不是社教；給城市運動所起的單獨的五反名稱不用了，而用單一的，包含一切的四清；四清被重新解釋為

包括政治、經濟、思想和組織，不僅僅是各領域裏的經濟廉明，這是吸收了王光美的桃園經驗裏的提法（第三條）。

一般的工作隊隊長應在作法上可能只需要有三點改變。第一是禁止搞「人海戰術」。然而這一條也規定「要適當集中力量，打殲滅戰」（第六條，這是一個新的條文）。隊長們如何區分這兩種做法？第二個改變是堅持工作隊要公開，不要秘密地工作，「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第五條）——這顯然是對王光美喜歡隱姓埋名地工作的批評。[153] 第三，減輕，甚至免去對白吃白拿的幹部的經濟處罰（第九條）。

在文化大革命後的分析中，這些措施旨在限制劉修正的《後十條》中的過度極左，這樣的努力被認為是有理由的；當時，彭真就利用《二十三條》減輕了左派對北京大學校長的壓力。[154] 但《二十三條》中有一段在後毛時代招到了官方尖銳的批判，因為這一段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清洗黨的高層的經典根據，狂暴的紅衛兵以這段話作為根據：

> 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進一步地鞏固和發展城鄉社會主義的陣地。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後的。支持這些當權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上面的，有在社、區、縣、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門工作的一些反對搞社會主義的人。[155]（著重點是我加的）

本來這些批判的段落是加在前面的一條上的，只指中央，但周恩來增加了「部門」這個詞，以削弱這幾段的力量。[156]

《二十三條》的影響

這一致命段落的含義可能未被基層社教運動工作隊長注意。他們已經知道，如果黨員不乾淨，就必須受到與其他幹部一樣的對待。此外，最初，《二十三條》似乎並沒有這樣大的影響。它是在 1965 年 1 月 14 日頒發的。各省委可能在幾日內傳達下去。[157] 然而，二三個星

期後，新的工作隊仍然不顧新的規定，繼續採取王光美在桃園的偷偷摸摸的工作辦法，雖然他們應該知道這些修改過的規定：

> 在 1965 年 2 月初的寒冷冬天，由 13 名幹部組成的工作小隊進了陳村。他們宣佈他們是四清工作隊，來大隊蹲點。自從土改以來，外來幹部來接管全村事務，這是第一次。
>
> 農民們不久就知道這個幹部工作隊只是駐在公社所在地的更大的工作隊的一部分……但村裏沒有人知道這 13 名幹部是誰，他們從哪裏來，或他們以前的職務是什麼。村民們是不應該知道這些的，他們被告知「不該問的事，就不要問，不該看的事，就不要看，不該聽的事，就不要聽」。[158]

隱姓埋名是為了給人以「工作隊不是由犯錯誤的人組成的，而是由共產黨的優秀代表組成的」印象。隱姓埋名有個好處，能使工作隊員們工作時團結一致；它還使隊員們不受謠言困擾，因為他們往往是來自其他單位的。[159]

全國工作隊的所作所為情況並未編輯成書，也可能編輯了，但未發表。這些情況原可以用作對《二十三條》對社教運動的影響作一全面的評估的。可能在各工作隊之間，甚至在工作隊內部，反應也是各式各樣的。有些官員可以因為不再需要強制執行那麼野蠻的政策而鬆了一口氣；其他人則可能對自己因社教運動所掌握的權力而沾沾自喜，繼續進行壓迫。在山東的一個大隊裏，來自北京的知識分子正沉浸於他們對當地幹部行使的職權，因此是他們的「老師」，社教運動工作隊隊長拒絕按《二十三條》改變作風；但（當地）幹部們知道風向已變了，與工作隊對抗，工作組最終撤走了。[160] 這份材料與毛的醫生李志綏的感受是一致的，對 1965 年中江西農村的貧困狀態感到吃驚，而且認為浪費這麼多的錢派成千上萬名並不心甘情願的城裏人去「清理」在這種（貧困）狀態下的幹部是愚蠢的。

> 有腐敗，這是不可否認的。但在像這樣一級的貧困隊，集中精力搞腐敗是荒唐的。我們的社教工作隊無法查賬，因為無

賬可查。負責記賬的農民只認識少數字，不知道怎樣記賬。也的確無賬可記。小隊這麼窮，村民在一起住，一起工作，每個人對別人的一切都知道得清清楚楚。[161]（據英文譯出）

不論荒唐不荒唐，社教運動在繼續進行。到它在 1966 年 12 月 15 日為文化大革命所取代時，運動在全國三分之一的縣都已結束了。在城市裏，北京和上海的社教運動已「基本」結束了。對薄一波來說，幸運的是他管轄下的工交系統不到 4% 的單位開展了這一有破壞性的運動。[162] 全國有近 200 萬幹部參加了社教運動。[163] 但一年前，毛已對社教運動沒有興趣了，認為它不能完成他改造黨這個基本目的。[164]

第十九章 毛以退為進

> 「您終於決定劉必須走是在什麼時候呢?」在 1970 年 12 月我們的交談中,我問他。他答道,作決定的時刻是 1965 年 1 月。……〔二十三條〕的關鍵首要之點便是特別明確地譴責、並要撤掉「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現在也成為這新運動、文化革命的首要之點。毛說,劉在會上極力反對的正是這一點。「那末作出發動文化革命的決定……便是在 1965 年 1 月吧?」主席說,在 1965 年 10 月之後,對《海瑞罷官》進行嚴厲譴責批判後,事情便迅速展開了。[1]

斯諾報告中關於主席決心清洗劉少奇的這一簡短敘述,成了中國歷史學家們力求確定兩位領導人分裂日期的權威性論據。[2] 有些劉的傳記作者認同了毛的斷言:他的副手反對「走資派」的提法[3];然而曾任毛秘書的黨史學家胡喬木卻說,劉並未直接反對這種提法,但只談到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的重疊而已[4]。

劉是否曾直接反對毛是無關緊要的,重要的是主席心裏怎麼想,同樣重要的是 1965 年 1 月他採取措施,令人們相信他的猜想,並使得他的同事們牢牢記住這一點。

如我們所知,毛即將在年終工作會議上挑起「狂飆運動」。他以戲劇性的憤慨情緒,清楚地告訴別人:他是指責劉和鄧小平妄圖以不讓他參加會議,來妨礙他在中央委員會裏和修正主義作鬥爭。他的表演效果很好,致使薄一波在將近二十年後回憶時,尚有明顯惶恐之感。毫無疑義與會者每個人均同樣印象深刻。出席者無疑都猜到一定發生了「什麼事」——某些人越過了界——雖然「為什麼」卻是令人費解的。

如前一章所論證，倘若赫魯曉夫的倒臺是樁突然事件，已在毛心中敲響了警鐘的話，那末毛只是在欺騙斯諾。他在 1965 年 1 月之前幾個月即已決心要從身邊清除掉劉，而他說出這個日期，只是因為可使人相信：他僅是對劉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難以接受的行為作出反應，而非因擔憂他自身的未來而挑起衝突的。在年終工作會議上，他向同事們辯解，對劉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行為，爲什麼自己突然從強烈贊同，改變為尖銳的敵視。他正開始為劉羅織罪名。毛很走運，因劉的很多多年盟友對「修訂的後十條」的極端主義性質，均心存疑慮，因此當毛提出修訂的時候他們表示贊同。[5]

毛批評劉，或與之意見相左，這並非第一次。他曾攻擊他（指劉——譯注）在 1947-1948 年的土改中，犯了「左傾主義」；在 1949 年拉攏資本家和 1951 年在集體化上犯了「右傾主義」[6]。對 1957 年整風運動的方式，他們間也曾發生爭執。[7] 可以證明這不是第一次想除掉他[8]（指劉——譯注）。不過這是第一次，主席親自扮演一個積極帶頭角色，陰謀清洗掉一位高級同僚。他明顯感到：對中國意識形態上的威脅與對他本人政治上的威脅結合在一起了，這都要求他採取決定性的行動。[9]

毛的謹慎

即使人們認定，主席所肯定的他決心除掉劉少奇的日期，大致是準確的：人們仍面對一個大的困惑：為何毛花了至少 20 個月——從 1965 年 1 月到 1968 年 8 月的十一中全會——才貶黜他（劉），而這只是他全面倒臺的第一步？在 1965 年 1 月，毛明知，他決定性地幹預黨的決策的能力並未減弱。在 1965 年 5 月，當主席對他早年井岡山軍事根據地，作一種懷舊式的象徵性訪問[10]，重鼓他的革命熱情時，他心知，美國無意把越南戰爭擴大到中國[11]；他可以造成國內大混亂，不擔心外來攻擊。1966-1967 年的大混亂證明，他可以輕而易舉地擊倒那

些中國共產黨的大人物。為何他要等待呢？他又為什麼要隱秘地行進，而不和劉少奇直接對抗呢？

可以提出四條相互交叉的假設。首先，毛對打敗劉後就能貶黜他，可能沒把握。早在毛 1943 年成為主席和無可爭辯的領袖以前，像劉、周恩來、陳雲、彭真和一些元帥，即曾各自獨立地樹立了聲譽並有追隨者；這個事實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淡化，因為毛就好像天神一樣牢牢控制了中國共產黨。如我們所見，劉通常總順從毛；但劉不是毛樹起來的人，可任意由他擺弄。劉樹立起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黨的組織者和勞工運動能手的地位，比毛登上主席寶座早得多；而且正是這些能力，使得他在在 40 年代初毛鞏固其領導地位時，成為毛至關緊要的盟友。[12] 從 1945 年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大會以來，劉一直在黨的領導集團中排行第二；1953 年的高崗插曲已證實，要想取代他是多麼困難；1958 年周恩來受到羞辱表明，在接班問題上，劉已沒明顯的競爭對手了，而這只可能加重毛對他的焦慮。[13] 在 1961 年，全部黨的高級官員可能均已知曉：毛曾告訴蒙哥馬利元帥，劉是他的指定接班人。[14] 從 1959 年起，五一節和國慶節，官方報紙均在頭版並排刊登兩位主席同樣大的照片。[15] 1961 年在為幹部準備的學習資料中，除摘引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的話之外，也摘引了劉的話。在 1963 年 9 月發表的第二篇反蘇論戰文(「論斯大林問題」)中，在「以毛澤東同志和劉少奇同志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一詞中，是毛親自加上劉少奇的名字；而在 1964 年 7 月的第九篇論戰文中，在康生的監督下，在較早的草案中可能也作了相似陳述。[16] 迄至 1965 年，劉「主席」已管理國家日常事務數年，高級同事也習慣於他的領導了。即使這次年終工作會議之後，也還是讓他負責。[17] 1965 年 9 月朱德曾建議，萬一戰爭爆發，應是劉而非毛來作三軍統帥。[18]

其次，劉曾監督黨的機器，其中高層佈滿了他的支持者。主席作為一位謹慎的遊擊戰士，不會忽視這種可能性：用單薄的藉口向劉發動正面衝擊，或許會使全黨團結起來反對他，尤其是因為(如果他的疑

慮是正確的話），他可能已經不再享有總書記鄧小平對他的忠誠了。[19]要瞭解為什麼，就有必要回顧一下毛是如何建立他對政府和軍隊官僚機構的統治的。

毛控制國務院

毛的同事們從來沒有絲毫地掣肘或反對過他。1949 年之後，對於三個最重要的中央機構其中的兩個，主席都曾教訓過它們的領導人。1958 年 1 月，他曾直接批評國務院的領導人，因為他們早期反對他們所稱的「盲目冒進」，而他則稱之為躍進[20]；從此以後國務院就變得不再是首創者，而倒是在中央書記處的領導下的政策執行者了。[21]

周恩來作為國務院總理，對於毛的路線從來不加反對地執行，無論毛的風嚮往哪裏吹，無論是左傾還是右傾，他隨時跟從。[22]他對他的秘書們規定了兩條指令，如果突發國際或國內危機，即使他睡著了，也應即刻通知他；同樣地，如果主席要他，不論什麼時刻，應當即刻召喚他。[23]他總是聽候毛的召喚。毛有任何不滿，他總是第一時間做出反應，尤其是 1958 年受到攻擊之後。當年，因為反對「冒進」，他用了整整十天，準備了一份卑躬屈膝的自我批評，在八大第二次會議上宣讀。[24]1959 年廬山會議上，他將彭德懷的「意見書」擱置一旁，直到毛譴責了它，周這才也決定，將其作為一個政治問題。[25]1965 年在聽到毛的抱怨後，他也是反應迅速，甚至有些小題大做。在年終工作會議上，毛聲稱周的私人辦公室太大，可能是因為總理的秘書比他多得多，感到不高興。周立刻解散了秘書們。[26]獨立的人格不一定就有獨立的態度。[27]

陳雲亦是如此。他在毛主義領導（確立）前，表現具有相當獨立觀點；在延安曾是舉足輕重人物；作為國務院資深副總理，50 年代前半期，在經濟政策制定中起過重大作用。但是 1958 年毛攻擊國務院計劃工作者之後，他的行為也受到很大影響。此後，不論何時，當陳看到

毛的左傾勁頭很堅決時，便選擇「謹慎勝於魯莽」的信條，乾脆隱退了事。如他在 1958 年的大躍進期間和 1959 年的廬山會議以後那樣。[28] 他小心翼翼地辭謝了毛要他在七千人幹部大會上申述觀點的邀請，而當年末的十中全會後，他乾脆進入休眠狀態，直至 14 年後毛逝世。[29] 這期間他唯一的政治活動，便是 1965 年 6 月 18 日主動作了一次補充自我批評。鑒於毛的行為，尤其是他向外國共產黨領導人所作關於反修正主義鬥爭的評述，陳向主席寫信，責備自己完全低估了中國經濟可能從大躍進後不景氣中恢復的速度；也責備自己錯誤地主張在農村實行責任制。[30] 幾乎可以肯定，陳的謹慎使得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免於成為重要目標。[31]

1958 年國務院其他經濟部長們也都作了自我批評，此後肯定也同周和陳一樣，不願向主席挑戰。另一位聲譽很高的副總理是外交部長陳毅元帥。他為人有膽量，直言不諱。他公開承認直到七千人幹部大會後，他在發表對知識分子政策的意見方面，受到過壓抑。[32]

毛對國務院的成功脅迫，得益於人民解放軍元帥們無聲的支持，和黨官員們積極的支援。確實，有證據表明：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毛不得不阻止劉少奇進一步地羞辱周和其部長同僚們。[33] 劉在那次會上的報告，以及部長們的自我批評，使得接受周的辭呈、以及可能撤去其他人的職，都變得理所當然。

忠誠的人民解放軍

1958 年重申了黨的領導(地位)[34]，1959 年廬山會議之後，由毛的親信林彪取代彭德懷，擔任負責黨中央軍事委員會日常工作的元帥；這樣到 50 年代末，人民解放軍也只得俯首聽命了。在廬山毛的成功有賴於諸多因素，軍隊中的宗派主義[35]；像劉少奇這樣的黨的官員認為一位元帥在地位上不應超過他們；以及當毛把他與彭的分歧上綱上線，只能二者選一的時候，高級將領們對他們戰無不勝的統帥的基本忠誠。[36]

從此以後，林彪便保證：人民解放軍的形象應當就是毛所要求的那樣：即這支隊伍應是完全忠誠的「紅色」隊伍；努力保持主席所衷愛的遊擊傳統，特別是人比武器重要的教導，擁護新國防部長 1960 年所說的觀點:「政治是解放軍的生命線，以及各種工作的根本保證」。[37] 1962 年羅瑞卿總參謀長和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肖華，遵從毛的訓示，領導高級軍官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38]

但是林彪還有一個更好的觀念(至少毛一定是這樣認為的)。在 1960 年的一次高級將領會上，他提出了他的「頂峰論」:「當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什麼？那便是我們毛主席的思想。它是今日世界的最高峰；它是當代思想的頂峰。」[39] 建立在這一概念之上，林以後提倡從主席著作中學習語錄，以便能夠背誦。[40] 但是一般列兵或甚至軍官怎樣知道應背誦什麼樣的語錄呢？答案便是 1964 年 5 月出版的所謂「小紅書」，載錄主席的簡短語錄；這一方案是由林彪於 1961 年 8 月向毛提出，註定它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要成為紅衛兵們的聖經。[41] 但是在此時，當毛把(對)他的個人崇拜視作是一件政治鬥爭的武器時[42]，將他的著作這樣提煉起到了強調他的選集是他個人的著作的作用，但削弱了更準確的概念，即毛澤東思想彙集了中國共產黨高級領導人的集體智慧。[43]

毛的語錄被灌輸到士兵中，激勵他們爭作雷鋒式的「五好戰士」:政治好、軍訓好、作風好、完成任務好、體育鍛煉好。新兵均要被灌輸林彪的「四個第一」(毛稱之為「偉大的創造」):[44] 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在林主持下，迅速增加了連黨委會和政治指導員的數目。1963 年做出一個決定，將政治委員的職責擴大到包括純軍事職能在內，而純軍事職能迄今為止均屬單位指揮員的權力，從而大大提高了政治委員的地位。兩年後人民解放軍的軍階、軍銜、徽章均取銷了；官兵均只簡單稱謂「司令員」和戰鬥員，人民解放軍精心製作的蘇式軍裝均拋棄了，代之以軍帽上的紅

星和衣領的紅領章。[45] 人民解放軍外表上回復到毛所喜好的簡樸的延安風氣。

林彪成功地突顯出人民解放軍的無私平等形象。結果是作出了一個非常特殊的決定，使人民解放軍成為國家的楷模，之所以非常特殊，因為在一個共產黨國家，模範單位當然應該是共產黨。不過 1964 年 2 月號召全國「向人民解放軍學習」的正是黨報《人民日報》，根據是「解放軍熱愛國家、熱愛人民、熱愛社會主義，對無產階級的事業無限忠誠……他們大公無私，為公忘私，專門利人，毫不利己，甚至把自己的青春和自己的生命貢獻給社會主義」。[46]

第一個以人民解放軍為楷模建立起來的單位是大慶油田；它宣稱它在學習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經驗之後，已經克服了大量問題。這事倒反過來激起了其他工業企業的興趣，引人注目的是水利電力部、冶金工業部和化工部。負責工業和交通[47] 系統的薄一波向毛報告了這情況。1963 年 12 月 16 日主席寫了一張條子給林彪和其他軍隊高級人物，鼓勵他們擴大這種作法。[48]

向人民解放軍學習已超越只學習文件，雖然這是正常的學習起點。在工交機構單位，由於主席干預的結果，創建了更多黨支部和政治部門。人民解放軍官員任副職作顧問，而文職幹部則去人民解放軍單位進修政治課。這種制度於 1964 年 3 月召開其第一次政治工作會議，會上薄報告了毛指示的重大歷史意義，並就指示的實施提出了計劃草案。在中央書記處將它作為一個討論草案發佈後，於 1965 年 5 月公佈了最後文件。[49] 這樣，文職領導人於 60 年代中期，幫助突出了人民解放軍的政治作用，而這種突出政治的作法預示著在文化大革命中人民解放軍的地位會得到提高，而林將取代劉少奇作為毛的法定接班人。

黨的地位

林彪的忠誠和周恩來的順從意味著毛可以放心，中央軍委和國務院都不會違逆他的願望——如果他們理解他的願望是什麼的話。可能林和周在做任何重大決策之前都會徵求主席的意見或者確認他的觀點。但對於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毛沒有這麼放心，儘管事實上他們也很小心，向主席請示彙報，讓他有機會提出建議或者提出贊成。但是毛沒有威脅黨的機關的高層官員，就好像他 1958 年威脅政府、1959 年威脅解放軍一樣；實際上，在向那兩個機構的官員發動運動時，黨的支持是至關重要的。在 1957 年的整風運動中，有一次他想讓黨公開接受批評，但被迫迅速收回，主要是因為他們強烈怨恨和反對。[50]他不能輕易地再發動一次整風運動，去清洗當的高層黨內同事。

毛必須採取迂迴方式對付劉的第三個原因是必須師出有名。即便是斯大林也不得不做個樣子公審，為他的清洗正名。黨內鬥爭要遵守正確的原則，就此點而言中共比蘇共更堅持，至少在表面上。[51]毛不能簡單地說一句「砍掉他們的頭」就行了，這樣他將難以維持一個公平正直的形象，僅僅在一線同事們走偏方向的時候才干預進來。如果法定繼承人被罷黜，必須有原因和合乎情理的程式。

第四，如文化大革命即將表明的，毛正摸索更新領導層的某種形式，它就涵蓋對一代接班人的革命鍾煉。一次簡單的清洗，即令假設他能執行的話，將達不到那個目的。1965 年初，毛進退兩難的處境便是：不首先採用人們熟悉的黨內鬥爭的手段排除障礙的話，他就不可能展開史無前例的運動，實現革命的更新（我們設想他對什麼是革命的更新，已有了清晰的想法）。而只要他的同僚們嗅出一點主席想幹的是什麼，他們最終便可能結成一夥，來反對他。

毛又不可能靠耍手段，挑撥他的最高級同僚們相互傾軋。如 10 年前高崗事件已表明的那樣，若某位政治局成員要遊說他的同僚來反劉，很可能有一位或更多人來向主席報告這種事，便會迫使他要表明態度了。[52]同樣地，毛也不可能利用黨的機構來達到他的目的，因為

那樣，更多的群體便會立即清楚瞭解他的圖謀了。[53] 確實，只有首先削弱劉控制的黨機器這一堡壘，而後開始向他衝擊，才能確保成功。

在這樣的情況下，毛不得不放棄他作為黨主席所擁有的道德上的優勢，而屈尊採取他自己一直警告同事們要反對的秘密謀劃的方式。他轉而依靠那些左傾主義者，他們的忠誠首先表現在對他個人的忠誠。他們在黨內佔有一席之地也好，還是在黨外活動的非正規軍也好，[54] 主席相信他們會忠實地執行自己的謀劃，因為他知道這些人希望通過執行任務獲得政治上的晉升。但即使是這樣，他也不能把他們成批召集起來；[55] 他的秘書田家英將很快意識到有什麼事正在運籌中。[56] 自從 1962 年時間之後他已經不再信任田。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只能概括地表達他的觀點，然後指望他的親信——林彪，陳伯達，康生——可以從中推斷出他的意圖，興風作浪，不過希望他們比高崗更謹慎一點。[57] 但是，就好像高崗事件一樣，毛必須先煽風點火。至於他的代理人的角色，他挑選了一個和他最親近，但對他又比別人更依賴的人：江青。

秘密的代理人

在她政治生涯的發軔期，江青慣常把自己描述為「只是普通一兵，是主席巡邏在思想戰線上的一個哨兵。我觀察瞭望，並把發現的情況向主席報告」[58]。毛的「哨兵」表現得非常謙虛。如我們所見，她曾干擾負責使文化革命化的彭真的五人小組，不過儘管她這時有了發表談話的資格，也不過是隻言片語而已。即使在家裏，她日益只作個配角兒，以青春少女的姿態出入毛的臥室而已；而她心裏感受到這點，或許更加重了她的多疑症。事實上，毛的醫生推測，主席在 60 年代中期可能就鼓勵江青投入京劇改革，原因是當時他對新情人張玉鳳的迷戀與日俱增，毛想以此分散江的注意力。[59] 即使是那樣，不過到 1965 年初，毛確實想到一個新計劃，讓江青終於可以在其中扮演她久已渴望的明星角色了。

她的秘密使命便是去組織對一位黨的傑出知識分子的攻擊，這個任務註定會讓她的腎上腺活躍起來。另外，這不是一般的知識分子，而是她久已懷疑的一位，北京市黨機關中的高級人物副市長吳晗，京劇《海瑞罷官》的作者。據一份材料說，江青早在 1962 年 7 月曾看過那部戲，並曾遊說中央宣傳部和文化部予以批判，但未得逞[60]；毛對她的憤怒也未作反應；按某些材料說，最終是康生引發了毛對該劇的興趣，認為可作為批判的對象，並縱容江青去批判[61]。

1964 年下半年，江青曾試圖讓北京文學批評家李希凡（北方知名的意識形態「金掃帚」）去攻擊它，但他拒絕了[62]。李以 10 年前的屠龍活動，而贏得這樣左傾的綽號。[63] 他也許是顧慮如果他批判了一位與當地黨的頭目彭真交情甚篤的副市長，他可能會出現政治問題。這便是為何毛後來說，彭領導下的北京，是一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地方的一條理由。[64]

於是 1965 年 2 月，江青去訪問了她在上海的左派朋友。她兩年前經由柯慶施在上海遇到張春橋[65]；她便和張共同招幕到南方的「金掃帚」姚文元來寫爭論文章。在柯慶施於 1965 年 4 月死後，張成了江青在上海的主要盟友。[66] 張便保證姚文元在高度保密的情況下苦幹了 8 個月[67]，此期間，他的文章經過了無數稿。

陰謀展現

根據他們個人後來的（交待）材料，現在清楚了：雖然江青早已力謀攻擊《海瑞罷官》，但直到毛給她許可（他的說法是提出建議），這樁事才得認真地進行起來。[68] 毛的綠燈對分析這個事件的動機是至關重要的。正如我們所知，當該劇 4 年前首演時，毛曾予以表揚，其後還向吳晗轉達敬意。顯然主席把吳的劇看作是對他要求宣傳海瑞的正當響應。那麼為何到 1965 年他又變卦了呢？

那倒不是因為他突然發現，那劇是為彭德懷辯護的偽裝。早在 1964 年康生即曾提出這樣建議，但或者毛未同意，或者沒在意它。[69]

直到 1965 年 12 月，毛才對陳伯達和其他意識形態策士們講，該劇的要害是：皇帝罷了海瑞的官，這是影射彭德懷的罷黜：「彭德懷是海瑞」。他說這話是爲瞭解釋，為什麼姚的批判文章雖在很多方面是好的，但未擊中要害。[70] 應當記住，吳晗原本曾打算給他的劇本提名《海瑞退田》的，且實際上，徵用農民(的田地)原是該劇的始初焦點，因之也是姚集中批判所在。只是到後來的一次上演中，吳晗接受了一位朋友的建議，才採用了現在這劇名，毛現在發覺它太挑釁了。主席未曾向他的追隨者們透露的是：未能抓住劇名，既是姚的錯，他也難逃其責，因為在發表前他曾三次看過批判文章，顯然並未通過江青向作者指明這點。

為什麼毛在姚撰寫的過程中，對這一點保持沉默呢？如果毛運動的唯一目標是指向吳晗，且其主要理由是所謂的吳晗對彭德懷的支持，那末這個問題應一定會成為姚文章的中心主題了。另一方面，如果目的是通過吳晗，搞到彭真身上，那末也許毛會讓姚在一個較次要的問題上發起這場運動，以保留較嚴重問題作為下次攻擊的藉口。或者，毛是否可能根本就忘記了海瑞(與彭)的那種聯繫，直到姚文章發表後，經康生提醒，才想起它的聯繫？而在準備這文章時，康生本人並沒有意識到。[71] 不論是哪種解釋，彭德懷問題顯然只是一個工具，目的是指向更大的謀劃，而非僅是對吳晗表示憤恨的理由而已。

彭德懷假釋

在姚批判文章的漫長醞釀期中，毛採取了一個步驟用以暗示，他認為彭德懷事件已經過去了。9 月 11 日彭應召，從他被軟禁的北京郊區家裏[72]，來到人民大會堂。在那兒，彭真對他說，毛澤東和中央想派他到「三線」去，在李井泉手下任副司令。在討論過程中，彭德懷提出了許多反對意見，同時宣稱他願幹黨決定的任何工作。[73] 9 月 24 日，彭德懷給毛寫信，表示他寧願到基層去工作；不過也同意去西南；他請求會見毛、劉、周、鄧。翌日，毛，稍後劉、鄧和彭真也來

了[74]，在中南海頤年堂極其親切熱情地接待了彭德懷：「我沒有去睡，等了你好久啦。我昨天下午收到你的信，興奮得睡不著。你真是個強人。你有幾年沒給我寫信；但是你一提起筆來，便給我寫了封八萬言書。」[75] 5 個小時之久，包括用了一頓飯，毛和彭德懷回憶了他們共同進行過的幾乎全部的政治和軍事鬥爭，並向他（彭德懷）灌輸他新任務的重要意義。他甚至說了歷史會說明 1959 年在廬山誰是對的。[76] 最終彭被說動了，接受了任務。他於 11 月 30 日到達設在成都的「三線」總部。[77]

派彭德懷去西南，遠不是原諒一位沙場老將，給他一個合適的工作那麼簡單，而是有政治含義的。無論毛是不是有意為之，他改變對彭的態度，可能是爲了讓他的同事們放鬆警惕。主席不再是 1959-1962 年間那個報復心強的政客，而是延安圓桌會議上嚴厲但骨子裏慈祥的老人，他承認這位共事時間最久的戰友之一對革命所作的貢獻，以謀求團結。或許 1949 年底他對劉和鄧大發雷霆，不過是一時衝動，並非暴風雨前的先兆。

此外，在對黨發動全面攻擊的前夕，對毛來說確保彭遠離戰場是穩妥的。因為畢竟在近年來彭是唯一敢於站出來和他抗辯的資深政治局委員，是一位軍隊英雄，他（彭）的罷官和持續受打壓已在黨內引發相當的不安。萬一毛的謀劃出了差池，或激起意外抵抗，可以想像反對方肯定會以彭德懷為理由召集。確實，當毛在 1959 年廬山會議上說很多黨員擔心，如果他死在這位元帥之前，後者會是無法管束的；這表示毛是瞭解彭在群眾中的威信和潛在的威力的。[78] 在國內政治危機的時刻，毛希望防範任何可能來自彭德懷的危險；這種設想從下述事實進一步證明：主席在同時命令急忙將廬山（會議）時任人民解放軍參謀長的黃克誠將軍發配出北京：黃是與彭德懷一塊兒被免的。[79]

3 不過表面看來，元帥和將軍這時都得到了寬恕，或至少是假釋，且毛也開始談論歷史將證明他們間的分歧誰對誰錯。在這種情況下，要精心策劃一場陰謀對付一個純粹的知識份子，是不合邏輯的，何況

就算指控他和彭站在一邊，那也是四年前的事，而四年前毛對這部戲的評價是完全相反的。

既然毛對撰寫過程密切關注，則反吳晗的陰謀不可能僅看作是江青出的怪招。他後來關於北京黨機器水潑不進的斥責證實，主席完全明白：對吳晗的攻擊必然會被人理解為對北京機關的攻擊（吳便是成員之一），因之也是對其第一書記彭真的攻擊。毛不可能輕易核准一項陰謀，利用姚文元作為打手，反對中央書記處的二號人物、政治局中最有權力和資深的委員之一，僅僅是爲了將江青的注意力從他的情人身上引開。那麼究竟是爲什麼？

威嚇反對的人

最合情理的解釋是，在毛的心目中，除掉彭真是除掉劉少奇，和對整個最高領導層進行革命性的更新換代的重要前提。首先，毛必須在北京有一個堅實基地；他不可能在上海操縱一個後來成為文化大革命的運動，尤其在 1965 年 4 月他的忠實盟友柯慶施死去後。主席心裏明白，彭真是他私下定作敵手的那批人的重要保險栓。雖然形式上劉和鄧是更為資格老，權力大，但是經過書記處執行他們決定的，卻正是身為執行書記的彭真；由他去首先接近彭德懷，便表明：在複雜微妙情況下他是個排難解紛的好手。[80] 除掉劉這個長期朋友和同事，[81] 便同時削弱了書記處的能量，動搖了國家元首的信心和威信。確實，毛的手段與 1953 年高崗的計策相似，那次高企圖以攻擊薄一波來搞劉。[82]

雖然彭在黨的機器裏是個關鍵角色，但他在一定程度上卻是個孤立的，因之易被打倒的人物。在共產黨征服東北期間，他開始時任地區第一書記，而在同高崗、林彪和陳雲發生爭吵後，毛將其召回；這些分歧並未被忘懷。[83] 雖然 40 年代初彭在延安擔任重要職務，他主要是當作「白區」幹部看待的，亦即是，在日本人或國民黨戰線後工作的人，沒有進行革命戰爭的真實經驗。他唯一重大的在軍隊內的關

係是聶榮臻，他們在晉察冀邊區共過事，但聶是位不問政治的元帥，唯一不是政治局委員中三位（元帥）之一。彭與國務院精英們一無聯繫，可能還有點與他們競爭的性質。[84]他在省裏也沒有根基，在中央委員會裏山西代表不多；[85]實際上他和政治局裏唯一另一位山西委員薄一波關係不好，是早有所聞的。[86]除（本人）能力之外，彭的優勢就在於劉的庇護，和黨機構高層中其他「白區」幹部的忠誠。他的實力和他的弱點，使得彭成為任何想破壞黨機器的人的明顯目標。

如果要有一場真正的「文化」革命的話，毛必須控制宣傳機構；他要這些機構如同士兵服從指揮官一樣順從。[87]江青是一名兇狠的女戰士，但毛需要一個全國網絡。那便意味著須打破彭真五人小組的權力，該組包括副組長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他的管文學的副部長周揚，另一名副部長、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的頭頭吳冷西。[88]這些知名的人物中，第五個成員，毛的特洛伊木馬康生，實際上是被孤立了。

這兩種動機如何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例證，便在 1965 年 3 月 2 日出現了；當時，在劉少奇的支持下，書記處召開了一次關於文藝現狀的會議。鄧宣稱，由於錯誤的左傾批評的結果，沒人敢寫文章，新華社收到的稿件極少，舞臺上只是描述打仗，影片也不好。雖然據後來說，鄧的直率講話，面對左傾潮流，收效甚微；[89]但會議卻再次向毛生動表明，奪得文化領域權力是重要的；在這領域中，彭真起著關鍵作用。

毛決定攻擊彭真的第三個理由可能是個人怨恨。在重大政策問題上，沒有 1949 年以後主席斥責彭真的記錄，如他對劉少奇或周恩來那樣。有諷刺意味的是，當 1965 年初他長時間恩主的地位遭到削弱（指劉少奇——譯注），鄧小平也被攻擊時，彭或許曾認為他可能有繼承毛的機會。確實，毛的可能繼承人之間的暗地爭奪肯定是他為什麼能在 1966 年將他們分而治之的重要原因。不過主席是既不會忘記，也不能原諒彭 1957 年對整風的抗拒的（當時吳晗便曾是他的同謀者）[90]，

更不能原諒他在七千人幹部大會上，準備把大躍進災難的罪過歸之於毛。[91]

毛想搞倒彭的巧招是把他逼進無法逃脫的兩難處境中。[92]毛安排好對吳晗作公開攻擊，這樣便把彭擺在兩難的選擇面前，或是保護吳，從而將自己暴露在勾結或同情一個反黨分子的指責面前；或是他必得批判他(吳)，從而犯下無能的罪名，竟然把一個反黨分子包藏得這麼久。

包圍北京

姚文元攻擊吳晗的批判文章《論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於11月10日登在上海的《文彙報》上(一份主要以知識分子為對象的報紙)。[93]江青的小團體對文章保密得非常好，使北京黨對之實際上事先毫無警覺。在10月的一次工作會議上，毛即曾向地區領導人提出問題：如果「中央委員會出了修正主義」，他們將怎麼辦？他自己回答說：「萬一出了，你們要造反。」彭真顯然沒有領會毛所指是什麼。關於以後會出什麼事，彭真從會上所得到的的唯一跡像是毛問他，「是否可以批評吳晗」，他的回答是：「如果他有什麼問題，那些問題當然可以批評。」但彭真只把這理解為從藝術的而非政治的觀點來批評。那年的早些時候，他的五人小組已經禁止在當時文藝界進行的思想鬥爭過程中使用政治標籤[94]；再次是在9月23日，他命令召開高級文化官員的會議，以區分政治的和藝術的問題，並大膽宣佈：「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95]，這句話以後為他招來文化革命分子們的憤怒。他真是大錯特錯了。

當姚文元的文章發表時，彭真和吳晗兩人均不在北京。[96]因為彭不在京，首都黨機關一片慌亂。彭的五人小組早有禁令，未得到中央宣傳部的同意，不得把目標指向個人，並命令官方黨報必須制定批評的標準。如果姚竟敢批評一位北京的副市長，他還是一名黨員，民盟的一位領導成員，一位傑出學者，那末上海黨的紀律出了什麼事了？

11 月 13 日，鄧拓，作為分管宣傳和新聞的北京黨的書記，和市（委）宣傳部長李琦，市黨報《北京日報》編輯范瑾會商：他們是否要轉載這篇文章。他們決定從《文彙報》尋求解釋，弄清毛是否特准了姚的批判文章——這個決定反映了鄧拓個人的相當經驗，深知主席的迂迴方式——如果後者也牽涉進去，那麼他們便要轉載。但《文彙報》遵張春橋的命令，毫不透露消息；於是鄧拓與彭真聯繫，請求指示。彭真說，在他回來之前，暫且按兵不動。

張和姚翹首靜候北京的反應，當看到毫無動靜時，感到大為茫然。江青把北京毫無動作的情況報告給了毛，他從 13 日到 19 日在華東各地作匆匆視察。[97] 共產黨的紀律是真有效的，實際上，在 11 月底前，華東的黨報也沒轉載。到 20 日，毛提議將文章出單行本，但當 24 日上海新華書店為出版事向各地徵訂時，北京新華書店遵從市黨委會指示，回答稱一本也不訂，不過這一狂妄態度並不能堅持很久。

11 月末彭真回到北京。他決定重新考慮，像《紅旗》這類全國性機關刊物是否須轉載姚的文章，並命令市委書記處討論在當地轉載的問題。但他規定，任何吳晗可能存在的問題均不屬敵我矛盾的範疇；並堅持認為姚文章的不正確方面也應予以批評。[98] 北京（市委）書記處告訴彭，它不同意姚文章第四部分中的政治性的批評[99]，並稱如果要轉載，便須同時發一篇編者按語，以表明北京黨的立場。由於受到周恩來暗中催促，且現在已明白了毛的興趣，彭真終於作出決定。11 月 29 日，即在姚文章發表幾乎三星期之後，《北京日報》予以轉載，並同時發表按語，稱應允許發表不同意見。次日，《人民日報》也緊跟上來，這次並同時發表由周和彭共同修改的編者按語，強調在實事求是的過程中自由批評的重要性。[100] 報紙的編輯將該文轉載在第 5 版關於學術討論的部分，表示了對姚批判文章的政治內容不予贊同。

不過，如果彭真認為他已經平息了（圍繞）吳晗的大論戰，保護住了他的北京分封領地的話，他必需也關心在其他領域同時出現的政治動向，它們威脅到他另一處權力基地：中央書記處。

楊尚昆的倒臺

在姚文元攻擊吳晗(文章)發表的同一天，毛突然免了楊尚昆的官。他是中央書記處的候補書記，其重要職責是領導中央辦公廳，共產黨高層的文件傳閱即由其控制。[101]毛以汪東興取代他。汪身為中央警衛(部隊)的負責人(8341部隊)，通常處處侍隨毛。[102]

楊免職的表面理由是：1959年他在毛專列車廂的臥室和接待室中安裝竊聽器。他經常去的省級賓館也安了竊聽器。據知情的毛的私人醫生說，其目的是善意的：在對各省巡遊時，毛所隨便說的許多話不應讓他在中央委員會的同事漏掉。更確切地說，那便意味著中央委員會立即便知道主席的想法有何變化，並能預測他的命令。這件事對毛是保密的，因為他曾反對為同樣目的派一名速記員伴隨他；他不願老感到他說話也須注意檢點，免得一句偶然的話觸發一場運動。[103]

臥車可能受到竊聽，因毛習慣於在床上作工作。結果是毛的很多聯繫也記錄下來了。實際上，1961年初竊聽即以被發現；主席和他的一位年輕情人的談話被負責的技術人員聽到，這人拿了向她開玩笑。當女子向主席反映竊聽的事，主席暴跳如雷，認為他的同事們要編彙一本檔案以反對他。他的很多中層人員被撤了職。雖然楊(在其中)的作用被掩飾起來了，但毛顯然懷疑這活動是他主持的。[104]如果如此，在毛認為性質如此嚴重的事情上，把對楊的處理延緩近五年之久，最可信理由便是：一直到1965年11月他才感到，控制住楊的機關(中央辦公廳)對他來說是至關緊要的。幾乎同時，也採取措施反對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將軍。他是書記處的另一名書記。

林彪控制了軍事委員會

60年代初期，林彪總保持低姿態，可能因為患病，只是偶爾露臉，或是保衛毛，如在七千人幹部大會上；或是為學習主席思想提出新標準。大部分時間，林把軍事委員會和軍隊事務的日常運作留給他的參謀長羅瑞卿負責。像林彪一樣，羅也是在1959年清洗國防部長彭

德懷和他的參謀長黃克誠之後，才受任的，且他在其後清洗彭可能藏在人民解放軍裏的「右傾機會主義」支持者的過程中，發揮了主導作用。[105]羅的背景是專管安全事務的政治委員。在30年代和40年代，他曾和林彪並肩戰鬥。[106]在長征路上，羅似曾負責毛的保衛工作；而在1949年後當他已升任公安部長，1959年升任副總理後，他總伴隨主席。在那些年裏，據毛的醫生說，毛對羅的抱怨只是他（羅）因為安全理由，試圖限制毛的行動自由太多。

在軍事委員會，羅輔助林在思想戰線上的工作，但他也嚴肅對待軍事任務；當60年代中期，人民解放軍被樹為全國政治正確性的楷模時，軍隊也盡力保持並提高其專業標準。這種做法的頂點便是1964年6月在北京郊外的明陵舉行的兩天軍事訓練表演。接受毛、劉、周、朱德、鄧小平和其他領導人的檢閱。據文化大革命之後的材料說，毛對所看到的表示讚許，結果整個8月份，中國各地均進行了類似的軍事活動。不過據他的私人醫生回憶，毛對那些與現代武器無關的演練最為高興，同時卻對羅鋪張浪費作了苛刻的評論。[107]

林彪沒有出席那次表演，顯然說明他不相信軍事演練；[108]相反，他派出以其妻葉群為首（一個同時兼任他個人辦公室主任的軍官）的親信去檢查軍事訓練是否在基層使人民解放軍脫離了政治工作[109]。1964年11月30日林對人民解放軍組織工作會議說應當突出政治；政治應當優先。一個月之後，他批評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沒有實行「四個第一」；訓練佔據首要地位太多，給政治工作留的時間太少。到1965年人民解放軍只得來抓政治，正是在那年5月宣佈取消軍銜。[110]

羅瑞卿對林甚為不滿，爭辯說並未忽視政治，且不應把其他事情均攪得一團糟。如果人民解放軍訓練不足，萬一發生戰爭，黨和國家便完了。[111]因為羅的許多話是在同僚們面前講的，這些話自然會傳到林的耳朵裏，這便更激怒了他。最後一根稻草終於來了。羅瑞卿為推行毛培養革命接班人的政策，勸林讓一些年紀較大的同僚退休。他設法讓空軍負責人告訴葉群，林彪應當照顧自己的健康，而讓羅來管理

人民解放軍。1965年11月30日，林給毛寫信，複述這些話，指控羅企圖趕走他。他派葉群去杭州，當面告狀。空軍負責人劉亞樓已於5月病逝，因之無法為葉作證，林便安排新負責人吳法憲和海軍政治委員李作鵬，來寫信支持他的指控。[112]

不論毛認為林的這些指控是否可信，他都有很好理由來採取行動反對羅瑞卿。在羅任公安部長時，毛就不滿意他向劉少奇和其他官員報告他的安全問題。[113]自1962年任中央書記處書記時，羅便向鄧小平和彭真負責。雖然羅像共產黨任何高級成員一樣，無疑是忠於毛的，但他在七千人幹部大會上對林彪講話的評語，已向主席表明他並非一個不用腦的忠誠者[114]。如果現在羅和林彪發生齟齬，那羅便須離去，因為毛信賴林完全忠誠。在毛即將發動摧毀黨的大混亂中，他須確保得到軍隊的堅定支持，它是國家的另一個主要機構。既然林的健康老是不佳，毛不能讓一位認為對黨忠誠應高於對主席忠誠的將軍去主持人民解放軍的日常工作。

12月8日，毛在上海召集了一次擴大的政治局常委會，葉群是攻擊羅的主要控訴證人，當時羅不在場。她講了10個小時，得到林彪、吳法憲和李作鵬的支持。據說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均對這種詭密的攻擊嚇了一跳，而莫知所措。在這次會議於15日結束後，毛命令周和鄧進行調查；這是毛把總理拖進來，攪混總書記和書記處權力的又一個事例；在以後的一個場合上，他把這種謀劃稱作「摻沙子」[115]。從昆明將羅傳喚來回答對他的指控，他不但未承認錯誤，反而為他的案子爭辯。結果導致成立一個小組負責羅的案件。3月4日到16日和3月22日到4月8日，該小組在北京開了這位不幸將軍的鬥爭會，參加人數第一次是42人，第二次95人。兩次會議中間的3月18日，羅從樓上跳下企圖自殺，但只摔折了一條腿。他被撤去參謀長的職務，由其副職楊成武接任，作代理總參謀長。[116]羅瑞卿在中央書記處的繼任人，是與周恩來關係密切的葉劍英元帥[117]；葉和另兩位元帥，陳毅和徐向前，被任命為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也許是勸誘他們不去過問參

謀長突然被清洗一事。[118] 1965 年初，將經濟控制權由中央書記處，轉交給周恩來和「小計劃委員會」後，毛現在似專注於確保人民解放軍也會更聽總理而不是書記處的話了。人民解放軍現在歸毛和林彪統帥了。

相互利用的聯姻

對羅瑞卿的攻擊給江青一個機會，發展比上海宣傳部更強大的基地。1965 年 11 月末，她在上海問羅瑞卿，軍隊報紙《解放軍報》為何不曾轉載姚文元的文章，他給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劉志堅打電話，通知他文章應予轉載。但文章還是到 29 日才轉載（和《北京日報》同一天轉載），雖然有一個編者按語，稱吳晗的劇是「一株大毒草」。顯然人民解放軍是受中央書記處和其宣傳部的領導的；也許羅作為書記處的一員，曾告誡劉志堅不要走得比彭真還快。[119]

林彪攻擊羅及羅的解職，給了江青一個好機會。林再次表示出他忠於毛的想法，也顯示出他準備在人民解放軍中，貫徹這些想法到什麼程度。因之，1966 年 1 月 21 日江青從上海去蘇州，向林建議：她願在人民解放軍中舉辦一次文化研討會。林欣然同意，無疑將此視作進一步討好毛的妙法。他發佈一項指示，說此後人民解放軍的文藝方面的文件均須呈送江青。葉群打電話，讓劉志堅於 2 月 2 日帶 3 名同僚和 2 名助手飛抵上海，聆聽江青關於電影、京劇和 30 年代文化生活的看法。[120] 江青與劉談話 8 次，主持小組討論會 4 次，帶人民解放軍一隊人看電影 13 次，看京劇 3 次，總是喋喋不休，並讓他們分別去看電影 21 次！[121]

在這樣緊張的文化學習班結尾，2 月 20 日劉志堅給總政治部寫了一份報告；雖然其中概括了江青的「許多非常重要意見」，她還是斥之為不可接受的歪曲，並將報告給毛看，毛轉而命令陳伯達、張春橋和姚文元予以修改。[122] 通過這種集體絞盡腦汁的努力，於是產生「林彪委託江青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123]。

紀要中最重要之點是說文藝領域有尖銳鬥爭。從中國共產黨掌權後，毛的指示未能得到實行；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對他的政策實行了專政。這籠統地批評了中國共產黨的文化機構，尤其是針對中央宣傳部，後面的評述才有所緩和：即在過去三年中，社會主義文化革命才開始結出碩果。這並不意味著歸功於彭真和他的五人小組，而是等於宣稱江青已經設法發起了活動，因為紀要說：兩條路線的鬥爭仍在繼續，包括人民解放軍內部也如此。大多數文藝作品是中性的或反黨的。中國古典作品，歐洲和俄羅斯的古典作品和美國電影的影響還太強。在對五人小組成員之一，文藝沙皇周揚的明顯攻擊中，紀要譴責了反馬克思主義分子們，他們曾信奉「國防文學」的口號[124]。紀要最後提出一個十條規劃，供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採用，以改進軍隊裏的政治工作。[125]

紀要不僅是訂出一項新的文化政策，這政策發自江青，並得到毛的支持和認真指導的；它建起了一個新的文化司令部，來和彭真的司令部對抗。這位北京第一書記在得知江青的活動後，警惕起來，並採取步驟去反擊它們，這是可以理解的。

日程紀要一

11 月

10 日	姚文元的文章（發表），汪東興取代楊尚昆。
29 日	《北京日報》和《解放軍報》轉載姚的文章，並附否定性按語。
30 日	《人民日報》轉載姚的文章。林彪關於羅瑞卿向毛寫信。

12 月

初	葉群向毛描述羅的錯誤言行。
8-15 日	毛在上海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批判羅；周恩來、鄧小平召羅詢問。

1 月

21 日	江青拜訪林彪，建議（召開）一次人民解放軍文化座談會。
最後 10 天	葉群告訴劉志堅出席座談會。

2 月

2-10，16-20 日	江青的人民解放軍文化工作座談會開會。
3 日	彭真的五人小組開會，制訂出《二月提綱》。
5 日	《二月提綱》經政治局常委會批准。
8 日	彭真在杭州向毛呈交《二月提綱》。
最後 10 天	毛審查人民解放軍文化工作座談會文件。

彭真的最後立足點

遵照五人小組的意見，《人民日報》和《北京日報》在 12 月份發表了許多文章，目的在把關於吳晗的辯論重行引入純粹的文學管道。鄧拓以筆名在北京地方報紙上發表文章，為他從前的文學同夥辯護。[126] 甚至《文彙報》上也發表了為吳晗辯護的評論文章；姚文元的猛烈攻擊正是登在該報上的。[127] 12 月 30 日吳晗的長篇自我批評（文章）登在《人民日報》上，引用大量歷史資料；他在文章中駁斥了任何把他的劇和 60 年代初出現的贊成個體耕種和翻案浪潮聯繫起來的說法。[128]

但是吳晗的自我批評已經遲了。毛現在已經下定了決心，他（11 月）21 日到 12 月 2 日在杭州與陳伯達、田家英、胡繩、關鋒和艾思奇談話期間[129]，已經完全接受了康生提出的觀點：《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慶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 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就是「海瑞」。[130]（日期應是 12 月 21 日到 22 日之誤，見注 130。——譯注）雖然遍及全國的知識分子，由於不知杭州的意見，直到進入新的一年仍在為吳晗辯護[131]，但毛的論調已經把吳晗問題轉化成了政治問題。近 1 月末，當江青在上海與關鋒（和陳伯達與張春橋一起工作的左派論戰團夥成員之一）討論毛的論點時，她補充說：北

京開始時未轉載這篇文章便是「黑線專政的一個例子」，由此，她對運動真實目的清楚指明。[132]攻擊吳晗的文章更頻頻出現。[133]為給四面楚歌的歷史學家一個喘息機會，一位北京黨的書記萬里，讓吳晗隱姓埋名去郊區參加四清，但在那兒不久他便發現自己也被迫參加當地的各種反吳晗運動的活動！[134]

從12月到1月整個期間，彭真一直從程式上堅持著防禦努力；在宣傳部裏，審查了關鋒早前的文章，表明他的觀點曾與吳晗的類似。[135]但到2月3日，已經讓兩個月白白溜掉，未對運動作出重大反應，彭召集了一次擴大的五人小組會議，以討論吳晗問題及其意義所在。這次會議所選的時機，及其實行決議的速度，表明彭已從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獲知，劉志堅一行已於2月2日離京去上海會晤江青。他再也無須瞭解詳細情況，即能認識到潛在的威脅，即江青和他的宿敵林彪間的聯繫所體現的威脅。

彭在會上宣佈，背後對吳晗所作調查未找到他和彭德懷之間有組織聯繫。他還著重指出，當《海瑞罷官》第一次上演時，毛曾予讚揚，表明毛已看過演出及讀過該劇。也許他本能地預感到整個北京機關不久將處於攻擊之下，或只是簡單地預計反吳晗的運動可能擴大到他為「三家村」所寫文章，因之波及到他在三家村裏的同夥們，彭真招呼他的副職劉仁和另一位市委書記作證，鄧拓一貫擁護「三面紅旗」。彭重申他的信念：認為《海瑞罷官》不應作為政治問題來討論，而且即使學術批評也須有個限制，不能超過某些界限。康生作為五人小組成員，出席了會議，顯然未表示不同意見，雖然他早前曾向毛指控吳晗和彭德懷。[136]

以這些話和會上明顯的支持性評論為根據，彭真的兩名下屬許立群和姚溱，即刻撰寫出「五人小組向中央報告提綱」，後來被文化革命分子斥之為《二月提綱》。彭真行動迅速，毫無疑問，無論江青有什麼意圖，他想先發制人，還想制止批判的浪潮，或至少在批判的浪潮失控前，將其疏導化解。彭將此文件發給所有政治局常委，並於2月5日

在當時在京的全體政治局常委會委員的一次會議上正式提交此檔。[137]因為毛當時在武漢[138]，朱德在江西[139]，林彪可能在蘇州[140]，這便意味著只有劉少奇、周恩來[141]和鄧小平[142]在北京。劉詢問吳晗和彭德懷之間是否有組織聯繫，彭真再次肯定沒有。康生又一次保持沉默，彭真便得到政治局常委會的正式批准。[143]2月8日彭和其同僚飛往南方武漢，請毛批准提綱。[144]依在場的吳冷西說，主席同意以中央名義發佈提綱[145]；據其他材料說，主席至少沒有表示相反意見。[146]據與此不同的材料說，毛當時問了：吳晗是否反黨反社會主義，或是否與彭德懷有聯繫，或者兩者均是。彭真再次說明：沒有組織聯繫。毛似乎滿意，因為他回應說，在批評之後，吳晗還可以當副市長。他並加一句說，廬山會議與《海瑞罷官》間的聯繫是康生的發現。[147]

彭真是如何看待這次會面的呢？主席格外開恩，沒有反對二月提綱，並似乎認可吳晗繼續留任。他提出了吳晗——彭德懷關係問題，但卻未對彭真的解釋表示不滿意。他甚至否認對這種提法負責，而說那是康生的發現。康生，似乎是以主席的顧問的非正式身份，而不是五人小組成員之一，曾在現場。對這一表彰，甚感狼狽，並試圖否認它。他一下被揭露了，是隱藏在彭真和其同僚背後，在五人小組裏搗鬼。康生也許懷疑，他是否誤解了毛的意圖，那在主席的迂迴戰術運動中，他很可能即將被投畀狼群的。直到文化大革命進行中，康生才敢承認他的著作權，並宣稱應享此榮譽。[148]但在當時，似乎還是彭真重新取得主動，並得到主席的同意，得以規定批判的限度，向前推進運動。

《二月提綱》

《二月提綱》是一份簡短文件，有跡象表明是倉促準備的；其六節中，有一節只有標題，而內容則待補充。[149]提綱遵從當時的左傾主義，宣稱：當前的思想鬥爭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鬥爭)。但是第一節強調它是學術範圍內而非政治範圍內的鬥爭；這又意味著它

是複雜的，通常不易於在短期內分辨對錯的。因之，必須堅持實事求是，並重複彭真去年9月的提法，即遵守「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是非常重要的。[150] 有反動思想或犯過錯誤的學者的自我改造，應受到歡迎。而對吳晗，提綱便有點矛盾了，它認為他「對歷史採取了資產階級世界觀，犯了政治錯誤」，不過又下令，發表的批判不應偏離正軌，誤入政治領域。

提綱未能約束住像姚文元這類意識形態上的牛仔，籲請所有左傾主義學者都參加到「互助組」或「(農業生產)合作社」中來工作，並宣佈創造了五人小組自己的「學術批判辦公室」，可能是為了推進或加強這種協調。[151] 但是即便在彭真和其同僚在準備這類防禦的同時，毛所作的只是靜候時機，向首都作最後衝擊。

彭真垮臺

在彭的長期庇護人和朋友劉少奇，於3月26日出國訪問南亞時，毛的機會來了。雖然他在訪問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緬甸期間，曾兩次在新疆短暫停留了幾天，但他未回北京。[152] 當他4月19日終於回來時，彭的命運已經決定了。

日程紀要二

3月

不明	彭真在四川視察三線。
4月4-8日	小組審理羅案；(4-16日)鬥爭會； (3月22日～4月8日)擴大鬥爭會。
11日	彭真和上海黨之間憤怒交鋒。
中旬	江青、陳伯達、張春橋討論人民解放軍文化工作座談會文件。
中旬	毛對周和鄧抱怨彭真的獨立王國。
14日	座談會文件呈送毛。
17日	毛批准座談會檔。

18-20 日　毛在杭州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劉少奇、周恩來、彭真、康生、陳伯達出席；鄧小平因在西南，缺席；毛於 18 日批評《人民日報》是半馬克思主義。

約 18 日　羅瑞卿企圖自殺。

19 日　江青把座談會文件送林彪。

22 日　林彪將文件發給其他元帥。

26 日　劉少奇和王光美出訪巴基斯坦。

28、30 日　毛譴責彭真，要求解散五人小組。

30 日　軍事委員會發出人民解放軍文化座談會檔和林彪致中央委員會的信。

31 日～4 月 4 日

劉少奇在新疆。

4 月

1 日　張春橋準備一份批判二月提綱的檔。

2 日　《人民日報》發表戚本禹／關鋒文章。

4 日　劉少奇飛往阿富汗。

8-15 日　劉回到新疆。

9-12 日　康生、陳伯達在書記處會上批判彭真；決議起草寫批判二月提綱的文件 (5 月 16 日指示)；成立文化革命小組。

10 日　中央委員會通過人民解放軍文化座談會檔，予以頒布。

14 日　毛開始重行起草 5 月 16 日指示。

15 日　劉飛往東巴基斯坦而後往緬甸。

16 日　《北京日報》發表批判「三家村」材料。

19 日　劉少奇從仰光回到北京。

22 日　毛主持政治局會議。

5 月

4-26 日　北京擴大的政治局會議。

譴責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

改組北京黨和中央宣傳部。

文化革命小組代替五人小組。

林彪談毛擔心政變。

3月初，張春橋，可能是採取一種存心挑釁的作法，來試探二月提綱中所定的政策限度，採取的方式是派上海宣傳局局長去北京參加關於批判有錯誤的學者和作家的指導方針的討論，。彭真乾脆便驅逐了這些信使，授張以藉口，給北京黨和宣傳部扣上反姚文元，甚至反毛的帽子。江青把北京和上海間再次發生的敵對狀況，告知了毛。他聽後大怒，不知是真是假。在月中某個時期——很可能是在彭真離開北京到四川視察三線的時候——毛在杭州召開了一次擴大的政治局常委會議，會上毛向周恩來和鄧小平抱怨，彭真在北京搞獨立王國；這一指控表面上的根據是北京對待江青的第一部樣板戲《沙家濱》的態度。當問到周和鄧作何反應時，他倆均稱沒有意見。[153] 不過如果他們以前沒認識到，現在總該明白對吳晗猛烈攻擊背後的用意了，大概也會預見不久將如何收場吧。

在劉剛出國後，3月28日和30日，毛召集康生、江青和張春橋商談。他譴責《二月提綱》沒能區別開對和錯，指控宣傳部、彭真和北京黨委會是在包庇壞人。宣傳部、北京市委員會和五人小組都應該解散。

幾天之內，宣傳部便被踢到一邊：《人民日報》刊登了左傾知識分子戚本禹和關鋒所寫的一篇文章，此文之前宣傳部未予發表。在4月9-12日的一次書記處會議上，康生和陳伯達攻擊了彭真。鄧小平在會議上的作用沒有透露，不過估計他可能同意決定發佈對《二月提綱》的譴責。毛對這個譴責性檔修改了七次，之後同意以「5月16日通知」之名發佈。；這便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個官方文件。書記處還決定設立一個「文化革命檔起草小組」，它最後成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中央文革）。[154] 4月22日，毛在杭州召集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制定了指導方法，這是最後的致命一擊了。[155] 我們不知道，劉（他剛下

飛機），或政治局其他委員是否反對過毛的想法。當姚文元的文章發表時，劉在與彭真打交道中，非常謹慎，顯然知道文章的背後有毛。[156]我們的確知道，毛選擇呆在杭州，卻讓劉去主持彭的政治死亡。這是一種無情的諷刺方式。

從5月4日到26日，在北京召開了政治局的擴大會議——80人參加。很反常的，出席者僅限於在首都工作的人；中國共產黨的地區局或省級委員會均無代表。頭三天裏，在精心協調的一組發言中，會場為毛的代理人，康生、張春橋和陳伯達所完全控制。[157]

5月5日和6日，康講了8小時，傳達了毛自十中全會以來，尤其是從1965年11月以來，對彭真和陸定一的不滿，號召解除他們的職務，並改組北京黨委會和中央宣傳部。對毛的要求，康表明了自己的觀點：第一，彭和陸應予批判，因為他們保護右派，壓迫左派，不允許革命；第二，人人有責，支持左派，造就一批新的革命的文化幹部隊伍，以促進一個偉大的文化革命。中央委員會過去已經產生了修正主義：羅瑞卿、彭真、楊獻珍、楊尚昆、田家英和廖沫沙都是例子。

5月6日下午，張春橋接過棒子，攻擊文化知名人士——陸定一、周揚、林默涵、邵荃麟——但是再次將主要火力對準彭真和北京黨委會，因為他們處理姚文章不當。次日晨便輪到陳伯達上陣了。他的任務是批判彭真的全部漫長革命歷程。[158]

但重磅炸彈是由林彪投下的，他在5月18日的全體會議之前發言，指控彭、羅、陸、楊陰謀搞政變。次日，彭真在一次五分鐘的反駁（它幾乎算不上自我批評）中，說，他做夢都沒想到過政變，更不用提策劃政變了；他問黨中央能否發現他，羅、陸之間，有何不正當聯繫。[159]毛後來對林關於政變的說法，表示保留；但他命令周要加強北京的安全（保衛），尤其是中南海。[160]林觸動了（毛的）一根神經。

陸定一是5月20日在極荒誕的情況下作的自我批評。在參加會議的每個人座位上擺有一份文件，其中直言不諱地寫道：「葉群是處女。林彪。」[161]這是對陸定一的顯已神經錯亂的妻子所寫的、指稱林彪的

妻子葉群有放蕩行為的一封信的回應。在激烈的交火中，陸堅持說他對其妻的信件，一無所知；林彪則拒不接受這個解釋。[162]

此後，會議便按毛設定的方向開下去了。沒有人敢為任何一個目標公開辯護。5 月 21 日周恩來說，彭羅陸楊「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這次對他們的揭露，以及「奪回被他們竊據的崗位」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是值得慶祝的」。[163] 他們四人被開除出中央書記處；撤銷彭北京第一書記和陸宣傳部長的職務。陶鑄從中南地區乘直升機來京，接替彭的角色，任中央書記處執行書記和陸的職務，任宣傳部長。[164] 周恩來的長期副手，葉劍英元帥，則接替羅瑞卿的角色，在書記處裏監管軍事工作。[165] 5 月 24 日政治局常委會設立了一個專案委員會（以後稱組），以「進一步審查四個同志（原文如此）彭羅陸楊的反黨活動和反常關係」。[166] 在 5 月 26 日會議結束前，兩位官員自殺了，曾一度任《人民日報》編輯的鄧拓，於 5 月 18 日自殺；任毛的秘書 10 年的田家英於 5 月 23 日自殺。[167]

毛從中央書記處撤除了權力很大的敵手，代之以新的官員，以便他們更聽他的話，這樣他便把他的左傾的文化大革命聯盟的全部角色，推到了前臺：林彪監管人民解放軍；像陳伯達、康生和文革小組這類意識形態專家控制宣傳，並得到像戚本禹和關鋒、張春橋和姚文元和上海黨的宣傳人員這類知識分子的輔助；以及當然，還有他本人的生事搗亂的妻子，江青。他們全體，除開林彪，（他是由其妻葉群作代表的）也許還有姚文元，均成了新的專案組的成員，以後在文化大革命中，它必然演變成為追獵老同事的主要官僚機構。[168] 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已經演完，主席要開始上演第一幕了。

第二十章 浩劫來臨

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幕第一場，是在北京上演的，毛卻在幕後導演。康生的妻子曹軼歐於5月末[1]，唆使一群北京大學教師貼出一張大字報，譴責大學領導官員。可以預見到，校方和其親信展開強力反擊，但當《人民日報》（現在是陳伯達主管了）於6月2日發表社論支持左派造反時[2]，便挖掉了他們的牆腳。立即所有北京校園均是一派大騷亂，因為師生們認識到，現在是向學校黨機構進攻的開放季節。

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考慮對策。他們給杭州的毛打電話，請他回到首都，但他拒絕了。他們向他請示可否派工作組（這是共產黨標準的工作程式）。由於沒得到明確回應，劉和鄧便南飛杭州，以便當面提出這個問題，毛仍是猶豫不決，表明他樂於讓他們去負責。[3]他們便派出工作組。工作組試圖恢復對校園的控制。

第二場於1966年7月16日發生在武漢。主席斬波劈浪，在長江順流暢遊兩小時。10天後，膠片和報紙將這一壯舉傳遍中國。這是他隆重回歸公眾視線。儘管前幾個月他在後台積極謀劃，然而自11月以來，此前他唯一的露面是5月和來訪的阿爾巴尼亞領導人合影。1966年上半年主席離開首都極大地（且無疑是有意謀劃的）造成了政治的緊張和困擾，因為他的忠實信徒已經點燃了高級幹部腳下的火葬柴堆。現在毛顯示，雖是72歲高齡，他仍身體健康，適於戰鬥，並準備指揮正在開展的文化大革命。[4]

第三場：毛於7月18日回到北京，當晚聽取康生與陳伯達和其他左傾分子的彙報，而後於7月19日嚴厲地斥責劉和鄧小平鎮壓革命師生；他稱這是清朝、北洋軍閥和國民黨才採取的作法。[5]就像彭真案件時一樣，毛的盟友已攪沸了鍋，想激起回應，毛的高級同僚曾請

他給予指示，卻被他拒絕，似乎表示接受他們對事情的處理安排。然後，他一百八十度地轉彎對付他們。他命令撤出工作組。周恩來本人承認他無法理解現正發生的事情。[6] 中央書記處已無法有效管理這個重大運動。

第一幕的第四場，是中央委員會的第十一次全會，這是四年來的第一次。由此可以看出毛實行統治的時候是多麼不希望受到機構限制。但現在毛需要為創建一個新的權力結構以及爲了發動第二幕，獲得正式批准。全會從 8 月 1 日開至 12 日，在全會結束的最後公報中，顯示出，在文化大革命的開始，延安圓桌（會議）的禮讓原則，是如何正在崩潰中：

政治局

	八屆大會 *	十一中全會
常委	毛澤東	毛澤東 **
	劉少奇	林彪
	周恩來	周恩來
	朱德	陶鑄
	陳雲	陳伯達
	林彪	鄧小平
	鄧小平	康生
		鄧小平
		朱德
		李富春
		陳雲
委員	〔林伯渠〕	董必武
	董必武	陳毅
	彭真	劉伯承
	〔羅榮桓〕	賀龍
	陳毅	李先念
	李富春	李井泉

	八屆大會*	十一中全會
	{彭德懷}	譚震林
	劉伯承	徐向前
	賀龍	聶榮臻
	李先念	葉劍英
	〔柯慶施〕	
	李井泉	
	譚震林	
候補委員	烏蘭夫	烏蘭夫
	{張聞天}	薄一波
	陸定一	李雪峰
	陳伯達	宋任窮
	康生	謝富治
	薄一波	

註： * 按八屆大會第一次和第二次全會（編出）。
** 關於江青如何協助排出這樣序列見葉永烈的《陳伯達其人》，第263～264頁。
〔 〕十一次全會前已死去。
{ }自1959年廬山全會後在政治局已經不再行使職能的成員）

這種激劇改換的組成，展示了毛的不正常心理。既然新政治局如舊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均為26人，數目相同，這種作法，在某一層次可獲得通過，認作是對因死亡或彭德懷和陸定一被罷免後的增補（他倆是失去職位的僅有兩位）。[7] 委任八屆大會會議中未進入政治局的剩下三位元帥，無疑是意在穩住毛和林背後最可靠最重要的選區。擴大政治局是斯大林的慣用手法，意在將小集團團結一致反對他的危險降至最低；而提升毛的支持者，如康生和陳伯達，甚至曾遭批判的李富春，可保證毛能輕易獲得多數。

十一次全會大換班中最顯著的戰略變化，當然是林彪取代劉少奇作指定接班人。14年前毛曾不夠慎重地向高崗埋怨過的那個人，終於打下來了。[8] 他所可能構成的任何威脅均被消除了。

不過毛遊戲計劃中至關重要的策略因素，是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的不同處理。劉明顯已失寵了，在政治局中已跌至第八位。但鄧小平，他的書記處已有效地被剝奪了全部重要職責，清洗掉關鍵人員，他對派工作組一事同樣負有責任，且僅數月之後，也將被劃成僅次於劉的「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魔鬼。但（這次）他僅在小組會上受過一次攻擊，且在全會後的政治局排名中實際上還上升了一名。若不是江青抗議，他可能排得更高，因為他得到最大可能的票數。[9]他似乎並未受到懲罰。然而，但只要毛對他的追隨者發出了一點點信號的話，鄧的聲譽便會被撕得粉碎了，這在隨後幾個月裏會得到充分證明的。

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在文化大革命發展的這一關鍵時刻，當中央委員會裏已經有相當的不愉快、困惑，甚至反對時[10]，毛正力謀防止劉和鄧聯合起來，號召中央委員會來反對他。作為一名老遊擊戰士，他深知不能同時對付他的所有敵人。[11]讓鄧仍留在高位上，毛也許能使這位總書記，產生一種虛假安全感，認為劉會遭罪，因為主席從來就和他處得不融洽；但他，鄧，會存活下來，因為他長期和毛忠誠交往。畢竟，毛 1957 年曾對赫魯曉夫說過他對鄧的高度評價。[12]但是隨著文化大革命此後的日益高漲，鄧，也像劉少奇、彭真和延安圓桌的其他同志一樣，在一陣急驟的污蔑中被清洗掉。[13]

如果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僅在於捍衛毛的地位，和除掉劉和鄧的潛在威脅，那麼這一運動在十一中全會後，只消幾個月便可走完它的歷程。但是，雖然毛心懷怨恨，且猜忌旁人的陰謀，他還作著夢想，心裏幻想著一個無限美好的新世界。那便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偉大革命」[14]，目的在造就敢想、敢說和敢幹的革命接班人，使中國再次充滿活力。全會關於「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決議，強調需要「大膽地發動群眾」和「讓群眾在運動中教育自己」。[15]

所以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幕，便是在十一中全會結束後不久就開始了。8 月 18 日的天安門廣場上，千百萬學生紐倫堡式集會，狂呼毛主

席萬歲。毛在隨後的3個月裏，親自出席另外7次這樣的集會，像是半個天神，激勵那些歇斯底里的信徒——紅衛兵——遵照他的指示，去「炮轟（中國共產黨的）司令部」。當紅衛兵組織好似是在首都的一些精英中學裏，自發冒出來時，毛在第一次集會上決定身著軍服，接受紅衛兵袖章，這便是批准在全國組成紅衛兵單位。確實，如果紅衛兵不存在的話，毛也會創造出他們的。從五四運動到百花齊放運動的長期經驗裏，主席懂得學生總是反壓迫和現狀的最激烈的群體。毫不足怪，紅衛兵們會在群眾集會上「審訊」黨的幹部，毒打他們很多人，有些情況下甚至打死。從來沒有一個獨裁者，發動社會力量反對他自己所創建的國家。這次確乎是所有群眾運動之母。

結論

本書第 1 卷從一次群眾運動開始講起。另一次群眾運動則是第 2 卷的主題。正是集體化和大躍進兩者的最終失敗，成了政治進程中的關鍵因素，它最後導致了（雖然並非不可避免）毛的第三次重要群眾運動，文化大革命。這場浩劫的降臨便是這第 3 卷的內容。

在城市以及鄉村，集體化迅速而相對平和地完成，毛取得的成功是令人瞠目結舌的。這是在其同僚的疑慮下取得的。國家的社會組織已明顯轉變，卻沒有在蘇聯發生過的那種群眾的騷亂。幾年功夫，毛便為在其國家的歷史上打下了他自己的烙印。在戰爭中，他打敗了蔣介石；在和平時期，他超越了斯大林。革命的勝利者成了國家復興的建築師，並將成為像公社這樣新結構的先行者。然而十年以後，毛卻宣揚「不破不立」，他駕駛的這艘失事沉沒。這種從善到惡的蛻變部分地可追溯到集體化。

毛預計他的集體主義的勝利是他下一步工作的發射台：從經濟上改變中國。他想使他的國家富強；他也深知：經濟成就才是新社會秩序的最可靠的廣告和保證。致富才是集體主義的光榮。對毛來說，不幸的是他的願望與現實撞車了。1956 年的經濟「小躍進」，因蘇聯模式的監護人的阻撓而夭折了。[1] 在這點上，主席提不出另一種辦法，而倒是有更緊迫的憂心：中蘇論戰的開始，是文化大革命起源中的另一個關鍵因素。

1956 年 2 月在蘇共二十屆大會上，由赫魯曉夫在其「秘密發言」中對斯大林的攻擊而造成的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混亂和使人深省的狀況，因匈牙利事件而達到最高峰，使毛不再信任蘇共第一書記，而須思考如何去避免在中國出現同樣危機。毛明白，斯大林和其匈牙利

總督的「錯誤」，是由於堅持殘酷的階級鬥爭。[2]毛骨子裏也是信仰階級鬥爭；不過他感到，中國共產黨的權力是不可淩越的，但行使權力的方式不妨做一改變。因而他決定擴大新的統一戰線的規模——統戰是出於發展的目的於最近開創的。他號召非黨的知識分子和官員，來幫助重行塑造中國共產黨。但他打破歷史先例邀請黨外人士，參加原先的黨內整風過程，卻成了引火燒身。各種批評劈頭蓋腦，校園裏騷動蔓延，幹部士氣嚴重挫傷。於是毛背信食言了，拋棄了他的第一個壯麗藍圖——創建一個偉大和諧的國家。[3]他懲罰了那些響應他號召的知識份子精英們，尋求新方式來改變中國。他又轉向發展，轉向農民，正是農民在戰爭與和平時期，為他提供了他的偉大勝利。

毛使中國掙脫了蘇聯的程式，以烏托邦式的努力發起大躍進和公社運動，想創造一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形式。農民將成為發展的動力。他們一窮二白，可變成新生的人，當情勢需要時，他們能在農業、工業、商業、教育或軍事各方面，都同樣精通。但他的第二個壯麗圖景，集體主義的富裕神話，在大躍進引起的全國性大饑荒中崩潰了。毛的高級同僚中多數人現在認識到，農民並非毛的空想棋盤上可以任意擺弄的平均主義的卒子。只有與家庭農業相聯繫的刺激，農業才會興旺。集體化也許是毛個人的勝利，但對中國來說，卻是個大失敗。60 年代初期迅速擴展的責任製表明，大肆誇張的「轉變」只不過是表面上的。中國共產黨在土地改革後，本應聽任它發展的。

但是，雖然毛準備領導一次部分的退卻，他可不願同意全部投降，從而失了面子，和犧牲他關於新的中國的幻想。對他來說，幸運的是，亦如大躍進時一樣，只有一個老同志，膽子很大，責任心強，敢於向毛挑戰。亦如 1959 年在廬山一樣，這次是 1962 年在北戴河，那些挑戰者的同僚們，沒有一個人站出來支持他，雖然他們和他觀點相同。在最高潮的關鍵時刻，黨的農村主管鄧子恢只是孤立一人了。因為他不是一位將軍，不具有搗亂的本錢，所以他的屈辱便不及彭德懷的那樣重。中國共產黨和農民還得被迫隨著規模縮小的公社輾轉掙

扎。但至少毛退出了經濟舞臺，被迫承認發展是馬拉松式的，決非一蹴可就。

毛再次恫嚇他的同僚們使他們順從。但他認為他們缺少思想意識上的堅定性，又使他有了另一種憂慮，這憂慮是蘇共二十次大會引發的。赫魯曉夫曾宣告，與列寧的意見相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世界戰爭並非絕對地不可避免的；他曾提出，第三世界國家的共產黨可能不須要武裝革命取得政權。毛感到，蘇聯領導人對待國際資產階級已變得軟弱了。從 1959 年赫魯曉夫訪問戴維營，再到他 1962 年從古巴撤出導彈，然後到 1963 年簽署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毛把蘇聯第一書記的所作所為，看作是討好帝國主義大國。赫魯曉夫 1960 年（從中國）撤退蘇聯專家，1961 年攻擊阿爾巴尼亞共產黨人，和他在 1959 年和 1962 年的兩次中印邊境衝突時持中立態度，則是更惡劣，完全背叛了無產階級的團結原則。如我們所看到的，毛逐漸地變得深信：蘇聯叛變的根源，乃在於蘇共領導人，為了復辟資本主義，而放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正如 50 年代中期一樣，在 60 年代中期，主席考慮蘇聯集團的發展對中國的意義。他再次提出這個問題：我們怎樣才能避免這種命運？在這兩次，和這個全盤政治問題交織在一起的，是毛個人的問題：在 50 年代，對斯大林的清算，對他自己意味著什麼；在 60 年代，赫魯曉夫倒臺的教訓，對自己又意味著什麼。人們確乎可能原諒主席把 1959 年在廬山彭德懷對他的挑戰，視作是受到了赫魯曉夫攻擊「個人崇拜」的鼓勵。但如果神靈不再保佑主席的話，他將確信那種害怕會是真實的。到 60 年代中期，他便以文化大革命，來先下手為強，消除他所認為的更為嚴重的挑戰了。

但毛的偏執和文化革命分子的所說的話均不足以證明，1966 年，四面楚歌的主席終於猛烈出擊，用以保衛自己和他的「思想」。從 50 年代中期到 60 年代中期，記錄顯示：毛一直是能總攬全域的，即使沒有參與日常指揮。他控制著工作日程。他的性格和威望的力量，更輔

以在列寧主義制度內黨主席職位所具有的權勢，保證了這一點。毛只向不可抗拒的力量低頭，而不是向他的同僚們低頭。當經濟過熱時，他讓「小躍進」煞車。當學生和知識分子掀起一陣狂風暴雨，而非他所預期的「和風細雨」時，他掉轉了航向。當美國人在台灣海峽和國民黨站在一起時，他便收住陣腳。當蘇聯人反對加在公社的意識形態上的光芒時，他將之驅散。當大躍進造成大饑荒時，他退卻了。(總之)在這類時機，他均能夠在他名義上的「第二戰線」按兵不動；這是一種保全面子並逃避責任的上策。但他的下一次捲土重來，決不會太遠的。

當毛選擇審慎時，他的同事們可能迫於情勢，感到須改變航向，但他們在每個重大問題上，總徵求他的意見。他們設想或希望，沉默或含糊其辭就表示同意。60年代初期，「右傾」政策的短暫插曲——在鄉村和城市，在農業、工業和商業，在教育和科學，對待知識分子和統一戰線，以及在國際舞臺上——均是負責的共產黨人對國內和國際各種危機，所作的合理回應。左派分子抱怨了，但是整個1962年1月，毛批准了這些政策。當偉大的舵手於1962年年中回到艦橋，掉轉航向時，他的同事們只能唯唯諾諾，像鄧拓這樣尖銳的筆也停止了。普羅米修斯在等待時機；他並未被縛住。他總是不同凡響。[4]

如果我對導致文化大革命的這十年的論述是正確的——雖然與一般人的看法有不同——那問題便來了：為什麼必須有文化大革命呢？如果毛能定調子，為什麼要對鋼琴演奏家發難呢？

要想完全解開毛的動機是不可能的，但有證據表明，「毛的終極恐懼——籠罩著他的毀滅的陰影——〔是〕革命的消亡」。[5] 他必得想出某種新措施來使它重行具有活力。他曾體驗過所有革命者共同經歷的「頓悟」：在勝利中，革命就死亡了。牢獄的陰影開始籠罩住革命後的國家；在一陣最初的變革之後，厭倦疲遝代替了昂揚振奮，按部就班代替了積極主動，勉強盡職阻礙了理想主義。[6] 很多革命的勝利者滿

足於權力和天下太平，毛不是這樣的人。[7] 舊革命已死亡；但革命萬歲！

但是，到 60 年代中期，對於如何達到這種新生，主席已經無選擇餘地了。[8] 前十年中他力圖激勵全國的努力，卻全部反而損害了他自己。兩個美好的新世界終於證明只是幻想。知識分子是沉默了。中國又出現一個蘇聯式的指令式經濟來代替大躍進的分權化。工業管理的「鞍山憲法」制度已經讓位給《工業七十條》，它在實際上體現了「馬格尼托哥爾斯克憲章」，雖然名義上並非如此，（蘇聯烏拉爾河上的鋼鐵中心——譯注）它是大躍進中被嘲笑的制度。[9] 人民公社實際上已變成了蘇聯式的集體農莊。這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只是蘇聯模式的改進型而已。令人感到羞辱的是，儘管有其缺點，它卻比毛不切實際的規劃，在實際中運轉得更好。

毛最嚴重的挫折是農村的集體化的失敗。對知識分子他可以聳聳肩，不理睬他們；他常常就是這樣作的。他的人格聲望並非投在工業方面，雖然實際上國家工廠中的工人，可能比其他產業的人，對他的革命更為滿意。但卻正是在農村，他第一次嘗試在革命中革命，卻失敗了。毛建設了一個夢想的田園，但農民就是不願進來。要想經過集體制來實現農業的強力發展是不可能的。有諷刺意味的是，深信放手發動人民的毛，卻在解放農民方面畏縮不前。到 1965 年，他認識到他十年前便憂慮「農村中自發地每日每時生長出資本主義因素」是如何正確[10]，而用集體化便可把這種傾向消滅掉又是如何錯誤；他根本無法抑制。而到 1965 年初，他也感到，他以前支持的激進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按劉少奇路線，也無法推進。[11] 政治代價是無法接受的。

在這點上，大多數其他領導人很忠誠努力，以組織和教育的辦法，保持革命火焰繼續燃燒後，再次會退而求其次，但毛不如此。毛在獲取和保持權力中，是個無情的馬基亞維里分子（16 世紀佛羅倫廷政論家，著有「論親王」，宣揚權宜、狡詐和兩重性的政治原則和手法——譯注），在將其理論付諸實踐中，他更是個不計後果的烏托邦

主義者。在中蘇集團解體後，中國成了世界革命的最後堡壘，主席必得尋到一種辦法，在他的人民心中植入一個意識形態的羅盤，永遠指向磁力中心的毛。如果從上而下的革命，現在已不可能，那便應當進行從下而上的革命。如果黨不能改變社會，那毛便要發動社會來改變黨。[12]

但是文化大革命不僅植根于原則爭論，也植根於個人。[13]任何領袖的第一必需是掌握權力。[14]只要他能保持住革命的進程表，毛作為中國共產黨主席的最高權威，是難以攻破的，在這點上，同僚們是不敢向他挑戰的。從他 50 年代中期和 1962 年初的經驗，他知道，如果他聽任像劉，鄧或周這樣的人來制訂進程表，他的「不切實際的」烏托邦式規劃，便會被擱置在一邊。甚至也許他自己也要靠邊站。赫魯曉夫的解職，更增加了他來自劉和鄧的威脅感。毛同時是中國革命的列寧和斯大林，似是獨特地處於打不倒的地位，但是「戴皇冠的頭總是惶惶不安的」，自蘇共二十大以來，他的偏執更增長了。[15]既然毛表明他打算推倒劉少奇，他 20 年之久的親密戰友和指定繼承人——把這下一個「秦始皇」變成「中國的赫魯曉夫」——為什麼他不應考慮到，這個熱誠的、無魅力的、卻非常自信的劉，也可能對等地對他有陰謀呢？

劉幾乎肯定從未想到過任何政變，但他卻未作任何抵抗，這確實是很奇特的。相反地，他 1966 年 5 月順從地主持了打到他的主要政治盟友的會議（指 1966 年 5 月 4 日～26 日的北京政治局擴大會議，有 80 人參加，打倒彭羅陸楊——譯注）。難道他認為這是保持作為毛的繼承人的代價？抑或這僅是這個實質上的列寧主義機構的官吏的嚴守紀律的行為？難道他沒有經歷過忠於領袖和忠於黨，甚至國家之間的「衝突」[16]？難道他的行為如某些斯大林手下的犧牲者那樣，在領袖已經開始的罪大惡極的反黨行為面前，代表著一種視而不見，或是一種無能為力[17]？難道沒有「更高一級的忠誠」[18]？或者也許劉只是完全嚇呆了，像一隻兔子在蟒蛇面前一樣？按照斯大林的譯員說，斯大林的

政府制度之所以有效（除卻忠心和熱情）是有賴於紀律、恐懼和獎賞的。[19] 可能所有這些因素，在此時均影響到劉的行為。

不論是哪種解釋，劉、鄧、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及以後許多人，在毛向黨發起攻擊面前，所表現出的克制態度，極大地幫助了主席，使他能除掉他的同僚們而保住他自己的地位。他懷疑他們有獨立的地位和權威，並在自己身邊使用那些只對他本人，而不是對黨、對馬列主義和同事們忠誠的逢迎者。他便這樣剝奪了中國的一份無價財富，即一個團結的有才能的領導層，延安圓桌，那個「精選的群體」，它征服了中國並指導她經歷了建設國家的早期陣痛。[20]

我們暫且認為毛是無罪的。他不想讓劉繼承他是有合法的原因的，這與毛個人權位的安全無關。除了本卷和前二卷討論過的毛、劉之間在一些問題上的分歧外，兩個人還在如何治理中國問題上，存在另一個根本性分歧。在百花齊放、大躍進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鼎盛期，和文化大革命初開始時，毛是贊成「大開放」和「大發動」群眾運動；而劉則常選擇通過黨的親手領導，實行較緊的控制。毛是一個「隨機應變的」領導人，會因時制宜地自由選擇任何他認為最佳政策，無論接下來發生什麼，都樂於碰碰自己的運氣；而劉是個「按規矩辦事」的人，寧願堅持那些過去曾對他行之有效的政治技術。毫不足怪，像別的領導人一樣，毛寧願選一個他認為是「自己人」的人，來做繼承人。[21]

毛也可能對劉不穩妥感到憂慮，這也是合理的；因為他（劉）有激烈地從一個極端轉到另一個極端的傾向。毛曾不時地作過策略上的退卻，但從未改變他的底線。而劉從大躍進時期的極左，變到大躍進之後饑荒時的極右，然後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後半期，重又回到極左。[22] 當國家和黨在那些年代裏正面臨嚴重困難的時候，劉反應過度，且說得太多甚至驚慌失措。這在任何時候，對一個領導人來說，都是不好的特點，在有危機時則更不好。即使在劉殷切地遵循主席的指導時，（如社教運動中）人們都可以說，劉越過了毛本能感到的政治

界限。確實，劉當時的打擊幹部的政策，損害了他在自己僅有的轄區內（即中共黨內）的個人地位。而這段時期後來證明是他一生事業的關鍵時刻。也許最重要的是，他能擁有人民解放軍對他的忠誠嗎？[23]

毛對劉能否作為領袖這種擔心在毛決心除掉他的過程中起了多大作用，人們仍只能猜測。比較能肯定的倒是，如果毛要想整肅中國共產黨，他必得移掉劉少奇和那些傚法他的領導作風的人；[24]而為了作到這點，毛必須首先佔領控制黨的制高點。文化大革命選擇以這樣的方式發動，這一點明顯是一個重要決定因素。為什麼彭真、陸定一、羅瑞卿和楊尚昆均相繼很快受到指控，雖然罪名各不相同？難道 1966 年 5 月，毛一網打盡，除掉了負責首都的人，負責宣傳的人，負責人民解放軍日常事務的人和負責中央委員會文件傳閱的人，僅是個純粹的巧合？或者主席事先早已決定，控制住這四個，對他的計劃說來，是至關緊要的職位，因而默許奪掉他和他的盟友不信任的這些人的職務？不論毛的真實（即令是由誤會產生的）想法是什麼，他所用的首要手段，都是卑鄙的政治陰謀。文化大革命從出生便帶有該隱（聖經創世紀第四章所載，該隱是亞當和夏娃的長子，曾殺死其弟亞伯——譯注）的烙印。

若果如此，為什麼毛不像斯大林一樣，也命令作點形式上的審判和處決呢？除卻毛對虛假的「資產階級」法制的蔑視不談，他可能已直覺感到，面對赤裸裸的殘暴，他的老同志中，即使最因循遲鈍的人，可能會反彈，也許甚至會反叛的。[25] 1966 年的中國共產黨，還不是 1936 年的蘇聯共產黨。而更重要的是，毛堅信精神的復活。現在，還不清楚在哪裏能找到這個革命的格雷爾神碟（指耶穌在最後的晚餐上所用的碟子，次日他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後，亞里馬帝亞的約瑟即用此碟，收集了耶穌的血滴。表示復活的意思——譯注）。毛把他的全部希望便寄託在尋找這神碟上面。滿懷希望的漫遊便等於抵達，所用手段便會變成終極目標，鬧革命便是革命本身。[26]他把延安圓桌的同志們，推出去面對一次最後的考驗，希望在階級鬥爭的烈火中，在亂

中，[27]得到淨化之後，最少有些人——例如一個從前寵幸的像鄧小平的人——能回轉來，在毛思想中再生，也許甚至還捧著格雷爾神碟。如果他們滅亡了，那就活該。他也會從舊（圓桌）的灰燼中，召集一次新圓桌。革命家們死了；革命家們萬歲！而如果所有其他辦法均失敗了，革命便會以它的領袖作化身，最高指示則是：毛主席萬歲！

註釋

導言

【1】 王京津（音譯）：《鄉村三十年》，編者概論，第 1 頁。
【2】 同上書，第 194 頁。對主要導致這個縣的災難的「共產風」，見上書第 177 ～ 186 頁。對這個縣所遭受災難的另一描述，見伍仁編《共和國重大事件紀事》，第 61 ～ 65 頁。鳳陽縣屬生態不穩定地區，是伊麗莎白·佩里《華北的造反者和革命者 (1845—1945)》的中心議題，文化革命後鳳陽逐漸擺脫厄運，見李擎吾（音譯）《中國的改革政治》中佩里的文章〈中國家庭承包制的意義：鳳陽縣〉，該書第 195 ～ 217 頁。
【3】 李默：《新中國大博覽》，第 365 頁。
【4】 巫、李：《一滴淚》，第 266、268 頁。
【5】 同上書，第 191 頁，作者均系安徽省會合肥之居民。
【6】 同上書，第 121 頁。
【7】 《中國人口：安徽分冊》，第 130 ～ 131 頁。
【8】 安徽省人民政府辦公廳編：《安徽省情》，第 124 頁。
【9】 提供本資料者系中國高級幹部。該幹部在毛以後的時期，負責調查大躍進引起的饑荒的影響。據安徽省的材料，一省級官員在 1962 年 1 月七千人大會上稱死亡人數為 700 萬人，但這一口頭報告無書面記錄。本資料系根據安徽省統計局編《安徽四十年》的官方數字推算而得的。該書稱三年困難時期，安徽死亡 500 萬人。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農業相對於五十年代甚至三十年代，境況岌岌可危，詳情參閱陳一諮：《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第 17-25 頁。
【10】 糧食數見四川省統計局編：《四川統計年鑒 1990》，第 135 頁。產量於 1961 年進一步降至 1,155 萬噸，直至 1970 年產量才超過 1958 年的產量；同上。
【11】 同上書。四川省統計局：《四川社會統計資料》，第 23 頁。
【12】 同上書，第 56 ～ 57 頁。據上述中國高級幹部，四川的死亡人數為 900 萬人。相對來說，安徽受災情況嚴重得多。1953 年，中國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時安徽人口為 3,070 萬，四川為 6,570 萬（卡巴德：《中國改變著的地圖》，第 34 頁）；1957 年，在大躍進以前不久，國家統計局估計的人口數為：安徽 3,356 萬人；四川 7,216 萬人（《偉大的十年》，第 11 頁）。
【13】 「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編《當代中國的山東》，第 193 頁。缺糧人數為 1,596 萬人；日人均數係根據本書中年人均 142.7 斤推算的。糧食產量降低的原因歸於四個因素：農村勞動力少了 20% 以及仍從事農業的人員的體力下降；牲口數大量下降，這意味著用於馱載的牲口量少體弱，豬糞肥減少；由於大躍進的政策，播種面積減少；由於以上各因素造成的農業質量差。（同上書，第 193 ～ 194 頁）人口數係 1957 年的，見國家統計局：《偉大的十年》，第 11 頁。在定州人口增長率從 2.4% 降到 1% 多；「定州卷」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國情叢書——百縣市經濟社會調查：定州卷》，第 17 頁。
【14】 《當代中國的山東》，第 196 ～ 197 頁。
【15】 見麥克法夸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 2 卷，第 42 ～ 43，302 ～ 303 頁。
【16】 《駐馬店市志》，第 101 頁。感謝邁克爾·肖恩霍爾使我注意到這資料。

【17】 參見弗里德曼·皮克威克斯與塞爾登：《中國村莊，社會主義國家》，第 240 ～ 245 頁。然而，遲至 1960 年 4 月，北京普通居民仍對首都鄰近省份的饑饉情況毫無所知；哈利·吳與卡羅林·韋克曼：《苦風》，第 55 頁。
【18】 商業部商業經濟研究所編：《新中國商業史稿》，第 193 頁。
【19】 《中國人口：北京分冊》，第 112 頁。
【20】 上海市統計局編：《上海統計年鑒 1983》，第 240 頁。
【21】 國家統計局貿易物價統計室編：《中國貿易物價統計資料（1952-1983）》，第 198 頁。
【22】 見鮑（若望）與切米明斯基:《毛澤東的囚徒》，第 210，213 ～ 216，248 頁。除去鮑的講述外，至少還有二份講述北京附近清河國家農場中勞改生活悲慘的情況的第一手材料，參見哈利·吳與卡羅林·韋克曼:《苦風》，第 99 ～ 153 頁；巫寧坤與李益凱：《一滴淚》，第 127 ～ 137 頁。關於中國勞改營，見巴默與明福德：《火種》，第 454 ～ 462 頁；第 460 ～ 461 頁討論了清河農場。
【23】 哈利·吳與卡羅林·韋克曼：《苦風》，第 95 ～ 96 頁。
【24】 溥寧（音譯）:《血紅的牙齒與爪子》，第 181 ～ 182 頁；另見張賢亮:《草湯》（譯按：英文本，詳見參考書目）。
【25】 1989 年為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十週年出版的一本相冊中，一幅照片的說明為「破茅草屋頂下的三名江蘇農村孤兒」（真實可靠，茅草屋頂是架在竹竿而不是牆上的）。他們的父母與另一名姊妹餓死於由 1958 年大躍進導致的饑荒。該照片說明悲劇甚至發生在中國較富裕的省份；見新華通訊社攝影部與吉林教育出版社編：《永恆之日》，第 103 頁。
【26】 見班尼斯特:《中國的人口變化》，第 85 頁。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 2 卷，第 330 頁，我使用了另一傑出人口學家約翰·艾爾德以前的估計數，即 1640 萬與 2,950 萬之間。上述注 9 中的高級幹部估計總數為 4,300 萬人。最近研究饑荒的書為貝克爾《飢餓的幽靈》。
【27】 官員們及其下屬往往利用領導人在場進行吃喝；此外，執行特殊任務的幹部，如翻譯《毛澤東選集》英文版的高級翻譯組的飯食是由特殊廚師製作的；見里騰貝格（另譯李敦白）與貝內特：《幕後的人》第 257 ～ 258 頁。「外國專家」也享受較高的定量；同上書，第 259 頁。
【28】 高京政編：《平凡與偉大》，第 117 頁。
【29】 周吃糧與使用算盤情況，見《人民的好總理》，第 3 卷，第 135 頁。有關他因（工作人員）收禮（蔬菜）而發怒一事，見上書，第 132 頁。他的警衛聲稱在這期間他不吃肉與蛋一事，見《敬愛的周總理我們永遠懷念你》第 83 頁；《人民的好總理》第 2 卷第 526 頁稱他在三年困難時期，很少吃肉。他指示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勳告訴單位的食堂工作人員自己種蔬菜、養豬，因為官員的食物太差，見上書第 3 卷，第 20 ～ 21 頁。有關糧食部副部長所說這時期周節儉的飲食習慣，見《不盡的思念》，第 236 頁，工作人員的回憶，見程華：《周恩來和他的秘書們》，第 81、289、463 頁。
【30】 見《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 2 卷。

第一編 災荒第三年

第一章 中共中央第九次全體會議

註釋： 凡作者標引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均簡稱《起源》，作者標引的頁碼均為英文原版的頁碼。
【1】 關於毛在 1960 年後半期的情緒，見董邊、譚德山和曾自：《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第 56 ～ 57 頁。

【2】 「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大事年表》，第 306 頁；曾碧君（音譯）、林慕熙（音譯）：《新中國經濟史》，第 171 頁。毛這句話顯然是重新接受了恩格斯關於承認必然決定一切的觀點。毛於 1959 年再度發動大躍進之前，思想較為現實，當時是接受恩格斯這個看法的；見《起源》，第 2 卷，第 164 頁。
【3】 見《起源》，第 2 卷，第 323 頁；關於 9 月 30 日是正式使用這個口號的日期，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黨史——大事年表（1919-1990）》，第 286 頁。
【4】 《劉少奇選集》下冊，第 357 頁。
【5】 見《起源》，第 2 卷，第 88～90 頁。
【6】 毛於兩年前在北戴河時曾希望到 1962 年達到這個數字；同上書，第 90 頁。
【7】 同上書，第 278～283 頁。
【8】 毛在 1960 年後半期對鋼鐵問題的說法與行動，詳見廖蓋隆等人合編《新中國編年史》，第 181 頁。關於大躍進造成的非農業區的經濟混亂，見《起源》，第 2 卷，第 326～330 頁及本書第 4 章。關於 12 月 3 日指示的文本，見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 23 卷，第 411～413 頁。關於中央命令對東北重要工業區所造成的影響，見《宋任窮回憶錄》，第 376～378 頁。
【9】 同上書，第 136～172 頁；《中國百科年鑒 1981》，第 563 頁；廣東省高等院校《中國共產黨簡史講義》編輯部編：《中國共產黨簡史講義》，第 357～358 頁；《中共黨史講義（遼寧史）》，第 251 頁；許滌新：《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第 153 頁。後者將此指示的時間誤為 12 月。
【10】 《中國百科年鑒 1981》，第 563 頁。
【1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1958-1981》（下），第 407 頁。
【12】 事實上，甘肅似乎是個恰當的例子。甘肅是遭受饑荒最嚴重的一個省，1960 年 12 月由原內政部長錢瑛女士及原財政部副部長戎子和所組成的調查團專門調查此事。他們很快得出結論，該省所聲稱的報糧產量 70 億斤（350 萬噸）實際只有 40 億斤（200 萬噸）——與之相比，大躍進之前的產量是 380 萬噸——但縣委書記們不敢說實話。他們向中共西北局官員——可能是第三書記胡耀邦（？）——報告時，胡試圖說服他們接受第一書記說的數字；見戎子和在「我們的周總理」編輯組編的《我們的周總理》第 304 頁中所寫的話。甘肅省 1961 年糧食產量降至 200 萬噸以下，直到 1967 年才超過大躍進以前的產量。調查之後發生一些神秘事情：當時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失去了職務，戎與錢也從公開場合消失，但戎後來被重新任命為某省的領導。見克萊因與克拉克：《中國共產主義傳記辭典》。
【13】 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大事年表》，第 310 頁；《懷念毛澤東同志》，第 216 頁；房維中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大事記》，第 287～289 頁。
【14】 《經濟大事記》，第 288～289、296 頁；當代中國計劃工作辦公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大事記要，1949-1985》，第 161 頁；「當代中國商業」編輯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大事記（1958-1978）》，第 210 頁。
【15】 《經濟大事記》，第 288～289、296 頁；《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大事記要》，第 161 頁；《商業大事記》，第 210 頁。僅廣東一省就為償還農民因平均主義造成的損失 1 億元；見「陶鑄文集」編輯組編：《筆祭陶鑄》，第 354 頁。關於平均主義在農村造成的損失的例子見本書第 2 章。
【16】 廖蓋隆等：《新中國編年史》，第 182 頁。
【17】 文化大革命期間出現了許多非官方的毛澤東講話選集，重印了毛的講話摘要，我採用了《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 年 6 月）》（下），第 323～324 頁。

【18】 1957 年至 1960 年間死亡率增長了兩倍以上。1960 年實際上人口減少了 0.45%。見世界銀行:《中國: 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附錄 B: 人口、健康與營養, 第 71 頁 ;《起源》, 第 2 卷, 第 330 頁。
【19】 百分比引自 1980 年《中國農業年鑒》, 第 34、36、38 頁計算的生產數字, 這是第一次公開發表的詳細數字。關於糧食的收購、儲存以及不足的數字, 見柳隨年 :《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的提出及執行情況》, 載《黨史研究》1980 年第 6 期, 第 23 頁。人口數字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 1983》, 第 103 頁。
【20】 薛暮橋 :《我國物價和貨幣問題研究》, 第 44 ～ 45 頁。
【21】 《財政工作三十五年》, 第 137 頁。根據此項資料, 自 1950 年至 1960 年農業稅額總數達 200,512,000 噸, 為平均年產量的 10.2%。
【22】 見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計劃司編:《中國農村經濟統計大全 (1949-1986)》, 第 96、362 頁。價值僅降低 22.7%的原因估計是提高收購價格所致。
【23】 對負責國家發展的中國領導人而言, 1960 和 1957 兩年的生產可能是個明顯的對照。1957 年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最後一年, 曾是國家發展充滿希望的開始, 而 1960 年糧食產量減少了 26.4%, 棉花產量減少了 1 ／ 3, 油料作物產量減少了 54%, 大牲畜減少了 12.5%, 見馬宇平和黃裕沖編 :《中國昨天與今天 : 1840-1987 國情手冊》, 第 620 頁。
【24】 《毛澤東思想集叢 1949-1968》, 第 2 卷, 第 239 頁。
【25】 同上書, 第 242 頁 ;《毛澤東思想萬歲 (1967)》, 第 263 頁。毛喜歡的這句格言來自漢代 ; 見中共中央黨校科研辦公室、毛澤東思想原理講話編寫組編 :《毛澤東思想原理講話》, 第 338 頁。根據沈邁克 1991 年向亞洲研究學會年會提出的一份報告稱, 這句廣為引用的話出自毛在 1941 年《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
【26】 《毛澤東思想集叢》, 第 2 卷, 第 237、238、241、242 頁。
【27】 同上書, 第 239 頁 ; 關於大躍進時期在這方面的作法的討論, 見《起源》, 第 2 卷, 第 31 ～ 32 頁。
【28】 《毛澤東思想集叢》, 第 2 卷第 237、238 頁。
【29】 同上書, 第 240 頁 ;《毛澤東思想萬歲 (1967)》, 第 261 ～ 262 頁。在 1961 年《北京週報》第 4 期第 6 頁所載全會公報中提及整風運動。其它材料提及該運動的見《懷念毛澤東同志》第 221 頁,《中國大陸雜誌選》604 號第 27 頁,《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 221 號第 31 頁。有關此運動的討論, 見泰偉斯 :《中國政治及清洗》, 第 448 ～ 471 頁。
【30】 《毛澤東思想集叢》, 第 2 卷, 第 242 頁。關於毛與後來的法國總統的會見 (2 月 8 日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2439 號第 21 頁), 見 1961 年 2 月 23 日《快報》第 13 ～ 14 頁 ; 一則較短的譯文載於 1961 年 10 月 23 日《新共和》。
【31】 《毛澤東思想集叢》, 第 2 卷, 第 240、244 頁 ;《毛澤東思想萬歲 (1967)》, 第 261、265 頁。
【32】 《毛澤東思想集叢》, 第 2 卷, 第 238、243 ～ 244 頁。
【33】 學習毛主席著作辦公室、廣州市軍管會革委會編 :《劉少奇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言論一百例》, 第 20 頁。毛的話 (講話日期只寫為 1961 年) 是:「形勢大好, 問題不少, 前途光明。」比較毛於 1959 年廬山會議前夕的話 :「成績偉大, 問題不少, 前途光明」; 見《毛澤東思想萬歲 (1967)》, 第 63 頁。
【34】 《毛澤東思想萬歲 (1967)》, 第 261、265 頁。有關中共團結方面的這兩段文字實質上極為相似, 顯示出此非官方的彙編有錯誤。但毛的講話常常重複, 可能是由於講話是即興的、不嚴密的, 因而有些鬆散。關於毛在廬山要求團結的呼籲, 見《起源》, 第 2 卷, 第 220 頁。毛在困難情況下使用這種策略並不少見, 參見英國前首相瑪格麗特 · 撒切爾夫人的看法 :「因此在一次談話中我直言不諱告訴他們, 他們在最後一年中不得不忍受很多困難, 出現這些困難並不是因為我們基本方法錯誤, 方法是對的。是因為他們拋棄了寶貴的團結美德, 還

因為……我們不得不做真正困難的事情，因為這些事情是正確的。」撒切爾：《唐寧街歲月》，第 564 頁。

【35】《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第 261 頁。

【36】同上書，第 258～259、265～266 頁；這些段落是重複的。毛於 1959 年廬山全體會議上早已明確表明此項政策；見中共黨史研究會（編）：《學習歷史決議專集》，第 121 頁。

【37】《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第 260、265～266 頁；《中國大陸雜誌選》633 號第 18 頁。關於此口號的起源，見《起源》，第 2 卷，第 323 頁和柳隨年《「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第 21～33 頁。關於中國高級經濟官員薛暮橋在起草此口號所起的作用，見「懷念周恩來」編輯小組編：《懷念周恩來》，第 38 頁；關於中共在 1960 至 1962 年所採取的一系列經濟措施，見「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編：《當代中國經濟》，第 353～361 頁。

【38】條文公佈於 1 月 20 日出版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大事記要》，第 165～166 頁；《商業大事記》，第 212 頁；「當代中國的經濟管理」編輯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管理大事記》，第 154 頁。

【39】此項決定是 1 月 15 日以中共批准財政部黨組的一份報告形式發佈的；同上書，第 154 頁；《商業大事記》，第 210 頁；《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大事記要》，第 165 頁；參看《起源》，第 2 卷，第 142～144 頁。

【40】《北京週報》1961 年第 4 期，第 7 頁。設立各機構的決定於 1960 年 9 月正式作出。（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黨史》，第 286 頁）；新的各局的第一書記於 7～8 月北戴河工作會議期間宣佈，他們顯然都是毛親自選定的；《宋任窮回憶錄》，第 361～362 頁。關於這些機構與原有機構之間的關係，見舒爾曼：《共產黨中國的意識形態與組織》，第 147～149 頁；關於高崗的「獨立王國」的報道，見泰偉斯：《毛王朝的政治》。

【41】《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第 261 頁。

【42】《懷念毛澤東同志》，第 261 頁。

【43】公報見《北京週報》1961 年第 4 期，第 5、6 頁。關於確認九中全會「決定終止」大躍進，見《黨史研究》1985 年第 6 期，第 39 頁。

【44】關於李富春 1960 年的文章，見《起源》，第 2 卷，第 300～301 頁。

【45】李富春講話的原文載於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 23 卷，第 434～435 頁。

【46】同上書，第 435～436 頁。

【47】同上書，第 436～437 頁。

【48】同上書，第 438 頁。

【49】同上書，第 435、438 頁。關於大躍進期間減少的可耕地面積，見《起源》，第 2 卷，第 126 頁。根據 1980 年《中國農業年鑒》，第 34～35 頁，1960 年糧食與最重要的經濟作物的播種面積約為 1.35 億公頃。但這些數字有問題。後者的統計數字是：1960 年種糧面積為 183,644 萬畝（123,041,480 公頃），而國防大學的《參考資料》，第 23 卷，第 439 頁上說李稱 1961 年種糧面積擴大至 18 億畝（12060 萬公頃）。造成此種問題或是因為李情況不明，或是因為文化大革命後為了使統計數字準確而作的估計。〔中國人的數字以畝為單位，我則換算為公頃，1 畝＝0.67 公頃。〕

【50】同上書，第 438～439 頁。

【51】毛死後各方普遍承認此點，雖然是以很克制的語言承認的，例如金春明：《建國後三十三年》，第 150 頁。

【52】見李：《共產黨中國的統計制度》書中各處；王一夫：《新中國統計史稿》，第 120～125、134 頁；又見張賽（音譯）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大事記（1949-1991）》。

【53】根據陳雲說，在煤炭工業部直接控制下，1960 年煤的產量僅為 2 億噸；見拉迪與利伯索爾：《陳雲關於中國發展的戰略》（以後簡稱為《陳雲的戰略》），第 174 頁。

【54】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 23 卷，第 441 頁。

【55】 李富春的講話未發表。
【56】 毛讓中共中央作為一個機構參與重要問題討論時，一向都很謹慎。四十年代初他曾在七大之前讓中央委員會先行討論《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即是一個例子。
【57】 第九次全體會議對莫斯科會議的決議見《北京週報》1961 年第 4 期，第 7～9 頁。有關會上赫魯曉夫的報告，見赫德遜、羅文泰爾、麥克法夸爾：《中蘇的分歧》，第 207～221 頁。對中蘇立場的評論，見同書第 33～34、206～207 頁；紮戈里亞：《中蘇衝突》，第 367～369 頁；吉廷斯：《中蘇論戰之概觀》，第 144～145 頁。
【58】 根據知情人 T 提供的材料，這個智囊團最初由陳伯達領導，以後改為康生。該團有無限權力，可以調查任何問題並有權接觸檔案與進入機構。
【59】 利伯索爾：《中共中央黨政會議研究指南 1949-1975》，第 165 頁。
【60】 《北京週報》1961 年第 10 期，第 7 頁。
【61】 同上書，第 6 頁；《懷念毛澤東同志》，第 214～217 頁。何其芳在大躍進時期由於批評「群眾」創作的詩歌而遭受批判，毛問他現在站在什麼立場上；同上書第 215 頁與戈德曼:《共產黨中國文學上的不同意見》，第 261～271 頁。毛尊重何對 18 世紀小說《紅樓夢》的馬克思主義觀點，此書是毛極為喜愛的文學著作；見龔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澤東的讀書生活》，第 220～237 頁，及戈德曼：《共產黨中國文學上的不同意見》，第 119、248 頁。關於毛與何在另一方面的合作，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與中央檔案館「黨的文獻」編輯部編：《中共黨史重大事件述實》，第 138～143 頁。有關毛編輯何的著作的具體情況，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9 冊，第 425～429 頁。
【62】 《北京週報》1961 年第 10 期，第 7 頁。
【63】 同上書，《懷念毛澤東同志》，第 218 頁。
【64】 《北京週報》1961 年第 10 期，第 9 頁。
【65】 同上書；《懷念毛澤東同志》，第 218 頁。
【66】 同上書，第 217 頁。

第二章 緊急措施

【1】 《陳雲同志文稿彙編（1956-1962）》，第 120 頁；《陳雲的戰略》英文本第 XXIX—XXX，147 頁。1956 年年中糧食儲量曾達 2135 萬噸。此數字與城市糧食配額儲量的關係是尼古拉斯·拉迪與肯尼斯·利伯索爾合著的書所計算的。
【2】 《不盡的思念》，第 233 頁；基辛格等：《我眼中的周恩來》，第 225 頁；「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編：《當代中國的糧食工作》，第 112～113、121 頁。後者附有周在糧食部的文件（第 112 頁）和糧食調撥表（第 121 頁）上批註的影印件，略有模糊。關於 1959 年廬山會議之後直至「文化大革命」，周全面負責糧食工作的介紹，見《懷念周恩來》，第 78～79 頁。
【3】 同上，第 253 頁。根據 1960 年 4 月 6 日國務院早些時候發出的緊急指示，那時北京僅有七天的存糧，天津 10 天，遼寧各工業城市八至九天，上海則根本無存米，只得逐日應付；見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李富春的一生》，載《中共黨史人物傳》，第 44 冊，第 93 頁。
【4】 關於糧食危機的範圍及其最終解決的討論，見《當代中國的糧食工作》，第 224～228 頁。
【5】 關於陳雲在設法解決大躍進所造成的混亂中所起的作用，見《起源》，第 2 卷，第 163～170 頁。
【6】 參見陶鑄對進口糧食的評論，載《新華月報》1989 年第 11 期，第 50 頁。
【7】 周於 1961 年 1 月 2 日至 9 日出席緬甸獨立日慶祝活動，互換中緬邊界條約批准書和簽訂向仰光政府提供 3000 萬英鎊無息貸款的協議書；新華通訊社內部新聞資料《中國的對外關係大事記（1949-1988）》，第 209 頁。

【8】 根據某權威性的人物簡傳，葉季壯是個政策的執行者而非制定者；見《中共黨史人物傳》，第 45 冊，第 273 ～ 276 頁。
【9】 《不盡的思念》，第 253 ～ 254 頁。陪同周去仰光的是葉季壯的一位副部長雷任民，他是在仰光之行結束後被總理派往香港瞭解在國際市場上購買糧食的可能性及運輸問題和外匯問題的；力平：《開國總理周恩來》，第 376 ～ 377 頁。
【10】 這是當時國務院的五個辦公室之一，它監督財政部、糧食部、商業部、外貿部和中國人民銀行，見唐尼索恩：《中國的經濟制度》，第 517 頁。
【11】 《經濟大事記》，第 296 頁。
【12】 《我們的周總理》，第 11 頁。根據當時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谷牧的說法，周稱對進口糧食需求的第一次估計為需 50 公噸。谷稱周是在中央全會後第二天即 1 月 19 日說的；估計是在那一天開的工作會議上講的，這顯示中央全會不過是進一步討論以及制定政策的預備性會議，見《商業大事記》，第 211 頁。
【13】 《當代中國的糧食工作》，第 123 頁。
【14】 見 45 頁表 22。
【15】 《商業大事記》，第 206 頁。
【16】 同上書，由於李先念是國務院財貿辦公室主任，所以由他擔任小組組長，交通部長王首道、商業部長姚依林任小組副組長。組員有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張國堅（音譯）、交通部副部長於眉、鐵道部副部長劉建章、財貿辦公室兩位副主任鈕佩宗（音譯）和馬定邦（音譯）、糧食部兩位副部長陳國棟和楊少橋、商業部副部長梁耀、財政部副部長李樹德、外貿部部長助理賈石，另有一名官員江東平職務不明，可能做財政與銀行工作。姚依林擔任執行辦公室主任。
【17】 1960 年 12 月 22 日及 30 日，1961 年 1 月 11 日《曼徹斯特衛報》；1961 年 1 月 26 日《泰晤士報》。
【18】 1960 年 12 月 30 日《紐約時報》；1961 年 2 月 3 日《泰晤士報》。據報道加拿大小麥委員會主席曾於 1960 年 10 月到中國進行調查訪問；1960 年 10 月 15 日《紐約時報》。
【19】 1961 年 1 月 27 日《曼徹斯特衛報》。
【20】 巴里：《中國購買糧食》，載《中國季刊》1961 年第 8 期第 24 頁。
【21】 同上書，第 21、24 頁；1961 年 1 月 27 日《每日電訊》。這些數字合計共達 78 萬噸，比財貿辦公室估計需要再出口的 100 萬噸要少。
【22】 劉曉：《出使蘇聯八年》，第 105 ～ 106 頁。
【23】 《不盡的思念》，第 232 頁。關於前一年中蘇論戰導致蘇聯撤走技術專家事，見《起源》，第 2 卷，第 11 章。
【24】 李的信見《李先念文選 1935-1988》，第 257 ～ 264 頁。
【25】 1959 年 12 月底毛致信陳雲，稱收到陳雲彙報病情的信，並對陳的康復表示欣慰。見《毛澤東書信選集》，第 568 頁。毛於 1961 年 8 月 25 日的另一封信（同上書，第 585 頁）談到陳時說他身體尚未完全恢復健康。在官方編輯的陳雲講話記錄中，自彭德懷遭受屈辱的 1959 年廬山會議前不久至 1961 年 5 月農業六十條通過期間，竟無一篇陳的講稿，這種現象肯定是有重大意義的。見《陳雲的戰略》，第 XXVI 頁，該書的二位作者也持這一觀點。
【26】 《商業大事記》，第 210 頁。
【27】 關於陳雲在大躍進末期所起的作用，見《起源》，第 2 卷，第 323 頁。有關他在促進進口糧食中所起的作用，見鄧力群《向陳雲同志學習做經濟工作》，第 45 ～ 46 頁。
【28】 《陳雲同志文稿選編》，第 117 ～ 118 頁；《陳雲文選 1956-1985》，第 147 ～ 148 頁；《陳雲的戰略》，第 140 ～ 141 頁。
【29】 《陳雲文選》，第 212 頁。1961 年 8 月～ 9 月廬山會議期間陳曾與毛磋商。
【30】 見沃克：《中國的糧食穀物的收購與消費》，第 161 頁，該書估計 1961 年 -1962 年糧食純進口量為城市需要量的 14%。王耕今認為在隨後的數年中，進口糧食佔城市消費的 40%；見〈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尊重農業是基礎的規律〉，載《經濟研究》1979 年第 12 期，第 36 ～ 38 頁。

【31】 國際小麥理事會:《小麥的貿易安排》，見 1961 年 12 月秘書處第 2 號報告第 58 頁；我非常感謝該理事會的恰德斯特拉先生提供秘書處印發的此份和其它的報告。又見巴里:《中國的糧食收購》，第 26 頁。
【32】 加拿大國際糧食協會 1979 年出版的威爾遜:《加拿大的糧食市場》，第 345～348 頁。此材料對 1973 年雙方有關簽訂合同的談判有一段有趣的描寫，但書中所述 1961-1963 年協議中的數字似有錯誤。
【33】 國際小麥理事會:《1962/63～1965/66 小麥貿易的安排》，見 1967 年 3 月秘書處第 7 號報告第 15 頁。巴里在《中國的糧食收購》，第 21 頁中所提供的數字為 1961 年購買了 278.9 萬噸，但此數字可能是最高的數字，其中包括備選方案，但實際上可能並未採用。
【34】 這是李先念於 7 月 30 日向毛報告的，見《當代中國的糧食工作》，第 123 頁。
【35】 關於陳雲估計中國進口的最大能力為 500 萬噸，見《陳雲同志文稿選編》，第 121 頁。
【36】 根據此項材料，從 1961 年至 1965 年期間進口總量為 2,964 萬噸，另一材料為 547 億斤或 2,735 萬噸，見《當代中國的糧食工作》，第 124 頁。1962 年 1 月劉少奇所說的數字為 1961 年糧食進口 520 萬噸，估計 1962 年需進口 400 萬噸，這兩項數字都低估了。見《劉少奇選集》下冊，第 358 頁。
【37】 《中國統計年鑒》，1983，第 420～421 頁。
【38】 《劉少奇選集》下冊，第 358～359 頁。劉在七千人大會上作此估計，看來過高估計了外匯費用（見表 23）。
【39】 關於貸款條件，見國際小麥理事會秘書處的報告第 2 號（第 58 頁）及第 7 號（第 15 頁）。關於陳雲確認進口糧食對支付進口工業設備及原料的能力所產生的重大影響，見《陳雲同志文稿選編》，第 124 頁。
【40】 《中共黨史人物傳》，第 45 冊，第 275 頁。
【41】 《中國統計年鑒》，1981，第 359 頁。關於 1960 年中蘇分歧的討論，見《起源》，第 2 卷，第 11 章。
【42】 《經濟大事記》，第 296 頁。口號為「以進養出」。
【43】 《陳雲同志文稿選編》，第 118～119 頁；《陳雲的戰略》，第 141～142 頁。
【44】 《中國統計年鑒》，1981，第 356 頁。當然是香港吸收了大量中國出口至這兩個殖民地的產品。
【45】 《李先念文選》，第 261～262 頁。
【46】 《陳雲同志文稿選編》，第 120～121 頁。
【47】 同上書，第 122～123、128 頁。
【48】 同上書。
【49】 關於大躍進末期的定量分配數字，見《起源》，第 2 卷，第 329 頁。
【50】 《陳雲同志文稿選編》，第 123～124 頁。
【51】 同上書，第 124～125 頁。
【52】 同上書，第 125～128 頁。關於工業的詳細情況，見本書第 4 章「縮短戰線」。
【53】 同上書，第 128 頁。
【54】 引自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382 頁。
【55】 陳玉龍（音譯）:《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大事記（1949-1985）》，第 212 頁。李富春在中共九中全會上的講話談到 1960 年第 4 季度從各行各業中派出 2,000 萬人加強農業第一線，不過此舉可以假設為由於秋收季節氣候惡劣所採取的臨時措施；見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 23 卷，第 438 頁。然而早在 1960 年 11 月 12 日中共中央顯然已經看到把這些人從暫時下放農村變為永久居住那裏的好處；同上書，第 403 頁。陳起士的《中國紅軍的政治鬥爭》第 459 頁提到 1960 年全年共下放 1,000 萬人（《起源》，第 2 卷，第 330 頁結語中引用），這個數字亦可假定為短期下放的。
【56】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381～382 頁。
【57】 《當代中國經濟》，第 360 頁。根據此材料，這項工作 1961 年以後越來越困難。關於進一步在 1962 年減少城市人口的決定，見本書第 7 章。

【58】《中國統計年鑒》，1958，第 93 頁。關於毛對中共能夠順利完成此項任務而未遇到大規模民眾反抗感到高興，見《起源》，第 2 卷，第 335 頁。
【59】見《中共黨史人物傳》，第 44 冊，第 93 ～ 96 頁的李富春傳。
【60】6 月 27 日至 7 月 24 日浙江省委召開大會傳達北京工作會議決議並討論；見「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編：《當代中國的浙江》，第 2 冊，第 516 頁。四川省委於 7 月 8 日對此問題發出指示：見「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編：《當代中國的四川》，第 2 冊，第 713 頁。湖南省委於 12 月 5 日發出對下放農村過程中產生的問題的「幾點意見」意味著在幾個月以前就曾有過指示，見「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編：《當代中國的湖南》，第 2 冊，第 632 頁。
【61】北方的山西省黨委於 6 月 8 日召開電話會議討論了減少城市人口問題及其他問題；「山西四十年」編輯委員會編：《山西四十年 1949-1989》，第Ⅲ～ 80 頁。
【62】天津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天津經濟建設大事記（1949-1987）》，第 164 ～ 165、168 頁。
【63】同上書，第 179 ～ 181 頁。
【64】《中國人口：天津分冊》，第 85 ～ 89 頁。與天津在大躍進前的 320 萬人口相比，廣州為 180 萬。（沙巴德：《中國正在變化中的地圖》，第 113、187 頁）；廣州在此項政策下遷出 13 萬人（《曾生回憶錄》，第 646 頁）。
【65】《財政大事記》，第 212 頁。1960 年的數字為 50,440,000；從表 24 的統計數字判斷，此數字未包括農村的「幹部」。有個材料說實際下放的工人和幹部總數為 1,940 萬人；有可能是 940 萬的印刷錯誤；不過，如果不是印錯，那麼可以假定大量工人在被僱用時其他工人則在被解雇。見《當代中國經濟》，第 360 頁。
【66】《山西四十年 1949-1989》，第Ⅲ～ 80 頁。天津和山西兩處的數據說明 6 月初中央連續發出了兩個指示。減少非農業工人和減少城市人口是分別處理的，以下事實可以說明：山西黨組織於 6 月 8 日召開電話會議處理城市人口問題，6 月 11 日召開另一個電話會議處理非農業工人問題；同上書，第Ⅲ～79、80 頁。
【67】原文見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 23 卷，第 489 ～ 491 頁。
【68】同上書，第 489 ～ 490 頁。
【69】同上書，第 490 頁。
【70】同上書，第 491 頁。
【71】《中國人口：天津分冊》，第 88 頁。
【72】《筆祭陶鑄》，第 354 頁。從本書所說的時間看，廣東省將大批工人遣返農村似乎發生在 1960 年。
【73】他的原話見《起源》，第 2 卷，第 335 頁。
【74】《毛澤東書信選集》，第 583 ～ 584 頁。
【75】《財政大事記》，第 212 頁。
【76】1958-1960 年的數字，見劉、吳的《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第 270 頁；1957-1961 年的數字，見薛暮橋：《當前我國經濟若干問題》，第 170 頁。
【77】上海社會科學院「上海經濟」編輯部編：《上海經濟 1949-1982》，第 82 頁。
【78】劉、吳：《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第 278 頁；張澤榮：《中國經濟體系改革紀實》，第 88 頁；《商業大事記》，第 211 頁。
【79】《陳雲的戰略》，第 196、198 頁。
【80】劉、吳：《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第 278 ～ 279 頁。
【81】見前第一章。
【82】《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大事記要》，第 177 頁。由於提高糧食的收購價格被消費品價格和農業投入價格的提高所抵銷，農民的實際收入將低於以上所提供的數字。尼古拉斯·拉迪的《中國現代經濟發展中的農業》著重論述在農村與城市貿易中，總是不利於農民。這對我有幫助，在此我對他表示感謝。

第三章 農村工作的新路線

【1】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902 頁。

【2】 毛給田家英的指示信複印於《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9 冊，第 421 頁。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第 41 ～ 42、107、177 頁出現 3 次；由於此信重要，所以在《毛澤東書信選集》第 574 ～ 575 頁又全文印出。又見政治學院中共黨史教研室編：《中國共產黨六十年大事簡介》，第 483 頁。洪承華與郭秀芝：《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體系沿革大事記，1949-1978》，第 219 頁，毛在他「個人組織與領導的」這些省進行調查時的講話。

【3】 李銀橋：《在毛澤東身邊十五年》，第 268 ～ 271 頁。事實上河南省委反而把工作組派到了許昌地區，在那裏呆了 6 個月。工作組另一個成員林克說這是因為那裏的公社整頓差不多已完成；見林克、徐濤、吳旭君：《歷史的真實——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證言》，第 242 頁。可能真正的原因是省領導不願意讓這樣一個通天的工作組去一個情況惡劣的地區，見前面的導言。這個工作組向毛彙報後又在貴州省勞動了 6 個月。這不是毛第一次派他的警衛人員外出作現場調查；在 1955 年夏季集體化運動期間，他的警衛人員也做了類似的工作，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5 冊，第 208 ～ 211 頁。可能是之前的先例令李銀橋誤以為這是一次真正的調查，實際上毛的醫生透露，這不過是毛精心策劃的計謀，汪東興也默認了。毛借此將貼身工作人員中的腐敗分子清除出去，包括李在內。這樣毛就無需對他的家從們當面承認，他已經無法忍受這些人。1960 年 12 月 25 日，爲了慶祝他次日的 67 歲大壽，毛舉辦家宴，僅他的家人和工作人員參加。毛精心引用了一個典故來矇騙那些即將被遣走的人。他們試圖拖延到春節之後再啟程，但毛堅持要他們立即動身。關於這個“調查”的真實意圖，參見李，《毛主席的私人生活》，第 337-45 頁；關於毛講話的文稿，見《炎黃春秋》，1993 年第 7 期，第 2-4 頁。

【4】 《中共黨史人物傳》，第 50 期，第 166 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902 頁。

【5】 1941 年 2 月，28 歲的胡成為毛的秘書之一，同時也是政治局的秘書；雖然 1961 年田家英是毛的主要的日常工作秘書，多病的胡仍在形式上保留那個位子，直到 1966 年 6 月；見《新華月報》1992 年第 10 期，第 77 ～ 79 頁轉載的官方訃告。胡大概是中共宣傳部門中最重要的筆桿子。在 50 年代，他在《人民日報》上寫過一些非常重要的社論；同以上材料及《胡喬木文集》；他還協助起草 1956 年八大的主要檔；《新華月報》1992 年第 10 期第 77 ～ 79 頁及張榮（音譯）《風雲人物見聞錄》第 69 頁。毛與胡還在詩詞方面交換看法；徐及之：《毛澤東與胡喬木的詩詞交往》，載《黨的文獻》1993 年第 6 期，第 81 ～ 86 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2 冊，第 231 ～ 236、450 ～ 454 頁。

【6】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902 頁；若干地方幹部也參加了這些調查組（同上書）。關於鄧力群，見「中共人名錄」編輯委員會：《中共人名錄》，第 850 頁；關於許立群，見聯合研究院：《共產中國名人錄》（第 2 版），第 271 ～ 272 頁；關於逄先知，見中國名人錄編輯部編：《中國名人錄：當代領袖》，第 526 ～ 527 頁。

【7】 《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第 107 頁。關於調查過程以及田的調查組成員之一逄先知處理問題的報道，同上書，第 42 ～ 45 頁；另一報道見上書，第 176 ～ 187 頁。鄧力群保留的廣東組的調查材料，見「1961 年廣東農村調查的一組材料」，《當代中國史研究》1994 年第 1 期，第 62 ～ 70 頁。

【8】 《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第 45 頁。毛還引用了他在杭州和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江華及省委另一書記林乎加的談話；同上書。根據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913 ～ 914 頁，到那時為止，毛已感覺到快速的變化影響到對公社制訂規章制度。

【9】 同上書，第 45 ～ 46 頁。

【10】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915 ～ 916 頁。

【11】 葉永烈：《陳伯達其人》，第 201 頁；為知情人 C 所證實。
【12】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903 頁；從 1958 年的一件事看來，廣東組組長陳伯達由於對農業的無知，他很容易被農村幹部愚弄，見張希賢：《陳佈雷與陳伯達》，第 326 頁。
【13】 《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第 47 頁。
【14】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916 頁。
【15】 《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第 47 頁。又見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資料組編：《中國共產黨歷次重要會議集》，下冊，第 148 頁；郝孟筆與段浩然合編：《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 526 頁。
【16】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915 ～ 916 頁。
【17】 同上書，第 916 ～ 917 頁。關於某些討論的摘要，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9 冊，第 446 ～ 450 頁。
【18】 洪承華與郭秀芝：《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體制沿革大事記》，第 221 頁。這篇文章系兩個月前才由中國革命博物館中公開；見《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第 355 頁注。文集中主要內容之一已譯成英文；湯普森：《毛澤東：來自尋鄔的報告》。毛一貫強調調查，可以想像此時他再度堅持此點是由重新發現這篇文章激發的。當這篇文章於 1964 年重新公開發表時，題目改為《反對本本主義》；見《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第 20 ～ 28 頁。
【19】 《六十年大事簡介》，第 483 ～ 484 頁。有關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在這次會議上發表的謹慎的正統觀點受到毛的歡迎，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9 冊，第 454 ～ 455 頁。
【20】 還有兩位政治局常委，共七人。朱德元帥參加了會議，偶爾發言，也許近年來他作為一名政治局常委所作的惟一一次有重大意義的行動就是企圖在 1959 年廬山會議上保護彭德懷元帥，但未能成功。見《起源》，第 2 卷，第 229 頁和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218 頁。林彪元帥在廬山會議之後代替彭德懷為國防部長，在政治上十分突出，但只是階段性活躍，而且主要在軍事問題上。
【21】 關於毛把黨中央領導分為第一線和第二線，見《起源》，第 1 卷，第 152 ～ 156 頁及第 2 卷，第 172 ～ 178 頁。關於此前高級領導召集地區會議而毛未參加的例子，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4 冊，第 605 頁注 1。
【22】 《山西四十年，1949-1989》，第 I I I ～ 97 頁（在 3 月 17 日～ 22 日及 3 月 20 日之下）。可以將此與 1957 年整風運動前夕作一有趣的比較：當時連續發出兩條指示以致在省一級造成混亂；見《起源》，第 1 卷，第 207 ～ 210 頁。在整風運動正式指示之前，必然先發出一個指示。關於證實這個假設的情況，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6 冊，第 432 ～ 433 頁。
【23】 同上書，第 60 頁。
【2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9 冊，第 440 ～ 441 頁。在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 23 卷第 448 頁中，信件並非全文，亦無收信人姓名。叢進引用該信並寫出收信人姓名，見他所著《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376 頁。該信寫於上午 8 時，但薄一波說主席後來改變了主意，未送出；見《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904 ～ 905 頁。
【25】 有些材料說會議於 3 月 14 日開始；見《六十年大事簡介》，第 483 ～ 484 頁；廖蓋隆等：《新中國編年史》，第 185 頁；《重要會議集》，下冊，第 148 頁；《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第 48 頁。但具有同樣權威性的材料稱廣州會議於 3 月 15 日開始；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905 頁；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376 頁；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1919.5 ～ 1987.12）》，第 253 頁；《中共黨史大事年表》，第 312 頁；《經濟大事記》，第 300 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與中共中央黨校合編：《劉少奇論黨的建設》，第 685 頁。有個材料兩個時間都採用：蔣華玄、張蔚萍、肖合編：《中國共產黨會議概要》，第 455、457 頁。「正式」開始日期不確定可能只是反映倉促召開的工作會議其實只是「半正式」性質，雖然中國人通常是不允許如此含糊不清的。據知情人 S，在北方組人員於 14 日晚上

9 點到達後，先開了個預備會議，有些作者明顯認為預備會議不算正式會議的一部分。不管怎樣，在 3 月 15 日以前似乎沒有討論任何重大問題，因為 3 月 14 日和 15 日毛的調查組和廣東省委還在廣州市以西 75 英里處與生產大隊幹部討論農村問題，估計那時他們還在那裏；《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9 冊，第 443 頁。這個問題可能是不重要的，可以等待官方正式澄清。

【26】 一位參加廣州會議者的私人通信。

【27】 《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第 595 頁。這個材料稱陳伯達是六十條的起草人；文化大革命中的激進分子不會把功勞給鄧子恢，更不會給陶鑄。同樣，文化大革命之後歷史學家也不會把功勞歸於陳伯達，而在早些時候有些材料都說陳伯達是主要起草人；逄先知在他的《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一書中強調田家英起了關鍵作用，儘管他也提到了陳伯達。這種感情用事給局外的分析者造成更多的困難。對於陳伯達在經濟方面所起破壞作用的猛烈攻擊，見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合編：《社會主義經濟中計劃與市場的關係》，上冊，第 98、253 頁。

【28】 關於鄧子恢對廣州會議通過的建議草案的貢獻，見《中共黨史人物傳》，第 7 冊，第 372 ～ 373 頁。薄一波在談到鄧的六十六條而不是四十條的問題時，指出王錄是毛的調查組成員之一，也是在廣州協助起草者。他幫助鄧子恢起草有關公社的建議；《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912 ～ 913 頁。毛對鄧的稱讚十分引人注目，因為儘管在革命時期鄧一直與毛關係密切，可是他在 1955 年政治上受到挫折後再也未能恢復原來的地位。那時毛改變了方向，鼓吹加速集體化，鄧跟不上。鄧在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的領導倒不是完全有名無實的，但到 1961 年他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已相當削弱了。當劉召鄧讓他調查 1960 年夏季的農村形勢時，鄧當時正因頭上的政治陰雲而被迫在家無所事事。關於鄧的挫折，見《起源》，第 1 卷，第 19 頁；關於導致鄧的挫折的那篇講話，見《黨史研究》1981 年第 1 期，第 2 ～ 9 頁；關於當時黨內有關集體化的辯論，見同書第 10 ～ 17 頁；關於 1955 年毛改變集體化的速度，見《中共黨史人物傳》，第 7 冊，第 366 ～ 372 頁，特別是第 371 頁；關於鄧的被迫在家閒住，見同書第 372 頁；關於文化大革命後對於鄧的觀點及貢獻的分析，見中國農業經濟學會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發展研究所合編《鄧子恢農業合作思想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29】 在毛的指導下制定的農業十二年規劃中規定國家分為三個地區分別定出增產數量，見趙國鈞（音譯）：《中國共產黨的農業政策》，第 331 頁。

【30】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167 號，第 2 頁；《中國大陸雜誌選》，574 號，第 15 頁；《中國大陸報刊概覽》，3903 號，第 2 頁；《中國大陸報刊概覽》，3908 號，第 2 頁；《鄧小平自白書》，第 6 頁。

【31】 「是哪個皇帝決定的？」見《東方紅》1967 年 2 月 18 日，第 20 期，第 6 頁（譯文載於《中國大陸報刊概覽》，3903 號，第 2 頁）；又見《鄧小平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言論選編》，第 4 頁。這些文化大革命中的攻擊並未得到證實，而具有中國傳統智慧的歷史學家們認為那時面臨著明顯的全國緊急狀態的毛，覺得和同事們協作比對抗好。但是這種分析低估了毛的迅速轉變的情緒；對於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人來說，製造莫須有的事簡直是小事一樁了。

【32】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見《東方紅》1967 年 2 月 18 日，第 20 期，第 6 頁及《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187 號，第 25 頁。關於廣州會議後所發命令的文本略有不同，見以下注 58。

【33】 關於忽視四十條的事是一位參加會議者私人透露的。關於陶鑄所起的作用，見中共祁陽縣委編：《懷念陶鑄同志》，第 80 頁。這個材料很可能只是反映南方會議預備會的情況而非隨後的聯合工作會議。由於草案最後定稿的小組似乎是在 3 月 19 日成立的（最後的第三稿於 21 日完成），而小組成員由中南局的王延春和趙紫陽及其他區各局代表組成，但無陶鑄，這就使陶鑄在會議上究竟起一個什麼角色的問題更難確認了；《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第 48 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917 頁。但另一個材料說陶鑄

在擔任起草委員會主席期間，直到5月還一直在進行農村調查；見《新華月報》1989年第11期，第50頁。不過另一材料在談到陶鑄在檔定稿中所起的作用時，強調他在起草委員會中所起的作用是保證委員會能很好運轉而不在檔的具體內容；見《筆祭陶鑄》，第406頁。不管陶鑄在起草檔的過程中做了多少，他的領導作用還是引人注目的，因為文化大革命中的傳說和文化大革命後的檔以及一位曾參加檔起草者都說，陳伯達在南方會議中是個重要角色。陳伯達不但是政治局委員，與毛有密切關係，而且是黨的理論雜誌《紅旗》編輯、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陳也許只想扮個幕後的智囊人物，因為他是最初提出人民公社形式的人，而此時人民公社正在起變化了。（關於陳伯達在建立人民公社中所扮的角色，見《起源》，第2卷，第78～82頁和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738～739頁；他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的事在《毛澤東書信選集》第511、575頁中提到。毛當時的秘書田家英在1958年10月至1961年1月曾任該研究室副主任。）與陳的情況類似，譚震林——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大躍進期間農業方面最高領導，在這個後退時候也應保持低姿態了（關於大躍進期間譚震林所扮演的角色，見《起源》，第2卷，第60～61、82～83、122～124、127、221、299頁。）不過其他的中央官員們，如農業部長廖魯言，由於他們在大躍進中所處的地位，可以幹這個工作而不丟失面子。

【34】 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一書標題頁的有一張廣州會議的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到朱德與林彪。

【35】 逄先知稱劉是3月15日講話的，而3月19日劉的講話收在劉的講話集中，講話集也包括劉在3月15日的這個講話，見以下注59。參照《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第48頁與《劉少奇論黨的建設》第685頁。

【36】 《新華月報》，1989年，第11期，第50頁。

【37】 文化大革命期間，有人曾引用陶鑄一次說的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誰佔有最多的糧食，誰的話就最有份量」；《中國大陸報刊概覽》，4018號，第3頁。有關對此時四川糧食情況的簡短討論，見本書第7章。

【38】 在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時，毛開始第一次從大躍進的極左路線上後退，他批評陳伯達取消貨幣的建議；《起源》，第2卷，第131～132頁。那時他對陳說「你馬列主義未學好，去廣東向陶鑄學習」；葉永烈：《陳伯達其人》，第191頁。然而幾個月後他對陶的欣賞突然減退，令人吃驚。他批評陶和陶的副手趙紫陽揭發隱瞞糧食的做法太過激進，毛說珠江兩岸沒有多少馬克思主義！見《起源》，第2卷，第156～159頁。

【39】 《懷念陶鑄同志》，第104頁。

【40】 《黃克誠自述》，第260～261頁。

【41】 三月草案原文登在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23卷，第452—461頁及《農業集體化》，下冊，第455～469頁。六月草案的原文亦見於後者第474～491頁。關於農業六十條在解放軍中討論的報道，見鄭起士：《中國紅軍的政治》，第465～470、491～498、515～526、582頁。有一份報告（第465頁）稱「少數人在暫時困難的情況下，他們的信心有所動搖，從不堅定到懷疑，他們開始問黨的政策和人民公社制度的優越性到底是真的還是想像的。個別人甚至違反法律、法令，損壞了黨和國家的利益」。戰士們很清楚「六十條不是向前發展而是向後退卻」（第493、515頁）。他們問為什麼市場緊張物價高漲（第467、515頁）。有個單位30%的幹部和50%的戰士對農村形勢明顯感到困惑（第466頁）。另一個單位中有人說「農村中糧食定量太低，根本不夠吃」和「部隊中的定量也不夠」（第495頁），造成部隊官兵憂慮的原因大多是來自官兵的家信——有些戰士每月收到5或6封信——此外嚴重缺糧區戰士的親屬不斷增加來營探親也是重要原因（第580頁）。

【42】 同上書，第406、456頁。

【43】 《毛澤東書信選集》，第570～571頁；《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第49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905頁。1960年10月的

信寫給李富春，估計是因為他的上級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鄧小平與彭真正在莫斯科參加11月的81國共產黨最高級會議的預備會議；見《起源》，第2卷，第284頁。關於毛於1959年初攻擊平均主義和財產的轉移見同書第146頁。毛的批評「一平二調」得到彭真於6月在北京一次黨的會議上的響應，但這又是「文化大革命」中作為攻擊彭的諸多理由之一；見《彭真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選編》，第34頁。

【44】《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年6月）》，下冊，第331～332頁；《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第48～49頁；廖蓋隆等：《新中國編年史》，第185頁。

【45】公社的各級名稱是在廣州會議上作最後一次修改的。自從1959年初第二次鄭州會議以來公社以下的主要一級的正式英文譯名為brigade（生產大隊），它實際上是production group（生產隊），下麵一級譯為team（生產隊）實際上卻是生產小隊。現在反映出它的相對重要性正在增加，按實際情況生產隊譯為team（不是生產小隊），生產大隊譯為brigade（不是生產隊），名稱的混亂可以以山西為例，山西省委1月30日決定把公社以下的行政層次名稱由「管理區」改為「生產隊」，最低一級的「生產隊」改為「生產小隊」；廣州會議後，在全國範圍內又作了新的名稱變換；見《山西四十年（1949-1989）》，第ＩＩＩ～79頁（在1月30日和3月20日兩個日期下）。關於公社各級名稱混亂的討論，見《起源》，第2卷，第181～184頁。

【46】毛曾說公社是各大隊的「聯合組織」；材料來源同上。

【47】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23卷，第452頁。

【48】同上書，第2條。關於毛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對平均主義的批評，見《起源》，第2卷，第146～155頁。

【49】第2條與第5條見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23卷，第452頁。有關公社各級機構的大小如何才合適的詳細材料以及「文化大革命」後的分析認為六十條的最重要意義在於縮小各級機構的規模，見中共黨史研究會：《學習歷史決議專集》，第121～122頁。關於公社數量的增加，見多姆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英文本，第48頁。在北京以南120英里的定縣（1986年改為定州市）公社數由9個增加到53個，幾乎增加了5倍（原文如此），大大超過了全國公社數擴大的比例：每個新公社的人口平均為12,000；見定州卷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國情叢書——百縣市經濟社會調查：定州卷》，第36頁。自1926至1933年定縣是經濟與社會的主要調查地點，該地的調查資料為定州卷分析的變化提供了基礎材料；見甘布爾：《定縣：一個華北農村社團》。

【50】第10、11、14條；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23卷，第453～454頁。

【51】第16條；同上書，第454頁。

【52】第20條；同上書，第455頁。

【53】第33、37條；同上書，第457頁。

【54】第43～45條；同上書，第459頁。

【55】第47條；同上書。

【56】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377頁。

【57】《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年6月）》，下冊，第331～332頁。

【58】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23卷，第462頁；洪承華、郭秀芝：《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體系沿革大事記》，第222頁；胡喬木起草，毛和田家英修改的信（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905～906頁）於3月23日發出。1961年12月26日（毛68歲生日），毛給《詩刊》的編者寫信說，在他對詩的問題作進一步研究前，他對詩無發言權；《毛澤東書信選集》，第589頁。

【59】《劉少奇論黨的建設》，第685～688頁；《周恩來選集》，下卷，第320～321頁。在劉於3月19日的正式講話之外，根據一位參加者的私人通信說劉在15日還在一個小組會上講了家庭副業生產是「經濟民主」。

【60】張天榮：《關於1962年七千人大會的幾個問題》，1981年5月12日，第2頁。

【61】 即使在他死後也很少有人談到這點；見石仲泉：《周恩來的卓越奉獻》，第 341 ～ 342 頁。1961 年 5 月中共中央辦公廳一個叫戚本禹的工作人員寫了一篇對調查方法的犀利分析，毛認為這篇文章非常重要，因而放在北京工作會議的議事日程上；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9 冊，第 504 ～ 506、512 頁。

【62】 關於毛的親自調查，見 1961 年 5 月 2 日《人民日報》；《中共黨史人物傳》，第 50 卷，第 168 頁。毛的湖南之行給他極大的震動，因此命令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到長沙幫助擺脫困境；《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9 冊，第 465 ～ 467、482 ～ 483、494 ～ 495、499 ～ 500、510 ～ 512 頁。又見龔固忠、唐鎮南、夏遠生：《毛澤東回湖南紀實，1953-1975》，第 104 ～ 122 頁。關於毛的調查組，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907 頁。關於田家英，有些旅程還有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和《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一起陪同他，見《人物》1981 年第 5 期第 82 頁及《當代背景》874 號第 53 頁。

【63】 《當代中國的湖南》，第 2 卷，第 631 頁；龔固中、唐鎮南、夏遠生：《毛澤東回湖南紀實，1953-1975》，第 113、116 頁。

【64】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907 頁；《重要會議》，下冊，第 153 頁；卓愛國、薛建華：《中國大廣角》(Ⅰ)，第 9、11 頁。後者（第 11 頁）以周恩來 5 月 7 日的工作日誌說明總理時間安排極為勞累：清晨 2 時開始工作，與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商討有關老撾的會議，工作到晚 7 點 50 分結束。有一張周和一些農民談話的照片，見中國革命博物館編：《紀念周恩來》，第 367 張。周在邯鄲期間的完整工作時間表，見 1983 年《文獻和研究》第 88 ～ 92 頁，這張時間表是從周和他的秘書保存的從 1950 年 1 月以來的詳細工作日誌中抽出的，由周的遺孀鄧穎超於 1981 年送交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周的邯鄲組可能曾由公安部長謝富治領導，在薄一波的書中稱謝亦曾調查過該縣；《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907 頁。如果上述情況屬實，材料中缺少周與謝之間的直接關係，（其他材料都未提到謝曾領導邯鄲組）可能是因為謝在文化大革命中聲名狼藉之故。

【65】 周去雲南的主要原因是與緬甸總理吳努進一步會談；見懷恩（音譯）：《周恩來生平大事記》，第 421 頁。有一份材料說，周在此行前不久剛剛因某種原因接受手術，醫生建議他取消訪問，但周未聽醫生勸告；見《我們的周總理》，第 111、171 頁。周的妻子鄧穎超在 1961 年也有一段時間住院；同上書，第 468 頁。

【66】 張全珍、侯光文、王永盛合著：《周恩來的感情世界》，第 107 ～ 108 頁。尴尬的幹部要處罰那農民，被周制止，並在隨後的北京工作會議上引用了他的話。

【67】 《經濟大事記》，第 302 頁；卓愛國、薛建華：《中國大廣角》，第 10 ～ 11 頁。後者提供了電話記錄要點。

【68】 「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編：《當代中國的北京》，第 1 卷，第 155 頁；《新北大》1967 年 6 月 14 日，第 4 頁；《中國大陸雜誌選》，640 號，第 19 ～ 21 頁；《中國大陸報刊概覽》，4014 號，第 2 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907 頁。鄧在廣州會議上的發言也許是響應毛的批評，也強調調查的重要性，並說由於缺乏調查以致公社建立過快：「過去幾年，我們放棄了調查研究的方法……每個人談起話來都有點狂熱。我們把個人感情代替了政策……在集體化過程中從互助組到低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低級農業社），由低級農業社到高級農業社都有法可依。即使大吹大擂地進行私營工商業改造，事先也還有調查和討論，工作進行得細緻穩妥，可是在建立公社上，我們走得太快了。」見《進軍報》1967 年 3 月 26 日，第 4 版第 2 欄。〔此處稱發言的日期為 1961 年 4 月〕；同上，1967 年 6 月 14 日第 2 版第 3 欄；《徹底清算鄧小平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滔天罪行》，第 4 頁；《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208 號，第 10 頁。

【69】 帥東兵：《最初的抗爭：彭真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第 18 頁。

【70】 關於鄧拓與毛之間在百花齊放期間的問題，見《起源》，第 1 卷，第 193～194、201、282、312 頁。
【71】 《經濟大事記》，第 302 頁；《六十年大事簡介》，第 484 頁。關於敵意的評論，見《彭賊「懷柔調查」是劉鄧黑司令部陰謀復辟資本主義的嚴重步驟》中各處。關於調查組成員及對鄧拓所起作用的描述，見第 25～26 頁。
【72】 《六十年大事簡介》，第 484 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9 冊，第 492～293 頁。
【73】 《李先念文選》，第 257 頁。
【74】 《重要會議集》（下），第 153 頁。該年早些時候朱德曾去江西；郭思敏、天羽合編：《我眼中的朱德》，第 332 頁。關於朱德在 60 年代初期的多次外出調查的記載可以看出他在晚年（將近 80 歲）所扮演的角色。他儘管沒有實權，但仍是政治局中有活力的常委，見青木：《中國元帥朱德》，第 508 頁。像朱德這樣的著名領袖，所到之處，人們都非常謹慎，詳見對朱 1960 年 3 月返回四川的描述，《朱德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第 30 頁。
【75】 《中共黨史人物傳》，第 31 卷，第 94～95 頁；金野（音譯）：《回憶譚震林》，第 395 頁；董保存：《譚震林外傳》，第 72～74 頁。
【76】 關於陶鑄及其他人在中南地區的情況，見《懷念陶鑄同志》，第 94、96 頁及《新華月報》1989 年第 11 期，第 50 頁；關於東北地區，見遼寧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站「伐宋兵團」：《堅決打倒東北地區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宋任窮》，第 2 頁。其他外出視察的領導包括去河南的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勳、去遼寧的共青團第一書記胡耀邦、去四川的陳正人、去山西的廖魯言；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901 頁。
【77】 關於彭德懷，見他的遺孀浦安修在《新華文摘》1981 年第 5 期，第 174 頁上所述材料；又見本書第 7 章的討論。關於林彪，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9 冊，第 487 頁。
【78】 《懷念劉少奇同志》，第 60、335 頁。劉於 8 月去黑龍江大慶油田視察；康世恩：《少奇同志視察大慶油田》，見《黨的文獻》1993 年第 5 期，第 24～26 頁。
【79】 同上書，第 60 頁。在文化大革命反劉的爭論中以及文化大革命之後為他恢復名譽時均很重視劉對大慶的視察。下列兩個材料我都採用：文化大革命的報告說劉於 4 月 2 日至 5 月 16 日視察大慶——見《中國大陸雜誌選》（補遺）26 號，第 1 頁；1967 年 3 月 9 日，《東方紅報》第 5 頁；《劉少奇反革命罪惡史》，第 37 頁。
【80】 卓愛國、薛建華：《中國大廣角》（2），第 19 頁。秘書一職可以擔任許多不同工作，幾乎可以肯定王光美是劉的行政秘書（按：原文為辦公秘書）而非政治秘書。關於中共的人事制度，見李偉（音譯）：《中國的人事制度：官僚控制與綜合管理的機制》。
【81】 《中國大陸雜誌選》（補遺）26 號，第 6 頁；《懷念劉少奇同志》，第 68、335、342～343 頁；呂星斗：《劉少奇和他的事業》，第 500 頁。當時隨同劉少奇的官員當時毫無疑問自以為地位特殊，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們在會上、書報上，甚至在戲劇中都被批為劉的「走狗」。
【82】 李偉：「對中國中央領導人的保衛工作」，只有周恩來始終知道毛的行動，而且他也只瞭解一部分情況。
【83】 在廬山會議前夕，毛於 1959 年回到過韶山；見《起源》，第 2 卷，第 187～190 頁。
【84】 《懷念劉少奇同志》，第 60、65、327、331、342～344、346～362 頁；《紅旗飄飄》，1980 年第 20 卷，第 242 頁；《中國大陸雜誌選》（補遺），26 號，第 16～17 頁。關於毛對杭州的喜愛，見《起源》，第 1 卷，第 370 頁（27）。
【85】 《懷念劉少奇同志》，第 60、323、325、336 頁；《中國大陸雜誌選》（補遺）26 號，第 16 頁。
【86】 《懷念劉少奇同志》，第 66 頁。
【87】 《紅旗飄飄》1980 年第 20 卷，第 187 頁。

【88】《懷念劉少奇同志》，第 60、323 頁；楊尚昆：《懷念劉少奇同志》，見《紅旗》1980 年第 8 期，譯文見聯合出版研究社 75921 號，第 13～14 頁。根據文化大革命中的反劉材料，劉不僅返回長沙參加會議兩天，第三天還去了天華山。該材料說他的調查大部分時間不過是坐在辦公室裏聽彙報；見《中國大陸雜誌選》(補遺)，26 號，第 4、17 頁。
【89】《懷念劉少奇同志》，第 61、324～325、329、346～348 頁。1962 年 3 月劉寫信給大隊以確認取得的進展得以保持；同上書，第 326 頁。據說那時其他領導更加直率：共青團第一書記胡耀邦對手下的一些人說，「在食堂問題上，湖南騙了主席。一個人由於缺乏調查研究是會上當受騙的。結果上當受編者反過來也會使人上當受騙」。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194 號，第 30 頁。
【90】《懷念劉少奇同志》，第 324～325 頁。
【91】同上書，第 325 頁；《中國大陸雜誌選》(補遺)，26 號，第 10～11 頁。
【92】《中國大陸雜誌選》(補遺)，26 號，第 3～6 頁。
【93】同上書，第 6 頁。此材料中「回想起來……平息」一段不在引號內，但從上下文看，該段應在引號內。
【94】呂星斗：《劉少奇和他的事業》，第 516～517 頁。彭所說的原話是 (王談到彭時只是用她辦公室的名字而不是她的名字)：「劉鬍子，你竟敢用右傾分子。」「右傾」是指彭德懷和他名義上的支持者，這些人在 1959 年廬山會議中因批評大躍進而遭受攻擊。另一材料引用彭的話說「劉鬍子，你不是來抓生產，是來找岔子的」。見劉少奇研究論文集編輯組編：《劉少奇研究論文集》，第 377 頁。
【95】同上書；《懷念劉少奇同志》，第 350～351 頁。
【96】同上書，第 328～330 頁；《紅旗飄飄》1980 年第 20 輯，第 192～193 頁；《劉少奇選集》，下冊，第 329～330 頁。
【97】鮑若望與切爾明斯基合著：《毛澤東的囚徒》，第 265 頁。
【98】《懷念劉少奇同志》，第 328～329、356～358 頁。
【99】同上書，第 329～330、358 頁；《紅旗飄飄》1980 年第 20 輯，第 207～208 頁；《劉少奇選集》，下冊，第 330～331 頁；《中國大陸雜誌選》，602 號，第 10 頁。1980年劉恢復名譽後，已有二百年的老屋——劉及家屬的老家住所，闢為紀念館。劉的老家房子離韶山毛家只有 45 分鐘的汽車行駛路程，劉的房子有 23 間，顯然超過毛的 13 間。劉有三個哥哥住在那裏直到最後一個死於 1970 年。1986 年筆者訪問劉的老屋時，劉的最後一個哥哥的兒子仍住在附近務農。
【100】呂星斗：《劉少奇和他的事業》；《懷念劉少奇同志》，第 329～330 頁。
【101】《中國大陸雜誌選》(補遺)，26 號，第 13 頁；另見王光美所引的一些簡短的話，《劉少奇和他的事業》，第 516 頁。
【102】《劉少奇選集》，下冊，第 330 頁；《懷念劉少奇同志》，第 327～332、354、356、359～360、362 頁；《紅旗飄飄》1980 年第 20 輯，第 191～192、193～194 頁；劉戰明：《劉伯伯教我不怕鬼》，1980 年 5 月 15 日《人民日報》第 2 版；陳澱國：《群眾的貼心人》，同上，1980 年 5 月 22 日第 8 版；《中國大陸雜誌選》(補遺)，26 號，第 9 頁。劉愛琴：《女兒的懷念》，第 61～62 頁。劉愛琴是劉與前妻所生的女兒。
【103】呂星斗：《劉少奇和他的事業》，第 504 頁。王光美在敘說他們湖南之行時引用了劉的話，但未說明劉是在何時、何地說的。劉在 1961 年 5 月中央工作會議上對高級幹部的講話中有所不同，他的評價略有差別，較少自我批評；見《劉少奇選集》，下冊，第 338 頁。在 1962 年 1 月的七千人大會上劉講的是王光美所引用的原話，但不那麼直截了當。在談到兩個五年計劃時用「有人說」，在自我批評的估價時，明確地以「一方面我們的經驗還不夠」的理由開頭；同上書，第 423～424 頁。
【104】《劉少奇選集》，下冊，第 329 頁。
【105】《中國大陸雜誌選》(補遺)，26 號，第 2 頁；在文化大革命後我還未能找到與此相當的詞句。劉的引用和史實略有出入，雖然秦和隋兩個偉大統一朝代由於

極端壓迫而迅速崩潰，秦朝被推翻的是秦始皇的兒子。關於秦始皇和隋煬帝的暴政，見赫克爾：《中國舊日的帝國》，第 42 ～ 47、138 ～ 139 頁。關於文化大革命中傳說劉的確曾說過毛犯了錯誤的事，還有一個不太可信的說法，說劉曾要求毛退休等事，見《毛澤東主義戰報》，1967 年 4 月上旬出版，第 3 頁第 2 欄。關於毛與秦始皇的比較，見《起源》，第 2 卷，第 206 頁。當他聽到一年前一位湖南年輕姑娘由於抗議他家遭受的苦難而在國務院辦公室貼大字報，被投入監獄時，他忿怒了。在湖南期間，他見到的嚴峻局面可能是他發怒的原因。見《紅旗飄飄》1980 年第 20 輯，第 188 ～ 190 頁及《懷念劉少奇同志》，第 339 ～ 341 頁。

【106】見《起源》，第 2 卷，第 153 頁。

【107】《中國大陸雜誌選》（補遺），26 號，第 9 頁；《劉少奇選集》，下冊，第 331 ～ 332 頁。

【108】《中國大陸雜誌選》（補遺），26 號，第 2 頁；《劉少奇選集》，下冊，第 332 ～ 333 頁。

【109】見《起源》，第 2 卷，第 146 ～ 153 頁。

【110】邢振（音譯）：《一切都應從實際出發》，見《新聞研究資料》1980 年第 3 期，第 4 頁；耿盛（音譯）：《我們必須實事求是》，材料同上，第 6 頁。（這個講話未編入《劉少奇選集》下冊裏。）

【111】《新聞研究資料》1980 年第 3 期，第 5 頁；呂星斗：《劉少奇和他的事業》，第 501 頁。

【112】關於王光美講述劉在湖南之行中瞭解事實的困難，見上書，第 501 ～ 503 頁。關於高級幹部難於區別什麼是真理，什麼是謊言，什麼是事實，什麼是誇大的問題，薄一波在談毛在 1959 年發動集體化「高潮」中有所解釋；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 374 ～ 375 頁。薄一波作為 1956 年八大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直到文化大革命前一直是高級經濟官員的對劉少奇和其他高級官員在深入基層後所面臨的問題是十分瞭解的。

【113】《新聞研究資料》1980 年第 3 期，第 5 頁。又見劉愛琴：《女兒的懷念》，第 59 ～ 62 頁。關於陶鑄返回祁陽縣，見《新華月報》1989 年第 11 期，第 50 頁。關於鄧子恢在福建調查 20 天，見《中共黨史人物傳》，第 7 卷，第 373 ～ 374 頁。長征期間，鄧子恢、張鼎丞和譚震林（湖南人）留在後方以保衛福建蘇區；見同上書，第 329 ～ 340 頁及克萊因與克拉克：《中國共產主義人物辭典 1921-1965》中三人的傳記。

【114】《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201 號，第 29 頁。九中全會不久，據說劉對《人民日報》編輯說，如果他們想不犯錯誤，就不要把新聞和現實聯繫得太密切。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4253 號，第 23、24 頁。

【115】關於毛與劉在大躍進期間的情況，見《起源》，第 2 卷，第 81、220、230 頁。關於劉在廣州會議上，見《劉少奇論黨的建設》，第 686 ～ 687 頁。關於周的 1957 年 6 月 25 日的指示，見許祥（音譯）：《周總理與記者們的談話》，見《新聞研究資料》1980 年第 3 期，第 24 ～ 28 頁。

【116】《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201 號，第 30 頁。

【117】《起源》，第 2 卷，第 42 ～ 43、302 ～ 304、363（5）、376（9）頁。後來劉到黑龍江，從 1961 年 7 月 18 日到 8 月 10 日用 20 天到大小興安嶺和張廣才嶺，視察了在大躍進期間因過度砍伐森林而遭破壞的木材工業，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 30 期，第 71 ～ 83、230 ～ 232 頁。他發現有些森林企業完全處於無政府狀態；《中共黨史研究》，1988 年第 5 期，第 12 頁。他的黑龍江之行不如他的湖南之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那麼引人注意，他和他的妻子在鏡泊湖畔休息了幾天；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與新華通訊社合編：《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第 31 頁。根據此書第 284 頁，劉在黑龍江的時間為 7 月 16 日至 8 月 11 日。劉調查問題的嚴重程度由 1958 年森林覆蓋面積為 2513000 公頃減至 1961 年的 717000 公頃可以看出；見 1981 年《統計年鑒》，第 161 頁。

【118】關於劉於1960年的視察，見《起源》，第2卷，第303～304頁；關於1961年的視察，見段君毅等：《少奇同志，河南人民懷念你》，1980年5月21日《人民日報》第2版第2欄。
【119】劉在大躍進期間說成績與缺點是八與二之比，但在河南則說是七與三之比；《劉少奇論黨的建設》，第687頁。
【120】1960年末西藏的黨和軍隊的高級官員張國華調查了信陽的悲劇並向周恩來報告，周立刻派國務院工作組去河南；見程華：《周恩來和他的秘書們》，第286頁和權延赤：《陶鑄在「文化大革命」中》，第211～212頁；邁克爾·捨恩海爾斯使我注意這些材料，我對此十分感謝。關於大躍進對河南的整個影響，見前面的導言。
【121】見克萊因與克拉克《人名辭典》中的劉建勳與吳芝圃傳。劉建勳由廣西調至河南，他於1957年至廣西接替陳漫遠為廣西省委第一書記，當時陳與另外十名官員因未能防止餓死人而受處分；見1957年6月18日《人民日報》，譯文載於《中國大陸報刊概覽》，1562號，第13～20頁。
【122】陳起士：《中國紅軍的政治》，第119、120、122、138、140、142頁；約翰·威爾遜·劉易斯：《中國的秘密軍報：「持續」與「揭露」》，見《中國季刊》1964年第18期，第68～78頁；約翰·吉廷斯：《中國民兵》，同上，第113～117頁。又見《中國大陸雜誌選》（補遺），32號，第22頁。
【123】會議原定於5月15日開，但於5月5日決定會議延至20日開以便有更多時間進行調查；見《毛澤東書信選集》，第578、580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第475～476頁。事實上會議於5月21日開始至6月12日結束；見《重要會議》，下冊，第148頁。
【124】《毛澤東書信選集》，第578～582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第465～472、482～485、488、494～503、507～511頁。4月23日毛聽取了田家英的報告，顯然是這份冷靜分析的報告促使毛讓鄧召開一次新的中央工作會議題。田是在廣州會議後立即被毛派往浙江作進一步調查的；見《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第50～53頁。
【125】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治工作研究室：《中國共產黨七十年簡介》，第487頁；龔育之、石仲泉：《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新論大綱》，第33頁。
【126】《劉少奇選集》，下冊，第335～336頁。
【127】同上書，第337頁。有一位中國學者從另一來源（可能是不同版本）引用劉的講話，劉說這是他的個人看法；知情人S說，搞文化大革命的人很自然地要製造許多劉的悲觀看法；例如「走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道路」，《中國建設》1967年11月增刊，第8、11頁。
【128】《劉少奇選集》，下冊，第337～338頁。
【129】同上書，第338頁，譯文載於《劉少奇選集》，英文本（下），第316頁。
【130】《劉少奇選集》，下冊，第338～340頁。
【131】《徹底清算鄧小平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滔天罪行》，第4頁；《鄧小平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言論摘編》，第25頁；《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208號，第9頁。《鄧小平文選1938-1965》無此講話。
【132】《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第406頁；廖蓋隆、趙寶舒、杜青林合編：《當代中國政治大事典，1949-1990》，第631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中無毛6月12日的講話。又見利伯索爾與迪克遜：《中共中央黨政會議研究指南，1949-1986》，第118頁。
【133】《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年6月），下冊，第332～334頁。
【134】洪承華、郭秀芝：《政治體制沿革大事記》，第223頁。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本根本不打算為彭平反。
【135】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908頁。
【136】同上書，第925頁。5月初有一個組與胡喬木一起再度修改草案，胡喬木再次任主筆。但在22日草案完成前胡因病退出。第二次修改稿於6月8日傳閱，

做了若干表述上的更改後終於通過；同上書，第 924 頁。毛要胡延長休養時間；《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9 冊，第 542 頁。

【137】中共黨史研究會：《學習歷史決議專集》，第 122 頁；廣東教學材料第 2 卷，第 360 頁；《經濟大事記》，第 306 ～ 307 頁。在修改文本中，甚至與此事有關的第 33 和 34 條等條目中，措詞旨在掩飾文化大革命後的材料中承認的全面的退卻。有份材料著重指出修改的 60 條暴露了 11 月發出的緊急指示 12 條的缺點；趙德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專題大事記，1949-1966》，第 514 頁。又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925 ～ 933 頁。

【138】我已將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 23 卷，第 452 ～ 456 頁所載六十條的 3 月修訂本與《農業集體化》下冊，第 474 ～ 491 頁上的 6 月文本加以對照。

【139】第 1 ～ 6 條。

【140】第 10 ～ 15 條。

【141】3 月文本之第 17、18、20、26 條與 6 月文本之 17、20、28 條一致。

【142】23、24、26 條（3 月文本），24、25、26 條（6 月文本）。

【143】在兩個文本中，這內容均為 52、53、54 條。

【144】第 37 條（3 月文本）和 39 條（6 月文本）。

【145】第 43 條。由於像這樣的新條款插入在 6 月文本中，原來在 3 月文本中的有些條款被拿掉了，如如何對待富農和地主（第 42 條）和 4 條關於幹部作風問題（第 45、46、48、49 條）。

【146】兩個文本中的第 57 和 60 條。

【147】知情人 S。

【148】《當代中國的湖南》，第 2 卷，第 631 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9 冊，第 467 頁。

【149】同上書，第 467 ～ 470 頁。關於胡喬木的韶山報告摘要，材料同上，第 489 ～ 491 頁。《朱德選集》，第 440 頁，注 318。

【150】《當代中國的四川》，第 1 卷，第 108 ～ 109 頁。關於毛明確無誤地指責李井泉，見《毛澤東書信選集》，第 580 ～ 581 頁；又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9 冊，第 484 ～ 485、488、496 ～ 498 頁。然而，毛曾收到西南地區關於討論六十條的正式報告；見《周恩來書信選集》，第 571 ～ 573 頁。李未以個人名義寫此報告可能表明他很生氣毛竟會傳閱一個級別比他低的省外人（胡喬木）所寫的他領導地區情況的報告。田家英於 1958 年勸四川省委不要推廣過度密植，李井泉對此表示不滿，，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 89 ～ 90 頁。儘管毛根據田家英的調查發了通報，李井泉還是在四川實行密植政策。大約與李井泉再度強調他對公共食堂的信念的同時，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江華向毛報告說群眾要求解散公共食堂；《當代中國的浙江》，第 1 卷，第 80 頁。

【151】同上書；《朱德選集》，第 374 ～ 375 頁。

【152】《周恩來書信選集》，第 571 頁。

【153】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378 頁；《朱德選集》，第 375 頁；蔣寶英：《鄧子恢傳》，第 344 頁。周總理可能為陳毅外長參加日內瓦會議討論老撾問題作準備而有所延誤；卓愛國、薛建華：《中國大廣角》（I），第 9 ～ 11 頁。在劉少奇的湖南調查之後 10 天，劉與毛在長沙見面，此時劉似乎不像會告訴毛應該取消公共食堂。根據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份材料，北京市黨組織於 5 月 17 日呈報黨中央關於農具與大牲畜的所有權問題的報告，並於 5 月 18 日呈報關於公共食堂的報告；見《彭真「懷柔調查」是劉鄧黑司令部陰謀復辟資本主義的嚴重步驟》，第 15、21 頁。

【154】《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第 57 ～ 58 頁。不久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送給他一份形勢好轉的報告，讓他忘記了自己對於六十條的告誡；《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9 冊，第 548 ～ 549 頁。關於一位瞭解廬山衝突內幕者的陳述，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關於本作者的分析，見《起源》，第 2 卷，第 188 ～ 251 頁。

【155】《農業集體化》（下），第 492 ～ 497 頁。

【156】農村工作部報告中所提供的數字與這些年終數字略有不同，無法作準確的比較：3月下旬公佈六十條第一份草案之前公社數目為25,204個，8月下旬為55,682個；那時生產大隊為483,414個，現在為708,912個；那時生產隊為2,988,168個，現在為4,549,474個。同上書，第491～493頁。我使用的是後者數字，理由是在北京和廬山會議之間幾周內倉促準備的報告無疑是為取悅於領導而含有錯誤，而在以後壓力減少時重新統計的數字錯誤較少。顯示這個報告根據不足和倉促統計的是：在討論問題時，該報告只提到一個省——江蘇。另一個報告稱一年後生產隊又分成更小的單位；陳、馬德森、昂格爾合著：《陳莊》，第31～35頁。此報道也指出幹部們如何為了家庭和朋友的利益而在重新分配土地上弄虛作假。

【157】《農業計劃》（下），第492～493頁。

【158】同上書，第494～496頁。

【159】在毛與蒙哥馬利進行的9個小時的談話中，毛告訴蒙哥馬利1960年收穫只有1.5億噸，但是他說預計1961年會達到1.6億噸。（蒙哥馬利後來說「在一個平凡人的時代中毛主席是一個非常偉大的人，一個最不平凡的人」。）；那兩年的實際產量分別為1.43億噸和1.47億噸。在廣泛訪問全中國後，蒙哥馬利毫不含糊地說：「談論大範圍饑荒、嚴重匱乏、消極冷漠、國家動盪不安是毫無意義的，甚至可能是危險的……1959和1960年嚴重歉收的確造成糧食困難因而有必要實行定量配給；但是糧食還是夠分配的，雖然有些人可能得不到和從前一樣的多。中國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勒緊褲帶，但是沒有大範圍的饑荒。」《星期日時報（倫敦）》1961年10月15日雜誌部分，第25頁。毛大概沒有把他告訴另一位外賓的話告訴蒙哥馬利：「別聽所有那些人的話。他們就是用好的數字向你炫耀，使你有好印象。當他們請你到某處參觀時，相信我，他們是拚命向你顯示好的。成績不如你想像的好。一切都是因為你而事先安排好的，一分鐘也不要相信這個」；法坦諾泰：《龍珠》，第194頁。（重點號是我加的）

【160】《農業集體化》（下），第519～520頁；國防大學：《參考資料》，23卷，第448頁；《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第59～60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第562～564頁。毛還記錄了保定地區唐縣（北京鐵路線以西，向北200多英里）一個公社的詳細情況。毛似乎沒有時間在同一天親自去那裏，他是從保定地區地委書記李悅農（音譯）那裏聽到的，李參加了邯鄲會議；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領袖在河北》，第363頁。

【161】陶鑄和王任重寫了一個關於在廣西省徹底取消集體所有制的報告，該報告稱有一個7戶人家的家庭承包組，土地到戶，責任到人。據說毛對此表示好感。在這個成功的基礎上，生產增加了。陶和王建議推廣生產組，把產量、個人責任和超產獎勵聯繫起來。毛顯然表揚了這個報告，說這個報告的內容和建議是馬克思主義的，並委派陶、王和另一位中南地區官員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根據這個經驗共同為中共中央起草一個決議。最後這個經驗並未得到推廣，因為「有些同志不同意」。這種說法令人奇怪的是：（a）毛竟會對一個可能破壞集體主義的建議表示歡迎；（b）即使毛贊成這個經驗，其他官員竟也有能力使之流產。也許是毛被人說服了：在一個少數民族居住的邊遠山區的小小經驗不適用於漢族居住的內地。見《新華月報》1989年第11期，第50頁。

【16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第565～573、580～583頁；《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第59～60頁。（有個材料說，早在1961年4月在與王任重及其他湖北官員開會時，毛已被說服以隊為核算單位；中共湖北省委黨史資料征編委員會編：《毛澤東在湖北》，第335頁。）也許是毛沒有弄清隊的名稱或是毛決心不使人們誤解他在1959年所指隊的含義，因為他所說的隊是舊名小隊而不是現在的隊！關於1959年的問題，見《起源》，第2卷，第161頁。關於各級組織名稱上的混亂，同上書，第181～184頁和高益（音譯）在《黨史研究》1982年第1期第36頁上的註釋。他在註釋中指出農村最低一層的集體組織的正式名稱為隊，這個名稱來源於1961年3月22日中央文件，儘管舊名稱小隊甚至仍保留在劉少奇以及農村工作老手如鄧子恢的報告中和毛的

講話中。如劉少奇於 1962 年 1 月 27 日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全文本第 9 頁。

【163】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 23 卷，第 519 ～ 520 頁。

【164】《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第 60 頁；又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938 ～ 942 頁。

【165】國防大學：《參考資料》，23 卷，第 520 頁。

【166】《彭德懷自述》，第 257 ～ 258 頁。

【167】在《起源》，第 2 卷，第 77 ～ 82 頁中，公社的概念是陳伯達提出，毛贊成並做了修飾，數年後陳伯達證實此說；見葉永烈：《陳伯達其人》，第 181 ～ 183 頁。據知情人 S 的話，公社的概念早在領導層使用，陳伯達不過加以公開而已。

【168】正如溫斯頓·邱吉爾於 1945 年發現的和喬治·布希 1992 年發現的，從戰爭勝利中得到的榮譽不過是一種極易腐爛的政治商品。

【169】這個引語來自他身邊的一名工作人員逄先知，見《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第 68 ～ 69 頁。對此判斷的證實，見《鄧子恢傳》編輯委員會：《鄧子恢傳》，第 566 頁。

【170】《農業集體化》（下），第 518 頁。

【171】《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第 60 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0 冊，第 48 ～ 50 頁。

【172】對 1981 年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內部評論證實了，自從 1956 年成立了農業生產合作社以來，一直有個基本矛盾未解決，即管理單位以隊或與之相當的單位為基礎，而核算單位又以大隊或與之相當的單位為基礎。這個矛盾被毛的決定解決了，見中共黨史研究會：《學習歷史決議專集》，第 122、139 頁；又見《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第 60 頁。

【173】胡繩及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合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 372 頁。

第四章 計劃迭出

【1】 廖蓋隆等：《新中國編年史》，第 188 ～ 189 頁。還有 1962 年 3 月發佈的金融六條，見《上海經濟 1949-1982》，第 817 頁；財政六條，《李先念論財政、金融、貿易》，下，第 86 頁；電影三十二條，《周揚、夏衍、陳荒煤在電影方面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罪行錄》，第 42 ～ 48 頁；公安十條，周和邵：《新中國法制建設四十年要覽》（另 1968 年又發佈一個公安六條；見陳、馬德森·昂格爾的《陳莊》，第 143 頁。關於一位村領導人用後一文件威脅農民，見巫和李：《一滴淚》，第 263、279、294、305 頁）。

【2】 按中國表報，這幾年間，中共中央和（或）國務院在商業方面所發指示和決定數目如下：1958 年 25 件；1959 年 12 件；1960 年 22 件；1961 年 13 件；1962 年 21 件；1963 年 18 件；1964 年 7 件；1965 年 9 件；1966 年 8 件。毛在商業上發表重要講話次數如下：1958 年 4 次；1959 年 6 次；1960 年 2 次；1961 年 5 次；1962、1963 年僅各一次；1964 年無；1965 年 2 次；1966 年 1 次。60 年代早期制定商業政策最有影響的人物陳雲，於 1961 年講了三次話，1962 年講了兩次話，之後再次沉默。每當陳雲不出現時，李先念似便以商業上主要發言人身份出現：1959 年 7 次；1960 年 6 次；1961 年 1 次；1962 年 1 次；1963 年 4 次；1965 年 4 次。見《商業大事記》，第 872 ～ 874 頁。在 1961 年高層調查風中，共青團第一書記胡耀邦在遼寧考查農村商業，寫了一份報告，毛曾表揚說很好。《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9 冊，第 507 ～ 509 頁。

【3】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9 冊，第 512 頁。四十條的正式名稱是《關於改進商業工作的若干規定（試行草案）》；全文載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 23 卷，第 484 ～ 489 頁。

【4】 索林格：《社會主義下的中國商業》，第 71 頁，關於大躍進激進分子的烏托邦觀點和商業領域負責官員觀點的對比。

【5】 商業社會主義化基本上是在 1955 年末和 1956 年初幾個星期之內開始和完成的。這過程太快，引起類似大躍進期間所經歷的混亂；見《起源》，第 1 卷，第 19 ～ 25 頁。關於商業網複雜性的詳細說明見索林格的《社會主義下的中國商業》，第 33 ～ 47 頁；關於毛之後對共產黨領導下的商業的正統描述見劉福園、唐功烈、羅力行的《中國社會主義商業經濟》。

【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註釋本（修訂）》（以後稱《決議註釋本（修訂）》），第 304 頁。關於這些改變的簡短敘述見《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編：《當代中國商業》，第 1 卷，第 79 ～ 83 頁。對後一書中關於商業部門連續的結構改革的敘述，勿須置疑；值得注意的是，它似從中央計劃人員觀點來撰寫的；他們不喜歡大躍進創新所造成的混亂，同樣也不喜歡失控。

【7】 中文原文是「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城鄉互助，內外交流」。它出現在第二條；見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 23 卷，第 484 頁。

【8】 第四條，同上書，第 484 ～ 485 頁。

【9】 見前面第一章。

【10】 第八條與第十一條，同上書，第 485 頁。

【11】 第十三條，同上書，第 486 頁。

【12】 第十五條，同上書。

【13】 第四～六節，同上書，第 487 ～ 488 頁。

【14】 第十六條和第十七條，同上書，第 486 頁。

【15】 《商業大事記》，第 266 頁；也許它的非正式地位能說明，為什麼有關一百條的情況發表得極少。

【16】 《集體和個體商業文件選編》，第 195 ～ 196 頁；從姚依林 80 年代改革時期中的行動判斷，他 1961 年的講話是出於信念而非權謀。他同意陳雲的比喻，計劃經濟是個必要的籠子，自由市場和個體企業的鳥必須關在籠子裏。

【17】 《商業史稿》，第 206 ～ 207 頁。回顧這些年四川和遼寧省商業活動的記述，可以說明一份中共中央正式決議的重要性；這些敘述既沒提到四十條也沒提到一百條，而只提到 1962 年中共中央關於商業工作的決議。見中共四川省委研究室編：《四川省情》，第 577 頁；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物資經濟研究所、商業部教育局編：《論商品流通：商品流通經濟理論討論會文集》（以後稱《論商品流通》），第 75 頁。

【18】 同上書，第 74 頁。

【19】 見古華：《芙蓉鎮》，第 16、17 頁。該小說反映了他在湖南鄉村的觀察。

【20】 1978 年全國範圍的數字顯示，每千人有一個零售店，比 1957 年的比例減少 80%；商店數目的下降伴有從業人員的下降，因城市人口已加倍。《論商品流通》，第 30、51 ～ 53 頁。這一資料在第 53 頁也評論了某些店員因自己的崗位優勢，從而顯得高高在上。

【21】 3 月的廣州會議也曾提出恢復供銷合作社；見《商業史稿》，第 203 頁。

【22】 同上書，第 210 頁。

【23】 《論商品流通》，第 107 頁。

【24】 劉和吳：《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第 285 頁。有關表明直到 1962 年才開始糾正商業領域的錯誤的其他跡象，見《論商品流通》，第 93、190、242 頁；也見《當代中國的糧食工作》，第 135 頁。

【25】 《劉少奇選集》下卷，第 358、500 頁注 160。

【26】 《農業集體化》下，第 575 頁。這兩個省允許除大米小麥以外的其他糧食貿易，而全國其餘部分大多是嚴格禁止，鄧把兩者作了對比。

【27】 馬洪與孫尚清：《中國經濟結構問題研究》，第 172 頁。這比 1936 年的 65% 低很多；見里斯金：《中國的政治經濟》，第 20 頁。關於手工業的簡要描述，見多尼索恩：《中國經濟體制》，第 220 ～ 224 頁。有關這一部門領導人之一

關於50年代前五年共產黨對手工業的政策的描述，見《程子華回憶錄》，第337～366頁。

【28】 馬洪與孫尚清：《中國經濟結構問題研究》，第172～173、175頁。到1957年城鄉手工業工人比例發生了戲劇性變化，鄉村地區僅有35.9%。

【29】 農民中兼任手工業的工人當然是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員。

【30】 精確百分比是：地方經營的工廠是48%；合作工廠是22%；公社工廠是30%；見馬洪與孫尚清：《中國經濟結構問題研究》，第176頁。這些百分比與大躍進時所說的百分比不同（見多尼索恩：《中國經濟體制》，第224頁所引用）。關於專業手工業工人確切數字的不確定性，同上書，第221頁。

【31】 馬洪與孫尚清：《中國經濟結構問題研究》，第175～177頁。

【32】 引文見里斯金：《中國的政治經濟》，第275頁。

【33】 馬洪與孫尚清：《中國經濟結構問題研究》，第176～177頁。

【34】 《中國社會科學》經濟編輯室編：《經濟學文集1980年》，第514～515頁。有關大躍進對手工業生產和消費品影響的其他例子，見多尼索恩：《中國經濟體制》，第225頁。

【35】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第512頁。三十五條編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情報資料室編：《中國工業經濟法規彙編1949-1981》，第18～23頁。實際上各方資料均認為，三十五條是與商業四十條同日發佈的，不過有一份資料說是6月22日；見洪承華與郭秀芝：《政治體制沿革大事記》，第225頁。

【36】 第一條，《中國工業經濟法規彙編》，第18頁。

【37】 第二條，第三條，同上書。

【38】 第七條，第八條，同上書，第19頁。

【39】 第九條，第十條，同上書。

【40】 同上書，第19～23頁。

【41】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企業管理研究室編：《中國工業管理部分條例彙編》，第208頁。有關工業的指示在下節討論。

【42】 《程子華回憶錄》，第402頁。同書404頁表明，猶豫不決適用於整個部門。

【43】 馬洪與孫尚清：《中國經濟結構問題研究》，第177頁。

【44】 同上書，第177、178頁。

【45】 劉和吳：《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第272～273、279頁；《程子華回憶錄》，第404頁。

【46】 《人民的好總理》（下），第288頁。這是文化大革命後的敘述，但是在1978年12月有名的三中全會上共產黨老戰士恢復掌權前數月所寫的，這次會後18個月才為劉少奇平反。因之，該敘述還指稱已故國家主席抓住三年「暫時」經濟困難機會，恢復資本主義，砍削鋼鐵工業。這篇文章是冶金工業部理論組撰寫的;1959年正是該部在部長王鶴壽的領導下，進行激烈戰鬥（儘管未成功），反對那時陳雲所倡導的對鋼指標的削減；見《起源》，第2卷，第165～170頁。1978年陳雲已是一位威望很高的中央委員，再次以一位幕後重要政治人物身份出現。像這個理論組這樣的政治內情知情者可能是會知道這一點的，因之是不敢輕率地攻擊他的。但當時的共產黨主席華國鋒仍宣稱文化大革命是正確的，劉少奇看來便像是最好的攻擊對象了。既然周恩來和陳雲一樣，在大躍進開始時，因反對盲目冒進（見上書，第25頁）曾受到毛的批評，他在這個過程中似也不可能是個英雄了；但這個理論組也應記得：毛曾指示保證1958年煉鋼運動最少應該在名義上達到指標，完成這一任務從而挽救面子的正是周（同上書，第113頁；《人民的好總理》（下），第293～294頁）。至於劉和周在1961年是否像（文章）所提那樣尖銳對立，尚須等待進一步的文獻檔案來證明；不過這裏從《人民的好總理》所引簡短材料清楚地表明，冶金工業部在1961年像兩年前一樣在猛烈地捍衛其立場。

【47】 《黨史研究》1980年第6期，第24頁。尚不清楚這一權威性文章中的百分數是如何得出的，因為這些百分比似與從《統計年鑒》1983年第245、323頁

的絕對數字所得出的百分比不符。但建設規模超過原材料供應可能的全面情況，在後一份資料中也得到了證實。

【48】《黨史研究》1980 年第 6 期，第 24 ～ 25 頁。

【49】劉和吳：《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第 279 ～ 280 頁。

【50】同上書，第 280 頁。

【51】見《起源》，第 2 卷，第三篇。關於鄧小平夫人卓琳曾憂慮並警告她丈夫如果她丈夫不克制他的講話，他在廬山便會遭到彭德懷的命運的敘述，見劉金田編：《鄧小平的歷程：一個偉人和他的一個世紀》，第 2 集，第 5 頁。

【52】譯載《中國文學》1966 年第 5 期，第 9 頁，毛指江青為「李進同志」；李是她娘家的姓，李進是她以前偶爾用過的筆名。有位傳記作家說，中國人認為這首詩不是描寫自然，而是表達毛對妻子重新萌發「性趣」。見特里爾：《白骨精》，第 238 頁（中譯本為《江青傳》——譯注）。

【53】《程子華回憶錄》，第 403 頁。有關廬山會議產生的一份檔中有同樣的提法，見《中國工業管理部分條例彙編》，第 202 頁。於 1961 年 1 月 28 日擔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常務副主任的程子華談到毛和劉少奇在上海會議上提議削減基本建設，似乎會議是在 1961 年召開的。但這次會議及其後的北戴河會議（程也提到這次會議），均是在他上任前的 1960 年開的。沒有其他材料證明毛那麼早便批准了工業削減。見《程子華回憶錄》，第 403 頁；有關其任職日期，見第 684 頁。對程升任李富春領導的國家計劃委員會中的重要職務，並無明顯理由。也許他的作用是：當李要大躍進的激進分子接受削減遇到抵制時，程可使李更堅定決心。後來，李於 1962 年初患病，周恩來接管對計劃委員會的監督；見《程子華回憶錄》，第 404 頁。有關李富春可能頂不住壓力的簡短討論，見下麵註釋第 78。有趣的是，計劃委員會的一位長期任職的高級官員（王光偉）曾透露，即使在編製第一個五年計劃時，都是由周恩來和陳雲負責的，而不是李，在編製第二個五年計劃時，負責的則全是周。當時，李顯然是在出訪莫斯科，但這次訪問在標準的傳記辭典中未予記錄。見《懷念周恩來》，第 42 ～ 43 頁。關於毛對周在第二個計劃工作中的高度評價（18 月後被大躍進徹底破壞），見上書，第 44 頁。

【54】《中國工業管理部分條例彙編》，第 199 ～ 200 頁。

【55】按照確定指標的方式來判斷（見下面），1961 年是作為中央委員會在廬山所規定時期的第一年的，即使措詞（「今後七年內」）不是這樣。

【56】「調整、鞏固、充實、提高」；見前面，序言和《起源》，第 2 卷，第 323 頁。

【57】《中國工業管理部分條例彙編》，第 202 頁；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 23 卷，第 532 頁。

【58】見前面第一章。

【59】《統計年鑒》1983 年，第 245 頁。

【60】同上書，第 244 頁。煤產量的下降，雖是陡降，可能不似數字所表明的那麼嚴重；因為大躍進期間所產煤有大量是劣質的。我感謝尼古拉斯·拉迪提醒我這一點。亦見《起源》，第 2 卷，第 166 ～ 170 頁。

【61】《中國工業管理部分條例彙編》，第 202 頁。

【62】同上書，第 203 ～ 205 頁。

【63】《統計年鑒》1983 年，第 244 頁。

【64】《陳雲同志文稿選編》，第 127 頁；《陳雲的戰略》，第 174 頁。

【65】《統計年鑒》1983 年，第 244 頁。

【66】《陳雲的戰略》，第 174 頁；有關陳雲 1959 年對煤炭工業的調查，見上書，第 120 ～ 121 頁；《起源》，第 2 卷，第 168 頁。

【67】《陳雲同志文稿》第 148 ～ 149 頁；《陳雲的戰略》，第 175 ～ 176 頁。這篇講話未收入《陳雲文選》中。

【68】關於儲量分佈的估計見吳：《共產黨中國的經濟發展和能源利用》，第 36 頁；依照《毛後的中國經濟》第 339 頁所載瓦克拉夫·斯米爾的《中國能量：系統分析》一文，來自北部和東北的產量佔 60%，南部的僅佔 17%。

【69】《陳雲同志文稿》，第 147 ～ 152 頁；《陳雲的戰略》，第 174 ～ 180 頁。
【70】吉林廣播電台 1967 年 8 月 28 日。
【71】在與電力工業的對比中，煤炭工業的危機狀況的嚴重性便凸顯出來了。雖然發電設備的產量比採掘設備的產量，下降得更陡急，但電力僅下降到大躍進高峰期的 77%，且到 1963 年又上升了；而煤的產量幾乎下降了 50%，到 1965 年才開始上升；見《統計年鑒》1983 年，第 244、248 頁。這證明給燒煤的火力電站的燃料供應仍維持著，而其他用戶則是配給的。依照一份幾乎同時的西方分析，1960 年電廠佔煤消耗的 13.17%；以上是從吳的《共產黨中國的經濟發展和能源利用》第 119 頁計算而來。雖然這一分析也估計 1960 年煤炭節餘約近 7318 萬噸；但這似與當時中國領導人的憂慮不相符；不過從以後官方數字判斷百分數似尚近乎正確。1976 年電力工業佔到煤消耗量的 16.6%，至 1978 年這數字更升到 20.1%；見世界銀行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附件 E：能源》，第 30 頁。
【72】《中國工業管理部分條例彙編》，第 205 ～ 206 頁。關於陳雲始終堅持全面或綜合平衡的觀念的討論，見《陳雲的戰略》，第 xv ～ xviii 頁。有關毛的態度，見《起源》，第 2 卷，第 296 頁。
【73】《中國工業管理部分條例彙編》，第 207 ～ 208 頁。
【74】同上書，第 208 ～ 215 頁。
【75】關於對調查的討論見李廣安、王桂珍和秦明:《紀念李富春》，第 120～126 頁。
【76】《鄧小平大辭典》編輯委員會編：《鄧小平大辭典》，第 460 頁。
【77】關於當地突擊隊的規模，見一份文化大革命時對薄一波活動的惡意報告；見《遼聯戰報》1967 年 7 月 21 日，第 4 頁，第 1 ～ 2 欄。
【78】《經濟大事記》，第 292～293、316～318 頁。對調查和撰寫過程的最完整（且第一手）的報告，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952 ～ 960 頁。即使在這後一材料中，也不清楚，為什麼李富春領導了調查，卻未負責總結調查結果和撰寫規劃，也不明白為什麼總理建議在 1 月成立的十人小組，直到 6 月份才開始活動。在《中共黨史人物傳》，第 44 卷，第 1 ～ 112 頁，李富春的傳中也未提及他與七十條的聯繫。有材料表明李是位不強勢的領導，在大躍進期間無力將計劃委員會團結在他身後，因此只能尋求外部幫助，主要是冶金工業部部長王鶴壽；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 88、91 頁，毛在 1959 年廬山會議的一次講話中，就曾批評過李富春「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見《彭德懷案件 1959-1968》，第 26 頁。情況很可能是這樣的，十人小組成員是薄一波；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和薄管理小組的副手谷牧；王鶴壽；煤炭工業部長張霖之；代理鐵道部長呂正操；直到此時才任第一機械工業部（管多數民用機械）部長但當時任國家經委副主任的趙爾陸；水利電力部副部長劉瀾波；國家計委副主任彭濤（於 1961 年 11 月去世）；曾任毛秘書，現任農業機械部長陳正人；第三機械工業部部長（常規武器）孫志遠。名單見《我們的周總理》，第 11 頁。儘管周在組織小組中起了作用，組員也都是根據他們在政府中的地位而任命的，但該組是由鄧小平正式建立，並向中央書記處負責。見上書和《六十年大事簡介》第 491 頁；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局編：《毛澤東的足跡》，第 513 ～ 515 頁；《鄧小平文選 (1938-1965)》，第 259 頁，《鄧小平選集 (1938-1965)》第 280 頁。七十條的準備與農業六十條的準備的不同之處在於準備七十條時諮詢過經濟專家；見哈爾彭：《經濟專家與中國經濟政策的制定，1955-1983》，第 4 章。有關各機械工業部的職責，見多尼索恩：《中國經濟體制》，第 150、520 頁。趙爾陸是 1952 年第二機械工業部首任部長，當時該部負責飛機、坦克和軍火（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3 冊，第 529 頁）。
【79】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局編：《毛澤東的足跡》，第 513 ～ 515 頁。《鄧小平選集 (1938-1965)》，第 280 頁；《鄧小平文選（1938-1965)》，第 259 頁。毛似乎對頒布七十條的通知僅作過一處修改，即刪除「運用毛澤東思想」一詞；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9 冊，第 560 ～ 561 頁。

【80】 七十條全文，見國家經濟委員會經濟法規局、北京政法學院經濟法民法教研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企業法規選編》（以後簡稱《工業企業法規》），第45～73頁；中華全國總工會政策研究室編《中國企業領導制度的歷史文獻》第244～258頁作了相當多的摘錄。就本作者所知，不論是七十條的全文或此時所訂任何其他政策檔，均未於當時公開發佈。在80年代初以前，外國學者對七十條的瞭解均是來自文化大革命時資料中的惡意報道或簡短引錄，或是台灣和香港所獲得的簡短的、且並不完全正確的歸納。
【81】 《工業企業法規》，第48頁。有關1958年大躍進口號的演變，見《起源》，第2卷，第42頁，第351頁註釋第54條。有關文化大革命對七十條的批判，見1967年6月28日《郵電戰報》的「粉碎修正主義黑綱領『工業七十條』」，譯文載《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210號，第27～31頁。有關對七十條的攻擊所作的同情性歸納，見安多爾斯：《中國的工業革命》，第129～134、187～191頁。文化大革命時的材料中的一個指責是七十條「一點也沒提到不可戰勝的毛澤東思想」（《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210號，第28頁，著重點是我加的）；然而除了第6條明白提倡學習毛著作之外，第70條還規定要求企業黨委會去領導所有幹部學習「毛澤東同志是如何闡述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的」；《工業企業法規》，第73頁。文化大革命時的資料的另一個指責（《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210號，第27頁。）是七十條是反對「鞍鋼憲法」的，毛曾在1960年3月稱讚，說它強調了在工業中開展群眾運動；不過文化大革命分子未能引出任何證據，表明毛在1961年的經濟危機期間，曾為保持「鞍鋼憲法」的原則而努力過。對「鞍鋼憲法」的較長討論，見《起源》，第2卷，第306～309頁。關於有一份報告稱，60年代中期遼寧官員曾把「鞍鋼憲法」與七十條相比較，提出不利於鞍鋼憲法的意見，見《遼聯戰報》1967年7月21日，第3頁第2欄。
【82】 見第64條；《工業企業法規》，第70頁。
【83】 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960～962頁；《經濟大事記》，第316～317頁；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390頁；《六十年大事簡介》，第492頁；《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210號，第30頁。
【84】 這些規定載在文件裏冗長的第8條中；見《工業企業法規》，第48～49頁。
【85】 同上書，第49頁，這一規定可能意在使國家每年能加緊控制；但是毫無疑問，無能的經理們也可用作藉口請求其上級領導的寬釋；如科奈的「軟預算限制」理論所預測的；見科奈《自由經濟之路》第62頁及其他各處。
【86】 《工業企業法規》，第62～64頁。
【87】 同上書，第64～66、68～69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962～967頁。對這一論題的討論見鍾（音譯）的《毛主義和發展》，第163～168頁。
【88】 引自安多爾斯：《中國工業革命》，第69頁。
【89】 同上書，第100頁。
【90】 《經濟研究》1962年第15期，引自鍾：《毛主義和發展》，第163頁。
【91】 同上書，第163～165頁。
【92】 同上書，第165～168頁。關於此時，廠長有權自行處理的範圍的另一次討論，見舒爾曼的《中國的「新經濟政策」——過渡或開始》，載李編：《共產黨中國的工業發展》，第76～80頁。
【93】 《工業企業法規》，第51～54頁。
【94】 陳：《共產黨中國的科學和工程人力（資源）1949-1963年》，第182頁引用原文；著重點是我加的。
【95】 《工業企業法規》，第682～691頁。
【96】 同上書，第56～62頁；引文在第56～57頁。
【97】 魏昂德在他採訪了許多中國工人後，曾經直接指出「表現」這一「空泛」的詞，是包含多種表示「工作態度好」的詞；而「工作態度好」則是大躍進中決定工

資、獎金及其他報酬的一個重要因素。見魏昂德:《共產黨的新傳統主義》，第132～143頁。

【98】 見雷奇曼的報告《共產黨中國的工業社會》，第234～242頁；引文在第236～237頁。他於1966年4月至6月間在工廠考察；似乎中國東道主未將七十條告訴他。

【99】 毛12月14日在江蘇無錫曾訓斥市委第一書記，在七十條頒布兩個月後，還處在實行階段。見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和江蘇省檔案局編:《毛澤東在江蘇》，第79頁。

【100】 開始時有些黨委書記抵制七十條；見《七千人大會資料》，第39頁。

【101】 見安多爾斯:《中國工業革命》，第104～132頁；百分數在第119頁。鍾也強調了各工業和工廠的管理方法有很大不同，見《毛主義和發展》，第163、167頁。

【102】《當代中國經濟》，第357～358頁。

【103】 安多爾斯:《中國工業革命》，第132～142頁。

第五章 紅與專

【1】 見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所寫一篇文章，《起源》，第1卷，第306頁曾討論。

【2】 毛在百花齊放時期（1956-1957年）的多次講話中，曾大膽努力勸說持懷疑態度的下屬官員，相信資產階級教授的才幹對共產黨經濟事業的關鍵性重要意義；例見麥克法夸爾、奇克和吳編:《毛主席的秘密講話》，第331～336頁。

【3】 見《起源》，第1卷，第314頁；第2卷，第40～42頁。

【4】 這是常被引用的斯大林對作家的描述：例見康庫斯特:《斯大林：國家的破壞者》，第209頁。

【5】 關於1983-1984年間針對知識分子的「精神污染」運動，在對待鄉村態度和經濟改革上的影響，見施拉姆:《「經濟是統帥」？三中全會以來的意識形態和政策1978-1984年》，《中國季刊》1984年第99期，第417～461頁。

【6】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1949-1982年》，第282、285頁。

【7】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985頁。

【8】 《關於自然科學研究所當前工作的十四條意見〈草案〉》；見文化大革命期間出版的小冊子《斬斷劉鄧伸向科技界的黑手（資料彙編七）：科研「十四條」專輯（4）》的第23～33頁。較早的草案（2月的十五條；4月的十四條）也印在該書中的第6～22頁。雖然這一科學規劃正式名稱是「十四條」，與1961年所產生的其他綱領性文件一致，但其作者實際所提出的是十四條「意見」，也許是反映了他們根據經驗而來的謹慎吧。

【9】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直屬高等院校工作暫行條款（草案）》全文，載於《中國教育年鑒》編輯部編:《中國教育年鑒1949-1981年》，第693～699頁。共產黨亦於1961年7月開始制訂小學教育四十條和中學教育五十條（載同書的第699～705頁），不過它們均到1963年3月才發佈；見《決議註釋修訂本》，第308～309頁。

【10】《關於當前文學藝術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草案）》，見前書第313～317頁。

【11】 見《關於劇院（團）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和《關於加強電影藝術片創作和生產領導的意見（草案）》。這兩個檔從未得到共產黨中央批准，但草案曾發下供討論和試行；見《周恩來選集》下卷，第524～525頁注288，和《周恩來文選》，第2集，第546頁注262。

【12】 龔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澤東的讀書生活》，第83～97頁；《起源》，第1卷，第33～35頁。

【13】 在龔育之、逄先知、石仲泉的《毛澤東的讀書生活》關於「毛澤東和自然科學」一章（第83～114頁）中未提到他曾參加；聶榮臻的《在紅星內部》中論

十四條的一節（第713～727頁）也未提到（《聶榮臻回憶錄》下，第822～838頁）。

【14】除前面注8所提資料外，《資料彙編》系列中載有關於這一論題的項目的尚有：第2、3、5期。也見《科技革命》1967年第1期；《科研批判》1968年第2期，其中第37頁還提到在中國科學院的張勁夫（見下面）主持下準備的科研「七十二條」；《科大紅衛兵：1，科學革命專輯》1968年第2期；1967年7月《大批判背景材料》；1967年7月《徹底清算舊中宣部閻王殿伸向科學技術工作中的黑線》。下面擬搞清楚十四條如何成文時，不得已只好部分地依賴這些來源；它們儘管明顯存有偏見，但常很準確。聶榮臻元帥在文化大革命後所寫回憶錄《在紅星內部》、《聶榮臻回憶錄》，是另外的重要來源，因為他在科學政策的制定中，起了關鍵作用。儘管材料很完整，但不詳細，沒有提到各草案中的變更之處，給人印象是他在整個過程中只負責傳遞而已，但似也表明，彷彿他在制定過程的早期即已身處圈外了。我的分析得益於我在威爾遜中心的研究助手B·格萊塞和J·王對文化大革命材料的艱苦發掘工作。

【15】見科羅契科：《蘇聯科學家在紅色中國》，第66～78頁。

【16】聶：《在紅星內部》，第714頁；《聶榮臻回憶錄》下，第823～824頁。60年代初，約有1300家科學研究所和94000多名研究人員；見力平：《開國總理周恩來》，第406頁。

【17】文化大革命後另建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

【18】《大批判背景材料》，第1～2頁；有關文化大革命激進分子所稱在這次會議上的反動言論集，見《斬斷劉鄧伸向科技界的黑手（資料彙編五）》，隨處可見。

【19】如麥克法夸爾的《百花齊放運動與中國知識分子》第85～86頁。

【20】《斬斷劉鄧伸向科技界的黑手（資料彙編七）》，第1頁。

【21】同上書，第1～2頁；《徹底清算舊中宣部閻王殿伸向科學技術工作中的黑線》，第8頁；《大批判背景材料》，第5頁。

【22】二月草案的序言和第一條，清楚表明，這一檔是擬作內部使用的。

【23】聶：《在紅星內部》，第659～660頁。

【24】路易士和薛：《中國在造炸彈》，第53～54頁。

【25】《聶榮臻回憶錄》下，第825頁。關於自在法國勤工儉學日子起聶和鄧小平的友誼，見（鄧）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第80頁。

【26】路易士和薛：《中國在造炸彈》，第48～59頁。

【27】有關該小組成員，見聶：《在紅星內部》，第784頁注120。

【28】關於對張勁夫和韓光的攻擊，見《科研批判》1968年第2期，第1～13頁；《斬斷劉鄧伸向科技界的黑手（資料彙編七）》，第1～2頁；《科技戰報》1967年5月22日，第3～7頁。儘管受到攻擊，但在接近文化大革命末期，張勁夫又復出於1975-1979年任財政部長，其後並擔任許多重要職務；見《中國名人錄》第930～931頁有關他的傳記條目。聶元帥在其回憶錄中描述十四條制訂中所採取各種措施時，總是用代詞「我們」；但這次卻說：「我簽署了文件並呈交中央委員會。」見聶：《在紅星內部》，第715頁。

【29】《大批判背景材料》，第6頁。

【30】同上書，第6～7頁。

【31】《斬斷劉鄧伸向科技界的黑手（資料彙編七）》，第6～33頁載有三種草案全文。

【32】同上書，第6、13、23頁。

【33】見《起源》，第1卷，第105～108、149～150頁。

【34】見毛1953年5月24日給肖克將軍的信，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第238頁；在另一處，他早就核准刪去「毛澤東思想」，同上書，第192頁。關於後來指責說這一決定是劉少奇和鄧小平陰謀的結果，見《大批判背景材料》，第7頁。

【35】在第七條和第十三條中；《斬斷劉鄧伸向科技界的黑手（資料彙編七）》，第27、31頁；4月文本第十三條（第21頁）未提到毛著作。

【36】見《起源》，第2卷，第318～322頁。

【37】《教育大事記》，第 291 頁。「寧左勿右」一詞，似被陸用作又一個簡單化言論的例證。
【38】有關這個口號的來源，見《起源》，第 2 卷，第 42、351 頁注 54。
【39】《斬斷劉鄧伸向科技界的黑手（資料彙編七）》，第 6、13 ～ 14、23 頁。
【40】2 月文本中的另一條（第一條）是關於中國科學院的職責的；同上書，第 6 ～ 7 頁。
【41】同上書，第 7、14 ～ 15、16、23 ～ 24、25 ～ 26 頁。據《聶榮臻回憶錄》下，第 828 頁，鼓勵科學家要大膽被稱為「三敢」；有關毛對這論題的一次講話，見《起源》，第 2 卷，第 40 ～ 41 頁。
【42】獲斯大林獎金的蘇聯化學家對中國科學的批評之一是太強的保密，使各科學機構互相隔絕，佩帕的《教育新方向》中曾予以引述；見《劍橋中國史》，第 14 卷，第 415 頁。
【43】《斬斷劉鄧伸向科技界的黑手（資料彙編七）》，第 9 ～ 12、13、16 ～ 20、21、26 ～ 28、29 ～ 30、31 ～ 32 頁。
【44】同上書，第 20 頁。
【45】同上書，第 20、31 頁。
【46】同上書，第 21、31 頁。有關百花齊放時期使用這一詞語的情況，見《起源》，第 2 卷，第 212 頁。
【47】《斬斷劉鄧伸向科技界的黑手（資料彙編七）》第 21、31 頁。
【48】同上書，第 22、32 頁。
【49】聶：《在紅星內部》，第 717 ～ 719 頁。
【50】聶元帥 1961 年 6 月 20 日的報告及領導層的同意批示，載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 23 卷，第 499 ～ 512 頁。
【51】聶：《在紅星內部》，第 719 頁。
【52】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 23 卷，第 502 頁。
【53】同上書，第 509 ～ 511 頁；聶：《在紅星內部》，第 720 ～ 721 頁；《斬斷劉鄧伸向科技界的黑手（資料彙編七）》，第 13 ～ 14、20 ～ 21、22、23、30 ～ 31、32 ～ 33 頁。
【54】聶：《在紅星內部》，第 715 ～ 717 頁。
【55】參考《聶榮臻回憶錄》下，第 826 ～ 827 頁；和《大批判背景材料》，第 7 ～ 8 頁。
【56】聶：《在紅星內部》，第 716 頁；《聶榮臻回憶錄》下，第 826 ～ 827 頁；《大批判背景材料》，第 7 頁，亦見《斬斷劉鄧伸向科技界的黑手（資料彙編二）》，第 5 頁。
【57】《大批判背景材料》，第 7 頁。
【58】完整的說法是「總的來說，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見《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第 63 頁。
【59】聶元帥的引述實際上要長些：聶：《在紅星內部》，第 716 頁；《聶榮臻回憶錄》下，第 826 頁；《大批判背景材料》，第 8 頁。
【60】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986 頁。
【61】《大批判背景材料》，第 8 頁。
【62】《教育大事記》，第 291 頁。
【63】聶：《在紅星內部》，第 717、721 ～ 722 頁。
【64】《(毛澤東)學習文獻》，第 3 卷，第 319 頁。
【65】講話是 8 月 10 日作的：《陳毅談紅與專》，第 13 ～ 24 頁。
【66】同上書，第 13 ～ 15 頁。
【67】「那有什麼用哩？」同上書，第 15 ～ 18 頁。
【68】同上書，第 17 頁。可能聽陳毅講話的大部分學生是來自各工業部所屬的許多北京專業學校（有似法國的高等學校），而非來自中國同等的文科大學如北京大學。
【69】同上書，第 18 ～ 19 頁。

【70】 見《文革風雲》1967年第5期，第12～13頁。儘管這一資料稱此處引述的是8月10日和9月10日兩次講話，但幾乎全部似是來自8月10日的講話，除非他一個月後又作了完全相同的講話。
【71】 關於對1958年教育激進主義的描述，見《教育年鑒》，第91～92頁；佩帕：《教育新方向》，第400～411頁；《起源》，第2卷，第108～113頁。關於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批判見《鬥批改通訊》1967年6月29日第16期，第3～16頁。
【72】 佩帕：《教育新方向》（原書未注頁數——譯注）；《起源》，第2卷，第108～113頁。
【73】 《教育年鑒》，第236頁。
【74】 同上書，第92頁。
【75】 同上書（原書未注頁數——譯注）；此處似是中央書記處而非教育部在負責；佩帕：《教育新方向》，第411～414頁。
【76】 《教育年鑒》，第93頁；《起源》，第2卷，315～318頁。
【77】 這一點，可從關於教育的重要講話和決定數字的下降得到說明：

	毛	劉	周	鄧	陸定一	林楓	中共中央／國務院的指示
1958	4	2	1	0	1	1	4
1959	0	0	2	0	2	0	7
1960	0	0	0	0	1	1	5
1961	1	0	0	1	1	0	2
1962	0	0	2	0	0	0	

資料來源：《教育大事記》，第683頁。
【78】 《鬥批改通訊》1967年6月29日第16期，第12頁。很奇怪，據引述，周揚也抱怨說，另一個問題是科學研究太多了。
【79】 據《教育大事記》，第290頁，認定林楓是小組成員；並確認張際春、周揚和楊秀峰曾在會上講話，憑這一事實，再加上他們的職務，似能斷定他們也是組員；見上書，第285頁。但是，雖然張和楊出席了7月討論六十條的小組會，但周卻沒有；見《鬥批改通訊》1967年6月29日，第14頁。這一來源指明，陸定一是小組組長；並說明康生是副組長。出席會議的還包括宣傳部副部長張執一，六十條撰稿人蔣南翔以及同蔣一樣是教育部副部長的劉子載。鑒於共產黨的作法是「小」組要盡量小，這三個人可能是以專家顧問身份出席會議，但也有可能是組員。
【80】 《教育大事記》，第285、288～289頁；《教育年鑒》，第93頁。
【81】 《教育大事記》，第294～295頁。
【82】 《教育年鑒》，第93頁。
【83】 《大批判通訊》1967年6月29日第16期，第13頁。
【84】 同上書；《教育大事記》，第298頁；《教學批判》1967年8月20日的「高等教育領域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譯載於《中國社會學人類學學報》1960-1970年秋冬季合刊，第55頁。在《教育革命》1967年5月6日的《過去十七年教育戰線兩條道路鬥爭史》中，譯載於《聯合出版研究服務》41932號（1967年7月21日）第36頁，所列教育六十條的起草人是林楓、張際春和蔣南翔。蔣於1965年1月任高教部部長。
【85】 《教育大事記》，第298頁；《教育年鑒》，第93、254、511、692～693、942～943頁；《陳毅談紅與專》，第12～14頁；《鬥批改通訊》1967年6月29日第16期，第13～16頁。
【86】 同上書，第16期，第13～14頁。蔣在執行這一任務中，請來幫忙的同事中有何東昌（清華黨委副書記，以後於1985年任國家教委副主任）。
【87】 同上書，第14～15頁。這一成語來源，見吳的《西遊記》第1卷，第171～174頁關於孫猴子與如來佛的對抗的描述。
【88】 《鬥批改通訊》1967年6月29日第16期，第15頁。其他組員有宣傳部官員程金裕（音譯），宣傳部科學局副局長林澗青（他在文化大革命後曾復出擔任

不同黨內職務，並於 1982 年共產黨十二屆大會上當選中央委員會候補中央委員）和宣傳部長期研究員龔育之（文化大革命後他的第一個職務是毛著作出版委員會的高級官員，並於 1988 年重返宣傳部任副部長）。

【89】 同上書，第 14 ～ 15 頁。60 年代前半期制曾成立幾個小組訂出「修正主義」綱領，康生不只參加了這一個。他是彭真領導的「文化革命小組」的五人中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未被清洗的唯一組員。正如後來激進分子所稱，可以想像康因為這種或另一種原因，不能對這些小組的所謂的罪惡活動負責——他在撰寫反蘇論戰文章中是主角這一點肯定是真實的——但也可能是，康雖持有激進的觀點，在大躍進後的危機中也認為謹慎是上策。在編入教育卷的歷史年表中沒有記錄他參加了 7 月的小組會議。

【90】 同上書，第 15 頁。

【91】 教育方面的與會者有：陸定一、康生、林楓、張際春、童大林、程金裕、蔣南翔和清華大學的李壽慈（音譯）；同上書。另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987 頁。

【92】 《鬥批改通訊》1967 年 6 月 29 日第 16 期，第 15 ～ 16 頁。不幸得很，鄧在這次會議上的講話，文化大革命後出版的《鄧小平文選（1938-1965)》中未有記載。

【93】 《鬥批改通訊》，第 16 頁。

【94】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987 ～ 988 頁。

【95】 《教育年鑒》，第 237 頁。

【96】 《鬥批改通訊》，1967 年 6 月 29 日第 16 期，第 16 頁。

【97】 正式名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全文載《中國教育年鑒》，第 693 ～ 699 頁。共分十章：總則；教學；生產勞動；畢業生培養；科學研究；教師和學生；設施和生活條件；思想（教育）和政治（教育）；領導制度和行政組織；共產黨組織和工作。

【98】 這些標準是加在 1957 年 6 月 8 日在自由批評時期中止後所發表的原始講話中的。見《起源》，第 1 卷，第 262 ～ 269 頁，和麥克法夸爾、奇克、吳：《毛主席的秘密講話》，第 131 ～ 189 頁。

【99】 《教育年鑒》，第 694 頁。這兩類矛盾是再次自毛 1957 年的矛盾講話中引來；見《起源》，第 1 卷，第 184 ～ 186 頁。

【100】 見《起源》，第 2 卷，第 108 ～ 113 頁。

【101】 《教育年鑒》，第 694 ～ 696 頁。

【102】 見《起源》，第 2 卷，第 225 ～ 227、287 頁。

【103】 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9 冊，第 535 ～ 536 頁；《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 年）》，第 267 ～ 268 頁；《當代背景》891 期，第 36 頁。關於江西共大的討論，見佩帕：《教育新方向》，第 406 ～ 408 頁。

【104】 董與麥克拉斯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戲劇》，第 2 ～ 5 頁。此處數字表明，每年有約 1 ／ 3 的演出是在工廠、礦山、農村和軍事基地進行的；這些地方工農兵觀眾約佔全部觀眾的 45% 至 48% 之間。

【105】 斯諾：《大河彼岸》，第 257 頁。

【106】 江青：《論京劇革命》，第 2 頁。

【107】 《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論黨的群眾工作》，第 139 頁。總理 6 月 19 日在一次藝術創作會議上的這篇講話，只有一個摘要編入這部資料中，這似是 1961 年總理關於文化的少數講話中的一次。它流傳不廣，因之可能在此時未起到決定性作用。統一戰線工作部的主要職責，是處理少數民族問題；進行私營商人和少數（「民主的」）黨派組織的工作；有些黨裏面有知識分子。不過統戰部也可能不為知識分子所信任。1957 年 5 月該部曾邀請非黨人士在一系列座談會上說出對共產黨的批評，但以後有些人當時的發言便被利用來攻擊他們。麥克法夸爾：《百花齊放運動與中國知識分子》，第 38—58 頁。確實統戰部長李維漢 1961 年似乎對少數民族和商人更為積極，1962

年末他就被批評為修正主義分子。見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第 859 ～ 878 頁；《李維漢選集》，第 362 ～ 431 頁。

【108】《起源》，第 1 卷，第 53 ～ 56、92 ～ 96、190 ～ 191、247 頁。

【109】同上書，第 52、201 頁；麥克法夸爾：《百花齊放運動與中國知識分子》，第 175、177 ～ 178 頁。

【110】見《起源》，第 1 卷，第三、四篇。

【111】同上書，第 2 卷，第 40 ～ 42 頁。

【112】這是《起源》，第 1 卷，第三、四篇論據的主要部分。按照毛去世以後史料 1981 年《關於中國共產黨歷史（1949-1981）的決議》中所說的官方路線，在 60 年代以前，毛和劉之間不存在嚴重分歧。這一說法在 1984 年夏得到重新肯定；當時本作者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研究所，向來自在北京的各個共產黨智囊團的聽眾作了兩次演講，闡述《起源》第一、二卷中的論題。在第二次演講後提問題時間裏，一位高級黨史學家在評述第一次演講的論題時，斷然聲言：「我們」不相信毛和劉之間在整風和反右派運動上存在任何分歧。我自知評論者比我本人對共產黨內部情況瞭解多得多，因此再次列舉出導致我作那樣結論的幾條主要證據，並要求他作進一步評論或反駁。但他既未評論也未反駁。爭論之一是劉是否出席了 1957 年 2 月 27 日毛論矛盾的報告會（見《起源》，第 1 卷，附錄七）。在作者於 1984 年會見另一位黨史學家時曾被告知，劉當時出席了，但他無法說明為何《人民日報》刊登的記載這一歷史時刻的的照片上卻沒有劉。在幾年以後的一次會見中，這位黨史學家說，那一次劉是否出席了，他已經忘記了。

【113】1959-1962 年間，陳雲對評彈做了不少口頭和文字上的評述，見《陳雲同志關於評彈的談話和通信》編輯小組編：《陳雲同志關於評彈的談話和通信》。

【114】仲侃：《康生評傳》，第 144 ～ 145 頁和林青山：《康生外傳》，第 181 ～ 184 頁。

【115】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和《中國文學研究年鑒》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文學研究年鑒 1981 年》，第 483 ～ 484 頁；《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陳毅傳》，第 530 頁。

【116】關於他在法國時期的報道，見《人民的忠誠戰士：緬懷陳毅同志》，第 14 ～ 62 頁；《陳毅傳》，第 8 ～ 19 頁。

【117】《中國人民解放軍五十年》，第 121 頁。早期這所大學（里昂的法中大學）的法語系曾拒絕陳入學就讀；後來陳因提抗議佔據大學建築，遭逮捕並隨同其他勤工儉學學生一起，被驅逐出法國。見科林和克拉克：《中國共產黨傳記辭典》，第 1 集，第 105 頁；《陳毅傳》，第 16 ～ 19 頁。

【118】關於他的詩，見《陳毅詩詞選集》；關於將他的詩與毛的詩相提並論，見《周恩來選集》（下），第 338 頁；在《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下），第 444 ～ 489 頁中，毛的詩佔一章，陳毅的詩佔一節，而周恩來、董必武和朱德共佔一節。關於中國人認為陳毅有權就知識分子事務說話的理由，見《陳毅傳》，第 525 ～ 526 頁。1958 年 6 月陳毅主持了元朝戲劇家關漢卿 750 週年紀念會，沃格納：《當代的中國歷史劇》，第 25 頁；關於李先念認為陳毅是個「文化人」，對一部有爭議的影片，陳的意見比他的更精確，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圖書資料室編：《周恩來與文藝》，上冊，第 67 頁；關於陳毅承認他曾立志從事文學事業，見上書，第 69 頁；關於他對蘇聯小說、英法詩歌和蕭伯納、易蔔生和法國作者的戲劇的知識，見上書，第 70 頁；關於 1954 年陳毅的文化職務，見上書，第 72 頁。

【119】見《起源》，第 1 卷，第四篇；第 2 卷，第 40 ～ 42 頁。

【120】對陳毅性格的簡短討論，見《起源》，第 2 卷，第 74 ～ 75 頁。

【121】譯文載《中國人民解放軍五十週年》，第 140 頁；另一種譯文，見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學》，第 525 頁；原詩載《陳毅詩詞選集》，第 254 頁。

【122】關於 60 年代早期的川劇及其與京劇對比的簡短描述，見韓的《我家有兩道門》，第 353 ～ 354 頁。

【123】《中國文學研究年鑒》，第 483 ～ 484 頁。

【124】同上書，第 477 ～ 478、479 ～ 480 頁。曹操是 3 世紀初東漢末年的一位睿智的政治家，見《劍橋中國史》，第 1 卷，第 350 ～ 355 頁。女皇武則天，唐朝時在位 15 年，此後一直受到中國文學家的貶斥，認為她僭奪了男性世系。見《劍橋中國史》，第 3 卷，第一篇，第 306 ～ 327 頁。中華人民共和國傑出知識分子，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曾寫劇本為曹操和女皇武則天翻案（《蔡文姬》，1959 年；《武則天》，1960 年），見郭沫若：《五部歷史劇》，第ｖｉｉ～ｉｘ頁和第 317 ～ 521 頁。優秀劇作家田漢也於 1961 年末發表關於武則天的京劇《謝瑤環》；討論見沃格納：《當代中國歷史劇》，第 80 ～ 138 頁。曾國藩是 19 世紀中葉搖搖欲墜的清王朝的保衛者，其湖南同鄉毛澤東青年時期很崇拜他，見庫恩：《晚清中華帝國的叛亂和敵人》，第 135 ～ 152 頁；和施拉姆：《毛澤東》，第 51 頁。在陳毅所提到其他未有定論的歷史人物中，有李自成，正是他在 1644 年打倒了明王朝，但很快便被滿洲人推翻（《中國文學研究年鑒》，第 479 頁）。陳指出：李顯然是個傑出人物，因為他領導了群眾起義，反抗明王朝；但他也有缺點，否則他不會被擊敗。兩年後，可能是受陳毅講話的鼓勵，作家姚雪垠經過長期醞釀，發表了關於這個複雜人物的多卷本小說中的第 1 卷，且因得到毛的保護、得以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繼續撰寫他這部鴻篇巨著；見姚雪垠：《李自成》，第 1 卷序言和《國外廣播新聞—中國—91—076》，第 25 頁。
【125】《中國文學研究年鑒 1981 年》，第 479 頁。
【126】同上書，第 479 ～ 480、482 頁。此劇將在後面第十八章討論。
【127】同上書，第 481 頁。
【128】同上書，第 486 頁。
【129】同上書，第 477 頁。
【130】見《周恩來選集》（下），第 333、353 頁。1956 年 1 月周關於知識分子的講話，見《起源》，第 1 卷，第 33 ～ 35 頁。
【131】《周恩來選集》（下），第 344、348、349 頁。陳雲的評論是 1961 年 2 月 14 日對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局領導成員講的。見《陳雲同志關於評彈的談話和通信》編輯小組編：《陳雲同志關於評彈的談話和通信》，第 51 頁。
【132】《周恩來選集》（下），第 331 頁。
【133】同上書，第 334 頁。
【134】同上書，第 336 ～ 337 頁。最後一句對理想的政治環境的描述，是來自毛 1957 年 7 月在青島會議上的講話；當時主席正試圖找到一個折衷辦法，使他能在洶湧喧囂的反右派運動中，保護某些整風運動的目標。見《起源》，第 1 卷，第 286 ～ 287 頁。
【135】《周恩來選集》（下），第 345 頁。
【136】同上書，第 337 ～ 340、348、353 ～ 354 頁。
【137】同上書，第 346 頁。周確曾提到毛在提出百花齊放政策過程中的一次重要講話；見同書，第 341 頁。
【138】關於文化大革命以後，對周這時期的活動表現和當時的影響的緬懷回憶，見《周恩來與文藝》，上卷，第 106 ～ 124、129 ～ 141 頁。
【139】香港聯合研究院：《共產黨中國名人錄》，第 1 卷，第 427 頁；林於 1961 年 8 月升任宣傳部副部長。關於他在百花齊放時期的行為公佈得很少，不過他確實支持過有爭議的作者王蒙；見《起源》，第 1 卷，第 14 章注 37。
【140】1967 年 6 月 30 日《文藝戰報》，第 3 頁。這份文化大革命中懷敵意的材料顯然是譴責林默涵所作的保證，而非整理人們的講話（材料）以便在以後鬥爭會上用作證據的作法。
【141】同上書。（未標明頁數——譯注）
【142】他的同事是袁水拍、蔡若虹（畫家）和尹冰（音譯）；同上書。
【143】同上書，第 4 頁。關於何其芳，見前面第一章。張光年是文學批評家、中國作家協會書記和《文藝報》主編。有諷刺意味的是，因張對何的批評，當時何和張成了對頭冤家；見戈德曼：《共產黨中國的文學分歧》，第 268 頁。

【144】1967 年 6 月 30 日《文藝戰報》，第 4 頁。
【145】十條重刊於上書 1967 年 6 月 30 日第 5～6、8 頁。八條，是作者從一件無名稱檔的第 260～273 頁影印而得到的；雖出處不明，但文件似真實可靠。以下簡稱八條，資料來源。
【146】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004 頁。
【147】關於這次大會的討論，見杰羅姆·陳：《作家和藝術家的集會》，載《中國季刊》1960 年第 4 期，第 76～81 頁。
【148】這是八條的條文，見八條，資料來源第 261 頁（指注 45 中所述——譯者）。關於以前使用這些口號的情況，見《起源》，第 1 卷，第 52～53 頁。
【149】對這次「百萬首詩歌」群眾運動的一個方面的討論，見 S·H·陳的《一致性中的多樣化：詩歌和大躍進》，載《中國季刊》1960 年第 3 期，第 1～15 頁。
【150】毛講話最初版本的譯文，見麥克道戈爾的《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1943 年譯文並評述》；關於其政治意義的討論，見戈德曼的《共產黨中國的文學分歧》第二章；關於反右派運動的敘述，見同書第九章和《起源》，第 1 卷，第四篇。
【151】薄一波曾直接指出具體的修改，見《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004 頁。
【152】兩個文件的序言見：十條的序言載 1967 年 6 月 30 日《文藝戰報》，第 5 頁；八條的序言載第 260～262 頁。周揚或許自 1951 至 1954 年任部黨組書記，見科林和克拉克的《中國共產黨傳記辭典》所述他的傳記。林默涵自 1959 年任文化部副部長後，可能即任書記。
【153】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004～1005 頁肯定地說，刪去政治的和藝術的領域間的這種區別，不是偶然的。
【154】在中國指導幹部的社論、指示、規劃和其他文件中，其習慣性程式是，在第一段中先重行肯定當前政策，接著，在一個「但是」之後，說出真正的訊息、所希望的更新之處。在十條和八條兩個檔中，措辭謹慎的附錄在「但是」之前，而新的「提法」則在其後。
【155】見八條，資料來源第 262～264 頁（見注 145 所述——譯注）。這個題目在十條的第二條第二節中有討論，見 1967 年 6 月 30 日《文藝戰報》，第 5 頁。文化大革命中，人們對周揚和林默涵提出的一條（載 1961 年 3 月《文藝報》），甚為憤怨；這一條主張對（作品）主題問題應採取寬廣的態度；例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第 3860 號，第 10～16 頁。關於文化大革命中對周揚建國前的活動的攻擊，以及其在壓力下編寫的 30 年代自傳性敘述，見 1967 年 8 月 11 日《井岡山戰報》。
【156】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005 頁。
【157】關於對這次講話出版時增加的這些標準的討論，見《起源》，第 1 卷，第 262～266 頁；關於這一過程的官方說法，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6 冊，第 358～360 頁；關於講話的原始本中沒有這些標準，見麥克法夸爾、奇和吳：《毛主席的秘密講話》，第 131～189 頁。
【158】十條中的第六條，見 1967 年 6 月 30 日《文藝戰報》，第 6 頁；八條，資料來源，第四條第 262～268 頁（見注 145——譯注）。
【159】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005 頁。
【160】在這方面八條引用了陳毅所認可的傳統戲。而十條則特別提到過去 40 年的遺產：這樣寫可能意在使 1919 年五四運動以來的好作品合法化。五四運動是共產主義文學的奠基人及其追隨者們開始他們事業的時候。
【161】在這裏八條有更專門的規定：號召須保證專業作家有 10 個月從事創作活動；擔任行政、教學或編輯職務的作家，有一到三個月的創作時間，體力勞動則限制在一個月，甚至半個月；見八條，資料來源第五條第 268 頁（見注 145—譯注）。所以作出這樣精確的規定可能是因為人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十條的規定太過泛泛，那些管文化的幹部們是可輕易迴避的。

【162】關於共產黨領導藝術的問題，同樣，十條更為直接，指出：認為黨在這個領域不起作用是錯誤的（是對較早的百花齊放時期多次批評的反駁），而問題是在於在領導時，共產黨犯了主觀主義（盲目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命令主義（發命令時不驗證其可行性）和宗派主義（歧視非黨人士）錯誤；而毛正是打算用1957年半途夭折的整風運動來改正這些缺點的。在《起源》，第1卷，第111頁裏用的是「官僚主義」一詞，而非「命令主義」。八條則較空泛而少指責性；參見其第八條與十條的第十條。見1967年6月30日《文藝戰報》第8、10頁和八條，資料來源的第272～273頁（見注145——譯注）。

【163】關於這些人以前的講話，見《起源》，第1卷，第33～35、51～56、92～96、184～189、201、204頁。

【164】1961年下半年陶鑄作了一系列講話，提倡對知識分子和非黨人士採取更和解的政策。見《陶鑄文集》編輯委員會編：《陶鑄文集》，第251～266頁。

【165】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1005～1006頁，承認就八條中的那些改變本身來看，他們是正確的，不過在當時這些改動顯示出以政治標準限制正確政策的意圖。

【166】知情人B。八條內容更緊湊，薄一波對其出臺作了長篇的敘述。意味深長的是他未指責文化大革命的意識形態「重要人物」如康生或陳伯達。薄也不可能直接指出促使這一改變的人是陸定一，因陸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而且還因為當薄的書出版時，他仍在世並處於很好的政治地位上。但薄在後來某個時機卻引述了鄧小平的話，暗示陸有左傾思想（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1007頁）。

【167】同上書，第1008～1009頁。

【168】關於直到七千人幹部大會後，1961年的各項政策才得以認真執行這一說法。見張素華、邊彥軍、吳曉梅：《說不盡的毛澤東》，第216頁。

第六章 中國的孤立

【1】見《起源》，第2卷，第283～292頁，和前面第一章。

【2】這是當時中國駐莫斯科大使的說法，見劉曉：《出使蘇聯》，第105頁。

【3】紮戈里亞：《中蘇衝突》，第372頁。

【4】劉曉：《出使蘇聯》，第107頁。

【5】見前面第二章，第25～26頁。

【6】《中國季刊》1961年第6期的「季刊紀事與文獻」，第194頁。

【7】劉曉：《出使蘇聯》，第106頁；關於陳毅批判赫魯曉夫在中印邊境衝突中蘇聯所採取的中立態度，見《起源》，第2卷，第260～262頁。

【8】這是甘迺迪本人對赫魯曉夫的看法；見伯奇勞斯：《危機年代，甘迺迪和赫魯曉夫1960-1963》，第225頁。赫魯曉夫在其回憶錄中自然強調他的合理性，並稱他對這位美國對手有很高評價：特別是將甘迺迪和艾森豪威爾相比後，見《赫魯曉夫回憶錄：最後的遺言》，第560～575頁。但是據蘇聯科學家安德列·薩哈羅夫說，1961年7月赫魯曉夫是很洩氣地評論他同美國總統的會面：「完全是個小夥子！他來會談了，可有些手足無措。真見鬼，我們要一個這樣小夥子幹嘛？幹嘛浪費時間和他談判？」（引文見伯奇勞斯：《危機年代》，第294頁）伯奇勞斯認為赫魯曉夫的固執可能部分是出於回應中國人的壓力；同上書，第217頁。若果然如此，則這可能是因為中國人批評他對待美國手段太軟，而他試圖證明這種軟化手段可以制服美國，但最終未能成功，因此赫魯曉夫心有不甘。蘇聯官員曾試圖令其美國對手明白，他們支援赫魯曉夫的重要性；否則的話，赫氏的繼任者有可能缺少他這樣的靈活性，這非常不妙。見瓦特：《國際事務縱覽》，1961年，第212頁。

【9】瓦特編：《國際事務文獻》，1961年，第282頁。

【10】赫魯曉夫在維也納交給甘迺迪的備忘錄，載上書，第277～280頁。

【11】引文見伯奇勞斯：《危機年代》，第223～224頁。

【12】《赫魯曉夫回憶錄》，第 455 頁。
【13】《赫魯曉夫回憶錄：最後的遺言》，第 572 頁。
【14】同上書，第 271 ～ 296 頁；瓦特編：《國際事務文獻》，1961 年，第 339 ～ 374、455 ～ 465 頁；和《國際事務縱覽》，1961 年，第 246 ～ 263 頁。
【15】見歐邁格和亨德遜的《人民日報社論研究指南 1949-1975》，第 57 ～ 59 頁所列標題；關於對這一點的進一步討論見下麵第十章。
【16】譯文載《中國大陸報刊概覽》，第 2511 號，第 46 ～ 48 頁。
【17】紮戈里亞：《中蘇衝突》，第 372、499 頁注 13；《中國大陸報刊概覽》，第 2511 號，第 46 ～ 48 頁。
【18】紮戈里亞：《中蘇衝突》，第 372、448 頁注 10。
【19】1961 年 2 月僅有兩名西方記者獲准在查爾平原訪問其總部，其中一位證實共產黨支援的老撾軍隊使用了「大量」蘇聯武器；見菲爾德：《盛行風》，第 115 ～ 122 頁。
【20】見多門：《在老撾的衝突》，第 117 ～ 170 頁。
【21】見加弗：《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第 292 ～ 294 頁；楊：《同中國共產黨談判》，第 248 ～ 250 頁。
【22】多門：《老撾的衝突》，第 193 頁。
【23】同上書，第 193 ～ 194 頁。多門評論說，這是一個無風險的保證，因為兩個先決條件一個也不會得到滿足的。
【24】周恩來—梭發那·富馬聲明載於《中國大陸報刊概覽》第 2486 號第 24 ～ 26 頁。關於這 81.5 公里公路建設的詳情，見李鐙、肖紀和王立兵：《建國以來軍事百件大事》，第 189 頁。
【25】泰勒：《中國和東南亞》，第 21 頁。
【26】惠廷：《中蘇分裂》，載《劍橋中國史》，第 14 卷，第 525 頁。
【27】《起源》，第 2 卷，第 283 ～ 292 頁。
【28】紮戈里亞：《中蘇衝突》，第 372 ～ 373 頁；關於這些問題的蘇聯立場見《蘇聯共產黨黨綱》，第 38 ～ 39、47、54 ～ 56 頁。
【29】《起源》，第 2 卷，第 276 ～ 278 頁。
【30】比伯拉奇：《阿爾巴尼亞和中國》，第 28 頁。
【31】格里菲斯：《阿爾巴尼亞和中蘇分裂》，第 54 ～ 56 頁。如果李先念把時間花在幫助找出中國國內經濟問題上，無疑會更有利，但在中蘇爭論的背景下，爲了體現對小國盟友的重視，反而將他派往地拉那。
【32】哈利戴編：《高明的阿爾巴尼亞人：恩維爾·霍查的回憶錄》，第 238 ～ 239 頁。
【33】格里菲斯：《阿爾巴尼亞和中蘇分裂》，第 73 頁。
【34】哈利戴：《高明的阿爾巴尼亞人》，第 244 頁。
【35】伯奇勞斯：《危機年代》，第 584 頁。
【36】劉曉：《出使蘇聯》，第 106 ～ 109 頁。除科茲洛夫外，李先念的蘇聯主人還包括蘇聯意識形態專家蘇斯洛夫、出席阿爾巴尼亞黨大會蘇聯代表團的高級團員波斯帕羅夫和安德羅波夫。關於在布加勒斯特的衝突，見《起源》，第 2 卷，第 276 ～ 278 頁。
【37】格里菲斯：《阿爾巴尼亞和中蘇分裂》，第 76 ～ 77 頁。霍查關於蘇聯代表和阿爾巴尼亞東道主間小小試探性交鋒的敘述，見哈利戴：《高明的阿爾巴尼亞人》，第 244 ～ 246 頁。
【38】佛洛德：《毛與赫魯曉夫的對抗》，第 311 頁。
【39】格里菲斯：《阿爾巴尼亞和中蘇分裂》，第 78 ～ 79 頁。
【40】同上書，第 81 頁。佛洛德：《毛與赫魯曉夫的對抗》，第 312 頁。霍查本人關於這次特別爭論的敘述，載哈利戴：《高明的阿爾巴尼亞人》，第 240 ～ 244 頁。
【41】所說宣言全文均載於赫德遜·羅文哈爾和麥克法夸爾編：《中蘇論戰》，第 46 ～ 56、177 ～ 205 頁。
【42】格里菲斯：《阿爾巴尼亞和中蘇分裂》，第 89 ～ 93 頁。兩位突出的阿爾巴尼亞女共產黨員，老遊擊隊員，被霍查處決：利莉·格茄於 1956 年被槍決時正懷

孕，顯然是陰謀推翻霍查；利莉·貝利肖娃據說於 1960 年被絞死，被指控為在北京與其代表團談話中向蘇聯外交官透露了中國人所擬採取的反蘇方針。見《赫魯曉夫回憶錄》，第 476 頁；《赫魯曉夫回憶錄：最後的遺言》，第 303～304 頁；哈利戴：《高明的阿爾巴尼亞人》，第 10、223～224 頁。

【43】 這是紮戈里亞的結論；見《中蘇衝突》，第 374—375 頁。

【44】 見伍修權：《回憶與懷念》，第 345 頁。伍是傑出的蘇聯通之一。他於 1926-1931 年在蘇聯學習，在回到中國以後的政治軍事生涯中，不時應召擔任俄語口譯員。在外交部任職 8 年後，1955-1958 年任駐南斯拉夫首任大使。後任與外國共產黨打交道的中共中央國際聯絡部副部長（見上書，第 321 頁）。

【45】 紮戈里亞：《中蘇衝突》，第 371 頁。

【46】 《起源》，第 2 卷，第 92～100、132～135 頁。周 1957 年初也訪問了莫斯科、布達佩斯和華沙，力圖在匈牙利叛亂後鞏固蘇聯在東歐的地位。見上書，第 1 卷，第 175～176 頁。關於這兩次周活動情況的內幕，見劉曉：《出使蘇聯》，第 31～39、78～82 頁。

【47】 康生的這次講話載赫德遜·羅文哈爾和麥克法夸爾：《中蘇論戰》，第 72～77 頁；劉曉的《出使蘇聯》第 84～85、88 頁討論了其對俄國人的消極影響。

【48】 《農業集體化》下，第 584 頁。

【49】 紮戈里亞：《中蘇衝突》，第 371 頁。

【50】 權延赤：《陶鑄和他的親人：女兒眼中的父親》，第 113 頁。

【51】 劉曉：《出使蘇聯》，第 114 頁。

【52】 同上書，第 112 頁。新華社於 10 月 15 日分別報道米夫丘和中國代表團的離京消息；沒有說他們是乘同一架專機旅行；見《中國大陸報刊概覽》，第 2603 號，第 23、45～46 頁。

【53】 劉曉：《出使蘇聯》，第 110～111 頁；有關中國人對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即時反應，見《起源》，第 1 卷，第 39～41、43～48 頁。

【54】 見《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兩篇譯文載《共產黨中國，1955-1959 年：政策檔及分析》，第 144～151、257～272 頁。

【55】 即令恩維爾·霍查在其 2 月阿爾巴尼亞第四屆黨代會的講話中，也不曾攻擊蘇共，而是採用中國習慣用的以南斯拉夫作替罪羊的辦法；見格里菲斯：《阿爾巴尼亞和中蘇分裂》，第 197～222 頁。

【56】 佛洛德：《毛與赫魯曉夫的對抗》，第 316～317 頁；劉曉：《出使蘇聯》，第 113 頁；格里菲斯指出在赫魯曉夫攻擊後 24 小時之內，甚至在周有機會回應前，北京便發表了一位中國代表出席地拉那婦女大會幾天前的發言，她說：「中國人民和阿爾巴尼亞人民之間的友誼，是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基礎上的，是牢不可破的，任何力量也破壞不了的。」見《阿爾巴尼亞和中蘇分裂》，第 93 頁。

【57】 劉曉：《出使蘇聯》，第 113 頁。劉說：「正好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在即」（著重號是作者所加），這表明周利用了一個合理的藉口；但實際上，1961 年從未開人代會，直到 1962 年 3 月才召開下一次會議；《人民手冊》，1962 年，第 3 頁。也許原定 1961 年秋召開一次會議，但劉曉在寫回憶錄時，忘記會議被取消了。

【58】 佛洛德：《毛與赫魯曉夫的對抗》，第 319 頁；格里菲斯：《阿爾巴尼亞與中蘇分裂》，第 98 頁。

【59】 這是格里菲斯的評論，見上書，第 99～100 頁，另見霍查 1961 年 11 月 8 日的講話，見同書，第 242～270 頁。

【60】 達林：《國際共產主義中的分歧》載有一系列支援性聲明，見第 141～145 頁。關於北京與莫斯科間在阿爾巴尼亞和其他爭論的問題上，各外國黨在第二十二次大會上的情況，見格里菲斯：《阿爾巴尼亞和中蘇分裂》，第 102～105 頁。

【61】 佛洛德：《毛與赫魯曉夫的對抗》，第 321 頁；關於伴隨決裂而來的外交交往，見達林：《國際共產主義中的分歧》，第 145～156 頁。

【62】 格里菲斯：《阿爾巴尼亞與中蘇分裂》，第 106 頁；達林：《國際共產主義中的分歧》，第 220～221 頁；蘇聯人也重印了對中國共產黨的批判，見格里菲斯：《阿爾巴尼亞和中蘇分裂》，第 115 頁。
【63】 達林：《國際共產主義中的分歧》，第 208～211 頁。
【64】 同上書，第 222～234 頁；格里菲斯：《阿爾巴尼亞與中蘇分裂》，第 122～129 頁。關於 1960 年的幾次小插曲，見《起源》，第 2 卷，第 274～276 頁。
【65】 見《人民日報》為莫斯科聲明一週年紀念所發社論，載達林：《國際共產主義中的分歧》，第 213～220 頁。
【66】 伯奇勞斯：《危機年代》，第 317～319、335～336、342～346 頁。
【67】 見 1961 年 12 月 8 日《人民日報》文章《甘迺迪的如意算盤》，譯文載《中國大陸報刊概覽》，第 2639 號，第 38～42 頁。
【68】 達林：《國際共產主義中的分歧》，第 235 頁。
【69】 王炳南：《回顧中美會談的九年》，譯文載《聯合出版研究服務社—CPS—85～079》號，第 46 頁。會談於 1955 年在日內瓦開始，於 1958 年移至華沙。至 1972 年 2 月尼克森總統訪華時，所達成唯一協議是從美國遣返中國學生，和從中國遣返 40 名美國人。這筆交易是於 1955 年會談開始後 6 個星期內定下的；見麥克法夸爾編：《中美關係（1949-1971）》，第 104 頁。王大使作這樣的估計的理由之一，可能是甘迺迪政府於 1961 年所採取的新策略，並獲成功：不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聯合國內的中國席位；見上書，第 184 頁；《中國大陸報刊概覽》，第 2648 號，第 36～40 頁。
【70】 麥克法夸爾：《中美關係》，第 182 頁，引語是甘迺迪的助理西奧多爾·索倫遜的。
【71】 同上書，第 183～184 頁；希爾斯曼：《感動一個國家》，第 302～303 頁。
【72】 楊：《與中國共產黨人的談判》，第 116～117、244～245 頁；希爾斯曼：《感動一個國家》，第 304 頁；王炳南的回憶錄《中美會談九年》第 46 頁。
【73】 《七千人大會資料》，第 1～6 頁；關於對這一有價值資料的討論見第七章注 27。
【74】 此外，在某一處劉還以斥責口吻提到把共產黨看作是「全民黨」的概念；這確切無誤地是指蘇聯共產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所批准的新黨章。見《七千人大會資料》，第 57 頁。
【75】 「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同上書，第 1 頁。
【76】 同上書，第 2～3 頁。
【77】 同上書，第 3～4 頁。
【78】 同上書，第 4～5 頁。
【79】 同上書，第 5～6 頁。
【80】 譯文載施拉姆編：《未經修飾的毛澤東》，第 181 頁。
【81】 《七千人大會資料》，第 87、100 頁。其精確的財政含義將於下章詳細討論。出席蘇共二十二大的北朝鮮和北越代表，在蘇聯—阿爾巴尼亞爭吵中保持沉默，但卻與中國競相攻擊美國的「帝國主義干涉」，見格里菲斯：《阿爾巴尼亞和中蘇分裂》，第 104 頁。
【82】 施拉姆：《未經修飾的毛澤東》，第 101 頁。
【83】 這一點是劉的報告提出的，見《七千人大會資料》，第 28 頁。

第二編 虛假的黎明

第七章 七千人幹部大會

【1】 早期也有例子：如毛在整風運動前夕，於 1957 年 4 月 30 日召開的會議；見《起源》，第 1 卷，第 210 頁。
【2】 《黨史年報》，第 277 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014 頁。

【3】《廣東教育資料》，第 315 頁。
【4】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400 頁。
【5】依清朝初年學者黃宗羲的說法「今以四方之勞擾，民生之憔悴，足以危吾君也，不得不講治之牧之之術。苟無繫於社稷之存亡，則四方之勞擾，民生之憔悴，雖有誠臣，亦以為纖芥之疾也。」（譯按：《原臣》載於《黃宗羲全集》第 1 冊，第 4 頁，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年 11 月第 1 版）。見德·巴里：《等待黎明》，第 95 頁。
【6】黃道霞、戴舟、余展和中共中央宣傳部宣傳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十年大事記（1949-1989）》，第 166 頁。
【7】見序言內表 3。
【8】據尼古拉斯·拉德的說法（個人通訊）這些數字可能縮小了消費品價格上漲的幅度。
【9】馬齊彬等編：《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第 211 頁。陳雲在七千人幹部大會後，推行他這一建議，作為向城市居民提供蛋白質的最佳途徑。見後面第八章。毛於 1961 年 12 月在現場詢問了城市的生活標準；見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和江蘇省檔案局編：《毛澤東在江蘇》，第 80 ～ 81 頁。
【10】《劉少奇選集》下，第 358 頁。
【11】吳和威克曼：《苦風》，第 72 ～ 73、83 頁。
【12】同上書。（未注頁碼——譯注）。
【13】姜化宣、張蔚萍、肖：《中國共產黨會議概要》，第 466 頁；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400 頁。
【14】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014 ～ 1016 頁，是一個重要資料來源。其中未透露誰提出這次會議的規模。另一個來源是在林志建編：《新中國要事述評》，第 270 頁。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400 頁，則說是毛。鄭謙、韓鋼：《晚年歲月：1956 年後的毛澤東》，第 155 頁，亦持此說。把這個主意歸之於劉、周、鄧的是張天榮：《關於 1962 年七千人大會的幾個問題》，1981 年 5 月 12 日油印本第 6 頁（這個本子曾傳閱以徵求意見）。這段文字在以後不久發表於《黨史研究》1981 年第 5 期第 20 頁時，已被刪除；很明顯這篇文章被認為是對這次會議的半官方定論式分析；且當《黨史研究》的這篇文章重印入朱成家編的《中共黨史研究論文選》第 526 頁和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 24 輯第 13 頁中時，仍被刪除了（張天榮和叢進二人均曾參與編纂《參考資料》）。刪除這段文字，是因為它不準確？或是認為在這條資訊上以謹慎為更相宜呢？

費解之處是，像張天榮這樣明顯消息靈通的作者怎麼會在這點上搞錯？另一費解之處是，當一般黨史對這次會議的敘述中，關於是誰出主意召開這樣大型會議保持沉默時，為何叢進卻歸之於毛。這些問題也並非是迂腐學究鑽牛角尖。如果劉、周、鄧確曾聯合提議召開一次非常的會議；這可能是極罕見的例子，毛的同事們竟協同一致強迫他去做某事情；主席便很可能要對他們的動機產生懷疑。知情人 S 認為大躍進已使人們習慣於開大會，七千人幹部大會也並非太不正常，但一次群眾性大會，且毛要在會上對全國性災難承擔一些責任，則確實是應該另當別論的。
【15】關於這些事情的討論見《起源》第 2 卷各處，及以後章節。
【16】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073 頁。
【17】該講話譯文見施拉姆：《未經修飾的毛澤東》，第 158-87 頁，文革之後得到的中文版；這段話在第 158 頁。官方版本在《毛澤東著作選讀（下）》中，出版時經同意略去第 3 和第 5 部份，可能因為這內容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講話最終出版時顯得不合時宜；該段在第 814 頁。供內部流傳的完整版本見國防大學：《參考資料》，24 期，第 1-12 頁。在這個版本和 Schram 的版本中，第三部份是關於中國共產黨應該團結哪個階級；第 5 部份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18】 見鄧小平在會上的講話中，關於對縣以上共產黨領導者的描述；《鄧小平文選 1938-1965》，第 281 頁。
【19】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019 頁。
【20】 胡繩和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 378 頁。
【21】 據張天榮:《關於 1962 年七千人大會的幾個問題》，第 6 頁，這段文字也從《黨史研究》1981 年第 5 期第 20 頁中刪除，可能是因為它暴露了當時中國共產黨活動中手忙腳亂的性質。但也應補充說：《黨史研究》本的這種編排，有時明顯是為了節約篇幅而已，因此刪除或改寫那些只是簡單重複的會議報告和討論的材料的段落，允許讀《黨史研究》的局內人可能已得到。大多數改寫似僅只反映作者和編輯的普遍傾向，即對文件進行剪裁以跟上當時形勢，此外並無惡意，但為保持一致起見，所以本書仍擬繼續使用油印本。
【22】 它在《劉少奇選集（下）》中幾乎佔 70 頁，從 349 頁到 417 頁；幾乎與他 1956 年在共產黨八屆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相當。毛沒時間來詳細考慮這一重大而又冗長的報告，也許是他提議不需政治局同意，即向大會提交報告的另一個理由。
【23】 《劉少奇選集（下)》，第 335 頁；提交報告的日期見滕文藻：《關於七千人大會的評價問題》，第 4 頁。
【24】 當劉少奇於元月 27 日向七千人幹部大會講話，談到大躍進口號時，毛作簡短插話。說是書記處首先對這類事情作了澄清，但卻沒能把這件事處理完畢。他沒有完全同意（劉的講話），似並不是因為報告對他個人作用有什麼批評，而是因為書記處對新聞界促成 1958 年那種狂熱的責任，未予批評：這是毛至少自廬山會議以來，即感惱怒的一件事。毛的插話見《劉少奇選集》下，第 429 頁；毛以前對新聞界的批評，見《起源》，第 2 卷，第 220 ～ 221 頁。
【25】 見張天榮：《關於 1962 年七千人大會的幾個問題》，第 21 頁（載《黨史研究》1981 年第 5 期，第 26 頁）。這段文字不完全清楚。鄧顯然要求與會者就書記處工作發表意見（即批評）；並擬將它們加到報告中去，如果書記處的調查證明是不完全的話：「並要求大會同志提意見，說如果檢查得不夠，就加。」（劉少奇在 1 月 27 日的講話中，使用了同樣的話——不夠就加——當時他提議，假如與會者希望的話，他們可以列出更廣泛的錯誤，以便加入到他的書面報告中；見《劉少奇選集 (下)》，第 420 頁。）人們可以設想，與會者都有這份報告可細讀，以便決定他們有什麼要補充的。不過，這沒有明白說出；而且一份呈政治局常委會的報告，沒有毛的直接命令，竟分發到縣級官員，那是極非尋常的；還有，如果毛曾命令在會上散發報告，則張天榮可能會說出來。無論如何，有一點是清楚的，即與會者面前擺有某種文件式簡要介紹情況的書，因為周恩來在講話中提到它；見《七千人大會資料》第 85 頁。關於對後一資料的討論，見下面注 27 和注 96。
【26】 見附錄二。
【27】 印在《劉少奇選集（下)》，第 349 ～ 417 頁的（報告）文本（譯文載《劉少奇著作選集》，第 2 集，第 328 ～ 396 頁，在本章已起草後才面世，故引用較少）是不完全的。所幸的是，在《七千人大會資料》中載有似是（劉講話的）全文，該資料中還有鄧小平講話的較完整全文，林彪講話的較完整全文，和別處無法得到的周恩來講話全文。劉的講話全文中，重大刪節是在關於國際形勢部分；可能是因為在《劉少奇選集（下)》出版時。1962 年到 1985 年間中國對外關係已有相當大的變化；但在國內事務上也有重要刪節，後面將注明。（譯按：可能指劉談彭德懷的段落。）《劉少奇選集（下)》第 349 頁所說書面報告的日期是 1 月 27 日；但本作者同意中國評論家的說法，即報告在正式提出前，實際上即已傳閱。
【28】 參考《起源》，第 2 卷，第 326 頁。
【29】 《劉少奇選集》下，第 350 ～ 352 頁。
【30】 同上書，第 353 ～ 354 頁。
【31】 參考《七千人大會資料》，第 11 ～ 14 頁，以及《劉少奇選集》下，第 354 頁。

【32】《七千人大會資料》，第 11 頁。關於對劉講話的討論見《起源》，第 2 卷，第 51 ～ 54 頁。
【33】《七千人大會資料》，第 11 頁。
【34】同上書，第 12 頁。
【35】同上書，第 12 ～ 13 頁。
【36】同上書，第 28 頁。
【37】同上書，第 13 頁。
【38】同上書，第 13 ～ 14 頁。
【39】同上書，第 14 頁。
【40】《劉少奇選集》下，第 355 頁。
【41】同上書，第 354 ～ 359 頁。
【42】劉少奇從親身在湖南的調查中發現新聞界鼓吹虛假的勝利後，於 1961 年 4 月 28 日給予批評，見前面第三章。毛在大躍進期間也曾批評新聞界；見《起源》，第 2 卷，第 220 ～ 221 頁。
【43】《七千人大會資料》，第 38 ～ 39、41 頁。
【44】《起源》，第 2 卷，第 214 ～ 227 頁。
【45】《七千人大會資料》，第 40 頁。
【46】同上書，第 36 ～ 37 頁；《起源》，第 2 卷，第 306 ～ 309 頁。
【47】《劉少奇選集》下，第 355 頁。
【48】《七千人大會資料》，第 35 ～ 36、41 ～ 42、58、61 頁。
【49】《劉少奇選集》下，第 354 ～ 359 頁。前面已作多次討論。
【50】另一種解釋是，這種奇特的並列在報告第一稿和第二稿中都存在，但是劉著作選集的編者刪掉了令人難堪的為毛和中央辯解的話，毛去世後對大躍進中他們的作用出現了更為批判性的評價，刪掉這部份內容好與其保持一致。
【51】同上書，第 361 ～ 367 頁。
【51】同上書，第 368 ～ 372 頁。
【52】同上書，第 429 ～ 430 頁。
【53】同上書，第 373 ～ 394 頁。
【55】同上書的〈報告〉全文中，刪除了這些；也許因為它是過去無法改變的事實；也許因為，已決定不直指某些人，這些人名如出現在本書中將意味著永久的公開的屈辱。例子載在《七千人大會資料》，第 35 ～ 37 頁。劉的報告在一處因河南某縣委第一書記的做法而指責了農業部，該書記在大躍進中因遵循農業部指示而造成大災難，毀掉了 300 多萬株棗樹，6,000 部四輪板車和 32 座橋樑；見同書第 35 頁。
【56】《劉少奇選集》下，第 395 ～ 406 頁。
【57】「怎樣解決這個矛盾？唯一的道路，就是全黨都要服從中央。」同上書，第 407 頁。
【58】同上書，第 408 ～ 413 頁。
【59】同上書，第 414 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934 ～ 938 頁。關於六十條 3 月文本中的暗示和 6 月本中第 47 條的全文，見《農業集體化》下，第 466 頁（第 44 ～ 49 條）、487 ～ 488 頁；其在七十條中的運用，見《工業企業法規》，第 72 頁；在四十條中的規定，見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 23 輯，第 489 頁。一部中國政治辭典認為劉的七千人幹部大會書面報告，是法規中最具權威性的經典之作；見方平、葉篤鑄編：《黨的建設辭典》，第 110 ～ 111 頁。這似表明：這法規在 1961 年 3 月和 6 月即已制定出，並漸漸在中國領導人中間流傳，當撰寫劉的書面報告時，這法規便成了現成的素材，體現了他們希望追隨者們如何行動。但是這個三八法規似乎未能像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法規那樣廣泛流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辭書中未予正式收入，台灣所列重要大陸政治術語中也未收入，郭華倫編：《中國共產黨術語彙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原始法規載《毛澤東選集》，第 4 卷，第 155 ～ 156 頁。

【60】 這一法規本身在9個月後的共產黨十中全會上也經刪改；《劉少奇選集》下，第503頁注187。
【61】 見下面第十五章。
【62】 中國的文章在腳注裏表明，這些討論有記錄；但遺憾的是，顯然僅有受信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者能得到這記錄。我引用了他們著作中的話。
【63】 施拉姆：《未經修飾的毛澤東》，第166頁。
【64】 韓鋼：《六十年代前期黨內關於社會主義問題的新認識》；載中國中共黨史研究會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專題講座》，第1～2頁。
【65】 同上書，第2頁。
【66】 同上書。所提到的「第三次左傾路線」是最具破壞性的一次，因為它是最終使共產黨遭受巨大失敗的時期。這個詞是用於描述1931-1934年江西蘇維埃時代；這一時期以在蔣介石第五次「圍剿」面前，蘇維埃政權被迫全體大撤退結束。隨後從南方到西北的長征，一直是官方歌頌的英雄史詩；但在共產黨軍隊倖存者到達陝西省之前，曾遭受巨大損失。一般認為第三次左傾路線是在1935年1月遵義會議上結束的；在這次會議上毛開始崛起掌權。關於對這一時期的官方毛主義的說法，見1945年《關於黨史的決定》，載《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85～193頁；關於更近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看法，見劉吉編：《中國共產黨七十年》，第199～220頁。
【67】 韓鋼：《六十年代》，第2頁。
【68】 同上書；知情人S。
【69】 韓鋼：《六十年代》，第3～4頁。
【70】 知情人S。
【71】 見前第三章第57～58頁。
【72】 《劉少奇選集》下，第423頁。
【73】 關於主觀主義的討論，見《起源》，第1卷，第111～114頁；它是1942-1944年和1957年整風運動所攻擊的三大罪狀之一。
【74】 韓鋼和知情人S兩人均如此說。
【75】 李向前：《七千人大會始末》，載《黨史文匯》1992年第12期，第28頁。
【76】 滕文藻：《關於七千人大會的評價問題》，第2頁。
【77】 起草委員會的規模和其討論的時間長短，是毛在其對大會講話中透露的；見施拉姆：《未經修飾的毛澤東》，第159頁。
【78】 李向前：《七千人大會始末》，第28頁。滕文藻《關於七千人大會的評價》只謹慎地指出某個地區局的一位「負責人」；儘管近年中國學者日見增多地討論柯的左傾主義，但他死後從未受過譴責。
【79】 關於十二年農業規劃的內容、影響和象徵性意義的討論，見《起源》，第1卷，第27～29、90～91、123～126、314～315頁；第2卷，第16、42、122、305頁。中國人一般稱之為四十條。
【80】 「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關於大躍進口號的演變過程，見《起源》，第2卷，第42頁注54。
【81】 滕文藻：《關於七千人大會的評價》，第2頁。
【82】 同上書；（規劃）正文只簡單提出「四，五，八」；我猜想是建議中提高糧食產量指標的簡化提法：即華北從1955年的每畝150斤提高到400斤；華中從208斤提高到500斤；華南從400斤提高到800斤。見《起源》，第2卷，第351～352頁注55。規劃第一個文本全文載《共產黨中國，1955-1959：政策檔及分析》，第119～226頁；此處所提出的目標是在第六條中，載於第121頁。
【83】 《起源》，第2卷，第323頁。
【84】 滕文藻：《關於七千人大會的評價》，第2～3頁。李向前：《七千人大會始末》，第28頁；後一來源對彭真的講話作了最充分描述，但有某些刪節。
【85】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1026頁。
【86】 關於彭真和總書記之位的討論，見《起源》，第一卷，第141-6頁。

【87】 滕文藻：《關於七千人大會的評價》，第 4 頁；李向前：《七千人大會始末》，第 28 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026 ～ 1027 頁。這些資料均僅提到三年或五年的「過渡」，但結合大躍進來看，這明顯是指要在 1958 年秋末過渡到共產主義的狂熱談論。見《起源》，第 2 卷，第 130 頁。
【88】 例見麥克法夸爾、奇克和吳：《毛主席的秘密講話》，第 431、433 頁。
【89】 關於毛在過渡問題上的否認說法，見《中國的法律和政府 I 》，第 4 號，第 41 ～ 42 頁。
【90】 滕文藻：《關於七千人大會的評價》，第 4 頁；李向前：《七千人大會始末》，第 28 頁。
【91】 同上書。想要人家把他看得謙遜樸實些，這可能是獨裁者的一種職業性癖好。在伏爾科岡諾夫的《斯大林：勝利和悲劇》中，引用了蘇聯獨裁者一封信裏的話。信是斯大林寫給兒童讀物《斯大林童年時代的故事》的出版者的，他在信中聲言，他反對出這本書，認為這書會促進個人崇拜！大衛·雷姆尼克在《紐約書評》1992 年 11 月 5 日第 14 頁上，評述伏爾科岡諾夫的書時，曾引述了這件小事。對約那坦·麥斯基指引我瞭解這一點，深表感激。
【92】 滕文藻：《關於七千人大會的評價》，第 5 頁。
【93】 滕文藻不知是出於天真或由於不慎重，竟認為陳伯達的批評是無道理的，見上書。毛對劉的《報告》全文提出了非常溫和的修改；《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0 冊，第 5 ～ 9 頁。
【94】 滕文藻：《關於七千人大會的評價》，第 5 頁。
【95】 同上書；滕文藻的用辭是「專斷」。
【96】 收入《劉少奇選集（下）》第 418 ～ 443 頁中的講話文本有重大刪除。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圖書館的油印本有劉 1962 年 1 月 27 日講話較完整的文本。即使在此文本中，也刪除了開場一節關於國際形勢的講話。（講話）這一節的內容在劉報告開始的同一節內；這報告收入了油印文集中《七千人大會資料》；這文集收錄了劉的報告，但沒有劉的講話。為讀者方便，我只援引劉講話的公開發行本。在其中報告與講話是完全一樣的。

刪節的理由是很清楚的；但應補充說，負責編纂中國領導人的講話和文章的機構認為，以官方文集形式出版刪訂本是毫不足怪的。這類政治上正確的本子是供「廣大群眾」學習之用——意即對「廣大群眾」的薰陶教育。完整稿是僅供經批准的官員和學者進行研究之用的，如本章所述的那些人和學者，以保證他們不致把事情搞錯。
【97】 他在寫講話時所碰到的麻煩表現在李向前《七千人大會始末》第 29 頁微縮複製的 5 頁塗改重重的手書講話稿中。劉未預見到要作講話，但毛提議要講。劉僅只準備了一個大綱，在劉講話前，毛和政治局常委傳閱了一下，見黃鎮：《劉少奇一生》，第 377、379 頁。
【98】 見滕文藻：《七千人大會的評價》，第 3 頁。
【99】 見李向前：《七千人大會始末》，第 28 頁。劉講話的官方文本刪除了毛的這次插話，但它收有其他人的插話；劉 1962 年 1 月 27 日講話油印本，則未包括插話。
【100】《劉少奇選集》下，第 354、420 頁。
【101】 劉少奇講話的官方文本中，刪去了談到山東的這一段話；可比較同書第 419 頁與劉 1962 年 1 月 27 日講話油印本第 2 頁。在後一文本中用了一個錯字代替了惠民地區的「惠」字。
【102】《劉少奇選集》下，第 420 頁。
【103】 同上書。（未注頁碼——譯注）
【104】 同上書，第 420 ～ 421 頁。
【105】 劉 1962 年 1 月 27 日講話油印本第 3 頁，劉指責河南，是為報復前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在大躍進期間沒有聽他的話，見《起源》，第 2 卷，第 303 ～ 304 頁。

【106】這個插話也沒有印入官方的文本中，但李向前《七千人大會始末》第28頁卻引用了。
【107】《劉少奇選集》下，第421頁。
【108】「不離三，六，九」，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432頁。
【109】據另一材料，緊接1961年廬山會議之後，劉少奇在安徽南部的黃山休養地，召開了一次會議；會上官員們向他提交了他們對大躍進影響的最確切估計；知情人W。不論是什麼理由——怕刺激主席，或怕毛威信受到重大打擊給共產黨帶來的後果；或是顧慮到披露會導致要求彭德懷復出而使自己倒臺；或僅是為了避免使幹部們洩氣——但不管怎麼樣，劉沒有向七千人幹部大會提交這些資料。
【110】《劉少奇選集》下，第422頁。
【111】官方文本對劉講話這重要的部分實際一點也未載入（見《劉少奇選集（下）》，第426頁）；因此（我）便用了劉1962年1月27日講話油印本。
【112】劉為強調應全面地講總路線，引用了他和中國派駐英國代辦的一次談話。後者告知他，英國人很怕中國人以這樣速度前進。劉便問：「怎樣呢，如果我們停止前進得這樣快，他們便會停止怕我們嗎？」代辦以外交辭令迅速回答說，那麼他們會更加怕中國人，因為他們懂得質量是比數量更重要！（劉少奇1962年1月27日講話油印本第7～8頁）劉沒點出那位官員的名字；不過當時駐倫敦代辦是宦鄉；在文化大革命後，宦任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後又成為中國國際教育交流的重要人物和中美政策會談顯要的參與人。
【113】同上書，第8～9頁。
【114】滕文藻：《關於七千人大會的評價》，第3頁。
【115】《七千人大會資料》，第22頁。這段話如放在劉所提大躍進的一個成績處肯定是恰當的，即隨著5億農民進入公社，集體化已達到一個更高階段。《劉少奇選集（下）》，第352頁。劉著作選的編者將包含這段話在內的半頁對公社的讚頌之詞（《七千人大會資料》，第21～22頁）刪除了，可能是因為它與時代太不協調。正直的讀者知道他們是應從共產黨領導人的著作中吸取教益；他們會感到驚詫，他們將如何把這些話和80年代中期解散公社協調起來呢。關於神學院對斯大林口才和寫作的訓練的影響的評述，見烏拉姆：《斯大林：其人其時代》，第24頁。
【116】關於農業生產合作社從初級到較高級轉變的簡短討論，見《起源》，第1卷，第16～19頁。
【117】至少有少數食堂堅持到1962年甚至更後；見威廉·欣頓：《神飯》第230～232頁；它對食堂制度是採取一種同情的觀點的。
【118】劉1962年1月27日講話油印本，第9～10頁。
【119】同上書，第13～14頁。
【120】關於毛在這兩個規劃中的作用，見《起源》，第1卷，第27～29頁；第2卷，第15～19頁。
【121】《劉少奇選集（下）》，第359頁。
【122】《劉少奇選集》的編者顯然認為（這段話）不足以說服讀者，因為到1985年書出版時，讀者關於毛的錯誤已聽到很多，並且目睹了彭德懷元帥的平反，所以他們在書中刪掉了劉講話中的這段話。
【123】劉1962年1月27日講話油印本第7頁。
【124】見《起源》，第2卷，第212～216頁。
【125】同注123。
【126】如前已提出，劉講話的油印本不包含旁人插話；這一插話是引自叢進的《曲折發展的歲月》第494頁。關於高—饒事件的最完整最新的敘述，見泰偉斯的《毛朝廷中的政治》；對彭德懷作用的討論在第104～107頁。在廬山會議上，劉也用了同一個詞「餘孽」；見《起源》，第2卷，第231頁。（中譯本《起源》，第2卷，第315頁，用的是「一個漏網分子」。——譯注）

【127】劉 1962 年 1 月 27 日講話油印本第 6 ～ 7 頁。毛的這些話第一次似乎是出現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一份紅衛兵出版物上；見《起源》，第 2 卷，第 231 頁。不清楚毛是什麼時候說這話的。李銳寫道，在 1959 年 7 月 31 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曾指控彭深深地捲入了高—饒事件，但沒引述這些話；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 217 頁。有關在廬山通過的中央委員會決議中，在這個問題上對彭的官方攻擊，見《彭德懷案件 1959-1968》，第 41 頁。

【128】毛澤東 6 月對一位北朝鮮客人又重複了這一指控；客人可能對朝鮮戰爭中這位前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表示特別的興趣；見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494、496 頁。

【129】關於彭陰謀勾結赫魯曉夫的指控，見多梅斯：《彭德懷：其人和其形象》，第 87 ～ 88 頁；《起源》，第 2 卷，第 225 ～ 228 頁。關於高崗，見泰偉斯：《毛朝廷中的政治》，第 47 ～ 51 頁。

【130】還是劉在廬山所作的指控；見《起源》，第 2 卷，第 178 頁。

【131】劉 1962 年 1 月 27 日講話油印本第 7 頁。

【132】同上書。(未注頁碼——譯注)

【133】有趣的是，毛去世後一位中國分析家認為有必要特意指出毛的插話，因這表明並不只有劉對彭持如此觀點，因此很明顯，對於熟知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學者來說，他們已經認定劉對於彭的平反個人心存憂慮；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496 頁。關於高對劉產生威脅的討論，見泰偉斯:《毛朝廷中的政治》，書中到處可見，但最重要是第二章。關於彭德懷對劉造成威脅，更詳細的討論見《起源》，第二卷，第 230-3 頁。關於他會議文章的最初稿，張天榮（音）：《關於一九六二年》第 29 頁引用劉評論彭德懷的話，但這破壞劉形象的話在《黨史研究》版本中被刪掉了。

【134】劉少奇 1962 年 1 月 27 日講話油印本第 16 ～ 18 頁。但在《劉少奇選集》中，這段話幾乎全部被刪掉。可能因為在出版時，這類作法是極普通的且經認可的。

【135】李向前：《七千人大會始末》，第 8 頁；黃錚：《劉少奇一生》，第 382 頁。

【136】林彪的講話沒有一個令人完全滿意的文本。現在西方學者都能得到的文本見於林從 1937 年到 1968 年著作的文集第 129 ～ 140 頁。這一文集是真實可靠的，我名之為《林彪選集》。我得到的這個文本，既無書名頁，也無任何有關出版的材料，顯然這是文化大革命期間準備並發行的集子。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410 ～ 412 頁和滕文藻《關於七千人大會的評價》第 5 ～ 6 頁引用這一講話的段落，極為相似，這就證實了這一講話文本的可靠性。其相異處——可以用以下事實來說明：即在七千人幹部大會上，亦如別的場合一樣，林彪所採取的辦法是，不按準備好的稿子講話，而如果它需要較廣地散發的話，僅在事後作成一個官方的經過正式審核的本子，因之便可能有一個根據錄音的非正式文本，以及一個最終的官方本。在這種情況下，亦如在 1969 年共產黨九次代表大會一樣，有一個事先準備好的本子，但他沒有用它。見張雲生《毛家灣紀事：林彪秘書回憶錄》第 210 頁和滕文藻《關於七千人大會的評價》第 5 ～ 6 頁。

但這個本子刪除了講話第二部分的一大半，它是專門談軍隊工作細節的。這一部分可在《七千人大會資料》第 125 ～ 161 頁遠為完整的談話中看到。《資料》可能是會後不久彙編的。將第一個文本與第二個文本的相關部分作比較便可見，兩者均有刪節和改寫；有些可能是由於政治原因，有些則是由於編輯原因。

【137】例如林彪在八大上重行當選後不久，即沒有出席 1956 年 10 月 20 日召開的討論蘇聯入侵波蘭前景的重要政治局會議；吳冷西：《憶毛主席》，第 11 頁。

【138】按照《林彪選集》第 60 頁，他 1958 年 5 月在軍隊高級軍官會議上講了話。這可能是一次軍委擴大會議，有一千名高級軍官出席，該會議於 5 月 27 日開始；《起源》，第 2 卷，第 66 ～ 67 頁。

【139】林彪譴責彭德懷的例子，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 227 頁；《起源》，第 2 卷，第 242 頁。

【140】當時他們在那點利益上可能是共同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準備林彪講話的文本時，要把它的這第二句話包括進去便不合時宜了：「至於黨的工作，少奇同志的報告，講得非常好，也非常正確。我是完全同意的。」參見《七千人大會資料》，第 125 頁，和《林彪選集》第 129 頁。同樣的，在文化大革命後、劉少奇去世後出版劉少奇選集，編者們準備他在這次會議上這篇講話時，他們也從論述軍隊工作各方面非常巨大成就的一段中，刪除了標明成就日期的「自 1959 年以來」這個詞；那當然是林彪從被罷黜的彭德懷手中接任國防部長的時候，而彭在劉的著作出版時已經平反了；參見《七千人大會資料》第 9 頁和《劉少奇選集》下，第 352 頁。關於 1959 年劉和林在彭德懷問題上的利益一致，見《起源》，第 2 卷，第 242 頁。

【141】《林彪選集》，第 132 頁；但《七千人大會資料》，第 129 頁中相應的段落裏，沒有包含這一點。一個可能當然是，它是加到文化大革命文本中的，因這時彭德懷又成了一個突出的被攻擊的目標；但提到這一點相對說來並無大害，所以很難看出究竟是什麼原因；另一可能是，1962 年文本中刪去了所提這一點是因為林不希望進一步激怒彭在軍隊中的老同志們。

【142】《林彪選集》，第 132 頁；《七千人大會資料》，第 129～130 頁。這兩個文本間的差異似乎只是編輯上的。

【143】《林彪選集》，第 129 頁；《七千人大會資料》，第 126 頁。兩個文本文字上有差異，但很難看出其中有什麼政治意義。雖然林彪的措詞似乎是表明，他所指的是 1961、1962 和 1963 年，但也可能是說溜了嘴。那是常有的事。一個人甚至到 1 月末還未習慣已進入新的一年；特別是這次講話如果還是在中國農曆新年之前的話。若果如此，則林所指年份似應是 1960-1962 年。林講話時彷彿他已經知道「這一年」所代表的數字，如果他所指是 1962 年的話，就不可能這樣講了。當然另一種分析是，他可能故意早在 1963 年初就降低期望值，從而讓大家提前以悲觀情緒展望未來。

【144】《七千人大會資料》，第 127～128 頁；《林彪選集》，第 130～131 頁。林在 1962 年文本中把「失」放在「得」前面，有趣的是這一點在文化大革命文本中卻倒過來了。可能林先說失，僅只因為他知道，那是當時所謂的主導性話題。關於毛在廬山對彭德懷把「失」放在「得」前面感到惱怒的情況，見《起源》，第 2 卷，第 214 頁。

兩個文本的文字在一個詞上也有不很重要的差異：在 1962 年文本中，林說儘管大躍進有物質上的「失」，但共產黨在精神上有很大的「得」；而文化大革命文本卻聲稱，他說得「在建設上」。這可能是第一個文本文字上的錯誤，在第二個文本中予以糾正了；但因林在別的許多地方強調了「精神」的重要性，所以也可能第一個文本是正確的，不過文化大革命的編者們經過考慮，認為他沒充分強調過大躍進的「物質上的得」，因而後來在這一段中，用「建設」代替了「精神」。

【145】《林彪選集》，第 132～134 頁；《七千人大會資料》，第 130～134 頁。儘管有嚴重經濟問題，仍號召信賴政治領導，這是 1992 年大選中英國保守黨的成功戰略的特點，更是同年較遲時候，布希總統失敗的競選連任活動的特點。

（兩個文本的）文字這兒又有差異：文化大革命文本中，另有一段關於毛的正面敘述，和一大段反修正主義的論述；但這文本卻刪除了關於美國因其從落後到發展的進步，「在全世界來說，美國是很典型的」一段描述，這是可以理解的；也刪除了（原因不太明顯）關於英國「已是一個落後的老帝國主義」國家的描述——可以想像，林（選集）的編者後來感到，這樣講有點削弱了毛在大躍進開始時發出的在 15 年內中國超過英國的號召的意義（見《起源》，第 2 卷，第 15～19 頁）。

【146】滕文藻：《關於七千人大會的評價》，第 4 頁。

【147】在斯大林去世後很久，喬治·朱可夫元帥描述了，在 1941 年不可能勸說他把蘇聯軍隊置於備戰狀態，以應付德國進攻，當時似乎除了斯大林之外，人人均感到必然會發生。朱可夫承認，他沒能堅持那樣做，因為 30 年代晚期的軍隊清洗，十分清楚地表明，違抗蘇聯領袖會意味著什麼。不過他還補充說：「然而那只是實情的一個方面。我還要告訴你另一方面。我並不認為自己比斯大林更聰明更有遠見，或者對局勢我有比他更好的理解。像所有其餘人一樣，我對他，對他在最困難局勢中找到出路的能力，懷有巨大的信賴。我感覺到德國有進攻的危險，這種感覺攪得我心神不寧；但是我對斯大林的信賴，堅信最終一切事物會依他所指示的那樣發展的信念，卻更強烈。」引自舒克曼編：《斯大林的將軍們》，第 347～348 頁。關於周恩來 1958 年的講話，見李銳：《「大躍進」親歷記》，第 331 ～ 332 頁。

【148】所有中國評論家們均同意這一點，滕文藻：《關於七千人大會的評價》，第 6 頁；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413 頁；按照一份資料來源，毛也欣賞華國鋒的發言，華當時是一位湖南省官員，後來 1976 年毛指定其作繼承人。儘管林的講話招致消極反應，當毛根據劉的講話更正中央決議時，他插入了一個詞組，表示會議全體一致同意所有政治局常委們的講話，並要求將林的 (講話) 廣泛發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0 冊，第 59 ～ 60、62 ～ 65 頁。

【149】撒切爾：《唐寧街歲月》，第 27 頁。這位英國前首相所指的是威廉·懷特勞；1979 年在其第一屆政府中她委任他當內務部長和副首相。關於後者對撒切爾夫人的看法，見懷特勞的《懷特勞回憶錄》。

毛的高級同事對林彪那種行為方式的反應，可能恰好與撒切爾夫人另一位高級同事、財政大臣尼格爾·勞遜，對她的新聞秘書伯納德·英代姆的反應一樣；英代姆「總是以這樣的前提發佈新聞：所有正確的事情，都是瑪格麗特個人的成就；所有搞錯的事情，便都是她的大臣們的過錯；瑪格麗特本人也日漸這樣來看待事情」。勞遜：《(唐寧街) 第十一號的觀點》，第 850 頁。

【150】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413 頁；按另一份材料，毛是在幾個月之後問羅的；黃瑤：《三次大難不死的羅瑞卿大將》，第 206 ～ 207 頁。

【151】滕文藻：《關於七千人大會的評價》，第 5-6 頁；黃瑤：《三次大難不死的羅瑞卿大將》，第 205-206 頁。葉群本人也享有軍銜，為林彪辦公室主任；見張雲生《毛家灣紀事》，書中各處。

【152】李，《毛主席的私生活》，第 386-387 頁。毛參加這類會議不多，大多數時候都和年輕女子待在人民大會堂「他的」房間內，從會議簡報上讀那些批評意見；同上書。

【153】有位西方領導人，像毛一樣，在「群眾」面前總是道貌岸然的長者，甚至很能鼓動人，而私下裏則很粗魯，他便是林頓·約翰遜；見古德溫：《回憶美國》，第 256～259、280～281 頁。因為毛 1949 年後的全部講話均是秘密地說的，主席覺得可以用些粗話來逗逗人，可沒想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紅衛兵會不經刪節，便把這些原話傳佈開。

【154】施拉姆：《未經修飾的毛澤東》，第 166 ～ 167 頁。

【155】同上書，第 167 頁。

【156】同上書，第 187 頁。

【157】李先念在同一天的一個小組會上講話，在其自我批評中也採用相似方式；《李先念文選》，第 276 頁。

【158】這是毛的醫師的分析。李，《毛主席的私生活》，第 387 頁。

【159】施拉姆：《未經修飾的毛澤東》，第 170 ～ 176 頁。所引用的話在第 173 頁。外國人中有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和美國記者愛德格·斯諾 (他 30 年代中期對毛的採訪和對中國西北共產主義運動的描述，構成了他的經典之作《紅星照耀下的中國》的基礎)。在《大河彼岸》的第 613 ～ 630 頁，斯諾對中國有大眾饑荒的傳聞給予極度的蔑視嘲罵，認為那只是冷戰思維；那本書是 1960 年他在中國作長時間採訪後寫成，那一年中國人口是負增長。關於他個人對這件事

的懷疑，並熱切地籲請旅居中國的西方人提供「事實」，見S·伯納·托馬斯：《高度冒險的季節：愛德格·斯諾在中國》，第306～308頁。

【160】《毛澤東著作選讀》下，第833頁；施拉姆：《未經修飾的毛澤東》，第180頁。毛沒有說明來源。這說法是恩格斯從黑格爾脫胎而來，1959年毛和陳雲兩人均引用過。關於這條闡述早期運用的討論，見《起源》，第2卷，第164頁。

【161】施拉姆：《未經修飾的毛澤東》，第177頁。

【162】同上書，第168頁。

【163】關於它對一位將軍影響的例子，見樊昊：《毛澤東和他的顧問》，第246頁；毛曾邀這位將軍作他在軍事教育方面的顧問。

【164】見他2月24日給田家英的便箋；《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第111頁，也見同書第62頁。在主席允許將他的講話於4月10日發給較低級幹部前，毛的講話由一些黨的主要宣傳幹部閱讀了一遍；《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第54～58頁。

【165】關於中國領導分成兩個戰線的討論，見《起源》，第1卷，第152～156頁；第2卷，第172～180頁。

【166】從毛的同事們的行為表現來推測他私下的決定，是與從一顆恆星的光的運動，來計算存在一顆掩蔽的行星的過程相反但卻是類似的；圍繞「飛馬51」的那些行星便是這樣發現的；1995年10月30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第69～72頁。現在的例子，則是按他的衛星的行為來計算「心中的紅太陽」的相對亮度；見下麵第十二章。

【167】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406頁。

【168】金葉：《回憶譚震林》，第385、395頁。

【169】李向前：《七千人大會始末》，第28頁。這也曾經是廣東的一個問題；見《起源》，第2卷，第155～159頁。

【170】儘管陶鑄同時擔任中南局第一書記職務，但他直至1965年才把省委第一書記職務讓給趙紫陽。陶鑄也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見《筆祭陶鑄》，第284頁。

【171】李向前：《七千人大會始末》，第26頁。我估計這一資料來源提到李雲仲恐是印刷錯誤。毛對李的批評，見《毛主席對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批判》，第12～14頁。

【172】《起源》，第2卷，第163～170頁。

【173】巴克曼：《陳雲和中國的政治制度》，第75頁。

【174】《朱德選集》，第389頁。

【175】見上面第三章第65頁。

【176】《鄧小平文選1938-1965》，第279～299頁；(《鄧小平選集1938-1965》，第269～286頁，所收似是全文；至少與書中其他各篇文章相比，無刪削痕跡。

【177】《鄧小平文選1938-1965》，第280～283頁。鄧的講話贏得了毛的讚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第53頁。

【178】鄧正式說明，有義務完全同意毛的講話（因為他是黨的主席）和劉的報告（因為那是中央的報告）；同上書，第279頁。

【179】鄧在八屆大會的講話中，也提出了相似的論證。見《起源》，第1卷，第116～117頁。

【180】黨員數字是出現在毛的講話中的；施拉姆：《未經修飾的毛澤東》，第179頁。

【181】《鄧小平文選1938-1965》，第283～289頁；引語載第289頁。毛在講話中也引用了自己的話；施拉姆：《未經修飾的毛澤東》，第163頁。關於這條在青島提出的說法的來源和早期政治（含義），見《起源》，第1卷，第285～289、304頁。

【182】《鄧小平文選1938-1965》，第290頁。鄧沒有被插話打斷，而說黨章中已考慮到這點（他向八屆代表大會所提出的黨章）。毛在自己的講話中確曾談到禁止「秘密」幫派；施拉姆：《未加修飾的毛澤東》，第183頁。

【183】《鄧小平文選1938-1965》，第290頁。

【184】同上書，第 292 頁。這一建議曾引發了有趣的三人之間的交談。劉少奇打斷鄧的話，說每個黨委會應當一個月開一次批評自我批評會；鄧回答說，不需要每個月，以一季為好；劉同意了這點，而毛似乎覺得他也應當說點什麼，便提出沒有什麼創見的建議，說這種會應包括檢查工作、總結經驗和交換意見。
【185】同上書，第 295 ～ 296 頁。
【186】《七千人大會資料》，第 79 頁。
【187】同上書，第 81 頁。
【188】同上書，第 81 ～ 82 頁。
【189】同上書，第 83 頁。
【190】同上書，第 83 ～ 84 頁。
【191】同上書，第 85 頁。
【192】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407-408 頁。
【193】《七千人大會資料》，第 79 頁。
【194】關於討論，見《起源》第二卷，第 59-63 頁。
【195 見《起源》，第 1 卷，第 86 ～ 91 頁。第 2 卷，第 24 ～ 25、55 ～ 59 頁。陳雲有一段時間完全退出了活躍的政治活動。
【196】李先念作了一次同樣無說服力的自我批評；《李先念文選》，第 276 ～ 279 頁。
【197】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070 頁。
【198】見《起源》，第 2 卷，第 105、108 ～ 113 頁。
【199】關於對 1959 年這些問題的更長的討論，見上書，第 228 ～ 233 頁。
【200】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392 ～ 395 頁。
【201】《起源》，第 2 卷，第 196 ～ 200 頁。
【202】《橫刀立馬彭將軍》，第 162 頁；對他這次訪問的描述在第 160 ～ 168 頁上，只不過訪問開始月份載在《彭德懷同志故居簡介》，第 4 頁。這次訪問是從 11 月 3 日到 12 月 23 日；龍正才：《彭德懷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問題的艱苦探索》；載《中共黨史研究》1988 年第 6 期，第 49 頁。這後一資料來源並對彭 60 年代早期的活動，作了簡短如實描述。關於彭在北京西北郊圓明園的拘禁地的描述，見《起源》，第 2 卷，第 233 ～ 237 頁。當本作者於 1986 年訪問他的家鄉時，那導致青年彭德懷參加革命的貧窮條件，仍存在著。他的家庭情況很明顯要比他湖南同鄉毛和劉少奇的家庭差得很多。
【203】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498 頁。
【204】按同書第 497 頁，它包含五部分：關於廬山會議；關於高饒事件；關於他與外國人的接觸；歷述他在共產黨運動中的經歷；關於軍事路線。毛去世後，為彭的平反所做的努力值得欽佩──《彭德懷自述》，英文名《一位中國元帥的回憶錄》──作為歷史文件，有相當多的缺點。該書大半是根據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交代寫成；僅第十四章（關於朝鮮戰爭）和第十五章（關於廬山事件）是根據他 1962 年的檢討。即使按最寬容的估算，這兩章也僅包含所傳說這後一文件（指 1962 年檢討──譯注）中 8 萬字裏的不足 1.4 萬字。在第十五章中，彭的討論僅涵蓋了經濟論題及說明他決定於 1959 年 7 月 14 日寫信給毛有關的在廬山的行為活動。如我們所知，劉少奇對七千人幹部大會的講話中，也實際承認了彭對經濟問題看法的正確性。劉完全是根據所謂牽涉到高崗事件，來對其罷黜強作辯解；彭的「自傳」再版中沒有他對這個問題的答辯；可能是為維護劉少奇去世後的榮譽而刪除了。有意思的是，當叢進出版他的優秀著作時，他正執教於國防大學，已是大校（相當於准將）；人們不能不這樣設想：在毛之後時代，為表達人民解放軍對已故元帥平反不夠的不滿，他被允許對彭德懷的反駁作更廣的透露。
【205】王年一：《「文革」漫談》，未出版的文稿第十一編。關於廬山政治局常委會議的描述，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 215 ～ 261 頁。彭被罷黜的原因之一，便是人民解放軍未授權在中國人民志願軍中出版政治工作報告，這是一個重大課題。所有分析和文獻均已在 1959 年 8 月青島的一次會上，經過討論並定案；

但這一計劃為來自廬山的風波所淹沒。其文稿於 1985 年始最後出版；《李志民回憶錄》，第 694 ～ 698 頁。
【206】韓素音：英文版《周恩來傳》，277 頁。

附錄二：暢觀樓事件

【1】例見利伯索爾:《大躍進和延安領導層中的分裂》，載《劍橋中國史》，第 14 卷，第 327 ～ 328 頁；齊克：《毛中國的宣傳和文化：鄧拓和知識界》，第五章。
【2】《劉少奇選集（下)》，第 355 頁。
【3】「鄧小平……還組織人對幾年來的中央文件作了檢查，對書記處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給政治局常委寫了一個報告……」張天榮:《關於 1962 年七千人大會》，第 21 頁。
【4】滕文藻：《關於七千人大會的評價》，第 4 頁。
【5】《驚心動魄的「宮廷政變」一幕》，第 1 ～ 13 頁；序言的註釋在第 13 頁。《當代中國的北京》，第 1 集，第 155 ～ 157 頁。
【6】胡繩和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 390 頁。
【7】關於其他文化大革命中對暢觀樓事件的材料，見丁旺(音)編：《北京市文化大革命運動》，第 215 ～ 233 頁，該文特別詳細(彭開始北京的活動的命令引在第 220 頁上)(此間重印的紅衛兵報紙文章譯文，載於《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第 187 期，第 23 ～ 36 頁)；《彭賊「懷柔調查」是劉、鄧黑司令部陰謀復辟資本主義的嚴重步驟》，隨處可見；另一份紅衛兵報紙文章譯載《中國大陸報刊概覽》，第 4014 期，第 1 ～ 8 頁，和《聯合出版物研究服務社》，第 42966 號，第 92 ～ 101 頁。亦見中國研究材料中心，紅衛兵出版物，《補遺 I》，第 4 卷，第 1760 ～ 1774 頁。
【8】十分遺憾，彭真顯然從未發表有關這一事件的任何說明；而他的副手劉仁，在 70 年代初他的妻子問及暢觀樓事件時，他僅好不容易簡短說了一句：「我沒去那兒，我不清楚」；《緬懷劉仁同志》，第 296 頁。
【9】對沈邁克的建議，我深為感謝。

第八章 經濟困難

【1】可能在代表們的彙報中有經濟方面的總結。但這樣，似乎周不必要花這麼多的時間再將這些數字列出。在他講話的其他地方，他避開了一個已經被充分談論的話題。《七千人大會資料》，第 83 頁。
【2】貸款的三大類是朝鮮戰爭的軍用物資，中國發展計劃中的工廠與設備，以及支付中國的貿易赤字；見上書，第 100 頁。
【3】見上書，第 2 章。
【4】《經濟大事記》，第 324 ～ 325 頁。
【5】該樓房及樓內會議室的照片，見《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第 50 ～ 51 頁。
【6】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414 頁；《經濟大事記》，第 331 頁。後一本書稱 1962 年可能的赤字為 50 億元，60 億元是李先念的初步估計（見下注)。
【7】見 2 月 26 日李先念在國務院會議上的講話。在講話中，他只籠統地同意劉少奇對他下屬官員的批評；事實上他乾巴巴地說財政工作，像其他各項工作一樣，成績很大，但也有一些赤字！原先估計 1958-1961 年應有 39 億元的盈餘就是來自李的講話。見《黨的文獻》，第 2 卷，1989 年，第 25 頁。這一講話沒有收入《李先念文選》。赤字的發現可能使劉少奇，甚至李先念大吃一驚，但不清楚財政部官員是否真的不瞭解這一情況；尼克拉斯·拉迪認為這些官員可能害怕後果，而沒有向他們彙報（個人交流)。
【8】劉與吳：《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第 269 ～ 270 頁；《黨的文獻》，第 2 卷，1989 年，第 26 頁；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413 ～ 414 頁。

【9】 同上書：第 414 頁；《經濟大事記》，第 331 頁。
【10】 《陳雲的戰略》，第 185～201 頁。本文是根據內部發行的《陳雲文稿》第 157～172 頁，而不是後來公開發行的《陳雲文選》翻譯的。這二者之間沒有重大區別，但是翻譯的引文與上述二份中文文本核對過。中國的文本稱這是陳雲 2 月 26 日對國務院官員的講話，但有跡象表明這只是重複了西樓會議上的講話。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414 頁。
【11】 《陳雲的戰略》，第 186 頁。
【12】 同上書。
【13】 同上書，第 185～186 頁。編者指出陳可能未得到 1961 年的最後數字，所以他低估了缺口，缺口實際上超過 4,750 萬噸。
【14】 同上書，第 186～187 頁。如此多的土地棄耕的一個原因是大躍進期間做出了災難性的錯誤計算。當時認為耕種技術的改進有可能從較少的耕地獲得較多的產量；見《起源》，第 2 卷，第 119～128 頁。
【15】 《陳雲的戰略》，第 188～190 頁。
【16】 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編：《中國財政問題》，第 11 頁。
【17】 《陳雲的戰略》，第 190～191 頁。這是一個循環的問題：由於農民也缺糧，他們不那麼願意生產經濟作物，從而減少了可供加工的原料，而這些加工的物品是要返銷給他們自己的。(同上書，第 192 頁) 中國在 1962 年的形勢似乎是 40 年前蘇聯臭名昭著的「剪刀（差）危機」的翻版。蘇聯當時農業形勢比工業好，但以高價的工業品從農民手中騙取了錢財。諾夫（Nove）：《蘇聯經濟史》，第 93～96 頁。農民並沒有拒售糧食給國家，但不再購買工業品，給工業造成災難性的影響；戴維斯（Davies）：《蘇聯的工業化》，第 28～29 頁。諾夫認為（第 140 頁）那時蘇聯政府又大肆降低工業品價格，但農民並未得到好處，因為錢都被仲介人賺去了。這是對中國當時急於要維持農民積極性的一個有趣的反映。可能陳雲瞭解蘇聯這段歷史，所以他沒有建議提高工業品價格以彌補這 20 元～30 元的差額。他二次說不問青紅皂白提價會招致人民對中國共產黨的詛罵（《陳雲的戰略》，第 196 頁）。中國的經濟學家梁文生（音譯）說 1949 年前就存在剪刀差問題，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已逐步解決了這問題；見許滌新等：《中國對經濟增長的探索》，第 71 頁。毛澤東不承認中國面臨與蘇聯類似的剪刀差問題，見《毛澤東選集》，第 5 卷，第 356 頁。然而，拉迪堅持強調，總的說來，城鄉交易的條件對農民不利；見拉迪：《中國現代經濟發展中的農業》，第 108～110、112～119 頁。
【18】 《陳雲的戰略》，第 191 頁。
【19】 同上書，第 192～193 頁。陳雲用的詞是「革命是會失敗的」。
【20】 同上書，第 192～193 頁。
【21】 見《起源》，第 2 卷，第 165～170 頁。在鄧力群：《向陳雲同志學習做經濟工作》，第 111～112 頁上，就陳雲在大躍進期間召集的關於養殖豬的兩個星期的會議，對陳雲的工作方法做了有趣的描述。
【22】 同上書，第 7 章。
【23】 由於每一個城市居民一年需要 36 斤，1000 萬人所需總數達 36 億斤。
【24】 《陳雲的戰略》，第 197 頁。1961 年城市人口數，見《中國統計年鑒》1983 年，第 103 頁。
【25】 不清楚在陳雲與計劃人員的計算中，他們的計劃要求產量增加多少。1962 年產量只增加了 6 億斤；1962 年的數字只是 1957 年的 65%，見《中國統計年鑒》1983 年，第 15 頁。
【26】 《陳雲的戰略》，第 198 頁。
【27】 同上書，第 198～199 頁。陳知道這意味著要進口更多的糧食，但他的官員計算出，這樣的要比進口棉花划算。進口 1 噸棉花需 700 美元，而進口 1 噸糧食只需 70 美元。這就是說同樣數量的外匯可買 1 噸棉花或 10 噸糧食，但 10 噸糧食可鼓勵農民多生產 5 噸棉花。關於國際上貿易的條件怎樣繼續對中國農業不利的討論，見許滌新等：《中國對經濟增長的探索》，第 72 頁。

【28】《陳雲的戰略》，第 199 頁。陳雲列舉的商品糧主要生產地區為：東北的吉林與黑龍江；北部的內蒙，西北的陝西中部平原，長江三角洲，江漢平原，華中的洞庭湖地區，西南的成都盆地，以及南方的珠江三角洲。

【29】同上書，第 199 ～ 200 頁。關於中國一名計劃人員證實工業定位的問題，見《起源》，第 2 卷，第 332 頁。

【30】鄧力群：《向陳雲同志學習》，第 5 頁；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416 頁。

【31】鄧力群：《向陳雲同志學習》，第 6、8 頁；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417 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053 ～ 1054 頁。毛也同意小組副主任為計委主任李富春。後來李先念為第二副主任，而總理周恩來、副總理譚震林（大躍進期間負責農業）、副總理薄一波（經委主任）、總參謀長羅瑞卿、程子華（計委副主任）、谷牧（經委副主任）、姚依林（商業部長）和薛暮橋（一流經濟學家及計委副主任）都是委員；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420 頁。叢進對陳雲評價很高。但讓陳就任小組的領導的決定作出之後，又過了兩周才正式生效，原因未予解釋。《中共黨史大事年表》，第 319 頁。

【32】見李先念：《1962 年的經濟調整與意見分歧》，載《中共黨史研究》第 6 期，1985 年，第 62 頁。作者的根據是文化大革命初劉少奇的一份交待，在交待中劉說他後來才知道主席對此不高興。該交待在《問題與研究》（臺北）1970 年 6 月，第 95 頁譯成外文。我將該譯文與日本報紙《每日》記者根據北京紅衛兵大字報的譯文核對過。陳的講話正式於 3 月 18 日分發，《經濟大事記》，第 327 頁。

【33】奇怪的是，這張看起來像是一幅畫的照片。兩端的朱德和林彪看起來像是在照相室或暗室裏加上去的。這一群人（除林彪）的照片的各種版本，為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共以圖片製造神話提供了來源，重新營造出中國領導人在毛領導下團結友愛的形象。例如在華林編《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上封面即用這張照片。本作者 1986 年在北京從新華社得到的一張照片上缺朱德與林彪，而彭真（不是常委委員）卻在林彪的位置上。這一群人中沒有一個人是微笑著的，相反倒像是在進行嚴肅地討論，彭真作為中央書記處的第二號人物出席似乎是很自然的。這張真實得多的照片（劉的手摸著領子，周的眼睛半閉著，缺彭真）至少刊在兩本新華相冊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與新華通訊社編：《鄧小平》，1988（第 86 頁）與《永恆之日》1989（第 102 ～ 103 頁）。但在 1988 年出版的《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第 165）和中共 70 週年的《北京週報》（1991 年 7 月 1 日）上有一幅與《光明日報》幾乎一樣，但不完全相同的照片：仍缺林彪。刊於泰偉斯：《中國的政治與清洗》，第 2 版封面上（據知情人 S 稱，真實的照片裏是毛、劉、周、朱、陳和鄧）。關於官方照片作為分析中國精英政治的輔助材料的討論，見麥克法夸爾：《論照片》（載於《中國季刊》1971 年，第 46 期，第 289 ～ 307 頁）。

【34】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歷史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052 頁。

【35】《黨的文獻》，第 2 卷，1989 年，第 26 ～ 28 頁。

【36】洪承華與郭秀芝：《政治體制改革大事記》，第 239 頁。這比中央政府 24 萬名幹部要多得多。毛要求中央政府人數減去一半。見第 2 章。

【37】問題之一是許多企業沒有自己的財政部門來保證財政紀律；據李先念，山西省的 160 家輕工公司中 90 家即屬此類；《黨的文獻》，第 2 卷，1989 年，第 28 頁。

【38】《經濟大事記》，第 327 ～ 328 頁。可能這些人中相當大的部分回到原來的工作上去。

【39】《起源》，第 2 卷，第 25 ～ 27 頁。

【40】段雲：《財政金融論叢》，第 95 頁。

【41】《經濟大事記》，第 329 ～ 332、334 ～ 335 頁。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 24 卷，第 49 ～ 51 頁，重印了 1962 年 4 月 21 日發佈的銀行工作六條。

【42】《黨的文獻》，第 2 卷，1989 年，第 28 頁。

【43】《陳雲文稿》，第173頁只寫出月份，因而《陳雲的戰略》，第202頁也是如此。《陳雲文選》第198頁寫出了日期。小組會議開了2天，即3月7至8日；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歷史事件的回顧》，下卷，第1054頁。
【44】《陳雲的戰略》，第202～203頁。在《起源》，第1卷，第57～58頁，我認為經委是按蘇聯模式於1956年組建的，其任務是制定年度計劃並對經濟給予比計委五年計劃更靈活、更有活力的推動。在這裏，陳雲表明，至少在1962年，計委負責全部計劃，而經委則按年執行計委的計劃。
【45】鄧力群：《向陳雲同志學習》，第82頁；「陳雲與新中國經濟建設」編輯組：《陳雲與新中國經濟建設》，第514～528頁。
【46】陳謹慎地將王稱為部的「領導同志」，但似乎級別比他低的人不可能向陳雲提出挑戰；《陳雲的戰略》，第206頁。關於1959年二人在鋼的指標上的矛盾，見《起源》，第2卷，第165～170頁。
【47】《陳雲的戰略》，第206～207頁。
【48】同上書，第208～209頁。
【49】同上書，第204頁。
【50】同上書，第204～205頁，引文見第205頁。譯文刪去半斤魚是一個月的量，在一處，這數量為一斤，在另一處則為半斤；《陳雲文稿》，第175頁。另，這些數字與總數不符，每人每月半斤魚，則6,000萬人一年需3.6億斤或18萬噸，比陳要求漁民捕獲的量大20%。
【51】《陳雲的戰略》，第210頁。
【52】《陳雲文稿（1956-1962）》最後一篇即這篇講話。根據《陳雲文選》，陳的下一次講話作於毛澤東逝世後6個月，即1977年3月13日，《陳雲文選》，第207頁。然而，劉少奇在得到毛澤東的批准後要求高級幹部在此後幾個月閱讀此講話。
【53】鄧力群：《向陳雲同志學習》，第7頁。
【54】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24卷，第61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第76～77頁。
【55】同上書，第62頁；姜化宣、張蔚萍與肖:《中國共產黨會議概要》，第481頁。
【56】另6名主要講話人為李富春（關於城市居民下鄉和縮短工業戰線）；李先念（關於糧食與外貿）；姚依林（關於市場物價）；鄧子恢（關於鞏固公社制度）；公安部長謝富治（關於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及林楓（關於教育）；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24卷，第62頁。
【57】同上書；姜化宣、張蔚萍與肖：《中國共產黨會議概要》，第481頁。缺席的常委（毛、陳雲與林彪）據說是不在北京。關鍵的經濟官員薄一波缺席是很奇怪的。彭德懷元帥與張聞天在1959年廬山會議後處於政治失利狀態，雖然他們仍是政治局委員與候補委員，我認為他們已經不再有實權。
【58】由於缺乏該會議的完整檔，關於主要討論情況的最詳細的報道，見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24卷，第63～77頁；這材料裏也包含小組報告中的主要部分的引文以及會議結束後所發佈的指示。《周恩來選集》，下冊，第416～426頁中的講話被認為是摘自原文，但劉少奇的講話（假設是全文，見《劉少奇選集（下）》，第444～449頁）與鄧小平的講話（見《鄧小平文選》(1938-1965)，第300～303頁）並未將國防大學材料中所引的重要段落包括進去。
【59】此數似乎有意無意地低估了1961年的產量，在毛去世後的統計手冊中，該數字為1.5371億噸；《統計年鑒》(1983)，第158頁。
【60】經過5年（1962-1966）糧食產量才超過1957年，同上書。
【61】沃爾克根據中國人宣佈的材料將黑龍江1957年可能的餘糧定為336.9萬噸，四川的餘糧為93.8萬噸；合計430.7萬噸；黑龍江平均一年出售182.92萬噸，四川361.96萬噸，共544.88萬噸；見沃爾克：《中國的糧食收購與消費》，第30、276頁。
【62】《四川省情》，第234頁。1956-1961年數字，缺。
【63】該報告中農業部分，見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24卷，第65～67頁。

【64】 同上書，第 67 頁只引用了該報告這一部分的一句話，傳達了主要意思。但可能該報告故意在經濟危機的這些次要問題上沒有多花筆墨。
【65】 同上書，又只引了一句話；關於大躍進期間鐵路危機事，見《起源》，第 2 卷，第 89、129 頁。
【66】 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 24 卷，第 66 ～ 68 頁。
【67】 關於陳雲，見《陳雲的戰略》引言，第 xv ～ xviii；關於李富春，見《人民手冊》，1957，第 109 ～ 110 頁。
【68】 《統計年鑒》，1983 年，第 245 頁。
【69】 小組報告的這一部分，詳見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 24 卷，第 68 ～ 69、72 頁。
【70】 同上書，第 72 ～ 73 頁，引文在第 73 頁上。
【71】 同上書，第 69 頁。可能該會議參加者不瞭解這次人員的大遷移的獨特性，因為當他說這在歷史上是空前絕後的時，他只是指中國的歷史。
【72】 這是上書第 70 頁的提法。在《周恩來選集》，下卷，第 421 頁中的提法則更為謹慎：「只有我們受到群眾擁護的人民的政府才能做這事。」
【73】 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 24 卷，第 70 頁。《周恩來選集》，下卷，第 421 ～ 422 頁上講話有關部分中沒有這些措施的詳情。但周恩來的確在該講話中談到決策過程的大致情況。最初想法是下鄉 700 萬城市居民，包括 500 萬辦公室工作人員與工人，但各地政府知道他們將反覆面臨政治與供應的難題，因此寧願有一次更大規模的活動，數字就提高到 1,300 萬與 900 萬人。常委會進一步討論後，決定將工作人員與工人數從 900 萬提到 1,000 萬人，下鄉總人數則改為 2,000 萬人。
【74】 「開槍打死人是不行的」。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 24 卷，第 70 ～ 71 頁；引文見第 70 頁。《劉少奇文選（下）》，第 446 ～ 447 頁有該講話的刪節本，文中未提及軍事管制與開槍打人。自 1919 年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激動的學生總是與其他城市的學生聯繫。1957 年百花齊放運動時即如此，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串聯規模更大，因此劉提議切斷鐵路、公路交通以孤立出問題的城市。
【75】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美駐香港領事館），第 4027 期，第 3 ～ 4 頁。
【76】 同上書，第 4、7 頁。這說法來自文化大革命中陶鑄倒臺後對他的批判材料，因此使用時應謹慎。但，這材料是由廣州公安局中瞭解情況的「造反派」寫的，從當時香港瞭解的情況來看，其細節似乎是可信的。有意思的是文化大革命後為陶鑄「平反」中未對這一事件做詳細的解釋。
【77】 傅高義：《共產主義治理下的廣州》，第 294 頁。
【78】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第 4027 期，第 4 頁。
【79】 傅高義：《共產主義治理下的廣州》，第 294 頁。
【80】 同上書，第 293 頁。
【81】 羅伯遜：《難民與部隊調動——來自香港的報道》，《中國季刊》第 11 期，1962 年，第 113 頁；《中國大陸報紙一覽》，第 4207 期，第 4 頁。
【82】 傅高義：《共產主義治理下的廣州》，第 295 ～ 296 頁。
【83】 《中國大陸報刊概覽》，第 4027 期，第 5 頁。
【84】 《曾生回憶錄》，第 674 ～ 677 頁。傅高義：《共產主義治理下的廣州》，第 295 ～ 296 頁。後者報道這事件發生在 6 月 1 日，但曾生市長稱事件發生在以後。
【85】 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 24 卷，第 52 頁。
【86】 同上書，第 75 頁；《鄧小平文選（1938-1965）》，第 300 頁。
【87】 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 24 卷，第 75 頁；《鄧小平文選（1938-1965）》，第 301 頁。後者刪去數字。
【88】 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 24 卷，第 63 頁。
【89】 《劉少奇選集》，下卷，第 444 ～ 446 頁；引文見第 445 頁。
【90】 《周恩來選集》，下卷，第 419 ～ 420 頁。

【91】 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 24 卷，第 63 頁；《鄧小平文選（1936-1965）》中無此意。
【92】 周恩來稱毛知道五月會議所作的決議，並已取得他的同意；《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0 冊，第 94 ～ 96 頁。

第九章 關於集體化的爭論

【1】 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 24 卷，第 73 頁。
【2】 中文的主要資料來源是叢進的《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483 ～ 494、505 ～ 517 頁等能說明問題的材料。他在第 483 頁上明確指出了安徽所起的重要作用，正如本書在概論中所討論的鳳陽縣的命運那樣。本書材料引自許多檔，其中有許多可在《農業集體化》（下）與國防大學《參考資料》（叢進是編者之一）中找到。我們會看到，本書的敘述與檔均對有些問題不能解釋。有關安徽北部的生態問題以及由此引發的民間鬥爭，參見佩里：《華北的造反者和革命者》。
【3】 《安徽省情》，第 1 卷，第 168 頁。曾是黃埔軍校早期畢業生，該校是孫中山在蘇聯顧問幫助下於 1924 年建立的。校長是蔣介石，但是許多學員，如林彪，在學校活躍的高級政治教員周恩來影響下後來均成為中共黨員。曾是 1927 年 23 歲時入共產黨的。
【4】 克萊因與克拉克：《中國共產主義的傳記字典》，第 2 卷，第 860 ～ 862 頁。
【5】 同上書；有關他發表的文章與其他省領導人發表的文章的比較，見《起源》，第 2 卷，第 388 頁（202）。曾還經常為安徽省委在大躍進第一年創辦的雜誌《虛與實》寫文章；見 1958 年第 1 期，1959 年第 3、10、12 期；1960 年第 1、6、7、10 期。
【6】 《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第 64 頁。
【7】 上引曾為《虛與實》寫的文章完全可以證明這一點；例如，在創刊號（1958 年第 1 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一文中，該文主要的 12 長段落中有 7 段是以「毛澤東同志教導我們……」開頭的。1958 年 4 月，曾在上海會議上出盡風頭，他在會上向毛吹噓安徽在水利方面的成就；吳冷西：《憶毛主席》，第 67 頁。1958 年 9 月，毛表揚安徽一個公社吃飯不要錢的做法，這個做法導致大食堂的推廣；弗里德曼等人：《中國村莊，社會主義國家》，第 238 頁。曾在廬山堅定地捍衛了大躍進，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 97 頁。另見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483 頁。
【8】 《安徽省情》，第 1 卷，第 123 頁。
【9】 宋任窮、陳丕顯與葉飛：《奮鬥不息的堅強戰士——紀念曾希聖同志逝世 20 週年》，載《新華月報》1988 年第 8 期，第 35 頁。
【10】 《安徽省情》，第 1 卷，第 290 頁。在曾希聖寫的文章《人民公社在安徽》中未提到這些「偏向」，見《虛與實》1959 年第 12 期。
【11】 邊彥軍：《毛澤東和 1958 年「大躍進」》，見《黨的文獻》1994 年第 4 期，第 78 頁。周恩來 1960 年 3 月收到類似的信；力平：《開國總理周恩來》，第 390 頁。
【12】 蔣坤奇：《60 年代曾希聖在安徽推行責任田始末》，見《當代中國史研究》1994 年第 1 期，第 56 ～ 57 頁。毛 1960 年末明確表示同意，見伍仁：《共和國重大事件記事》，第 3 卷，第 67 頁。
【13】 蔣坤奇：《60 年代曾希聖在安徽》，第 57 頁；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483 頁。
【14】 蔣坤奇：《60 年代曾希聖在安徽》，第 57 頁，《安徽省情》，第 1 卷，第 290 頁。
【15】 蔣坤奇：《60 年代曾希聖在安徽》，第 57 ～ 58 頁，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484 頁；《農業集體化》（下），第 501 頁。

【16】 蔣坤奇：《60年代曾希聖在安徽》，第58頁；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484頁；《農業集體化》（下），第501頁；另見下第76條註釋。
【17】 蔣坤奇：《60年代曾希聖在安徽》，第58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1079～1080頁。
【18】 蔣坤奇：《60年代曾希聖在安徽》，第58頁，據一份材料，華東地區一名2月份在安徽休假的「負責幹部」向曾轉達了一些老農要求：准許他們自行耕種，曾認為這是對他的鼓勵；關於向曾傳達毛的新指示一事，這份材料又提到一名「負責幹部」，從上述引用的材料，我們知道這人是柯慶施。如果柯確曾在早些時候鼓勵曾，他的作用實在令人感到奇怪。可能他在發覺毛對這些試驗從根本上持懷疑態度後，因此改變了他的路線；伍仁：《共和國重大事件記事》，第3卷，第68～69頁。
【19】 蔣坤奇：《60年代曾希聖在安徽》，第58～59頁。收到這信的其他領導人有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和柯慶施，柯是華東地區第一書記，因此是曾的直接上司；《農業集體化》（下），第498頁。在信的一開頭，曾說鑒於人們對安徽的制度有誤解，他要再次解釋。
【20】 克魯克與克魯克：《楊儀公社的第一年》，第126、128頁。本書內有個有趣的討論（第127～128頁）：農民如何在涉及婦女時反對官方的同工同酬的規定。施蘭：《中國農業的發展，1950-1959》，第30～31頁稱一個勞動日普遍計為10個工分。
【21】 克魯克與克魯克：《楊儀公社的第一年》，第127～128頁；何：《中國先生的兒子》，第131～132頁。
【22】 克魯克與克魯克：《楊儀公社的第一年》，第129～132頁。
【23】 何：《中國先生的兒子》，第118頁。
【24】 同上書，第118～119頁。
【25】 《農業集體化》（下），第609～610頁。這是張家口地區第一書記胡開明在1962年7月華北農業會議上講話時的分析；胡將講話的一份文本送給了毛。對胡提出的辦法的討論，見下文。
【26】 曾的信見上書，第498～500頁。
【27】 《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第64頁。
【28】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1080頁。
【29】 曾由於記不起，只列舉了5個統一中的兩個，這也是可能的。
【30】 《農業集體化》（下），第501頁。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484頁，也注意到這次名稱的變化。
【31】 《農業集體化》（下），第501～502頁。
【32】 同上書，第503頁（4月與5月），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484頁（3月）；蔣坤奇：《60年代曾希聖在安徽》，第59頁。
【33】 同上書，第59～60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1080頁；宋任窮、陳丕顯與葉飛：《奮鬥不息的堅強戰士》，第35頁；《農業集體化》（下），第503頁；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485頁。毛與曾的談話見伍仁：《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第3卷，第70～72頁。
【34】 《農業集體化》（下），第503～504頁。
【35】 同上書，第508頁。
【36】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486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聯處於同樣困難時期，集體農莊主席允許類似的按家庭組織的責任或「聯繫」制；霍斯金：《蘇聯史》，第288頁。
【37】 這也是薄一波的看法；《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1080頁。10月初，毛收到共青團第一書記胡耀邦的另一份調查報告。其中對安徽的試驗提出了謹慎的批評；《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第574～576頁。
【38】 《農業集體化》（下），第529頁。
【39】 據毛的醫生說，毛這三天沉迷女色，只是在間歇中接見曾和柯慶施；李，《毛主席的私生活》，第362頁。

【40】 蔣坤奇：《60 年代曾希聖在安徽》，第 61 頁。
【41】 同上書；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61 頁。
【42】 《(劉少奇) 言論集》，第 227 頁。劉對安徽預備會議作了二次發言，一次在 1 月份大會一般性辯論時，一次在 2 月關於曾希聖。
【43】 同上書，第 227 ～ 229 頁。
【44】 同上書，第 231 ～ 232 頁。
【45】 《七千人大會資料》，第 35 ～ 36 頁。
【46】 《(劉少奇) 言論集》，第 232 頁。
【47】 《農業集體化》(下)，第 558 ～ 566 頁；尤其是其中第 558 ～ 559 頁與 561 ～ 562 頁。
【48】 《(劉少奇) 言論集》，第 231 ～ 232 頁。曾調到上海，繼續擔任華東局第二書記之職；1965 年，他調至成都西南局書記處；周月犁：《曾希聖同志的一生》，載《學術界》(安徽)，1955 年第 2 期，第 86 頁。
【49】 《農業集體化》(下)，第 599 ～ 608 頁。這書未註明該信的日期，但其他地方則註明為 1962 年 5 月；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編：《包產到戶資料選》，第 4、317 頁。該書毛於 8 月 2 日作批示後分發，可能官僚機構剛將該書送到。該批示提到了錢並徵求對他寫的信的意見，但沒有註明信應送給誰；《農業集體化》(下)，第 599 頁。
【50】 同上書。
【51】 同上書，第 599 ～ 600 頁。錢承認 1960 年的數字是個很低的基數，他列舉了自然災害和九個其他主要問題使 1961 年成為特別困難的年份，取得這些成績實為不易。
【52】 同上書，第 601 頁。
【53】 同上書，第 601 ～ 602 頁。
【54】 同上書，第 603 ～ 604 頁。
【55】 同上書，第 605 頁。
【56】 同上書，第 507 ～ 508 頁。
【57】 叢進大段引用了錢的信，但未談該信的影響；也沒有將陶鑄與王任重提出的可行的個體農業勞動形式 (見下) 與錢和曾希聖贊成的形式進行對比，用以說明這二者之間是否有根本的不同；《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490 ～ 492 頁。
【58】 《包產到戶資料選》，第 330 ～ 339 頁。本資料未透露這份報告是送給誰的；可能是送呈中央農村工作部工作組的 (見下)。
【59】 同上書。
【60】 同上書，第 344 ～ 348 頁；第 348 頁提到了富麗區。另一份山東的調查報告也以肯定語氣提出包產到戶，見上書，第 359 ～ 365 頁。
【61】 有關胡開明對農民缺乏工作熱情的分析，見以上第 25 條註釋。
【62】 《農業集體化》(下)，第 611 頁。
【63】 同上書，第 614 頁。
【64】 同上書，第 613 頁。
【65】 同上書，第 615 頁。胡開明在上書毛以後不久，主席對該信不滿意，胡就開始受到了批評；見賈溫品 (音譯)：《真理與命運》，第 191 ～ 204、279 頁。
【66】 《農業集體化》(下)，第 555 ～ 557 頁。
【67】 同上書，第 591 ～ 592 頁。
【68】 同上書，第 593 頁。
【69】 《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第 65 頁。
【70】 《農業集體化》(下)，第 515 頁。
【71】 同上書，第 596 ～ 597、598 頁。
【72】 河南省統計局編：《河南經濟統計年鑒，1989》，第 130 頁。
【73】 《農業集體化》(下)，第 598 頁。
【74】 王任重、金明、雍文濤與餘明濤 (音譯)：〈松樹的風格長存〉，載《新華月報》1989 年第 11 期，第 50 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0 冊，第 114 ～

116 頁。據前一篇文章，毛由於有些同志（可能包括柯慶施在內）的「反對」，放棄了將廣西經驗寫入中央決議。

【75】 傳說王任重是毛最喜歡的省級領導人之一，證明這個說法的有力證據是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毛提名王任重任新組成的文化革命小組的副組長。（見權延赤：《陶鑄在「文化大革命」中》，第 202 頁；我感謝沈邁克使我注意到這一情況）毛喜歡王的原因之一是後者據說擅長諂媚；李，《毛主席的私生活》，第 280-282 頁，第 299,379 頁。另一個原因可能是王與毛都對中國歷史有興趣。在 1961-1962 年的困難日子裏，王在湖北黨內刊物上發表了對著名的 11 世紀歷史經典著作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的思考，以此指導他下屬的幹部；見王任重：《讀書筆記》。陶鑄可能知道了（毛與王的）這種關係，認為在一個明顯可能成為有爭議的政治判斷的問題上與王聯盟，是明智的；否則，很難理解為什麼廣西調查需要同時有兩個地區領導人關心。陶與王還有一個（可能無關的）考慮是廣西在 50 年代末大肆宣揚成為廣西壯族自治區了；他們可能不願意得出使中共地位最高的壯族領導人、廣西壯族自治區的第一書記韋國清下臺的結論。（在可獲得的文件中，沒有韋國清的名字，這是引人注意的）

【76】 安徽領導人為他們還在做的事引用在工業中人們普遍接受的作法，可能是想要說服兼任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第一書記的柯慶施。叢進提到 1962 年 7 月底華東局嚴厲批評過安徽，這可能反映了華東局早些時候的看法；《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493 頁。毛的醫生確認，柯帶頭批評了曾；李，《毛主席的私生活》，第 376 頁。

【77】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079 頁。

【78】 見下第 12 章。

【79】 鄧子恢 5 月 24 日關於公社問題的報告是送給中央和主席的（《農業集體化》（下），第 567 ～ 576 頁）；他 7 月 11 日關於農業問題的報告是在中央黨校作的報告（同上書，第 577 ～ 589 頁）；他的調查結果在 1961 年 11 月呈給毛的報告裏提及，毛說是很好；《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9 冊，第 605 ～ 607 頁。

【80】 中國毛澤東思想理論與思想研究會理事會編：《毛澤東思想辭典》，第 90 頁。

【81】 《農業集體化》（下），第 567、577 頁。

【82】 同上書，第 577 ～ 578、582 頁。鄧子恢對法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所起作用的信念是令人感興趣的（同時令人驚奇）。事實上，中國共產黨並沒有在形式上違反承諾，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左傾領導人用了各種方法勸說農民「自願」地將核算單位還給大隊；見崔大偉：《中國的農業激進主義，1968-1981》，第 32 ～ 49、98 ～ 121 頁。

【83】 《農業集體化》（下），第 870 ～ 871、578 ～ 579、582 頁。

【84】 同上書，第 579 ～ 581 頁。

【85】 同上書，第 581 頁。

【86】 同上書，第 586、588 頁。

【87】 同上書，第 586 頁。

【88】 同上書，第 588 頁。

【89】 同上書。（譯按：無頁數）

【90】 同上書，第 572 ～ 573、582 ～ 583 頁。

【91】 同上書，第 574 ～ 575、585 頁。

【92】 同上書，第 575 頁。

【93】 同上書，第 571 ～ 572、579、583 ～ 584 頁。

【94】 對此問題的討論，見奧依：《當代中國的國家與農民》，第 181 ～ 226 頁。

【95】 《農業集體化》（下），第 581、587 頁。

【96】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084 ～ 1085 頁。

【97】 馬齊彬等編：《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第 220 頁。關於鄧多次使用黑貓白貓的比喻，見第 12 章；關於書記處會議上意見的分歧，見《星火燎原》編輯部編：《解放軍將軍傳》，第 2 卷，第 65 頁。

【98】 宋任窮、陳丕顯和葉飛 :《奮鬥不息的堅強戰士》, 第 35 頁。
【99】 薄一波 :《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下卷, 第 1078 頁。有關後來對 1955 年毛主義在集體化問題上的勝利的疑問, 見《中共黨史通訊》1994 年 9 月 25 日第 18 期, 第 3 頁。

第十章 恢復統一戰線

【1】 我用的「非黨人士」這個詞只表示非中共黨員, 它不僅僅指不參加任何黨派的人, 而可能包括民主黨派的成員在內。共產黨 (和國民黨) 稱呼所有非黨員的人的詞是「黨外」。
【2】 有關對民主黨派的討論, 見《起源》, 第 1 卷, 第 48 ~ 50 頁。民主黨派所以能繼續存在是由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 他們離開國民黨而傾向於共產黨並且是共產黨願意與在台灣的國民黨重建統一戰線的重要象徵 ; 有關反右運動, 見上書, 第 4 部分。
【3】 叢進 :《曲折發展的歲月》, 第 431 頁 ; 李銳 :《廬山會議實錄》, 第 60、72 頁。氣氛的緩和約在 1959 年 1 月至 6 月。
【4】 見李維漢 :《回憶與研究》(下), 第 859、864 頁。對共產黨的外籍黨員也有影響 ; 見李敦白與貝內特 :《幕後的人》, 第 249 ~ 250 頁。李敦白比別人要幸運, 因為陸定一向廣播事業局打了招呼, 很快就停止了對他的攻擊。
【5】 叢進 :《曲折發展的歲月》, 第 431 ~ 432 頁。
【6】 見《起源》, 第 2 卷, 第 310 ~ 315 頁。
【7】 《李維漢選集》, 第 433 ~ 435 頁。
【8】 李維漢 :《回憶與研究》(下), 第 865 頁。
【9】 《周恩來選集》, 第 2 卷, 第 413 頁。
【10】 王邦佐 :《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史》, 第 530 ~ 531 頁。
【11】 李維漢是 1917 年湖南毛的「新民學會」的成員, 在 20 年代初, 與鄧小平同在法國的工讀小組, 在黨內比鄧升得快, 1927 年臨時組成政治局時曾短期任委員。李在 1933 年任組織部部長, 曾主持批判鄧的會議, 受批判是當時支持毛澤東的人的命運。見高新與何頻 :《高幹檔案》, 第 422 ~ 423 頁 ; 吉耶爾馬 :《中國共產黨史 (1921-1949)》, 第 62、150、243 頁 ; 哈里森 :《奪取政權的長征》, 第 230 ~ 231 頁 ; 王建英編 :《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彙編》, 第 71 頁 ; 李維漢 :《回憶與研究》(上), 第 195 ~ 196 頁。
【12】 李維漢 :《回憶與研究》(下), 第 865 ~ 868 頁。
【13】 叢進 :《曲折發展的歲月》, 第 433 頁。
【14】 見 1962 年《人民手冊》關於 1962 年人民代表大會與人民政協會議的簡短報告, 第 3 ~ 13 頁。
【15】 這是 1992 年美總統選舉中得勝的克林頓參選的口號。
【16】 自中共第一次全年執政的 1950 年至文化大革命前一年的 1965 年, 報紙一年平均有 275 篇社論。1954-1960 年的社論數超過上述平均數, 期間社論數最多的年份為大躍進的第一年與最後一年, 即 1958 年 (442 篇) 與 1960 年 (459 篇)。1961 年社論僅 245 篇, 比前一年少 46% 以上 ; 1 月與 2 月, 社論篇數比 1960 年同期多, 但此後, 每月的篇數即大量減少。1962 年全年篇數又降低 40%, 至 147 篇, 雖然 1963 年增加 1/3 至 205 篇, 但 1962-1963 年仍是 1966 年以前社論最少的年份。
【17】 《起源》, 第 2 卷, 第 293 頁。
【18】 上述之比較與計算的根據是歐邁格與漢德遜 :《1949—1975》人民日報《社論研究指南》。
【19】 唯一必須出席者是國家副主席、人大委員長與總理 ; 見中華人民共和國 1954 年憲法第 43 條。
【20】 例如, 在 2 月 27 日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報告 ; 見《起源》, 第 1 卷, 第 184 頁。

【21】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432～436 頁。周恩來也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了話，但二人的講話均未收入他們的官方選集；幸而，本資料長篇報道了劉的講話。
【22】《周恩來選集》，下卷，第 366～382，401～415 頁；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與中共中央研究室編：《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第 425～430 頁。
【23】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436 頁。
【24】《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上），第 101 頁。他早些時候 2 月份的講話專門談到作家的問題，下文將涉及此問題。
【25】《周恩來選集》，下卷，第 366 頁。
【26】 同上書，第 367～370 頁。
【27】 同上書，第 370 頁。
【28】 見施瓦茨：《說真話的時間已沒有了：與張申府的談話》，第 122 頁；另見梅兆贊對此的評論《黨的秘密》，載《紐約書評》（1993 年 3 月 25 日）。
【29】《周恩來選集》，下卷，第 371～377 頁。
【30】 毛對此問題的意見，見麥克法夸爾、奇克與吳文津：《毛主席的秘密講話》，第 278～279 頁。
【31】《周恩來選集》，下卷，第 377～382 頁。
【32】《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第 426～428 頁。雖然知識分子（「臭老九」）有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本資料（第 407 頁）在註釋中仍使人注意到周稱知識分子屬於勞動人民。
【33】 中共命令的全文，見《黨的文獻》1994 年第 2 期，第 43～48 頁。
【34】 當代中國民族工作編輯部編：《當代中國民族工作大事記 1949-1988》，第 161 頁。25 年後，塔城當局承認大躍進後饑荒的影響；見《光輝三十年》編輯部編：《光輝三十年 1955-1985》，第 662 頁。據一份中國的材料，逃亡者達 7 萬人；德雷爾：《人民解放軍與新疆的地方主義》，引用載《太平洋評論》1994 年第 1 期，第 43～44 頁。
【35】《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第 428～430 頁。
【36】 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 24 卷，第 95～106 頁。
【37】 麥克法夸爾：《百花齊放運動和中國知識分子》，第 195～202 頁。
【38】《起源》，第 2 卷，第 310～315 頁。
【39】《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第 428 頁。
【40】 周振想與邵景春編：《新中國法制建設四十年要覽（1949-1988）》，第 291 頁。
【41】 有關 1946 年當時被稱為「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情況，見佩珀：《中國的內戰》，第 137～138 頁；政治協商會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以後之作用，見範斯萊克（範力沛）：《敵人和朋友》，第 208～210、236～238 頁。
【42】《周恩來選集》，下卷，第 401 頁。
【43】 同上書，第 401～403 頁。有關對六條標準之演變情況之討論，見《起源》，第 1 卷，第 262～269 頁；有關沒有六條標準的（人民內部）矛盾講話原文，見麥克法夸爾、奇克與吳文津：《毛主席的秘密講話》，第 131～189 頁。
【44】《周恩來選集》，下卷，第 404～408 頁；《起源》，第 1 卷，第 49～50、110～119 頁。
【45】 有關李給該會議的長篇書面報告，見《李維漢選集》，第 432～451 頁。李自然關心要建立起周想發起的友好氣氛，但他的報告卻充滿了老一套的分類（指：政治上的）與評價，這給讀者的感覺是雖然中共現在更需要他們，但對黨外的基本態度卻未變。
【46】 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 60 年代初中共對知識分子政策的研究中，高級領導人的講話中被重印和被引用的只有這兩個人。例如，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文化組編《黨和國家領導人論文藝》以及武漢師範學院中文系當代文學教研室編《關於當代文藝問題的內部講話選編》。無窮無盡的文章和書籍不斷地頌揚周，因為他的態度和行動有利於知識分子。例如，

1980 年出版的 2 卷本《周恩來與文藝》, 1992 出版的陳荒煤編《周恩來與藝術家們》。
【47】 見上書第 5 章。1959 年的講話是在大躍進中稍有理性的短時期中的 5 月講的。這三篇都重印於《周恩來與文藝》(上), 第 5 ~ 46 頁, 其中包括作為附錄的陳毅 1962 年的講話 (第 47 ~ 93 頁), 周恩來《關於文藝工作的三次講話》。但應注意, 編入有關文化的著作中的 1962 年講話是 2 月 17 日在北京對作家的講話, 不是 3 月 2 日在廣州有關知識分子的講話。但選入周恩來選集下卷中的是 3 月 2 日, 不是 2 月 17 日的講話。
【48】 這是下個月在廣州的全國會議的預備會議;見《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上), 第 101 頁。另見《周恩來與文藝》(上), 第 32 頁。
【49】 「有些省市委就不敢傳達」,《周恩來與文藝》(上), 第 32 頁。
【50】 《周恩來選集》, 下卷, 第 332 頁。
【51】 《周恩來與文藝》(上), 第 32 頁。
【52】 《起源》, 第 2 卷, 第 25、59 ~ 63 頁。
【53】 如果有人假設周像以往一樣小心謹慎, 將他的講話的文本送了一份給毛, 那麼, 他就得認為毛沒有批准這講話。如果主席批准分發這檔, 像柯慶施那樣的省級領導人是必須遵照執行的。
【54】 我們對周恩來的《關於文藝工作的三次講話》中 1959、1961 和 1962 年的講話作了比較, 發現在 1959 年的講話中, 每兩頁總理才提到毛一次, 在 1961 年的講話中, 每一頁多一點就提一次, 在 1962 年則每 1.5 頁一次。但 1962 年還不全是直接提到的, 因為, 在提到毛的次數中, 有半數指的是中共的共同財產, 即毛的思想, 而不是活生生的毛本人。從毛的觀點看, 可以得出結論, 1959 年的講話雖然短, 周對領導他的人的承認是漫不經心的, 而總理在 1961 年就要慎重得多。在 1962 年的新的氣候下, 周卻又在表示崇敬時有些草率。
【55】 周的講話使人難以知道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的確切分界線在什麼時候, 他顯然承認 1957 年中期反右運動的重要性, 但在一處, 他似乎將第二階段開始的日期定為 1958 年初, 但在另一處, 又定在 1959 年秋;見《周恩來與文藝》(上), 第 33 頁。只有對第三階段的開始的時間是明確的。
【56】 《周恩來與文藝》(上), 第 33 ~ 34 頁。周將莎士比亞的劇本作為雖是外國但又是好的東西的例子。「大國沙文主義」是中國人在 1956 年創造的詞, 當時他們用以批評蘇聯對待東歐衛星國的行為;見《起源》, 第 1 卷, 第 170 ~ 171、365 頁 (11) (13)。關於對口號為「扶清滅洋」的義和團的反外國 (主要是反教會) 的性質的描述, 見伊謝瑞克:《義和團起義的起源》, 第 3 章。
【57】 《周恩來與文藝》(上), 第 34 ~ 35 頁。
【58】 同上書, 第 35 頁。週一般提到馬克思主義理論時只不過是禮節性地引用毛的著作。這種引用是有風險的, 這部分是因為毛認為自己是唯一有權使馬克思主義用於為中國服務的領導人, 部分原因是主席在 1958 年拒絕了恩格斯的提法而提出了一條新的「否定之肯定規律」, 從而將中國的意識形態投入了全面混亂之中;參見施拉姆:《毛澤東的思想》, 第 137 ~ 141 頁。可能是由於形勢的緊張, 周沒有提及毛在理論上的革新, 但很明顯, 周對這一提法是很贊成的, 因為在他後來的講話中反覆提到了這個提法。
【59】 《周恩來與文藝》(上), 第 35 ~ 37 頁;施拉姆:《未經修飾的毛澤東》, 第 165 頁。
【60】 《周恩來與文藝》(上), 第 38 ~ 39 頁。有關人們逐漸接受毛在 1957 年夏在青島提出來的觀點的討論, 見《起源》, 第 1 卷, 第 287、304、308 頁。
【61】 《周恩來與文藝》(上), 第 39 ~ 43 頁。即令周加了一條附錄說, 認為有不犯錯誤的英雄是反毛澤東思想的, 這也救不了他。
【62】 胡風是傑出的黨員作家, 他與文藝官僚主義不能相容, 在 1955 年的運動中被斥責;見戈德曼:《共產黨中國內的文藝不同意見者》, 第 7 章;有關毛對文藝的幹預, 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第 5 冊, 第 108 ~ 115、124 ~ 125、130、144 ~ 145、148 ~ 149、153 ~ 166、168 ~ 178 頁。

【63】《周恩來與文藝》(上)，第 43～46 頁。引文載於第 45 頁。
【64】這篇講話在《周恩來與文藝》(上) 中佔了 50 頁，有 3 萬字 (見《陳毅傳》，第 534 頁)。在廣州時，陳毅先參加了中央軍委常委會議；劉樹發：《陳毅年譜》(下)，第 911 頁。
【65】《周恩來與文藝》(上)，第 58 頁。陳毅所引的話說明，雖然 1961 年中已正式宣佈要對知識分子的生活採取更為支持的政策 (見《中共黨史研究》1993 年第 4 期第 72 頁所引中央對 14 條的評論)，但在這問題上，與其他問題一樣，直到七千人大會以後才有所行動。
【66】《陳毅傳》，第 530 頁。
【67】《周恩來與文藝》(上)，第 50 頁。周是在科學與戲劇大會的聯席會議上講話的，而陳毅則是在 3 月 5 日對科學家，3 月 6 日對劇作家講話的。陳在 3 月 6 日講話中多次提到科學家說明這二次講話有一個共同的大綱，雖然在後一次講話有些題目顯然與科學家毫無關係。
【68】《陳毅傳》，第 525、534 頁。
【69】《周恩來與文藝》(上)，第 48 頁。
【70】同上書，引用的話載於第 52 頁。陳引用毛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話說，「你們要相信過去三年有時候我們是做蠢事呀！我們是很蠢的呀！」陳引用的話與幾年後官方出版的版本很接近。《毛澤東著作選讀》(下)，第 833 頁。施拉姆對紅衛兵的版本的譯文，見《未經修飾的毛澤東》，第 180 頁。
【71】可能陳知道，並且他的聽眾也感到劉對文化基本上不感興趣，將這方面的問題交由毛和周處理。我還沒有見過一本相當於《周恩來與文藝》那樣講到「劉少奇和文學與藝術」的書；對劉有關各領域的著作沒有一段，或甚至一章是關於文化的；見呂星斗：《劉少奇和他的事業》。
【72】《周恩來與文藝》(上)，第 59 頁。
【73】同上書，第 60～61 頁。
【74】同上書，第 61～63 頁。陳毅說到「副總理」時，顯然是指他自己，因為他剛批評了二個劇本，其作者就在聽眾席裏。陳認為他們對機會主義人物表現得不正確，他們不是叛徒。陳可能是在下意識地為彭德懷元帥辯護，彭在 1959 年廬山會議上被譴責為「右傾機會主義」。
【75】陳《一致性中的多樣化：詩歌與大躍進》，第 1～15 頁，尤其是第 5 頁。
【76】《周恩來與文藝》(上)，第 63、86～88 頁。引文載第 63 頁。
【77】同上書，第 66～68 頁、75、86、90～93 頁。海默在反右運動中的命運，以及他劇名的翻譯，見董與麥克拉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戲劇》，第 16 頁。
【78】《周恩來與文藝》(上)，第 74～75 頁。
【79】同上書。在文化大革命中一般人認為用到這句話時，就是暗地批評毛。無法知道這認識在這裏是否適用。
【80】同上書，第 78～85 頁。
【81】同上書，第 58、79 頁。
【82】吳與李：《一滴淚》，第 181～182 頁。吳當時是由勞改營出來不到一年的「右派」大學教師。他回憶說，他那單位的黨書記告訴他，由於在廣州會議上「近來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有了改變」，可以分配他做臨時工作，但又警告他要小心，因為政治路線一般是從左向右移的。
【83】肖：《沒有地圖的旅行者》，第 230 頁。
【84】《陳毅傳》，第 534 頁；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與外交史研究室編：《懷念陳毅》，第 128 頁。
【85】胡繩：《胡喬木和黨史工作》，載《中共黨史研究》1994 年第 1 期，第 75 頁。
【86】《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上)，第 102～103 頁。有關分析見戈德曼：《中國的知識分子》，第 46～50 頁。

第十一章「三家村」奇案

【1】 主要的攻擊是由後來成為臭名昭著的「四人幫」之一的姚文元發動的。他的兩篇主要批判文章是〈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原載於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彙報》。譯文載於《中國人對歷史與哲學的研究》第2冊，1968年秋季第1期，第13～43頁)與《評「三家村」——「燕山夜話」與「三家村劄記」的反動本質》(原文同時載於1966年5月10日《解放日報》與《文彙報》，譯文載於《中國的偉大的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第1冊，第29～69頁)。

【2】 參見戈德曼:《中國的知識分子》，第18～38頁。

【3】 有關廖沫沙的簡歷，見《中國共產黨名人錄》，第1冊，修訂版，第420～421頁。廖知名度不是那麼高，未收在本書第1版(1966)內。有關簡略自傳，見《廖沫沙文集》，第1冊，第1～5頁。這套四卷本文集的第二冊載有他投於《三家村劄記》的稿子，以及在文化大革命中寫的關於這些文章的檢討(第444～488頁)和文化大革命以後的大事記(第198～204、489～495頁)。據新華社1990年12月30日報道，廖於1990年12月27日去世，終年84歲。於1991年1月4日葬於八寶山烈士公墓；新華社在計算年齡時或者不夠準確，或者按中國傳統演算法，在出生時就算一歲。廖自稱生於1907年1月16日，因此，去世時不到84歲。《廖沫沙文集》，第1卷，第1頁。

【4】 《廖沫沙文集》，第2卷，第202頁。

【5】 奇克:《毛的中國的宣傳與文化:鄧拓和知識分子》，第2章。有關30年代與40年代的鄧拓，見《晉察冀日報》史研究會編:《人民新聞家鄧拓》，第91～124頁。

【6】 見麥克法夸爾、奇克與吳《毛主席的秘密講話》中奇克《原文》，第83頁。

【7】 見《新聞界人物》編輯委員會編:《新聞界人物》，第5冊鄧拓條，第51頁。

【8】 鄧拓對朋友曾談到這一點；感謝蒂莫西·奇克使我注意到這材料。

【9】 奇克:《毛的中國的宣傳和文化》，第4章；《中共黨史人物傳》，第50冊，第283～284頁；《起源》，第1卷，第282、312頁；戈德曼:《毛執著於文學與知識分子的政治作用》。載於麥克法夸爾、奇克與吳:《毛主席的秘密講話》，第50～52頁。對毛長期與鄧拓的爭論，《中共黨史人物傳》的編輯們做出了無聲但尖銳的評論。在第一批50卷中的最後4卷中，他們出版了四位偉大的革命人物的傳記，但它們的次序與目前對他們排列的相反；朱德在第47卷裏，劉少奇在第48卷裏，周恩來在第49卷裏，而毛則在第50卷裏。但在第50卷裏，也有鄧拓的傳記，這說明他們認為鄧與毛一樣有權被認為是真正的革命者。人們想不出還有別的原因為什麼他們要一直等到1991年才出版鄧的傳記，因為到80年代中期，已有大量關於他的材料(包括他的文集)出版了。

【10】 王必勝:《鄧拓評傳》，第178頁。

【11】 同上書，該書第186頁企圖為鄧拓辯解，說他不可能不受時代的影響；《中共黨史人物傳》，第50卷，第287～288頁也提出相同的論點，但又說，鄧已經開始顯出左的傾向了。另見奇克:《毛的中國的宣傳與文化》，第4章。在該章裏，他提出鄧拓表現出服從列寧主義的原則，即對外表現出一致和服從，在黨內則保留爭論的權利。

【12】 見裘之倬:《中共黨史人物錄》，第50～51頁。只是在1961年中共九中全會以後才正式公佈中共各大局的組成名單。如果本資料的日期是準確的，那麼，各大局可能在全會以前就組成了。

【13】 奇克:《文化改造的政治:鄧拓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改革》，「概論」，載《中國的法律與政府》1983-1984冬季刊，第10頁。

【14】 見廖沫沙編:《憶鄧拓》，第111～115頁。引文載於第113頁上。河北省馬蘭村的確切位置，見《新聞界人物》，第5冊:鄧拓，第27頁。以「南」代「蘭」是諧音。鄧拓是福建人，這二個字都讀為「蘭」，見奇克:《概論》，第9頁。

【15】 奇克:《毛的中國的宣傳與文化》，第5章，稿費數大致相當7.50美元。確鑿的是，在該欄文章於1963年集刊成書時，鄧拓還收到了2萬元(1萬美元)。

【16】 廖沫沙：《憶鄧拓》，第 115 頁。
【17】 馬南村：《燕山夜話》，第 5 ～ 7 頁，奇克譯載於《中國的法律與政府》1983-1984 年冬季刊，第 38 ～ 40 頁。《北京晚報》的編輯後來稱鄧的第一篇文章有鼓舞作用，特別是對年青人，因為當時全國形勢使許多人意志消沉，不夠振作；廖：《憶鄧拓》，第 119 頁。
【18】 同上書，第 116 頁，《燕山夜話》卷頭字跡，譯載於奇克：《中國的法律與政府》，1983-1984 年冬季刊。
【19】 廖沫沙：《憶鄧拓》，第 115 頁。
【20】 莊心誠（音譯），見哈林姆與奇克編：《中國的官方知識分子》中奇克著《鄧拓：中國對新聞的列寧主義式的理解》引用，第 112 頁。
【21】 《中共黨史人物傳》，第 50 卷，第 290 頁。
【22】 美駐香港總領事館《大陸中國雜誌摘要》，第 3912 期，第 10 頁。
【23】 《中共黨史人物傳》，第 50 卷，第 291 頁。有關姚後來的攻擊，見姚文元：《評「三家村」》，第 29 ～ 69 頁。中文原文可在《明報月刊》編輯會與丁旺編：《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第 2 卷：《鄧拓選集》；，第 408 ～ 431 頁。
【24】 據說彭真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被批鬥前夕曾對一些政治上的同盟者說過：「在合作化運動、鎮反和反修上從來沒有落在人後，但在學術問題上我是相當落後的……我對許多事是無知的，因為我上學遲。」（按英文譯出）美駐香港總領事館：《中國大陸報紙一覽》（附錄）第 195 期，第 27 頁。劉仁的話見上雜誌第 37 頁。凡是認為首都大白菜問題是個藉口的人，應參閱諾期托爾：《限期—北京》，第 48 ～ 49 頁。
【25】 這一觀點是編輯《北京晚報》第三版的人說的。《燕山夜話》登在該版上。
【26】 毛對吳晗的關心表現在他親自處理吳申請入黨一事，見下第 28 條注。也有證據說明這兩個人曾在 1954 年私下討論過歷史問題；見龔育之、逄先知與石仲泉：《毛澤東的讀書生活》，第 11 ～ 12 頁。
【27】 除上述姚的爭論文章，另見翻譯並收集在《中國對歷史與哲學的研究》，第 2 卷第 1 期（1968 年秋季）與第 3 期（1969 年春季）與《中國對歷史的研究》（上一雜誌之續篇）第 3 卷第 1 期（1969 年秋季）、第 2 期（1969-1970 年冬季）與第 3 期（1970 年春季）。
【28】 見《鄧拓文集》，第 1 卷，第 469 頁；《廖沫沙文集》，第 1 卷，第 3200 頁。
【29】 蘇雙碧與王宏志：《吳晗傳》，第 356 頁。據本資料，吳晗於 1948 年 12 月申請入黨。毛同意了，但親自寫信給吳晗解釋說，周恩來將決定吳晗何時入黨最有利；同上書第 354 頁。可能推遲吳入黨是因為黨認為吳在黨外發表對共產黨政策的支持對其他知識分子的影響將更大。吳晗最終在 1957 年 3 月被批准入黨時，毛似乎認為知識分子或者已擁護共產主義事業或者採取了中立態度；見他 1957 年 3 月 20 日在上海的講話（麥克法夸爾、奇克與吳文津：《毛主席的秘密講話》，第 354 ～ 356 頁），可能吳晗此時的非黨身份已對爭取同事不那麼重要了。關於對吳晗統戰工作的分析，見瑪麗·G·梅休爾：《40 年代中國的知識分子活躍情況：在統一戰線與民主同盟中的吳晗》，載《中國季刊》第 133 期（1993 年）第 27 ～ 35 頁。另一個中共堅持要同路人留在黨外的明顯例子是宋慶齡。她實際上是在臨去世時的床上才入黨的——1981 年 5 月 15 日入黨，1981 年 5 月 29 日去世；見盛平編：《中國共產黨人名大辭典 1921-1991》，第 385 頁。
【30】 蘇雙碧與王宏志：《吳晗傳》，第 355 頁。這一任命是在吳被拒絕入黨後 10 個月發表的。吳顯然不願接受這個職位，寧願「功成身退」，但周恩來勸他接受了。這是否暗示吳晗對不讓他入黨並掌握他希望得到的實權，而只給他一個基本上是禮儀上的職位感到不滿？
【31】 吳晗的《朱元璋傳》1954 年與 1965 年版本組成《吳晗文集》的第 2 卷。前二版出版於 1944 年與 1949 年，據吳在 1965 年版的前言說這二版有許多錯誤；同上書第 255 頁。

【32】 毛是對湖北省中層官員梅白說這話的。梅是王任重向毛推薦的；見賈思南編：《1915-1976：毛澤東人際交往實錄》，第 166 頁。

【33】 據毛的醫生說，毛很喜歡湖南省第一書記周小舟在長沙安排的關於海瑞的湖南戲。毛在 1959 年 4 月參加在上海舉行的七中全會時，上海的第一書記柯慶施安排演出了另一出有關海瑞的戲；李，《毛主席的私生活》，第 285-286 頁，第 295-297 頁。李醫生推測，在 1959 年廬山會議因批評大躍進與彭德懷一起被清洗的周小舟是暗地裏批評毛，但應該將這看成是個假設，因為不可能說柯也有這種意圖。中國有一個事後聰明的看法，即毛表揚海瑞是要引誘批評者跳出來，但毛 1959 年的秘書之一李銳卻寧願由歷史學家對此做出判斷；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 92 頁。

【34】 《起源》，第 2 卷，第 208 ～ 212 頁。當時，我曾猜測當時勸吳晗寫海瑞的未指明的「領導同志」可能是周恩來或毛本人。但後來證明是毛的一名高級助手。例如在夏鼐，蘇雙碧：《吳晗的學術生涯》中就透露了胡喬木所起的作用，第 205 頁。

【35】 劇本原文載《吳晗文集》，第 4 卷，第 376 ～ 427 頁。該劇本初載於 1961 年 1 月的《北京文藝》。有關該劇的譯文，見吳晗：《海瑞罷官》。《吳晗的學術生涯》，第 112 ～ 114 頁；《吳晗和「海瑞罷官」》第 2 ～ 5 頁；蘇雙碧與王宏志：《吳晗傳》，第 310 ～ 312、356 ～ 357 頁講述了這劇是怎樣寫出的。關於劇名問題的另一說法見仲侃：《康生評傳》，第 175 頁。據這份資料，從第四稿起的劇名叫「海瑞罷官」，是雲南植物研究所所長 (可能是吳晗的朋友) 的建議，以區別於有關海瑞的其他的戲。

【36】 《吳晗和「海瑞罷官」》，第 5 頁。據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609 頁，該劇於 1 月上演。在蘇與王：《吳晗傳》，第 357 頁中，演出日期為 1961 年 11 月，但可能是 1 月之誤。

【37】 《廖沫沙文集》，第 2 卷，第 80 ～ 82 頁。廖的文章引起了許多對吳晗劇本的評論；同上書，第 447 頁。廖的文章《「歷史」與「戲劇」》載於 1961 年 2 月 16 日《北京晚報》。

【38】 嚴琪編：《中國各民主黨派史人物傳》，第 347 頁；蘇雙碧與王宏志：《吳晗傳》，第 312 頁。當人們將毛的話告訴吳晗時，吳很高興，這是可以理解的；同上書。毛在看了演出後是否吃過飯，還是只看到出版的劇本，大多數中國的著作對此含糊其辭；對嚴琪著作中的用辭，二者都說得通，但有一名西方學者假設他是親自看戲的 (哈姆林與奇克編：《中國知識分子》中費希爾《吳晗：人文學科中「正直官員」的典範》，第 165 頁)。人們會認為，如果毛的確看了演出 (陳毅說毛不喜歡看演出，見第 10 章)，那麼，在文化大革命後，對此事會更加強調，但也可能官方歷史學家想要保護毛的名聲。只有一個材料斬釘截鐵地說，毛說戲演得好，這說明他是看過的；林青山：《康生外傳》，第 257 頁。從邏輯上說，如果毛只是讀過劇本，很可能他會召見作者而不是召見演員。另一方面，他可能召見演員，讓他讀臺詞，恰恰是因為他不想看演出。據一份資料說，江青看了戲，立即表示不喜歡；林青山：《林彪傳》，第 1 卷，第 145 ～ 146 頁。

【39】 夏鼐與蘇雙碧《吳晗的學術生涯》和蘇雙碧與王宏志《吳晗傳》均有《毛選》封面的照片，毛選封面上有毛的簽名和 9 月 28 日的日期。《吳晗的學術生涯》的標題解釋書是 1961 年贈予的。《毛選》第 4 卷是 1960 年國慶 (10 月 1 日) 出版的。因此，顯然吳晗不是在出版時就應該收到簽名的書的人。在蘇與王的《吳晗傳》吳晗生平年表中也沒有任何材料說明為什麼毛在 1961 年 9 月 28 日要送書。可能毛有在國慶日贈書的習慣。

【40】 嚴琪：《中國各民主黨派史人物傳》，第 338 ～ 339 頁。

【41】 姚文元：《評「三家村」》，第 33 頁。

【42】 有關其他欄目的簡介，見奇克：《毛的中國的宣傳和文化》，第 5 章。

【43】 知情人 L。

【44】 《廖沫沙文集》，第 2 卷，第 198 ～ 204 頁。

【45】 他們都是市黨組織的高級官員。廖沫沙說從 1959 年起經常與吳晗見面；《廖沫沙文集》，第 2 卷，第 449 頁。
【46】 同上書，第 201 頁。
【47】 同上書，第 203 頁。廖沫沙繼續諷刺地說恰恰因為《劄記》不是有組織的，所以批判者認為需要找出其中的組織聯繫，將三名專欄作家在其他地方寫的文章也混在一起，似乎他們遠在 30 年代就在一起搞陰謀了，而那時，他們還互不相識呢；同上書，第 203 ～ 204 頁。
【48】 文化大革命初，對三家村的成員作了大量的批判。除去姚文元的〈評「三家村」〉而外，主要有林杰等編〈鄧拓的「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胡話〉與戚本禹的〈評「前線」與「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兩篇文章都收入《中國的偉大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第 2 卷，第 12 ～ 65 頁。
【49】 見費希爾：《人文學科中「正直官員」的典範》，第 158 ～ 159 頁；德福爾熱：《廖沫沙、三家村與姚文元：與黨的官僚機構的不明確的關係》。
【50】 「以鄧拓為核心的這些謠言與攻擊……」姚文元：《評「三家村」》，第 50 頁。著重號是我加的。
【51】 見姚文元：《評「三家村」》，第 39 頁，它們並未歪曲原文（馬南：《燕山夜話》，第 11 ～ 13 頁）並與奇克的譯文相符（《中國的法律與政府》，1983-1984 年冬季刊，第 51 ～ 53 頁）。後者也包括了姚部分批判的譯文。
【52】 姚文元：《評「三家村」》，第 39 頁。
【53】 同上書，第 40 頁；丁旺：《鄧拓選集》，第 414 頁。原文見馬南：《燕山夜話》，第 78 ～ 79 頁。
【54】 姚文元：《評「三家村」》，第 47 ～ 48 頁。
【55】 同上書，第 41 ～ 42 頁；馬南：《燕山夜話》，第 60 ～ 62 頁；奇克：《文化改革之政治》，第 44 ～ 46 頁。
【56】 奇克：《毛的中國的宣傳與文化》，第 5 章。
【57】 費希爾：《人文科學中的「正直官員」的典範》，第 171 頁。
【58】 德福爾熱：《廖沫沙、三家村與姚文元》。我要感謝黃敬（音譯）對廖沫沙作品的分析。鄧拓在 30 年代在福建時也寫過諷刺性的雜文；奇克：《毛的中國的宣傳與文化》，第 1 章。
【59】 奇克：《毛的中國的宣傳與文化》，第 5 章。
【60】 見附錄 2。
【61】 奇克：《毛的中國的宣傳與文化》，第 5 章。
【62】 同上書；費希爾：《人文科學中「正直官員」的典範》，第 171 頁；德福爾熱：《廖沫沙、三家村與姚文元》。
【63】 與 1964-1965 年相比，1961-1962 年期間漫畫也反映出對批評官僚主義的容忍；有關在這些年間題目與方法的變化，見華君武《諷刺與幽默》。
【64】 自從文化大革命結束以來，作者曾就這個題目，在多年間詢問過許多政治上老練的北京居民。有相當多的人記得當時讀過這些冒犯性的文章，但只有一個人說從中發現了它們的政治意義，或對作者的魯莽感到驚奇。據西方研究鄧拓的主要學者說，這二個專欄之一在北京市的黨內「顯然並未引起震驚」，中國領導人，包括毛在內，當時也沒有對這二專欄中的任一個有過評論、批判等；奇克：《毛的中國的宣傳與文化》，第 5 章。

第三編 階級鬥爭

第十二章 毛改變了信號

【1】 「改變信號」是瑪格麗特·撒切爾用以描述向右轉向「撒切爾主義」的說法。撒切爾主義是她在1979年任首相時提出的，見《唐寧街的歲月》，第38～59頁。
【2】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505 ～ 506 頁。

【3】 有關毛在50年代挑選鄧小平任總書記的討論，見《起源》，第1卷，第140～145頁。

【4】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毛澤東在上海》，第435頁；《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第62頁。

【5】 自1949年至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未參加的重要會議還有兩次，其中只有一次是在1962年以前。1954年，他要參加七屆四中全會可能太尷尬了，因為在這次全會上，他一度特別喜歡的高崗受到了紀律處分；泰偉斯的《毛朝廷中的政治》（第121頁）記載了官方對此的平淡的解釋。在1966年上半年，毛讓劉少奇主持一些會議，會上清洗了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批高級幹部（按他的意願），並制定應付校園裏愈來愈大的紛擾（他後來要劉與鄧小平對此負責）的政策。《重要會議集》（下）將這兩次會議與上述1962年的兩次會議均列為重要會議。

【6】 在《曲折發展的歲月》第512～513頁裏，叢進試圖掩蓋此事，稱，劉當時負責是因為毛不在首都。說明1962年上半年毛活動不多的是，《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重印毛澤東在該期的文章只有38篇，其中16篇是七千人大會或其後時期的；1962年下半年則有66篇。七千人大會以後，毛關心的一件事是要秘書們幫助他研究國際事務和英語；同上書，第68～69頁。

【7】 《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第63頁。

【8】 《論共產黨員的修養》，1962年7月1日《人民日報》。有關以小冊子形式的印數，見劉曉明：《中共黨建史，1949-1976》，第157頁。

【9】 知情者S。見外文出版社根據1949年中文版所出《論共產黨員修養》，1952年的修訂版第31～37頁與《劉少奇選集》第一卷第121～128頁。《選集》的編輯有一有趣的章節附註（第442頁，第76～78條章節附註）「本文1980年3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單行本時，中文版出現以下編者按：在這三處的『反革命』一詞後面，在1962年版都加了「和改良派」四字。這不是作者本人加的，而是本書的編輯人員加了而經過作者同意的。現在這三處仍按1949年版。」

本注所提的一段如下：「共產黨員是在不斷同反革命（和改良派）的鬥爭中去改造社會，改造世界，同時改造自己的。」1962年版插入「改良派」一詞似完全違背了（我們現在所知）劉希望該文所傳達的精神：「改良派」恰恰是統一戰線政策要取悅的人。80年代的編輯認為可以無需顧忌地丟棄這一詞，說明劉是勉強接受增加這一個詞的。一個可能是，1962年的編輯康生，或者參加修訂這文章的陳伯達是在毛的授意下提出增加，也有可能他們認為這樣會更明白無誤地反映了毛當時的想法。有關陳伯達在其中的作用，見葉永烈：《陳伯達其人》，第203頁。

【10】 《起源》，第2卷，第176頁。

【11】 顯然毛第一次是在1952年提出的，在1960年再次提出；劉曉明：《中共黨建史》，第154～155頁；據該書及知情人J說，劉甚至不願重新出版該文，更不用說出選集了，部分原因可能是謙虛，部分原因是他不想顯得與毛分庭抗禮。但主席一旦在1960年又提出這問題，劉就必須讓步了，然而，他仍然設法拖延。參加選集小組的鄧力群也如此說；見郭思敏與天羽編：《我眼中的劉少奇》，第432～433頁。鄧也認為毛是在1960年提出的，並且書記處關於該事的正式決定是在該年年底做出的。他並未提到康生的作用。

【12】 除去康生與鄧力群而外，編輯小組還包括熊復（高級記者和國際事務的宣傳人員）和王仲一。該小組在1961年5月在長沙向劉彙報工作，當時劉正在進行農村調查。劉當時和以後顯然對重讀過去的文章不感興趣；見黄錚：《劉少奇一生》，第375～376頁。

【13】 《劉少奇選集》（上）最後一版的《怎樣做個好共產黨員》（第97～167頁），在英文版的《劉少奇選集》中有譯文。

【14】 見《李先念論財政、金融、貿易》，第二卷，各處可見；尤其是下，第21、31、35頁。李先念的同事、經濟部長李富春，更為謹慎或者說更為忠誠；在6月7日華東地區黨會議上，同時提到毛和劉（《李富春選集》，第289頁）。
【15】《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第62～63頁；該書扉頁是田和他的小組與毛主席和參加會議的湖北省第一書記王任重的照片。
【16】 同上書，第63～64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1083～1084頁。
【17】《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第64～66頁。
【18】 同上書，第65～66頁。
【19】 同上書，第66頁。這是一個奇怪的插曲。這似乎是與自留地而不是與包產到戶有關。可能總理徵求田的意見是因為他是主席的代言人，但這一消息來源明白地說，田並未徵求毛的意見，也沒有任何跡象說明田是根據與毛，甚至與劉的談話做出這一回答的。
【20】 引人注目的是一份地方資料，事後表揚他「加強了責任制」；中共湘潭市委黨史資料徵集辦公室編：《毛澤東與湘潭》，第313～314頁。
【21】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1081頁。
【22】 劉關於合法化的話，見上書，第1084頁。
【23】 我認為這是指「秀才」的意思。
【24】 知情人B；根據此來源，田極為激動，要求消滅左的癌症。
【25】《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第67頁。這可能意味著劉、周、朱德、陳雲和鄧小平都贊成，林彪則在等著瞧毛怎樣幹。另見鄭謙和韓鋼：《晚年歲月：1956年後的毛澤東》，第177～179頁。據賈遛品：《真理與命運》，第193頁，彭真也贊成。
【26】 據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1078頁，估計約20%的農民在包產到戶制度下耕種。
【27】《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第67～68頁。
【28】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1086頁；領導人包括河南第一書記劉建勳和山東第一書記譚啟龍。
【29】《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第67～68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1086頁。據一個資料來源說毛曾一度對經劉呈遞的鄧子恢關於包產到戶的報告表示同意；見林青山：《康生外傳》，第196頁。如果毛的確像本資料所說像往常一樣在檔上劃了圈，可能主席只表示他讀了這檔，在反擊時機成熟時再使用他的權力。這來源還說劉少奇和鄧子恢在全國各地推廣包產到戶，見上書，第194頁。
【30】 1955年，助手當然是鄧子恢。有關陳伯達在此時的作用，見《起源》，第2卷，第16～19頁。
【31】《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第71～72頁。
【32】 見上書，第九章。
【33】《陳雲與新中國經濟建設》編輯組編：《陳雲與新中國經濟建設》，第168～169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1085～1086頁。
【34】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580～581頁。
【35】 鄧反覆談到說明農民智慧的這句話。在這次，鄧說，這句話，他是聽二野的戰友劉伯承元帥說的。劉顯然說這是一句四川的俗話；《鄧小平文選1938-1965》，第305頁。從以上情況，人們可以得出結論：a）鄧在某一次記錯了，b）他認為在這個有爭論的問題上，有一位得到人們尊敬的軍事人物的支持是有用的，c）在中國，到處都有「老鼠」，d）以上幾點都對。關於鄧講話原文，見《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鄧小平反動言論》，第52～60頁，有關段落載在第53～54頁。
【36】 知情人B。
【37】《劉少奇選集》（下），第440～441頁。
【38】 同上書，第443頁。

【37】 同上書，第 440 ～ 441 頁。有一種看法，即劉對幹部的講話是對毛的投降，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086 頁；林志軍：《歷史不再徘徊》，第 89 ～ 91 頁。有關在游泳池旁的對抗，見黃鎮:《劉少奇一生》，第 389 頁。
【40】 王震等:《回憶與繼承——紀念王稼祥同志》，載 1981 年 2 月 4 日《工人日報》。譯文見 FBIS-CHI-81-038，p，L4。
【41】 見楊:《從革命到政治》，第 5 章;《中共黨史人物傳》，第 33 卷，第 16 ～ 19 頁。
【4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 230 ～ 232 頁；王健英：《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彙編》，第 481 頁。
【43】 王的妻子朱仲麗是名醫生，1949 年江青在蘇聯住院時，朱負責照料江青；見朱仲麗：《女皇夢：江青外傳》，第 104 ～ 121 頁。
【44】 《中共黨史人物傳》，第 33 卷，第 44 頁。有關王的妻子所述他們在莫斯科大使館裏的歲月，見外交部外交史研究會：《當代中國世界外交生涯》，第 1 卷，第 1 ～ 33 頁。
【45】 《起源》，第 2 卷，第 227 ～ 228 頁。
【45】 王在 30 年代中與國民黨鬥爭中曾負傷。後來得了肺病；曾二次被送往蘇聯就醫；但似乎以後始終身體不好；克萊茵與克拉克：《中國共產主義傳記字典》，第 2 卷，第 897 頁；王震等：《回憶與繼承》; FBIS-CHI-81-038，p，L10. 毛後來尖刻地評論，王從病床上起來，以新的勁頭宣傳修正主義觀點；高煦等編：《歷史巨人毛澤東》，第 1421 頁。
【47】 王力遺言（Wang Li Yiyan），第 9 頁。本資料稱會議是 1960 年開的，但它又說王力在城裏幫助起草六十條，但這是在 1961 年（見上書第 2 章），我估計是印刷錯誤。
【48】 王力：《現場歷史》，第 73 頁。
【49】 王力遺言（Wang Li Yiyan），第 9 頁。
【50】 王力遺言（Wang Li Yiyan），第 9 頁。《中共黨史人物傳》，第 33 卷，第 50 頁。原信未收入王稼祥選集編輯部編《王稼祥選集》，但將本資料的另二份資料（第 444 ～ 460 頁）與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500 ～ 502 頁）中所引用的信件相比較後，說明前者是闡述信中的思想的。
【51】 《王稼祥選集》，第 450 頁；有關 1960 年的爭論，見《起源》，第 2 卷，第 272 ～ 274 頁。
【52】 《王稼祥選集》，第 444 ～ 445 頁。
【53】 同上書，第 445 頁。
【54】 《七千人大會資料》，第 100 頁。
【55】 王力：《現場歷史》，第 73 頁。
【56】 達林：《國際共產主義中的分歧》，第 8 ～ 11 頁；見上書，第 6 章。
【57】 吉廷斯：《中蘇爭論概述》，第 155 頁。
【58】 達林：《國際共產主義中的分歧》，第 650 ～ 651 頁。
【59】 同上書，第 824 頁。
【60】 同上書，第 652 ～ 653 頁，有關新疆事件，見上書，第 11 章。
【61】 霍查：《關於中國的反思》，第 1 卷，第 3 ～ 29 頁。雖然幾年以後霍查才與毛決裂，這些早期的沉思說明他會同意安德列·馬爾羅對尼克森總統說的話：「但中國從來沒有幫助過任何人！沒有幫過巴基斯坦，沒有幫過越南。中國的外交政策是個漂亮的謊言！中國人自己也不相信它，他們只相信中國。只相信中國！」見《尼克森回憶錄》，第 557 頁。
【62】 王力遺言（Wang Li Yiyan），第 9-10 頁；王力:《現場歷史》，第 72 ～ 73 頁；達林：《國際共產主義中的分歧》，第 652 頁。
【63】 《曾生回憶錄》，第 674 頁；張：《朋友和敵人》，第 225 ～ 226 頁。該年晚些時候，毛警告說怠工者、縱火者和在廣州附近擲炸彈者應處決；施拉姆：《未加修飾的毛澤東》，第 195 頁。
【64】 惠廷：《中國對威懾因素的估計》，第 65 頁。

【65】 同上書，第 67 頁。有關毛提出應準備就需要全國提高警惕發表公開聲明事，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0 冊，第 101 ～ 103 頁。有關公安部對城市反革命活動的擔心，見上書，第 146 ～ 147 頁。
【66】 希爾斯曼：《動員一個國家》，第 318 頁；羅伯遜：《難民和部隊調動——來自香港的報道》，第 114 頁。恩維爾·霍查根據中國外交部致阿爾巴尼亞大使的通信說，在福建已宣佈進入「戰爭狀態」；霍查：《在中國問題上的反思》，第 1 卷，第 21 頁。在福建連江縣的文件稱局勢是「備戰」；「國防部情報局」（台灣當局）編：《反共遊擊隊突擊福建連江俘獲匪幫文件彙編》，第 36 頁。
【67】 王：《回憶中美九年談判》，第 48 頁。
【68】 同上書，第 48 ～ 50 頁。惠廷：《中國對威懾因素的估計》，第 68 頁。
【69】 楊：《與中國共產黨人談判》，第 250 ～ 251 頁。甘迺迪於 6 月 20 日決定不支持蔣；張少書：《朋友與敵人》，第 226 頁。
【70】 希爾斯曼：《動員一個國家》，第 319 頁。據前國務院東亞事務副國務卿威廉·邦迪，華盛頓任命兩名海軍上將為駐國民黨政府的大使的一重要理由是因為他們有專業上的可信度，能對入侵大陸的可能性潑冷水；1993 年 8 月 24 日電話採訪。
【71】 馬齊彬等編：《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第 221、223 頁；張：《朋友與敵人》，第 226 頁。擊落 U2 型機使傳媒對中國給予極大的注意；見美駐香港總領事館：《中國大陸報紙縱覽》，第 2820 期，第 1 ～ 7 頁；第 2821 期，第 1 ～ 11 頁；第 2822 期，第 1 ～ 11 頁；第 2823 期，第 1 ～ 2 頁。有關事後追述如何取得此次勝利，以及毛祝賀有關部隊的照片，見《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編：《當代中國空軍》，第 374 ～ 378 頁。
【72】 王：《回憶中美九年談判》，第 50 頁。據 1996 年 4 月 6 日《南華早報》「23 年後秘密會晤成為頭條消息」的報道，1963 年底，周恩來與蔣介石在南海某島嶼上會晤，達成「一個中國」與和平統一的原則。
【73】 《起源》，第 2 卷，第 255 ～ 264、287 頁。
【74】 惠廷：《中國對威懾因素的估計》，第 60 頁。這社論語調特別令人吃驚，因為它標誌著中印關於在西藏貿易的協議的終結，印度人拒絕續約；馬克斯韋爾：《印度的中國戰爭》，第 249 頁。
【75】 引文見拉爾：《共產黨中國是怎樣談判的》，第 179 頁；另見上書，第 171 ～ 180 頁。
【76】 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黨史專題講義：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第 147 ～ 148 頁。
【77】 施拉姆：《未加修飾的毛澤東》，第 188 頁。
【78】 馬齊彬等編：《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第 221 頁。
【79】 大多數資料都認為會議開始於 8 月 6 日；例如：廖蓋隆等：《新中國編年史》，第 485 頁。至少有一份資料認為開會日期是 7 月 25 日，陳敏先：《新中國 45 年研究》，第 212 頁；該資料稱 8 月 6 日以前，會議為主要與農業有關（知情人 S）的檔的最後文稿作準備。
【80】 22 人——毛實際上說是 23 人，或者他數錯了，或者他漏了一個名字——是常委毛、劉、周、朱德、鄧小平；書記處書記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大區第一書記李井泉、柯慶施、陶鑄、宋任窮、劉瀾濤、李雪峰；和「中央負責同志」：政治局候補委員陳伯達（「紅旗」主編）和陸定一（中共宣傳部部長）；謝富治（公安部長）；毅牧（計劃人員，可能代表陳雲）、羅瑞卿（總參謀長，可能代表林彪），陳毅和楊尚昆。陳雲與林彪估計由於健康原因未參加。建議明顯將這中心小組分成更小的小組；施拉姆：《毛澤東的新文本 1921-1966》，載 1983 年 4 月《共產黨事務》第 2 期，第 152 頁；《（毛澤東）資料選編》，第 269 頁。
【81】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076 頁。譚震林顯然很聰明地強調農業很快就能恢復，以減輕他在大躍進中處理農業不當的責任；《起源》，第 2 卷，第 82 ～ 85 頁。

【82】 李、譚、陸、陶和劉在文化大革命中均受迫害；有關陸在此時的地位，見下面第 107 條註釋；有關陶和劉的地位，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087 頁。
【83】 施拉姆:《新文本》，第 152 頁。
【84】 同上書，第 153 頁；《(毛澤東）資料彙編》，第 269 ～ 270 頁。
【85】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087 ～ 1089 頁；有關毛對鄧子恢的批判，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0 冊，第 137 ～ 140 頁。
【86】 「成績很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施拉姆:《新文本》，第 152 頁；《(毛澤東）資料彙編》，第 269 頁；在《起源》，第 2 卷，第 192 頁曾提及。
【87】 施拉姆:《新文本》，第 152 頁；譯文強調第二個「不」，但原文中沒有。
【88】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074 頁；《(毛澤東）資料彙編》，第 271 頁。在引文中，毛諷刺地引用大躍進的口號——「鼓足幹勁」——這口號當然仍是正確的。
【89】 馬齊彬等:《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第 221 頁。
【90】 施拉姆:《未加修飾的毛澤東》，第 152、153 頁。
【91】 這是一名高級英國部長對前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如何控制內閣成員的評價:「如果瑪格麗特對一個問題已有了明確的看法，她會毫不掩飾地、有傾向性地予以介紹，然後再請負責的、有時被威嚇的部長發言。這樣，開始是一種最便捷地做工作的方法，結果卻是不問優缺點，不計政治代價地貫徹她的意圖。」勞遜:《(唐寧街）11 號的看法》，第 128 頁。
【92】 《中共黨史專題講義》，第 149 頁。
【93】 《(毛澤東）資料彙編》，第 270 頁。
【94】 正如他在 1959 年廬山會議上的行為一樣;《起源》，第 2 卷，第 219、222 頁。
【95】 《(毛澤東）資料彙編》，第 270 ～ 271 頁。本書是在 1955-1956 年集體化運動時出版的，前言和評論均是毛自己寫的；這樣，他間接地對自己缺乏預見性作了自我批評。
【96】 《(毛澤東）資料彙編》，第 270 頁。
【97】 同上書，第 270、271、272 頁。這兒，也可能又有自我批評的意義。1947 年，毛對老解放區的土改發出一個指示，糾正劉少奇早些時候的指示，劉的指示導致過左，這可能給新解放區的土改定下了調子；見張天榮等編:《黨的建設七十年》，第 222 ～ 234 頁。舒耶 (Shue) 在《過渡時期的中國農民》第 83 頁中說，恰恰就是那些因在老解放區進行了激烈土改而受批評的老幹部決心不再因同樣錯誤而挨批評，因此他們盡可能和平地進行土改。有關老解放區農村政策的例子，見克魯克與克魯克《一個中國農村的革命》和《一個中國農村的群眾運動》；弗里德曼等:《中國農村、社會主義國家》，第 2、3 章；哈特福德與戈爾茨坦:《星星之火》；韓丁:《翻身》。有關新解放區土改情況，見舒耶:《過渡時期的中國農民》；傅高義:《共產主義治理下的廣州》，第 3、4 章。不論毛怎樣在回顧時認為土改太軟弱了，土地主和其他當地掌權者的無疑不這麼想。主席自己承認在政權的初期處決了各類敵人 80 萬人，包括「土豪」和「劣紳」。
【98】 《(毛澤東）資料彙編》，第 270 頁。
【99】 毛看到胡開明的信，說明信是由田家英轉給他的，田的任務之一就是審閱給主席的來信，只將他認為應予注意的信轉給他。
【100】 同上書，第 270 ～ 272 頁。
【101】 毛在大躍進初期也這樣做過；見《起源》，第 2 卷，第 144 ～ 159 頁。
【102】 毛在鄭州籠統談到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仍是重要的，中國的商業專家們認為這講話對他們的工作是重要的 (《商業大事記》，第 55 ～ 56 頁)，但是並沒有作特別指示，他這時說這指示被人們不予重視。
【103】 原文是「主義」，可能應是「建議」。毛對那些沒有向他彙報的部門也提出警告；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0 冊，第 135 頁。
【104】 《(毛澤東）資料彙編》，第 237 頁；《起源》，第 2 卷，第 24 ～ 27 頁。

【105】馬齊彬等：《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第 221 頁。鄧子恢在北戴河為責任制試圖作簡短辯護，引用陶鑄和王任重對廣西的實驗的評價，該實驗是毛批准的（見上書，第 9 章），見「鄧子恢文集」編輯委員會：《鄧子恢文集》，第 613～615 頁。
【106】《（毛澤東）資料選編》，第 271 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006～1007 頁。
【107】知情人 B。據陸定一女兒說，他擁護反右運動；法塞諾塞：《龍珠》，第 137 頁。有關陸的女兒的外國朋友描述陸的節儉生活方式，見上書，第 123～125 頁。
【108】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007 頁。
【109】同上書，第 1007～1008 頁。
【110】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第 875～877 頁。
【111】毛利用省反對中央的早期例子是在 1955 年合作化時。
【112】馬齊彬等：《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第 221 頁。
【113】1964 年 2 月 29 日，毛告訴金日成，1962 年上半年黨內有人要解散農村的社會主義集體經濟，而改善與蘇聯和美國的關係則是他們的對外綱領；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577～579 頁。
【114】據薄一波，毛自 1959 年後就擔心「和平演變」；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137～1170 頁。在薄的書於 1993 年出版時，毛後的鄧政權也極關心和平演變，無疑，這可以解釋薄出人意外的、對毛 60 年代的左傾的理解。
【115】毛用「右傾」這個詞，這可能是「右傾機會主義」的略稱，這是 1959 年扣在彭德懷身上的名字；《（毛澤東）學習文選》，第 113 頁。
【116】根據 1958 年夏收的原來數字，佔該年全年糧食總產量的近 15%。這是這一時期中唯一公佈數字的一年。1958 年夏收產量中近 2/3 是在夏初收穫的冬小麥，幾乎是麥收總量的 90%，當時估計近 3,900 萬噸。後來公佈的數字為該年公佈總數的 10.3%；李德彬、林順寶等編：《新中國農村經濟紀實 1949.10～1984.9》，第 187、199 頁。雖然產量數字證明是誇大了的，但重要的是所佔的比例。據文化大革命後公佈的數字，1957-1963 年間，小麥年產量佔總糧食產量之比，在最高 15.4%（1960）和最低 9.66%（1961）之間浮動，平均為 11.7%，距 1958 年所說的 10.3% 不大。《中國統計年鑒》，1983 年，第 158 頁。換句話說，毛可能假設夏麥的收成或整個夏收是估計年糧食總產的可靠根據。
【117】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073 頁。據薄說，毛當時在山東、上海、杭州與武漢；據毛自己說，他還視察了西南。薄還說（第 1080 頁）早在 1961 年 12 月，毛即自信地對曾希聖說，生產已恢復了。據另一資料來源，在北戴河會議上，每個人都感到形勢肯定好轉了；林青山：《康生外傳》，第 193 頁。到 1962 年 6 月左右，口糧的增加使勞改營裏的犯人確信饑荒已過去了；吳與韋克曼：《苦風》，第 156 頁。
【118】《周恩來選集》（下），第 404 頁。
【119】《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第 599 頁；毛，《雜集》，第二卷，第 430 頁。毛說，一個月前，收割前，山東的幹部就不那麼樂觀了。
【120】李德彬等：《新中國農村經濟紀實》，第 187 頁；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152 頁。在華北平原三個主要產麥省之一的山東，小麥於 6 月初成熟，以端午節為標誌。楊：《一個中國村莊》，第 18 頁。1962 年，端午節為 6 月 6 日；董：《北京的習俗與節日》，第 125 頁。再向南，小麥自然成熟得較早。上海附近為 5 月，福建為 4 月（據 19 世紀園藝學家）；福瓊：《在中國遊蕩的三年》，第 307 頁。因此，在毛收到夏收的估計前應有許多時間作估計。遲至 7 月 7 日，鄧小平謹慎地說還不清楚，1962 年糧食生產是否會達到 1.5 億噸（《鄧小平文選 1938-1965》，第 304～305 頁），但他當時可能正在等秋收的第一次估計；一般地第一次估計在 8 月中可以做出。（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102 頁注 1）

【121】施拉姆：《新的文本》，第 152 頁。大躍進初，國家統計局受到嚴厲的批評，它研究並公佈事實的能力受到了限制，但到這時，它的重要性又被人們認識了，見李《共產黨中國的統計制度》，尤其是其中的第 10 與 11 章。
【122】惠廷：《中國對威攝因素的估計》，第 21 頁。
【123】《經濟大事記》，第 344 頁。秋收、耕種與播種均於 9 月中開始（美駐香港總領事館:《大陸中國雜誌選編》，第 2596 期，第 13 頁）而在 10 月下半月結束（美駐香港總領事館：《大陸中國雜誌選摘》，第 2602 期，第 11 頁）。李先念於 9 月 25 日談到「今年的生產增長」，《李先念論財政金融貿易》（下），第 38 頁。9 月 23 日，當秋收正在進行時，中共中央發佈了一個新的有關糧食的指示。在毛的指示下，1962 年糧食收購數減少 200 萬噸，總數剛過 3,200 萬噸，這數字甚至比鄧子恢在 7 月份提出的還少。但這指示與鄧的提法不同的是鄧提出收購量 5 年不變，而指示預計農業會好轉，在以後收購量會逐漸增加，進口減少；同上書；馬齊彬等：《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第 221 ～ 222 頁。不清楚的是這個決定與 4 天以後中共十中全會發表的數字之間是什麼關係。中共十中全會稱收購量應定在適當水準上，時間與鄧子恢提出的一樣長；同上書，第 222 頁；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 24 卷，第 133 頁（譯按：十中全會的決定只說「在一定時期內」，並未如作者所說「時間與鄧子恢提出的一樣長」）；李先念在全會的講話中似乎要解決這問題，他說在（收購量）提高到適當水準後穩定下來了，《李先念論財政金融貿易》（下），第 38 頁。
【124】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074 ～ 1075 頁。
【125】同上書，上卷，第 371 ～ 373 頁。
【126】為說明毛早在 1961 年 12 月就估計農業會好轉，見伍仁：《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第 3 卷，第 72 頁；另見許全興：《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1956-1976》，第 301 頁。
【127】施拉姆：《未加修飾的毛澤東》，第 9 頁。
【128】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509 頁。
【129】同上書，第 512 頁。
【130】施拉姆：《未加修飾的毛澤東》，第 189 ～ 190 頁。據施拉姆說，早在延安時期，毛就明確他從共產主義經典文獻中得出的資訊就是，「階級鬥爭、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施拉姆：《毛通向權力之路》，第 1 卷，第ＸＶⅡ頁。
【131】毛在北戴河指定並同意的由高級政策制定人組成的小組名單中未包括陳雲；見上面第 80 條注。在十中全會出版的照片中，陳也不在常委中；見麥克法夸爾：《論照片》，第 306 ～ 307 頁間的照片。
【132】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513 頁。
【133】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074 ～ 1075 頁。
【134】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513 頁。插話、作簡短評論，本身並不表示不同意，而是中國領導人之間的通常做法，是大多數秘密會議中不拘禮儀的作法。事實上，這是的講話不被看作是最終文本。即令毛在主要場合作長篇、半正式講話中，也可以插話，見麥克法夸爾、奇克與吳：《毛主席的秘密講話》，第 162、169、186、217 ～ 247 頁，不過，那些對毛講話作插話的人是想幫助毛，而毛卻常用這方法來為難發言者，或者以諷刺和嚴厲的言辭表示反對，或以強調或闡述他的話來表示對發言者的堅定性或權威性的（未說出的）懷疑。毛在十中全會對劉的插話就屬於後一種；第一種的最著名的例子，見阿利托：《最後一個孔夫子》，第 1 ～ 3 頁。
【135】中央農村工作部乾脆就撤銷了，其職責併入國務院農林辦公室。鄧子恢被撤去部長職務，後由譚震林繼任。可能由於他早期與毛關係密切，鄧仍保留高幹地位，但後來他被撤去副總理職務，任政協副主席。有趣的是，起初劉正式稱呼鄧為「鄧子恢同志」，但在毛以更友好的「老鄧」稱呼他時，劉也這樣稱他了。鄧不得不到毛處作自我批評，但在他受到同事們批評時這樣做是要有非凡勇氣的；見「鄧子恢傳」編輯委員會：《鄧子恢傳》，第 565 ～ 570 頁。全會以後，鄧子恢與陳毅、賀龍和聶榮臻到廣東視察，並寫了一篇 2 萬字的回憶錄；《中

共黨史人物傳》，第 7 卷，第 376 ～ 377 頁；《解放軍將領傳》，第 2 卷，第 65 頁。

【136】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513 ～ 514 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075 頁。

【137】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515 ～ 517 頁。

【138】郭思敏與天羽：《我眼中的劉少奇》，第 438 ～ 439 頁；馬齊彬等：《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第 222 頁；許全興：《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 1956-1976》，第 303 頁。

【139】呂星斗編：《毛澤東和他的事業》，第 2 卷，第 705 頁。

【140】施拉姆：《未加修飾的毛澤東》，第 194 ～ 195 頁。彭德懷指的是毛在延安對他的批評；見《起源》，第 2 卷，第 223 頁。

【141】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515 頁。毛指的是 17 級以上；該級別與科長級是同級幹部，見巴納特：《共產黨中國的幹部、官僚主義和政權》，第 41 ～ 43、190 ～ 193 頁；另見黃錚：《劉少奇一生》，第 392 ～ 293 頁。

【142】《經濟大事記》，第 345 頁；利伯索爾：《大躍進和延安領導層的分裂》，第 331 ～ 335 頁。毛對全面公報的修改集中在階級問題而不是經濟問題上；《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0 冊，第 195 ～ 198 頁。

【143】郝為民：《內蒙古自治區史》，第 207 頁。

【144】使小隊成為公社活動的中心的決定於 2 月即通過了；劉與吳：《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第 296 頁。結果，關於大隊職務的條文數由 12 條減為 2 條，而關於小隊的條文則由 10 條增至 19 條；然而，應注意，有關大隊條文中有一條有幾款，因此，2 這個數字是有些誤導的。在有些地方，檔中有關大隊部分的一些條文被整個轉至小隊部分，只是名稱作適當更改；由於 1961 年 6 月文本中有關小隊的許多條文都保留下來了（如有關糧食、供出售的農產品、馱重牲口、工作組、標準、按勞分配、財政管理等條文），這一段必須作相當大的擴充。見《農業集體化》（下），第 633 ～ 641 頁；我比較了同上書中第 474 ～ 491 頁與第 628 ～ 649 頁的文本。

【145】《經濟大事記》，第 349 頁。

【146】見上書，第 3 章，表 31。

【147】據劉與吳：《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第 296 頁，30 年的決定是在 2 月份做出的，不清楚此時鄧起了什麼作用。據另一份材料，田家英 2 月 8 日向主席提出了三個方案供選擇：20 年、40 年或「至少 20 年」，2 月 11 日毛選了「至少 30 年」；見《中共黨史重大事件述實》，第 125 頁。

【148】見上書，第 9 章。

【149】大隊喪失了積累（資金）的權力，也不再管理福利。1961 年 6 月文本中第 25、26 條，1962 年 9 月文本中第 35、36 條；《農業集體化》（下），第 481、639 ～ 640 頁。1962 年文本之譯文見《問題與研究》1979 年 10 月期，第 93 ～ 111 頁與 1979 年 12 月期，第 106 ～ 115 頁。

【150】1961 年文本第 42 條與 1962 年文本第 27 條；同上書，第 486、637 頁。

【151】1961 年文本第 34 條與 1962 年文本第 32 條；同上書，第 483、638 頁。

【152】第 40 條，同上書，第 642 頁。

【153】同上書，第 659 ～ 663 頁。

【154】1961 年與 1962 年文本第 8 條；同上書第 475、629 頁。

【155】1961 年文本第 6 條與 1962 年文本第 8 條；同上書，第 475、630 頁。

【156】見上書，第 7 章，第 151 ～ 152 頁。

【157】1961 年文本第 47 條與 1962 年文本第 48 條，《農業集體化》（下），第 488、645 頁。

【158】1961 年文本第 44 條與 1962 年文本第 46 條，同上書，第 487、644 頁。

【159】1961 與 1962 年文本第 57 條，同上書，第 490、648 頁。

【160】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094 頁。

【161】《(毛澤東) 資料選編》，第 276 頁；施拉姆：《未加修飾的毛澤東》，第 194、196 頁；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512 頁。自從廬山（會議）以來，彭德懷就沒有參加過政治局會議。毛在 1965 年 1 月 21 日指示，由彭真決定哪些政治局委員應閱讀有關計劃的重要報告，但附上只有「反黨分子」應除外的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1 冊，第 316 頁；張聞天在廬山（會議）被指責為彭陰謀的同夥，他在 1960 年底被派往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1962 年初，受到寬鬆環境的鼓勵，向毛提交了一份他對農村市場的調查報告——這無疑使主席感到不快；鍾誠、夏魯和葉蘭編：《領袖交往實錄系列：毛澤東》，第 57 頁。有關張與彭的關係和他在廬山（會議）的作用，見《起源》，第 2 卷，第 204～206、217～218、222、236 頁。

【162】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093 頁。1965 年 2 月，「紅旗」發表了三首諷刺性的散曲，應該是一尼（赫魯曉夫）在 1964 年 10 月垮臺後不久，對另二尼去世的哀悼，，即「西尼」(甘迺迪，於 1963 年 11 月去世)，及「東尼」(尼赫魯，於 1964 年 5 月去世)；見《某公三哭》，譯文載《聯合出版物研究》，第 30、134 期，1965 年 5 月 18 日，第 55～57 頁。

【163】知情人 G。

【164】例如，在八大由政治局委員降為候補委員後不久，他就稱病沒有出席 1956 年 10 月 20 日政治局的一次重要會議。該會議討論的議題是蘇聯可能即將入侵波蘭，而康又是中國主要的「蘇聯專家」，他應該出席；吳冷西：《憶毛主席》，第 11 頁；《起源》，第 1 卷，第 148 頁。有關康生的主要中文資料來源是仲侃著《康生評傳》；與林青山著《康生外傳》。有關文化大革命後這些反康生而又對康生有瞭解的作家的情況，見拜倫與派克為他寫的傳記《龍爪》，第 489～492 頁；該書主要資料來源來自仲侃。有些關於康生的重要段落載於師哲：《峰與穀：師哲回憶錄》，第 192～229 頁；劉曉：《出使蘇聯》。有一本法文書有很多篇幅涉及康，該書的資料來源似乎主要是用西方文字寫的材料，法利戈特與考弗《康生與中國的秘密工作》，已譯成英文《中國的秘密工作》。

【165】「東海」指他出生於沿海省山東；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 23 頁。毛不僅將康視為可靠的政治知己，還不時徵求他對文化事務的意見；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0 冊，第 349 頁；第 11 冊，第 159、430～431 頁。

【166】康生是他在 30 多歲時用的名字，也是許多名字中最後一個；他原名張宗可。見仲侃：《康生評傳》，第 332、343 頁。

【167】同上書，第 6～13 頁，學校校長是理查·威廉，曾將《易經》譯成德文；拜倫與派克：《龍爪》，第 42～44 頁。據該書說，康生於 16 歲被送至德國學校，因為他父親不滿意於他兒子與壞朋友結交、過的糜爛生活；同上書，第 38～40 頁。

【168】在仲侃：《康生評傳》，第 17 頁，作者勉強承認康的確受到當時革命事件的鼓舞。

【169】同上書，第 14～28、333～336 頁；林青山：《康生外傳》，第 9 頁。據拜倫與派克：《龍爪》，第 72 頁，康生未與他第一位妻子離婚。社會科學部當時由瞿秋白領導，瞿後來曾短時期地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仲侃：《康生評傳》，第 23 頁。

【170】同上書，第 28～30 頁。

【171】拜倫與派克：《龍爪》，第 103～111 頁。仲侃：《康生評傳》，第 38 頁；只隱約地說康「參加了中共中央某機關的領導工作」。師哲：《峰與穀》，第 116 頁，指出在白區，中共 90% 的組織在 1929-1931 年均消失了，但這主要是由於國民黨的無情鎮壓而不是由於康生的無能。

【172】師哲：《峰與穀》，第 116 頁；仲侃：《康生評傳》，第 30～31 頁；林青山：《康生外傳》，第 13～14 頁；拜倫與派克：《龍爪》，第 76～85、90 頁。

【173】仲侃：《康生評傳》，第 38、57～63、338、344 頁；師哲：《峰與穀》，第 211 頁；林青山：《康生外傳》，第 41～49 頁。拜倫與派克：《龍爪》，第 112～132 頁。

《龍爪》，第 89 頁，稱王明返回莫斯科，留下一名下屬負責中共，因為他非常害怕被國民黨逮捕。

【174】師哲：《峰與穀》，第 213 頁，稱康生一下飛機就看出權力在誰手裏，他看到歡迎委員會與毛站在一起。另見仲侃：《康生評傳》，第 74 ～ 75 頁；林青山：《康生外傳》，第 78 ～ 81 頁；拜倫與派克：《龍爪》，第 135 ～ 145 頁；戴晴：《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第 51 頁。

【175】康生雖忙於組織工作，但仍擠出時間寫了許多文章；請注意仲侃：《康生評傳》，第 338 ～ 343 頁，按日期列出的他在 1932 年的活動。

【176】朱仲麗：《女皇夢》，第 36-37 頁。據師哲：《峰與穀》，第 220 頁，是康生的妻子曹軼歐親自安排演員藍蘋更名為江青。

【177】仲侃：《康生評傳》，第 75 ～ 77、347 頁；拜倫與派克：《龍爪》，第 145 ～ 150 頁。關於對康生和江青可能在山東和 / 或延安有曖昧關係的推測，見後者，第 48-50 頁。特里爾：《白骨精》，第 18、136 頁。

【178】運動中所使用的檔均收集在康普頓《毛的中國》一書中，並附有前言。

【179】仲侃：《康生評傳》，第 77 ～ 95 頁。雖然該書將處決的責任歸之於康生，而且他可能對最初對他們提出控訴也負責任，但處決他們的命令似乎是由當地高級軍事指揮官和後來的元帥賀龍批准的，因為國民黨的部隊 1947 年已接近中國共產黨的根據地；見戴晴：《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第 101 頁，及戴晴：《王實味與「野百合花」》，第 64 ～ 69 頁。看起來，原因好像是賀龍不願意在打仗時還要照顧一大批犯人。毛在七千人大會上提到處決王實味，也證明瞭這一點：「那個時間發生在隊伍正進行長征的時候，安全機構自作主張處決了他；不是中央的決定。就此事我們多次進行批評；我們認為他不該處決。如果他是特務，寫文章攻擊我們，到死都拒絕改造，那麼爲什麼不把他就留在那裏，或者讓他去勞動呢？」（施拉姆：《未加修飾的毛澤東》，第 185 頁。）

有關戴晴對康生作用的觀點，見《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第 48 ～ 58、96 ～ 97 頁。有關西方對批判王實味運動的看法，見戈德曼：《共產黨中國文學上的不同意見》，第 37 ～ 42 頁；艾普特與賽克：《在毛的共和國裏的革命說教》，第 288 ～ 292 頁。

【180】仲侃：《康生評傳》，第 353 頁。康生此時正參加殘暴的土改；同上書，第 96 ～ 105 頁。

【181】這數字是劉少奇在 1961 年 6 月 30 日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 40 週年的講話中說的；《劉少奇選集（1958-1967）》，第 140 頁。

【182】仲侃：《康生評傳》，第 106 ～ 111 頁；林青山：《康生外傳》，第 121 ～ 134 頁；拜倫與派克：《龍爪》，第 198 ～ 208 頁。

【183】《起源》，第 1 卷，第 148、359 ～ 360 頁，註釋第 44 條。

【184】其他事例包括林彪（《起源》，第 1 卷，第 146 ～ 147 頁；第 2 卷，第 65 頁）與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幾年裏，毛拒絕將鄧與劉少奇一樣全面打倒。

【185】仲侃：《康生評傳》，第 114 ～ 132 頁。當毛在 1957 年初發動運動開展整風時，康生總是搖旗吶喊；麥克法夸爾、奇克與吳：《毛主席的秘密講話》，第 196，200，218，219，223，238，245，246，256，261，264，265 頁。在大躍進期間，康生除去在思想意識上予以支持而外，還對農業機械化作了一些研究；《起源》，第 2 卷，第 43 ～ 50 頁。根據其他資料，他還為毛介紹女性，提供色情資訊；索爾茲伯里：《新帝王們》，第 217-221 頁。

【186】戴知賢：《山雨欲來風滿樓》，第 70 頁。

【187】仲侃：《康生評傳》，第 144 ～ 147 頁；林青山：《康生外傳》，第 180 ～ 188 頁；拜倫與派克：《龍爪》，第 261 ～ 267 頁；特里爾：《白骨精》，第 207 ～ 208 頁；另見下麵第 17 章。

【188】戴知賢：《山雨欲來風滿樓》，第 72 頁。

【189】黃埔軍校各班名單見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編：《黃埔軍校史料》，第 522 ～ 587 頁。

【190】盛平：《中國共產黨人名大辭典 1921-1991》，第 190 頁。有關對劉志丹命運的最近分析，見艾普特與賽克：《在毛的共和國裏的革命說教》，第49～54頁。
【191】見作者在小說最後於 1979 年出版時的前言；李建彤：《劉志丹》，第 1 ～ 2 頁。任何為中國共產黨主要人物立傳的人都會碰到與《劉志丹》小說同樣的困難。當中國共產黨在 1945 與 1981 年提出對黨史的官方看法時，這些隻言片語不涉及黨內鬥爭中的許多個案與幾百名領導人物的作用。這些爭吵的倖存者在過去可能處在相對立的兩面，但幾十年以後都同樣是有身份的人，而且他們極不願意回顧他們過去的錯誤。以小說虛構或藝術加工為由，並不能常常倖免。如李建彤與還健在的劉志丹的高級同事之間的爭吵所證明的，雖然她可以說中共 1945 年的決定已對他作出了正面的評價。（李建彤：《劉志丹》，第 3 頁）另一種方法是由倖存者和專家組成的委員會對具體事件或組織作謹慎小心的敘述。這一方法是《中國共產黨歷史資料叢書》所採用的，這套橙色的大部頭叢書由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出版。中國共產黨編史工作中這類問題可以解釋，爲什麼中共對於自身一個重要時期——長征，雖然有許多個別軍事單位的歷史記載，但從來沒有出版過一本官方的、全面的記述，而寧願讓外國人哈里遜·索爾茲伯里去承擔這一工作，然後再去不辭辛苦地處理大量的棘手問題，去協調他書中數以十計、甚或數以百計的與已衝突（至少是不同）的觀點；見他的《長征》。這可能也能解釋為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出版商們急切地翻譯外國人對他們政策的敘述，這些書所表達的觀點，如果換成中國專家，就難逃其咎。
【192】《中國名人錄》，第 768 ～ 769 頁。
【193】克萊恩與克拉克：《中國共產主義人物辭典》，第 1 卷，第 312 ～ 313 頁。
【194】見習仲勳在《人民的好總理》中的自述第 24 ～ 25 頁。
【195】文聿：《中國「左」禍》，第 364～365 頁；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511 頁；李建彤：《劉志丹》，前言，第 3 ～ 4 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096 頁。
【196】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511 頁，《劉志丹》，前言，第 3 ～ 4 頁。由於《劉志丹》於 1979 年出版時，中國共產黨還沒有對高級幹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行為和導致文化大革命的事件做出官方評價；李很謹慎，沒有提閻紅彥的名字，只說他是陝西幹部；甚至提到康生時也只用當時指代他的「理論權威」，用引號以示諷刺。仲侃：《康生評傳》，第 154 ～ 156 頁，敘述與李建彤的很接近，但甚至連「陝西幹部」也沒有提，這就使人不解，康生是怎樣知道《劉志丹》的。林青山：《康生外傳》，第 189 ～ 190 頁，稱康的一名「忠實追隨者」在談話中提出這本書，但之前康對此不感興趣，直到有人告訴康，這與高崗問題有聯繫。這一事件在人民解放軍出版的系列《解放軍將領傳》第 9 卷第 460 頁的閻紅彥傳記中未提及。閻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去世，據說是自殺；《共產黨中國名人傳》，第 2 卷，第 774 頁。
【197】見泰偉斯：《毛朝廷的政治》；《起源》，第 1 卷，第 47 頁。
【198】知情者 1。
【199】李建彤：《劉志丹》，前言，第 3 ～ 4 頁；仲侃：《康生評傳》，第 155 ～ 156 頁；林青山：《康生外傳》，第 200 ～ 201 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095 ～ 1096 頁。吳冷西：《憶毛主席》，第 148 頁。
【200】習仲勳稱毛對這事並不重視，並暗示毛以後對他的處理說明他並不相信這些指控；《人民的好總理》，第 24 ～ 26 頁。
【201】《起源》第 1 卷，第 222 頁。
【202】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515 ～ 517 頁；《中國「左」禍》，第 367 頁。
【203】《人民的好總理》，第 23 ～ 25 頁。
【204】賈三次受貶。在 1959 年彭垮臺後，他因為對經濟有「右傾機會主義」觀點受到攻擊，七千人大會後平反。在《劉志丹》事件中受到康生批評後，被送到中央黨校學習，但在過了 3 年平靜的生活後，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迫害。見周維仁：《賈拓夫傳》，第 124 ～ 214 頁。
【205】戴知賢：《山雨欲來風滿樓》，第 77 頁。

【206】該時，習是洛陽一工廠的副廠長。當賈拓夫因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於 1967 年去世時，勞動部部長馬文瑞代他成為「反黨集團」的頭頭之一。馬是陝西前遊擊隊員，《劉志丹》的作者曾徵求過他的意見。17 年後，於 1979 年才對此事「平反」。見《人民的好總理》，第 25 頁；仲侃：《康生評傳》，第 156～161、381 頁；林青山：《康生外傳》，第 201～204 頁；李建彤：《劉志丹》，第 5～6 頁；1968 年 5 月 20 日《文彙報》。

第十三章 喜馬拉雅山戰爭，加勒比海危機

【1】《起源》，第 1 卷，第 46～48、169～183 頁。

【2】同上書，第 2 卷，第 132～134 頁。

【3】見本書第 12 章。

【4】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 冊，第 539～541 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 43～45 頁；「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編：《抗美援朝戰爭》，第 17～21 頁。

【5】西方的這一當代看法已得到證實；《起源》，第 2 卷，第 92～100 頁；吳冷西：《憶毛主席》，第 75 頁。

【6】《起源》，第 2 卷。據一份材料，毛早在 1958 年 7 月 17 日就命令開始準備炮擊，幾乎在中東危機剛開始時；陳敦德（音譯）：《北戴河：毛澤東急召葉飛上將密談》，載《炎黃春秋》，1993 年第 7 期，第 48 頁。

【7】在分析中印邊界戰爭時的一個問題是：即令文化大革命後最詳盡的材料也沒有提供有關中國決策過程的內部材料，而印方的材料則早已得到。

【8】《起源》，第 2 卷，第 255～257 頁。

【9】馬克斯威爾：《印度的中國戰爭》，第 208～216、231～238 頁；戈帕爾：《尼赫魯》，第 3 卷，第 206～211 頁；帕利特：《高高的喜馬拉雅山上的戰爭》，第 89、94、97～99、105～110 頁。戈帕爾博士是 1960 年印度外交部歷史處處長，是中印官員聯合報告中二名簽名的印度官員之一，該報告是尼赫魯與周恩來高峰會議的成果。帕利特准將（後少將）是印 1961-1962 年軍事作戰處處長。印度在中印邊界上準備不足的原因之一是在 1959 年 10 月以前，該地區完全由情報局管轄，基本上是內政部下轄的國內員警活動地區，其局長直接向尼赫魯報告。即令在 1959 年以後，情報局仍保留對邊界上情報站的控制權；帕利特：《高高的喜馬拉雅山上的戰爭》，第 99～101 頁。

【10】馬克斯威爾：《印度的中國戰爭》，第 492～493 頁。馬克斯威爾的來源之一是周恩來，但他未說明周是怎麼知道莫斯科與新德里之間的秘密通信的。

【11】帕利特：《高高的喜馬拉雅山上的戰爭》，第 85、109～110、160～161、170 頁；馬克斯威爾：《印度的中國戰爭》第 334～345 頁。據帕利特，早在 1961 年秋，尼赫魯已形成看法，這些因素加在一起會使中國人民解放軍不對所擬議中的印度行動進行嚴重的反擊。由於當時並沒有國民黨的嚴重威脅，帕利特可能是將這事與 1962 年中在新德里作出的相似但又更有理由的估計混淆了。

【12】帕利特：《高高的喜馬拉雅山上的戰爭》，第 111～154 頁。這也是中國分析家的看法；石博：《1962 年，中印大戰紀實》，第 179 頁。

【13】帕利特：《高高的喜馬拉雅山上的戰爭》，第 156～160、170、173～174 頁；印度政府《白皮書》第 6 卷第 37～39 頁；馬克斯威爾：《印度的中國戰爭》，第 250～251 頁；戈帕爾：《尼赫魯》，第 3 卷，第 211 頁。

【14】沙力和閩力編：《中國九次大發兵》，第 101 頁。中國有關戰爭的主要資料來源是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史編寫組：《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史》，第 122～127、141、143 頁。

【15】惠廷：《中國對威懾因素的估計》，第 75～77 頁；欣頓：《世界政治中的共產黨中國》，第 296 頁。

【16】見第 12 章。

【17】 美駐香港總領事館：《中國大陸報刊概覽》，第 2755 期，第 27 頁。
【18】 見第 12 章。
【19】 負責印度西部司令部的將領不同意這次推進；馬克斯威爾：《印度的中國戰爭》，第 252 ～ 254 頁。有關中國決定增援的情況，見《中印》，第 132 ～ 133 頁。
【20】 《中印》，第 145 ～ 148 頁；戈帕爾：《尼赫魯》，第 3 卷，第 213 頁。
【21】 惠廷：《中國對威懾因素的估計》，第 73 ～ 74 頁。
【22】 引文見帕利特：《高高的喜馬拉雅山上的戰爭》，第 79 ～ 80 頁。
【23】 引文見喬治：《梅農》，第 249 頁。
【24】 帕利特：《高高的喜馬拉雅山上的戰爭》，第 79 ～ 83 頁。
【25】 印度政府《白皮書》第Ⅶ期，第 1 頁。
【26】 同上書，第 3 頁。
【27】 惠廷：《中國對威懾因素的估計》，第 80 頁；馬克斯威爾：《印度的中國戰爭》，第 267 頁。
【28】 惠廷：《中國對威懾因素的估計》，第 84 頁；印度政府《白皮書》第Ⅶ期，第 4 頁。
【29】 佈雷徹:《印度與世界政治》，第 170 頁；陳毅急於談判是梅農參加會議的原因，但這正好與北京當時對三和一少政策的偏愛相符，與印度改善關係是三和一少的重要組成部分。梅農後來在印度遭到攻擊，因為拍到了一張他與陳毅飲酒的照片；馬克斯威爾：《印度的中國戰爭》，第 267 頁。陳與梅農在 7 月 22 日與 23 日會面。劉樹發：《陳毅年譜》，第 926 頁。關於這些會面是由陳提出的證據，以及有關這二位部長的討論的不太可靠的情況，另見石博：《1962 年中印大戰紀實》，第 185 ～ 186 頁。
【30】 戈帕爾：《尼赫魯》，第 3 卷，第 213 頁。
【31】 馬克斯威爾：《印度的中國戰爭》，第 259 頁；《起源》，第 2 卷，第 255 ～ 264 頁。
【32】 印度政府《白皮書》第Ⅶ期，第 18 頁；馬克斯威爾：《印度的中國戰爭》，第 259 ～ 261 頁；惠廷：《中國對威懾因素的估計》，第 87 ～ 91 頁。馬克斯威爾稱這是總理的立場，7 月 26 日的照會並未改變立場而且中國人也瞭解這點。惠廷稱尼赫魯是被迫放棄較為溫和的態度的。
【33】 同上書，第 88 ～ 89 頁。
【34】 當時，全面負責亞非事務的副外長是黃鎮，其同事回憶他的活動時均未提到在 10 月份邊境戰爭以前，他曾參與有關印度事務。見姚仲明、謝武生與白建章編：《將軍、外交家、藝術家——黃鎮紀念文集》，第 411 ～ 423 頁。
【35】 惠廷：《中國對威懾因素的估計》，第 91、98 頁。
【36】 同上書，第 92 頁；見第 12 章。
【37】 惠廷：《中國對威懾因素的估計》，第 93 頁。
【38】 中國領導人對參與朝鮮戰爭是有爭論的，但這個決定涉及與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相對抗並包含有核報復的危險，然而，毛似乎戰勝了反對參與的大多數人;《彭德懷自述》，第 257 ～ 258 頁;《中國元帥的回憶錄》，第 472 ～ 274 頁。有關在中聯部工作的一名幹部進一步證實毛在外交事務上有決定權，見《王力談毛澤東》，第 43 ～ 44 頁。
【39】 戈帕爾：《尼赫魯》，第 3 卷，第 212 頁，作家韓素音（《我的房子有二扇門》，第 267 ～ 268 頁）說她曾收到消息，某個時候，（中國）會有一次「力量的顯示」，說明中國已決定用軍事解決的辦法。但仔細看一下，韓對這種威脅的報道的時間、來源和意義都過於含糊不清，無助於對中國決策過程的分析。

另一個中國可能有軍事行動的暗示被印度情報局於 1962 年 5 或 6 月獲悉：中國駐加爾各答領事秘密告誡印度共產黨領導人在邊境上可能有武裝行動；帕利特：《高高的喜馬拉雅山上的戰爭》，第 176 ～ 177 頁。中國外交部可能預見到印度的前進政策的結果將是邊境衝突，希望在印度的北京的朋友們有事先準備並一旦事件發生，能採取親中國的態度。另一個可能是中國人完全知道在印度很難保守秘密，故意將這「情報」透露給印度共產黨人，並確信印度情報

單位會掌握這情報（印度情報單位在國內搜集情報的能力遠強於它對外國的分析能力），從而遏制印度軍隊不再向前推進（確實，韓素音收到的暗示可能也有類似的目的，因為周恩來完全知道她能接近尼赫魯）。完全不可能的是：（a）早在5或6月，當王稼祥所鼓吹的對印度應採取較軟路線得到高層贊同時，北京就已決定重大的跨境襲擊了。（b）即令作出了這樣的決定，竟會在4個月以前就預先警告可能成為敵對國的一位可能會洩露秘密的公民。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編輯們下達的有關中印衝突的宣傳提綱直到1962年11月才發出；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24卷，第176～182頁。

【40】 外交部外交史編輯室編：《新中國外交風雲》，第2卷，第72頁；《中印》，第142～143頁；「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編：《當代中國軍隊的軍事工作》，第617頁；在最新的和權威性的第6卷《毛澤東軍事文集》中並沒有毛對1962年邊境戰的指示。第一份資料也曾提到陳毅，但他不是一名關鍵人物：當時局勢太微妙了，甚至外交部長也不能處理。在60年代，處理主要外交問題的建議按慣例都是由周呈送給毛批准的，並抄送給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的；知情人D。據薛與白編：《當代中國的外交》，第261頁，「總之，中國的外交是毛主席指導，周總理親自處理，盡量保證處理得當。」雖然這一評論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作出的，但似乎是正確的。在處理外交事務上，毛與周的關係和斯大林與莫洛托夫的關係相似；見別列日科夫：《在斯大林身旁》，第209～210頁。

【41】 「邊防無小事，事事聯北京」；《中印》，第144頁。

【42】 威特遜：《中國高層司令部》，圖D。中國中將軍銜只有二顆星；其上為元帥，大將（四顆星）和上將（三顆星）。

【43】 馬克斯威爾：《印度的中國戰爭》，第465～466頁。

【44】 《當代中國軍隊的軍事工作》，第617～618頁；李澄、肖紀和王立兵編：《建國以來軍事百件大事》，第186頁。

【45】 戈帕爾：《尼赫魯》，第3卷，第218頁；馬克斯威爾：《印度的中國戰爭》，第271～272頁。

【46】 沙力與閻力：《中國九次大發兵》，第112頁；陳石平：《中國元帥劉伯承》，第525～526頁；「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劉伯承傳》，第669～674頁；徐燕：《中印邊界之戰歷史真相》，第111～112頁。由於以前受傷，獲有「獨眼龍」外號的劉可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偉大的戰略家（林彪可能是中國最偉大的戰術家）。在共產黨征服中國後不久，劉被任命為人民解放軍（參謀）學院的第一院長，1954年成為訓練總監部部長。（克萊恩與克拉克：《中國共產主義傳記辭典》，第1卷，第611、614～615頁）。在1958年重要的軍委會議上（《起源》，第2卷，第63～71頁），由於軍內關於「教條主義」之爭，劉不得不作自我批評，不得不由他的老戰友鄧小平為他辯護；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274～299頁。然而69歲的劉在中印邊境戰中的作用說明他的傑出才能仍被人尊重。他研究了印度在東線的佈置後說是「銅頭，錫尾，背緊，腹鬆」；沙力與閻力：《中國九次大發兵》，第112頁。

【47】 官方的人民解放軍的編年史的敘述並未提供情況；見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中國人民解放軍60年大事記（1927—1987）》，第600～601頁。

【48】 帕利特：《高高的喜馬拉雅山上的戰爭》，第178～181、183、187頁；《中印》，第157～160頁。

【49】 印度部隊瞭解並關心麥克馬洪線與印度聲稱的領土之間有差異，但不知道北京已正式斥責印度的說法；同上書，第188～191頁。

【50】 印度政府《白皮書》第Ⅶ號，第68頁。

【51】 同上書，第71～73頁。

【52】 同上書，第74頁。印度部隊在朵拉哨所附近發現一塊板，上有中文字「這是我們的河山」；馬克斯威爾：《印度的中國戰爭》，第320頁。

【53】 印度政府《白皮書》第Ⅶ號，第77～78頁。

【54】 馬克斯威爾：《印度的中國戰爭》，第321～331、343～344頁。這決定是總理不在時作出的。總理於前一天離此赴倫敦參加英聯邦總理會議。據一名印

度高級軍官說「梅農從來不否決他軍事首領的專業意見，如果他們堅持他們的看法的話……如果軍事首領堅持，他不會去否決他的」；帕利特：《高高的喜馬拉雅山上的戰爭》，第 73 頁。

【55】 馬克斯威爾：《印度的中國戰爭》，第 346 頁；惠廷：《中國對威懾因素的估計》，第 100 ～ 102 頁；《中印》，第 160 ～ 161、510 頁。

【56】 馬克斯威爾：《印度的中國戰爭》，第 338 ～ 342 頁。

【57】 《中印》，第 161 頁；惠廷：《中國對威懾因素的估計》，第 92 頁。

【58】 印度政府《白皮書》第Ⅶ號，第 796 ～ 798、100 ～ 102 頁；惠廷：《中國對威懾因素的估計》，第 108 ～ 110 頁。

【59】 《中印》，第 179 ～ 181、187 頁。本書強調印度已將它的精銳部隊部署在邊境東線一帶；同上書，第 191 ～ 192 頁。

【60】 惠廷：《中國對威懾因素的估計》，第 110 ～ 114 頁。有關外界人士對考爾的評價，見馬克斯威爾：《印度的中國戰爭》，第 193 ～ 208、355 ～ 368 頁；有關由考爾任命在其下服役的高級官員的評價，見帕利特：《在高高的喜馬拉雅山上的戰爭》，第 71、76 ～ 77 頁；有關該官員所述考爾在發展的危機中直到此時的行為，見上書，第 219 ～ 228 頁。

【61】 馬克斯威爾：《印度的中國戰爭》，第 369 ～ 371 頁。

【62】 對尼赫魯的講話，一般只有將「f r e e」譯成中文「清除掉」，例如在這樣的聲明中：「他公開命令（印度）必須完全將中國部隊從印佔的中國領土上『清除掉』」，見《當代中國軍隊的軍事工作》，第 617 頁。

【63】 引文見惠廷：《中國對威懾因素的估計》，第 117 ～ 118 頁。

【64】 馬克斯威爾：《印度的中國戰爭》，第 380 ～ 385 頁。

【65】 同上書，第 391 ～ 392 頁。

【66】 《中印》，第 189 ～ 190 頁；胡青雲：《中印邊界戰爭》，載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黨史研究資料》1990 年，第 11 期，第 614 頁。

【67】 《中印》，第 183 ～ 184 頁；王鹹金：《熱血冰山》，第 99 頁。

【68】 《中印》，第 191 頁。

【69】 有關從中國觀點描述的戰鬥，見《中印》，第 195 ～ 221 頁；王鹹金：《熱血冰山》，第 99 ～ 102 頁（西線）。沙力與閻力：《中國九次大發兵》，第 105 頁。據王書第 98 頁，阿克塞欽的黎明是印度時間上午 4:30，即北京時間 7:00，其西 2,000 里的西藏也用這時間。馬克斯威爾：《印度的中國戰爭》，第 388 頁與《中印》第 198 頁似乎也同意這說法，說東線攻擊於印度時間 5 時，中國時間 7：30 開始。

【70】 同上書，第 222 ～ 254 頁：惠廷：《中國對威懾因素的估計》，第 119 ～ 121 頁。

【71】 同上書，第 392 ～ 394 頁。考爾將軍堅持回家並在那裏繼續指揮他的司令部，在中國人攻擊的那個早晨才放棄這主張；同上書，第 385 ～ 387、400 頁。有關瞭解內情的人對印度高層將領處理局勢不當的情況，見帕利特：《在高高的喜馬拉雅山上的戰爭》，第 231 ～ 275 頁。

【72】 戈帕爾：《尼赫魯》，第 3 卷，第 277 頁的意見與此相反，它說「即令有這樣規模的危機也不會影響到尼赫魯對人民的控制」。

【73】 同上書，第 225 頁；馬克斯威爾：《印度的中國戰爭》，第 405 ～ 422 頁。尼赫魯的談判的先決條件是恢復 1962 年 9 月 8 日以前的狀態，朵拉哨所即於該日被佔。這意味著中國人必須放棄他們新近在軍事上所獲得的好處，並讓印度人重新佔領在前進政策下建立的哨所。周將尼赫魯的建議稱之為「強加在戰敗方」的建議並問中國政府怎麼可能同意呢；引文見上書，第 409 頁。見《中印》，第 255 ～ 267 頁中所述中國對印度外交的看法。

【74】 有關印度在政治上的緊急事態如何必然影響到東線不恰當的軍事準備，見馬克斯威爾：《印度的中國戰爭》，第 417 ～ 428 頁；馬克斯威爾在多處評論說印度部隊戰鬥勇敢、有效，但因將領無能而失敗。所引尼赫魯的話，見第 417 頁。

【75】 馬克斯威爾：《印度的中國戰爭》，第 405 頁；有關周對亞非領導人的遊說，見惠廷：《中國對威懾因素的估計》，第 123 ～ 124 頁。
【76】 同上書，第 127 ～ 128 頁。馬克斯威爾：《印度的中國戰爭》，第 419 ～ 420 頁；戈帕爾：《尼赫魯》，第 3 卷，第 227 頁。惠廷令人信服地說，在尼赫魯拒絕了周恩來的談判要求以後，這篇文章寫得太長、太具體，但如果尼赫魯接受了談判建議，這文章就可能不發表了。有關 1959 年的文章，見《起源》，第 2 卷，第 259 頁；這文章是胡喬木寫的（《胡喬木文集》，第 1 卷，第 618 ～ 644 頁）。自胡因病從 1961 年開始不在任期間，1962 年文章可能是陳伯達寫的，但當我詢問時，與當時中國宣傳工作有關的官員都不能準確回憶起作者是誰。據負責翻譯這文章的人說，該文有二十幾稿，毛、劉少奇和周恩來都修改過，毛是主要修改者。「初稿文風直率、無味、僵硬，後改為更圓滑、含蓄，同時也更傷人，更諷刺，技巧更成熟……最後的文本是一篇小小的訓斥，比正面批評更使印度領導人生氣。」見里頓伯格與貝內特：《幕後的人》，第 263 ～ 264 頁。
【77】 《起源》，第 2 卷，第 8、255 ～ 263、290 頁。
【78】 戈帕爾引用一名斯里蘭卡政治領導人的話，該人曾與毛、劉少奇、周恩來和陳毅談過話，證實他們確實如此敵視；《尼赫魯》，第 3 卷，第 230 頁。
【79】 《中印》，第 270 ～ 280 頁；沙力與閻力：《中國九次大發兵》，第 111 頁；惠特遜：《中國高層司令部》圖 G；國際關係學院編：《中國共產黨名人錄》，第 2 卷，第 225 ～ 226、327 頁。
【80】 由於考爾生病，任命了他的繼任人，但這人只在任幾天，因為尼赫魯顯然想要幫助考爾挽回名聲；馬克斯威爾：《印度的中國戰爭》，第 423 ～ 424 頁。考爾被替換，然後又回任原職只是在中國第一次打擊後東北邊境局高層人士頻繁變動中的一次。不論個別指揮員的素質如何，這種變動在應集中精力於備戰時，反會導致官場的混亂；同上書，第 403 ～ 404、427 ～ 428 頁。
【81】 同上書，第 429 ～ 430 頁。考爾顯然在考慮要得到南韓人和中國國民黨人的幫助。
【82】 戈帕爾：《尼赫魯》，第 3 卷，第 228 頁。
【83】 《中印》，第 282 ～ 342 頁；沙力與閻力：《中國九次大發兵》，第 111 ～ 112 頁；胡青雲：《中印邊界戰爭》，第 615 頁。中國對他們行動的說法還是抵禦印度全面進攻；而考爾在 11 月 14 日的失敗又給他們以比 10 月 20 日更多的理由。
【84】 1959 年經仔細考慮制定的戰略計劃是將印度東北邊境局主要防禦設在靠近平原上後勤和增兵基地的地點，迫使入侵的中國軍隊面臨穿過艱難的喜馬拉雅山區的一條漫長危險的供應線。這計劃被廢棄不用，因為在 1962 年政治形勢下，這看起來像是不發一槍就讓出了印度的領土；馬克斯威爾：《印度的中國戰爭》，第 425 ～ 427 頁。有關印度據守某一地區與相反的意見，見帕利特：《在高高的喜馬拉雅山上的戰爭》，第 256 ～ 257 頁。
【85】 有關邊境戰爭最後幾天印度高級指揮所裏癱瘓狀態的生動、第一手描寫，見上書，第 301 ～ 335 頁。有關瞭解情況的旁觀者的看法，見加爾佈雷恩：《大使的日記》，第 372 ～ 456 頁。
【86】 馬克斯威爾：《印度的中國戰爭》，第 442 ～ 453 頁。在 1962 年戰爭以前，印度高級官員與官僚可能假設，如果燃起戰火，西方可能給予援助；帕利特：《在高高的喜馬拉雅山上的戰爭》，第 88、97 頁。有關梅農不願向美國要求提供武器，見加爾佈雷恩：《大使的日記》，第 378、386 ～ 387 頁。
【87】 惠廷：《中國對威懾的估計》，第 164 頁。在 1964 年，本作者訪問了拉達克的印度部隊，印度認為阿克塞欽是拉達克的一部分。該時，一名印度下級官員說印度發動戰爭去獲取該領土是沒有前途的，但當中國的中央政權像在歷史中多次發生的那樣衰弱了，阿克塞欽就可能收復。中國人自己可能從這次勝利的懲罰性遠征中得出錯誤的結論。1979 年 2 月，鄧小平決定教訓入侵柬埔寨的越南人，用一個傀儡政權取代中國支持的紅色高棉政府。人民解放軍再次設法佔領若干「有爭議」領土，但當單方面撤軍的時候，中國軍隊遭遇久經戰爭考驗

的越南部隊。越南從有力的戰略位置發動攻擊，中國部隊遭受重創。關於中越關係的中方說法，見郭明：《中越關係演變四十年》。
【88】 當毛在 1963 年 2 月聽取喜馬拉雅山勝利的彙報時說，這次勝利的另一個好處是證明瞭人民解放軍抓住了政治；(毛澤東)《學習資料》，第 3、49 頁。
【89】 似乎是周恩來；劉曉：《出使蘇聯》，第 121、122 頁。
【90】 1963年11月2日《人民日報》，引文載於吉廷斯:《中蘇爭論概覽》，第178頁。
【91】 劉曉由在夏天以前任駐印大使的潘自力繼任，是很合適的。
【92】 劉曉：《出使蘇聯》，第 119 ～ 122 頁。
【93】 佛洛德：《毛對抗赫魯曉夫》，第 158 ～ 159 頁。
【94】 劉曉：《出使蘇聯》，第 121 頁；吉廷斯：《中蘇爭論概覽》，第 178 頁。
【95】 劉曉：《出使蘇聯》，第 122 ～ 123 頁。
【96】 外交部外交史編輯室編：《新中國外交風雲》，第 1 卷，第 129 ～ 131 頁。當 18 年後尼克森總統赴華，他還記得那次冷落：「我知道，杜勒斯拒絕在 1954 年日內瓦會議上與他握手，這使周深深受到了屈辱。因此，我走下最後一級梯子向他走去時，我伸出了手。當我們的手握住時，一個時代結束了，而另一個時代開始了。」見《尼克森回憶錄》，第 559 頁。
【97】 劉曉：《出使蘇聯》，第 122 頁。
【98】 惠廷：《中國對威懾的估計》，第 131 ～ 133 頁。馬克斯威爾：《印度的中國戰爭》，第 397 ～ 399 頁；吉廷斯：《中蘇爭論概覽》，第 178 頁。
【99】 1962 年 10 月 24、27 日《人民日報》。
【100】當赫魯曉夫被趕下臺後寫回憶錄時，古巴導彈危機是他寫的第一件事件：赫魯曉夫：《赫魯曉夫論赫魯曉夫》，第 234 ～ 235 頁。
【101】《赫魯曉夫回憶錄》，第 493 頁。
【102】有關赫魯曉夫何時提出導彈計劃，見貝斯洛斯:《危機歲月》，第 382、386 頁。
【103】同上書，第 451、499 頁。
【104】《赫魯曉夫回憶錄》，第 492 ～ 495 頁；《赫魯曉夫回憶錄：最後的遺言》，第 583 頁。據貝斯洛斯：《危機歲月》，第 382 ～ 391 頁，赫魯曉夫說服他最親密的同事米高揚比說服卡斯特羅還要困難，卡斯特羅沒有與赫魯曉夫親自進行激烈的爭論就同意了，這是赫魯曉夫後來寫的。赫魯曉夫與卡斯特羅的分歧在於：赫魯曉夫說部署導彈的主要原因是保護古巴，而卡斯特羅認為，如果這樣，那並不需要導彈，但同意接受這計劃是他將這計劃看成為改變東西方力量對比的一個手段。據祖博克與普列沙科夫：《克里姆林宮的冷戰內幕》，第 261 ～ 262 頁。啟動導彈活動的最後決定是國防委員會於 1962 年 5 月 24 日作出的，赫魯曉夫為共同負責，堅持出席者全都在命令上簽字。
【105】貝斯洛斯：《危機歲月》，第 430 頁。
【106】有關危機的發展過程，見上書，第 431 ～ 575 頁；有關俄國的經濟代價與後來承認受到了屈辱，見上書，第 562 ～ 563 頁；有關赫魯曉夫認為這是個勝利，見《赫魯曉夫回憶錄》，第 498、504 頁。在 504 頁上，這位已故的蘇聯領導人說「加勒比危機是蘇聯外交政策的勝利，也是我作為政治家和集體領導成員的個人事業的勝利。我認為我不費一槍一彈就取得了巨大的勝利!」赫魯曉夫還說，蘇聯船隻不顧封鎖，繼續將軍事設備運交古巴；同上書，第 496 頁。有關從蘇聯時期的檔案中找出蘇聯與古巴關係的新證據，包括赫魯曉夫擔心古巴可能與北京關係更密切，見「1962 年古巴導彈危機」《冷戰時期世界歷史公告》1995 年春季，第 5 期，第 58 頁。
【107】張德群：《在莫斯科六年半》，載《中共黨史資料》1996 年 6 月第 58 期，第 38 頁；貝斯洛斯：《危機歲月》，第 430 頁。
【108】惠廷：《中國對威懾因素的估計》，第 151 頁。
【109】當然，中國對美國事先瞭解導彈情況的態度要比赫魯曉夫現實，見上書。
【110】在冷戰期間，另一次兩個危機同時發生在 1956 年 10 月～ 11 月間。當時匈牙利叛亂被蘇聯人鎮壓和以色列、美國與法軍部隊對埃及的攻擊同時發生。在這次，二次危機都醞釀了一段時間，但莫斯科與倫敦、巴黎和特拉維夫的領導人

都無疑會感謝，他們冷戰時期的對手的注意力分散了，他們得以繼續執行他們的政策。有關對此的簡短評論，見凱爾：《蘇伊士》，第 376 ～ 377 頁。不可能有什麼事會阻止蘇聯派坦克到匈牙利去，但納吉總理看到西方被蘇伊士問題分散了精力、意見也不一致，一定感到失望；而尼赫魯則可能得到了好處，因為導彈危機強調西方必須團結一致、對之做出反應（他也像納吉一樣請西方予以幫助），也必須與任何地方的共產主義的威脅作鬥爭。

【111】中國改變對蘇聯的態度，顯然是因為毛又掌握了外交事務，從北京宣傳工作對結盟的看法可以看出這點：《人民日報》最後一次紀念 1950 年中蘇條約是在 1961 年，在 1962 年該條約仍在外交部的雜誌《世界知識》的短文中提及；到 1963 年，宣傳家們就不提該條約了。見張居連：《宣傳與理解：蘇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價值，1950-1960》，未出版，哲學博士論文，哈佛大學，1995 年，第 5 章。

【112】吉廷斯：《中蘇爭論概覽》，第 179 頁。

【113】達林：《國際共產主義中的分歧》，第 660 頁。

【114】吉廷斯：《中蘇爭論概覽》，第 181 ～ 183 頁。蘇聯人也可以反駁說，1958 年炮轟沿岸島嶼後沒有繼之以進攻也同樣是冒險主義和投降主義，雖然毛所受的屈辱不像赫魯曉夫所受的那麼明顯。

【115】北朝鮮、緬甸和馬來西亞的黨在代表大會上是站在中共一邊的。日本、印尼和愛爾蘭的黨沒有提阿爾巴尼亞；達林：《國際共產主義中的分歧》，第 661 頁。

【116】伍修權：《回憶與懷念》，第 344 ～ 348 頁。

【117】格里菲斯：《阿爾巴尼亞與中蘇分裂》，第 165 頁。

【118】伍修權：《回憶與懷念》，第 348 頁。

【119】同上書，第 349 ～ 352 頁。伍解釋說，在外交辭令中，「遺憾」帶有抗議的語氣。

【120】同上書，第 352 頁。波蘭人有理由比中國人高興，因為他們認為北京的幹預對阻止蘇聯在 1956 年推翻波蘭的領導是極為重要的；見當時波蘭托蘭斯卡第一書記奧恰布的證詞：《他們：斯大林在波蘭的傀儡》，第 67 ～ 76 頁。

【121】伍修權：《回憶與懷念》，第 358 ～ 359 頁；達林：《國際共產主義中的分歧》，第 662 頁。

【122】疑心極重的霍查一直在注意中國倒退的證據，他認為中國在義大利代表大會上的講話是「很好的強硬的講話」，他認為東歐各代表大會上對中共的攻擊是「以流氓手段進行的」，但他仍然不相信中共顯然理智的語氣有什麼價值；霍查：《關於中國的反思》，第 30 ～ 32 頁。

【123】佛洛德：《毛對抗赫魯曉夫》，第 161 頁。這些文章可能是康生作為新的反蘇爭論的主持人的第一批成果。

【124】達林：《國際共產主義中的分歧》，第 663 頁。

【125】伍修權：《回憶與懷念》，第 353 頁。

【126】達林：《國際共產主義中的分歧》，第 663 頁。

【127】伍修權：《回憶與懷念》，第 353 ～ 356 頁。這聲明收入達林《國際共產主義中的分歧》第 664 ～ 667 頁。伍公然走上主席臺，當時諾沃提尼正在發表總結報告，伍要求主席同意在諾沃提尼讀過後予以散發。吃驚的主席將聲明交給諾沃提尼，諾看了一眼，中斷了他的講話，很不高興地宣讀了這聲明，這使中共代表團大為高興。

【128】這可以從原應是友好的告別午宴上中國代表團與捷克主人之間的一場長達 5 小時的舌戰中看出；伍修權：《回憶與懷念》，第 357 ～ 358 頁。

【129】達林：《國際共產主義中的分歧》，第 2 ～ 3、745 ～ 746 頁；將蒙古提升的正式理由是它已是經互會的成員，經互會是蘇聯與東歐衛星國之間的經濟聯盟。

【130】伍修權：《回憶與懷念》，第 358 ～ 359 頁。

【131】同上書，第 360 頁。伍可能混淆了因果關係。東德制定的正式規定是外國代表要發言，必須得到 20 名東德黨員的支持。北朝鮮和印尼抗議不讓他們在會上發言，但無效；見達林：《國際共產主義中的分歧》，第 746、762 頁。

【132】同上書，第 750 頁。
【133】伍修權：《回憶與懷念》，第 359～365 頁；達林：《國際共產主義中的分歧》，第 761～762 頁。後一份資料說伍穿了一身西服而不是通常的中式服裝，這說明他想要對中國不理解西方情況的隱晦的指責作出反應。

第十四章 毛負全責

【1】見第 19 章。
【2】我未將七屆中央委員會的歷次全會包括進去，因為在 1954 年底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並召開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以前，中共領導人似乎仍忙於穩定政權的任務：即掌握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各部分。
【3】1956 年黨章第 36 條；《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檔》，第 108 頁。
【4】《起源》，第 1 卷，第 171～172 頁。這次全會以前沒有召開工作會議。這有二個原因：事情很急，毛一貫認為外交（不同於國內）政策的決定基本上是他一個人的事，只用徵求少數親密同事的意見。
【5】同上書，第 3、4 篇。
【6】這例外是 1958 年 5 月第八次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以前的四中全會到第二次會議以後的五中全會之間有 3 個星期的空隙。事實上，第二次會議起了全會的作用，而其後的二次全會則更多是出於形式。例如，五中全會類似一中全會，它唯一重要的任務就是在代表大會後選出新的政治局委員。
【7】《起源》，第 2 卷，第 2、3 章。
【8】同上書，第 128～135 頁。
【9】同上書，第 172～173 頁。
【10】同上書，第 3 編。
【11】鄧子恢、王稼祥、習仲勳和賈拓夫與其他在十中全會上倒臺的人的級別當然不像彭德懷和劉少奇那樣高，但他們被清洗仍然代表著相當大的變動。
【12】廖蓋隆、趙寶煦和杜青林：《當代中國政治大辭典 1949-1990》，第 385 頁，小心謹慎地稱黨章「結合了國內、國際經驗」。
【13】《問題與研究》1973 年 11 月，第 96 頁。
【14】佩珀：《為新秩序進行的教育》，《劍橋中國史》，第 14 卷，第 197～203 頁。
【15】見星火燎原編輯部編：《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帥名錄》中傳記所附照片。
【16】《起源》，第 2 卷，第 36～40、333～335 頁。
【17】有關對該建築物、傢俱與用途的描述，見吳冷西：《憶毛主席》，第 1～3 頁。
【18】《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9 冊，第 432 頁。
【19】知情者 A。
【20】李銳：《「大躍進」經歷記》。
【21】據他的秘書之一林克《新華月報》1993 年第 3 期，第 25 頁；林克、徐濤、吳旭君：《歷史的真實——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真言》，第 235 頁。
【22】吳冷西：《憶毛主席》，第 145、151～152 頁。
【23】有關該制度在卡特政府中執行情況，見布熱津斯基：《權力與原則》，第 57～74 頁。
【24】大多數受過教育的中國人在被人問到時，都會說中國駐外記者都參與了該國的情報活動。見費利戈特與考佛：《中國的秘密工作》，第 131 頁。本作者認識的一位駐外記者後來成了國家安全部的副部長。
【25】有關早期對這些出版物的討論，見許華茲《參考資料：中國官員對外部世界瞭解多少》，載《中國季刊》1966 年第 27 期，第 54～83 頁。
【26】《冷戰國際史第 6～7 號公告》1995-1996 年冬季刊，第 168 頁。
【27】知情者 A。

【28】 對撒切爾首相的這個評論是她最親密的同事說的，他說她缺乏「組織洞察力」：「她在工作中的成功不僅取決於她所承認的那樣，歸功於像內閣秘書羅伯特·阿姆斯壯爵士那樣的人的官場技能」，豪：《忠誠的衝突》，第 147 頁。
【29】 巴特利特：《皇帝與大臣》，第 28～29 頁。
【30】 在 1957 年百花齊放運動期間，一位教授批評毛的巡視：「他們怎麼可能瞭解真實情況？至多他們可以巡視黃河，在長江裏游泳……即令他們與農民談話，農民也不會講真話，而只能說『毛主席偉大』」；麥克法夸爾：《百花齊放運動與中國知識分子》，第 108 頁。
【31】 《起源》，第 1 卷，第 27～29、57 頁；第 2 卷，第 20～50、77～82 頁。
【32】 有關「內廷」與「外廷」的摩擦，見巴特利特：《皇帝與大臣》，第 1 章。
【33】 本節是根據對《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前 6 冊的分析而寫出的。
【34】 有關皇室制度，見巴特利特：《皇帝與大臣》，第 44 頁。
【35】 毛早期文章中最著名的一篇是《組織起來》，《選集》第 3 卷，第 153～161 頁。（譯：這是英文本上的頁數，已查對過）
【36】 見《起源》，第 2 卷，第 59～63 頁。
【37】 十中全會上，書記處的權力縮小的明顯徵候是撤銷了中央農村工作部而將其職能轉到國務院下屬農林辦公室。但在這一官僚機構改變的同時，由書記處書記譚震林取代鄧子恢成為農林辦公室主任，似乎保留了書記處對農業問題的監督權。鄧子恢被黜是明顯的，但不清楚的是以這種方式來罷黜他，是否為了保全他的面子，還是一個信號，說明以後管理農業就是要增加生產，而不是改變農村的社會主義制度。有關周對書記處的報告，見《黨的文獻》1995 年，第 3 卷，第 37 頁。有關以後對政府工作的描述，見《中國政府工作概要》。
【38】 有關中國領導人參與 1949 年以後政治的詳細報道，在正常情況下，是在他去世後才發表的。
【39】 幾乎可以肯定自從 1959 年彭德懷元帥被罷黜後，黃在書記處是不起任何作用的，因為他被斥為所謂彭的「軍事俱樂部」的成員；《起源》，第 2 卷，第 239、242 頁。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譚政也在十中全會上離開書記處，在廬山會議後人民解放軍的清洗中被黜，他在 1960 年 10 月被指責為繼續推行彭德懷的政策，反對在林彪領導下的新軍委。他由前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取代。見《解放軍將領傳》，第 7 卷，第 507～508 頁。
【40】 見上書，第 2 卷，第 287 頁。
【41】 衡量國務院的地位的一個辦法是看它活動的多少。它在 1954 年底成立後的 3 年裏，平均每年舉行 21 次會議，文化大革命前最多的一年是 1957 年，達 26 次會議。在大躍進的第一年，1958 年，中央政府的職權分散到省，各省第一書記向書記處負責，國務院的會議次數降至 16 次，1959 年，又降至 9 次。1960 年又升為 15 次，這可能反映書記處的兩名領導人鄧和彭真專注於中蘇爭論（《起源》，第 2 卷，第 293 頁），因為在 1961 年，會議次數又降至 7 次。在 1962 年權力又集中於中央後，國務院會議次數又開始增加，1963 年達 15 次（這時鄧與彭忙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並重新與蘇聯談判），然後又開始下降，1965 年只有 8 次會議，雖然該年政府正準備於 1966 年開始執行第三個五年計劃。見張：《共產黨中國的國務院》，第 68 頁。
【42】 《起源》，第 2 卷，第 61 頁。

附錄 3：獨裁角色和獨裁風格的比較

【1】 烏拉姆：《布爾什維克》，第 219 頁。
【2】 查皮羅：《蘇聯共產黨》，第 314-315 頁，第 447 頁；塔克：《斯大林黨政》，第 123 頁；範塞德：《俄國如何管理》，第 184 頁。
【3】 龔育之，逄先知 & 石仲泉：《毛澤東的讀書生活》，見全書。
【4】 李：《毛主席的私生活》，見全書。

【5】 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第 405 頁，布洛克引用希特勒的設計師阿爾伯特·斯皮爾的話：「我要問自己，希特勒到底何時工作？」斯皮爾本人關於希特勒的餐桌社交圈，見《第三帝國內部》，第 176=195 頁。
【6】 沃爾科戈諾夫：《斯大林：勝利與悲劇》，第 147 頁。
【7】 塔克：《斯大林黨政》，第 124-125 頁。
【8】 沃爾科戈諾夫：《列寧》，第 272 頁；關於希特勒，參見史蒂芬·金澤的報導：《貝希特斯加登雜誌：一塵不染的阿爾卑斯山風光，魔鬼的遺產》，《紐約時報》，1995 年 9 月 13 日。
【9】 李，諾莫夫 & 赫列夫紐克：《斯大林寫給莫洛托夫的信》，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斯大林的下屬在他離開期間，有相當大的自由度。
【10】 沃爾科戈諾夫：《斯大林：勝利與悲劇》，第 217 頁。
【11】 布拉奇：《德國的獨裁統治》，第 297；布洛克：《希特勒和斯大林》，第 404 頁。
【12】 托蘭：《阿道夫·希特勒》，第 374-375 頁。有趣的是，這四位領導人的工作習慣，跟他們本國傳統意義上的國民性格，都有著強烈的反差——中國和德國性格特點是：紀律嚴明，勤勞吃苦，尊重權威；俄羅斯國民特點：效率低下，激情感性，自由散漫近乎無政府主義。然而，列寧卻有德國人的血統，這對於他的傳記作家而言是十分尷尬的事實，他母親是伏爾加德國人的後裔；馬達里亞加：《凱瑟琳大帝時代的俄國》，第 361-363 頁中簡短描述了這一脈的源起，後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斯大林驅趕至亞洲。亦見：沃爾科戈諾夫：《列寧》，第 8-10 頁。關於列寧的蘇聯傳記作家在這方面的困難，見菲舍爾：《列寧的一生》，第 2-3 頁。關於中國，見巴特菲爾德：《中國》，第 280-285 頁；關於俄羅斯，見梅納特：《蘇聯人和他的世界》，第 30 頁；史密斯：《俄羅斯人》，第 150 頁；凱撒：《俄羅斯》，第九章，《經濟：有計劃的低效》。關於俄國和中國的對比，見肖特：《龍與熊》，第 28-35 頁。關於俄羅斯和德國，見史密斯：《俄羅斯人》，第 362 頁，亦見史蒂芬·厄蘭格關於伏爾加德國人的首頁報導，《紐約時報》，1993 年 5 月 9 日；在後一份材料中有這樣的話：「德國人比俄羅斯人做事好，她（一位伏爾加德國人）說，反襯出俄羅斯人自身的一個共同點。這就是最初德國人被邀請的俄羅斯的理由。」毛所稱的「官僚主義」問題自然對所有國家都不陌生，包括這三個；關於中國，見馬修：《十個億》，第 183-206 頁。
【13】 布洛克：《希特勒》，第 349 頁；菲斯特：《第三帝國的面孔》，第 77-78 頁；布拉奇：《德國的獨裁統治》，第 297 頁。
【14】 引自布洛克：《希特勒和斯大林》，第 150 頁。
【15】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 28 頁。
【16】 參閱斯達：《繼續革命》，第 300-307 頁；以及希特勒的話：「權力的征服是永不停息的過程……至關重要的不是對權力的攫取，而是對人的教育。」（引自布洛克：《希特勒和斯大林》，第 431 頁。）
【17】 引自施拉姆：《毛澤東思想》，第 167 頁。
【18】 李：《毛主席的私生活》，第 463 頁。
【19】 布洛克：《希特勒和斯大林》，第 374 頁。
【20】 施拉姆：《毛的權力之路》第 1 卷，第ＸＸⅷ - ＸＸＸⅱ頁，第 175-313 頁。
【21】 同上，第 263-264 頁。
【22】 施拉姆：《毛澤東思想》，第 17 頁。
【23】 毛最有名的其中一篇講話的題目，發表於 1945 年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閉幕會議上；《毛澤東選集》第 3 卷，第 312-323 頁。當然，人類事務的意志力不僅局限於獨裁統治。例如，溫斯頓·邱吉爾就曾於 1940 年斷然壓制內閣中要求與希特勒談判謀求和平的傾向，因為他強烈相信勝利勢不可擋，相信他本人的個性力量；邱吉爾越過搖擺不定的懷疑者，以他煽動人心的演講號召人民，那些懷疑者再也發不出聲音。參見查姆雷：《邱吉爾：榮耀的結束》，第 396-419 頁。

【24】 李：《毛主席的私生活》，第 443 頁；布洛克：《希特勒和斯大林》，第 383-386 頁。
【25】 同上書，第 376,444 頁。

第十五章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519 頁。
【2】 《北京週報》1962 年第 39 期，第 5～8 頁；引文載第 6 頁上。
【3】 1963 年 1 月 11 日《人民日報》；引文載鮑姆：《革命的前奏》，第 17～18 頁。
【4】 這些文件為國民黨 1964 年獲得；鮑姆：《革命的前奏》，第 12 頁。中文文本見國防部情報局編：《反共遊擊隊突擊福建連江俘獲匪方文件彙編》；其中大部分譯文載於陳（編）《連江的農村人民公社》；該書另有一些其他文件。連江是省特別小組發動社教運動的三個地方之一，另二個地方是廈門和南安；「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編：《當代中國的福建》，第 1 卷，第 133 頁。
【5】 陳：《連江的農村人民公社》，第 109～110 頁。
【6】 張向凌：《黑龍江四十年》，第 333 頁；《當代中國的山東》，第 1 卷，第 226 頁；《當代中國的四川》，第 1 卷，第 122 頁。
【7】 《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第 441 頁。這二人都曾在毛寵愛的王任重手下在湖北工作過，這可能就是為什麼主席單獨提到他們，而不提第一書記們。劉子厚從 1949 年起在湖北工作，50 年代任第二書記與省長，後來才調至他的老家河北，他當時任第二書記。劉出生保定地區（劉出生於邢臺地區任縣——編者），對該地區的試點毛曾表示讚賞。王延春也是河北人。50 年代中在湖北工作，1960 年任第二書記。1962 年初調湖南。見《中共人名錄》第 240 頁；《共產黨中國名人錄》，第 1 卷，第 464～465 頁；第 2 卷，第 703 頁；盛平：《中國共產黨人名大辭典（1921-1991）》，第 50、179 頁。
【8】 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 24 卷，第 168～169 頁。
【9】 同上書，第 169～171 頁。
【10】 該年晚些時候，安徽省也宣稱從資本主義道路中解脫出來了，同上書，第 182～184 頁。
【11】 據毛稱，保定小組原準備處理分配問題，在群眾壓力下發動了「四清」運動；《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第 443 頁。
【12】 「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編：《當代中國的河北》，第 1 卷，第 111～112 頁。
【13】 《中國黨史專題講義》，第 158 頁。
【1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0 冊，第 255～258 頁；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黨史》，第 302～303 頁；馬齊彬等：《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第 230 頁。該會也討論了 1963 年經濟計劃；小學四十條和中學五十條。以上檔文本，見《教育年鑒》，第 699～705 頁；這些文件於 1963 年 3 月 23 日傳閱（《教育大事記》，第 328～329 頁）。
【15】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527 頁。
【16】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107 頁；中共關於與修正主義作鬥爭的檔是根據劉的報告寫的；同上書，第 1146 頁。
【17】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527 頁。這一資料往往是準確的，但根據一個省的資料，五反運動是在 1 月份開展的，而另一個省則說是 3 月 1 日；湖北省地方誌編撰委員會編：《湖北省志：大事記》，第 678 頁；張向凌：《黑龍江四十年》，第 332 頁；《中共黨史專題講義》，第 159 頁。毛可能對中央組織部 1962 年 12 月的報告表示關心，該報告稱他對七千人大會的講話已引起要多民主，少集中；多自由，少紀律的要求；《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0 冊，第 241 頁。關於 1951 年 -1952 年第一次五反運動，見林蘊輝、樊壽星與張恭：

《1949-1989 中國，I：凱歌行進的時期》，第 251 ～ 261 頁；鮑大可：《共產黨中國：早期的歲月 1949-1955》，第 135 ～ 171 頁。
【18】 馬雲飛：《劉少奇與 60 年代的國民經濟調整》，載《中共黨史研究》1988 年第 5 期，第 13 頁。據另一份資料，這一決議是在周恩來提議下，但直到 1963 年 9 月作出的；國防大學：《七十年簡介》，第 513 頁。
【19】 如貴州省黨委在十中全會和 2 月工作會議後都曾召開會議，但只是在 2 月工作會議後才開始談論社會主義教育；見《貴州省志：大事記（1949-1985）》（傳閱徵求意見稿），第 103、105 頁。
【20】 淮濱縣志辦公室編：《淮濱縣志（1951-1983）》，第 28 頁。1962 年河南響應十中全會號召將 90 個縣的三級幹部會議材料送中央。這些文件稱早些時候好的年成使人們不能充分理解需要階級鬥爭，但現在階級鬥爭已充分暴露了；「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編：《當代中國的河南》，第 1 卷，第 148 頁。
【21】 《農業集體化》（下），第 674 ～ 679 頁。
【22】 「當代中國的江蘇」委員會與江蘇省檔案局編：《江蘇省大事記 1949-1985》，第 233、234、235 頁。
【23】 黑龍江動作遲緩可能是由於負責運動的高層的效率不高。天津的黨也約在同時，即 4 月 25 日在當地工業與運輸單位會議上討論五反運動，國家經濟委員會召開了一個全國範圍的類似會議上，天津會議即以此為基礎；《天津經濟建設大事記》，第 192 頁。
【24】 張向凌：《黑龍江四十年》，第 332 ～ 335 頁。
【25】 赫為民：《內蒙古自治區》，第 216 頁。
【26】 有關雷鋒是怎樣被樹為典型的，見舒雲：〈是否宣傳雷鋒曾有一場爭議〉，載《炎黃春秋》1993 年 5 月 11 日，第 4 ～ 9 頁。
【27】 李明：《共和國歷程大寫真》（上），第 366 ～ 369 頁。
【28】 見林克在 1993 年 3 月 5 日《人民日報》於雷鋒運動 30 週年時寫的文章，轉載於《新華月報》1993 年第 3 期，第 25 ～ 26 頁。同時刊登的《人民日報》社論（同上書，第 24 ～ 25 頁）稱雷鋒在當前仍有意義，並公佈了 30 年間在雷鋒運動中獲先進稱號的單位與個人名單（同上書，第 21 ～ 23 頁）。
【29】 引文見謝里登《英雄的競爭》，載《中國季刊》1968 年，第 33 期，第 52 ～ 53 頁。有關雷鋒簡歷，見廖蓋隆等：《新中國編年史》，第 212 ～ 213 頁。有關駐北京的外國記者對雷鋒運動的諷刺性介紹，見馬爾庫塞：《北京報紙》，第 235 ～ 246 頁。在中國教英語的美國人的記述更具同情色彩，見密爾頓 & 密爾頓：《風不止息》，第 63-69 頁。
【30】 劉賓雁：《第二種忠誠》，第 197-199 頁。
【31】 如，在東北；《農業集體化》（下），第 672 頁。
【32】 同上書，第 689 頁；鮑姆與泰偉斯：《四清：1962-1966 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第 66 頁。
【33】 主要人物原來是彭真與各大區第一書記柯慶施（華東）、李井泉（西南）、陶鑄（中南）以及江華（浙江第一書記，會議即在浙江省會舉行）。後來又有其他大區第一書記參加：宋任窮（東北）、李雪峰（華北）和劉瀾濤（西北），此外還有陳伯達與胡耀邦（西北第三書記）。最後，周恩來和鄧小平在會議結束時也參加了。見鄭謙與韓鋼：《晚年歲月：1956 年後的毛澤東》，第 246 頁。
【34】 劉在 4 月 12 日至 5 月 16 日正出國訪問；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530 頁。在訪問印尼時，劉的妻子王光美戴著珍珠項鏈，穿著旗袍而不是通常的外衣，為此文化大革命中在紅衛兵的鬥爭會上被指責。
【35】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530 頁。這份資料認為（二人）已有潛在的差別了，但本章認為《前十條》的內容說明毛還沒有認識到他應對最高層而不是下層擔憂。這份資料也沒有暗示在劉不在國內時召開這會議有政治上的考慮；對這認識，我要感謝黃敬的提醒。有關劉提出進行延安式的教育，即學生下鄉對農民進行教育，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9 冊，第 515 ～ 516 頁。

【36】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107 ～ 1108 頁；《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第 73 頁；知情人 E。田家英未受邀參加這次會議，也未參加 2 月份的會議（同上書），這是毛不信任他的一個信號。
【37】 《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第 444 頁。
【38】 毛原來說團結 90%，但周恩來勸他將可能的敵人從人口的 10%減為 5%；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109 ～ 1110 頁。
【39】 《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第 445 頁；但毛《思想集叢》第 2 卷，第 322 頁的譯文則完全相反。
【40】 《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第 438 頁。
【41】 同上書，第 443 頁。
【42】 鮑姆與泰偉斯：《四清》，第 58 ～ 70 頁。本卷的譯文是根據中國國民黨在襲擊連江時所得的文本（同上書，第 9 ～ 10 頁）；《前十條》的官方文本見《農業集體化》（下），第 680 ～ 693 頁。毛對浙江文件之評價見該書，第 693 ～ 694 頁。
【43】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0 冊，第 285 ～ 289、292 ～ 309 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109 ～ 1110 頁。
【44】 《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第 445 頁。當地黨的官員徵稅太多，一貧農公開說，在類似情況下 1949 年前地主比這些官員對他還好；見吳與李：《一滴淚》，第 304 ～ 305 頁。
【45】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106 頁；《起源》，第 1 卷，第 295 ～ 297 頁。
【46】 《農業集體化》（下），第 671 ～ 672 頁。
【47】 見 1965 年初在中國訪問的法國記者的報告，卡洛爾：《中國：另一個共產主義》，第 165 ～ 172 頁。
【48】 《農業集體化》（下），第 672 ～ 674 頁。
【49】 鮑姆與泰偉斯：《四清》，第 70 頁。
【50】 見 1958 年 7 月 1 日中共成立紀念週年之《人民日報》社論《農民問題仍然是根本問題》。
【51】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110 ～ 1111 頁。
【52】 同上書，第 1109、1111 ～ 1112 頁。有關 1963 年夏的「試差法」情況，見鮑姆：《革命前奏》，第 28 ～ 42 頁；《江蘇省大事記》，第 236 ～ 237 頁。
【53】 知情人 E。
【54】 《問題與研究》1970 年 6 月期，第 95 ～ 96 頁。
【55】 《人民手冊》1964 年，第 343 ～ 353 頁。
【56】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112 頁。顯然，除了周恩來，所有活躍的高級黨的領導人都參加了《後十條》的起草，然而中國的資料卻對負責起草人的說法不一：一份資料說劉少奇和彭真負責起草；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531 頁；第二份資料說鄧和譚負責；《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第 74 頁；第三份資料說鄧和彭；知情人 E。文化大革命期間的資料，如薄一波的，則稱《後十條》的基礎是彭真給毛的一份報告，而起草則由鄧領導；鮑姆：《革命的前奏》，第 43 頁。薄似乎是唯一提到譚的作用的人。有關毛的不滿，見下書第 18 章。有關毛參加起草情況，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0 冊，第 386 ～ 393 頁。
【57】 鮑姆與泰偉斯：《四清》，第 72 頁。以後，該檔不時出現下列詞句「毛澤東同志精闢和明確地解釋說……」，「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指示……」，「……反覆學習了毛澤東同志的指示……」，「毛澤東同志反覆指示我們……」，「毛澤東同志的指示……應直接傳達給幹部和群眾……」，「……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等，同上書，第 72、73、75、76、78 頁。另見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531 頁。
【58】 這是在一切政治體制中的正常技巧。在英國財政大臣勞遜與總理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之間 80 年代末就匯率政策的長期爭論中，他和他的顧問提出了一份縮小分歧的報告。勞遜後來寫道，該報告「既表達了我的，也表達了他的觀

點。但在文中又作了讓步，設法將瑪格麗特的觀點包括在內」。勞遜：《11 號的觀點》，第 831 頁。

【59】 鮑姆辯稱，「應該承認《後十條》內充滿著合法主義、自由主義和政治容忍的語調，這可能起了不聲不響破壞毛關於階級鬥爭的論點精神（如果不是論點的文字）」。《革命的前奏》，第 59 頁。

【60】 《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第 437 頁。

【61】 同上書，第 441 頁。

【62】 《前十條》的前言稱「我們對於農村工作存在的問題是經過了建國以來的 13 年的實踐，才能寫出一個比較完整的文件」，《後十條》的第 1 條將社教運動說成是「甚至比土地改革運動更要複雜」。鮑姆與泰偉斯：《四清》，第 58、75 頁。

【63】 有關毛澤東贊成的那種土改的例子，見欣頓《翻身》，書中描述了在共產黨建立政權以前，在老解放區進行的過程。

【64】 鮑姆與泰偉斯：《四清》，第 63、70 頁。

【65】 同上書，第 77 頁。

【66】 毛澤東將《前十條》的起草工作由彭真改為由陳伯達負責的原因顯然是他要的是一份短些、尖銳的文件；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108 頁。

【67】 鮑姆與泰偉斯：《四清》，第 73 ～ 91 頁。

【68】 同上書，第 79 頁。薄一波稱前、後十條的最重要的差別是（後十條）詳細講了如何團結 95% 的群眾與幹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113 ～ 1114 頁。

【69】 有一篇小說根據作者第一手觀察到的材料，反映了在社教運動中妒忌所起的作用和壞的階級成份的永遠影響，見古華：《芙蓉鎮》；有關社教運動中一名幹部誣告對手偷竊的實際記述，見陳、馬德森與昂格爾：《陳莊》，第 35 ～ 40 頁。

【70】 關於農民抵制重新劃分地主子女成份，見李：《毛主席的私生活》，第 428-429 頁。無疑，在新的運動來臨時，有現成的目標是很方便的，如果老目標沒有了，就得找一個新目標，而這樣，（誰成為新目標）前景就是難以確定的。

【71】 鮑姆與泰偉斯：《四清》，第 82 ～ 89、91 ～ 94 頁。

【72】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113、1114 ～ 1115 頁。

【73】 鮑姆與泰偉斯：《四清》，第 75、83 ～ 84 頁。

【74】 同上書，第 66 頁。

【75】 同上書，第 64 頁。

【76】 同上書，第 75 頁。

【77】 哈丁：《組織中國》，第 205 頁。

【78】 鮑姆與泰偉斯：《四清》，第 74、90 ～ 91 頁。

【79】 《起源》，第 1 卷，第 112 ～ 116、189 ～ 191 頁。

【80】 《起源》，第 2 卷，第 51 ～ 55 頁。

【81】 哈丁：《危機中的中國》，載《劍橋中國史》，第 15 卷，第 134 ～ 138 頁。

【82】 鮑姆：《革命的前奏》，第 178 頁，注 3。

第十六章 中蘇決裂和越南戰爭

【1】 伍修權：《回憶與懷念》，第 366 頁；佛洛德的《毛與赫魯曉夫的對抗》一書詳細記錄了辯論的過程及所引用的主要檔的話，見第 326 ～ 395 頁。

【2】 格里菲斯：《中蘇分裂》，第 105 ～ 106、108 頁。

【3】 赫德遜、洛溫索爾和麥克法夸爾：《中蘇論戰》，第 202 ～ 203 頁。

【4】 引文見格里菲斯：《中蘇分裂》，第 106 頁。

【5】 同上書，第 107 ～ 108 頁。

【6】 關於這個問題見《起源》，第 2 卷，第 7 ～ 11、255 ～ 292 頁。

【7】 格里菲斯：《中蘇分裂》，第 110 ～ 111 頁。

【8】 北越、日本、印度尼西亞、印度、英國和新西蘭等國的共產黨帶頭建議召開會議，避免中蘇兩黨分裂。見吉廷斯：《中蘇論戰概觀》，第 184 ～ 185 頁；有關這些國家共產黨在中蘇辯論的問題上採取的立場—親蘇、親中和中立—的評論，見格里菲斯：《中蘇分裂》，第 120 ～ 123 頁。
【9】 佛洛德：《毛與赫魯曉夫的對抗》，第 371 ～ 374、392 頁。毛建議赫魯曉夫擬議訪問柬埔寨時在北京停留。對此，蘇共指出，蘇聯已發表公開聲明，訪問柬埔寨的是勃列日涅夫，不是赫魯曉夫。見該書第 395 頁。
【10】 佛洛德：《毛與赫魯曉夫的對抗》，第 390 ～ 393 頁。
【11】 同上書，第 395 ～ 396 頁；伍修權：《回憶與懷念》，第 367 頁。
【12】 格里菲斯：《中蘇分裂》，第 114 ～ 119 頁。
【13】 《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第 3 ～ 45 頁。
【14】 伍修權：《回憶與懷念》，第 366 頁；葉永烈：《陳伯達其人》，第 208 頁。
【15】 阿爾巴托夫：《社會體制》，第 95 頁。
【16】 佛洛德：《毛與赫魯曉夫的對抗》，第 406 ～ 424 頁。
【17】 伍修權：《回憶與懷念》，第 367 頁；蘇斯洛夫不僅是蘇共的權威理論家，還是當時蘇共主席團（政治局）中國委員會的主席。這是自 1925 年以來一個高級別的委員會：知情人 F。
【18】 同上書，第 368 ～ 369 頁。
【19】 霍查：《對中國的思考》（一），第 44 頁。
【20】 同上書，第 44 ～ 45 頁。陳毅在 1960 年在中國內部也採取了類似的路線。
【21】 伍修權：《回憶與懷念》，第 370 頁。
【22】 同上書：格里菲斯：《中蘇分裂》，第 149 ～ 153 頁；佛洛德：《毛與赫魯曉夫的對抗》，第 423 ～ 429 頁。伍給人的印象是他對這些爭論，既譴責了莫斯科，也譴責了北京。
【23】 伍修權：《回憶與懷念》，第 371 頁。伍用這句話顯然是贊成當時西方對此的評論。
【24】 在第一輪會談中，蘇斯洛夫宣讀了長達 70 頁的發言稿。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588 ～ 589 頁。
【25】 阿爾巴托夫：《社會體制》，第 94 頁。
【26】 伍修權：《回憶與懷念》，第 371 ～ 372 頁。蘇共代表團有這樣一個印象，中共代表團用密碼電報將蘇聯的發言稿和評論傳回國內，然後等待指示，國內最後的定稿在第二天的會議上發表；阿爾巴托夫：《社會體制》，第 94 頁，阿爾巴托夫沒有說明這種印象是否來自監視中國通訊的蘇聯情報機構。
【27】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589 頁。劉金田主編：《鄧小平的歷程》（二），第 117 ～ 119 頁，簡要記述了鄧小平在這次會談中的作用。
【28】 伍修權：《回憶與懷念》，第 371 頁。
【29】 阿爾巴托夫：《社會體制》，第 95 頁。
【30】 《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第 4 ～ 7 頁；
【31】 同上書，第 6 ～ 12 頁。
【32】 同上書，第 13 ～ 17、24 ～ 25 頁；引文在第 13 頁。
【33】 同上書，第 21 ～ 24 頁。
【34】 同上書，第 25 ～ 29 頁。
【35】 同上書，第 25 ～ 29 頁。
【36】 同上書，第 30 ～ 33 頁。
【37】 同上書，第 33 ～ 39、48 ～ 50 頁。
【38】 同上書，第 39 ～ 40 頁。
【39】 同上書，第 42 ～ 45 頁。
【40】 同上書，第 45 ～ 48 頁。
【41】 同上書，第 50 ～ 52 頁。
【42】 同上書，第 526 ～ 529 頁。

【43】 見格里菲斯：《中蘇分裂》，第 157 頁；書中簡要介紹了蘇聯對近年社會主義陣營歷史的看法。
【44】 《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第 529 ～ 538 頁。
【45】 同上書，第 539 頁。
【46】 同上書。
【47】 同上書，第 563 頁。
【48】 同上書，第 570 ～ 571 頁。
【49】 見《起源》，第 1 卷，第 41 ～ 42 頁。
【50】 《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第 541 頁。
【51】 見沈邁克譯：《毛澤東：在 1957 年莫斯科會議上的講話》，《共產主義研究》，第 2 冊，1986 年 6 月 2 日，第 109 ～ 126 頁。
【52】 《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第 547 ～ 551 頁。
【53】 同上書，第 551 ～ 556 頁。
【54】 見《起源》，第 2 卷，第 10 ～ 11、92 ～ 99、225 ～ 226 頁。
【55】 《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第 544 ～ 545 頁。
【56】 阿爾巴托夫：《社會體制》，第 98 頁。
【57】 同上書，第 97 頁；這兩節在《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中第 542 ～ 545 頁。
【58】 康奎斯特：《赫魯曉夫後的蘇聯》，第 114 ～ 117 頁。貝施羅斯：《危機歲月》，第 585 頁。這兩份材料推測這是一種不正常的做法，並指出沒有證據表明這種變化給赫魯曉夫帶來了絲毫好處。科茲洛夫於 21 個月後去世。
【59】 見《起源》，第 2 卷，第 278 頁。
【60】 貝施羅斯：《危機歲月》，第 586 頁；阿爾巴托夫只簡要地提到了禁止核試驗條約（《社會體制》，第 98 頁），並且索引中沒有科茲洛夫的名字。
【61】 遞交這封信是麥克米倫的主意；有關英—美兩國共同對這些問題進行的討論情況以及信件原文，見麥克米倫：《時期的結束》，第 455 ～ 468 頁。
【62】 引自張少書：《朋友與敵人》，第 236 頁。
【63】 同上書，第 238 頁。
【64】 貝施羅斯：《危機歲月》，第 596 頁。
【65】 同上書，第 598 ～ 601 頁。
【66】 見格里菲斯：《中蘇分裂》，第 158 頁；書中認為選擇這個時間並不使人感到意外，中國人也持此觀點；見《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第98頁。
【67】 伍修權：《回憶與懷念》，第 372 ～ 373 頁。
【68】 貝施羅斯：《危機歲月》，第 622 ～ 624 頁。
【69】 同上書，第 624 ～ 626 頁。
【70】 伍修權：《回憶與懷念》，第 372 頁；貝施羅斯：《危機歲月》，第 622 ～ 624 頁。
【71】 1950 年簽署的中蘇條約並未正式作廢，而是任其在 1980 年滿 30 年後停止的。
【72】 這次，周恩來似乎像往常一樣具有說服力，因為懷有深深疑慮的恩維爾·霍查描述與周的談話進行得很順利，這次訪問對阿爾巴尼亞來說是個「偉大的勝利」；霍查：《對中國的思考》，第 1 卷，第 61 頁。
【73】 格里菲斯：《中蘇分裂》，第 177 ～ 189 頁。
【74】 同上書，第 189 ～ 206 頁；吉廷斯：《中蘇論戰之概觀》，第 193 ～ 227 頁。
【75】 這些國家是：埃及、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斯、加納、馬里、幾內亞、蘇丹、埃塞俄比亞、索馬里。此段引自艾迪：《周恩來的征程》，載《中國季刊》1964 年，第 18 期，第 174 ～ 194 頁。
【76】 同上書，第 175 頁解釋說，周恩來指的是民族解放鬥爭，不是社會革命。另見斯諾：《星筏》，第75～76頁；拉捨：《1949-1970年的中國和非洲》，第70頁。
【77】 齊力：《「左派」理論家浮沉錄》，第 210 ～ 211 頁。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與中共對外聯絡部副部長趙毅敏是該小組的名義組員，該小組有 7 名成員組成的支持隊。該反修班子由所謂秀才組成，不要將它與選集班子混淆了，選集班子成

立較早，是編輯毛、劉少奇和其他領導人選集的。這個班子由康生領導，與中央書記處在同一座樓裏。這兩個秀才班子的成員有重迭。（由沈邁克提供）

【78】除去另行注出外，關於九評寫作的材料均來自參加該工作的成員知情人 I。

【79】它後來成為外國革命者流亡的秘密居留處，知情人 I。

【80】在中國其他城市有許多類似的樓群；知情人 I。

【81】伍修權：《回憶與懷念》，第 374 頁。

【82】同上書，第 375 頁。

【83】同上書。在 60 年代初，毛不僅密切注意評論的撰寫，對中蘇關係的各方面及其影響也很注意；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0 冊，第 245 ～ 254、262 ～ 264、276 ～ 283、316、320 ～ 324、330 ～ 331、369 ～ 376、378 ～ 379、394、414 ～ 415、434 ～ 435、465 ～ 466 頁，第 11 卷，第 12 ～ 13、14 ～ 15、30 ～ 32、36 ～ 37、40 ～ 41、66 ～ 67、68 ～ 71、102、105 ～ 109、164、179 ～ 181、204 ～ 205、216 ～ 219、320 ～ 321、339 ～ 340、344 ～ 350、385、394 ～ 395 頁。

【84】格里菲斯：《中蘇分裂》中對前五評有摘錄並有簡評。

【85】這一現象的一個突出的早期的例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德國社會黨投票贊成增加軍事費用，以後又投票贊成戰爭借貸，而不堅持它反對軍國主義及與法國社會主義者團結的立場；克雷格：《德國 1866-1945 年》，第 296 ～ 297 頁。

【86】《起源》，第 1 卷，第 39 ～ 56 頁。中共的第一篇評論《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肯定「分歧是從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開始的」，《論戰》，第 59 ～ 67 頁。

【87】有關對法國毛主義分子的討論，見費吉托：《一個法國毛主義分子：雅克、韋吉斯與革命》，載《中國季刊》1964 年，第 19 期，第 120 ～ 127 頁及《革命》的非籍美國人理查·吉布森對該文的評論，同上書，1965 年第 21 期，第 179 ～ 182 頁。

【88】據知情人 B，第九評是陳伯達寫的，但葉永烈《陳伯達其人》，第 209 頁，稱康生不讓陳在起草九評時起主要作用。據知情人T稱該文作者是吳冷西與王力。

【89】《論戰》，第 430 頁。

【90】同上書，第 436 頁。

【91】同上書，第 436 ～ 439 頁。

【92】同上書，第 440 ～ 441 頁。

【93】德吉拉斯：《新階級》，隨處可見，但重點在第 37 ～ 69 頁。該書肯定在中國是人所共知的，可能毛與其他領導讀過，因為該書的全譯本登在 1957 年 8 月《參考資料》的大字本上，是在一名幹部提議下翻譯的，後來該幹部被打成右派分子，部分原因就是這個提議。1963 年 2 月，該書作為內部書籍出版，此情況係沈邁克提供的。

【94】《論戰》，第 443 頁。

【95】同上書，第 464、466 頁。

【96】同上書，第 471 ～ 476 頁。

【97】有關 1964 年毛在這問題上的思想發展，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158 ～ 1162 頁。毛 1964 年 6 月 16 日在對中央工作會議的一次講話中曾談到革命接班人的重要性；《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1 冊，第 87 頁。

【98】《論戰》，第 477 ～ 478 頁。關於毛早期對基層接班人和「新生力量」的關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1 冊，第 74 ～ 75、94 ～ 95 頁。到 1965 年春，中央辦公廳滿意地宣佈山西 95 個縣的農民已接受過革命接班人五個條件的教育；同上書，第 383 頁。

【99】《論戰》，第 479 頁。

【100】雖然有了這些攻擊，但毛、劉和周在赫魯曉夫 1964 年 4 月 17 日 70 歲生日時簽名發了一份和解語調的電報給赫魯曉夫。引文載麥德維杰夫：《赫魯曉夫》，第 229 頁。

【101】蘇聯人有禮貌地通過他們駐北京大使在宣佈以前通知了中國人；伍修權：《回憶與懷念》，第375～376頁。大使館奉命試探蘇聯人是否會改變他們的政策；張德瓊：《在莫斯科六年半》，載《中共黨史資料》1996年6月第58期，第40頁。
【102】霍查：《對中國的思考》，第1卷，第125頁。1964年6月尼赫魯逝世後，中國人也緩和了他們對印度的宣傳，直到後來他們認為他的接班人沙斯特里與他是一丘之貉；森古普塔：《亞洲的支點》，第191～193頁。
【103】霍查大怒，在日記中寫道必須揭露中國人的修正主義觀點和行為，並與之作鬥爭；霍查：《對中國的思考》，第1卷，第125～135頁。
【104】然而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出席了蘇聯大使館的週年慶祝會；伍修權：《回憶與懷念》，第376～378頁。
【105】然而，赫魯曉夫的繼承者批評他在外國人面前對中國人作即席評論時不婉轉，如他稱毛是「老套鞋」(Galosh)，麥德維杰夫：《赫魯曉夫》，第241頁。
【106】伍修權：《回憶與懷念》，第378～381頁；格里菲斯：《中蘇關係，1964-1965》，第61～64頁。在他討論馬林諾夫斯基這件事中，阿巴托夫（當時不在場，但安德羅波夫將此事告訴了他）說馬林諾夫斯基是對周恩來說這話的；《體系》，第109頁。據另一份中國材料稱，他對他們兩個人都說了；《中共黨史重大事件述實》，第207～209頁。
【107】霍查：《對中國的思考》，第1卷，第177頁。
【108】《論戰》，第491頁；霍查：《對中國的思考》，第1卷，第181～182頁。
【109】伍修權：《回憶與懷念》，第376頁。
【110】劉易斯和薛：《中國製造了炸彈》，第35～72頁。
【111】聶：《在紅星內部》，第701～704頁。
【112】格里菲斯：《中蘇關係，1964-1965》，第79～88頁。
【113】伊拉茲馬斯：《戴高樂將軍承認北京》，載《中國季刊》1964年第18期，第195～200頁；拉庫奇：《戴高樂，1945-1970的統治者》，第392～393頁。據這後一材料，對法國領導人來說「擁有核武器始終不僅僅是個象徵性姿態，這是民族獨立的一個重要屬性」；同上書，第413頁。戴高樂在1970年去世前2個月已不任總統，曾談道到中國去，他說，這「是圓了一個夢」；他去世時，中國人在紫禁城下半旗，以示他們對法國承認他們的重視（同上書，第586～587頁）。
【114】阿貢（音譯）：《印尼外交政策二十年，1945-1965》，第431～440頁；利弗：《印尼的外交政策》，第67～71、99～105頁，有關毛對蘇加諾就中蘇分裂表示的關切所作的安慰式的答覆，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第421～423頁。
【115】格里菲斯：《中蘇關係，1964-1965》，第76～79頁。
【116】第一個重大的秘密決定是甘迺迪總統於1961年5月11日授權派遣400名特種部隊與100名其他軍事顧問赴南越，同時又下令中央情報局訓練南越特工人員在北越進行秘密活動；《五角大樓文件》，第79、82、90～91頁。
【117】同上書，第93～111頁；蓋爾布與貝茨：《越南的諷刺》，第69～80頁。
【118】同上書，第80頁。
【119】《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編：《當代中國外交》，第159頁。
【120】《五角大樓文件》，第113頁。
【121】《當代中國外交》，第159頁。前一年，中國友好代表團由葉劍英元帥率領訪問河內。由於葉與胡志明在1940年曾有密切工作關係（即訓練華南的抗日遊擊隊），所以葉與胡有特殊關係；福爾：《兩個越南》，第98、103頁。
【122】北越與中國人的共同立場是反對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與譴責南斯拉夫；格里菲斯：《中蘇分裂》，第192～193頁；《中蘇關係，1964-1965》，第66～67頁。北越政治局1963年也通過了反修正主義的決議，但有二人不同意，一是胡志明，他棄權，另一人是武元甲，他投反對票。我要感謝Hue Tam Ho Tai（越南人名）提醒我注意這事。據在60年代初寫作的一位越南問題專家稱，在共產

黨領導下，親中國的是 Truong Chinh 和 Nguyen Duy Trinh，而親蘇的是 Le Duan 和 Vo Nguyen Giap，而胡志明則企圖保持中立；見霍尼：《今日北越》，第 55 ～ 58 頁。

【123】《五角大樓文件》，第 607 頁。

【124】索倫森：《甘迺迪》，第 653 頁。這些因素使歷史學家產生爭論：如果甘迺迪活著，美國是否會陷入泥潭。

【125】約翰遜在任職的第一年對越南並未太多注意（東京灣事件除外）；蓋爾布與貝茨：《越南的諷刺》，第 97 頁。

【126】孔雲峰（音譯）：《戰爭類比》，第 97 ～ 147、174 ～ 205 頁。

【127】《五角大樓文件》，第 254 ～ 255 頁。

【128】蓋爾布與貝茨：《越南的諷刺》，第 100 ～ 104 頁。有關當時國防部長對東京灣事件的說法，見麥克納馬拉《回憶》第 5 章。該書出版後，麥克納馬拉先生訪越南，1955 年 11 月 9 日會晤武元甲將軍。北越前國防部長在回答麥克納馬拉的問題時說 8 月 2 日地方海防艦隻曾襲擊美國驅逐艦，但 8 月 4 日並未攻擊；後來有人引麥克納馬拉的評論說，他認為「99% 和 99% 到 100% 肯定 (8 月 4 日的襲擊）並未發生」。見蒂姆·拉里莫爾：《在河內，以前的敵人重訪越南戰爭的轉折點》，載 1955 年 11 月 10 日《紐約時報》。

【129】《五角大樓文件》，第 259 ～ 270 頁。

【130】蓋爾布與貝茨：《越南的諷刺》，第 117 ～ 120、372 頁。

【131】同上書，第 129、372 ～ 273 頁；麥克納馬拉：《回憶》，第 7 章。

【132】國防大學：《七十年簡介》，第 514 頁。毛喜歡預見危險。1960 年 9 月，蘇聯撤回專家僅幾個星期後，毛就預計有蘇聯進行核攻擊的危險了！汪東興：《毛主席關懷我們成長》，載《炎黃春秋》1993 年第 7 期，第 5 頁。

【133】閻放鳴：《三線建設述評》，載《黨史研究》1987 年第 4 期，第 71 頁。

【134】此後的簡單敘述主要來自閻放鳴：《三線建設述評》；與諾頓《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工業政策》，載於約瑟夫·翁與茲韋格：《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新觀點》，第 153 ～ 181 頁。

【135】諾頓：《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工業政策》，第 157 ～ 158 頁；第 159 頁上有一幅三線地區的地圖。閻放鳴：《三線建設述評》，第 70 頁。

【136】諾頓：《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工業政策》，第 157 ～ 158 頁。

【137】閻放鳴：《三線建設述評》，第 72 頁。

【138】利伯索爾與歐邁格：《中國的政策制定》，第 186 ～ 191 頁。李富春和薄一波被迫縮小了權力，但他們似乎堅持對三線負責，見下注 146。

【139】《起源》，第 1 卷，第 63 ～ 66 頁；閻放鳴：《三線建設述評》，第 72 頁。

【140】程華：《周恩來和他的秘書們》，第 12 頁。

【141】諾頓：《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工業政策》，第 161 頁。有關一名在勞改營中度過幾年參加建設三線的雲南人的簡短敘述，見何：《中國先生的兒子》，第 135 ～ 137 頁。

【142】諾頓在第 163 頁上稱，將最初三線投資放在西南，使中國增強了援助越南的力量，但這種說法是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空軍基地和軍事集結站（這點她確實做到了），但不是在靠近前線的地方建設關鍵的工廠。諾頓還提出三線建設增加了人們相信中國要進行干涉的威脅，從而有助於阻止美國；同上書。如果真是如此，那這辦法根本無效果；惠廷是當時國務院研究這問題的人，他在分析華盛頓與北京的威懾信號時並未提到美國的分析家們對三線有印象，更不說將它考慮在他們的估計中了；見《中國對威懾因素的估計》，第 6 章。

【143】就像在 1962 年對蔣介石那樣，美國人遏制住他們急切的盟國；蓋爾布與貝茨：《越南的諷刺》，第 99 頁。

【144】即令在（美國）派陸戰隊到南越以後，中國人仍認為美國人將設法避免在中國使用地面部隊；見惠廷《中國對威懾因素的估計》所引周恩來所提的第四點，第 194 頁。

【145】《當代中國外交》，第 159 頁。

【146】有關中國人對由三線引起的問題的看法，見閻放鳴：《三線建設述評》，第 69、73 頁。有關兩位經濟領導官員李富春與薄一波於 1965 年春訪問三線的簡報報告，見劉廣安、王桂珍與秦明：《紀念李富春》，第 13 ～ 14 頁。有關毛繼續對三線的關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1 冊，第 182 ～ 184、196 ～ 197、329 ～ 330 頁。有關 90 年代三線仍然引起的問題，見 1994 年 12 月 11 日《紐約時報》，第 3 頁。

【147】《當代中國外交》，第 160 頁。有關一名訪問記者與常駐外國人的示威的描述，見卡羅爾：《中國：另一種共產主義》，第 200 ～ 201 頁，和米爾頓和米爾頓：《風不止》，第 82 ～ 84 頁。

【148】米爾頓和米爾頓：《風不止》，第 4 ～ 5 頁。

【149】《當代中國外交》，第 160 頁。當時對此不清楚，因中國的宣傳不認為「幾萬美國地面部隊」有可能「嚇倒越南人民」，引文載惠廷：《中國對威懾因素的估計》，第 183 頁。

【150】見馬爾羅：《反回憶錄》，第 383 ～ 389、396 ～ 400 頁中對他與周和陳的會見的描述，以及卡羅爾在《中國：另一種共產主義》，第 448 ～ 450、454 ～ 456 頁中對這二人的會見的描述。

【151】在毛於 1965 年 1 月 9 日與斯諾會見時，他一定知道這次會見會以某種形式在美國報紙上有報道 (《新共和國》1965 年 2 月 27 日有精簡的報道)，另見斯諾：《漫長的革命》，第 194、216、218 頁。

【152】廖蓋隆、丁曉春、李忠志：《中國共產黨發展事典》，第 797 頁。另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1 冊，第 359 ～ 360、381 ～ 382 頁。據歐洲權威性材料，周恩來在 1965 年 6 月在開羅告訴納賽爾總統，北京歡迎美國更多地捲入越南戰爭，因為這樣就減少了對中國進行核攻擊的危險；周的推理似乎是美國政府不希望使它自己的部隊有處於核輻射微塵下的危險；錢達：《兄弟仇敵》，第 128 頁。

【153】李健：《新中國六次反侵略戰爭實錄》，第 202 頁；本書收錄王賢根的一篇文章，關於越南戰爭中中國所起的作用，是他早期一本書的縮減版，見後，註釋 154。離開長沙的時候，胡志明提出和毛交換手杖，被毛婉拒，說他「真奇特」；Gao Jingzhen：《平凡與偉大》。

【154】李健：《新中國六次反侵略戰爭實錄》，第 202 頁；對志願飛行員和 (可能戰鬥) 部隊的要求只見於史應富：《秘密出兵雅里叢林：援越抗美紀實》，第 15 頁。所有其他材料都只談到要求支援部隊。由於本書有楊得志將軍寫了讚揚性的前言，人們必然假設書中引用黎筍的重要講話必然是準確的。

劉少奇可能作為毛主席以下的最高級黨的官員率領中國代表團，以表示對僅處在胡志明以下的高級黨的領導人的黎筍的尊敬。當黎筍於 1966 年夏再度訪華時，劉很深地捲入了文化大革命中，改由周恩來接待越南客人；王賢振：《援越抗美實錄》，第 130 頁。

【155】有關莫斯科與河內在 50 年代的不愉快關係，使這些話更可信的情況，見塞耶：《另一種手段的戰爭》第 35 ～ 37、60 ～ 63、159 ～ 163 頁。

【156】格里菲斯：《中蘇關係；1964-1965》，第 72 ～ 74 頁。

【157】羅斯：《印度支那的較量》，第 21 ～ 23 頁。

【158】史應富：《秘密出兵雅里叢林》，第 3 ～ 16 頁。

【159】王賢振：《援越抗美實錄》，第 99 頁。

【160】同上書，第 44 頁。由於這政策包含著在中國土地進行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可能尋求人民代表大會的正式支持。有關人民代表大會正式活動的文獻，見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代表大會文獻資料彙編：(1949-1990)》。

【161】王賢振：《援越抗美實錄》，第 45 頁；李健：《新中國六次反侵略戰爭實錄》，第 202 ～ 203 頁。

【162】同上書，第 203 ～ 205 頁。

【163】李鐙、肖紀和王立兵：《建國以來軍事百椿大事記》，第 221 頁。

【164】在李天祐於1963年4月被任命為副總參謀長以前，在廣東軍區越南邊境任職超過12年，最後任該軍區司令。
【165】李健：《新中國六次反侵略戰爭實錄》，第205頁。
【166】此時，胡志明在長沙因心臟病休養。他在長沙呆了一個多月，毛訪問過他；肖心力：《巡視大江南北的毛澤東》，第447～450頁。
【167】《當代中國外交》，第161頁；《解放軍六十年大事記》，第616、617頁；史應富：《秘密出兵雅里叢林》，第16、216頁（這材料也有數字表明各中國單位的成就，第39、216頁）；謝益顯：《折衝與共處》，第147頁；李健：《新中國六次反侵略戰爭實錄》，第212頁；惠廷：《中國對威懾因素的估計》，第186～189頁；錢達：《兄弟仇敵》，第129頁；《北京週報》1979年11月30日第48期，第14頁。
據另一份材料，撤退的日期為1970年7月；廖蓋隆、丁曉春與李忠志：《中國共產黨發展事典》，第799頁。據知情人F，人員的數字只包括著制服的人，而不包括征去築路的中國民工等。如果將這些人也包括在內，中國在越南的最高人數接近30萬人。
【168】《解放軍六十年大事記》，第616～617頁；空軍司令部編研室編：《空軍史》，第207頁；《當代中國空軍》，第396～410頁；黃玉沖：《一代天驕——新中國空軍實戰錄》，第248頁。據另一份材料，總數為165架飛機；117艘戰艦；810輛坦克與裝甲車，15,000輛汽車，3萬門大炮，1,777,000枝步槍與機槍和10.4億發子彈，中國戰爭費用總數為400億元；沙力和閻力編：《中國九次大發兵》，第270頁。有關海軍活動，見「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編：《當代中國海軍》，第412～431頁。據知情人P稱，官方傷亡數字是大為低估的，如死亡者僅包括運回中國醫治後死亡的。在越南死亡並埋葬的作為越南人死亡數（人民解放軍在朝鮮戰爭中也用此法計算）。
【169】惠廷：《中國對威懾因素的估計》，第174頁。
【170】周總理4月2日將這政策傳遞給阿尤布·汗總統；如果那時政策已得到同意，他可以在巴基斯坦領導人3月2日至9日訪北京時就這樣做，因此可能還未最後完稿。由於周在3月23日至27日訪問羅馬尼亞，政策可能是在23日以前制定的，假設周會在制定政策中起主要作用的話。另一個可能是在阿尤布3月訪問時政策業已制定了，但中國人對如何將之傳送給美國人，意見還不一致。
【171】周在1964年訪問巴基斯坦時就提出了這點，見古普塔：《亞洲的支點》，第184頁。
【172】周恩來在簡短訪問了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和聯合阿拉伯共和國以後返國途中於4月2日至3日在卡拉奇作短暫停留；懷恩：《周總理生平大事記》，第450～451頁；1965年4月3日《紐約時報》。周與阿尤布在6月28日再度在開羅會面；懷恩：《周總理生平大事記》，第451頁。
【173】《當代中國外交》，第160～161頁；謝益顯：《折衝與共處》，第146～147頁。一年後這四點才通過一名巴基斯坦新聞記者公開公佈（惠廷：《中國對威懾因素的估計》，第193～194頁），這時中國可能已有理由認為至少美國人不會攻擊中國了。
【174】1965年4月17日《紐約時報》。原定在阿尤布訪華後訪華的印度總理沙斯特里也取消了訪問，以保持在對立的南亞國家之間的中立。阿尤布是在訪蘇時知道這一推遲的；高哈爾：《阿尤布·汗》，第302頁。
【175】麥克馬洪：《周圍的冷戰》，第318～324頁；巴恩慈：《印度、巴基斯坦和世界各強國》，第196～197頁。有關約翰遜總統對阿尤布和沙斯特里推遲訪問的個人感覺以及由於推遲而引起的反響，見左德溫：《記住美國》，第394～396頁。阿尤布最後於1965年12月在華盛頓會晤了約翰遜，但對他來說，推遲訪華還是值得的，因為這大大增強了他的黨在3月末國會選舉中的地位；見高哈爾：《阿尤布·汗》，第289～291頁。這一材料未提及周與阿尤布在卡拉奇的會晤。

【176】當時美駐巴基斯坦大使瓦爾特·P·麥康吉稱並未通過他傳遞過這樣的信息；1993年8月電話採訪。國務院、中央情報局和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很高級的工作人員都不記得通過巴基斯坦或其他方面傳遞過周恩來的這樣的資訊，也沒有收到對這一資訊的答覆。(我對這些人願意答覆我以信件或電話的採訪，深表感謝)。然而，某些資訊通過某些仲介傳到了華盛頓某些人；「中央情報局關於中越對美在越戰中戰術的反應的報告」，載斯特哥爾摩：《當代亞洲雜誌》(13)1983年第2期，第269頁。這文件的日期為1965年6月9日，是對發展中的中國立場的詳盡分析，可能是中央情報局對周的資訊中所傳遞的(不管是如何傳遞的)中國人的意圖的評估。在該報告中，提到協力廠商的仲介如下：(a)與直接大膽談論準備採取「真正的行動」正相反的，是一個不那麼大膽的行動，即私下裏暗示(通過協力廠商向華盛頓)人民解放軍地面部隊並未在南方邊境結集，從而使美國放棄對華南進行事先已經準備好的空襲(這段作為機密內容(5(B)(2))而刪除了)。(b)「周恩來同一個月私下說人民解放軍有充分理由進行幹預：即美國地面部隊在北方進行攻擊(這段作為機密內容5(B)(2)而刪除了)。(c)周還在4月中旬說(作為機密內容5(B)(2)而刪除了)只要南越或美國部隊不入侵北緯17度以北地區，北京就不會派部隊入北越。」1996年8月，中央情報局檔根據「資訊自由法案」向本作者公佈了。在這份基本上未經刪節的文本(雖然作者的名字刪除了)未提到(a)中「協力廠商」是誰。然而，該檔透露(b)中周告訴的對像是緬甸的奈溫總統，在(c)中的對像是柬埔寨的西哈努克親王。周和外交部長陳毅在卡拉奇短暫停留後於4月3日至4日在仰光會晤奈溫。在4月中(16～26日)周和陳毅在印度尼西亞參加萬隆亞非會議十週年紀念會；在這期間，他有充分機會與西哈努克談話，而他也確實於17日拜訪了西哈努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與外交史研究室編：《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第445～450頁)。也可能中央情報局設法竊聽了周在卡拉奇的會見。據西德尼·李敦白說，陳毅「秘密」告訴安娜·路易士·斯特朗中國參加越南戰爭的三個條件，他正確地相信她會將這三個條件透露給美國政府。這活動的日期未透露；見李敦白與貝內特：《幕後的人》，第276頁。有關約翰遜對中國可能干預的關心，見克爾恩斯：《林登·約翰遜和美國夢》，第264～265、270～271頁。

【177】惠廷:《中國對威懾因素的估計》，第179頁。黄玉沖:《一代天驕》，第248頁，人民解放軍在1964年8月至1968年8月在中國領土上空擊落25架，擊傷3架美國飛機。

【178】惠廷：《中國對威懾因素的估計》，第175～177頁。

【179】同上書，第184～185頁。

【180】美國分析家能得到的情報或有關協議的報告中都沒有提到它們。同上書，第186～187頁。據陳健，中國的材料稱中國人與越南確實詳細討論過中國飛行員參戰的形式，但越南的材料卻與此說法不一樣；見他的《中國對越南戰爭的參與，1964-1969》，載《中國季刊》1995年142期，第369頁。

【181】格里菲斯：《中蘇關係，1964-1965》，第74～76頁。

【182】蘇聯領導人於1969年顯然考慮過，在中國發展核能力以前，以「外科手術」摧毀中國的核能力是太危險的選擇；羅賓遜：《中國對抗蘇聯》，載《劍橋中國史》，第15卷，273頁；麥克法夸爾:《對毛的繼承和毛主義的終結》，同上書，第320頁。有關在國家危機中想要清洗自己的政黨的政治領導人所面臨的兩難境地，參見溫斯頓·邱吉爾的事例：他在1940年5月任首相後，想要解決張伯倫的忠實信徒們，但他知道國會內的鬥爭會在與納粹德國戰爭的最危險關頭致命地損害英國政府，因而作罷；見羅伯茨:《傑出的邱吉爾一族》，第162頁。有關邱吉爾困境的另一方面，見下面第19章注17。

【183】斯諾：《漫長的革命》，第17頁；見下麵第19章。

【184】德克薩斯州奧斯汀約翰遜圖書館的工作人員未能找到總統就中國人的詢問所作答覆的信，但一名工作人員稱在這大量檔案中，沒有找到是不能作為定論的。另，美國高級官員，包括當時負責東亞的副國務卿威廉·邦迪在內，均記不

起總統有這類信息傳遞給首相（譯按：估計為總理之誤）。有關約翰遜總統在1967年初有意通過泰國仲介開始與中國進行高層會談的情況，見法坦諾泰：《龍珠》，第224～241頁。

【185】楊：《與中國共產黨人談判》，第268～270頁。

【186】這是1965年周恩來的一名助手浦壽昌1993年告訴邦迪的；1993年8月24日對邦迪的電話採訪。北京似乎是按字面理解美國堅決宣佈的政策（1962年台灣海峽事件也說明）。

【187】這問題在60年代中期引起西方分析家相當多的爭論，他們對中國1965-1966年發表的有關世界事務的重要文章的解釋有爭議。例見拉阿南：《1965-1966年北京的外交政策「辯論」》與紮戈里亞：《北京的戰略爭論》，均載於鄒：《中國在危機中》（下），第23～71、237～268頁。對這些文章的評論，見亞胡達：《克里姆林宮學與中國的戰略論爭，1965-1966年》，載《中國季刊》1972年第49期，第32～75頁；對拉阿南與紮戈里亞文章的反駁，見《中國季刊》1972年第50期，第343～350頁；亞胡達對這反駁的反駁，見《中國季刊》1972年第51期，第547～553頁；哈丁與格托夫：《清洗羅瑞卿：中國戰果規劃的政治》。據我所知，在許多針對文化大革命受害者的罪名都與這「爭論」有關，而與越南政策無關。雖然毛與他的同事們在文化大革命前的爭論，包括對外交政策的爭論，在文化大革命後都全部發表了。我卻沒看到對這問題的分歧有過任何討論。這並不能肯定沒有過像西方分析家所說的那種或其他種爭論。有些爭論的參加者，如鄧小平和彭真，在本書寫作時，仍活著，這肯定對中國歷史學家來說是禁區。此外，在1979年中越戰爭以後，鄧希望在對「沒良心的」越南共產黨人政策上，要將中國領導人描繪成團結一致，不應有任何暗示，即在1965年他們本可以做得更多。然而外國分析的一個重點是需要重新審視的：即對羅瑞卿和林彪在戰略政策上曾有深刻分歧，這在他們1965年對德、對日勝利20週年的文章裏尤其表現得很明顯。據林羅鬥爭的最權威材料以及羅瑞卿的傳記，羅主持了林彪文章的起草工作，兩篇文章都得到了「中央」的同意，完全可以肯定在重大外交政策上是得到毛的同意的，黃瑤：《三次大難不死的羅瑞卿大將》，第29章；《中共黨史人物傳》，第46卷，第60頁。

第四編 延安圓桌會議的終結

第十七章 女戰士

【1】 布洛克：《希特勒和斯大林》，第149頁。

【2】 《起源》，第1卷，第222頁；麥克法夸爾、奇克與吳：《毛主席的秘密講話》，第144頁；見第12章。

【3】 毛對裴多菲綜合症縈懷於心，是很容易得到其他材料證明的，但他對知識分子的活動特別關心，可能有更深層的文化原因。傳統上，口才不是被人看重的技能；中國沒有像狄摩西尼斯（譯按：希臘演說家）和西塞羅（譯按：羅馬演說家）那樣被後人視為典範的人。布爾什維克從列寧以下以有許多雄辯演說家而自豪——但斯大林除外，他的格魯吉亞口音是個不利條件，經常為喜劇演員所模仿——而中共領導人沒有一個曾顯示出能站上肥皂箱，激勵公民們去攻打冬宮的本領。在不公開的會議上，而且聽眾的政治背景又很複雜的情況下，他們是有相當影響力的，影響力主要來自講話內容，而不是講話方式。當然，還有講話時的誠懇；人們會想起毛在1957年2月27日有關「矛盾」的講話和陳毅在1962年3月6日在廣州會議上的講話。除去在巡視時的講話而外，毛不像列寧，在這個問題上也不像希特勒，與「廣大群眾」的交流是像皇帝一樣通過批示，而不是通過口頭表達的。如果人們認為中共領導人一般不想通過口頭

來動員群眾的假設是正確的話，那麼他們想要控制這些善於通過像京劇這樣的媒體動員群眾的「靈魂的工程師們」的願望要比蘇聯還強。

【4】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548 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226 頁。

【5】 叢進強調毛澤東並沒有全部否定舊戲並提出柯的行動是根據他對主席所說的話的（可能是扭曲的）理解；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548 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229 頁將柯的講話定為 1963 年 2 月；有關柯在大躍進中如何緊跟毛，見李銳：《「大躍進」經歷記》，第 326 頁。

【6】 戈德曼：《毛的知識分子》，第 63 頁；葉永烈：《張春橋沉浮史》，第 118～119 頁。

【7】 引文見上書。

【8】 《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上），第 107 頁。不清楚為什麼周說 108 年，除非他指的是鴉片戰爭（1839～1842）與中共在 1949 年的勝利之間的這段時間；我也沒有找到這指示的資料來源。

【9】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549 頁。

【10】 見上書。

【11】 江青在上海扮演的重要角色之一是《玩偶之家》的諾拉。在史沫特萊根據 1937 年的採訪寫的朱德傳記中有以下一段話：「作為旁白，他說，有身份的女孩子當時仍不可能在中國舞臺上演出，易蔔生《玩偶之家》中的諾拉不得不由中國年青的男學生扮演，他們為現代中國婦女鋪平了道路。」；《偉大的道路》，第 120 頁。江青顯然到 1938 年才碰到並與毛同居的，但延安是一個很小的世界，她可能當時已很知名，所以朱知道她的過去，才脫口說出這話；特里爾：《白骨精》，第 138～150 頁。

【12】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556 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228 頁；戴知賢：《山雨欲來風滿樓》，第 73 頁；林青山：《江青沉浮錄》，第 253 頁。可以得出暗示，江青不是毛的第一位情人；他與一位名叫吳麗麗（音）的女演員的曖昧導致了與賀子珍的離婚。麥金農 & 麥金農：《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第 188-192 頁。

【13】 李德：《在中國的共產國際間諜》，第 246～250 頁；鍾與米勒：《毛夫人》，第 45～54 頁；林青山：《江青沉浮錄》，第 238～263 頁；斯諾：《西行漫記》，第 522～523 頁；特里爾：《白骨精》，第 129～161 頁；維特克：《江青同志》，第 148～163 頁；葉永烈：《藍蘋外傳》，第 90 頁；朱仲麗：《女皇夢》，第 30～39 頁。對像江青這樣一個有爭議的人物的資料很自然在準確程度上有很大差異；有關對特里爾《江青傳記》以前的傳記的評論，見特里爾:《白骨精》，第 397～399 頁。

【14】 見上書，第 182～236 頁；維特克：《江青同志》，第 223～232、244～275 頁；朱仲麗：《女皇夢》，第 104～242 頁。

【15】 維特克：《江青同志》，第 255～256 頁；這是唯一說江曾任此職的材料。

【16】 見上書，第 233～234、255 頁；特里爾:《白骨精》，第 190 頁；朱仲麗:《女皇夢》，第 122 頁。

【17】 特里爾：《白骨精》，第 189～197 頁；維特克：《江青同志》，第 232～244 頁；朱仲麗：《女皇夢》，第 143～145 頁；《中共當代文學史初稿》，（上），第 41～46 頁；戈德曼：《中國的知識分子》，第 75～76 頁。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據說劉少奇曾說《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的，他在給毛的信中激烈地否認了這一點，也為文化大革命以後的作家所否認。

【18】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9 冊，第 479、518、603～604 頁；第 10 冊，第 182、188、377 頁；第 11 冊，第 40～41、61、81、89、130、193、204～205、361～362、381～384、468～469、474 頁。

【19】 根據毛的醫生所說，江青對康生比對毛其他同事都尊敬；李：《毛主席的私生活》，第 397 頁。

【20】 戴知賢：《山雨欲來風滿樓》，第 80 ～ 82 頁；林青山：《康生外傳》，第 184 ～ 185 頁。
【21】 戈德曼：《中國的知識分子》，第 43 ～ 44 頁。
【22】 毛在他的醫生李志綏的推薦下這麼做。對於孟超改編的這部戲的原型，李有著模糊但愉快的兒時記憶。不過，關於宋朝丞相和他的妾之間的故事惹惱了毛，因為太影射現實了。李：《毛主席的私生活》，第 402-405 頁。
【23】 戴知賢：《山雨欲來風滿樓》，第 74 頁；林青山：《康生外傳》，第 186 ～ 187 頁；仲侃：《康生評傳》，第 143 ～ 150 頁；拜倫與派克：《龍爪》，第 260 ～ 267 頁。
【24】 林青山：《康生外傳》，第 188 ～ 192 頁；仲侃：《康生評傳》，第 150 ～ 153 頁；拜倫與派克：《龍爪》，第 268 ～ 269 頁。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孟超受到由康本人領導的審查組的審查，死於獄中。
【25】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550 頁。
【26】 《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上），第 107 頁。
【27】 戈德曼：《中國的知識分子》，第 43 頁；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550 頁。
【28】 同上書，第 550 ～ 551 頁。
【29】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226 頁。
【30】 《毛澤東思想萬歲》，第 26 頁；譯文載美駐香港總領事館：《當前背景》，第 891 期，第 41 頁。
【31】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226 頁。
【32】 同上書，第 1220 ～ 1221 頁。
【33】 同上書；譯文載美駐香港總領事館：《當前背景》，第 891 期，第 41 頁。該文之正式文本現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0 冊，第 436 ～ 437 頁。
【34】 1964 年 6 月，毛評論演出時說人民解放軍劇團最好，地區劇團次之，北京或中央劇團最差；《毛澤東思想集叢》，第 2 卷，第 355 頁。
【35】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552 ～ 553 頁。
【36】 《起源》，第 1 卷，第 180 ～ 182、202 ～ 207 頁。
【37】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553 頁，未詳細解釋這時發生了什麼使宣傳機構震驚的事。
【38】 據上書，主持機構是中宣部；據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221 頁，主持機構是文化部黨組。
【39】 同上書。
【40】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553 頁。
【41】 同上書；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221 ～ 1222 頁。
【42】 同上書，第 1222 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1 冊，第 91 ～ 93 頁；《毛澤東思想萬歲》，第 26 頁；譯文載美駐香港總領事館：《當前背景》，第 891 期，第 41 頁。所有中文文本均有「基本上」這一稍輕的字眼，但在美駐香港總領事館譯文中無此字。根據毛的原話，該講話的重點是如薄所說的。薄作為一知名的保守領導人，在中共再度以懷疑眼光看待知識分子時出版他的回憶錄，是處於尷尬境地的。一方面，他同意毛的意見，當時上演的劇目，表揚革命和社會主義的不夠多，但另一方面，他又得指責毛的批評太嚴厲、誇大和限制太多，因為這些是導致文化大革命的左傾思想的一部分；《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222 ～ 1223 頁。而叢進引用文化大革命後的官方檔，同意地說這二個指示都不符合實際情況，產生了嚴重後果；《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554 頁。
【43】 同上書，毛繼續對宣傳官員施加壓力，評論了哲學、音樂與繪畫；《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1 冊，第 148、172 ～ 173、339 ～ 401 頁。
【44】 戈德曼：《中國的知識分子》，第 77 頁。
【45】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555 頁。
【46】 同上書。有關毛的評論，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1 冊，第 113 頁。

【47】《江青同志論文藝》，第 32 ～ 42 頁。每一篇評論都是看完戲後作出的，最後一篇是 7 月 13 日作的。1970 年 5 月的譯文見斯諾：《舞臺上的中國》，第 256 ～ 303 頁。
【48】在《江青同志論文藝》中，7 月講話（第 21 ～ 25 頁）放在 6 月講話（第 26～29 頁）前面，7 月講話被選譯成英文（江青：《論京劇革命》，第 1～7 頁）。
【49】叢進：《曲折前進的歲月》，第 558 ～ 559 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228 ～ 1229 頁。
【50】「上海的黨和北京的黨都在抓戲劇，柯老是親自抓的。」《江青同志論文藝》，第 28 頁。有關江青與柯的關係，她利用上海與北京的對抗以及她諷刺地談到「大北京主義」，見特里爾：《白骨精》，第 244 ～ 246 頁；丁旺：《北京市文化大革命運動》，第 312 ～ 321 頁。
【51】知情人 H 與 Q；《起源》，第 1 卷，第 203 頁。
【52】江青：《論京劇革命》，第 2 頁。有關她提的數字，見上第 5 章。6 月 23 日講話中確實提到 3,000 萬人（《江青同志論文藝》，第 27 頁），在 7 月 1 日講話中則變為「只有一小撮」地主等。
【53】江青：《論京劇革命》，第 3 頁。在以前的講話中，江的確講過「這點我有發言權」；《江青同志論文藝》，第 27 頁。
【54】江青：《論京劇革命》，第 3 ～ 6 頁。
【5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1 冊，第 89 ～ 90 頁；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557 頁。
【56】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227 ～ 1228 頁。
【57】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557 ～ 558 頁。
【58】《江青同志論文藝》，第 63 ～ 140 頁。
【59】吳冷西：《憶毛主席》，第 149 頁。
【60】特里爾：《白骨精》，第 245 ～ 251 頁。
【61】戈德曼：《中國的知識分子》，第 78 頁；另見福克瑪：《創造性與政治》，載《劍橋中國史》，第 15 卷，第 607 ～ 611 頁。
【62】伯奇：《共產主義以後的文學》，載《劍橋中國史》，第 15 卷，第 788 頁。
【63】見《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上），第 108、110 頁。左傾分子的攻擊所以如此嚴厲的主要原因據說是林彪、江青、康生和追隨者（如姚文元）的陰謀。
【64】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575 頁。談到左傾思潮鼓勵各式各種的批判，這些左傾活動不能直接歸罪於江青的陰謀。
【65】戴知賢：《山雨欲來風滿樓》，第 117 ～ 120 頁；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559 頁。
【66】《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上），第 128 ～ 129 頁；戈德曼：《中國的知識分子》，第 101 ～ 107 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所寫的最著名的歷史傳記的第 1 卷，姚雪垠的《李自成》於 1963 年出版，但作者未繼續出版，直至文化大革命末他得到毛批准出第二卷時才出版；姚雪垠：《李自成》，第 1 卷，前言，第 3 ～ 5 頁。
【67】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561 頁。
【68】茅盾長期以來是「進步」國際組織，如世界和平大會和亞非團結委員會的著名中國代表，是出席國會間聯盟的代表；《共產黨中國名人錄》，第 2 卷，第 563 ～ 565 頁。
【69】維特克：《江青同志》，第 103、127、136、338 頁；特里爾：《白骨精》，第 103、163 頁。
【70】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561 頁。
【71】見他 1964 年春節談話和與毛遠新和王海蓉的談話，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第 455 ～ 471 頁。有關大躍進的教育政策，見《起源》，第 2 卷，第 108 ～ 113 頁。
【72】陳修良：《孫冶方革命生涯六十年》，第 70 ～ 80 頁；《孫冶方選集》，第 294 ～ 303 頁；尤其是第 294 頁的註釋；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573 頁；

戈德曼：《中國的知識分子》，第59～60頁。有關對孫冶方對1961-1963年工業管理的再思考的貢獻的評論，見哈爾彭：《經濟專家與中國經濟政策的制定1955-1983》，第4章。孫冶方的知識分子同事們佩服他，因為他從來不在壓力下承認錯誤；知情人士。文化大革命後，他大受稱讚；見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學術資料室編：《孫冶方經濟理論評論》。

【73】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574頁；戈德曼：《中國的知識分子》，第86～87頁。

【74】 同上書，第107～110頁；楊春貴：《中國哲學四十年，1949-1989》，第181～184頁。1964年8月中旬，康生利用見到毛的機會譴責了科學院哲學與社會科學所是「古董所」；毛：《思想集叢》，第2卷，第386頁。

【75】 西方有關楊獻珍的資料主要是卡洛爾·李·哈里的著作；見她哲學博士論文：《中國馬克思主義裏的另一種提法1955-1965：楊獻珍的辯證法理論》；《楊獻珍：堅持正統的列寧主義理論》，載哈里與奇克：《中國知名知識分子》，第51～91頁；《楊獻珍的哲學「刑事案件」》，載《中國法律與政府》，1991年春—秋期。有關對此時期的討論，另見拜倫與派克：《龍爪》，第275～282頁。有關中國的資料，見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561～573；林青山：《康生外傳》，第205～244頁；李振霞：《當代中國十哲》，第50～109頁；楊春貴：《中國哲學四十年》，第159～171頁，有關此事件的哲學而非政治方面；仲侃：《康生評傳》，第162～173頁。

【76】 《中共人名錄》，附錄，第221頁。本資料與西方資料稱楊在蘇聯和德國受過訓練，但官方資料對此未予證實；哈里與奇克：《中國知名知識分子》，第54頁，註釋6。

【77】 有關毛欠艾思奇的情，見福格爾：《艾思奇對中國馬克思主義發展的貢獻》，第5章。

【78】 哈姆林：《楊獻珍：堅持正統的列寧主義理論》，第59～61頁。

【79】 同上書，第67～69頁；《起源》，第2卷，第236頁。

【80】 哈姆林：《楊獻珍：堅持正統的列寧主義理論》，第62～67頁。

【81】 見上書，第67～76頁。

【82】 施拉姆：《毛澤東思想》，第167～168頁。有關毛在周發言後的熱情支持，並支持在出版前所作的幾次修改，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第400～410頁。與蘇聯分裂有其正當理由，潛藏在後的是毛堅持一分為二，關於此觀點，見辯論的一位參與者（站在毛一方）的證明：王若水：《中國政治的偉人：毛澤東和他的鬥爭哲學》，《當代中國雜誌》，1995年秋，第73-77頁。

【83】 林青山：《康生外傳》，第205～206頁。這書特別尖銳，因為作者就是因楊獻珍而獲罪的那篇文章的作者之一，他非常佩服楊。另見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563～564頁。

【84】 哈姆林：《楊獻珍：堅持正統的列寧主義理論》，第77頁。

【85】 哈姆林：《楊獻珍的哲學「刑事案件」》，第111頁。

【86】 同上書，第115～116頁。

【87】 然而，哈姆林認為楊後來的辯解是「有一點不誠實」；哈姆林：《楊獻珍：堅持正統的列寧主義理論》，第78頁。

【88】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564～568頁；林青山：《康生外傳》，第207～211頁；仲侃：《康生評傳》，第162～170頁，指的是關鋒和一個「反修正主義哲學小組」；據沈邁克，根本沒有這個小組，仲侃可能泛指反修班子，關鋒顯然是該班子的成員。

【89】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565頁。

【90】 施拉姆：《未加修飾的毛澤東》，第224頁。

【91】 見《批判資料：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

【9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第463～464頁；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568～570頁。

【93】 拜倫與派克：《龍爪》，第 280 ～ 281 頁。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林青山寫了許多文化大革命主要左傾人物的傳記。
【94】 戈德曼：《中國的知識分子》，第 102 頁。
【95】 維特克：《江青同志》，第 103 ～ 106、120 ～ 121、127、130、131、136 頁；特里爾：《白骨精》，第 52 ～ 55、69、102 ～ 103、248 ～ 251、263 頁。據戈德曼，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界最重要的官員、30 年代上海的左翼分子夏衍是對《早春二月》負責的，江青對他有怨恨；見《中國的知識分子》，第 45 ～ 46 頁，該書敘述了這一陰謀。
【96】 戴知賢：《山雨欲來風滿樓》，第 95 ～ 101 頁；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568 ～ 570 頁。有關毛的評論，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1 冊，第 135 頁。
【97】 田雖然級別高，但沒有榮譽職務；戴知賢：《山雨欲來風滿樓》，第 87 ～ 90 頁。
【98】 林青山：《康生外傳》，第 190 頁。
【99】 戈德曼：《中國的知識分子》，第 82 頁。
【100】 有關對田漢的《謝瑤環》的精闢詳盡的分析，見瓦格納：《當代中國歷史劇》，第 2 章；有關田與周有關係，從而有一段時間受到了保護的說法，見上書，第 136 ～ 137 頁。據毛的醫生所說，田漢被江青錯誤批評，因為他寫了一篇讚揚《李慧娘》的文章，令毛決定在中南海上演該戲。實際上，田漢的文章之所以遭受批評，是汪東興的建議，經過毛同意的，目的是爲了保護真正的始作俑者——李志綏，免遭江青的怒氣！李：《毛主席的私生活》，第 403-405 頁。據江青自己說，她曾要田漢將《紅色娘子軍》改編為京劇；他同意了但提出的劇本不如原劇；維特克：《江青同志》，第 311 頁。
【101】 且不說周揚在知識界的個人恩怨，他一般說來似乎贊成溫和的文化政策，但在毛批判了溫和政策後，他就成了正確方的鄉頭了。與陸定一相比，周贊成毛 1957 年整風的想法（《起源》，第 1 卷，第 51 ～ 53、219、247 頁），在反右運動中又轉而積極行動起來。另一方面他也與陸不同，他在 1961-1962 年是贊成周恩來和陳毅的政策的，直至毛表示反對這些政策時止。到 1965 年初，他的立場是如此之左，以致一名採訪他的外國記者，對他在一年後文化大革命中是第一批被清洗的人大吃一驚；卡洛爾：《中國：另一種共產主義》，第 275 ～ 286 頁。周的一個問題是他與每一位 1949 年後受批判的主要作家都有關係；吳載平：《巨人的情懷：毛澤東與中國作家》，第 64 頁。

第十八章 從灰色名人到紅色領導人

【1】 特里爾：《白骨精》，第 239 頁。正如之前所指出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王光美被紅衛兵的模擬法庭所「審判」，該法庭要求她穿上劉在 1963 年對印尼作正式訪問時的「頹廢」的衣服。看來似乎江青妒忌王在出訪期間的明顯的作用，這給紅衛兵的行動起了促進作用。
【2】 例如，1963 年 9 月 1 日，《中國青年》1963 年第 17 期的封面是他們二人與周恩來一起與演雷鋒戲的演員們拍的集體照片。
【3】 叢進認為，這一決定是劉作出的，而不是他妻子提出、由他同意的；《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534 頁。
【4】 在 1992 年美總統競選活動中，當民意調查表明群眾對希拉里·克林頓反映不佳時，克林頓競選班子放棄了原定的「買一送一」的策略，該策略原意要充分利用他作律師的妻子的無可懷疑的能力的。後來克林頓派他的妻子負責他主要的國內政策——醫療衛生——這是與毛和劉一樣的有風險的戰略，這戰略在政治上引起了重要的後果，雖然還不那麼致命。在希拉里·克林頓領導下制定的篇幅長達 1,300 頁的計劃在國會沒有通過，1994 年議會中期選舉中，共和黨取得重大勝利後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對克林頓政府處理醫療衛生政策缺乏信任是人們對民主黨的失望、懷疑和憤怒的關鍵因素，這導致民主黨的失敗；「民意測驗人看到了一股無聲的風暴，將民主黨人吹跑」，1994 年 11 月 16 日《紐

約時報》，第 A14 頁。另一次由民主黨領導委員會（克林頓任阿肯色斯州州長時領導過該委員會）主持的民意調查說明（據該委員會執行主席說），克林頓總統給人以大政府宣傳者的印象，在這個印象的形成過程中，醫療衛生所起的破壞作用是不應低估的；「對民主黨人的民意調查結果不溫不火，這警告克林頓，投票人是煩躁不安的」，同上報 1994 年 11 月 18 日，第 A30 頁。1995 年 1 月 9 日，希拉里·克林頓認為自己對國家的政治是「無知和笨拙的」，她說，「我非常遺憾，人們完全誤解了（我）在醫療衛生方面所作的努力，人們不聯繫前後的情況，而用來在政治上反對政府。我對此要負責，我對此深感遺憾。」《希拉里·克林頓謀求改善不好的形象》，載 1995 年 1 月 10 日《紐約時報》，第 A1 頁；另見《自相矛盾的第一夫人》，載 1995 年 1 月 23 ～ 29 日《華盛頓郵報》，第 6 ～ 8 頁。最後，在 1995 年 2 月底，即選舉失敗後約 4 個月，白宮向新聞雜誌內幕專欄透露，經過「一系列緊張的討論」，已決定今後克林頓夫人的角色是「顧問」或「鼓吹者」，不是主管人；1995 年 3 月 6 日《世界新聞與報導》，第 29 ～ 30 頁；1995 年 3 月 6 日《新聞週刊》，第 6 頁。民主黨的捐款人 1994 年收到克林頓總統與夫人的致謝性質的照片；而在 1995 年，照片裏只有克林頓。在文化大革命時中國政治權力結構完全不同，江青沒有後退，更不用說從照片中消失了，即令在她丈夫警告她不要組織「四人幫」時，也是如此。

【5】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537 頁，使用了「贊同」和「支持」這樣的詞來表示毛的態度。

【6】 有關 1960 年的情況，見《起源》，第 2 卷，第 303 ～ 304 頁；有關 1961 年的情況，見以上第三章；有關劉少奇在 1963 年的態度，見美駐香港總領事館：《中國大陸報紙概覽》，第 4024 期，第 4 頁。

【7】 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 24 卷，第 473 頁。

【8】 桃園大隊屬盧王莊公社，該公社地處唐山專區撫寧縣；同上書，第 472 頁。

【9】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540 頁；美駐香港總領事館：《中國大陸報紙概覽》，第 4024 期，第 4、12 ～ 13 頁。如果像《概覽》所譯的文化大革命報告所說（第 16 頁），她由 5 名保安人員保護，當地幹部不會不認為她是個重要人物。

【10】 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 24 卷，第 472 ～ 473 頁。王光美長篇報告中的大段摘錄，見上書第 472 ～ 484 頁，該長篇報告在中國仍不能公開得到。全文載《劉少奇言論集》，第 3 卷，第 471 ～ 570 頁。1967 年 9 月 6 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對王在河北農村活動的批判，該文譯文載美駐香港總領事館：《中國大陸報紙概覽》，第 4024 期，第 1 ～ 19 頁。該報還轉載 1967 年 9 月 13 日《解放軍報》的評論，譯文載於美駐香港總領事館：《中國大陸報紙概覽》，第 4025 期，第 16 ～ 17 頁。有關對文化大革命的負面報道，見鮑姆：《革命的前奏》，第 188 ～ 189 頁，注 1。

【11】 見上書，第 3 章。

【12】 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 24 卷，第 473 頁。據文化大革命的報道，該黨支部多次受到縣、鄉、區和公社黨委的表揚與獎勵；美駐香港總領事館：《中國大陸報紙概覽》，第 4024 期，第 4 頁。

【13】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540 頁；美駐香港總領事館：《中國大陸報紙概覽》，第 4024 期，第 4、8、10、12 頁。

【14】 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 24 卷，第 476 ～ 477 頁。

【15】 同上書，第 474 頁。

【16】 同上書，第 477、481 ～ 482 頁。

【17】 同上書，第 479 ～ 480 頁。

【18】 同上書，第 481 頁。

【19】 同上書。王並未說她和劉少奇對關景東在大躍進時的生產熱情有很深印象並在家中招待過他；美駐香港總領事館：《中國大陸報紙概覽》，第 4024 期，第 12 ～ 13 頁。

【20】 國防大學:《參考資料》, 第 24 卷, 第 476、481 頁; 及美駐香港總領事館:《中國大陸報紙概覽》, 第 4024 期, 第 8 ～ 9 頁。有關其他敵視的報道及王光美在桃園活動的照片, 見《桃園調查紀實——揭露劉少奇、王光美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滔天罪行》;《衛東》 1967 年 3 月 28 日, 第 4 頁。感謝沈邁克提醒我注意這些參考資料。
【21】 美駐香港總領事館 :《中國大陸報紙概覽》, 第 4024 期, 第 7 ～ 8 頁。
【22】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 人們說為了吹噓桃園及王光美在該大隊的業績, 對大隊給予了在供應設備與資金方面的特殊照顧。這一說法中除去由於反對王而誇大外, 對「典型」單位予以特別幫助是保持先進的正常做法 ; 見上書, 第 18 ～ 19 頁。
【23】 國防大學 :《參考資料》, 第 24 卷, 第 475 頁。
【24】 有關缺乏儲備的新的領導人才, 見陳、馬德森、昂格爾 :《陳莊》, 第 52 ～ 53 頁。有關小說家根據個人經歷對 1964 年初湖南工作組的所作所為的描寫, 見古華 :《芙蓉鎮》, 第 66 ～ 128 頁。一名腐敗的農村小隊隊長利用黨員身份在任何政治氣候都能掌握權力、勒索農民, 如遇反抗, 則以《公安六條》相威脅, 對上級的「譴責」不屑一顧, 欠集體的債得到寬恕, 有關於此的第一手經驗, 見吳與李 :《一滴淚》, 第 263 ～ 306 頁。雖然這材料講的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的情況, 但所描繪的幹部行為再現了王光美以前想要根除的那種行為。
【25】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第 11 冊, 第 43 ～ 46 頁 ; 薄一波 :《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下卷, 第 1115 ～ 1116 頁。
【26】 叢進 :《曲折發展的歲月》, 第 534 ～ 536 頁。
【27】 同上書, 第 533 頁 ; 薄一波 :《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下卷, 第 1116 頁。
【28】 毛 :《毛澤東思想集叢》(第 2 卷), 第 387 頁。
【29】 薄一波 :《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下卷, 第 1116 頁。
【30】 叢進 :《曲折發展的歲月》, 第 536 ～ 537 頁 ; 這資料稱, 劉不可能想到, 這種想法竟會毀了他自己。「和平演變」在 80 年代又成了毛以後的政權主要關心的問題。
【31】 薄一波 :《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下卷, 第 1116 頁。
【32】 同上書, 第 1118 頁。這指示載於國防大學 :《參考資料》, 第 24 卷, 第 435 ～ 436 頁 ; 協會章程載該書第 436 ～ 410 頁及鮑姆與泰偉斯 :《四清》, 第 95 ～ 101 頁。另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第 11 冊, 第 76 ～ 77 頁。
【33】 見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次交待 ;《問題與研究》 1970 年 7 月期, 第 96 頁。
【34】 薄一波 :《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下卷, 第 1118 ～ 1119 頁。
【35】 陳第一次, 也是最成功的一次趨炎附勢是在 30 年代末對毛的追隨, 幾年之後毛確立了無可爭議的領導權 ; 他最後一次, 也是最致命的一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隨林彪。
【36】 知情人 T。據他說, 王光美是在人數很多的會上作講話的。
【37】 彭真被替換, 可能是由於他當時剛剛被任命為負責文化革命的五人小組的組長。
【38】 薄一波 :《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下卷, 第 1118 頁。
【39】 同上書, 第 1119 ～ 1120 頁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第 11 冊, 第 132 ～ 134 頁。
【40】 鄭謙、韓鋼 :《晚年歲月 : 1956 年後的毛澤東》;《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 第 75 頁。據後面這份資料, 田對這次任命感到極為尷尬, 因為他完全不同意劉的左傾主義。
【41】 劉振德 :《我為少奇當秘書》, 第 193 頁。
【42】 廖蓋隆等編 :《新中國編年史》, 第 234 頁。毛的原話是「此件先印發到會各同志討論一下, 如果大家同意, 再發到全國去。我是同意陳伯達和少奇同志意見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第 11 冊, 第 144 ～ 147 頁 ; 薄一波 :《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下卷, 第 1123 頁。

【43】　工作會議是中央領導與大區第一書記的高層會議；姜化宣、張尉萍與肖：《中國共產黨會議概要》，第 508 頁。
【44】　見《當代中國的河南》，第 1 卷，第 148 頁。
【45】　鮑姆與泰偉斯：《四清》，第 104 頁。
【46】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121 頁。
【47】　鮑姆:《革命的前奏》，第 93 ～ 99 頁。修改的《後十條》文本載鮑姆與泰偉斯:《四清》，第 102 ～ 117 頁。有關劉的強硬態度，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1 冊，第 194 ～ 195 頁。
【48】　以前的地主等佔 21%，出身好但腐敗的幹部佔 26%；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124 頁。鮑姆認為在重點地方被撤換的幹部的比例很高，但在其他地方，數字可能要低得多，因此省的平均百分比不會高於 5%～ 10%；《革命的前奏》，第 103 ～ 104 頁。
【49】　知情人 I。
【50】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124 ～ 1125 頁；《徹底清算趙傳壁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滔天罪行》，第 10 頁。
【51】　引文來自西尤採訪的原話，見她的《南中國的特務和受害者》，第 201 ～ 202 頁。
【52】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1124 ～ 1125 頁。這一簡短的敘述清楚地說明大隊領導人至少有「缺點」，而他兒子的地位則說明至少該大隊有裙帶關係。
【53】　鮑姆：《革命的前奏》，第 112 ～ 119 頁。有關文化大革命後對大寨典型沉浮的敘述，見孫啟泰、熊志勇：《大寨紅旗的升起與墜落》。
【54】　鮑姆：《革命的前奏》，第 103 頁。有關 1964 年末基層幹部在社教運動中經歷的敘述，見上書第 106 ～ 112 頁。
【55】　似乎天津的黨完全沒有可能招來這樣一個高聲望的工作組；薄一波（見注 56）暗示天津的事完全是陳一人的主意。
【56】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545 ～ 546 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124 頁。
【57】　周國全、郭德宏：《動亂中的陳伯達》，第 9 頁。
【58】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127 頁。薄解釋說，他任主任的國家經委受命為中央起草指示，在城區放手發動群眾；他顯然試行改變在農村社教運動中使用的極端措施，但未辦到。
【59】　據住在北京的原外籍中共黨員；見李敦白與貝內特：《幕後的人》，第 284 頁。
【60】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117 ～ 1118 頁；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543 ～ 545 頁。叢進神秘地暗示這事與高崗有聯繫，曾任第一書記的張仲良（他沒有稱他為「同志」）承受了對這段時期的大部分責難。中央轉發了省和部的報告，並附有批示，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 24 卷，第 434 ～ 435 頁載有該文件。12 月份還有一份有關該廠的報告；有關毛和薄一波對此的批語，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1 冊，第 277 ～ 279 頁。對此案的結論於 1979 年被推翻；國防大學：《四十年簡介》，第 515 頁。
【61】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122 ～ 1123 頁。
【62】　在附加的中央通知中以及他長篇講話的開始時（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 24 卷，第 512 ～ 520 頁載有該講話的大部分），有跡象說明王下基層時間不長，還不能根據他的經驗說話（第 512 頁）。有關這個合作地區的其他報告，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1 冊，第 225 ～ 226、259 ～ 261 頁。
【63】　同上書，第 513 ～ 514、516 頁。
【64】　王實際上是指出農村共產黨的基本問題；農民走資本主義的自發傾向是毛在 1955 年發動合作化的主要原因；見《起源》，第 1 卷，第 16 ～ 17 頁。
【65】　這是毛以後農村的情況。
【66】　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 24 卷，第 514 ～ 515 頁；引文見第 515 頁。
【67】　鮑姆與泰偉斯：《四清》，第 63 頁。

【68】 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 24 卷，第 517 ～ 518 頁。
【69】 《起源》，第 1 卷，第 225 ～ 227 頁。
【70】 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 24 卷，第 518 ～ 519 頁。
【71】 同上書，第 509 ～ 510 頁。有關中央同意的指示是由劉起草的情況，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122 頁。有關毛事先即已同意的情況，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1 冊，第 241 ～ 242 頁。
【72】 在所有檔案解密之前，作為學者，只能囿於現有的資料；不過如果能得到高級官員而非中南局的關鍵性支援，無疑這材料將會被重印或者至少會被提及。
【73】 1963 年四川發動 66,000 名幹部組成工作組，到 1964 年 5 月，57% 的公社開展了社教運動；修訂後的《後十條》下發之後，又採取了跟進措施；《當代中國的四川》，第 1 卷，第 123-124 頁。在另一個省——李的老家貴州，社教運動進展得差強人意，因此省第一書記周林被撤職，從中央和大區中心派下來工作組來負責運動。一名地區書記李大章（音）接管省委書記一職，為期六個月。劉派遣中央領導的行為說明他無法容忍在李井泉所屬的地區出現倒退。見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編）：《當代中國的貴州》，第 82-83 頁；何頻：《中國掌權者》，第 2 卷，第 1055 頁；鮑姆：《革命的前奏》，第 126,199,200 頁。
【74】 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 24 卷，第 520 ～ 521 頁。
【75】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540 頁。
【76】 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 24 卷，第 501 ～ 503 頁。
【77】 克萊因與克拉克：《中國共產主義傳記辭典》，第 1 卷，第 178 ～ 179 頁。
【78】 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 24 卷，第 505 頁。
【79】 同上書（譯按：無頁數）。
【80】 同上書，第 504、505 頁。通知稱中央同意劉信中的意見；有關毛的批示，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1 冊，第 168 ～ 171 頁。
【81】 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 24 卷，第 505 頁。
【82】 這當然是會使紅衛兵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對劉的那種批示。
【83】 同上書，第 505 ～ 506 頁。
【84】 同上書，第 506 ～ 507 頁。有關劉對江渭清的羞辱和對湖南第一書記張平化的影響，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1 冊，第 275 頁注 1。
【85】 據一份材料（知情人 S），1961 年某個時候，鄧小平告訴柯慶施推廣包產到戶的試驗，柯遵守紀律，將這話傳給江渭清。江拒絕了，拍著桌子，堅持如果這指示直接來自毛，他才會服從這命令。知情人 S 認為江所以如此大膽是因為江蘇比諸如安徽那樣的省份損失要小，只有幾十萬（!）人死亡。
【86】 李，《毛主席的私生活》，第 413-415 頁。李醫生這種推理有一個問題：劉的病情是在 1964 年「春天」確診的，在中國意味著春節，也就是當年 2 月初，而毛下令撤銷領導們的健康局則是在 8 月；《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 年 7 月）第 83 頁。這時候毛已經不可能得償心願了。只要官方巧妙安排，現有的醫療設施總能保證領導們的健康繼續得到照顧，毛當然不會擔心。高京正：《平凡與偉大》第 30 頁中，有一張毛澤東醫療卡的照片，保證他可以在北京醫院治療。照片標題是：「毛很少去醫院，認為可以通過個人意志和抵抗力自我治癒」!
【87】 毛發動大躍進的決定是個關鍵的例子；《起源》，第 2 卷，第 15 ～ 19 頁。毛照抄赫魯曉夫的另一種形式的大躍進可以說明一個更為普遍的現象：極權國家的領導人可能會密切注意，確切說，是在適當時，會仿傚類似領導人的行為。據斯大林的一名譯員說，在 1934 年德國的清洗後，這位蘇聯領導人評論說「你聽到在德國發生的事了嗎？希特勒，多麼偉大的人啊！這就是對付你的政敵的方法」。這譯員指出德國的清洗是在夏天進行的，而 12 月份列寧格勒的黨的領導人基洛夫就被暗殺了，給斯大林以藉口，發動了清洗列寧的舊同事的廣泛運動；別列日科夫：《在斯大林身旁》，第 9 ～ 10 頁。
【88】 例子參見李：《毛主席的私生活》，第 229-230 頁，第 434-435 頁，第 443 頁。赫魯曉夫偏執得還不夠。反對他的政變的消息是通過他兒子告訴他的，但在簡

單地詢問後，他認為這全屬子虛；赫魯曉夫：《赫魯曉夫回憶赫魯曉夫》，第 86～122 頁。

【89】 康奎斯特：《赫魯曉夫後的俄羅斯》，第 77～123 頁。梅德韋杰夫：《赫魯曉夫》，第 225～245 頁。「輕率的計劃」是蘇共中央形容赫魯曉夫有風險的政策的詞彙。

【90】 赫魯曉夫：《赫魯曉夫回憶赫魯曉夫》，第 79 頁。

【91】 據一份分析材料，是江青引用蘇聯的先例警告毛，劉少奇越來越顯赫的地位和越來越多的講話構成了對他的危險；《王力談毛澤東》，第 79 頁。1957 年 6 月幾乎成功地將赫魯曉夫搞掉的事可能也對毛的行動有影響；在赫魯曉夫幾乎被搞下臺後不久，毛與劉和彭真在反右運動如何進行問題上的妥協難道只是巧合嗎？見《起源》，第 1 卷，第 293～310 頁。

【92】 鍾誠、夏魯與葉蘭：《領袖交往實錄系列：毛澤東》，第 56 頁。

【93】 見下面第 19 章。

【94】 上書，第 119 頁。

【95】 這是毛在 1965 年 1 月 9 日對斯諾說的；斯諾：《漫長的革命》，第 70、205 頁。

【96】 康奎斯特：《赫魯曉夫後的俄羅斯》，第 114 頁。

【97】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602 頁；顧龍生：《毛澤東經濟年譜》，第 615 頁。

【98】 在《毛澤東經濟年譜》中，每年所佔篇幅是說明毛對經濟事務的興趣與活動情況的可靠證明。1958 年 35 頁；1959 年 69 頁；1960 年 15 頁；1961 年 33 頁；1962 年 19 頁；1963 年 10 頁；1964 年 30 頁；1965 年 17 頁；1966 年 6 頁。以後，沒有一年超過 3 頁。

【99】 有關彭德懷將毛與秦始皇對比的情況，見《起源》，第 2 卷，第 206 頁。

【100】 引自《史記》，載圭索、帕加尼與米勒：《中國的始皇帝》，第 22 頁。

【101】《起源》，第 1 卷，第 105～107 頁。從鄧小平 80 年代末正式退休以後繼續所起的作用來看，顯然毛不論名義上居於什麼地位根本不可能不管事。

【102】 不清楚為什麼劉說彭真管五反，因為薄一波已取代彭管五反了。可能彭是負責全面監督的書記處成員，不是負責日常事務的；也可能劉更關心農村的運動，以致忘記了。

【103】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602 頁。

【10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1 冊，第 256～258、265～274、286～287 頁；顧龍生：《毛澤東經濟年譜》，第 615～616 頁。

【105】 李，《毛主席的私生活》，第 416 頁；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602 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128 頁。李醫生將這次會議開始時間錯記成 1965 年 1 月；1994 年 10 月 7 日在哈佛大學的一次演講中，他說毛患過一次重感冒。

【106】 姜化宣、張蔚萍、肖：《中國共產黨會議概要》，第 508 頁。劉 12 月 5 日所作分析的原文未收入他的《選集》中。有些材料說會議自 12 月 15 日開至 28 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史》，第 314～315 頁；《中共黨史大事年表》，第 337 頁；姜化宣、張蔚萍、肖：《中國共產黨會議概要》，第 507 頁；蘇東海與方孔木：《中華人民共和國風雲實錄》，上，第 962 頁；其他材料認為會議於 1965 年 1 月 14 日結束，該日發佈了 23 條——國防大學：《七十年簡介》，第 515～516 頁；懷恩：《周總理生平大事記》，第 448 頁；黃錚：《劉少奇一生》，第 398 頁。肯定會議在 1 月初仍在繼續，可能是非正式的會議；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130、1132 頁。各方所記日期有出入可能反映了當時的政治形勢：劉少奇主持的工作會議在 28 日結束。制定了 17 條，但毛繼續徵求意見，以致改為 23 條。薄說會議準備在 28 日結束；《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128 頁。

【107】 蘇東海與方孔木：《中華人民共和國風雲實錄》，上，第 962 頁。

【108】《毛澤東思想集叢》，第 2 卷，第 409 頁；《(毛澤東) 學習文選》，第 3 卷，第 58 頁。劉遲到，這在一個官員們以準時為榮的政權裏是令人感到奇怪的事。毛是故意突然早到，從而使劉難堪嗎？

【109】12 月 20 日討論的原文，在西方第一次見於《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第 578 ～ 596 頁，譯文載《毛澤東思想集叢》，第 2 卷，第 408 ～ 426 頁。這一版本有缺點，即有些報告人沒有指明，尤其是劉少奇、鄧小平，以及王光美的報告：「在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往往出現 X 字樣，這是指那些受到批判的人。在《(毛澤東) 學習文選》，第 4 卷，第 56 ～ 72 頁刪去了其他版本中的一些段落，但指出了發言人的姓，使人能知道他們是劉和鄧。該版本所指發言人與《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不同，但更可靠；如將一次講話的發言人說成是鄧而不是毛，而又將另一次講話的發言人說成是毛，而不是另一名不知姓名的人。在本書後面的討論中，這二個版本我都使用了。

【110】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128 頁。

【111】姜化宣、張蔚萍、肖：《中國共產黨會議概要》，第 509 頁；在《毛澤東思想集叢》第 2 卷第 408 ～ 444 頁中討論的實質證實了我的這個分析。另見許全興：《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第 308 頁。

【112】《毛澤東思想集叢》，第 2 卷，第 413 ～ 14 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129 頁。

【113】《毛澤東思想集叢》，第 2 卷，第 414 頁;《起源》，第 2 卷，第 136 ～ 159 頁。1959 年，陶鑄也是左傾分子之一。

【114】《毛澤東思想集叢》，第 2 卷，第 415 ～ 418 頁。

【115】《毛澤東思想集叢》，第 2 卷，第 418 頁。

【116】《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1 冊，第 267 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128 ～ 1129 頁。

【117】洪承華與郭秀芝：《政治體制沿革大事記》，第 282 頁。據《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1 冊，第 268 頁，註釋 8，「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這個詞是薄一波所寫的解釋性批語的一部分；毛寫的是「這些人」，而薄則增加「這就是說那些在企業領導崗位上堅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不清楚薄的這個解釋是徵求過毛的意見後寫的，還是自行寫的，這一解釋也印在分發的文本中。在薄講述毛的重要批示的四行文字中，沒有提到他自己的作用。

【118】《毛澤東思想集叢》，第 2 卷，第 411、412、414 頁。周恩來同意毛的意見，指出政府中有 3 名高級黨員已撤職，似乎是在討好毛。

【119】同上書，第 412 頁。趙生輝：《中國共產黨組織史綱要》，第 358 ～ 359 頁。有關中央組織部對毛早在 1964 年 7 月十三陵政治局工作會議上提出的問題所作的工作，見《1965 年中央組織部關於黨的建設的三個報告的形成過程》，載《中共黨史資料》，第 52 卷，第 12 ～ 21 頁。

【120】據薄自己說，在社教運動中，不可能保護按《工業七十條》工作的工廠不受被資本主義控制的指責；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136 頁。

【121】《毛澤東思想集叢》，第 2 卷，第 418 頁。李先念的意思有點不清楚，可能他的意思是如果不整當權派，就必然要整毛明顯想要保護的貧農。毛也強調有必要首先攻擊更危險的反對派，即黨的幹部，而不是以前的地主，這些人已經搞臭過了，他還引偉大的唐朝詩人杜甫「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的詩句。同上書；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129 頁；譯文來自華特遜：《哥倫比亞中國詩集》，第 221 頁。

【122】王鶴壽在大躍進期間曾以增加鋼鐵產量的熱情受寵於毛；《起源》，第 2 卷，第 165 ～ 170 頁。此時，毛兩次詢問王的命運，顯然因為他的一名寵信被他自己的政策所套住而不高興；《毛澤東思想集叢》，第 2 卷，第 419、422 頁。有關文化大革命後對此事責任由誰負的說法，見上書，註釋 61。

【123】趙生輝：《中國共產黨組織史綱要》，第 358 頁。

【124】《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第 591 ～ 592 頁;《毛澤東思想集叢》，第 2 卷，第 417、420 ～ 421 頁。

【125】同上書，第 424、426 頁。

【126】《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1 冊，第 280 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129 頁。
【127】毛坐在斯大林右邊；見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封面照片。
【128】主要客人為毛的親表兄王季范，他將毛從韶山帶到長沙，然後進入更廣闊的世界，毛始終對他抱有感激之情；學者和教育家章士釗；在內戰期間湖南的國民黨將領，和平地率該省向人民解放軍投降的程潛，和學者與書法家葉恭綽。這五個人鬆弛地相互談著話，而他們的後代則在旁邊談話。王帶著他的孫女王海蓉，王海蓉後來成了毛的親密助手；章帶了他的女兒章含之，章含之後來成了外交部長喬冠華的妻子；程帶了他的長女；葉則帶了他的孫女兒來。毛的女兒李敏（賀子珍生）和李訥（江青生）也在場。江青進進出出，向毛傳達來拜謁的官員的話，只在吃中飯時才參加進來。據知情人 R 說這次會見在中南海舉行，不在毛的住處；但是，在李：《毛主席的私生活》中有一張照片顯示，毛人民大會堂 118 房（正式名字是北京廳），該房設施豪華，從 60 年代初就成為毛澤東的專用房間。（上書，第 356 頁）有關毛與章士釗的關係的簡史，見路海江與賀明洲編：《毛澤東和他同時代的人》，第 356 ～ 361 頁；有關他與程潛的關係，見上書，第 338 ～ 341 頁，與呂星斗:《毛澤東和他的事業》(上)，第 605 ～ 608 頁。
【129】高京正：《平凡與偉大》，第 42 頁。
【130】李：《毛主席的私生活》中有毛和他的私人工作人員在大會堂的照片。毛在 1966 年 73 歲的生日也是以政治姿態慶祝的。與江青一起，他招待了文化大革命小組的領導成員：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關鋒與戚本禹。見王力：《現場歷史》，第 100 頁。王指出林彪、周恩來、陶鑄（當時是高級政治局委員），康生和李富春均未被邀。
【131】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131 頁。據另一份材料，彭真、羅瑞卿、餘秋理和陶鑄的妻子曾志也與毛同桌；黃瑤：《三次大難不死的羅瑞卿大將》，第 235 ～ 236 頁。
【132】在 12 月的人民代表大會上，周恩來命令華北局和山西省第一書記李雪峰和陶魯笳再次肯定大寨的業績，因為他收到誹謗大寨的報告；陶魯笳：《一個省委書記回憶毛主席》，第 117 ～ 120 頁。鑒於陳永貴後來的不光榮歷史，陶強調大寨領導人的左傾錯誤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發生的，當時陶已不負責山西了；同上書，第 121 ～ 127 頁。
【133】孫啟泰與熊志勇：《大寨紅旗的升起與墜落》，第 35 ～ 69 頁。《中國青年》1964 年 12 月 1 日（第 23 期）封面上是陳永貴向青年們講階級問題的照片。
【134】《毛澤東思想集叢》，第 2 卷，第 427 頁；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603 頁。
【135】同上書；《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1 冊，第 280、283 ～ 284 頁。十七條只說原則上前十六條既適用於城市，也適用於農村。叢進稱劉並沒有直接反對毛，但劉與毛的提法不一樣就足以使毛生氣了，這點叢進也承認（第 604 頁）。
【136】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604 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131 頁；《毛澤東思想集叢》，第 2 卷，第 429 ～ 432 頁。據在毛百歲誕辰時出版的傳記性畫冊（有中、英文說明），主席在使用身份證的時候總是很謹慎，在出席會議時登記；高京正：《平凡與偉大》，第 29 頁。
【137】《起源》，第 2 卷，第 222 頁。
【138】美駐香港總領事：《當前背景材料》，第 891 期，第 71 頁。
【139】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128 頁。
【140】據一份材料，劉是受彭真和陶鑄的勸告作自我批評的，他對插主席的講話，對主席尊重不夠，表示道歉，對此，主席生氣地說，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而是他們之間的原則分歧，修正主義與反修正主義之間的分歧。見葉永烈：《陳伯達其人》，第 214 頁。據葉永烈所根據的另一份材料，這一場面是陳伯達後面挑唆的結果；王力：《現場歷史》，第 147 頁；《王力談毛澤東》，第 80-81 頁。後一書中，王力讚揚陳伯達將文化大革命推遲了一年。葉對這次工作會議的敘述與薄不一樣，他說毛未參加劉主持的 12 月份的會議，毛這次發火是在鄧主

持的 1 月會議上（《陳伯達其人》，第 212 頁）。由於薄的敘述是根據回憶寫的，而且他可接觸到最高級的黨的檔案，人們應該假設他的說法是更為準確的；沒有什麼明顯的理由他會捏造事件發生的次序。

【141】蘇東海與方孔木：《中華人民共和國風雲實錄》，上，第 962 頁。

【142】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131 ～ 1132 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1 冊，第 281、284 頁（文稿給出了陳伯達的原話，新的中央指示據說是第 815 號）。沒有看到全部中央文件，難以說清這究竟是多麼不正常的事，但薄一波的反應說明中央文件在所有主要領導人都在場的會議上通過後又被撤銷是從未聽到過的事。有關對中央文件制度的討論，見利伯索爾：《中國的中央文件和政治局裏的政治》。

【143】見下第 19 章。

【144】呂廷煜：《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曲折發展（1958-1965）》，第 117 頁。目前所能得到的 1 月 3 日討論的原稿（《毛澤東思想集叢》，第 2 卷，第 437 ～ 444 頁）與 12 月 20 日的原稿大不一樣；這次全是毛一人在講話，劉只是講了少數辯解的話。

【145】據王力稱，這推遲了毛對劉的攻擊；見沈邁克（編）：《知情人談文化大革命：王力的回憶錄》，載《中國法律與政府》1994 年 11 ～ 12 月期，第 16 頁。有意思的是 1964 年 10 月至 1965 年 1 月呆在中國的美記者斯諾會見到毛與周恩來；但當他要求會見其他領導人，包括劉少奇時，總理告訴他「我沒有必要『打擾』這些『忙人』，因為他可以回答他提的任何問題，而且，如果他回答不了，毛可以回答」；托馬斯：《高度冒險的時刻》，第 312 頁。

【146】這樣說是因為最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許多材料在工作會議的確切日期上說法不一。見上註釋 103。

【147】《毛澤東思想集叢》，第 2 卷，第 437 ～ 444 頁。

【148】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604 頁。

【149】不清楚毛是否迫使計委善待他們的取代者，還是計委成員邀請他們參加計委，以便用將反對者請進來再消滅之的經典官僚辦法，使毛的創議不能實現。據一名計委成員說，是李富春提出建議使這新小組進入原有的計委，然後逐漸取而代之（毛同意此建議）；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205 ～ 1211 頁。毛在 1965 年 1 月 21 日對李富春的報告作批示時提到小計委；《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1 冊，第 316 ～ 317 頁。

【150】有關彭真的作用，見上書，第 1132 頁。

【151】鮑姆與泰偉斯:《四清》，第 118 頁。事實上，這份在會議後頒發的含有《二十三條》的內部小冊子只將毛的《前十條》也包括進去了。

【152】立法的歷史敘述了美國國會在起草與通過國會助手們準備的法案時的考慮，其目的是澄清參議員與眾議員的意圖，以便法官們在以後被要求在法院對法律條文作解釋時用。事實上，立法的歷史往往是含糊其辭的，為司法解釋留下廣泛的餘地。見梅爾尼克：《章程與法院》，第 77、159、373 ～ 379 頁。

【153】鮑姆與泰偉斯：《四清》，第 118 ～ 126 頁。

【154】1964 年 11 月 11 日，中央組織部派了 250 人的工作隊在副部長張磐石率領下到北京大學進行社教運動。這些人似乎被左傾的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所說服，認為整個大學都亂成一團並且是由「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領導的。（聶在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初是校園中帶頭的毛分子）工作組所作這樣內容的報告得到康生的支持。彭真及其高級同事們對事情出現如此變故感到相當憂慮，派出了北京市黨的官員去扭轉形勢。聶收到一個電話，向她保證她得到最高層的支持，於是堅持己見。最後，彭真 1965年3月1日將此事向毛和政治局報告。主席顯然相信彭的保證北大校長陸平是個好同志，兩天後，書記處決定停止攻擊北大的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宣傳部的工作隊撤走了，陸定一於 3 月 5 日作了報告，北大的社教運動轉由北京市一個小工作隊負責，工作隊由市委書記萬里率領。校職工在國際飯店集中開會，雖然聶打了一場猛烈的後衛戰鬥，但陸平和他的夥伴們還是解脫了。7 月，召開了第二次國際飯店會議解決哲學和經

濟系的問題，甚至康生出面幹預也未能使聶免於受批評。見閻捷：《八載青春夢》，第 26 ～ 30 頁；《教育大事記》，第 370；郝平：《重新評估文化大革命的起點》，載《中國國際評論（夏威夷）》1996 年第 1 期（春季刊）第 71 ～ 74 頁；知情人 U。

【155】鮑姆與泰偉斯：《四清》，第 120 頁。

【156】據《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1 冊，第 284 頁，在 17 條改為 23 條時增加了 7 條（1，4，6，8，9，10，22 條），取消了一條。有關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段落在第二條裏。然而，這份材料也指出字句作了許多改動，但顯然將原有的幾條包括進去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一段未在這份材料裏出現（第 281 ～ 283 頁），可能是受信任的陳伯達所為。有關周的作用，見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605 頁。

【157】福建省委於 1 月 18 日發出這文件；鮑姆與泰維斯：《四清》，第 118 頁。有些大區和省的書記，特別是那些反對劉的嚴厲路線的人，可能事先就提出北京新風向的警告。如，在 1 月 13 日，華北保定地區委員會報告他們按毛主席指示精神改變了社教運動的作法；毛在 15 日作了表揚的批示；《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1 冊，第 312 ～ 313 頁。

【158】陳、馬德森與昂格爾：《陳莊》，第 41 頁。馬德森：《一個中國村莊的道德與權力》第 67 頁將工作隊抵達時間定為 1 月底左右。

【159】陳、馬德森與昂格爾：《陳莊》，第 42 頁。有關社教運動在陳莊的活動情況，見上書，第 41 ～ 73 頁；馬德森：《道德與權力》，第 67 ～ 101 頁。

【160】知情人 R。

【161】1965 年 6 月，毛命令身邊工作人員參加社教運動。李：《毛主席的私生活》，第 422-429 頁，引用在第 427 頁。

【162】當然，他們不久就面對文化大革命更具破壞性的影響，此時薄已被罷黜，無力幹預了。

【163】呂延煜：《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曲折發展》，第 118 頁。

【164】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1134 ～ 1135 頁。《決議註釋修定本》，第 367 頁。社教運動與文化大革命初期重疊在一起的例子是 1966 年 5 月 16 日。該日陶鑄向中南局官員作了一個有關社教運動的報告，而三天後又向群眾大會作了有關文化大革命的報告；鄭曉峰、舒玲：《陶鑄傳》，第 417 頁。

第十九章 毛以退為進

【1】 斯諾：《漫長的革命》，第 17 頁。（毛）接見斯諾是在 1970 年 12 月 10 日。提出「走資派」實際是在第二條而非第一條中。恰巧斯諾 1965 年 1 月 9 日採訪了毛，正是人們猜測主席下決心撤掉劉的時間；見托馬斯：《高度冒險的時刻》，第 312 ～ 315 頁。

【2】 例見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605 頁。

【3】 《中共黨史人物傳》，第 48 卷，第 120 頁。

【4】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605 頁，引用了這一說法。

【5】 有意思的是，在毛死後，為劉少奇平反恢復名譽時，黨的方針認定：「修訂的後十條」對局勢的嚴重性估計過度，因之是「極左的」；《決議詮釋修訂本》，第 25、366 頁。

【6】 見呂星斗：《劉少奇和他的事業》，第 316 ～ 317、401 ～ 411、435 ～ 436 頁。泰偉斯：《毛朝廷中的政治》，第 41 ～ 43 頁。亦見施拉姆：《毛澤東的思想》，第 111 頁；迪特默：《劉少奇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第 244 ～ 246 頁；關於劉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為這些錯誤所作自我批評，見《問題與研究》1970 年 6 月號，第 93 ～ 94 頁。

【7】 見《起源》，第 1 卷，第 177 ～ 199 頁。

【8】 高崗 1953 年妄圖取代劉少奇，作為毛的第二號人物，部分地是因毛曾向高批評劉和周恩來，見泰偉斯：《毛朝廷中的政治》，第 37 ～ 39 頁。該書對高崗事件作了詳盡分析。泰偉斯和其消息靈通的口頭資訊來源的觀點一致，即懷疑毛要撤掉劉；但主席在高這樣顯然野心勃勃的副手面前，表現得如此不謹慎，甚至有些挑釁，這就令人覺得另有原因了。我們現在已經清楚，毛總是屢出怪招，用一句共產黨老掉牙的口頭禪來形容：「那肯定不會是偶然的事嘛，同志！」確實，大多數共產黨高級人物，包括鄧小平，未能當即斷然地駁斥高的遊說，表明他們認為高可能是代表毛來找他們的，因此有所警惕——毛與高的密切關係是人所共知的。

到高崗事件時，劉已協助毛得償所願：幫助毛處理掉其對手王明並確立他的權威。黨內爭奪領導權的鬥爭早已過去，反對國民黨的內戰勝利結束，這時毛可能變得更難容忍工作方法上和氣質方面的分歧，更難容忍在執行毛的政策中，劉走得太右或太左的傾向。毛也焦慮不安地感到，有相當多的黨的高級幹部和劉的聯繫，比和他的聯繫密切得多。因之高崗這一插曲可能是企圖貶低劉，而使毛處於爭鬥之上，靜待爭鬥的結局，維持他作為統一領袖的形象。如果高能發動多數人支持，倒劉成功，毛可能民主地點頭服從多數；並可允許劉作為次一級人物繼續存在，如毛早年對手王明和李立三一般。而實際情況是，高的陰謀活動，是由鄧小平和陳雲向毛報告的，主席也失去了「否認的可能性」：若在此時毛撤掉劉，便意味將其全部聲譽投入一場派係爭鬥中，必將毀掉延安的「圓桌」和圓桌的捍衛者的自身形象。於是相反，毛民主地點頭服從另一種多數，而犧牲了高。

從此之後，毛盡量與他建立的領導集團融洽周旋、亦如當年在延安為鞏固其個人權力一樣；正如本書的分析所指出、李志綏披露的資訊所證明的，他長期以來對劉都難以釋懷，對他日益增長的權力、日益增長的與自己分庭抗禮的意願，深表憂慮。無需假設從 50 年代初以來，毛就在不斷尋求搞掉劉；只需要假定，毛願意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文化大革命期間毫無原則地使用陰謀，一點都不奇怪。

【9】 參見瑪格麗特·撒切爾：「我從政治中學到一件事。只在你不得不作決定時，你才去作決定。」見克拉克：《日記》，第 150 頁。

【10】 見汪東興的材料《隨毛主席重上井岡山日記》，載《中共黨史資料》第 40 期，第 124 ～ 144 頁。

【11】 見前面第十六章。

【12】 見《起源》，第 1 卷，第 5 ～ 7 頁。

【13】 無疑地，如果毛有兩個強力繼承人，使之相互傾軋，他會感到威脅少得多。例如英國首相哈羅德·威爾遜，當 60 年代末他有兩個明顯競爭的繼承人（喬治·布朗和詹姆斯·卡拉漢）時，便感到心裏安逸自在得多；而當他們倆仕途受挫，有段時期，他只剩下一個繼承人（羅伊·任金斯）時，他真是憂心忡忡的。見皮姆洛特：《哈羅德·威爾遜》，第 488 ～ 491 頁。

【14】 1961 年 10 月 15 日倫敦《星期日時報》。中國作者通常引述這件事以證實：毛已指定劉作他的繼承人。關於同一次談話的內容，亦見外交部外交史編輯室：《新中國外交風雲》，第 48 ～ 57 頁。以下情況，只供記錄用：本作者，在蒙哥馬利元帥訪問中國前，向其簡單介紹情況時，曾建議他提出這個問題和另一個問題。

〔關於後一個問題，有必要澄清一下上述兩個報道和最近一篇中文文章（該文是很具權威的）之間的差異。按英國元帥說「我問道，劉之後會是誰。他稱不知道或是不想管；他自己那時會已經去見卡爾·馬克思了；在中國他們自己會把這問題解決的！」剛才引用的中文文章（指《外交風雲》）以簡略形式證實了這一敘述，該文引用毛的話說（第 57 頁）：「在劉之後我管不了……（原文如此）」在兩位熟悉中國共產黨黨史的中國人所寫文章中，毛對繼承問題的回答，據說是這樣：「我的繼承人，第一個是劉少奇；第二個是鄧小平」；見龔

育之和石仲泉:《時代的重托，歷史的選擇》，載《新華文摘》1994 年第 10 期，第 1 頁。不過這個說法是錯的；有我和龔育之的私人通信為證。]

龔和石引述了 1957 年當赫魯曉夫提同樣問題的時候毛的回答，說在他之後會有「劉少奇、鄧小平和周恩來」。赫魯曉夫回憶的可不同：毛對劉，周和朱德持批評態度，「他的同志中，毛唯一似乎只讚賞鄧小平」；見《赫魯曉夫回憶錄：最後的遺囑》，第 288 頁。赫魯曉夫和基辛格與蒙哥馬利不一樣，似肯定有自己的譯員，他會不理中國的自我審查制度，而報道毛所真說的話；另一方面，赫魯曉夫也可能記錯，或者他想在他的北京宿敵中間散播一點混亂。

【15】 1965 年 2 月 1 日《中國青年》第 3 期封面刊登兩人在全國人大會上的照片，在這次大會上劉再次當選國家主席。

【16】 1961 年的文件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9 冊，第 556～559 頁。第二篇論戰文，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文》，第 123 頁；關於毛在第二篇論戰文中的作用，見黃崢:《劉少奇一生》，第 374 頁；關於第九篇論戰文，見林青山：《林彪傳》，上卷，第 201 頁；在已出版的第九篇論戰文文本中未見有對劉地位的這類讚頌之處。

【17】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606 頁。劉少奇仍繼續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起草指示；如 1965 年 7 月，不過他注意在發佈前，要經毛審閱；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1 冊，第 406～407 頁。似乎是所有強力領導人通常均須小心行動，擔心會招致反對。如溫斯頓·丘吉爾於 1940 年 5 月，在一波大眾的熱情中，接替納維爾·張伯倫任首相；他均能以其領導（才能）和振奮的演說，保持住了這種熱情，雖然後來在對納粹德國的戰爭中受到挫折。但他發覺，即使在英國戰爭的高峰時，也無法贏得國會保守黨黨團的支持，因為國會中忠誠於張伯倫的人佔多數，他們不斷敵意地作梗。因之丘吉爾只得保留且實際支持張伯倫仍任職，直至後者因健康不佳而辭職，爾後他才慢慢砍掉張伯倫派的機構；但也直到他成為首相 14 個月之後，張伯倫死去 8 個月之後，丘吉爾才感到確有把握除掉已故領導人的那些不願妥協的追隨者們，並按自己意願大幅重組政府；見羅伯茨：《傑出的丘吉爾信徒們》，第 137～210 頁。

【18】 林青山：《林彪傳》，上卷，第 201 頁。

【19】 早在 30 年代，鄧小平即曾是毛個人集團中一員；見《起源》，第 1 卷，第 142 頁。關於毛 1963 年 12 月的評論說，在每一次動盪中，鄧實際上都是支持他的，見王力：《現場歷史》，第 93 頁；關於毛對鄧能力所作的不斷高度評價，即使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清洗以後也有好評；見同書，第 96 頁。朱德雖然從 20 年代末在井岡山的時候起便與毛交往親密，當他成為領袖後，更是一貫忠於他，但朱有個獨立的人品；當長征前毛受屈時，和鄧不同，朱並未和他一樣受辱。到 1965 年時，朱的重大政治意義，乃在於他是政治局委員的一員，毛通常靠他投贊成票。

【20】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109～112 頁;《起源》，第 2 卷，第 24～29 頁。

【21】 同上書，第 59～63 頁。

【22】 對於周的唯命是從，毛的醫生尤其看不慣；例如，見李：《毛主席的私生活》，第 508-511 頁。在 1994 年 10 月 2 日《紐約時報》刊登的一篇專訪中，李的話更加刻薄：「周實際就是毛的奴隸。他言聽計從。無論什麼時候見到他跟毛在一起，都像僕人跟著主子一樣。很多人都認為周保護了別人，認為他是個好人。實際上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毛的旨意。毛是坐轎子的，周是抬轎子的。」1994 年 10 月 7 日他在哈佛大學作演講，之後回答問題環節，他的說法更簡潔：主席和總理的關係概括成三個字，就是「主與僕」。這位已故醫生的尖刻評價無疑部份反映他根本不信任周，他的回憶錄中充分體現了這一點，但凡是學習毛澤東時期的共和國政治的人，沒有誰會不相信，周從來沒有刻意僭越毛。

【23】 程華：《周恩來和他的秘書們》，第 251 頁。

【24】 這十天中有七天，周足不出戶，全心修改文稿，改了十五遍；石仲泉：《周恩來的卓越奉獻》，第 336-339 頁；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123-128 頁。

【25】 石仲泉：《周恩來的卓越奉獻》，第 363 頁。

【26】 程華：《周恩來和他的秘書們》，第 153,198,490 頁。（參見秦始皇的行為：「一次，皇帝從山頭望見丞相李斯的車駕隨從隊伍甚為龐大，大為不快。有人轉告李斯，李立刻解散隨從」；伯德：《秦的政權和秦始皇》，《劍橋中國史》，第 1 卷，第 71 頁。）回憶此事的秘書們的說法有所出入，其中一人說，私人辦公室被解散，另一個說他將秘書從六七人減少到兩三人。之前的 1958 年初周與毛之間也曾發生過問題，他把人數從十二人減到六七人。

【27】 就好像有些中國人說的那樣，周沒有毛的勇猛和眼光；見張素華、邊彥軍、吳曉梅：《說不盡的毛澤東》，第 534-535 頁。

【28】 和周恩來一樣，陳雲也在八屆二次會議上作了充分自我批評；見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128 ～ 131 頁。

【29】 見前面第七、八、十二章。

【30】 參考 80 年代末英國財政大臣的話：「現代經濟的特徵便是：雖然總有轉折點，但要預見這些轉折點何時發生，卻不可能。因之，當不涉及具體時間談論經濟時，總可以預測會有一個轉折點；而當談及即將臨近的年份時，就決不可預測會出現一個轉折點——因為在某一特定年份裏，其機率很可能是轉折點不會發生」；見勞森：《第十一號的觀點》，第 807 頁，著重點屬原書所有。陳雲真不幸，1962 年他無意地採取這樣態度，可是中國經濟卻突然好轉，使他處於難堪境地。

【31】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580 ～ 581 頁。在對待毛的表現上，周恩來和陳雲行動舉止的差別，也許在清初學者黃宗羲論述為臣之道的這段文章中，表述得最精當了：「……則臣道如何而後可？曰：緣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吾以天下萬民起見，非其道，即君以形聲強我，未之敢從也，況於無形無聲乎！非其道，即立身於其朝，未之敢許也，況於殺其身乎！不然，而以君之一身一姓起見，君有無形無聲之嗜好，吾從而視之聽之，此宦官宮妾之心也；君為己死而為己亡，吾從而死之亡之，此其私者之事也。是乃臣不臣之辨也。（譯按：《原臣》，《黃宗羲全集》，第 1 冊，第 4 頁，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11 月第 1 版）

【32】 見前面第十章。

【33】 見《起源》，第 2 卷，第 55 ～ 59 頁。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者均不願考慮，劉和周之間存在敵對競爭的可能。

【34】 見《起源》，第 2 卷，第 63 ～ 71 頁。在《起源》第 2 捲出版後，我獲得關於 1958 年人民解放軍會議的更遠為充分的報告，見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274 ～ 299 頁，書中透露，彭德懷牽涉到軍事宗派主義，這也是他遭罷黜因素之一。

【35】 顯然林彪樂於從彭德懷的罷官中得益。賀龍元帥能在這次會議與中央八中全會間，應毛的召請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以嚴厲批判彭，完全是因為主席知曉他們兩人間有積怨。關於政治局常委會會議的記述，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 215 ～ 261 頁。

【36】 《起源》，第 2 卷，第 222 ～ 223、228 ～ 233、237 ～ 247 頁。

【37】 引自吉廷斯：《中國軍隊的作用》，第 245 頁。

【38】 《解放軍將領傳》，第 2 卷，第 287 頁；第 11 卷，第 268 ～ 270 頁。

【39】 江波和林清（編）：《1959 年以後的林彪》，第 11 頁。講話全文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第 145 ～ 154 頁（此處引文在第 153 頁），或在《林彪選集》，第 102 ～ 119 頁（引文在第 118 頁）。

【40】 江波和林清（編）：《1959 年以後的林彪》，第 12 頁。

【41】 《毛主席語錄》，1966 年發行第 2 版，有林彪的序言。關於林最初的建議，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9 冊，第 544 頁。

【42】 見斯諾：《漫長的革命》，第 205 頁。

【43】 可參考第一個使用「撒切爾主義」這詞語的英國資深政治家對這個詞的評價：「我相信，撒切爾主義是一個很有用的詞，在當時肯定是有的。現代首相中沒

有能以他或她自己的名字，命名一個特殊的政策和價值的大集合體。不過它須很謹慎地使用。錯誤的定義是「不論瑪格麗特·撒切爾本人在任何時候所作或所說的任何事情」。正確的定義包含一個大的混合體：自由市場、金融紀律、對公共消費的堅定控制、削減稅賦、民族主義、(薩繆爾·斯邁爾斯的各種自助辦法的)「維多利亞式的價值」、「私有化和一絲平民主義味兒」。(勞森：《第十一號的觀點》，第64頁；著重點系本作者所加。) 中國宣傳家們，在主席有生之年，枉費心機地和這種觀點作鬥爭：即不論毛本人在任何時候所作或所說的任何事情便是毛主義；直到他死之後，中國黨史學家才得以列出構成毛澤東思想的那些成分，並明確指出它們的來源 (除了毛之外)。當然，勞森深感必需指出這一點便意味著在英國和國外存在相當的錯覺：把撒切爾主義理解為不論是撒切爾夫人所作或所說的任何事情。如果說在一個有新聞自由而沒有列寧式政治的國家，把領導人等同於一系列政治理念的公式，尚得以流行，那在毛式的中國，就更加如此了。

【44】 李：《毛主席的私生活》，第412頁。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965年11月，由林彪提議，經毛同意，確定1966年人民解放軍工作五條指導原則的頭兩條是：活學活用毛著作和「四個第一」；《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第480～481頁。

【45】 當林接手時，約三分之一的連隊沒有黨支部，大多數排裏沒有黨小組；18個月後，全部連隊均有黨支部，80%的排裏有黨小組。見吉廷斯：《中國軍隊的作用》，第246～251頁。取消軍銜不是林的建議，而是毛與賀龍1964年8月交換意見的結果；黃瑤：《三次大難不死的羅瑞卿大將》，第231頁。人民解放軍於1965年1月12日提出了正式報告，毛隨即予以批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第308～309頁。不過早在1963年12月，毛在批閱一個軍隊文件中，即曾倡議修改文件，以「同志」代替軍銜稱呼；同書，第10冊，第463頁。

【46】 引自吉廷斯：《中國軍隊的作用》，第254～255頁。關於毛號召其高級同僚學習林彪的話的例子，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第237～238頁。

【47】 交通在中國是指運輸而非傳媒。

【48】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第454～458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1150～1151頁。

【49】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1151～1152頁；吉廷斯：《中國軍隊的作用》，第256～257頁。有趣的是，雖然毛至少在1963年12月即急切想讓人民解放軍捲入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去，但這種想法似並未很快有結果。1964年11月時的前景僅是高層試驗即將開始；1965年8月毛仍須鼓勵人民解放軍，向某陸軍工程學院的學生學習，這些學生在黑龍江參加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5年10月林彪把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列為人民解放軍第三項最重要任務，位於學習毛著作和抓戰備與政治工作之後，但到11月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並未出現在他的1966年人民解放軍工作五項指導方針裏；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第432～433、449～451頁；11冊，第43～46、223～224、437～439、472～473、480～481頁。

【50】 《起源》第1卷，第3、4部份。

【51】 對這些原則從理論上和實踐上進行分析，是泰偉斯：《中國的政治和清洗》一書的重點內容。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正是劉少奇本人在延安時期，關於這個主題，寫下了中國共產黨的標準文件：《論黨內鬥爭》。

【52】 將高崗反劉活動向毛報告的，正是鄧小平和陳雲；見泰偉斯：《毛朝廷中的政治》，第108～113頁。

【53】 估計這一點可能就是毛為什麼不選擇在《紅旗》上，發動對吳晗的攻擊的原因，雖然這份雜誌是由忠實的陳伯達經管的。

【54】 參見夏洛克·福爾摩斯的：《貝克街的非正規偵察隊》。

【55】 毛的確曾將中央文革小組的中堅分子召集起來，那是在1966年12月26日他73歲生日，他們首發革命成功之後；見上書，第18章，註釋130。

【56】 偏執狂不一定就是妄想分子；毛懷疑田並不是毫無道理的。1962 年田曾將一份文件壓下來，其中毛批示說陳雲是「資產階級分子」；李：《毛主席的私生活》，第 392 頁。
【57】 「兩人（希特勒和斯大林）作為成功的政治家，大部份歸功於他們擅長掩飾他們的想法和意圖，無論是對盟友還是對敵人」；布洛克：希特勒和斯大林，第 396 頁。（著重號是我加的）
【58】 李：《毛主席的私生活》，第 405 頁。沈邁克曾對我指出：江青說這話的場合，有記錄的僅有一次，這就是 1967 年 4 月 12 日在一次擴大的軍事委員會會議上；見南開大學衛東批判文藝黑線聯絡站（與）「紅海洋」（編）：《無限風光在險峰》，第 62 頁。
【59】 李，《毛主席的私生活》，第 407-408 頁。全書列舉了許多例子，江青對自己的健康大驚小怪，給李帶來不少麻煩；然而，據他所說，1966 年她作為一個強有力的政治人物粉墨登場之後，所有的毛病卻都消失了；上書，第 451-452 頁。張玉鳳超過了她所有的情敵，陪伴毛直到他去世。根據知情人 S 所說，張是直到 1970 年才開始在毛的身邊變得重要。
【60】 葉永烈：《張春橋沉浮錄》，第 122 頁。關於《海瑞罷官》的多數報道，均僅稱是 1961 年初上演的。如果葉所說是正確的，那末，這或者是再次上演，或者是江青命令演了專場。在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609 頁，未提她是否看了該劇。蘇雙碧和王宏志：《吳晗傳》，第 317 頁。
【61】 國防大學:《七十年簡介》，第 528 頁；林青山:《康生外傳》，第 249 ～ 250 頁。
【62】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609 頁。
【63】 見戈德曼：《共產黨中國的文學上的不同意見》，第 122 ～ 125 頁；儘管李拒絕了，他還是盡力與江青保持良好關係；知情人 I。
【64】 《政法紅旗》1967 年 10 月 17 日第 5 版。紅衛兵報紙所透露這一情況，得到叢進所引毛 1967 年 5 月對一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的講話所證實；《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611 頁。
【65】 葉永烈：《張春橋沉浮錄》，第 122 ～ 123 頁。
【66】 見同書，第 134 ～ 137 頁，載有柯視察四川時死亡的詳細實情。
【67】 國防大學：《七十年簡介》，第 528 ～ 529 頁；《決議註釋本修訂》，第 373 頁。據知情人 I 稱：姚佯稱病，匿居在上海工人療養院，寫攻擊吳晗的文章。姚何以比李希凡膽量大些呢？因他不屬於北京黨的管轄範圍之內。依知情人 I 說，更重要的是因在北京和上海，關於對方城市思想界所作活動，均大半一無所知。在彭所在的北京，江青是個可厭人物，在思想舞臺上僅是無足輕重的角色，而在柯的上海，人們便把她當作一個大得多的角色，從主席那兒來的思想上志同道合的使者；且姚也可能也非常清楚，他 1964 年發表的那篇文章頗得毛的青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1 冊，第 99 頁。
【68】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610 ～ 611 頁，引述了毛和江青的說法。據一份官方材料說，1967 年 2 月毛曾對一位外國人講，開始時這個活動完全是江青在做（《決議註釋本修訂》，第 373 頁）。不過沈邁克曾向我提出，這可能是一個事後措施，意在避免人們懷疑毛竟然會倡行這樣敵意的陰謀。一份文化大革命的材料，講到 2 月 3 日毛和阿爾巴尼亞人的談話（曾流傳有毛會見外國人的談話記錄）表明從一開始毛便參與了這一事件；《〔毛澤東〕學習資料 1962-1967 年》，第 287 ～ 288 頁。
【69】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616 頁注 1；林青山：《康生外傳》，第 249 ～ 250 頁；仲侃：《康生評傳》，第 176 頁。但在後一材料（第 387 頁），將康生和毛討論這一問題（的時間）放在 1965 年 5 月。
【70】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613 頁。
【71】 毛曾向江青提議，應當告知周恩來和康生，但她不同意，也許她想將這事完全當作她一個人的活動，見同書；仲侃：《康生評傳》，第 176 頁。按毛對阿爾巴尼亞人的敘述，江青主動說，文稿不應給周和康看，因為那樣，劉少奇和鄧小平也會要看的；《〔毛澤東〕學習資料 1962-1967 年》，第 288 頁。

【72】《起源》，第 2 卷，第 234 ～ 236 頁。
【73】《中共黨史重大事件述實》，第 320 ～ 321 頁。挑選彭真進行這次可能爆炸性的會晤，表明他是主席和書記處重要決定的執行者，但也可能是反映出這樣一種認識：即萬一彭德懷怨恨太過，不夠謹慎，也不顧紀律的話，他（彭真）完全有能力作出最佳應對。
【74】同上書，第 321 ～ 322 頁。周恩來當時正在接見柬埔寨的西哈努克親王。
【75】彭德懷：《一位中國元帥的回憶錄》，第 521 頁。
【76】景希珍：《在彭總身邊》，第 114 頁；王春才：《彭德懷在三線》，第 17 頁。比較官方的文本剪短了彭對他警衛敘述關於這次討論的情況；給人印象是：當毛談到廬山會議上彭可能是正確的時，主席僅是指，彭提醒說他（彭）當時曾提出三條保證，而他（毛）可能僅記得兩條；例見「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彭德懷傳》，第 697 頁。這後一資料來源（第 696 頁）說彭是由毛的秘書召請到中南海的（這似很可能）；而景希珍（第 112 頁）則記得是毛親自召請的。即使彭在廬山誤解了毛，或者景記錯了，這次會見的關鍵之處乃在：廬山問題已經是過去式，徒具歷史意義而已。
　這一插曲使人想起，在布哈林屈辱罷職之後而在受審處決之前的騷動時期中，斯大林虛偽地對待布哈林的情形。在 1935 年春天軍隊幹部畢業宴會上，斯大林突然祝酒說：「同志們，讓我們為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布哈林），乾杯，讓過去了的事情過去吧！」在斯大林死去後很久，布哈林的遺孀說出了這一插曲；她認為他是在試探人們對她丈夫的態度；若果如此，則對這次祝酒的「暴風雨般的掌聲」恐怕會使斯大林感到喪氣，也使布哈林感到苦惱。見拉列娜：《我永難忘懷》，第 65 ～ 66 頁。
【77】《中共黨史重大事件述實》，第 322 ～ 333 頁。
【78】毛是在 7 月的工作會議和 8 月召開的中央八次全會間的兩天政治局常委會上，說出這一點的；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 238 頁。
【79】《黃克誠自述》，第 271 頁。9 月也有中央官員與黃接觸；這次是較低一級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和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他被告知，毛已決定他應去擔任山西省副省長。黃心裏高興又能幹工作了，只是請求在北京呆到 10 月 1 日國慶節時候，但卻被命令即刻離開城市。頗具諷刺意味是，第二年他又在太原邂逅楊尚昆，因後者也被罷黜而從首都放逐出來了；見同書，第 273 頁。這本書還包括在廬山和以後對彭和黃所遭受的多次鬥爭會的清晰照片；見同書，第 248 ～ 270 頁。
【80】彭做的跑腿工作的另一個例子，便是將關係他們前途的中央決定通知那些高級同僚們；見《宋任窮回憶錄》，第 361 頁。
【81】《起源》，第 1 卷，第 146 頁。
【82】泰偉斯：《毛朝廷中的政治》，第 62 ～ 71 頁。
【83】有人說，高崗、林彪罷黜去世後，彭真最終沒有成為後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局常委，是因為陳雲秘密投了反對票；知情人 P。關於在東北彭和他的同事之間的矛盾，見泰偉斯：《毛朝廷中的政治》，第 39,124 頁。
【84】在劉於 1954-1959 年擔任人大委員長期間，彭是人大的秘書長，似乎曾作過努力，想在該機構和國務院之間形式上的上下級關係中，注入一些生機；見《起源》，第 1 卷，第 115 ～ 116 頁。
【85】代表最多的是湖南，這是毛和劉少奇的故鄉；和四川省，朱德和鄧小平的故鄉。
【86】知情人 P。
【87】參考吳冷西：《憶毛主席》，第 74 頁；在 1958 年台灣海峽危機時，毛堅持要求宣傳機構須表現出軍隊式紀律。
【88】1964 年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便是彭真在宣傳工作中起關鍵作用的一個例證：會上收到毛、劉、鄧小平和彭關於文化的指示；見中央宣傳部辦公廳編：《黨的宣傳工作會議概況和文選（1951-1992 年）》，第 193 頁。
【89】姜化宣、張蔚萍和肖：《中國共產黨會議概要》，第 512 頁。

【90】《起源》，第 1 卷，第 180～183、192～196、202～207、270～273、277～278、289～292 頁。
【91】見前面第七章。
【92】這並非中國所特有。在現代英國的早期，即用過這一策略，即人人所知的所謂「莫頓叉」(Morton's Fork)：可能是在莫頓大主教的提議下，亨利七世的臣宰替亨利七世向貴族收斂錢財。他們申言：那些慳吝節儉，捨不得花錢的人，一定積蓄了不少；那些奢侈揮霍的人，必定是非常富有；見克賴姆斯：《亨利七世》，第 203 頁。
【93】可能是因為假若文章是通過當地黨的機關報《解放日報》發表的話，那麼會讓太多的上海高級官員事先瞭解到這篇文章，結果會有洩漏消息給北京的危險。
【94】中國共產黨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 318 頁；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611～612 頁。1966 年 10 月毛自稱他曾問過在「北京」出現修正主義，而不是中央委員會；不過可以假定，不論他真地說了什麼，他的聽眾，包括彭真，都會認為他的意思是，北京是以毛為首的全國的首都，北京不是以彭為首的省級城市；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 113 頁。對沈邁克將這一點向我指明，深為感激。
【95】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彭真生平大事年表》，第 37 頁。
【96】以下敘述多數是根據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612～617 頁。彭真行蹤不明：美國政府所彙編的名人活動一覽中，未列有彭這期間材料。按一份紅衛兵報紙，彭於 11 月 9 日接待了蘇聯大使（在北京？）；1967 年 10 月 12 日《東方紅》。由於知悉 11 月 10 日以後彭真會離開北京一段時間，可能便決定了姚文元文章發表的時間。吳晗於 11 月 11 日回家，在一堆報紙中，看到姚的文章，感到不快震驚；見蘇雙碧和王宏志：《吳晗傳》，第 315 頁。
【97】馬齊彬等：《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第 265 頁；顧龍生：《毛澤東經濟年譜》，第 633～635 頁。
【98】彭給市委書記處的命令，可能反映了他對純知識界事情的無知或缺乏興趣；他深知，鄧拓的判斷一定會比他的更好。
【99】這也是吳晗的觀點；蘇雙碧和王宏志：《吳晗傳》，第 315～316 頁。
【100】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618 頁。關於當彭真受到壓力時，《人民日報》追隨《北京日報》之後的較早的例子，見《起源》，第 1 卷，第 206 頁。
【101】官方說法是楊轉調廣東任當地黨書記，但他卻從未赴廣州履任；廖蓋隆等：《新中國編年史》，第 276 頁；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635 頁注 1。亦見第十九章注 79。
【102】李：《毛主席的私生活》，第 433-434 頁。馬齊彬等：《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第 264 頁。毛在會議上宣佈彭德懷的新職務和楊的免職，與會者只對後者感到震驚；知情人 V。汪東興告訴李醫生，他曾試圖建議毛，他更應該委任陳伯達或者胡喬木，但毛未聽取。
【103】李：《毛主席的私生活》，第 292=293 頁。
【104】同上，第 365-369 頁。
【105】《起源》，第 2 卷，第 242～244 頁。林在 60 年代初的低姿態，可由其講話的貧乏簡短得到證實；例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下；《〔林彪選集〕》；《以林副統帥為光輝榜樣無限忠於偉大領袖毛主席》。遲至 1964 年 6 月，廣州軍區副司令員吳子禮少將便以圖謀宣傳彭德懷早年的一件革命功績，而遭到譴責；彭的老對頭賀龍負責進行調查；見馬齊彬等：《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第 248 頁。
【106】黃：《三次大難不死的羅瑞卿大將》，第 199～200 頁。
【107】馬齊彬等：《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第 248 頁。李，《毛主席的私生活》，第 97-98,157-159,184-186,435 頁。
【108】上書，第 435 頁。
【109】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631 頁。
【110】馬齊彬等：《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第 259 頁。

【111】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631～632頁；這一敘述有幾處引用了羅的講話。
【112】同上書，第632～633頁；李，《毛主席的私生活》，第435-436頁。葉群和毛單獨呆了約七小時；黃瑤：《三次大難不死的羅瑞卿大將》，第282頁。
【113】李：《毛主席的私生活》，第185頁。
【114】見前面第七章，第169頁。
【115】這是1970-1971年他圖謀攪混林彪的權力時說的。關於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所感困惑的情況，見力平：《開國總理周恩來》，第457頁。
【116】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633～634頁。馬齊彬等：《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第265頁；早些時候林彪曾抓住楊尚昆撤職時機，來解除人民解放軍中他的同等人物，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肖向榮將軍；黃瑤：《三次大難不死的羅瑞卿大將》，第274～275頁。這是關於林—羅鬥爭最詳盡的資料；隨處可見。關於對羅的最後控告，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第195～203頁。關於西方最近一次試圖揭開「異常困難的」羅瑞卿案件的真相，見泰偉斯和孫：《林彪的悲劇》，第24～32頁。
【117】見下麵第460頁。
【118】劉樹發：《陳毅年譜》第二卷第1137頁。
【119】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618頁。
【120】同上書，第618～619頁。
【121】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24卷，第604頁。
【122】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621頁；葛恆鈞的《1966年部隊工作座談會幾起會議紀要述略》載《中共黨史研究》1966年第3期第54～58頁。
【123】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24卷，第604～610頁。
【124】同上書，第607頁，這是30年代的一次大論戰，當時周揚是站在毛一邊。
【125】同上書，第610頁。
【126】蘇雙碧和王宏志：《吳晗傳》，第321頁。
【127】《中國歷史哲學研究》，2，1968年秋季第1號，第44～48、56～67頁。
【128】譯載同上書，第68～107頁。該文12月27日曾刊登在《北京日報》上；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614頁。吳晗的第二篇自我批評於1月12日登出。
【129】從1949年到他逝世，毛訪問杭州39次，肖心力:《巡視大江南北的毛澤東》，第436頁。
【130】郝孟碧和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561頁。關於田家英企圖從毛講話記錄中刪除這段話的材料，見葉永烈：《陳伯達其人》，第228～230頁。但田死後卻成功了。關於12月21日到22日毛在杭州的講話，唯一載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第492～493頁）的那些是論教育的。
【131】《中國歷史哲學研究》，2，1969年春季第3號，隨處均有。亦見丁旺（音譯）：《吳晗與「海瑞罷官」事件》，第541～617頁。
【132】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615頁。關於關鋒和其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升到顯要位置的「激進知識分子」的背景材料，見戈德曼：《中國的知識分子》，第61～88頁。
【133】見丁旺：《吳晗與「海瑞罷官」事件》，第277～546頁。
【134】蘇雙碧與王宏志：《吳晗傳》，第322～323頁。
【135】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615頁。
【136】同書，第616頁；仲侃:《康生評傳》，第177～178頁；林青山:《康生外傳》，第256～257頁。參加會議的全部11人名單是：彭真、陸定一、康生、吳冷西、許立群、胡繩、姚溱、王力、範若愚、劉仁、Guo Tianfan；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24卷，第611頁。五人小組中，只周揚缺席。
【137】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615～616頁。
【138】同書，第616頁。
【13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第543頁。
【140】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618頁。
【141】劉和周肯定在那裏（北京）；淮安：《周總理生平大事記》，第456頁。

【142】這點在吳冷西的《憶毛主席》第 150 頁得到證實。
【143】馬齊彬等：《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第 268 頁；仲侃：《康生評傳》，第 178 頁；林青山：《康生外傳》，第 257 ～ 258 頁。
【144】吳冷西在書中稱：當政治局常委會批准提綱後，告訴小組去武漢以便得到毛的批准；吳並補了一句說「我們飛去了武漢」；吳本人肯定在場；見吳冷西：《憶毛主席》，第 150～151 頁。表明小組全體去了的其他資料來源包括：仲侃：《康生評傳》，第 178 頁；林青山：《康生外傳》，第 258 頁；穆欣：《辦〈光明日報〉自述》，第 278 頁。黃萍：《連雨春秋——陸定一在 1966-1978 年》，載《南方週末》第 28 期，1992 年 8 月說僅彭、陸和康去了。叢進證實康生在那兒（武漢）；《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618 頁注 1。而其他資料只說，彭和他的五人小組副組長陸定一，提綱撰稿人之一許立群去了；馬齊彬等：《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第 268 頁；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616 頁；蘇東海和方孔木：《中華人民共和國風雲實錄》，第 1 卷，第 1035 頁。
【145】吳冷西：《憶毛主席》，第 150 頁。
【146】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616 頁；馬齊彬等：《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第 268 頁。
【147】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616 頁注 1；林青山：《康生外傳》，第 259 頁。《康生評傳》，第 176 頁。
【148】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616 頁注 1；林青山：《康生外傳》，第 259 頁；仲侃：《康生評傳》，第 176 頁。
【149】國防大學：《參考資料》，第 24 卷，第 611 ～ 613 頁。
【150】同書，第 612 頁。
【151】同書，第 612 ～ 613 頁。
【152】劉不在場與彭的清洗之間的聯繫，是由黃敬（音譯）在其《中國共產黨政治中的宗派主義》中所指出的，那是 1995 年哈佛大學未發表的博士論文。
【153】力平：《開國總理周恩來》，第 436 頁；斯諾：《舞臺上的中國》，第 21、122 ～ 190 頁。關於彭真 3 月訪問三線，見王春才：《彭德懷在三線》，第 68 ～ 69 頁；很可惜，這一資料來源，雖然告訴我們，彭德懷謹慎地避免和彭真一起拍照，避免進一步因為海瑞問題受到牽連，但卻沒說出彭這次遠行的準確日期。我之提出，毛是在彭真遠離北京時攻擊他的，是由於我肯定：如果彭在首都，他必然要出席這一次擴大的政治局常委會會議的。
【154】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 623 ～ 625 頁。
【155】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 9 頁。
【156】葉永烈：《陳伯達其人》，第 222 ～ 223 頁；實際上相同的敘述出現在袁浩和建民（編）《千秋功罪》的一篇文章中第 17 ～ 18 頁。
【157】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 10 頁。
【158】見同書，第 10 ～ 12 頁。關於康生講話的部分和陳伯達後來的講話，見《林彪文選》，下，第 264 ～ 272 頁。
【159】關於林的講話，見《毛主席的親愛戰友林彪同志言論選》，第 116 ～ 132 頁；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 16 ～ 18 頁。
【160】毛在給江青的一封信中表示了他的觀點；《「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第 55～56 頁。毛關於安全的命令是以後由周向紅衛兵透露的；《中央首長講話》，1，第 249 頁（是沈邁克提醒我注意這點的）。
【161】按出席會議的劉志堅說，林彪的條子還要長些，包括四點：葉群結婚時是處女，且結婚以後一直很忠實；在延安時她和作家王實味毫無糾葛；林彪和葉群的孩子們是他們親生的；陸定一妻子所指控的每件事均屬胡說。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 18 頁注 1。
【162】同上書，第 18 ～ 19 頁。一份文化大革命對這個指控的詳細材料，見《戰報》1967 年 1 月 18 日所載一篇文章，記載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中國大陸報刊概覽》（補遺）第 165 期第 12 頁。文化大革命期間，曾攻擊陸定一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據說它是妨礙學習毛著作的一種陰謀手段，不過主席是衷心

贊成更多學習這類著作的，因之是鼓勵陸的；參考《陸定一反對毛澤東思想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言論摘編》，第5期，第3頁；和《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第25～28、56～57頁。
【163】沈邁克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專案組（1966-1979年）》，斯德哥爾摩大學太平洋亞洲研究中心1995年1月第36號工作文件第5～6頁。關於周的講話文本，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第19～23頁。
【164】陶鑄的妻子曾志對他這次陞遷，懷有沉重的預感；見周明：《歷史在這裏沉思——1966-1976年紀實》，3，第1頁。
【165】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19頁。關於葉劍英和周恩來的關係，見克林和克拉克：《中國共產黨人傳記辭典》，2，第106頁。
【166】引文見沈邁克：《中國共產黨中央專案組（1966-1979年）》，第5頁。現在在文化大革命之後的材料中，這個機構均稱作「中央」專案組，一直存在到1979年。
【167】林志建：《新中國要事述評》，第307頁。
【168】沈邁克：《中國共產黨中央專案組（1966-1979年）》，第7頁。這個小組的其他高級成員是汪東興，顯然是毛的耳目；公安部長謝富治，和新任代理參謀長楊成武將軍。鄧小平是政治局常委委員，直到十一次全會，他被康生取代以前有進行監督的責任；見同書，第6頁。不過周恩來主持了所有這類正式會議；據與沈邁克的交談。

第二十章 浩劫來臨

【1】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28頁。1994年對聶元梓和其他捲入這一事件者的訪問，產生了一些矛盾的說法，對曹軼歐在挑起大字報上的中心作用，發生懷疑；對沈邁克讓我分享訪問成果，深為感激。
【2】 見同書，第30頁。
【3】 見同書，第34頁；馬齊彬等：《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第272～273頁；周明：《歷史在這裏沉思——1966-1976年記實》，1，第3頁。
【4】 在長江的「急」流和毛僅用一小時多點便遊了15公里的能力——幾乎是10英里世界記錄的四倍——之間的關係，（按：指流速將毛推向前，不是毛真的遊得快）中國媒體並未予特別強調；結果世界職業馬拉松游泳聯合會主席，特邀主席參加在加拿大舉行的兩次10英里游泳比賽；見《季刊的編年和文獻》，載《中國季刊》1966年第28期，第149～152頁。
【5】 馬齊彬等：《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第275頁；林志建：《新中國要事述評》，第314頁。
【6】 力平：《開國總理周恩來》，第457頁。
【7】 但不清楚彭德懷和張聞天是否正式保住了他們的職位。
【8】 關於毛動機的討論，見前面第十九章注8。
【9】 林志建：《新中國要事述評》，第319頁；葉永烈：《陳伯達其人》，第264頁。
【10】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61頁。林志建：《新中國大事述評》，第325～326頁。
【11】 逐個地剪除你的敵手，肯定不僅僅是一位前遊擊戰士的政治策略；參考勞森的《第十一號的觀點》第935頁的描述，瑪格麗特·撒切爾是如何首先罷掉她的外交大臣，然後才處理她的財政大臣的。
【12】 見前面第十九章注14。
【13】 當然也可有其他可能性。毛也許從未想過要讓鄧倒臺，但卻無法使他免受對「走資派」的攻擊，於是總書記也像許多其他人一樣，被清洗了。既然毛在必要時，能保護周恩來；這一可能性似乎是不存在的。更為可信的另一種可能性是：毛想給鄧一次教訓，目的是將為他平反，使他淨化，好將來擔任領導，不過這是一個高度冒險的謀略：因為一旦毛指出某同僚是一個合法的打擊目標時，主席卻沒把握能控制住紅衛兵的鬥爭策略。但是由於鄧在70年代重新掌

權，使這種假想甚為可信；且在文化大革命的全部高級受害者中，只鄧一人沒有指定正式的「專案組」來評定他的罪行，雖然也對他的歷史搜集過資訊；見沈邁克：《中央專案組（1966-1979 年）》，載《中國季刊》1996 年 3 月第 145 期，第 102 ～ 105 頁。

【14】 這是在陳伯達的主持下 1966 年 6 月 2 日《人民日報》社論的標題，譯載於《中國的偉大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3，第 7 ～ 10 頁。

【15】 《中共中央關於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第 3 ～ 5 頁。

結束語

【1】 在《起源》第 1 卷第一篇中有描述。

【2】 麥克法夸爾、奇克和吳：《毛主席的秘密講話》，第 141 ～ 142 頁，第 172 頁。

【3】 毛原希望，他的論矛盾講話會給全國帶來一個心情舒暢的時代，和對中國共產黨的支持，這可能反映了他早年對晚清改革家康有為的欽佩之情。康的論統治的主要著作便題名《大同書》；譯載於湯普遜：《大同書：康有為的一元世界哲學》。毛偶爾也用「大同」一詞意指共產主義；見施拉姆：《毛澤東》，第 25、27 頁；及其《毛澤東思想》，第 18、91、102 頁。

【4】 可參考瑪格麗特·撒切爾首相的一位高級閣僚，對她得意時期中不可抗拒的影響的描述：「她的影響是隨機性地本能地表現出來的，遠非我們能夠計劃。在整個白廳（英國政府所在地）和威斯敏斯特（英國議會所在地），她的直覺，她的思維，她的權威，幾乎無所不在，使你擺不脫地、隨處都實實在在地感到它。隨著日月的流逝，人們漸漸地感到，儘管看不到也聽不到（她），總彷彿幾乎每次會議上，首相均在場。因之總產生這樣一些問題，即使並未講出來：這在（唐寧街）10 號（英國首相府）又是怎樣的呢？為了要爭得首相支持的最好辦法是什麼呢？以及如此等等（豪：《忠誠的衝突》，第 249 ～ 250 頁）。

本文中的兩段應能表明，這個時期的中國政界是以毛為中心的觀點並不必然說毛能逆轉狂瀾，僅只是說他是具有壓倒一切的政治角色。可以參考 1964 年 1 ～ 2 月號《國外事務》所登，關於領袖個人作用的下述評論：關於斯大林，約翰·路易士·加迪斯寫道：「關於約瑟夫·斯大林可以接受的國際秩序是什麼，不存在任何寬鬆的、開放的、一致滿意的看法。既然蘇聯本身也已成為歷史，現在我們越瞭解到蘇聯的歷史，便越難將它（蘇聯）的任何一方面，與這個傑出的但陰險的人物的影響分開，這種影響是痛苦而擺不脫的。即使人們不接受歷史是由偉大人物創造的理論，也會承認：在世界前所未有的極權政府中，駕馭它的極權人物確乎是不同凡響的（第 144 頁）。

在評論撒切爾的回憶錄時，羅賓·W·溫克斯說：「瑪格麗特·撒切爾，不管是好是壞，有沒有驚歎號（表示讚賞）和旁注（表示微詞），總證明瞭歷史家的論點：這些個人確乎是不同凡響。」（第 161 頁）

【5】 利夫頓：《不朽的革命——毛澤東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第 19 頁。

【6】 在德佈雷：《革命中的革命》，第 120 ～ 122 頁中有類似的討論：革命組織的熱情如何在革命前即已挫傷了。

【7】 參考對斯大林的這段評論：「如果斯大林追求和運用權力，僅只是為享受權力本身的話，那他決不會在緊接消滅了右的以及左的反對派之後，便立即冒險發動像第二次革命。如果他只是一個頭腦頑固的現實主義者，那他擊敗競爭領導權的對手所取得的勝利，便完全足夠了；他至少會停下來享受一下勝利。如果這樣看待他，便未能瞭解他心底的渴望，想要對自己證明，並想贏得他所擊敗的那些人承認：他是列寧繼承人並且與列寧是同樣偉大的人。」（布洛克：《希特勒和斯大林》，第 382 頁。）

毛是想要對自己和他的同僚們證明：他對革命的理念是正確的。

【8】 利夫頓：《不朽的革命》，第 31 頁。

【9】 關於鞍山和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兩種制度之間的差別的討論，見《起源》，第 2 卷，第 306 ～ 309 頁。

【10】《1955 年 -1959 年共產主義的中國》，第 103 頁。
【11】毛 1959 年也曾同樣地從最高層的激進主義退縮。
【12】毛從未正式接受過卡斯特羅的理論：即應當有一個先鋒隊，但它並不一定要是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但實際中，文化大革命的紅衛兵階段，卻正是這種情況；參考德佈雷：《革命中的革命》，第 96 ～ 97 頁。
【13】《起源》，第 1 卷，第 3 頁。
【14】參考瑪格麗特·撒切爾：「就她而言，就真是要前進，前進，前進，如她曾對一位電視記者講的，她會這樣行事。只要她在，她是不會放棄權力槓桿的……」(勞森：《第十一號的觀點》，第 871 頁)。
【15】《起源》，第 1 卷，第 10、157 ～ 159 頁。引文當然是來自《亨利四世》。也見李：《毛主席的私生活》，隨處可見。關於偏執，參考斯大林，他雖身處權力頂峰，但總感到被迫須密切關注已被打倒的托洛斯基及其一小撮追隨者，在他命令刺殺這位已被流放的敵手成功前，一直寢不安席。伏爾科岡洛夫：《托洛斯基》，第 302 ～ 488 頁，隨處可見。
【16】杰弗理·豪曾在瑪格麗特·撒切爾的幾屆政府中服務，任財政大臣和外交大臣。他曾在回憶錄《忠誠的衝突》中敘述，他如何最後終於辭職，從而引發一場黨的危機和她的垮臺：「無可爭辯，瑪格麗特·撒切爾是一位偉大的首相。她的悲劇乃在於：人們可能較少記得她諸多的輝煌成就，而只記得她的肆無忌憚，她後來總是那樣力求把她個人的日益不容忍妥協的觀點強加於人。在她的最後幾年，對瑪格麗特·撒切爾來說，在她個人、政府、黨和國家之間，已不存在差別。在她心目中，它們已渾然一體。她的利益，天經地義地便是英國的利益。任何對她的批評便是不愛國的行為。她堅持她個人意見的權威性是不可侵犯，等同於國家的權威性，便是她失敗的原因。」(第 691 頁)

這一段只要換幾個明顯的詞，人們便可能是在讀一篇逼真的描寫毛的許多同僚是如何看待他的。對他們和中國來說，悲哀的是：劉沒有在中央全會上站起來，說出豪在下院辭職演說中的最後一段話：「忠誠的衝突，對我的尊貴的朋友首相閣下的忠誠——因為，畢竟，有 20 年之久，這種本能的感情仍是真實的——和對我所認為的國家的真正利益的忠誠之間衝突，早已發展到太大了。我再不相信，有可能從本屆政府內部來解決這個衝突。這就是為什麼我辭職。我這樣做是我認為這是對我的黨和我的國家都很正確的事。對這種衝突我本人心中的鬥爭，也許已經太久了。現在是其他人考慮作出反應的時候了：面對這樣悲劇性的忠誠的衝突，他們應該怎麼辦。」(第 702 ～ 703 頁)
【17】關於布哈林，甚至在其被捕前夕，仍寧願相信斯大林無罪，卻不面對現實的情況，見其遺孀拉列娜：《我永難忘懷》，第 246 ～ 346 頁。參考莫洛托夫，在斯大林死後，儘管後者囚禁了他的妻子，仍對斯大林忠心耿耿，並繼續稱頌他；見別列茲科夫：《在斯大林身邊》，第 338 ～ 342 頁。
【18】劉賓雁的自傳《第二種忠誠》，記述了他多年來對於中國共產黨的忠誠是如何逐漸減退的，因為他意識到還有更重要的價值，而不是盲目的愚忠。
【19】別列茲科夫：《在斯大林身邊》，第 210 頁。
【20】麥克法夸爾：《中國的模式和不發達世界》，載韋爾奇：《政治現代化》，第 373 ～ 382 頁。關於延安的同志們是一個「精選的群體」，見阿普特和賽克:《毛共和國的革命講演錄》，第 265 頁。
【21】瑪格麗特·撒切爾通常用這個詞，描寫她同僚中信奉相似意識形態觀點的人。
【22】人們也應注意，毛早期對劉的批評，包括後者 1947-1948 年在土改中的左傾主義，和 1949 年在資本主義「剝削」問題上的右傾主義；見泰偉斯：《毛朝廷中的政治》，第 41 頁。關於劉 1949 年在天津的講話（它引起了右傾主義的指控）以及評論，見《黨的文獻》1993 年第 5 期，第 3 ～ 23 頁。
【23】在中國國內，甚至像劉少奇的前私人秘書、意識形態專家鄧力群這樣一位黨的官員（他曾和劉是十分親近的），考慮到如果一位領導沒能強有力地掌握軍隊的和政治事務的話，是不可能治理這樣一個國家和黨的。因此他接受將繼承人從劉改為林彪。全國黨史資料徵集會議和紀念中國共產黨 60 週年學術討論會

(編)：《黨史會議報告集》，第 153 頁。當然這個文化大革命後的說法可能只是鄧力群拋棄劉的一種日後的合理化的解釋；但至少，還不清楚像鄧這樣官員是如何相信，幾乎不露面的林彪能強有力抓住政治事務。至於劉，有諷刺意味的是，當 1955 年授軍銜以表彰對革命的貢獻時，曾考慮授予他（以及周恩來和鄧小平）元帥；對劉來說，其理由是 40 年代他曾擔任過短時期的人民解放軍的政治委員。但軍銜委員會考慮授予毛以大元帥軍銜，毛卻輕蔑拒絕了這頭銜，使得他的文職同僚們別無選擇，只得效仿。見宋任窮：《宋任窮回憶錄》，第 323 ～ 325 頁。

【24】 見前第十九章。

【25】 劉賓雁（第二種忠誠，第 95 頁）有另一個解釋：「毛比斯大林聰明得多。為什麼要把你的敵人都殺光呢？給他們加上一個標籤，搞垮他們。如果不頂用，還有管教所，再上面，還有監獄。如果毛殺光了他所有的政敵，所有的地主和所有的富人，那麼四年後他發出的號召：『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就會變得毫無意義。八年後，在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們也就沒有目標去發洩他們的革命熱情了」。（按英文譯出——譯按）

【26】 參考喬治·索利耳：《目標毫無意義，運動便是一切》。引自布洛克：《希特勒和斯大林》，第 438 頁。

【27】 在所羅門的《毛的革命和中國的政治文化》第 474 ～ 509 頁，討論了毛對亂的態度。

書目

編註：由於外文人名及地名的漢語譯文在華語界無法統一和規範化，使用參考書目時請參照英文原文。

A

《高教領域兩條戰線鬥爭大事記〈教育批判〉》1967 年 8 月 20 日，記載《中國社會學·人類學學報》1969-1970 年秋冬季合刊第 17 ～ 76 頁。

W·A·C·艾迪《周恩來的征程》《中國季刊》1964 年第 18 期第 174 ～ 194 頁。

阿貢（音譯）：《印尼外交政策二十年 (1945-1965)》海牙：冒頓出版社，1973 年。

安炳：《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大革命：政策過程的發展史》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出版社，1976 年。

G·S·阿利托：《最後的儒家梁溟和中國現代性的困境》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1979 年。

斯蒂芬·安多爾斯：《中國的工業革命政策、計劃及管理，1949 年至目前》倫敦：馬丁·羅伯遜公司，1977 年。

安徽省人民政府辦公廳（編）：《安徽省情》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第一卷 (1949-1983)1985 年；第二卷 (1949-1984)1986 年。

安徽省統計局（編）：《安徽四十年》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9 年。

戴維·E·阿普特與托尼·賽克：《毛的共和國裏的革命講演集》馬薩諸塞州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1994 年。

格奧爾吉·阿爾巴托夫：《制度：蘇聯政治中一個知情人的生活》紐約：時代圖書公司，1993 年。

B

〔法〕鮑若望與〔美〕魯道爾夫·切爾敏斯基：《毛澤東的囚徒》倫敦：德意志出版 1975 年。

大衛·M·巴克曼：《陳雲和中國政治制度》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東亞研究所，1985 年。

朱迪斯·班尼斯特：《中國的人口變化》斯坦福：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87 年。

杰里梅·巴默和約翰·明福德：《火種：中國人良心之聲》紐約：正午出版社，1989 年。

威廉·J·巴恩茲：《印度、巴基斯坦和世界各強國》倫敦：對外關係委員會波爾莫爾出版社，1972 年。

鮑大可：《共產黨中國：初創時代，1949-1955》紐約：普拉格公司，1984 年。

——（附傅高義的文章）「共產黨中國的幹部、政府機構和政權」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67 年。

阿蘭·J·巴里：《中國的糧食收購》《中國季刊》1961 年第 8 期第 20 ～ 33 頁。

伯特里斯·S·巴特利特：《清朝中葉的軍機處：專制君主與尚書 1723 ～ 1820》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91 年。

理查德·鮑姆：《革命的前奏：毛澤東、黨和農民問題(1962-1966)》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 1975 年。

——和泰偉斯《四清：1962-1966 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伯克利：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1968 年。

雅斯帕·貝克爾：《餓鬼：中國饑荒的秘密》倫敦：約翰·默里公司，1996 年。

北京市歷史學會(編)：《吳晗紀念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年。

貝里茲科夫·M·瓦連京：《在斯大林身邊：十月革命到獨裁者帝國崩潰其譯員的回憶》紐約：白樺胡同出版，1994 年。

邁克爾·R·伯奇勞斯：《危機年代：肯尼迪與赫魯曉夫，1960-1963》紐約：愛德華·柏林格姆圖書公司，1991 年。

邊彥軍：《毛澤東和 1958 年「大躍進」》《黨的文獻》1994 年第 4 期第 75 ～ 80 頁。

埃勒茲·比伯拉奇：《阿爾巴尼亞和中國：對不均等聯盟的研究》科羅拉多州博爾德：西方觀點公司，1986 年。

白芝：《共產主義下的文學》《劍橋中國史》第 15 卷，第 743 ～ 812 頁。

薄一波：《薄一波文選 1937-1992》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年。

——《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年上卷，1993 年下卷。

德克·博德：《秦帝國》《劍橋中國史》第 1 卷，第 21 ～ 102 頁。

卡爾·狄特里奇·布拉契：《德國專政制度：國家社會主義的起源、結構和結果》哈蒙華斯：企鵝公司，1973 年。

李德(奧托·布萊恩)：《共產國際代表在中國》倫敦：C·赫斯特公司，1982 年。

邁可爾·布里契：《印度和世界政治：梅農看世界》紐約：普拉格公司，1968 年。

布熱津斯基：《力量和原則：國家安全顧問的回憶 1977-1981》紐約：法拉爾·斯特拉斯·吉羅克斯公司，1983 年。

《不盡的思念》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 年。

《冷戰國際史項目公報》華盛頓特區：伍德羅·威爾遜學者國際中心，1992 年春季號。

阿蘭·布洛克：《希特勒：對獨裁的研究》倫敦：奧得翰公司，1952 年。

——《希特勒和斯大林：同樣的生活》倫敦：方塔那出版社，1993 年。

費多爾·布爾拉茨基：《毛澤東：一幅思想和心理的畫像》莫斯科：進步出版者，1980 年。

福克斯·巴特菲爾德：《中國活在苦海中》紐約：時代圖書公司，1982 年。

約翰·拜倫與羅伯特·帕克：《龍爪：康生——毛澤東身後的鬼才及其在人民中國的恐怖遺產》紐約：西蒙與舒斯特公司，1992 年。

C

《財政工作三十五年》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4 年。

《劍橋中國史》劍橋和紐約：劍橋大學出版社，第一卷 1986 年(丹尼斯·特威切特和邁可爾·洛威編)；第三卷第一部 1979 年(丹尼斯·特威切特編)；第十四卷 1987 年，第十五卷 1991 年(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和約翰·K·費正清編)。

《彭德懷案件 1959-1968》香港：聯合研究院，1968 年。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黨史——事件彙編(1919-1990)》北京：外文出版社，1991 年。

安尼塔·陳、理查德·馬德森和喬納林·昂格爾：《陳莊：毛的中國裏一處農民社會近事》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84 年。

納揚·錢達：《兄弟仇敵：戰後之戰》加利福尼亞州聖地亞哥：哈科特·佈雷斯·約萬諾維奇公司，1986 年。

《長短錄》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80 年。

張少書：《朋友與敵人：美國、中國和蘇聯 1948-1972》斯坦福：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90 年。朱利安·張《宣傳與理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兜售蘇聯 (1950-1960)》未發表的博士論文，哈佛大學，1995 年。

張旭成（音譯）：《中國的政權和政策》賓州大學公園：賓州州立大學出版社，1975 年。

張萬山（音譯）：《共產黨中國國務院：結構和職能分析 1954-1965》未發表的碩士論文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無日期。

趙國鈞（音譯）：《中國共產黨的農業政策 1921-1959》倫敦：亞洲出版社，1960 年。

約翰·查姆利：《丘吉爾：光榮的終結——政治傳記》紐約：哈科特·佈雷斯公司，1993 年。

《徹底清算鄧小平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滔天罪行》「紅色聯絡站」材料組中央統戰部東方紅公社，1967 年 2 月 4 日。

《徹底清算舊中宣部閻王殿伸向科學技術工作中的黑線》首都科技界革命造反派批判劉、鄧聯絡站，1967 年 7 月。

《徹底清算趙傳璧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滔天罪行》地總紅衛兵成都部隊公元十一戰鬥團等，1967 年 9 月。

蒂莫西·齊克：《毛的中國的宣傳和文化：鄧拓和知識分子》牛津：牛津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

——《鄧拓：中國的列寧主義新聞路線》載哈爾明和奇克（編）《中國當權的知識分子》第 92 ～ 123 頁。

——《文化改革的政治：鄧拓和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變更》載《中國的法律和政府》1983-1984 年冬季號。

——《學院派政治家——鄧拓研究》載《共和中華》第 15 卷，1990 年 4 月第 2 期。

——《講話校勘》載麥克法夸爾，奇克和吳《毛主席秘密講話》，第 75 ～ 103 頁。

C·S·陳（編）：《連江農村人民公社》斯坦福：胡佛學院出版社，1969 年。

陳澱國：《群眾的貼心人》《人民日報》1980 年 5 月 22 日第八版。

陳敦德：《北戴河：毛澤東急召葉飛上將密談》《炎黃春秋》1993 年第 7 期第 48 ～ 51 頁。

陳荒煤：《周恩來與藝術家們》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年。

陳志讓：《作家與藝術家大會》《中國季刊》1960 年第 4 期第 76 ～ 81 頁。

陳建（音譯）：《中國捲入越南戰爭 1964-1969 中國季刊》1995 年第 142 期第 356 ～ 387 頁。

陳敏先：《新中國四十五年研究》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1994 年。

陳玉龍（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大事記 (1949-1985)》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9 年。

S·H·陳：《一致性中的多樣化：詩和大躍進》《中國季刊》1960 年第 3 期第 1 ～ 15 頁。

陳石平：《中國元帥劉伯承》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 年。

陳修良：《孫冶方革命生涯六十年》上海：知識出版社 1984 年。

《陳毅詩詞選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 年。

《陳毅談紅與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年。

陳易之（音譯）：《中國：十年改革與 89 民運》台北：聯京出版實業，1990 年。

《陳雲》北京：中國曲藝出版社，1983 年。

《陳雲同志文稿選編 (1956-196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

《陳雲文選 (1956-1985)》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陳雲與新中國經濟建設」編輯組：《陳雲與新中國經濟建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 年。

鄭竹園（音譯）：《共產中國的科學和工程人力資源 1949-1963》華盛頓特區：美國科學基金會，1965 年。

程華：《周恩來和他的秘書們》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 年。

陳吉士（編）：《中國紅軍的政治》斯坦福胡佛學院出版社，1966 年。

《程子華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 年。

戚本禹：《論〈前線〉和〈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載《偉大的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第 2 卷）》。

江青：《論京劇革命》北京：外文出版社，1968 年。

《劍橋中國史》

S·B·克賴姆斯：《亨利七世》倫敦：艾里·梅休因公司，1972 年。

《過去十七年教育戰線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教育革命》1967 年 5 月 6 日載《聯合出版研究會》第 41，932 號 (1967 年 7 月 21 日)。

鍾仲武（音譯）：《毛主義和發展：中國工業管理的政治》漢城：國立漢城大學出版社，1980 年。

鍾華敏（音譯）和亞瑟·密勒：《毛夫人》香港：聯合研究院，1968 年。

《中央情報局關於中越對美國在越南戰爭中戰術的反應的秘密報告》《現代亞洲》雜誌（斯德哥爾摩）第 13 卷 1983 年第 2 期第 26 ～ 71 頁。

阿蘭·克拉克：《日記》倫敦：鳳凰公司，1994 年。

《劉少奇選集 (1958-1967)》香港：聯合研究院，1968 年。

《共》馬薩諸塞州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1962 年。

博伊德·康普頓編：《毛的中國：黨的整風文獻，1942-1944》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出版社，1952 年。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

羅伯特·康庫斯特：《赫魯曉夫後的俄羅斯》紐約：普拉格公司，1965 年。

《斯大林：國家的破壞者》紐約：瓦伊金公司，1991 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北京：外文出版社修訂版，1961 年。

戈頓·A·克雷格：《德國 1866-1945》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1980 年。伊沙貝爾·克魯克和大衛·克魯克：《楊儀人民公社的最初年月》倫敦：羅特勒基和凱根·保羅公司，1966 年。

大衛·克魯克和伊沙貝爾·克魯克：《十里店——一個中國農村的革命》倫敦：羅特勒基和凱根·保羅公司，1959 年。

伊沙貝爾·克魯克與大衛·克魯克：《早年陽益公社》倫敦：羅特勒基和凱根·保羅公司，1966 年。

——《十里店——一個中國農村的群眾運動》倫敦：羅特勒基和凱根·保羅公司，1979 年。

〔古巴導彈危機〕《1962 年古巴導彈危機》《冷戰國際史項目公報》（華盛頓特區）第 5 號 1995 年春季號第 58 頁。

D

《大批判背景材料》北京：國家科委文化革命委員會辦公室和首都科技界革命造反派批判劉·鄧聯絡站，1967 年 7 月。

戴晴：《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89 年。

——《王實味與「野百合花」: 中國共產黨內的整風與清洗 1942-1944》紐約州阿蒙克: M·E·夏普公司，1994 年。

戴知賢：《山雨欲來風滿樓》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年。

亞歷山大·達林主編：《國際共產主義中的分歧：文獻記錄 1961-1963 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63 年。

《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 (編):《當代中國軍隊的軍事工作》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 卷，1989 年 (在該編輯部監督下，各專門編輯組準備了以下各卷，由同一出版社在北京出版)。《當代中國的安徽》2 卷，1992 年；《當代中國的北京》2 卷，1989 年;《當代中國的福建》2 卷，1991 年;《當代中國的貴州》2 卷，1989 年;《當代中國的海軍》1 卷，1987 年；《當代中國的河北》2 卷，1990 年；《當代中國的河南》2 卷，1990 年;《當代中國的湖南》2 卷，1990 年;《當代中國的江蘇》2 卷，1989 年；《當代中國經濟》1 卷，1987 年；《當代中國的空軍》1 卷，1989 年；《當代中國的糧食工作》1 卷，1988 年；《當代中國的山東》2 卷，1989 年；《當代中國商業》2 卷，1988 年;《當代中國的四川》2 卷，1990 年;《當代中國外交》1 卷，1987 年；《當代中國的浙江》2 卷，1989 年；《抗美援朝戰爭》1 卷，1990 年；

《當代中國商業》編輯部 (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大事記 (1958-1978)》無出版地：商業出版社，1990 年。

《當代中國的江蘇》委員會和江蘇省檔案局 (編)：《江蘇省大事記 (1949-1985)》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1988 年。

《當代中國的計劃工作》辦公室 (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大事記要 (1949-1985)》北京：紅旗出版社，1987 年。

《當代中國的經濟管理》編輯部 (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管理大事記》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86 年。

《當代中國的民族工作》編輯部 (編)：《當代中國民族工作大事記 (1949-1988)》北京：民族出版社，1989 年。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 (編):《陳毅傳》北京: 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 年;《劉伯承傳》北京: 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 年;《彭德懷傳》北京: 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 年。

R·W·戴維斯：《蘇俄的工業化，第一卷。社會主義的攻勢：蘇聯農業集體化 1929-1930》倫敦：麥克米倫公司，1980 年。

威廉·西奧多·德·巴里:《期待黎明: 一位王子的計劃; 黃宗羲著作: 明遺談訪錄》紐約: 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93 年。

伊沙貝爾·德·馬達里亞加：《凱瑟琳大帝時代的俄羅斯》紐黑文：耶魯大學出版社，1981 年。

里吉斯·德佈雷：《革命中的革命 ?》哈蒙華斯：企鵝公司，1968 年。

《中國》北京：外文出版社，1966 年。

鄧力群：《向陳雲同志學習作經濟工作》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 年。

——《1961 年廣東農村調查的一組材料》《當代中國史研究》1994 年第 1 期。

〔鄧〕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上)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年。

《鄧拓文集》四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 年。

「鄧小平大辭典」編輯委員會：《鄧小平大辭典》北京：紅旗出版社，1994 年。

《鄧小平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言論摘編》北京：首都紅代會中國人民大學三紅揪劉鄧兵團第一支隊 1967 年 4 月。

《鄧小平文選 (1938-1965)》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年。

《鄧小平自白書》出版地點日期不明。

「鄧子恢文集」編輯委員會：《鄧子恢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

「鄧子恢傳」編輯委員會：《鄧子恢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

亞力山大．德斯．福吉斯：《廖沫沙，三家村，姚文元與黨機關的模糊關係》未發表的哈佛大學論文，1991 年 1 月。

丁旺（音譯)(編)：《北京市文化大革命運動》香港：《明報》月刊社，1970 年。

——《鄧拓選集》香港：《明報》月刊社，1969 年。

——《吳晗與「海瑞罷官」事件》香港：《明報》月刊社，1969 年。

「定州卷」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國情叢書——百縣市經濟社會調查：定州卷》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1 年。

洛厄爾．迪特默：《劉少奇和中國文化大革命：群眾批判的政治》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74 年。

米洛萬．德吉拉斯：《新階級：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紐約：布拉格爾公司，1957 年。

尤根．多梅斯（杜勉)：《彭德懷其人及其形象》斯坦福：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85 年。

——《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農村社會政策》倫敦：C．赫斯特公司，1980 年。

亞瑟．J．多門：《老撾的鬥爭：中立主義的政治》倫敦：帕爾．馬爾公司，1964 年。

董保存：《譚震林外傳》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 年。

董邊、譚德山、曾自(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 年。

奧德里．唐尼索恩：《中國的經濟體制》倫敦：艾倫與昂溫公司 1967 年。

《斗批改通訊》北京。

瓊．德雷爾：《人民解放軍與新疆的地方主義》載《太平洋評論》1994 年第 1 期第 41 ～ 55 頁。

段君毅等：《少奇同志，河南人民懷念您》1980 年 5 月 21 日《人民日報》第 2 版。

段云：《財政金融論綜》北京：財政經濟出版社，1984 年。

E

羅伯特．S．埃勒根特：《毛的偉大革命》倫敦：威登菲爾德和尼科爾遜公司，1971 年。

斯蒂芬．伊拉茲馬斯：《戴高樂將軍承認北京》《中國季刊》1964 年第 18 期第 195 ～ 200 頁。

約瑟夫．W．伊謝瑞克：《義和團起義的起源》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87 年。

F

梅樂．范索德：《俄國是如何統治的》馬薩諸塞州：哈佛大學出版社修訂版，1963 年。

羅杰．費利戈特與雷米．考弗：《中國的秘密工作》倫敦：黑德萊因公司，1989 年。（原以法文出版：《康生：中國的秘密工作 (1927-1987)》巴黎：羅伯特．拉豐公司版，1987 年。）

貝納德．B．福爾：《兩個越南》倫敦：帕爾．馬爾公司，1963 年。

樊昊：《毛澤東和他的顧問》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

范平與葉篤竹（編)：《黨的建設辭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

范天順、李榮豐、祁建民（編)：《中華人民共和國，2 卷：1956-1966》北京：紅旗出版社，1994 年 (?)。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鄧小平反動言論》北京：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資料組，1967 年 10 月。

房維中（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大事記(1949-1980)》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 年。

弗朗索瓦·費吉托：《一個法國毛主義分子：雅克韋吉斯與革命》《中國季刊》1964 年第 19 期第 120 ～ 127 頁。

馬國瑞：《論中國勞動力市場》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1991 年。

喬基姆·C·費斯特：《第三帝國的面貌》倫敦：毛利斯·坦普爾·史密斯公司，1982 年。

邁克爾·菲爾德：《流行風·印度支那目擊記》倫敦：梅休因公司，1965 年。

《中國人民解放軍五十年》北京：外文出版社，1978 年。

路易斯·費希爾：《列寧生平》紐約：哈帕·科洛豐公司，1965 年。

湯姆·費希爾：《吳晗：人類典範的「正直官吏」》載哈林和奇克（編）：《中國的官方知識分子》第 155 ～ 184 頁。

大衛·弗洛伊德：《毛與赫魯曉夫對抗：中蘇衝突簡史》倫敦：帕爾·馬爾公司，1964 年。

喬舒亞·A·福格爾：《艾思奇對中國馬克思主義發展的貢獻》馬薩諸塞州劍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理事會，1987 年。

道威·福克瑪：《創造性與政治》《劍橋中國史》第 15 卷第 594 ～ 615 頁。

羅伯特·福綜：《浪跡中國三年》倫敦：邁爾德梅圖書公司重印，1987 年。

愛德華·弗里德曼、保羅·G·皮克威克斯、馬克·塞爾登及凱·安·約翰遜：《中國村莊：社會主義國家》紐黑文：耶魯大學出版社，1991 年。

G

約翰·肯尼思·加爾佈雷斯：《大使筆記：肯尼迪年代親歷記》波斯頓：霍頓·米夫林公司，1969 年。

西德尼·D·甘布爾：《定縣：一個華北農村社團》斯坦福：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68 年。

甘肅省統計局（編）：《甘肅四十年》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9 年。

高京正（編）：《平凡與偉大：毛澤東中南海遺物軼事》（畫冊）北京：西苑出版社，1993 年。

《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林彪選錄〕》無地點和單位 1966 年。

高凱與熊冠佳（編）：《新中國的歷程(1949 年 10 月 1 日 -1989 年 10 月 1 日)》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 年。

高煦、邢炳、王詮與楊清（編）：《歷史巨人毛澤東》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3 卷，1993 年。

高新與何頻：《高幹檔案：中共權貴關係事典》台北：新新聞文化事業公司，1993 年。

約翰·W·加弗：《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新澤西州恩格伍德·克利夫：普論蒂斯·霍爾公司，1993 年。

阿爾塔弗·高哈爾：《阿尤布·汗：巴基斯坦首位軍人執政》拉合爾：桑格·厄·米爾出版公司，1993 年。

郭恆鈞：《1966 年部隊工作座談會及其會議紀要實錄》《中共黨史研究》1966 年第 3 期，第 54 ～ 58 頁。

萊斯利·H·蓋爾布及理查德·K·貝茨：《越南的諷刺：體制運行得好》華盛頓特區：布魯捨斯學院，1979 年。

《耿飆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1 年。

耿升：《我們必須實事求是》《新聞研究資料》1980 年第 3 期。

T·J·S·喬治：《梅農》倫敦：喬納森角公司，1964 年。

理查德·吉布森：《評「一個法國毛主義分子：雅克韋吉斯與革命」》《中國季刊》1965年第21期第179～182頁。

約翰·吉廷斯：《「學軍」運動》《中國季刊》1964年第18期第153～159頁。

——《中國軍隊的作用》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代皇家國際事務研究院出版，1967年。

——《中蘇論戰之概觀：對最近爭論的摘要和評論》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代皇家國際事務研究院出版，1968年。

戈德曼：《中國的知識分子建議和不同意見》馬薩諸塞州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1981年。

——《共產黨中國的文學上的不同意見》馬薩諸塞州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1967年。

艾弗里·戈爾茨坦：《從趨附強者到權力平衡的政治：中國結構的制約與政治1949-1978》斯坦福：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91年。

龔固忠、唐振南與夏遠生：《毛澤東回湖南紀實1953-1975》長沙：湖南出版社，1993年。

龔育之：《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年。

龔育之、逄先知與石仲泉（編）：《毛澤東的讀書生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6年。

龔育之與石仲泉：《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新論大綱》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4年。

——《時代的重任、歷史的選擇》《新華文摘》1994年第10期第1～5頁。

理查德·N·古德溫：《記住美國：六十年代的呼聲》波斯頓：小布朗公司，1988年。

薩維帕里·戈帕爾：《尼赫魯傳（第3卷）1956-1964》倫敦：喬納森角出版社，1984年。

《中國偉大的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北京：外文出版社，1966年1、2、3期。

威廉·E·格里菲斯：《阿爾巴尼亞和中蘇分裂》馬薩諸塞州劍橋：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1963年。

——《中蘇關係1964-1965》馬薩諸塞州劍橋：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1967年。

——《中蘇分裂》倫敦：艾倫和昂溫公司，1964年。

古華：《芙蓉鎮》北京：熊貓圖書公司，1983年。

顧龍生（編）：《毛澤東經濟年譜》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

谷辛與陳梅：《鄧拓傳》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編）：《黃埔軍校史料》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2年。

廣東省高等院校「中國共產黨簡史講義」編輯部（編）：《中國共產黨簡史講義》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

「光輝的三十年」編輯部（編）：《光輝的三十年（1955-1985）》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

雅克·吉耶爾馬：《中共黨史，1921-1949》倫敦：梅休因公司，1972年。

R·W·L·奎索、凱塞琳·帕加尼、大衛·米勒：《秦始皇》多倫多：白樺胡同出版，1989年。

貴州省志：大事記（1949-1985）（徵求意見稿）地點不明，貴州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89年。

郭建榮（編）：《中國科學技術記事（1949-1989）》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

郭敏：《中越關係演變四十年》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郭沫若：《五大歷史劇》北京：外文出版社，1984年。

郭思敏和天羽：《我眼中的劉少奇》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

——《我眼中的朱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

國防部情報局：《反共游擊隊突擊福建連江虜獲匪方文件彙編》台北：國防部情報局，1964 年。

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治工作教研室：《中國共產黨七十年大事簡介》北京：國防大學出版，增訂第四版，1991 年 (1985 年曾出版過涵蓋前六十年的黨史版)。

國家經濟委員會經濟法規局和北京政法學院經濟法民法研究室 (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企業法規選編》北京：法律出版社，1981 年。

國家統計局貿易物價統計司 (編)：《中國貿易物價統計資料 1952-1983》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4 年。

中國統計局綜合司 (編)：《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歷史統計資料彙編 1949-1989》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0 年。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中共人名錄」編修委員會：《中共人名錄》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修訂第 3 版，1989 年。

H

哈利戴 (編)：《高明的阿爾巴尼亞人：霍查回憶錄》倫敦：查托與溫德斯公司，1986 年。

尼娜 · P · 哈爾彭：《經濟專家與中國經濟政策的制訂 1955-1983》密執安大學未發表博士學位論文，1985 年。

卡羅爾 · 李 · 哈姆林：「1955-1965 年中國馬克思主義內的另一種理論：楊獻珍的辯證唯物論」威斯康星大學未發表的博士學位論文，1975 年。

——「楊獻珍：維護正統列寧主義理論」載哈姆林與奇克 (編)《中國的官方知識分子》第 51 ～ 91 頁。

——「楊獻珍的哲學『罪案』」《中國法律和政府》1991 年春夏季合刊。

——與蒂莫西 · 奇克 (合編)：《中國的官方知識分子》紐約州阿爾蒙克：M · E · 夏普公司，1986 年。

韓鋼《60 年代前期黨內關於社會主義問題的新認識》載《全國黨史研究會》(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專題講座》。

韓素音：《我家有兩道門》倫敦：喬納森公司，1980 年。

——《長子：周恩來和現代中國的締造 1898-1976》紐約：科登夏國際公司，1995 年。

郝孟碧和段浩然 (編)：《中國共產黨六十年》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 卷，1984 年。

郝萍 (音譯)：《文化大革命起點再評估》《中國國際評論》(夏威夷)1966 年春季第 1 期第 66 ～ 86 頁。

郝倬民 (編)：《內蒙古自治區史》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1 年。

哈里 · 哈丁：《危機中的中國國家》《劍橋中國史》第 15 卷第 107 ～ 217 頁。

——《中國的組織制度：1949-1976 年的官僚體制》斯坦福：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81 年。

——與麥爾溫 · 格托夫：《清洗羅瑞卿：中國戰略規劃的政治》加利福尼亞州聖莫尼卡：蘭德公司報告 R—548—PR 號，1971 年。

詹姆斯 · 平克尼 · 哈里森：《奪取政權的長征：中共黨史 (1921-1972)》倫敦：麥克米倫公司，1973 年。

凱思林 · 哈特福德與史蒂文 · M · 戈爾茨坦 (編)：《星星之火：中國的農村革命》紐約州阿爾蒙克：M · E · 夏普公司，1989 年。

何禮益 (音譯) 及克萊爾 · 安妮 · 奇克：《中國先生的兒子：一個村民的生活》科羅拉多州鮑德爾：西方觀點公司，1993 年。

何頻：《中國掌權者：大陸卷 1994 年版》台北：雲鶴出版社，2 卷，1994 年。

河南省統計局（編）：《河南經濟統計年鑒1989年》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9年。
《橫刀立馬彭將軍》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羅杰斯·希爾斯曼：《感動一個國家》紐約：德爾塔公司，1968年。
哈羅德·C·欣頓：《世界政治中的共產黨中國》波斯頓：霍頓米夫林公司，1966年。
威廉·欣頓（韓丁）：《翻身：──中國農村革命的紀錄》紐約月評社，1966年。
──《身翻：一個中國農村的繼續革命》紐約：文特奇公司，1984年。
國內新聞書庫，新華社：《中國對外關係：大事記(1949-1989)》北京：外文出版社，1989年。
P·J·霍尼（編）：《今日北越：一個共產主義衛星國側影》紐約，普拉格爾公司，1962年。
洪承華與郭秀芝（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體制沿革大事記(1949-1978)》北京：春秋出版社，1987年。
《紅旗飄飄》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0年第20卷。
杰弗里·霍斯金：《1917-1991年蘇聯史》倫敦：方坦納公司，1992年最終版。
杰弗里·豪：《忠誠的衝突》倫敦：麥克米倫公司，1994年。
恩維爾·霍查：《對中國的思考》地拉那：南托利出版社，82卷，1979年。
尚誠（音譯）：《不帶地圖的旅行家》斯坦福：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93年。
許芥煜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學》布魯明頓：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1980年。
胡華主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史講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年。
胡家模：《彭德懷評傳》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胡喬木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卷，1993年第2卷，1994年第3卷。
胡青云：《中印邊境戰爭》《黨史研究資料》（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黨史研究室）1990年第11期。
胡繩：《胡喬木和黨史工作》《中共黨史研究》1994年第1期第72～76頁。
──和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
華君武：《中國的諷刺與幽默：1955-1982年華君武漫畫選》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84年。
華林（編）：《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北京：花翎出版社，1990年。
懷恩：《周總理生平大事記》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淮濱縣志辦公室（編）：《淮濱縣志1951-1983》地點不明，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懷念劉少奇同志》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懷念毛澤東同志》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
「懷念周恩來」編輯小組：《懷念周恩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黃道霞、戴舟、余展和中共中央宣傳部宣傳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十年大事記(1949-1989)》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
黃靖（音譯）：《中國共產黨政治中的宗派主義》哈佛大學未發表博士論文，1995年。
《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黃萍：《連雨春秋──陸定一在1966-1978》《南方週末》1992年8月第28期。
黃瑤：《三次大難不死的羅瑞卿大將》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年。
黃玉沖：《一代天驕──新中國空軍實戰錄》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
黃崢：《劉少奇一生》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
湖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湖北省志：大事記》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

查爾斯·O·赫克爾：《中國舊日的帝國》斯坦福：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75 年。

G·F·赫德遜、理查德·羅文塞爾、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編：《中蘇論戰》紐約：普拉格公司，1961 年。

I

印度政府外交部：《白皮書：印中兩國政府間交換的照會、備忘錄和信件 1961 年 11 月～1962 年 7 月間第 6 號：1962 年 7 月～ 1962 年 10 月第 7 號》新德里：印度政府出版社，1962 年。

國際關係研究所（編）：《中共名人錄》台北：國際關係研究所 2 卷，1970 年和 1971 年。

國際小麥理事會：《小麥貿易管理》秘書處報，1961 年 12 月第 2 號。

——《小麥貿易管理：1962/1963-1965/1966 年》秘書處報，1967 年 3 月第 7 號。

J

吉興、熊光輝、趙偉、郭思敏和天羽：《我眼中的周恩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 年。

賈思南（編）：《1915-1976：毛澤東人際交往實錄》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

賈溫品：《真理與命運：胡開明傳略》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

《建國以來工商稅收大事記》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3 年。

《建國以後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 年第 1 卷 (1949-1950 年)，1988 年第 2 卷 (1951 年)，1989 年第 3 卷 (1952 年)，1990 年第 4 卷 (1953-1954 年)，1991 年第 5 卷 (1955 年)，1992 年第 6 卷 (1956-1957 年)，第 7 卷 (1958 年)，1993 年第 8 卷 (1959 年)，1996 年第 9 卷 (1960-1961 年)，第 10 卷 (1962-1963 年)，第 11 卷 (1964-1965 年)。

江波與李清（編）：《1959 年以後的林彪》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年。

蔣寶英：《鄧子恢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

姜化宣、張蔚萍、肖：《中國共產黨會議概要》瀋陽：瀋陽出版社，1991 年。

蔣坤奇：《60 年代曾希聖在安徽推行責任田始末》《當代中國史研究》1994 年第 1 期第 56 ～ 61 頁。

江青：《江青同志論文藝》出版地點單位不明，1968 年；1977 年台灣印刷。

江卞加措：《班禪大師》北京：東方出版社，1989 年。

《教學批判》見「一個……的記錄」。

《教育革命》見「……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

金春明：《建國後三十三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

——《「文革」起因，眾說紛紜》《黨史文匯（山西）》1995 年第 3 期第 2 ～ 7 頁。

金棨（編）：《回憶譚震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年。

金振林：《毛岸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

《晉察冀日報》史研究會（編）：《人民新聞家鄧拓》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

景希珍：《在彭總身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年。

《敬愛的周總理，我們永遠懷念您》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3 卷，1977 年。

《驚心動魄的「宮廷政變」陰謀》北京：徹底摧毀舊北京市委戰鬥兵團，1967 年 7 月（編入中國研究材料中心，紅衛兵出版物補充第 4 卷第 1760 ～ 1774 頁。）

《紀念周恩來同志》（後面無任何出版地點，單位，日期——譯注）《集體和個體商業文件選編》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81 年。

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毛之後的中國經濟》華盛頓特區: 美國政府出版署 ,1978 年。
威廉 · A · 約瑟夫、O · 克利斯汀、P · W · 翁與崔大偉 (編) :《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新觀點》馬薩諸塞州劍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理事會，1991 年。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 (編):《中國人民解放軍 60 年歷史大事記 (1927-1987)》北京: 軍事科學出版社，1988 年。

K

羅伯特 · G · 凱薩 :《俄羅斯 : 人民和政權》紐約 : 袖珍圖書，1976 年。
康世恩 :《記少奇同志視察大慶油田》《黨的文獻》1993 年第 5 期第 24 ～ 26 頁。
斯坦雷 · 卡諾 :《毛和中國 : 從革命到革命》倫敦 : 麥克米倫公司，1972 年。
K · S · 卡羅爾 :《中國 : 另一種共產主義》倫敦 : 海涅曼公司，1967 年。
柯愛 :《劉少奇》濟南 : 山東人民出版社，1984 年。
道里斯 · 克爾恩斯 :《林登 · 約翰遜和美國夢》紐約 : 哈帕和勞公司，1976 年。
《科大紅衛兵 : 科學革命專輯 I》1968 年第 2 號。
《科技革命》1967 年第 1 號。
《科研批判》1968 年第 2 號孔雲峰 (音譯) :《戰爭類比 : 朝鮮、慕尼黑、奠邊府和 1965 年的越南決議》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大學 : 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92 年。
N · 赫魯曉夫 :《赫魯曉夫回憶錄》倫敦 : 安德爾 · 德意志公司，1971 年。
——《赫魯曉夫——最後的遺言》紐約 : 班坦圖書公司，1976 年。
塞奇 · 赫魯曉夫 :《赫魯曉夫論赫魯曉夫 : 關於其人和其時代的內部報告》波斯頓 : 小布朗公司，1990 年。
唐納德 · 克萊因和安尼 · B · 克拉克 :《中國共產黨傳記辭典 1921-1965》馬薩諸塞州劍橋 : 哈佛大學出版社 2 卷，1971 年。
米哈依爾·A· 科羅契科:《蘇聯科學家在紅色中國》蒙特利爾: 國際出版者代理人 ,1964 年。
空軍司令部編研室 (編) :《空軍史》北京 : 解放軍出版社，1989 年。
雅諾什· 科奈:《通向自由經濟之路從社會主義制度轉變: 匈牙利範例》紐約: 諾頓公司，1990 年。
菲利普 · A · 庫恩 :《1796-1864 年晚清中華帝國的叛亂和它的敵人 : 軍事化與社會結構》馬薩諸塞州劍橋 : 哈佛大學東亞研究理事會，1980 年。
郭華倫:《中國共產黨術語彙編》台北:「國立」誠旗(音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 ,1978 年。
基思 · 凱爾 :《蘇伊士》紐約 : 聖馬出版社，1991 年。

L

讓 · W · 拉庫奇 :《戴高樂 : 1945-1970 年的統治者》紐約 : 諾頓公司，1993 年。
亞瑟 · 拉爾 :《共產黨中國怎樣談判》紐約 : 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68 年。
尼古拉斯 · R · 拉迪 :《中國現代經濟發展中的農業》劍橋 : 劍橋大學出版社，1983 年。
——《重負下的中國經濟 1958-1965》《劍橋中國史》第 14 卷第 360 ～ 397 頁。
——和 K· 利伯索爾:《陳雲關於中國發展的戰略: 一種非毛主義的選擇》紐約州阿蒙克: M · E · 夏普公司，1983 年。
布魯斯 · 拉金 :《1949-1970 年間的中國和非洲 :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政策》伯克利 : 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73 年。
安娜 · 拉列娜 :《我永難忘懷 : 布哈林遺孀回憶錄》紐約 : W · W · 諾頓公司，1994 年。

尼格爾·勞森：《第十一號的觀點：一位保守黨急進分子的回憶錄》倫敦：科吉公司，1993 年。

邁克爾·利弗：《印度尼西亞的外交政策》倫敦：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委託艾倫和昂溫出版社，1983 年。

J·W·劉易斯：《中國的秘密軍事報刊：「連續性」和「啟示性」》《中國季刊》1964 年第 18 期第 68 ～ 78 頁。

——和薛利泰（音譯）：《中國製造炸彈》斯坦福：斯坦福大學出版，1988 年。

李晨（編）：《曲折與發展——探索道路的艱辛：第 2 卷（上）1957-1961，第 2 卷（下）1962-1965》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年。

李澄、肖曉季和王立兵：《建國以來軍史百樁大事》北京：知識出版社，1992 年。

李卓敏：《共產中國的工業發展》紐約：普拉格公司，1964 年。

——《共產中國的統計制度》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62 年。

李德彬、林順寶、金碧華、何鳳琴和金世英（編）：《新中國農村經濟紀事 1949 年 10 月～1984 年 9 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年。

《李富春選集》北京：中國京華出版社，1992 年。

利廣安、王桂珍、秦明（編）：《紀念李富春》北京：中國京華出版社，1990 年。

李健（編）：《新中國六次反侵略戰爭實錄》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 年。

李健彤：《劉志丹》北京：工人出版社，1979 年。

李俊亭楊金河：《中國武裝力量通覽 1949-1989》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年。

李可、赫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軍》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 年。

李明：《共和國歷程大寫真 (1949-1993)》北京：檔案出版社，2 卷，1994 年。

李默（編）：《新中國大博覽》廣州：廣東旅遊出版社，1993 年。

力平：《開國總理周恩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 年。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北京：春秋出版社和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年（後出增補新版名《毛澤東秘書手記：廬山會議實錄》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

——《「大躍進」親歷記》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 年。

李〔劉〕樹發主編：《陳毅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 卷，1995 年。

李偉（音譯）：《中國的人事制度：一種官僚控制與統一的機制》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東亞研究所，1994 年。

——《對中國中央領導人的保安》未出版文件。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2 卷，1986 年。

——《李維漢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

《李先念論財政·金融·貿易》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 卷，1992 年。

《李先念文選 (1935-1988)》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年。

李向前：《七千人大會始末》《黨史文匯》（太原）1992 年第 12 期。

——《1962 年的經濟調整與意見分歧》《中共黨史研究》1988 年第 6 期，第 59 ～ 67 頁。

李銀橋：《在毛澤東身邊十五年》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年。

李宇銘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辭典》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9 年。

李振霞（編）：《當代中國十哲》北京：華夏出版社，1991 年。《李志民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3 年。

李志寧（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大事典 1949 年 10 月～ 1987 年 1 月》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 年。
廖蓋隆（主編）、莊浦民、林炳輝、叢進、金春明、譚宗級、李定國、田夫（編）:《新中國編年史 (1949-1989)》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年。
廖蓋隆、丁曉春、李忠志（編）:《中國共產黨發展事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 年。
廖蓋隆、趙寶舒、杜青林（編）:《當代中國政治大事典 1949-1990》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年。
廖沫沙（編）:《祭鄧拓》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 年。
《廖沫沙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4 卷，1986 年。
遼寧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站「伐宋兵團」:《堅決打倒東北地區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宋任窮》無出版地點單位日期。
K·G·利伯索爾《大躍進和延安領導層的分裂》《劍橋中國史》第 14 卷，第 293 ～ 359 頁。
——《中共中央黨政會議研究指南 1949-1975》紐約州阿蒙克：M·E·夏普公司，1976 年。
——與布魯斯·J·迪克遜共編：《中共中央黨政會議研究指南 1949-1986 年》紐約州阿蒙克：M·E·夏普公司增訂版，1989 年。
——與歐邁格共編：《中國的政策制訂：領導人、結構和過程》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88 年。
——與詹姆士·童（音譯）和尹賽春（音譯）合編：《中國的中央文件和政治局政治》安·阿波：密執安大學中國研究中心，1978 年。
羅伯特·J·利夫頓：《不朽的革命：毛澤東和中國文化大革命》紐約：文特奇圖書公司，1968 年。
拉斯·T·李、奧列洛·V·勞莫夫和奧列格·V·克列夫紐克（編）:《斯大林致莫洛托夫書信》紐黑文：耶魯大學出版社，1995 年。
《林彪文選》無出版地點單位，下冊無日期。
〔《林彪選集》〕無出版地點單位，日期。
林杰等（組編）:「鄧拓的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話」載於《中國偉大的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2）》。
林克、徐濤和吳旭君（音譯）:《歷史的真實——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證言》香港：禮文出版社，1995 年。
林青山：《江青沉浮錄》北京：中國新聞出版社和廣州：廣州文化出版社，2 卷，1988 年。
——《康生外傳》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8 年。
——《林彪傳》北京：知識出版社，2 卷，1988 年。
林蘊暉、范守信、張弓：《1949-1989 年的中國 I ：凱歌行進的時期》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
林蘊暉、劉勇、史柏年（編）:《人民共和國春秋實錄》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 年。
林志堅（編）:《新中國要事述評》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 年。
凌志軍：《歷史不再徘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
劉愛琴：《女兒的懷念：回憶父親劉少奇》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 年。
劉賓雁：《更高一級的忠誠：一位中國最先進記者的回憶》紐約：萬神出版社，1990 年。
劉福園、唐功烈、羅力行（編）:《中國社會主義商業經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0 年。

劉吉主編：《中國共產黨七十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

劉金田（編）：《鄧小平的歷程：一個偉人和他的一個世紀》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 卷，1994 年。

《劉少奇文集》《劉少奇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言論一百例》廣州市軍管會革命委員會毛主席著作學習辦公室，1967 年 5 月。

《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選編》北京：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資料組和新北大公社批判劉鄧聯絡站，3 卷，1967 年（亦見《……批判資料》）。

《劉少奇反革命罪惡史》無出版地點，（只）爭朝夕戰鬥隊，巋然不動戰鬥隊，無日期。

劉少奇：《論共產黨員修養》北京：外文出版社修訂版，1952 年。《劉少奇選集》〔《劉少奇文選》〕無出版地點、單位、日期。《劉少奇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上集，1985 年下集。

《劉少奇研究論文集》編輯組（編）：《劉少奇研究論文輯》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 年。

《〔劉少奇〕言論集》無出版地點、單位，1967 年 9 月。

《劉少奇於 1962 年 1 月 27 日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七千人幹部）》無出版地點單位日期（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圖書館藏有微縮本）。

柳隨年：《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史綱要 (1949-1984)》北京：北京評論，1986 年。

——和吳群敢（編）：《「大躍進」和調整時期的國民經濟 (1958-1965)》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 年。劉曉：《出使蘇聯八年》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 年。

——《「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的提出及執行情況》《黨史研究》1980 年第 6 期，第 23 ～ 35 頁。

劉曉明：《中共黨建史 (1949-1976)》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1996 年。

劉學琦（編）：《毛澤東風範辭典》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1 年。

——和王習耕（編）：《周恩來風範辭典》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1 年。

劉戰明：《劉伯伯教我不怕「鬼」》1980 年 5 月 15 日《人民日報》第 2 版。

劉振德：《我為少奇當秘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 年。

龍正才：《彭德懷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問題的艱苦探索》載《中共黨史研究》1988 年第 6 期第 47 ～ 53 頁。

《陸定一反對毛澤東思想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言論摘編》北京：首都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聯絡委員會，1967 年 5 月。

路海江與賀明洲（編）：《毛澤東和他同時代的人》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年。

呂星斗（編）：《劉少奇和他的事業》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年。

——《毛澤東和他的事業》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2 卷，1992 年。

呂延〔廷〕煜：《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曲折發展 (1958-1965)》北京：紅旗出版社，1994 年。

駱耕漠：《社會主義和通貨膨脹》《北京週報》1982 年第 44 期第 20 ～ 22 頁。

M

馬洪和孫尚清（編）：《中國經濟結構問題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 卷，1981 年。

馬南村（鄧拓）：《燕山夜話》北京：北京出版社，1979 年。

馬齊彬、陳文炳、林蘊輝、叢進、王年一、張天榮、卜偉華（編）：《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 1949-1989》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 年，增訂版 1991 年。

馬雲飛：《劉少奇與60年代的國民經濟調整》載《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5期第8～16頁。
馬宇平和黃裕沖（編）：《中國昨天與今天：1840-1987國情手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
邦尼·S·麥克杜格爾：《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3年評述譯本》安·阿伯爾：密執安大學中國研究中心，1980年。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馬若德）《對失敗的剖析》《紐約書刊評論》1991年9月26日。
——《中國模式與欠發達世界》見韋爾奇《政治現代化》第373～382頁。
——《中國革命的終結》《紐約書刊評論》1989年7月20日。
——《百花齊放運動和中國知識分子》紐約：普拉格公司，1960年。
——《論照片》《中國季刊》1971年第46期第289～307頁。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I：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兩處均為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出版，1974年。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II：大躍進（1958-1960）》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兩者均為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出版，1983年。
——《中國的政治1949-1989》紐約：劍橋大學出版社，1993年。
——《中美關係1949-1971》牛頓·艾博特：大衛和查爾斯公司；紐約：普拉格公司，兩者均為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出版，1972年。
——《對毛的繼承和毛主義的終結》《劍橋中國史》第15卷第305～401頁。
——蒂莫西·奇克和尤金·吳（編）《毛主席的秘密講話：從百花齊放到大躍進》馬薩諸塞州劍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理事會，1989年。
斯蒂芬和賈尼斯·麥金農：《阿格尼斯·史沫特萊：一位美國激進人士的生平和時代》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88年。
羅伯特·J·麥克馬洪：《周邊的冷戰：美國、印度和巴基斯坦》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94年。
哈羅德·麥克米倫：《1961-1963年時期的結束》紐約：哈帕和羅公司1973年。
羅伯特·S·麥克納馬拉和布賴恩·范德馬克：《回憶：越南的悲劇和教訓》紐約：蘭頓書屋／時代圖書公司，1995年。
理查德·馬德森：《中國一個村莊的道德和權力》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84年。
安德列·馬爾勞克斯：《反回憶錄》哈蒙茲華斯：企鵝公司，1970年。
《毛澤東思想集叢（1949-1968）》華盛頓特區：聯合出版研究中心61269—1，—2，2卷，1974年。
《毛澤東軍事文集》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和中央文獻出版社，6卷，1993年。
《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毛澤東生平資料簡編1893-1969年》。
《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以下見蒂莫西·奇克對麥克法夸爾·奇克和吳的《毛主席秘密講話》分類第78～81頁）《毛澤東思想萬歲！》無出版地點、單位、時間。同書，1967年6月；同書，1967年7月；同書，1967年；同書，1969年。《毛澤東：無名稱的文集》無出版地點、單位、時間。《〔毛澤東〕學習文選》無出版地點、單位，4卷，無時間。《〔毛澤東〕學習資料》無出版地點、單位，3卷，無時間。
《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論黨的群眾工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
《（毛澤東）資料選編》無出版地點、單位（由中國研究材料中心發佈），1964年。

《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年。

《毛澤東著作選讀》北京：人民出版社，2 卷，1986 年。

《毛主席對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批判》無出版地點、單位、日期。

《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1921-1969 年）》無出版地點、單位、日期。

《毛主席語錄》廣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1966 年。

《毛主席親愛戰友林彪同志言論選》無出版地點。西南政法學院「政法兵團」，1967 年 4 月。

雅克·馬庫塞：《北京報刊：一位（駐）中國記者筆記隨錄》倫敦：亞瑟·巴克公司，1967 年。

杰伊和琳達·馬修斯：《十億：中國紀年》紐約：蘭頓書屋，1983 年。

內維爾·馬克斯韋爾：《印度的中國戰爭》哈蒙茲華斯：企鵝公司，1972 年。

瑪麗·G·梅休爾：《四十年代中國的知識分子的實踐主義：統一戰線和民主聯盟中的吳晗》《中國季刊》1993 年第 133 號。

羅伊·梅德韋杰夫：《赫魯曉夫》牛津：黑井公司，1982 年。

克勞斯·梅耐特：《蘇聯人和他的世界》紐約：普拉格公司，1961 年。

R·謝普·梅爾尼克：《章程和法庭：清潔空氣法案件》華盛頓特區布魯金斯公司，1983 年。

《一位中國元帥的回憶錄：彭德懷自傳 1898-1974》北京：外文出版社，1984 年。

《緬懷劉仁同志》北京：北京出版社，1979 年。

大衛·米爾頓和南希·道爾·米爾頓：《風不止——1964-1969 年的中國革命》紐約：萬神公司，1976 年。

《民報月刊》編輯會和丁旺（音譯）編：《中共文化大革命彙編，第 2 卷：鄧拓（案件）選輯》香港：明報月刊社，1969 年。

梅兆贊：《黨的秘密》1993 年 3 月 25 日《紐約書報評論》第 57 ～ 60 頁。

穆欣：《辦「光明日報」十年自述 1957-1967 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 年。

N

南開大學衛東批判文藝黑線聯（絡）站〔與〕「紅海洋」（編）：《無限風光在險峰：江青同志關於文藝革命的講話》天津：南開大學衛東批判文藝黑線聯（絡）站〔與〕「紅海洋」，1968 年。

巴里·諾頓：《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工業政策：軍事準備、權力下放與躍進》載約瑟夫·王和崔大偉編的《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新觀點》第 153 ～ 181 頁。

聶榮臻：《在紅星內部：聶榮臻元帥的回憶錄》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88 年。

——《聶榮臻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3 卷，1983-1984 年。

——《聶榮臻軍事文選》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 年。

理查德·尼克松：《理查德·尼克松回憶錄》倫敦：書業俱樂部協會，1978 年。

《農村政策文件選編第 2 卷（1958-1965）》北京：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系資料室，1980 年。

弗雷德里克·諾薩爾：《國際日期線——北京》倫敦：麥克唐納公司，1962 年。

亞歷克·諾夫《蘇聯經濟史》哈蒙茲華斯：企鵝公司修訂版，1982 年。

O

戴穆珍：《當代中國的國家和農民：村政府的政治經濟》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89 年。

歐邁格和蓋爾·亨德遜：《人民日報社論研究指南 (1949-1975)》安·阿伯爾：密執安大學中國研究中心，1982 年。

P

D·K·帕利特：《喜馬拉雅高山上的戰爭：危機中的印度陸軍 1962 年》新德里：蘭色公司，1991 年。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黨史——大事編年史（1919-1990）》北京：外文出版社，1991 年。

《彭德懷同志故居簡介》湖南湘潭縣：彭德懷同志故居管理所，1983 年。

《彭德懷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英譯名為《彭德懷回憶錄》）。

《彭賊「懷柔調查」是劉鄧黑司令部陰謀復辟資本主義的嚴重步驟》北京：首都紅代會和河北北京師院「紅旗」批彭聯（絡）站，1967 年 8 月 1 日。

《彭真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摘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新人大公社，毛澤東思想紅衛兵，1967 年 5 月。

彭真：《論新中國的政法工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年。

《彭真文選 (1941-1990)》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年。

《五角大樓文件》紐約：《紐約時報》班達姆公司，1971 年。

蘇珊娜·佩帕：《中國的內戰：1945 年 -1949 年的政治鬥爭》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78 年。

——《教育服務秩序》《劍橋中國史》第 14 卷第 185 ～ 217 頁。

——《關於教育的新指示》《劍橋中國史》第 14 卷第 398 ～ 431 頁。

伊麗莎白·J·佩里：《中國家庭承包的影響——鳳陽縣案件》載李聲吾（音譯）（編）《中國的改革政治：政策及其影響》，第 195 ～ 217 頁。《華北的造反者和革命者（1845-1945）》斯坦福：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80 年。

西林·法坦諾泰及詹姆斯·佩克：《龍珠》紐約：西蒙和舒斯特公司，1994 年。

本·皮姆洛特：《哈羅德·威爾遜》倫敦：哈帕·科林斯公司，1992 年。《批判資料：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北京：人民出版社資料室，3 卷，1967 年。《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北京：外文出版社，1965 年。

吉姆·普賴爾：《權力的平衡》倫敦：哈米希·漢米爾頓公司，1986 年。《蘇聯共產黨綱領》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61 年。

溥寧（音譯）：《血紅的牙齒與爪子：中國獄中 26 年》紐約：格羅夫出版社，1994 年。

白魯恂：《毛澤東：領袖人物》紐約：巴西克圖書公司，1976 年。

——《中國政治的精神實質——政治發展中的權威危機的心理文化研究》馬薩諸塞州劍橋：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1968 年。

Q

戚本禹（漢語拼法）見戚本禹（羅馬拼法）齊力（編）：《「左派」理論家浮沉錄》北京：團結出版社，1993 年。

《七千人大會資料》無出版地點、單位，油印本，1986 年 12 月（藏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圖書館）。

青木：《中國元帥朱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 年。

裘之倬等編：《中共黨史人名錄》重慶：重慶出版社，1986 年。

全國黨史資料徵集工作會議及紀念中國共產黨六十週年學術討論會（編）：《黨史會議報告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 年。

全國中共黨史研究會（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專題講座》無出版地點單位，1988 年。

權延赤：《領袖淚》北京：求實出版社，1990 年。
——《毛澤東：是人不是神》北京：外文出版社，1992 年。
——《陶鑄和他的親人：女兒眼中的父親》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 年。
——《陶鑄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年。

R

尤里·拉阿南：《1965-1966 年北京的外交政策「辯論」》載鄒 （編）《中國在危機中》第 23 ～ 71 頁。

《人民日報》社國內資料組和中國工業經濟學會調研組（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大事記（1949-1990）》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 年。

《人民手冊》北京：大公報社，1960-1965。

《人民的好總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年（卷 2）、1979 年（卷 3）。

《人民的忠誠戰士：緬懷陳毅同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年。

《關於中國共產黨歷史的決議 (1949-1981)》北京：外文出版社，1981 年。

李聲吾（音譯）（編）：《中國的改革政治：政策及其影響》漢城：蘇漢（音譯）大學出版社，1986 年。

巴里·M·里奇曼：《共產黨中國的工業社會》紐約：蘭頓書屋，1969 年。

卡爾·里斯捨:《中國的政治經濟：自 1949 年以來對發展的探索》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1987 年（原文如此——譯注）。

西德尼·里頓伯格和阿曼達·貝內特：《幕後的人》紐約：西蒙和舒斯特公司，1993 年。

安德魯·羅伯茨：《傑出的丘吉爾一族》倫敦：鳳凰公司，1995 年。

弗蘭克·羅伯遜：《難民和部隊的移動——來自香港的報告》載《中國季刊》1962 年第 11 期第 111 ～ 115 頁。

托馬斯·魯賓遜：《中國對抗蘇聯：中國內陸邊境的戰爭與外交》《劍橋中國史》第 15 卷第 218 ～ 301 頁。

羅伯特·S·羅斯：《印度支那的較量：1975-1979 年中國的越南政策》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88 年。

S

哈里森·E·索爾茲伯里：《長征：未講完的故事》紐約：哈珀和羅公司，1985 年。
——《新皇帝：毛和鄧時代的中國》紐約：阿馮公司，1993 年。

倫納德·夏皮羅：《蘇聯共產黨》倫敦：艾爾和斯波蒂斯伍德公司，1960 年。

沈邁克：《中國共產黨中央專案組（1966-1979）》斯德哥爾摩大學太平洋亞洲研究中心工作文件 36 號，1995 年 1 月。
——《中央專案組（1966-1979）》載《中國季刊》1996 年 3 月第 145 期第 87 ～ 111 頁。
——《按中國政策詞彙辦事：五份研究》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東亞研究所，1992 年。
——《一個內情人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報告：王力回憶錄》《中國法律和政府》1994 年 11 ～ 12 月第 16 頁。
——《毛澤東在 1957 年『莫斯科會議』上的講話》《共產主義研究雜誌》2，1986 年第 2 期第 109 ～ 126 頁。

施拉姆：《「經濟掛帥嗎？」三中全會以來的思想和政策（1979-1984）》《中國季刊》第 99 期第 417 ～ 461 頁。
——《毛澤東》哈蒙茲華斯：企鵝公司修訂版，1967 年。

——《未經修飾的毛澤東：談話和書信(1956-1971)》哈蒙茲華斯：企鵝公司，1974年。
——《毛走向權力的道路：1912-1949年的革命著作（I），前馬克思主義時期》紐約阿蒙克：M·E·夏普公司，1992年。
——《1921-1966年毛澤東的新文本》《共產黨事務》(2) 1983年第2期第143～165頁。
——《毛澤東的思想》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89年。
彼得·施拉恩：《1950-1959年中國農業的發展》厄本納：伊利諾斯大學出版社，1969年。
法朗茲·舒爾曼：《中國的新經濟政策——過渡還是開始》載李（編）《共產黨中國的工業發展》第65～91頁。
——《共產中國的意識形態和組織》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66年。
維拉·施瓦茨：《講真話的時間已經結束了：和張申甫談話錄》紐黑文：耶魯大學出版社，1992年。
亨利·G·許華茨：《參考消息：中國官員對外部世界瞭解到何程度？」《中國季刊》1966年第27期第54～83頁。
《鄧小平選集(1938-1965)》北京：外文出版社，1992年。
《劉少奇選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84年第1卷，1991年第2卷。
《毛澤東選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65年卷1，卷3，1961年卷4，1977年卷5。（原文無卷2——譯注）。
《周恩來選集》卷2北京：外文出版社，1989年。
《朱德選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86年。
巴巴尼·森古普塔：《亞洲的支點》紐約：飛馬公司，1970年。
沙力和閻力（編）：《中國九次大發兵》四川：四川文藝出版社，1992年。
西奧多·沙巴德：《中國變化中的地圖》紐約：普拉格公司修訂版，1972年。
上海社會科學院「上海經濟」編輯部（編）：《上海經濟(1949-198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上海市統計局（編）：《上海統計年鑒1983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商業部商業經濟研究所（編）：《新中國商業史稿（1949-1982）》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4年。
山西四十年編輯委員會（編）：《山西40年(1949-1989)》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9年。
T·H·沈（音譯）：《中國農業資源》紐約州伊薩卡：康奈爾大學出版社，1951年。
盛平（編）：《中國共產黨人大辭典(1921-1991)》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1年。
瑪利·謝里登：《英雄們的競爭》《中國季刊》1968年第33期第49～72頁。
師博：《1962：中印大戰紀實》北京：中國大地出版社，1993年。
師東兵：《最初的抗爭：彭真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
施盈富：《秘密出兵亞熱叢林：援越抗美紀實》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0年。
師哲：《峰與谷：師哲回憶錄》北京：《紅旗》出版社，1992年。
——《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
石仲泉：《毛澤東的艱辛開拓》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
——《周恩來的卓越奉獻》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
菲利普·肖特：《龍與熊：今日中國和蘇聯》倫敦：霍德和斯托頓公司，1980年。
舒云：《是否宣傳雷鋒，曾有一場爭議》《炎黃春秋》1993年5月11日第4～9頁。

維維恩·舒耶：《過渡時期的中國農民：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過程 1949-1956》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80 年。

瑞金：《周恩來的另一個世界》《炎黃春秋》1991 年 7 月 1 日第 28 ～ 36 頁。

哈羅德·舒克曼（編）：《斯大林的將軍們》倫敦：韋登弗爾德和尼科爾遜公司，1993 年。

四川省統計局（編）：《四川社會統計資料 1949-1988》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9 年。

——《四川統計年鑒 1990》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0 年。

海倫·F·西尤：《華南的代理人和受害者：農村革命的共謀犯》紐黑文：耶魯大學，1989 年。

阿格尼斯·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紐約：每月評論出版社，1956 年。

瓦克拉弗·斯米爾：《中國的能源：一個系統的分析》載聯合經濟委員會《毛以後的中國經濟》第 323 ～ 369 頁。

赫德里克·史密斯：《俄國人》紐約：巴蘭坦圖書公司 1984 年修訂版。

埃德加·斯諾：《漫長的革命》倫敦：哈欽森公司，1973 年。

——《大河彼岸：今日紅色中國》紐約：蘭頓出版社，1961 年；（修訂版：《今日的紅色中國：大河彼岸》哈蒙茲沃爾斯：企鵝圖書出版社，1970 年）。

——《紅星照耀下的中國》哈蒙茲沃爾斯：企鵝圖書出版社，1968 年修訂增補版。

洛伊斯·惠勒·斯諾：《舞台上的中國》紐約：蘭頓出版社，1972 年。

菲利普·斯諾：《星筏：中國撞上非洲》紐約州伊薩卡：康奈爾大學出版社，1989 年。

多羅西·J·索林格：《社會主義的中國商業：國內商業政策（1949-1980）》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84 年。

理查德·H·所羅門：《毛的革命和中國的政治文化》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71 年。

《宋任窮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4 年。

宋任窮、陳丕顯、葉飛：「奮鬥不息的堅強戰士——紀念曾希聖同志逝世 20 週年」《新華月報》1988 年第 8 期第 34 ～ 35 頁。

西奧多·索倫森：《C·肯尼迪》倫敦：霍德和斯托頓公司，1965 年。

艾伯特·斯皮爾：《在第三帝國》倫敦：斯費爾圖書公司，1971 年。

約翰·布賴恩·斯塔爾：《繼續革命：毛的政治思想》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79 年。

國家統計局：《偉大的十年》北京：外文出版社，1960 年。

蘇東海和方孔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風雲實錄》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 卷，1994 年。

蘇雙碧（編）：《吳晗自傳書信文集》北京：中國人事出版社，1993 年。

——和王宏志：《吳晗傳》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年。

孫啟泰和熊志勇：《大寨紅旗的升起與墜落》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年。

孫維本（編）：《中國共產黨黨務工作大辭典》北京：展望出版社，1989 年。

《孫冶方選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 年。

T

譚宗級、鄭謙等：《十年後的評說：「文化大革命」史論集》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年。

陶魯笳：《一個省委書記回憶毛主席》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

「陶鑄文集」編輯委員會（編）:《陶鑄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
「陶鑄文集」編輯組（編）:《悲祭陶鑄》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年。
《桃園調查紀實——揭露劉少奇王光美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滔天罪行》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紅衛兵戰鬥隊，1967 年。
杰伊·泰勒:《中國和東南亞：北京與革命運動的關係》紐約：普拉格出版社，1976 年第 2 版。
泰偉斯:《中國的領導權：合法性和鬥爭》紐約州阿蒙克：M·E·夏普公司，1984 年。
——《毛和其助手們》載《澳大利亞中國事務雜誌》1988 年第 19 ～ 20 期。
——《王朝的政治——五十年代初高崗和黨的宗派主義》紐約州阿蒙克：M·E·夏普公司，1990 年。
——《中國的政治與清洗：整風與黨的準則的衰敗 1950-1965》紐約州阿蒙克：M·E·夏普公司，1993 年第 2 版。
——和孫華倫《林彪的悲劇：在文化大革命中騎虎 1966-1971》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1996 年。
滕文藻:《關於七千人大會的評價問題》油印本，藏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圖書館。
羅斯·特里爾:《毛澤東傳》紐約：哈帕爾和羅公司 1980 年另有西蒙和舒斯特公司，1993 年新版。《白骨精：毛澤東夫人傳》紐約：威廉、莫羅公司，1984 年(中譯名《江青傳》——譯注)。
瑪格麗特·撒切爾:《唐寧街歲月》紐約：哈帕爾·科林斯公司，1993 年。
卡萊爾·A·塞耶:《另一種手段的戰爭：越南的民族解放和革命 1954-1960》悉尼：艾倫·昂溫公司，1989 年。
S·伯納德·托馬斯:《高度冒險的時刻：埃德加·斯諾在中國》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96 年。
勞倫斯·G·湯普森:《大同書：康有為的一元世界哲學》倫敦：艾倫·昂溫公司，1958 年。
羅杰·R·湯普森(譯):《毛澤東：來自尋鄔的報告》斯坦福：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90 年。
天津社會科學院研究所（編）:《天津經濟建設大事記（1949-1987）》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1989 年。
約翰·托蘭:《阿道夫·希特勒》紐約：鐵錨書屋雙日社，1976 年。
特里薩·托蘭斯卡:《他們：斯大林的波蘭傀儡》紐約：哈帕·和羅公司，1987 年。
鄒讜（編）:《中國在危機中（2）：中國在亞洲的政策和美國的選擇》芝加哥：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68 年。
萊昂·托洛斯基:《我的一生：擬自傳》哈蒙茲沃爾斯：企鵝公司，1975 年。
羅伯特·C·塔克:《掌權的斯大林：來自上層的革命 1928-1941 年》紐約：諾頓公司，1990 年。
董利誠（音譯）:《北京每年的風俗和節日》(譯者：德克·波德）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1965 年第 2 版。
康斯坦丁·董（音譯）和科林·麥克拉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戲劇》奧爾巴尼：紐約州立大學，1987 年。

U

亞當·B·烏蘭:《布爾什維克們》紐約：科里爾圖書公司，1968 年。
——《斯大林：其人和其時代》紐約：瓦伊捨公司，1973 年。
聯合研究院:《共產中國名人錄》香港：聯合研究院修訂版，2 卷本，1969 年。

V

萊曼·P·范斯萊克（范力沛）：《敵與友：中共歷史上的統一戰線》斯坦福：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67 年。

傅高義：《共產主義治理下的廣州：一個省會的綱領和政治 1949-1968》馬薩諸塞州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1969 年。

德米特里·沃爾科戈洛夫《斯大林：勝利和悲劇》加利福尼亞州羅克林：普賴梅出版社，1992 年。

——《列寧新傳》紐約：自由出版社，1994 年。

——《永久的革命家——托洛斯基》紐約：自由出版社，1996 年。

W

魯道夫·G·瓦格納：《當代中國歷史劇：四份研究》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90 年。

外交部外交史編輯室（編）：《新中國外交風雲》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第 1 卷，1990 年，第 2 卷，1991 年。

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當代中國世界外交生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第 1 卷，1995 年。

魏昂德：《共產黨的新傳統主義：中國工業中的工作與權威》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86 年。

肯尼思·R·沃克：《中國糧食穀物的收購和消費》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84 年。

王邦佐：《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

王炳南：《回憶中美談判九年》《世界知識》1985 年第 4 ～ 8 期記載聯合出版研究服務ＣＰＳ 85079 號，1985 年 8 月 7 日出版。

王必勝：《鄧拓評傳》北京：群眾出版社，1986 年。

王春才：《彭德懷在三線》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年（1992 年訂正版名《元帥的最後歲月：彭德懷在三線》）。

汪東興：《隨毛主席重上井岡山日記》中共黨史研究室《中共黨史研究資料》第 40 期第 124 ～ 144 頁。

——《毛主席關懷我們成長》《炎黃春秋》1993 年第 7 期第 5 ～ 6 頁。

王耕今：《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尊重農業是基礎的規律》《經濟研究》1979 年第 12 期第 36 ～ 38 頁。

王貴誠和陸學儀（編）：《農村經濟典型調查——林縣經濟發展的回顧與展望》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9 年。

《王稼祥選集》編輯組（編）：《王稼祥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年。

王建英（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彙編：領導機構沿革和成員名錄》北京：紅旗出版社，1983 年。

王晶晶、楊順、王子辛、梁曉東和楊冠三：《鄉村三十年：鳳陽農村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實錄（1949-1983）》北京：農村讀物出版社，2 卷，1989 年。

王力：「王力談毛澤東」第二次徵求意見稿，1995。

——《王力遺言》，未發表，1988。

——《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 年。

王年一：《「文革」漫談》未出版手稿。

——《1949-1989 年的中國，（3）：大動亂的年代》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

王任重：《讀書筆記》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

—— 金明、雍文濤、於明濤：《松樹的風格長存》《新華月報》1989年第11期第49～52頁。

王若實（音譯）：《中國政治貞女——毛澤東和他的鬥爭哲學》《當代中國雜誌》1995年秋季號第66～80頁。

王賢振：《援越抗美實錄》成都：國際文化出版社，1990年。

王鹹金：《熱血冰山》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

王一夫：《新中國統計史稿》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6年。

王稼、廖承志、肖勁光、伍修權、傅鍾、方強、鍾子云：《回憶與繼承——紀念王稼祥同志》1981年2月4日《工人日報》譯文載「國外廣播新聞—中國—81—038」第3～12頁。

王志民和張北根：《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內亂驟起1965-1969》北京：紅旗出版社，1994年。

伯頓·沃森：《哥倫比亞中國詩歌集》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84年。

D·C·瓦特（編）：《1961年國際事務文獻》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受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委託出版，1965年。

——《1961年國際事務縱覽》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受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委託出版，1965年。

蘇珊·韋格林——施韋德茲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黨史學》《澳大利亞中國事務雜誌》1987年1月17日第77～94頁。

克勞德·E·小韋爾奇（編）：《政治現代化：比較政治變革讀本》加利福尼亞州貝爾蒙特：華茲華斯公司，1967年。

聞捷（編）：《八載春城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

文聿：《中國「左」禍》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年。《文獻和研究1983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威廉·懷特勞：《懷特勞回憶錄》倫敦：奧朗出版社，1989年。

艾倫·S·惠廷：《中國對威懾因素的估計：印度與印度支那》安·阿波爾：密執安大學出版社，1975年。

——《中蘇分裂》《劍橋中國史》第14卷第478～538頁。

威廉·W·惠特森與黃承夏（音譯）：《中國高層指揮機構：共產黨軍政史（1927-1971）》倫敦：麥克米倫公司，1973年。

《中國名人錄》編輯局：《中國名人錄：現代領導人》北京：外文出版社，1989年。

《共產黨中國名人錄》香港：聯合研究院，1969年修訂版，2卷。

查理·F·威爾遜：《加拿大的穀物銷售》加拿大國際穀物研究所，1979年。

狄克·威爾遜：《毛澤東在歷史的天平上》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77年。

威爾遜、約翰·威爾遜和謝莉若（音譯）：《中國造了炸彈》斯坦福：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88年。

羅克珊·威特克：《江青同志》波斯頓：小布朗公司，1977年。

《我們的周恩來》編輯組（編）：《我們的周恩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

世界銀行：《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華盛頓特區：世界銀行，9卷，1981年。

吳晗：《海瑞罷官》洛杉磯：貝德出版社，1968年。

——《吳晗和「海瑞罷官」》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吳晗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4卷，1988年。

——《吳晗文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 年。

——《吳晗的學術生涯》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年。

哈里·吳和卡羅林·威克曼：《苦風：回憶在中國古拉格的歲月》紐約：約翰·威利公司，1994 年。

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 年。

巫寧坤和李益凱（音譯）：《一滴淚》紐約：大西洋月刊出版社，1993 年。

伍仁（編）：《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3 卷，1992 年。

伍修權：《回憶與懷念》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年。

吳原禮（音譯）：《共產黨中國的經濟發展與能源利用》紐約：普拉格公司（代胡佛研究所），1963 年。

吳在平：《巨人的情懷：毛澤東與中國作家》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 年。

武漢師範學院中文系當代文學教研室（編）：《關於當代文藝問題的內部講話選編》武漢：1979 年。

X

蕭心力（編）：《巡視大江南北的毛澤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年。

謝春濤：《大躍進狂瀾》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年。

謝明干和羅元明（編）：《中國經濟發展 40 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年。

謝益顯：《折衝與共處》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年。

新華通訊社攝影部和吉林教育出版社（編）：《永恆之日》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 年。

「新聞界人物」編輯委員會（編）：《新聞界人物（5）：鄧拓》北京：新華出版社，1985 年。

辛真：《一切從實際出發》《新聞研究資料》，1980 年第 3 期。

星火燎原編輯部（編）：《解放軍將領傳》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4 年。

——《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帥名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6 年第 1 卷，1987 年第 2、3 卷。

許滌新：《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 年。

——《中國對經濟增長的探索：1949 年以來的中國經濟》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82 年。

徐達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 ～ 5 卷 1994 年。

徐及之：《毛澤東與胡喬木的詩詞交往》《黨的文獻》1993 年第 6 期第 81 ～ 86 頁。

許全興：《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 1956-1976》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 年。

許向：《周總理與記者的談話》《新聞研究資料》1980 年第 3 期。

徐焰：《中印邊界之戰歷史真相》香港：天地圖書，1993 年。

《虛與實》（安徽）。

裘慕鴻與裘建章（音譯）（編）：《當代中國外交》香港：新地平線出版社，1990 年。

薛暮橋：《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北京：外文出版社，1981 年。

——《當前我國經濟若干問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年。

——《我國物價和貨幣問題研究》北京：紅旗出版社，1986 年。

Y

邁可爾·亞胡達：《克里姆林宮學與中國的戰略戰爭 1965-1966》《中國季刊》1972 年第 49 期第 32 ～ 75 頁。

閻放鳴：《三線建設述評》《黨史研究》1987 年第 4 期第 70 ～ 73 頁。

彥奇主編：《中國各民主黨派史人物傳》北京：華夏出版社，3 卷，1991 年。
本杰明．楊：《從革命到政治：長征中的中國共產黨人》科羅拉多州鮑德爾：西方觀點公司，1990 年。
楊春貴（編）：《中國哲學 40 年 (1949-1989)》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 年。
楊懋春（馬丁．M．C）：《一個中國村莊：山東省泰頭（音譯）》倫敦：科干保羅．特倫奇．特拉布勒爾公司，1947 年。
楊尚昆：《懷念劉少奇同志》《紅旗》1980 年第 8 期，譯文載《聯合出版研究服務 75921》1980 年 6 月 23 日第 13 ～ 14 頁。
姚文元：《評『三家村』——〈燕山夜話〉和〈三家村筆記〉的反動本質》譯文載《中國的偉大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Ⅰ）》。
姚雪垠：《李自成》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77 年修訂版第 1 卷。
姚仲明、謝伍申和裴建章：《將軍．外交家．藝術家——黃鎮紀念文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 年。
葉永烈：《陳伯達其人》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0 年。
——《胡喬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 年。
——《藍蘋外傳》大連：大連出版社，1988 年。
——《新中國沉重的一幕》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 年。
——《張春橋沉浮史》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88 年。〔再發行時有第 3 個附錄，書改名為《張春橋傳》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 年。〕
《以林副統帥為光輝榜樣無限忠於偉大領袖毛主席》北京：無出版單位（上），1966 年。
肯尼斯．T．楊：《與中國共產人談判：美國的經驗 1953-1967 年》紐約：麥克格勞．希爾公司（代外交關係理事會 1968 年）。
安東尼．C．俞（翻譯並編輯）：《通向西方的旅程》芝加哥：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 ～ 4 卷，1977-1983 年。
於俊道和李捷（編）：《毛澤東交往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
袁浩和建民（編）：《千秋功罪》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年。
袁永熙（編）：《中國人口：總論》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1 年。

Z

唐納德．S．扎戈里亞：《中蘇衝突：1956-1961》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62 年。
——《北京的戰略爭論》載鄒讜的《中國在危機中》第 237 ～ 268 頁。
曾璧鈞和林木西（編）：《新中國經濟史 1949-1989》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0 年。
《曾生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1 年。
曾希聖：《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虛與實》（合肥）1958 年第 1 期第 5 ～ 11 頁。
《斬斷劉鄧伸向科技界的黑手資料彙編 5 和 7：科研「十四條」專集》北京：首都科技界革命造反派批判劉鄧聯絡站，1967 年 6 月第 5 集、7 月第 7 集。
張德瓊：《在莫斯科六年半》《中共黨史資料》1996 年 6 月第 58 期第 31 ～ 41 頁。
張化：《試論『文化大革命』中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載譚宗級和鄭謙等《十年後的評說：「文化大革命」史論集》第 141 ～ 155 頁。
張全珍、侯光文和王永盛（編）：《周恩來的感情世界》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2 年。
張容：《風雲人物見聞錄》北京：中國文藝出版社，1992 年。
張塞（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大事記 (1949-1991)》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2 年。

張素華、邊彥軍和吳曉梅：《說不盡的毛澤東》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3 年。

張天榮：《關於 1962 年七千人大會的幾個問題》北京：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 1981 年 5 月 12 日油印本（藏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圖書館；《黨史研究》1981 年第 5 期第 19 ～ 29 頁載有該文但有重大刪節）。

──呂澄、鍾碧輝和王延賓（編）:《黨的建設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 年。

張希賢：《陳佈雷與陳伯達》太原：書海出版社，1993 年。

張向凌（編）：《黑龍江四十年》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 年。

張賢亮：《草湯》倫敦：米納瓦公司，1995 年。

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林彪秘書回憶錄》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 年。

張澤榮（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紀事》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86 年。

趙德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 (1949-1966)》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專題大事記 (1949-1967)》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

趙生暉:《1965 年中央組織部關於黨的建設的三個報告的產生過程》《中共黨史資料》(52) 第 12 ～ 21 頁。

──《中國共產黨組織史綱要》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年。

鄭謙和韓鋼：《晚年歲月：1956 年後的毛澤東》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3 年。

鄭笑楓和舒玲：《陶鑄傳》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2 年。

政治學院中共黨史教研室（編）:《中國共產黨六十年大事簡介》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85 年。

鍾誠、夏魯和葉蘭（編）:《領袖交往實錄系列：毛澤東》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年。

仲侃：《康生評傳》北京：紅旗出版社，1982 年。

鍾榮：《中國漲價風暴》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年。

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史編寫組：《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4 年。

《中共黨史導讀》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 卷，1991 年。

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1980—。

中共黨史研究會（編）:《學習歷史決議專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 年。

中共河北省委黨委研究會（編）:《領袖在河北》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 年。

中共湖北省黨史資料征編委員會（編）:《毛澤東在湖北》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 年。

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和江蘇省檔案局（編）:《毛澤東在江蘇》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 年。

中共祁陽縣委員會（編）:《懷念陶鑄同志》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 年。

「中共人名錄」編修委員會：《中共人名錄》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89 年。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毛澤東在上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 年。

中共山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彭真生平大事年表》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 年。

中共四川省委研究室（編）:《四川省情》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年。

中共湘潭市委黨史資料徵集辦公室（編）:《毛澤東與湘潭》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 年。

中共中央辦公廳（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年。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

——《中共黨史資料》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82 年。
——《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1919 5-1987 1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年。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局（編）：《毛澤東的足跡》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 年。
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中國共產黨 70 年的歷程和經驗》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年。
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資料組（編）：《中國共產黨歷次重要會議集（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
中共中央黨校科研辦公室「毛澤東思想原理講話」編寫組（編）：《毛澤東思想原理講話》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3 年。
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室（編）：《四十年的回顧與思考》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年。
——《中共黨史專題講義：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8 年。
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文化組（編）：《黨和國家領導人論文藝》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2 年。
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
《中共中央文件》（23 條）無出版地點、單位，1965 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註釋本（修訂）》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
——《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 年。
——《周恩來經濟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年。
——《朱德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研究組和新華出版社：《毛澤東畫冊》北京：新華出版社，1993 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和新華通訊社（編）：《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 年。
——《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 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共中央黨校：《劉少奇論黨的建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 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央檔案館、「黨的文獻」編輯部（編）：《中共黨史重大事件述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
「中國百科年鑒」編輯部（編）：《中國百科年鑒 1981 年》北京：中國大百科出版社，1981 年。
《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 卷，1981 年。
中國革命博物館（編）：《紀念周恩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
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黨史研究資料》，1981 年。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重印，1980 年。
「中國教育年鑒」編輯部（編）：《中國教育年鑒 (1949-1981一》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 年。
中國毛澤東思想理論與實踐研究會歷史會（編）：《毛澤東思想辭典》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 年。
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編）：《包產到戶資料選》無出版地點、單位，1981 年。

中國農業經濟學會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編）:《鄧子恢農業合作思想學術討論會論文選》北京：農業出版社，1989 年。

中國農業年鑒編輯委員會（編）:《中國農業年鑒 1980 年》北京：農業出版社，1981 年。

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代表大會文獻資料彙編（1949-1990）》北京：中國民主法製出版社，1990 年。（1954 年才開第一屆人大，原文年代如此——譯注）

《中國人口》：各省分冊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7 年（安徽、北京、河北、湖南、江蘇、遼寧、內蒙古、上海、天津）；1988 年（甘肅、廣東、廣西、吉林、寧夏、陝西、四川、浙江）；1989 年（黑龍江、河南、青海、山西）；1990 年（新疆）。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編）:《陳毅元帥豐碑永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北京：國防大學 14 卷 1985-1988 年（14 ～ 27 卷）。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北京：國防大學 3 卷，1988 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編輯室（編）:《經濟學文集 1980 年》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物資經濟研究所和商業部教育局（編）:《論商品流通：商品流通經濟理論討論會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0 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情報資料室（編）:《中國工業經濟法規彙編 (1949-1981)》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1 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企業管理研究室（編）:《中國工業管理部分條例彙編》北京：地質出版社，1980 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學術資料室（編）:《孫冶方經濟理論評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資料室、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資料室和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資料室（編）:《社會主義經濟中計劃與市場的關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 卷，1980 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和「中國文學研究年鑒」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文學研究年鑒 1981 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 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圖書資料室（編）:《周恩來與文藝》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 卷，1980 年。

中國問題研究中心：《林彪專輯》香港：「梓年」（音譯）出版社，1970 年。

「中國政府工作概要」編寫組（編）:《中國政府工作概要》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年。

中華全國總工會政策研究室（編）:《中國企業領導制度的歷史文獻》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86 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財政（教）學研究所和中央財政金融學院（編）:《中國財政問題》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81 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 (1958-1981—) 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下），1981 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1—。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行政區劃處（編）:《全國鄉鎮地名錄》北京：測繪出版社，1986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計劃司（編）:《中國農村經濟統計大全（1949-1986）》北京：農業出版社，1989 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和外交史研究室（編）:《懷念陳毅》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1 年。

——《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 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與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 年。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 (1949-1982)》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3 年。

《中央首長講話》北京：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1967 年。

中央宣傳部辦公廳（編）:《黨的宣傳工作會議概況和文獻（1951-1992)》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 年。

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史編寫組:《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4 年。

周恩來:《關於文藝工作的三次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

《周恩來選集》（英文版）見《周恩來選集》（中文版）（譯注）。

《周恩來書信選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 年。

《周恩來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年上冊、1984 年下冊。

「周恩來研究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編輯組（編）:《周恩來研究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 年。

周國全和郭德宏:《動亂中的陳伯達》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 年。

周明（編）:《歷史在這裏沉思——1966-1976 年紀實》北京：華夏出版社，1986 年 1 ～ 3 卷；太原：北嶽出版社，1989 年 4 ～ 6 卷。

周繼仁:《賈拓夫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 年。《周揚、夏衍、陳荒煤在電影方面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罪行錄》北京：紅代會北京電影學院井岡山文藝兵團等卷 4，無日期。

周月犁:《曾希聖同志的一生》載《學術界》（安徽）1995 年第 2 期第 82 ～ 6 頁。

周振想和邵景春（編）:《新中國法制建設四十年要覽 (1949-1988)》北京：群眾出版社，1990 年。

朱成家（編）:《中共黨史研究論文選》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下，1984 年。

《朱德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北京：首都徹底批判朱德聯絡站，1967 年 4 月 15 日第 2 集。

《朱德選集》見《朱德選集》（中、英兩種文本——譯注）。

《朱德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

朱仲麗:《女皇夢：江青外傳》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 年（原在香港出版署名朱山《江青逸事》)。《駐馬店市志》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

《著作大辭典：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 卷，1991 年。

鄒愛國和薛建華:《中國大廣角》(1、2) 廣東：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 年。

朱伯克·符拉迪斯拉夫和康斯坦丁·普萊沙柯夫:《克里姆林宮冷戰內幕：從斯大林到赫魯曉夫》馬薩諸塞州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1996 年。

崔大偉:《中國的農業激進主義 (1968-1981)》馬薩諸塞州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1989 年。